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 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列宁斯大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有殷叙彝、李
兴耕、周懋庸、唐春华、李宗禹、杨威
理、周家碧、于沪生、涂敏、袁延明。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列 宁 斯 大 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印张 522,000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500

书号11002·535 定价2.45元

说 明

1895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从1896年10月起，伯恩斯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1899年1月，伯恩斯坦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在德国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许多党员对伯恩斯坦的背叛行为表示不满和反对，并且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在1898年10月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第一次对伯恩斯坦进行了批判。之后，汉诺威（1899年）、卢卑克（1901年）、慕尼黑（1902年）和德累斯顿（1903年）这四次代表大会也就伯恩斯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除慕尼黑大会外，其他三次大会都通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案。与此同时，双方的刊物也发表了不少针锋相对的争论文章。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这次大斗争，涉及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策略的重大原则问题。这场斗争从总的方面说是不彻底的，但是为后来的大规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有助于研究这段斗争的历史，我们编译了这本书。

本书选辑的资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代表大会上各

EURO / 13

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报告、发言以及有关的重要提案和决议；(二) 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阿德勒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来往信件；(三) 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的重要文章。全书根据这一斗争发展的阶段分为五个部分，按年代顺序编排。我们在每一部分的开头加了编者说明，并作了一些注释，供读者参考。另外，书中收入的普列汉诺夫给考茨基的两封信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是采用现有的中译文，只在个别的地方作了文字上的改动。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列 宁 斯大林

1979年8月

目 录

(一)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3)
(1898年2月15日)
- 卡·考茨基致维·阿德勒(摘录) (4)
(1898年4月9日)
- 格·普列汉诺夫致卡·考茨基 (5)
(1898年5月20日)
- 格·普列汉诺夫致卡·考茨基 (7)
(1898年5月30日)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8)
(1898年9月9日)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8)
(1898年9月24日)
- 罗·卢森堡 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 (10)
(1898年10月2日)
- 在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阿·施塔特哈根 (15)
(10月3日)
- 威·彼乌斯 (16)
(10月3日)
- 沃·海涅(摘录) (17)
(10月3日)
- 奥·倍倍尔 (19)
(10月3日)

克·蔡特金	(22)
(10月3日)	
布·休恩朗克	(25)
(10月3日)	
罗·卢森堡	(26)
(10月3日)	
格·福尔马尔(摘录)	(28)
(10月4日)	
沃·海涅	(30)
(10月4日)	
克·蔡特金(摘录)	(33)
(10月4日)	
罗·卢森堡	(35)
(10月4日)	
奥·倍倍尔	(38)
(10月4日)	
卡·考茨基	(44)
(10月4日)	
克·蔡特金(摘录)	(50)
(10月4日)	
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50)
(10月4日)	
罗·卢森堡 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摘录)	(54)
(1898年10月11日)	
奥·倍倍尔致爱·伯恩施坦	(59)
(1898年10月16日)	
爱·伯恩施坦致奥·倍倍尔	(63)
(1898年10月20日)	
爱·伯恩施坦 声明(摘录)	(71)
(1898年10月20日)	

- 奥·倍倍尔致爱·伯恩施坦 (72)
 (1898年10月22日)
- 卡·考茨基致爱·伯恩施坦 (75)
 (1898年10月23日)
- 爱·伯恩施坦 私人声明 (84)
 (1898年11月)
- 格·普列汉诺夫 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
 ——给卡尔·考茨基的公开信 (86)
 (1898年10—11月)
- 卡·考茨基 私人声明 (99)
 (1898年11月)
- 维·阿德勒致奥·倍倍尔 (101)
 (1898年11月1日)
- 奥·倍倍尔致维·阿德勒 (104)
 (1898年11月4日)
- 卡·考茨基致维·阿德勒 (107)
 (1898年12月23日)

(二)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113)
 (1899年3月22日)
- 罗·卢森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摘录) (114)
 (1899年4月)
- 保·康普夫麦尔 伯恩施坦这个“小资产者” (144)
 (1899年4月)
- 拉·龚普洛维奇 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 (151)
 (1899年4月)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附抄件) (163)
 (1899年8月3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65)
(1899年9月3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66)
(1899年9月9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167)
(1899年9月11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169)
(1899年9月13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70)
(1899年9月22日)	
卡·考茨基 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 (摘录)	(171)
(1899年9月)	
奥·倍倍尔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 会上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 的攻击”的报告	(181)
(1899年10月10日)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爱·大卫 (摘录)	(230)
(10月10日)	
路·沃尔特曼	(242)
(10月11日)	
威·李卜克内西 (摘录)	(245)
(10月11日)	
卡·考茨基 (摘录)	(250)
(10月11日)	
罗·卢森堡 (摘录)	(251)
(10月11日)	
克·蔡特金 (摘录)	(257)
(10月12日)	

卡·弗罗梅（摘录）	（259）
（10月12日）	
格·累德堡（摘录）	（261）
（10月12日）	
阿·施塔特哈根（摘录）	（262）
（10月12日）	
伊·奥艾尔	（264）
（10月12日）	
格·福尔马尔（摘录）	（272）
（10月12日）	
罗·卢森堡	（276）
（10月12日）	
奥·倍倍尔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	
（摘录）	（277）
（1899年10月13日）	
奥·倍倍尔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	
关于第五项议程的决议	（281）
（1899年10月13日）	
保·辛格尔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摘录）	（282）
（1899年10月14日）	
卡·考茨基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摘录）	（283）
（1899年10月18日）	
爱·大卫 为什么“伯恩斯坦分子”能够投票赞成倍	
倍尔决议？	（288）
（1899年11月）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成果（摘录）	（300）
——《社会主义月刊》编辑部的一次意见调查	
（1899年12月）	

- 卡·考茨基 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决议 (摘录) ……………(321)
 (1900年2月21日)
- 爱·伯恩施坦 我对倍倍尔决议的态度 ……………(334)
 ——驳卡·考茨基
 (1900年4月25日)
- 卡·考茨基 伯恩施坦的旧文章和新痛苦 (摘录) ……………(352)
 (1901年5月29日)

(三)

- 爱·伯恩施坦 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 (摘录) (361)
 (1901年5月17日)
- 卡·考茨基 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370)
 (1901年6月)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384)
 (1901年6月24日)
- 帕尔乌斯 实践中的机会主义 (摘录) ……………(386)
 (1901年8—9月)
- 奥·倍倍尔致路·考茨基 (摘录) ……………(413)
 (1901年8月29日)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414)
 (1901年9月4日)
- 在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上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提案 …(416)
 (1901年9月)
- 奥·倍倍尔 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
 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案 ……………(419)
 (1901年9月)
- 在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爱·伯恩施坦 (摘录) ……………(420)
 (9月23日)

沃·海涅 (摘录)	(423)
(9月23日)	
麦·格龙瓦尔德	(427)
(9月24日)	
卡·考茨基 (摘录)	(430)
(9月24日)	
爱·大卫 (摘录)	(433)
(9月24日)	
奥·倍倍尔	(438)
(9月24日)	
洛伊特尔特	(446)
(9月25日)	
阿·施塔特哈根 (摘录)	(448)
(9月25日)	
爱·伯恩施坦 (摘录)	(453)
(9月25日)	
爱·伯恩施坦 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的声明	(457)
(1901年9月25日)	
卡·考茨基 卢卑克党代表大会 (摘录)	(458)
(1901年10月2日)	
奥·倍倍尔 卢卑克党代表大会的反响 (摘录)	(466)
(1901年10月23日)	
爱·大卫 回顾卢卑克 (摘录)	(471)
(1901年11月)	
爱·伯恩施坦 党的纪律和对信念的忠诚 (摘录)	(478)
(1901年11月)	
卡·考茨基 一万人的撤退 (摘录)	
——对伯恩施坦的最新序言和图尔代表大会	
的一些评论	(488)
(1902年3月19日)	

- 保·康普夫麦尔 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
 (摘录)(492)
 (1902年5月)
- 爱·伯恩施坦 关于争论的争论(摘录)(493)
 (1902年5月)
-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494)
 (1902年8月25日)

(四)

在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阿·霍夫曼(摘录)(497)
 (1902年9月15日)
- 弗·楚拜尔(498)
 (1902年9月15日)
- 沃·海涅(499)
 (9月15日)
- 爱·伯恩施坦(502)
 (9月15日)
- 奥·倍倍尔(505)
 (9月15日)
- 爱·大卫(508)
 (9月15日)
- 莱恩德克尔(511)
 (9月16日)
- 罗尔瓦根(511)
 (9月16日)
- 卡·考茨基(摘录)(512)
 (9月16日)

阿·施塔特哈根 (摘录)	(514)
(9月16日)	
格·福尔马尔	(517)
(9月16日)	
克·蔡特金	(522)
(9月16日)	
卡·乌尔里希 (摘录)	(525)
(9月16日)	
爱·伯恩施坦	(526)
(9月16日)	
卡·考茨基 慕尼黑党代表大会 (摘录)	(529)
(1902年9月24日)	
爱·大卫 慕尼黑的法庭 (摘录)	(533)
(1902年10月)	

(五)

卡·考茨基 致奥·倍倍尔	(539)
(1903年1月5日)	
奥·倍倍尔 致卡·考茨基 (摘录)	(542)
(1903年1月8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543)
(1903年8月10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544)
(1903年8月29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546)
(1903年9月9日)	
在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奥·倍倍尔 (摘录)	(548)
(9月17日)	

格·福尔马尔 (摘录)	(570)
(9月18日)	
威·科尔布 (摘录)	(578)
(9月18日)	
伊·奥艾尔 (摘录)	(582)
(9月18日)	
卡·考茨基 (摘录)	(590)
(9月19日)	
爱·伯恩施坦 (摘录)	(599)
(9月19日)	
沃·海涅 (摘录)	(603)
(9月19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关于党的 策略问题的决议	(606)
(1903年9月19日)	
卡·考茨基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	(608)
(1903年9月23日)	
阿·艾尔姆 胜利的党代表大会	(618)
(1903年10月)	
爱·伯恩施坦 一八七八年和一九〇三年 (摘录)	(627)
(1903年10月)	
卡·考茨基 党代表大会的反响	(636)
(1903年10月1日)	
威·科尔布 理论和策略	(643)
(1903年12月)	
人名索引	(652)

(一)

从1896年10月到1898年6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六篇文章，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在其中的《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1896年10月28日）一文中，要求社会民主党“检查”自己的“精神武器”，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1898年1月）一文中，从多方面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修正主义公式。

伯恩施坦的这组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不少党员表示反对他的观点，并且要求即将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对此表示态度。倍倍尔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感到非常气愤，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算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他表示，同伯恩施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在1898年5月20日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他要求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给他篇幅同伯恩施坦进行论战。在大会召开前夕，卢森堡写了《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一文，不指名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她要求这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党的“基本策略”问题。

1898年10月3日至8日举行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没有把

伯恩斯坦问题单独列入议程，只是在讨论第一项议程“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时，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倍倍尔在宣读了伯恩斯坦从伦敦寄来的一篇书面“声明”之后表示不同意伯恩斯坦的观点，他认为这些观点涉及了党的基本原则，应当在党的报刊上透彻地加以讨论。伯恩斯坦的拥护者海涅、福尔马尔、大卫等人竭力为他们自己的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辩解。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则旗帜鲜明地反驳了伯恩斯坦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考茨基也作了一次发言。他反驳了伯恩斯坦的一些观点，但同时又说：“伯恩斯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

我们在这一部分主要选译了斯图加特大会的若干主要发言和大会前后的有关书信和文章。此外，还选录了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以后发表的《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这篇文章既批判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也批评了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态度。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898年2月15日于柏林

亲爱的卡尔：

附上有李希特尔^①一篇文章的《自由思想报》。李希特尔在文章中明确表示和爱德完全一致。这是爱德由于自己的文章^②所能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

还有一件使爱德非常丢脸的事，他公开谴责机器制造业工人的罢工^③，而企业家罗斯却完全站在工人一边。左边、右边、全都颠倒了。

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

海涅^④最近又来了，吹的还是同一个调子。我们要在党团里谈谈他。在我们这里，最危险的机会主义进展极快。

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热情问好。

你的 奥·倍倍尔

请把《自由思想报》的文章寄给爱德。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一份报，因此把它寄给你。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02—103页。

-
- ① 欧根·李希特尔 (Eugen Richter 1838—1906) ——德国自由思想党领袖。——编者注
- ② 指发表在《新时代》第16年卷 (1897—1898) 第1册第18期上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译文见《伯恩施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31—42页。——编者注
- ③ 指伯恩施坦在《新时代》第16年卷 (1897—1898) 第1册第15和21期发表《英国机器制造业中的斗争》一文。——编者注
- ④ 沃尔弗干格·海涅 (Wolfgang Heine 1861—1944)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会议员，属于党的极右翼。——编者注

卡·考茨基致维·阿德勒（摘录）

1898年4月9日于柏林弗里德瑙

亲爱的维克多：

……

我为什么给你写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愿意你误解我对爱德的评价。不能说他已经背叛、也就是说已经投向敌人方面。但是爱德变得抱怀疑主义态度了，怀疑得很厉害，超过他的文章给人的预感，而且当他老是在理论良心和党员义务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他情愿最好根本不再为我们写稿。他为了使自已可以不度文字生涯而拟了些十分冒险的计划，就这方面来说，如果他不改换他现在的环境，我担心我们将失去他。

要是他从反对社会民主联盟^①（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发展到最后陷入反对全党，我们一定得努力使他离开伦敦。他必须重新和党接触。那时他的想法也许仍和今天一样，但说法就不会一样了。正是以机灵著名的他如今却一点也不懂得，要揭露一种幻想，就必须做得使我们的人能接受这种揭露，而敌人又不会把它看成是让步。我很乐意读他的著作并且不断从中学习，但是我发现有许多事情他没有讲清楚，反而弄混乱了。

我劝他到苏黎世来并想请他暂时在那里编半年《新时代》。现在已经证明可以从远方来领导这个刊物。伯恩施坦当编辑是适得其所。主持正义的岗位现在对他比文字斗争的先锋的岗位合适。我也可以由此得到从事著述的时间，而且我渴望得到。许多事情应当解决，许多攻击应当还手，而现在却没有这么一个按

^①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联盟的领导长期由以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掌握。1884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等退出联盟另建社会主义同盟。伯恩施坦到伦敦后不久也曾反对过社会民主联盟。——编者注

我的意思去做这些事的人。爱德一般说来只是批评党，梅林又太粗暴了。所以我就需要自己也出面讲话了。但是计划终究还是计划。因此我请求你在这方面也别再讲了，相反，我很愿意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还有，哪儿是安置爱德的最好的地方？我们还不知道瑞士是否允许他回来。你看维也纳能容忍他吗？爱德在维也纳，而我在柏林，这简直是荒谬。也许德国政府会同意我们互相交换，如果我离开柏林，它就准许爱德回国而不给以处罚。

.....

忠实于你的 卡尔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与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245—247页。

格·普列汉诺夫致卡·考茨基

1898年5月20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考茨基：

在《新时代》的最近一期，伯恩斯坦发表了一篇论社会主义的两个“因素”的论文。^①这篇论文是对他在一月发表的批评“Zusammenbruchstheorie”（崩溃论）的论文的补充。伯恩斯坦现在想在哲学领域中做他在经济领域中他认为已经做过的事情。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是极其无力的。但是不管批评是怎样无力，它是直接反对恩格斯的（参阅《费尔巴哈》和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假如伯恩斯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

^① 指《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中译文参见《伯恩斯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54—69页。——编者注

想中还剩下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说法，但是我想，您会允许我在《新时代》上答复伯恩施坦的。我的意图是替恩格斯的思想辩护，这些思想被我们的“哲学家们”，类似施米特之流，认为是陈旧和经不起批评的思想。我必须承认这些哲学家们的文章使我深为愤慨，所以我的回答也将是不客气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关系到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不能保持学者式的冷静态度。施米特和伯恩施坦先生的“哲学的”思想正是我的导师们所始终反对的那些新康德主义者的思想。

难道您同意伯恩施坦吗？要是相信这一点，我是会太难过的。但假如您不同意，为什么您又不答复呢？因为这是对您的攻击，这些先生们所“批评”的正是爱尔福特纲领。

伯恩施坦引证了施泰恩的《自然科学的与经济的唯物主义》的论文。我们答复伯恩施坦正应从批评这篇论文开始。您同意在《新时代》的第36期上给我五到六页的篇幅吗？请尽快告诉我。请告诉我您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这一破产（这在社会主义史中实在是没有先例的）的意见；这对我是很重要的。

在回答了施泰恩以后，我就要进而批评施米特的和伯恩施坦的“哲学”。我将以一篇论文纯粹谈哲学；另一篇论文就谈伯恩施坦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中的两个“因素”）。您能否把登载着您在《新时代》上回答过巴克斯（Bax）的论文的那几期《新时代》寄给我？

咳，我们正在经历着危机，我为此难过极了。

您的 格·普列汉诺夫

《劳动解放社文献》1926年俄文版第5集，中译文见《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49—450页。

格·普列汉诺夫致卡·考茨基

1898年5月30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考茨基：

兹将论文^①寄您。请您随便给它加一个标题。我不知道这篇论文是否中您的意；至少您应该承认我提出了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您无疑地会看出我对待伯恩施坦和施米特很不客气。而您是对的。但请注意，在我看来这些先生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的敌人；所以我在谈及他们慢慢孵出的东西（“辛苦的劳作”）时不能没有愤怒。请告诉我您的意见，以及您是否允许我在《新时代》上继续论战？我的第二篇论文是反对康拉德·施米特的新康德主义的，而在第三篇论文中我将证明伯恩施坦从来一点也不懂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因素”。亲爱的考茨基，我很清楚地了解可能您觉得这类的论战是不愉快的，甚至是无益的（不过，哲学并不是一个无所谓的东西。费希特说：“是怎样的人，就是怎样的哲学。”伯恩施坦向康德倒退；同时他也就离开了社会主义）。正因为这一点，我才请您坦白地写信告诉我您在这问题上的态度。如果您对于允许我在《新时代》上攻击伯恩施坦哪怕是有一点点（不愉快）的话，那我不这样做。我首先找您，是因为我觉得在《新时代》上写文章比在社会党的任何其他刊物上写文章要愉快些。但是我不愿意滥用您的宽仁，而且是极尊重您和伯恩施坦之间的深交的。因此，亲爱的考茨基，请坦白告诉我，不要同我客气。

我在写法国社会主义史上费的时间很多，而且应当说，如果

^① 指《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发表于《新时代》第16年卷（1897—1898）第2册第44期。中译文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389—404页。——编者注

我早知道它是这样困难，我就不担任这一工作了。并此致意。
问候您的夫人。

格·普列汉诺夫

《劳动解放社文献》1926年俄文版第5集。中
译文见《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1957年人
民出版社版第450—451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898年9月9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爱德关于我和他意见一致的说法妙极了。我是故意避免和他争吵的，因为对我说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是听他讲，看看他到底走了多远。我们取得一致的不是那些有争论的问题。照我看来，他要是不换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是不会变好的。由于这个原因，对你迁居英国一事——假如有可能的话——我也要非常慎重地考虑。

.....

你的 奥·倍·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
文版第110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898年9月24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

你认识到爱德是不会改邪归正的，这使我感到高兴。我在

第一次和他谈话后就明白了这一点,同时也知道和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奥·倍倍尔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11页。

罗·卢森堡 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

(1898年10月2日)

在反动派从各个方面进行冰雹般的打击声中，在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最基本的权利同敌人进行的极其激烈的战斗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这决不是在风和日丽、愉快宁静的气氛下召开的一次和平的会议，这是在战场上仓卒安营扎寨、在敌人炮火下召开的一次军事咨询会议，脉搏跳动得非常激烈，气氛却象铁一般沉着冷静。

事实上，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来的最近整整十年中，我们还从未一时一刻看到过，各种政治对抗、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势力进行的斗争象今天这样尖锐。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军国主义和海上军国主义疯狂的、践踏人民利益和嘲弄人民正当要求的竞赛；德国轻率地陷入这种竞赛，给平静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封建容克对劳动人民实行掠夺，玩弄面包涨价的阴谋对付劳动人民。第三方面，所有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工人阶级的基本政治权利，向国会选举权^①实行进攻。第四方面，发动一次最新的进军，狠打无产阶级的痛处——结社权^②。

① 1897年1月22日，驻阿尔特纳第9军团司令官阿尔弗雷德·瓦德西伯爵在给威廉二世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要求实行政变废除普选权，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此后，1898年6月，在国会准备选举期间，极端反动人士的一些计划被泄露，这些计划预定同政府合作取消现行的国会选举权。——编者注

② 内务部国务大臣阿尔图·波扎多夫斯基-魏纳伯爵于1897年12月11日向德国各邦政府发出了一个秘密通知，建议采取立法措施反对罢工权和结社权。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将这一秘密文件弄到手，于1898年1月15日在《前进报》上发表。1898年9月6日，威廉二世在奥文豪泽的一次演说中宣布了这项预定于1899年实行的法案，这就是人所共知的“苦役监禁法案”。——编者注

最后，在追歼无政府主义^①的借口下，有计划地复活欧洲各国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神圣同盟的幽灵。我们不是那种随时嗅得出革命的黎明气息的急性病患者。但是，如果人们观察一下当前德国政治生活的全貌，那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时代已经散发出殊死斗争的热烈气息，通常说来这就意味着末日的开始。敌人在疯狂地、盲目地向周围乱打一气，他们的手不过是为恐惧所支配而已。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刻，而且还面临着更重要的时刻。德国的工人阶级有一切理由密切关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讨论。

社会民主党方面已经充分意识到时机的重要性和自己担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党代表大会的议程，特别是到目前为止从党的各个方面提出的提案，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十分满意地指出，过去通常在这里或那里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无足轻重的、琐碎的或者同工人事业本身没有多大关系的提案，如强制种痘、退出国教会等等，这一次都完全没有出现。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的提案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是：邦议会选举、军国主义、关税政策、殖民政策、一般策略、结社权、农业问题、劳动保护和五一节。党在向党代表大会提出愿望时仅仅考虑重大的问题，而且只是从大处着眼的。另一方面，已经提出的提案所涉及的问题已很完备，不需要再作什么补充了。对工人阶级的幸福和痛苦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都一一列入了党代表大会的议题。

议题中需要优先考虑的无疑有三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问题；为结社权而斗争的问题；同对待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有关的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策略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不应当化过多的时间去

^① 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于1898年9月10日行刺奥国皇后伊丽莎白之后，意大利政府邀请欧洲各国代表于1898年11月24日到罗马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制定共同防御无政府主义的细则。——编者注

争论。自从汉堡代表大会^①以来，已在报刊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赞成和反对的一切论据都已经充分地交流过了，所以在斯图加特的辩论中很难出现新的观点。党代表大会只需要采取明确的态度来消除误解和结束暗中摸索的情况。

关于受到威胁的结社权，在辩论中必须形成一个战役计划来保护工人阶级的这个政治上的眼珠。我们认为，如果人们不是满足于对反动派的计划发表一次或几次抗议演说，而是真想制定继续采取行动保卫结社权的实际计划，那么，议程的这一条就必须同其他两个问题即一般的劳动保护和五一节联系起来加以讨论。为了防御眼看就要发生的破坏结社权的阴谋，很可能首先在劳动保护领域采取行动，也就是要掉转矛头，从防御转向最有力的进攻，要求改善劳动保护立法，这一点是从一开始就一目了然的。另一方面，为获得八小时工作制而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即结社权受到威胁一事，必然给五一节行动以新的有力的推动。既然明年将会出现争取劳动保护和结社权的强大斗争，那么，现在除采取其他行动外，作出纪念五一节的相应决议就一定会成为对反动派的战争叫嚣的回答。

根据一切现象来看，最活跃的恐怕应当是关于最重要的第三个问题的争论，即关于我们的一般策略、特别是对待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的态度的争论。的确，有一些同志会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策略的一般原则展开争论是不容许的，做不到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对党的策略原则进行争论是必要的、可能的和有利的，反对进行这种讨论的理由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如果说，党代表大会不是教会长老会议，不能去争论抽象问题，而是要研究斗争中的实际问题，那么，我们必须提醒大家，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摆脱了对党的代表大会的任务所持

^①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1897年10月3日至9日在汉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编者注

的这种狭隘观点而进行了纯粹原则的争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甚至已经化很长的时间进行了关于艺术问题的辩论^①，要说它不应该化时间去进行关于基本策略问题的争论，那就是怪事了。然而我们甚至认为这种争论是直接必要的。这并不是说，好象我们以为我们的久经考验的原则受到了严重威胁，这并不是说，好象我们有些为我们的运动担忧。整个说来，“尽管有狂风暴雨，尽管有人噉噉喳喳”，运动将会沿着它的老的、正确的道路前进。但是，不能否认，最近一个时期，某些知名的同志的一些言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在某种情况下，只限于在报刊上进行讨论是不够的，因为每次都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意见。然而对这次提出讨论的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全党都必须表示态度，全党必须对正确的观点表示认可，要这样做，党代表大会就是唯一的机会。我们完全不忽视和低估进行这样一场争论在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技术上的困难还从来没有能够阻止我们讨论任何一个对党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一次也不应当如此。

另一方面，我们预期关于我们策略的基本原则的公开的、严肃的辩论会对即将到来的斗争时期产生最好的结果。无论何时，在继续不断的、时常束缚人们眼光的日常斗争中，始终是我们整个革命世界观的牢固基础为我们提供令人生气勃勃的养料，使我们擦亮眼睛，振奋精神。这一次重新探讨我们纲领的基础，也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党的队伍在坚持目标、加强胜利信心、提高战斗乐趣方面获得新鲜的、强大的动力。对于我们策略的一般原则进行讨论之后，我们就又要说，巨人已经接触到他的母亲，这使他产生了新的力量。

此外，不管党的代表大会将就它的议程作出什么样的决定，

^① 1896年10月11日至16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代表大会曾在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文学和艺术杂志《新世界》的内容时就艺术问题进行了较长的辩论。——编者注

它的讨论一定会产生促进工人阶级幸福和利益的结果。大量的严肃工作正等着它去完成，它将表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一使命。这次代表大会在工人阶级争取他们最后解放的伟大进军中，将再次形成一个阶段，它将为他们指明道路并且发出进行新的斗争、争取新的胜利的号令。

发表于1898年10月2日。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231—235页。

在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阿·施塔特哈根^①

(10月3日)

奥艾尔的确说得对，在选票的增加方面，任何政党也不能同我们相比。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战斗的党来说，问题取决于所得选票同有选举权的人数的比例。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要夺取全世界的战斗的党，那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传播已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干巴巴的数字比美好的愿望和言论令人愉快得多。1874年我们获得的选票占有选举权的人的4%，此后持续增加，只有1878和1881这两年例外。这一次，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的进展和以前有点相似的话，我们本来一定可以指望选票能有较大的增加，但是我们却远远没有达到所期望的那种程度。1887年，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占有选举权的人数的7.8%，1890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达到13.91%，1893年达到16.81%，而目前只增加到18.40%，也就是说，在五年中只增加了大约1.59%，而在上一届议会任期内还增加了2.3%，1887年到1890年甚至增加了6.9%。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如果我们看一看敌人的工作，那么仅限于回顾胜利的欢乐（我们是有理由这样做的）就不对了。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之所以没有达到我们能够期望的增长程度，也许是因为有特殊情况吧？我认为，这样的原因是存在的。选举活动期间的鼓动仅仅是最后的总结，主要的是经常不断的鼓动工

^① 阿尔图尔·施塔特哈根(Arthur Stadthagen 1857—1917)——国会议员，曾任《前进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反对党团多数派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编者注

作和组织工作，而这种工作由于来自东部的移民日益增多而大大增加了困难。但是，我认为，那些经常蓄意把最终日的抛在一边的人是出了很大的力来帮助人们挫伤积极性和战斗的欢乐。德累斯顿通过《萨克森工人报》的鼓动工作（尽管方式上常常有缺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因为它坚持了最终目的。

但是人们不仅在报刊上，而且在口头鼓动工作中往往没有达到教育社会民主党人这一目标。过去没有经常强调（我承认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最终目的，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其次也是由于有些人迫切要求不再注意那些漠不关心的人。我们应当向自己提出严肃的警告，我们在鼓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特别是鼓动工作方面，要恢复社会民主党唯一值得骄傲的老方法：把最终目的提到首位，唤醒那些漠不关心的人，不要跟在那些所谓的有学问的人后面跑，这些人自认为可以教育别人，我却认为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自己还应当先学习。

威·彼·乌斯^①

（10月3日）

我也是以前获胜却没有再度获胜的那个选区的一员，可是我对国会选举的结果非常满意，而且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理由感到满意。如果我们把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同我们的选举结果作一比较，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了。说不断提到最终目的就可以保证取得重大成就，这同事实有矛盾。在安哈尔特的两个选区和我过去工作过的那个选区，我们获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我认为，我们越壮大，我们的地位越重要，我们恰恰也就有义务更多地满足群众当前的需要。过去应当强调基本原则，而现在，无论在工会运动方面还是在党的运动方面，原

^① 威廉·亨利希·彼乌斯（Wilhelm Heinrich Peus 1862—1937）——国会议员，党报编辑。——编者注

则已经确立了。我讨厌最终目的这整个概念，因为根本不存在最终目的。因为最终目的达到以后，不言而喻还会有一大批新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促使群众同我们一道走。因此，如果我们打算按照施塔特哈根的劝告办事，结果就会适得其反。问题在于要使一个一个的人对我们的了解比目前更加清楚得多，报刊工作尤其要这样。我们看看柏林的情况吧，《前进报》不适合于人民的伟大事业的要求，不适合于对他们进行启蒙的需要。它超出了他们的理解水平。要是把某个省报搬到柏林去，有时会更好些。特别是因为中间等级的运动还有吸引力，目前局势对我们就更加不利了。这个中间等级的运动失败越多，从这些阶层投到我们方面来的人才会越多。我重视的是我们在当前从事更加建设性的、更加实际的工作。我想，最终目的会自然而然地达到。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象我们这样一个强大的党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它必须表明，它可以为跟在我们后面的群众做出某些成绩来，我们用不着为我们的原则担心。

沃·海涅（摘录）

（10月3日）

我请求发言是为了反驳那种毫无根据的意见，这些意见由于不断重复，已开始变成根深蒂固的迷信。据说，那些掩盖最后目的的人要为某些失败负责。我要问：这样做的同志是谁？如果可以举出名字来，我愿意进一步谈。但是，请饶恕我们吧，不要再泛泛地谈那些比诬陷好不了多少的意见了。一般说来，只是由于性格上的差别，才使某个同志比另一个同志更多地谈论未来社会。因此，任何人由于受性格推动而着重谈论这一点，我都不加责怪。但是，我们倒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的界限是什么。我认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向群众描绘未来的社会

主义社会的图画。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是出于科学的良心。如果我们的政敌向我们提出要求，说我们应该向他们作这样的说明，那我们就要把这当作无耻的奢望而加以斥责，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对自己的拥护者也不能说什么。在这方面，恩格斯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空想主义的儿戏，曾经写书论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要试图迫使我们走上一条已被彻底废弃的道路。当然，如果我们在落后地区多多许愿，而不去管我们怎样打算遵守这种诺言，我们在选举方面是可以获得成就的。但是，这种成就就会维持多久呢？一次或二次选举，到那时我们用这种方式争取到的选民就又会离开我们。人们是不肯轻信的托马^①，他们要相信什么东西，总想拿手摸一下。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和空想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来谈论未来的目的。我们不应该丢掉这种意识，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有助于创造一个更高的社会，创造一个从经济技术发展中自然成长起来的社会，一个同纯粹利己主义的社会相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要问：可以被指责为掩盖这一目的的宣传者在哪里呢？我知道是没有的。任何一个演说家都不会放弃这种给他们的演说增添热情和光辉的最好的手段。正象乌尔里希同志所说的，敌人已经留心做这件事了，我们不仅在农村，甚至在柏林，都必须不断地讨论敌人关于未来国家的传单。而且我们不得不谈论我们的真正目的，虽然我们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是，即使可以允许对这一目的进行这种必不可少的讨论，也不能把它当作我们演说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内容。是的，这个问题必须谈得很有分寸。我是最不会否认意志力量的道德价值和促进作用的人，这种意志力量产生于向往更美好的更高尚的未来的信念，但是，很可惜，诉诸这种信念是一种其效果恰恰与其应用的次数成反比例的斗争手段。同志们，没有别的东西比表示信念的话在使用

^① 《新约》中说，耶稣的使徒托马一定要摸到耶稣身上的钉痕才相信他已经复活。——编者注

中磨损得更快了；这样的话如果用滥了，听惯了，就使人觉得是空话，而且如果热情的预言家除此之外不知道提供别的什么，那么他给人留下的是牧师的可恶的印象。（福尔马尔：他会使人厌倦！）是的，总是听老一套，会使群众厌倦。能够不断地日新月异地激励群众的东西，能够永远提出新的任务而不使人感到厌倦的东西，就是为当前的日常的具体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就是我们为争取各种改良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它们指明了通向伟大的美好的未来的道路。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的道理，相反，这是社会民主党早已领悟了的东西。爱尔福特纲领第二部分的详细论述和党多年来的整个实践的态度都表明了这一点。这种策略已经行之有效，我必须说，那些埋怨所谓新策略的同志，实际上就是要求制定同党过去行之有效的实际政策背道而驰的新策略的人。当然，他们依靠的是表面的微不足道的选票增长率，而且蔡特金同志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取得比较大的进展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新出面竞选的选区。她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在那里需要更多地谈论我们的目的。我感到吃惊的是，一位思想如此敏锐的夫人竟会犯这样的错误。上面已经说过，我们过去在柏林也需要充分地谈论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地看到，真正的原因何在。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拥护者。我们不能随意把我们的信念传给每一个人，能了解我们思想的人的数量是由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状况决定的。在有些选区，我们早已把那些能接受我们思想的物质材料提取上来了，因此，同这些地方相比，我们在居住着还没有同我们接触过的群众的选区能够获得更大的成绩，这是十分自然的。……

奥·倍倍尔

（10月3日）

奥艾尔在他的报告中对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的结果表示非常

满意,可惜我不能分享这种满意。我倒乐意承认,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某些因素说明,党的发展规模并不象我们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大。事实是,同1893年、1890年和1887年的选举相比,最近的选举总的说来是一次参加人数不多的选举,因此社会民主党也自然要受到影响。其次,我也认为,百分比的提高也不可能和过去几次选举一样。因为一个政党联合到自己方面来的人数越多,各个百分数所代表的数量也就越大,但有一件事是必须强调的:我们的工商业调查和关于人口增长的统计报告表明,最近十五年特别是最近五年以来,恰恰是无产阶级选区的人口显著增加。因此,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因素,我自然要说,最近几年的结果完全不那么令人高兴。的确,我们比其他任何政党获得的成就都大,但是,我们本来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就。我认为,我们倒应该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原因在哪里?现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发生了热烈的争论,一些人说,关于未来国家的政治宣传做得太少了。另一些人说,对实际问题强调得太少了。关于党的最终目的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的这一指责从前就提出来了。大约二十年以来,我们在党的各次代表大会都听到过。早在1877年我就在哥达提出过,而且那时我也提供了证据,我本来希望今天发怨言的那些人也举出事实来。我现在只需要举海涅在柏林所作的竞选演说为例,在这次演说中,海涅就补偿问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建议。^①人们也许可以拿海涅的竞选成绩来反驳那些说这个政策有缺陷的人,因为海涅获得了许多人都料想不到的胜利。我想立刻补充一点,我坚信,并不是海涅的这种态度使他获得了胜利。对于选举中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有一个纲领,我们要全面地宣传这个纲领。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制造任何人为的区别,我们不能说,现在拿出党纲的一部分

^① 1898年2月10日沃尔弗干格·海涅在柏林第三选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主张,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国会中同意政府提出的军费要求,而以政府同意给予“人民自由”为交换条件。——编者注

来,宣传这一部分,而对另一部分置之不理。要是出现了这种缺点,可以举出事实来,可以举出人来。如果我们大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向艰苦地进行斗争的小资产者甚至农民提供任何解救办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竞选时拿我们的最终目的来麻烦他们了。我们不能拿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来麻烦小资产者和农民,因为他们不懂这些,甚至也许要反对,因为这些东西会使他们遭受牺牲,反正对他们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在选举中必须首先讨论要提交国会讨论的很多实际问题,而且必须明确地阐述我们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场合,我们不能讨论未来社会的细节,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人类的未来是怎么回事。但是,象我们今天从彼乌斯嘴里听到的那样,竟说得如此过分,这就不对了。他说,根本没有最终目的,要知道,如果这是从哲学上讲的,我认为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一个正在进行斗争的党,一个想达到确定目标的党,也必须有一个最终目的。如果人们赞同彼乌斯的观点,那就会走到这样的地步(事实上他在他的报刊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也就是竟认为这样做是切实可行的:干脆取消党纲的第一部分,而更加详细地发挥第二部分来代替它。但是,我要说,那我们也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而既然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是要找出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我想谈三件事。当然,对这三件事并不是都要一视同仁。首先,人们一开始就对许多大选区,特别是一些老选区抱有很大很大的胜利希望。有人曾经坚信,我们这次也会再度获胜,因为我们一向都取得了胜利。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我一向的态度是:即使我千百次地坚信我们会胜利,但是我在公开讲话时必须表现出似乎我是担心我们会失败的。因为我们不仅希望获得胜利,而且希望获得辉煌的胜利。在这方面,我们的希望大大破灭了。其次,《前进报》在选举期间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却犯了一个错误;照《前进报》那样做,好象我们毫无疑问地会在柏林所有六

个选区都获胜。而在无产阶级占巨大数量的柏林第四选区和第六选区，我们获得的选票却不得不是另一个样子。凡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地方，通常说来那里的组织工作是没有做到应该做的那样。可以完全公道地说，我们要想胜利，就必须组织起来，就必须准备好胜利。比方说，我从柏林第二选区许多投我们票的人那里得悉，在整个竞选期间，他们在住宅里没有收到过一张传单，没有收到过一张选票。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今天不是想提出责难，我不过是希望你们在下次做得更好些），那么柏林人在组织工作方面是有错误的。同志们，最后说说第三点。我长期以来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出版物，无论是狭义的党的报刊，还是党的出版物，都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我要十分重视使人们在这方面的组织得更好些。必须使它超出党员的狭隘圈子，必须通过报刊和小册子来争取新同志。如果我们踏踏实实地工作，那么我们下一次获得的结果就会和这一次不同。

克·蔡特金

（10月3日）

国会议员海涅喜欢对我说些骗人的恭维话，如果我在这里也想使用他对待我的那种腔调，那我就会说，他企图施展他的律师的天才和技巧来挪动斗争的基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在这里质问国会议员海涅对于未来国家抱什么态度，这里涉及的的确不是海涅关于未来国家的设想，也不是对我们的最终目的强调的次数多少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国会议员海涅关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异想天开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他提出的政策中表现出来了。此外，关于他对最终目的的态度，他在几次发言中也已经作了非常有趣的说明。国会议员海涅在这里宣布，对最终目的强调的次数是多还是少，只是宣传者的性

格问题。我一向认为，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一直是一个科学的认识问题，是一个政治信念问题，而不是性格问题。但是现在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海涅同志所主张的政策问题，这一政策他已经用补偿政策的如下口号作了表述：用大炮交换人民的权利。用德国人的话来说这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投机的政策。党代表大会必须对此表示态度，因为这一声明对我们的国会选举鼓动工作不是没有产生过影响。我也是那些走遍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的宣传员中的一个，请你们相信我，当我在阐述我们的纲领，阐述我们对军国主义的态度时，常常不仅从敌人方面，而且也从同志方面听到这样的叫喊：“大炮问题，补偿政策”。而且恐怕很多同志在宣传工作中都有过同样的体验。我不相信我在这方面是个别的。海涅有一个登峰造极的观点，就是他认为有些军费要求对工人阶级来说应该是无所谓的。例如，在他看来，购置新大炮的问题就是这样。

在沙皇已经成为和平的调解人之后，购置新大炮多半是用于对付内部敌人，而不是用于对付外部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购置新大炮经费的批准问题对工人阶级竟成了无所谓的事！我认为，海涅提出的整个策略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的错误理解上的。在他写的题为《选举还是不选举？》这本小册子中，这一观点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至于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关于邦议会选举问题所说的话，那同他所推荐的可能主义的一般策略比起来就完全是次要的了。他在那里是拿法国可能派作为样板的，可能派的格言是：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分成很小的份量，使任何人都可以接受。那么国会议员海涅打算怎样做到把社会主义分成这样小的份量，比方说使冯·施杜姆先生可以接受，或者冯·卡尔多尔夫先生也可以接受，或者还往上去，甚至德皇威廉二世陛下也可以接受呢？他们对于社会运动问题的立场难道不是人所熟知的吗？

我们不打算效法过去教会长老会议的做法，给持不同意见的个别人生起火刑堆来。但是我们想着重说明，多数代表，德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并不拥护这些人，而是拥护那些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立场上的人。出现意见分歧，出现不同的意见，这并不象我们的敌人所预言的那样是什么分裂的先导。对所有那些托马式的牧师^①说来，只有愿望才是思想之父^②。我们是一个有足够生命力的党，我们能够经得起不同的意见。值得注意的和值得担心的并不是这种不同的意见的存在。从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来看，这种不同的意见是很容易得到解释的。而值得担心的是中央机关报所助长的一种倾向，即不是明确地尖锐地表述意见分歧，而是任其腐化下去。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倾向。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依靠信条的迷信的党。因此，我们有必要表述并弄清意见分歧。只要我们提不出相反的论据，我们就要一如既往站在社会民主党久经考验的立场上。如果国会议员海涅能够提供充分的论据，证明他的补偿策略是正确的，那我就要向他保证，尽管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也许有朝一日我还要宣布：爸爸——可能主义，亲爱的妈妈——实际政策，我在天堂里在您二位面前是有罪的。但是，只要提不出论据来证明海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党代表大会就必须和同志们一致宣布：在引导我们达到目的的道路问题上，在我们为了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一问题的观点上，我们将站在迄今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纲领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海涅同志向我们提供的可能主义的立场上。

① 参见第18页注①。——编者注

② 参见《莎士比亚全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5卷第208页《亨利四世》下篇第四幕第五场中国王的话。——编者注

布·休恩朗克^①

(10月3日)

总的说来,我可以同意蔡特金同志的发言。我报名发言,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警告:我们不能采取梵蒂冈宗教会议的方式,利用党代表大会作出一项决议来反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就是说,我相信,全党十分之九的人认为老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是社会民主党唯一可能采取的策略。我们不想造成一种印象,说我们想以多数压制或威胁少数,但是我们要确认这一点:不应该推行鸵鸟政策,不应该掩盖党内一般在策略上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要严肃地、彻底地研究这些分歧的实质,并且表明党员的多数是怎样看待这一分歧的。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了,党的实际政策、党的宣传工作和政治行动就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但是,如果海涅议员的政策真的成了我们国会党团的指导观点,如果不弄清这里讨论的事实,不弄清我们在各种问题即军国主义、殖民政策、关税政策和贸易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党就会受到损害。如果我们不是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经历迄今一切民主主义的人民党所经历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是经常清醒地全神贯注地注视目标,我们就会遭受损失。如果人们考虑到从上面实行社会改良已经遭到了失败,考虑到沙皇固然发表了和平宣言,但与此同时一切军事强国都在从事新的军备,那么,可能主义的策略在今天就特别值得注意了。当社会对抗越来越尖锐的时候,当苦役监禁法案出笼在望的时候,可能主义的政策却梦想提出调解方案。很明显,大多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竭力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有必要说明这一点,而且有必要告诉少数派:好!你们可以保留这种意图,

^① 布鲁诺·休恩朗克 (Bruno Schönlank 1859—1901) ——国会议员,曾任《前进报》代理主编和《莱比锡人民报》主编。——编者注

我们不审判你们，但我们想指出，在面临自我毁灭危险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不能放弃老的政策。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仓促停止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因为如果现在停止争论，那么在讨论议会活动的报告时很自然地一定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党团的报告已经为此提供了足够的基础。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掩盖问题并实行鸵鸟政策。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说，意见分歧是存在的，让我们去解决吧。我们不要让机会主义观点败坏掉我们优秀的老的工作。让我们防止腐化，防止放弃阶级斗争。不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就永远也达不到最终目的，而没有最终目的，我们就无非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反对党。

罗·卢森堡

(10月3日)

海涅和其他人的发言证明，在我们党内，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对最终目的和日常斗争的关系的理解已经弄模糊了。有人说：关于最终目的在我们的党纲中有一段讲得很好，的确不当忘记，但是这同我们的实际斗争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也许有一批同志这样想：对最终目的的冥想实际上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没有比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更加实际的问题了。因为诸位想一想：我们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究竟表现在哪里呢？真正的实际斗争分为三点：工会斗争、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和争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斗争。我们的这三种斗争形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吗？完全不是。工会运动首先就不是！请你们看看英国，那里的工会运动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有一部分成了社会主义的障碍。讲坛社会主义、民族社会联盟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同样强调社会改良。而民主化又是专门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在我们之前早就把民主写在他们

的旗帜上了。那么在日常斗争中使我们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只能是这三种形式的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只有最终目的才构成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并使这一斗争成为阶级斗争。我们一定不能象海涅所说的那样，把这个最终目的理解为关于未来国家的这种或那种设想，而是要理解为在建立一个未来社会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对我们任务的这种理解同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关系非常密切，后者是我们的观点的牢固基础，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后必然要引起爆炸，引起崩溃，在这个崩溃中，我们将担任对破产了的社会进行清算的法律顾问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我们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充分实现这一立场的话，那么海涅在最近发表的意见就是行不通的了，他认为我们也可以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作出让步；此外，康拉德·施米特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的关于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取得社会主义多数的言论，特别是伯恩施坦关于我们一旦取得政权也不能缺少资本主义的言论也是这样的。当我读到这种言论时，我向自己说：1871年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不是这么聪明，这是多么幸运啊！否则他们就会说，孩子们，让我们躺在床上吧！我们的时刻还没有到，生产还不够集中，还不足以使我们保持政权。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不到那一场威武雄壮的戏剧，看不到英勇的斗争，而会经历另一种场面了，工人们也就不是英雄，而简直是老太婆了。我相信，关于我们如果夺取政权能否使生产社会化的讨论，关于生产是否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化的讨论，这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努力夺取政权，这一点是永远不容怀疑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必须表现出总是能够掌握局势，它决不能在自己的任务面前退缩。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最终目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要不顾风吹浪打使之实现。

格·福尔马尔（摘录）

（10月4日）

卢森堡小姐看来是表面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装备起来并借此给人以科学的印象。但是仔细观察一下，马上就可以弄清，她的结论大部分不过是骗人的结论。例如她说，因为劳动保护符合资本主义本身的利益，所以它才会产生。但是我记得，一位名叫马克思（这个名字并不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的人，曾经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复兴是从颁布工厂法开始的。其次，她向我们说，工联是反动的和敌视社会主义者的。但还是这一位马克思曾经把英国的工会叫作欧洲无产阶级的职业拳击家。究竟哪里实际上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获得了更多的成就，哪里事实上在民主化和社会化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是在英国还是在我们这里，这也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后，卢森堡小姐想激发革命的决心，她说，如果1871年法国的工人象我们今天这么聪明，这么成熟，那他们大概就不会开火，而会“安静地躺在床上”。对种种历史事件在事后卖弄聪明，说本来应该做些什么，这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通常都是受自发力量推动的。但是如果法国工人当时“睡着了”，那么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的贡献恐怕几乎不会更坏。无论如何，这一点是肯定的：认为公社似乎简直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东西，那就是最大程度的非历史的臆断。然而这自然是同卢森堡小姐的整个观点有联系的，因为她的观点似乎是，暴力行动必然永远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卢森堡抗议）那么，下面这样一个见解不能作别的理解：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随时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社会民主党可能突然取得政权，因此必须作好行使政权的准备。然而这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而是布朗基主义的观点，布朗基主义幻想可以不考虑经济

和政治的发展，可以不经过人民，而在随便什么时候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如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曾经有人有过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幸而也早就过去了。我们今后不能向后退，而要向前进。我的说法同卢森堡小姐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遭受到的不幸莫过于过早地处于接管政权的地位，因为我们将不能有效地利用和维持这个政权。我们不想通过人为的手段获得政权，而要利用内在的必然性获得政权，只有这种必然性才能保证政权的不可抗拒性，才能确有把握获得成功，也就是说，要在各种经济条件已经首先具备的时候才能做到。正象我在从前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的，我们不想从人民那里骗取政权，也不想强取政权，政权应该根据人民自己的意志落到我们手里。卢森堡小姐在她的文章中给“革命派”和“温和派”的区别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革命派的活动是考虑掌握政权，而温和派的活动是打算提高工人阶级，逐步扩大社会监督。同志们，如果这不算布朗基主义，那也只不过是一种诡辩，对此我一点也不理解。如果我要达到一种目的，那么在各个具体场合是什么样的理论考虑在起作用，我觉得是次要的。（帕尔乌斯^①喊叫）请您等一下。您以后可以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二十四篇社论来答复我！说人们追求当前的目的就是“推迟最终目的”，这整个的概念是最大程度地非社会主义的，首先是最最大程度地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我们整个宣传工作的成就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而符合我们意愿的发展必须根据内在的必然性进行，现代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谁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一句话，在文化上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谁就使劳动人民能够继续进行斗争，增强他们的力量，谁就可以脚踏实地走上导致最后掌握政权的道路。如果不存在这种内在的、自己起作用的动力，那我们的整个宣传工作就毫无价

^① 即亚历山大·格尔方德（Alexander Helphand 1869—1924），曾积极批判伯恩斯坦，后来堕落成沙文主义者。——编者注

值。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我要说，在我看来，所有那些受攻击的人，海涅、施米特和伯恩施坦由于自己的主动性为党立下的功劳无论如何要比那些只是不断地、一再地向我们发表陈词滥调的人大得多。此外，我丝毫不为一个党拥有象我们这样的处在非常顺利的发展中的力量感到担忧。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制服过许许多多的外部敌人，它也会懂得从空话中摆脱出来。

沃·海涅

(10月4日)

我必须坦率地说，在讨论不幸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对我进行的种种攻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特别深刻的或者重大的印象，尤其是对我的律师职业进行的一些幼稚的嘲弄更是这样，自从我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以来，我每周都必须忍受这种嘲弄。比这种嘲弄更不值钱的东西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的。要是我对蔡特金夫人说什么妇女逻辑，她大概会说些什么呢？要是我向发狂地仇恨一切枪炮和刀剑的休恩朗克在决斗时受的剑伤捅一下，他会说些什么呢？或者，要是人们想向以前做过旋工的倍倍尔说，他在车床上把党的各项原则车得太过了，以致把它们车成了相反的东西，或者，要是人们说，辛格尔的论据甚至没有达到一个裁缝的重量，你们会说些什么呢？要是人们拿这些愚蠢的笑话来论证问题，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步呢？例如，我从报纸上看到（我没有听到），休恩朗克昨天曾向我喊道：“您对马克思懂得什么。”我必须对这类卖弄专门家渊博学识的做法提出抗议。的确，我没有成为哲学博士，也未曾有幸或不幸地在二十岁时写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论，但是，一个人即使不是专门家，也可以掌握理论知识。那么所有这些愚蠢行为意味着什么呢？休恩朗克把海涅同志干脆改为海涅议员，这该算作什么呢？蔡特金夫人接连不断地称呼国会议员海涅，这又该算作什么呢？

我对这种装模作样的表现是毫不重视的，我只是想说明，人们使用了多么廉价的、幼稚的手段。蔡特金夫人，我想必应该故意称您为尊敬的夫人？我准备这样做。我认为对我的这种折磨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虽然我是在这一两年来才作政治演说，但我在党内并不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么年轻幼稚。我入党已经多年了，我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我不向前挤，而是等待人家喊我。我利用时间学习了一些东西。在每次代表大会上必然有人被当作替罪羊给杀掉，我今天犯的罪是许多伟人也犯过的，因为日后就连倍倍尔也一定会被人按照传统的宗教仪式的惯例给宰掉。但是，我所反对的是在党内制造奇谈怪论的企图。昨天有人拚凑出一个海涅—吕特根璠就是这种做法。我准备心甘情愿地被利用来代伯恩施坦及其他人挨鞭子，但是我打算坚决抗议在对我施加笞刑时把我同吕特根璠看成一回事。因此，要是人们把我同吕特根璠混为一谈，那就是十分无耻的颠倒是非，或者是相当大的疏忽。这种方式是会引起反感的。说有人掩盖最终目的也是奇谈怪论。据说在梅克伦堡的一份传单中谈到，即使在未来社会里小农占有也还会保留，但除此之外，说明有人掩盖最终目的的证据哪怕一件也提不出来，尤其是关于我的证据更提不出来。我手头有我的一些传单，其中有一份足足有四十九行说到最终目的。相反，这里在我面前有一份辛格尔的短得多因而也是好得多的传单，其中对未来社会却只字未提。我看这是无可非难的，每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

卢森堡同志作了长篇发言来反驳我，福尔马尔对这篇发言已经作了充分的评论；她所谈的同我所谈的都不是新的东西。区别仅仅在于我已经说过的那一点：我对施塔特哈根的观点进行反驳时所说的话是些老生常谈，而罗莎·卢森堡却给自己蒙上了一种新的真理的灵光。蔡特金夫人也不肯放弃编造奇谈怪论来反对我，她说我在我的小册子里表示赞同法国可能派的策略。关于这一点我却只字未写，蔡特金同志今天早上向我道歉了，并

且承认她弄错了。原来小册子里谈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我在小册子里十分明确地强调过，当我谈到可能主义时，我所想到的并不是法国的那个著名的宗派和它的策略。因此，你们看，当人们连读也没有读过的时候，整个辩论是多么捕风捉影啊！也许蔡特金同志以后将向你们说明，写了些什么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内在的思路是决定性的。是的，要是她能够比我更好地了解我的内心的话，那么事情可能会好的。但是我知道，我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相反的东西。现在蔡特金同志也还是把可怕的海涅事件搬到辩论中来。在这里讨论的又是一则奇闻。说什么我想通过强迫党接受一项新政策即补偿政策来抬高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实际情况却相反。如果我真的想实行一项新政策，那我会清楚地意识到：第一，在选举前夕的这个时机是最不适宜的，第二，我在第一次出场时就来推荐一项新政策是非常不适当的。当一些同志提出我做候选人的时候，我象一个诚实的人应该做的那样，曾经向他们当面谈过我对一些问题的态度。特别是我向他们说过，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对奥艾尔和席佩耳^①进行的攻击使我非常反感，而且我请求他们考虑，是否换一个候选人对他们更合适。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让我做。我在我的竞选演说中对这一点一句话也没有说。有一些同志希望提出别的候选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曾就这一点和其他六点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如问我对宗教抱什么态度，并且说了其他一些无礼的话。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必须诚实地对此作出答复，我说，我对某一个问题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在实际政策方面，我完全拥护党一向采取的立场。我确实是站在老的立场上的人，而抱怨这一立场的却是那些想实行一种新的、同迄今的实践相矛盾的说空话政策的人。我倾向于认为同那些试图在他们象淡咖啡一样无味的言论中加进相当多的革命的糖的人相比较，我自己和所有那些想实

^① 麦克斯·席佩耳 (Max Schippel 1859—1928) ——修正主义分子，国会议员。——编者注

行实际政策的人要激进得多。我对于《萨克森工人报》上的文章没有作过答复,以后也不准备答复,福尔马尔和格腊德纳乌厄尔^①保护过我。我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我的品德不允许我个人反驳这类诬蔑人的攻击。而《萨克森工人报》却说,我默认了一切。我什么也没有承认,我不值得答复这个问题。我请求你们对这件事作出判断,我是毫不在乎的。我知道我面临着什么;我有为党效劳的高尚的意图,这一点在柏林已经得到了证明。尽管我发表过大逆不道的意见,同志们还是把我提出来了,尽管《萨克森工人报》及其朋友们在竞选期间给我们造成困难,我还是同大家一起在严重的、辛苦的斗争中保持住了这个受到极大威胁的选区。由于我的缘故,你们把我们叫做叛徒。但是,如果在选举斗争中向我们背后插一刀不算背叛,那就根本不存在任何背叛了。而现在让两位女神蔡特金和卢森堡去继续编造吧。编造不出什么精致的东西来,一切都要暴露在阳光之下,编织出来的蜘蛛网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无处容身的。

克·蔡特金(摘录)

(10月4日)

我预先说明一下,我不是作为“受压迫的女性”发言,而是作为党的一个女同志发言。刚才格腊德纳乌厄尔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和事老的角色。他抱怨说,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来,渴望争论的现象减少了。但最后他又埋怨说,争论太多了,并且赞扬报刊,说报刊并不是每次受到挑动都对重大问题展开辩论。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的报刊在讨论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方面应该做的事恰恰比它迄今所做的要多得多。出

^① 格奥尔格·格腊德纳乌厄尔 (Georg Gradnauer 1866—1946) ——国会议员,曾先后担任《萨克森工人报》、《前进报》、《德累斯顿人民报》的编辑。——编者注

现不同意见并不是不幸，我们中间任何人也没有把它看作是堕落的标志，而是把它看作是党富有生命力和继续发展的标志。值得担忧的只是，有人企图否认意见分歧，不去充分广泛地、公开地讨论这些分歧，而且有人认为，一切意见分歧只是性格的问题，是使用某些词句的次数多少的问题。有些问题在我们的报刊上应该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首先是伯恩斯坦提出的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毫无疑问，伯恩斯坦是有巨大功绩的，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详尽的、科学的讨论。但是，他也在贬低我们的最终目的方面说过一句有名的话：目的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而且这是在竞选前夕发表的。伯恩斯坦在我们准备参加竞选的时刻发表这样的文章，这说明，他同德国党内生活多么格格不入。在伯恩斯坦看来，通过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工会的监督和立法的监督而逐步加以限制，有朝一日资本家自己就会对占有失去兴趣，因为资本家的所有制就仿佛仅仅成了法律上虚构的东西了。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看法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赞同伯恩斯坦的观点，那我们必然要把重点不是放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夺取政权上，而是放在个别的、细小的社会改良上，伯恩斯坦认为通过这种改良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即我们在这儿获得一块社会主义未来国家，在那儿又获得一块，可以说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块块拼凑在一起就行了。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在原则上崭新的观点至今还没有在《新时代》上透彻地加以讨论，而且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发表时编辑部方面却没有至少加一个脚注来表示态度，这往往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伯恩斯坦文章里的观点是代表编辑部和全党的，

罗·卢森堡

(10月4日)

福尔马尔激烈地责备我，说我这个运动中的新兵想教训老兵。不是那么回事。本来用不着这样做，因为我坚信，老兵和我们都站在一个立场上。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要教训某一个人，而在于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述一种确定的策略。我在德国的运动中还必须先获得一副肩章，这我知道。但是，我愿意站在同敌人作斗争的左翼，而不愿意站在同敌人作妥协的右翼。如果福尔马尔竟搬出这样的论据来反驳我的公正的论述，说什么你还是一个黄口小儿，我可以做你的祖父呢，我认为那就证明他快要理屈词穷了。他在论述过程中的确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而这竟出自一个老兵之口，至少是令人吃惊的。他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保护的一个能压倒人的说法，但是我可以拿马克思的另一个说法来反驳，这就是：在英国实行劳动保护几乎是意味着拯救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此外，福尔马尔说，不把工会运动当作社会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并举工联为证。难道福尔马尔一点没有听说过老工联主义和新工联主义之间的区别吗？难道他不知道老工联分子是完全站在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吗？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曾经表示希望目前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会向前发展，因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已经丧失了优势，因而工联运动必须走上新的道路，这一点难道福尔马尔不知道吗？福尔马尔把布朗基主义作为一个可怕的幽灵端出来。难道他不了解布朗基主义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吗？布朗基主义者是要少数密谋者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却是要工人阶级自己夺取政权，这一点难道他不知道吗？这就是区别所在，谁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老兵，谁就不应当忘记这一点。第三，他硬说我热中于暴力手段。无论在我的发言中，或者

在我发表于《莱比锡人民报》上的反驳伯恩斯坦的文章^①中，都丝毫找不到这方面的借口。我恰恰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我说过，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唯一暴力手段是在日常斗争中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启蒙教育。如果说我的意见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那么我认为这是莫大的恭维。的确，这对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是对我们这次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所有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对于海涅同志和他的补偿政策来说就不是这样。补偿政策怎么能同夺取政权相容呢？哪里会有补偿政策呢？我们要求加强人民的权利，民主自由，资产阶级国家要求加强它的实力手段和大炮。假定最好的情况是，双方公正地签定了交换协定并且加以遵守，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东西也不过是纸上的。白尔尼早就说过：我劝谁也不要拿德国的一部宪法做抵押，因为德国所有的宪法都是动产。要使宪法规定的自由保持固定不变的价值，必须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签订协定。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想从我们方面换取的东西，却是固定不变的，残酷无情的。我们批准给他们的大炮和士兵却使客观的物质力量对比向不利于我们的方面转化。不是别人，正是拉萨尔那样说过：“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宪法不存在于书面的宪法之中，而存在于那个国家的实际的力量对比之中。”^②所以，补偿政策的结果总是，我们使力量对比只是在纸上有利于我们，而在客观的现实中却有利于敌人；我们使我们的地位从根本上受到削弱，却使敌人的地位得到加强。我要问：能否认为一个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会认真地努力夺取政权？芬德里希同志愤怒地强调说

① 指《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见本书第114—143页。——编者注

② 参见拉萨尔《现在怎么办？》（《拉萨尔全集》第2卷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78页）。拉萨尔说：“宪法问题最初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力量问题；一个国家的实际的宪法只是存在于那个国家所有的现实的实际力量的对比中；书面的宪法只有在它准确地表达这个社会存在的实际力量对比时才有价值，才能持久……”。——编者注

这种意向是不言而喻的^①，我认为他矛头对着我来不过是错认了对象，他的这种愤怒基本上是对着海涅的；当海涅敢于说出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退让政策的时候，这种愤怒只不过是表明海涅自己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良心已经处于尖锐对立的地步了。

其次再谈谈康拉德·施米特的见解，他认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工会斗争之类的手段来消除。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为论述纲领中关于夺取政权的必要性的条文提供理由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灵丹妙药。无政府状态、工人阶级的可怕的痛苦、生活的缺乏保障、剥削、贫富悬殊，都在天天增长。难道能够说一个想采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人会认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必要的吗？因此，芬德里希和福尔马尔的愤怒在这里也不是针对我的，而是针对康拉德·施米特的。其次还有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这种自觉的见解：

“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谁这样说，谁也就不站在必须夺取政权的立场上了。你们看，党内的一些同志已经不再站在我们运动的最终目的的立场上了，因此就有必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示这一目的；如果有什么时候必须这样做的话，那就正是今天。反动派的子弹正象冰雹般地向我们射来。这次争论必须对皇帝的最近一次演说^②作出答复。我们必须象老卡托那样明确地说：“而且我认为这个国家必须摧毁”^③。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工人阶级不应当站在哲学家的颓废立场上：“最终

① 芬德里希在10月3日的发言中指责卢森堡的第一次发言是老生常谈。——编者注

② 指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9月6日在奥文豪泽的演说，参见本书第10页注②。——编者注

③ 罗马执政官卡托（Cato 公元前234—149）在元老院的一次演讲中说：“迦太基必须摧毁”。——编者注

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不，恰恰相反：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说来就是一切。

奥·倍倍尔

(10月4日)

同志们！我首先不是自己发言，而是代表一位一再受到批评的缺席者发言，他委托我宣读一份声明。他就是爱德华·伯恩斯坦。他知道，他的一组论文在这里会成为批评的对象。因此，他请求我宣读下列“声明”：

“我在《社会主义问题》这一组论文中所表述的见解，近来在社会党的报刊和集会上引起了争论，并且有人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见解表示态度。既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如果党代表大会同意这一要求，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的声明。

一个会议不管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它的裁决总不能使我对于自己通过考察社会现象而获得的见解产生疑惑，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新时代》上所写的东西是我的信念的表现，我不认为我有必要放弃这一信念的任何主要方面。

但是，党代表大会的裁决对于我来说决不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感到首先必须保卫自己，不让别人曲解我的论述和从它得出错误的结论。由于不能亲自出席大会，我采取了书面报告的方式。

某一方面的人断定，从我的论文得出的实践上的结论是，放弃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这是一个十分武断的结论，我坚决否认它的正确性。

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

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我不折不扣地坚持我的意见。

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

《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作出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

《宣言》的作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后一错误。但是很明显的是，既然经济发展所需时间远比原来假定的要长得多，那么，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也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

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象《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想掩饰这一点，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愚不可及。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减少，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

工业中生产积聚的劲头和速度目前也还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在很多生产部门中，生产的积聚固然证实了社会主义批评的全部预言，但是在另一些部门中，积聚目前还没有达到预言所说的那种程度。农业的积聚过程进行得还要慢。工商业统计表明，企业分成非常多的等级，任何一级都没有消失的趋势。企业内部结构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意义重大的变化不能瞒过这一事实。

就政治上说，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在这些制度的影响下，并且在日益活跃有力的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出现一种反对资本的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它在目前固然还是十分小心谨

慎地摸索前进,但毕竟已经存在,而且将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工厂立法,地方行政机构的民主化及其工作范围的扩大,工会和合作社摆脱了一切法律上的障碍,在一切由国家机关分派的劳动中都考虑到工人组织——这些都是这一发展阶段的标志。至于说德国还有人会想到压制工会,那么这并不说明它的政治发展水平高,而是说明它的政治落后。

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谁只要坚持灾变论,他一定会象这一理论的彻底拥护者以前也做过的那样,尽可能反对上述的那种发展并且试图加以阻止。但是难道所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只能是通过政治灾变夺取政权吗?难道这就等于说,由无产阶级独自占有国家权力并运用它来反对整个非无产界吗?

对于凡是赞成这种说法的人,我在这里要提醒他两件事。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新版的序言中宣称,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详细地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①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和军队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是会暂时阻止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或甚至使它倒退一个时期的手段——总之,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②。他并且据此指出党的迫切任务是,‘使自己的选票继续不断地增加’^③——或者是‘议会活动的缓慢宣传’^④。

由恩格斯所举出的数字可以看出,他不管怎样总还是要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10页。——编者注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页。——编者注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8页。——编者注

发展过程的速度估计得过高一些的，但是连他也讲了上面这些话。难道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由合法宣传加以保证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被一场政治灾变打断，我们就要议论他，说他不要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了吗？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同意他的论述，那么在听到如下的说法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会大发雷霆了：社会民主党还必须长期从事的，不是痴心妄想大崩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

这就是我在我那篇受到非难的文章中所说的话，我现在仍旧不折不扣地坚持这种说法。就我们目前所谈的问题来说，我的说法和恩格斯的下述原理是殊途同归的：在任何时候，工人阶级就其智力成熟程度和一般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有多大能力实行自己的统治，民主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统治。此外，恩格斯在上述文章中还明确地援引说，《共产党宣言》已经宣称，‘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①。

总之，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因此他认为即使在拉丁语系各国（那里的传统比德国更有利于这一策略得多）也有必要对这种策略作出修正。他写道，‘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②大家难道已经忘记了吗？

没有人对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引起争论的是崩溃论和这一问题：就德国的现有经济发展和城乡工人阶级的成熟程度来说，发生突然的灾变对于社会民主党是否适宜？我对这一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现在仍旧要作否定的回答，因为在我看来，不断的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2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607页。——编者注

因为我坚决相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即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工人阶级在城市和村镇中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工人经济组织的活动。我当时就是在这意义上写下这句话的：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意义上我今天仍旧承认它。即使‘通常’一词还没有能指出这句话只能有条件地加以解释，但是明摆着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态漠不关心，或者也许不如说不加操心。对于将来，我所感到兴趣的从来没有超出一般原则的范围，我也不能读完任何一本描绘将来的书。我所关心的和努力以赴的是现在和最近将来的任务，超出这一范围之外的远景，只有当它们能成为我在这一方面的有效行动的准绳时，才能引起我的注意。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对于资本家的剥夺，这些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一定的目的和意图的手段。它们作为这种手段列入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要求之中，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关于它们实现时的情况，那是丝毫不能预言的，我们只能为它们的实现而斗争。但是为了夺取政权，需要有政治权利，而我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及时解决的最重要的策略问题，是关于扩大德国工人的政治权利和职业权利的最好途径的问题。如果没有为这一问题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却去强调别的问题，那么到头来这不过是一片大话而已。

爱·伯恩施坦

1898年9月29日于伦敦”

由于争论涉及到伯恩施坦本人和他的观点，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谈谈这项声明。我认为，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伯恩施坦，因为他通过这项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在《新时代》上相当多的

一批文章中论述的见解作了一个提要，这就给将来准备研究这个问题和必须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了方便。同时我声明，我不赞成伯恩斯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我反复阅读这项声明后得出了一种印象：伯恩斯坦自身同他自己的论述处在十分深刻的矛盾之中。但是党代表大会不可能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声明中谈的不是策略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的基本观点问题，这些问题不允许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对这些问题赞成与否，必须在报刊上透彻地加以讨论。为什么《新时代》没有这样做，我的朋友考茨基以后大概要说明。但是我也不想在今天探讨这个极其重要的策略问题。我们昨天和今天听了一些发言，这些发言与主题几乎毫不相干。只有蒂勒尔和格腊德纳乌厄尔谈到了正题。但是其他一些人谈的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讨论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但事先必须做好准备。党代表大会完全合理地在最后一刻拒绝把策略问题列入议程，因为这样做在今天是得不出任何结果的。因此，我对这里谈论的任何问题都不表示态度，只是发表一些简单的意见。关于海涅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所发表的见解，这个问题对我说来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作为党团的成员，在我们邀请海涅参加的那次会议上，有充分的机会发表了 my 不同意见。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党团已经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因而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只有当海涅发挥的见解和作出的行动同我的见解不相容的时候，我同海涅的争论才有可能再度发生。从他那一次发言以后到今天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基于同样的或者类似的理由，我也不可能以某种方式就《前进报》的态度表示意见。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有很多机会同编辑部交谈，就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还想在这里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辩，那简直是轻率的。然而关于同《萨克森工人报》进行辩论的问题，我愿意向这里出席会议的这份报纸的前领导人十分坦率地声明：我对于它的反对立场以及它对党的报刊和对党的

领导的批评常常是感到高兴的，但是我也必须同样十分坚决地向它提出谴责，因为它在进行这种批评时经常使用的那种语调和措辞使受攻击的人无法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局势，考虑到伯恩施坦的声明，考虑到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在党内某些人中间引起了共鸣这一事实，并且考虑到有必要研究这一事实，我最后也只能表示这样一种愿望：让我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争论，但我们要客观地进行争论，不要忘记，我们是党内的同志对同志谈话。

卡·考茨基

(10月4日)

许多发言人受到这样的责备，说他们对问题没有发表任何新的见解，使代表大会大为失望。我担心如果人们期望我说出某些特别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一责备对我也将适用。我认为在我们已经进行过历次大辩论以后，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决定性的观点都已经提出来了。如果不是我的职务受到了攻击并且我的沉默因此会引起误解的话，我本来是不会发言的。问题在于伯恩施坦的文章。我曾经满意地说过，没有人因为我发表这些文章而责备我。各方面都承认，这些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人们仅仅责备《新时代》编辑部在发表这些文章时没有提出反驳。提出反驳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尽管这些文章作为讨论的对象很有益处，但是如果它们始终没有受到驳斥，如果它们竟在将来对党的策略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它们一定会成为致命的。我只能说，再也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加因为这些文章没有在《新时代》上引起讨论而感到惊奇了。我曾经期待所有向伯恩施坦开火的人会在《新时代》上这样做。《新时代》是党进行讨论的机关刊物。我曾经期待，尤其是卢森堡

同志也会在《新时代》上攻击伯恩施坦。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许多时间因此损失了；另一些人答应我写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但是没有给我，更多的时间因此损失了。在这一期间，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①发表了，另外几篇将继续发表。我的自觉性还不足以使我认为，我在伯恩施坦发表意见以后立刻对此表示态度是很关重要的。我认为，党并没有因为我没有这样做而遭到任何损失。但是人们把我的沉默理解成赞同，或者象帕尔乌斯所说的，理解成不知所措。哦，我不需要反驳说我不知所措的这一责备；但是对于认为我是因为《新时代》编辑部完全站在伯恩施坦的立场上才不作回答的这一看法，我想反驳一下。

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须同一个我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争论，这个人在党的最艰难的时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流亡在外，没有可能在这里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在应当消除暧昧情况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因此有所顾虑。我只不过将努力避免任何伤感情的话，并且不再加重讨论的不必要的尖锐性。

你们已经通过倍倍尔之口听到了伯恩施坦的声明。我认为，尤其使整个党代表大会感到惊奇的是，伯恩施坦认为有必要把一系列根本不存在意见分歧的观点强调成特别必要的。如果他向我们说明，合法的道路在目前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合法状态不会致我们于死命，却会致我们的敌人于死命，我们有进行民主的和经济的改良的任务，有组织无产阶级的任务，那么每个人都一定要问：伯恩施坦说这些话干什么呢？难道党内有任何人不站在这一立场上吗？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同党失去了接触。我必须遗憾地说：伯恩施坦曾经根据报纸和许多

^① 指《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发表于《新时代》第16年卷（1897—1898）第2册第44期。中译文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389—404页。——编者注

演说中的个别词句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错误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是布朗基主义者,想拿一场武装力量的冲突来进行投机,等等。我相信,没有一个党员同志是这样想的。

伯恩斯坦还向我们说明,发展并不象许多人所设想的那么快。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也无需强调同伯恩斯坦所说的相反的那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假设是一个性情问题。

我不属于那些否定一切分歧的人;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策略性的和理论性的分歧,这些分歧从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摆在那里,党变得愈大,党愈成为一个政治力量,这些分歧肯定还要加深;但是速度问题恰好是一个感情问题,性情问题。但是伯恩斯坦超出了这一点。他企图用一些我完全不能赞同的论据来论证发展的缓慢情况。他对我们解释说,有产者的人数、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们是依靠错误的根据来形成我们的观点的。的确,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不仅我们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如果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在增加,那么发展愈向前进行,我们离开目的就愈远,那么巩固起来的将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但是我今天恰恰不想详细讨论这一点,因为这一来我就必须同伯恩斯坦论战了,而凡是在没有必要的地方,我想尽可能避免同他论战。否则我必须详细谈论职业统计和收入统计以及类似的东西,而党代表大会不是这样做的地方。但是肯定无疑的是,马克思的这句话今天还是正确的:资本的增加也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增加。

伯恩斯坦还说,未来的历史将不再在灾变中发展,灾变的时代过去了。他援引了恩格斯的许多话,认为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不能赞同他的这种说法。我现在不能精确地回忆出恩格斯的这一切引文,因此不能说它们的上下文联系怎样;但是我知道我想不起恩格斯有任何一句话会证明从今以后没有灾变的可能。

我不打算用灾变论来麻烦你们。我只想在这里讨论伯恩斯坦的危机理论中在这里的会议上也引起了反响的那一部分，即政治危机和灾变的问题。伯恩斯坦认为，从现在起发展能够和平地进行，当然不是没有斗争，但是毕竟可以不经过大的灾变。无产阶级得到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利，通过工会运动、通过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影响、通过建立合作社等等获得愈来愈大的经济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逐渐压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后者有一天融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止。这一看法被人认为是愚蠢的。不，伯恩斯坦的这一看法是以很可靠的事实为根据的。这一看法只有一个错误，而这也是我们的不幸，即这些事实德国找不到，却要到英国去找。那么人们会说：是的，完全正确；但是英国的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英国给我们指出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不是这样看的。英国固然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但是英国就它的政治地位来说，就它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规律来说，就它的政治趋势来说，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国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条件同全世界的都不相同。由于它的历史，由于它的岛国的地位，我们在那里见到的是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官僚、没有农民的国家，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农业——农业人口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我们在英国看到，尽管经济是进步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却比别的地方小，英国的资本已经变得过分庞大，不能仅仅在英国的工业中寻找容身之处了。英国资本投放在全世界；投放在英国工业中的部分相对说来将愈来愈小，直接同剥削英国工人有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因此也愈来愈少。但是人类就本性来说是有同情心的，凡是在不同自己的利益抵触的地方，同情心总是要出来说话。因此我们看到英国的资产阶级支持工人罢工，而那儿的资本主义公司却打算消灭工会。博爱主义在英国与在任何别的地方不同，是一种力量。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经过灾变而逐渐取得权力。这是马克思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说过的，他写道，英国是这

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排除灾变。如果工人使用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这样做），英国资产阶级将采取什么态度，今天的资产阶级那时是否会起来叛乱，反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我们今天还不能知道。你们在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象英国这样的状态，即使在其他方面与英国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的美国，你们发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暴力灾变的倾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美国这样大，这样明显，单是英国就已经会推翻伯恩施坦的理论了。但是我们欧洲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到处都是军国主义的最发达的形态，到处都是专制主义地统治着的官僚，不仅在君主制国家中如此，在法国也是如此。此外我们欧洲大陆上大地产还起着决定性影响，资产阶级向刺刀的统治低头，它已经不再是一种民主力量。我们这里只有一种民主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我们也许还能够利用资产阶级青年时代的民主残余，但是资产阶级争取新的民主权利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伯恩施坦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取得民主，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无产阶级引到胜利，那么我要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我们这里，民主的胜利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我们根本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我承认，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是不容易发展的。我承认，英国无产阶级所走的道路是较好的，它要求的牺牲较少，我们必须希望我们能走同样的道路；但是历史的进程不是由虔诚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事实决定的，而事实告诉我们，英国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行不通的，民主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取得。

但是难道有人相信无产阶级有可能不经过灾变而取得胜利吗？我但愿如此，但是我不相信会如此。民主和无产阶级将愈来愈被迫处于守势，自由主义已经让位了。资产阶级民主不是

向前进,而是向后退,我们正处于日益发展的反动势力的支配下。这是一个戈尔迪乌斯之结^①,它愈来愈复杂,我不相信可以用与解开那一个古老的结不同的方法解开它。我们看见欧洲到处都在酝酿着大灾变。奥国不是面临着灾变吗?意大利不是面临着一场流血的灾变吗?西班牙不是吗?法国不是在酝酿着资产阶级自由同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之间的一场艰苦搏斗吗?而德国的人们正在谈论什么呢?难道是在谈论扩大人民的权利、扩大结社权吗?不是,人们在谈论政变,谈论取消选举权,谈论监狱。这是我们可能有的前途,在这种前景之下,伯恩施坦所建议的道路是不能想象的。如果伯恩施坦是在我们中间,他会是第一个谴责这一道路的人,这是我的确定不移的信念。

艰苦的斗争等着我们,我们为了这些斗争首先需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信任,是胜利的信心。不是那一种也许会使我们低估敌人、轻率地挑拨敌人或者袖手等待的胜利信心;不,我们必须准备作沉重的牺牲,而这一信心只能表现在我们说:不管牺牲多么沉重,并且即使我们也要遭受暂时的挫败,归根到底胜利毕竟是我们的。有人责备伯恩施坦,说他的文章削弱了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束缚了无产阶级的手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么当我作为一家社会主义刊物的编辑而接受伯恩施坦的文章时,当然是失职了。但并不是这样。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应当是盲目的信心,不应当以人们不加思考地接受下来的、现在也许已不再站得住脚的传统见解为根据;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必须以日新月异的考察为根据。如果伯恩施坦的文章当真使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在社会主义信念上发生动摇,那么这只是证明,不值得为这些人感到可惜,他们的信念不很牢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背弃我们。如果他们现在就背弃

^① 古希腊传说中一个名叫戈尔迪乌斯的国王所打的乱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拔剑斩断,因此解开戈尔迪乌斯之结一语就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问题之意。——编者注

我们，而不是一场灾变（那时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中背弃我们，那我们是感到高兴的。不，伯恩斯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但是我们不想按照他向我们建议的道路斗争，我们要按照条件为我们规定的道路斗争，那时我们会胜利。

克·蔡特金（摘录）

（10月4日）

在考茨基以如此杰出的方式既对伯恩斯坦问题、也对海涅的论调进行争论以后，如果我还想就报刊对待党的策略的态度进一步发表意见，那就是多此一举了。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教导人们要有信心，而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危险。我们希望公开讨论迄今人们回避讨论的那些问题。据说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对于那种要求我们按照“我给你这个，是要你给我那个”的方式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必要的社会改良、争取日常粮食的策略，多数代表、党员群众连听都不愿意听。不，我们愿意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政党，在不断同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中争取在目前社会中实现不可缺少的改良，而资本主义国家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对工人阶级伸出过慷慨之手，而始终只是拿铁拳对着我们的。

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10月4日）

现在谈谈关于策略的争论。蔡特金夫人认为，她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危险的。这一点她错了。昨天进行辩论的方式不如说是制造了一种与她的愿望相反的情绪。但是，当考茨基在原则的基础上并且从理论和科学的高度对问题作了说明以后，整个

代表大会对他表示了热烈的赞同。只有考茨基才把关于策略的争论引导到恰如其分的原则高度。双方都有违背使用良好语调的人。有气势汹汹的批评,也有激烈的回敬。我对帕尔乌斯的观点实际上大部分是同意的,但是我不赞成他讨论问题时用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令人不愉快的、教训人的、非同志式的口吻。如果换一种方式,本来是可以同他进行有益的争论的。人们谈论过宗教裁判。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实行宗教裁判,它只是反对有人想实行宗教裁判来反对党,因而对此作出了反应。但是,有人认为没有理由进行尖锐的批评,这是愚蠢的。因此,我感到遗憾的是,策略问题没有被作为特殊的问题列入议程,否则就可以进行一次集中的争论了。尽管有人转变了话题,但是我们还是进行了关于策略的争论。哪里有兴趣,哪里有需要,那是压制不住的,是要表现出来的。我从考茨基发言后博得的一片掌声中断定,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实质上已经达到了一致。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伯恩施坦在英国的逗留使他腐化了。象马克思这样一位天才,他必须呆在经济上走在其他一切国家前面的典型发展的英国,为的是在那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从事写作他的《资本论》。而伯恩施坦却陶醉于英国资产阶级巨大的、同时也是民主主义的发展。我们这里的情况和英国的不同在于,英国摆脱中世纪时期已经两个半世纪了,而我们这里现在还得同中世纪的破烂货作斗争。德国没有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改良和连续不断的发展的优点,在我们这里主要是曲折前进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取得统治,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统治。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让位了,容克即资本的护卫军则随时准备把事情推向灾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不会发生任何灾变,那是愚蠢的。请你们看看意大利吧!看看那里的血腥屠杀和绞刑架吧!请你们看看匈牙利和法

国吧！而德国呢，谁会认为由于颁布苦役监禁法案可以为我们保证一种和平的发展呢？在这里谁愿意说政治灾变、暴力斗争的时代过去了呢？我们不想要政治灾变和暴力斗争，确实不想要，但是，俾斯麦一直到死都一心想实现一种想法，他最渴望不过的就是将无产阶级诱入街垒战，唆使他们进行街垒战，这种思想现在也还占据着支配地位。我们试图避免灾变，但是我们的敌人在准备灾变。所以在策略上和原则上必须坚定不移。必须避免滑向背离久经考验的道路的错误道路。现在谈谈海涅的事。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我没有听过海涅的一些发言，不管他是怎么说的，这也是个别人的看法，而且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所有这类游移动摇的态度随时进行了最尖锐的谴责。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通过全部军事预算，而且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然而现在出现了另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出现了用保护关税政策来迁就容克的倾向。因此我们只应当感谢今天在这里敲起警钟的那些人。理论容易实践难。在原则方面没有任何分歧，只是在原则的运用方面有分歧。在实践领域内，很容易向右或向左走得很远，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更有义务防止偏差，不要徘徊不前。当然，在我看来，恰恰是那些自命直言不讳的人自己犯的错误要大得多。帕尔乌斯在参加邦议会选举的问题上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础，并落到帮助普鲁士资产阶级恢复元气的地步。在我看来，这同海涅关于大炮的言论比较起来，错误要大得多，有害得多。

国家中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立越是尖锐，就越要团结一致。但是一旦我们抹杀了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界线，一旦我们不再使党员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东西，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我们党也就失去了力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只要我们放弃了这种斗争，我们就没有力量了；就象电力一样，切断了电源，电力也就没有了。如果我们不再是无产阶级

的党，不再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党，那我们也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了。

伯恩施坦竟亲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对我说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十分愚蠢的。因为没有目的的运动是什么呢？这就成了漫无计划的流浪。卢森堡同志恰恰相反，她说：“对我说来，最终目的就是一切，运动是微不足道的。”这同样是错误的。没有运动怎么能达到最终目的呢？不是的，运动和最终目的——进行运动达到最终目的，这才是正确的口号，而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8年柏林德文版第87、89—90、92—94、95—96、97—98、99—100、105—107、107—109、112—113、117—118、122—126、126—130、132、133—135页。

罗·卢森堡 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摘录）

（1898年10月11日）

毫无疑问，关于策略的辩论是斯图加特大会讨论的重点，这个重点也引起了所有代表的最大的注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从党诞生时起，日常的实际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直到最后也将始终如此；只要党还存在和发展着，这个问题就不会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一定要一再以新的形式出现。我们认为，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不得不再一次如此着重地探讨这一问题，正是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无可怀疑的标志。

一般策略问题象一条红线贯穿着社会民主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但是，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这是和运动的历史条件完全一致的。从1868年起，也就是从党在爱森纳赫真正建立的前夕起，直到1891年为止，社会民主党内的策略争论是围绕议会政治问题进行的。那时必须同一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议会政治的极左派作斗争。只要党还没有进行有效的日常斗争的必要法律前提（首先是选举权），只要它还由于反社会党人法而丧失存在的法律基础，争论就不得不持续下去，不能通过辩论得到解决，一定要通过事实才能最终得到解决。我们也是的确是这样看到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政治选举的问题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出现的：1871年在德累斯顿，1873年在爱森纳

赫,1874年在科堡,1877年在哥达,然后在维登宫^①,在哥本哈根^②,在圣加仑^③;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以后,这一争论于1890年在哈雷和1891年在爱尔福特发展成对“独立派”^④的清算,争论也就在这里自然而然地结束了。由于重新获得了法律基础,由于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选举时取得辉煌的胜利,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议会斗争的有效性的任何怀疑都无法存在了,而那些坚决主张进行消极性鼓动的人,必定自然而然地迅速发展到无政府主义,也就是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党在一个方面的内部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相反方向上的斗争立即开始了;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性的阳光照耀下蓬勃发展,这就带来了新的危险。在这以前党的一翼一直是倾向于轻视日常的积极斗争,倾向于消极态度的,而1890年以来,由于运动向纵深蓬勃发展,就必然要使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过高估计建设性的改良工作,产生机会主义的倾向。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刻,在这个时刻,党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斗争——一方面反对独立派运动的残余,反对威纳尔之流,另一方面反对由福尔马尔体现的最初的机会主义迹象。那时辛格尔已经不得不出来反对福尔马尔,说他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看作一件传家宝,放进了逢到特殊的节日才打开来的银柜”。同一个辛格尔在他的上述发言中也证实——在正确认识两个极端派别的每一派应有的意义的情况下——,他认为,福尔马尔的意见“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如果得

①②③ 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举行的三次代表大会,1880年8月20日至23日在瑞士维登宫,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丹麦哥本哈根,1887年10月2日至6日在瑞士圣加仑。——编者注

④ 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倾反对派“青年派”,它反对党利用合法可能性来开展活动,特别是否定党所制定的革命的议会策略。在1890年哈雷党代表大会上“青年派”遭到一致驳斥,它的主要代表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他们后来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即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到了党代表大会的赞同，它们对党来说就会比反对派及其代言人的观点危险得多”^①。的确，如果说无政府主义理论每天都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成果即事实本身的迎头痛击，因此只有毫无头脑的人才会今天仍旧死抱住无政府主义的幻想不放，那么机会主义观点的情况却相反，表面上看来它们好象每天都被那些事实所证实，因此要驳倒这些观点，只能依靠党的明确的认识。同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对党的理论修养和策略修养所提出的要求，是与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时的情况无法相比的。我们也是这样看到1891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派别一再抬头的。1892年在柏林党代表大会上，它出现了，并被当作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受到打击。^② 1894年在法兰克福，巴伐利亚邦议会^③对预算的表决引起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机会主义派别在争论中又一次被彻底击败。1895年在布勒斯劳，追求实际效果的做法表现为农业社会主义的形式^④，它碰到在实践中坚持原则性的主张就又一次遭到失败。最后，在就党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了争论之后，我们在斯图加特同机会主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和原则性的清算，因为机会主义在理论方面通过伯恩斯坦，在实践方面通过海涅已经彻底成熟了。

争论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机会主义这一次也遭到了迎头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198页。——编者注

② 1892年11月14日至21日的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是诱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编者注

③ 在1894年6月1日，巴伐利亚邦议会的以格奥尔格·福尔马尔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投票赞成预算，从而第一次破坏了奥古斯特·倍倍尔提出的“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和一文钱”这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编者注

④ 在关于农业纲领的讨论中，机会主义者爱德华·大卫和麦克斯·克瓦尔克主张由资本主义国家以改良形式来援助小经营，他们称这种改良为社会主义的。他们否认走向大经营的历史趋势，从而否认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编者注

痛击。党一致声明：它坚持它的最终目的，坚持取得政权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它对社会改良和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彼岸丝毫不抱幻想，相反，它期待着社会灾变和政治灾变，它坚定地希望表明自己日益能胜任这一任务并作为形势的支配者出现；最后，它对现存的国家不仅不进一步实行让步政策，而且要把斗争进行到底。经过争论以后，代表大会的气氛使为数不多的机会主义代表感到十分受压抑。他们起初以为可以确立一种“良好的气氛”——请看福尔马尔的第一次发言——后来他们却不得不根本放弃在一般性辩论中继续维护他们的观点了。

就这些来说，我们有一切理由对讨论的结果感到满意。但是我们也想加几句批评的话，而且是针对我们的“老人们”在这一争论中的态度。如果党的老战士从争论一开始就投入战斗，而不是相反地试图通过否决唯一合理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将以一项专门的议程开始关于策略的讨论，并且使它更加易于进行下去。）使争论本身无法进行，那么我们会更加高兴得多。尽管如此，争论还是展开了，但这不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的态度，而是不顾党的领导人的态度才做到的。如果说也可以用对争论结局的关心来说明这一态度的话，那么，由此只会引起我们对这些老人提出新的指责，说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党的情绪，他们非常缺乏决心，不能不惜任何代价和全力以赴地抵制有害的倾向。首先听任争论自然发展，用两天时间沉着地观望“动向”，在机会主义的代言人已被迫明确发表意见时才参加进来，这时还对一些人的“过分尖锐的语调”指责一下，然后就全盘支持这些人的观点，如果党的领导人在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取这种策略，那是很糟糕的。考茨基解释说，他之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有对伯恩施坦的理论发表意见，是因为他要给自己保留在可能发生的辩论中作出结论的权利，但我们认为这也起不了什么辩解作用。二月，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伯恩施坦的文

章,连最起码的编者脚注都没有加,以后,沉默了四个月;六月,他在讨论开始时对伯恩施坦的“新”观点即老的讲坛社会主义的这一新翻版恭维了几句,以后又沉默了四个月,等着党代表大会召开;最后,他在争论过程中说他想作出“结论”。我们希望,我们的专职理论家在重要的事情上总是出来发言而不是作结论,并且不要给人造成错误的和迷惑不解的印象,似乎他长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拿破仑的老近卫队总是在战斗临近结束时才投入战场,我们却习惯于看到我们的老近卫队总是在战斗开始时就站在岗位上。我们将在评论另一项议程时指出,他们的慎重已经对实践产生了不利的后果。

发表于1898年10月11日。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分册第242—246页。

奥·倍倍尔致爱·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16日于柏林西区
哈布斯堡街5号

亲爱的爱德：

你当然是密切注意斯图加特大会的，这从你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我认为我有责任起码要把你的声明对那些人起了什么影响告诉你。他们同意你的一部分观点，却没有讲过，而你的声明的内容一下子就把他们给压垮了。我自己不能不说，虽然我事先已经把你的声明看了两三遍，因此我是知道它的内容的，而且从你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中，我也已经从总的方面了解了这一内容，但是直到我朗读声明时，我才充分感受到它的印象。

用句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你又一次在脱毛^①，而且我认为这是你历次脱毛中最危险的一次。这就是因为，唯一能帮助你的援救办法是使你换一个环境，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办法却不能使用。作为老朋友和老战友，我要坦率地讲。我曾经思考过使你得出目前观点的原因，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相识以来的近三十年中，只要你所接受的印象和影响改变了，较长时期以后你的观点就总要来一个根本的变化。你的追求真理的热情和你巨大的洞察力都没有阻止住你的这种变化；不如说，促成这种变化的是，你把你暂时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当成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并且力图用你全部洞察力来证明这一点。让我来

① 脱毛一词原是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尤斯图斯·李比希在谈到科学观点发展时的用语。他把化学家们赶上飞速发展的化学成就的过程比喻成脱去旧的羽毛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借用脱毛来比喻他在自然科学方面进行探讨的过程。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用这一词来形容观点上的变化。——编者注

向你提示一下在我们相识期间你所完成过的变化。

你入党时是一个爱森纳赫派。几年后你在杜林的著作和演讲的影响下变成了狂热的杜林分子。然后你认识了赫希柏格。你们两人隐退到北意大利湖泊区去过田园生活，你在和他的交往中——请允许我这样说——变成了赫希柏格分子。作为一个赫希柏格分子，你和赫希柏格以及施拉姆写了那篇可恶的文章^①（1879），它把我们大家都惹火了，现在提起那篇文章就使人鲜明地联想起你目前的观点，只不过你今天走的更远罢了。你也知道，那篇文章以及由于赫希柏格而发生的一些事，是我们到伦敦的“恩格斯堡”作“忏悔之行”的原因，当时你是真正的“忏悔者”，而我是在两位震怒的老人面前充当你的“引见人和守护神”。

我们得到必要的“赦免”回去了，后来你当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你生活在苏黎世我们自己的同志中间，那些同志那时由于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屈辱，满怀着激烈的革命之情，你曾是他们的观点和愿望的最杰出的代表。那段时期是你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谁都更加热情地关怀你。你迁居英国后，由于经常和恩格斯亲密交往等等，你的观点起初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自从恩格斯逝世，你所呼吸的英国空气、你所处的英国环境以及你在那里的交往使你的观点又来了一个变化，看到你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摇头惋惜。

我不能在信中作深入的理论上的分析，最近我们在瑞士的会面也使我相信，即使理论上的分析是中肯的，也几乎对你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当时我也有意识地不进行争论，因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从你的嘴里听一听，你的变化过程到底已经进展了多远。此外，我觉得如果把我要反驳你的话公开讲出来，那就更恰

^① 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发表于1879年8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该文公开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编者注

当,更明智,而且对事情更有促进作用。

我认为斯图加特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首先是因为时间不够,同时我的看法是,在讨论策略之前一定要就我们和你在我们的基本观点上的原则分歧进行辩论,而这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在那里既没有参加关于你的改变了的基本观点的讨论,也没有参加讨论你的策略观点。尽管如此,辩论还是象后来那样进行了,对于这一点我最后仍旧是以满意的心情表示欢迎的。辩论虽然不透彻,但确实很使人鼓舞而且澄清了一些问题,这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就更加使我高兴了。

卡尔的自发介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你的声明引得他出来讲话的,当然啦,在我拿到你的声明后,我立刻就告诉了他。这次毫不含糊的辩论对于你的观点和那些同情你的人的观点来说是不利的。卡尔最近在《前进报》上对你的答复中要求你对你目前的观点作一个总括的阐述,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觉得这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认为要想知道你向哪里发展以及你希望我们跟着你向哪里发展,你已经对我们讲的够多了。不过你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这倒也更好。

我发现你处于极端的矛盾当中,而且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给人的印象是,你只看到你愿意看到的東西,而当你看不到你愿意看的东西时,你就进行编造。拿一桩小事来说吧(不过这件事对我很有教益),你曾把一份维也纳出版的我党报刊寄到斯图加特来给我,那上面有编辑部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争论,谈的是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策略的必要性。你在有关的地方画上粗线。但是我和党内任何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没有反对过策略必须适应我们生活和斗争的环境。毋宁说这是全党都承认的自明之理。我相信,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关于策略的辩论已使人对这一点没有怀疑的余地,而且我们后来还经常反复强调这一点。我只想提一下李卜克内西那句极而言之话:

如果有必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二十四次改变策略。不过我们所争论的是，在这个确定的时刻是否必须执行另一种策略或者改变一下策略，万一必要的话，要改变到什么程度？但是无论如何还有一件事是必须坚持的。制定策略必须始终考虑到党的基本原则和目的。而在这一点上，你和党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你发表在《新时代》第二期上的文章再次表明英国的环境对你整个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对形成你的观点起了多大的决定性作用。即使承认你在那里就英国党的情况所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尽管我并不认为它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把它用到德国和德国党的情况上来。而且甚至对于我们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问题也根本不适用，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总的说来我的看法是同你一致的。因为我们这里的选举权绝对排除任何一种自己单独的成功，它迫使我们支持敌对的政党，不是为了赢得什么，而主要是为了防止某些有害的事。英国的选举制度不管有什么问题，毕竟是这样的，即只要那里有一个强大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政党，它就可以取得自己单独的成就，至少可以象我们在从前的选举制度下在萨克森曾经取得过的成就一样好。

英国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选举权，而是由于其他因素，我们的英国同志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克服这些因素的技巧和才干。不过我还要再次强调：把我们分开的不仅仅是策略上的严重分歧，而且也有基本观点上的尖锐矛盾。卡尔在斯图加特分析说，要是你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发展的观点（你在声明中重新说明了这些观点）正确的话，我们就只好不当社会民主党党员了，他是非常对的。从你现在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发展的观点出发，你完全有理由说：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鸿沟，我认为，极其明确地肯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所有知名的德国同志中，我想，福尔马尔是站在你一

边的，席佩耳大概不会，奥艾尔无论如何不会，尽管他喜欢玩弄外交手腕和进行调和。支持你的观点的可能还有海涅，但是他的短期的公开的党的活动已经使他丧失影响了。

我的信写得这样坦率，是因为我不想使你发生误解，而且也因为只有对你采取毫无顾虑的坦率态度，也许还能促使你下决心再次十分彻底地检查一下，你是否真的走上了歧途。

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奥·倍倍尔

刚才看到阿德勒在《工人报》上的文章。^①他向你指出那儿的人也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使我特别高兴的是他回答了你对德国党的攻击。作这样的攻击，你也应当拿出事实来，否则没法讨论。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与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255—256页。

爱·伯恩斯坦致奥·倍倍尔

请原谅写得过长，不过这信是给你们大家的。

1898年10月20日于伦敦东南区
路易镇绿荫巷146号

亲爱的奥古斯特：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非常感谢。信写得诚恳、明确。虽然没有用粗暴的话，但的确是十分坦率地使我明白你们真心实意地认为，由于我现在的观点，我不能再当党员了。出于爱护，你们也许能容忍我，但是你们宁可要我或是回心转意，或是根据我的

^① 1898年10月16日的维也纳《工人报》发表阿德勒的题为《斯图加特大会》的文章。——编者注

思想变化自己作出决定。

我决不会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对我有什么恶意，这难道还需要对你说明吗？你们是遵照你们的真诚信念办事的，而且尽管这样一种分手很不好受，但是这可还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口是心非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摩擦和误解，要比这坏得多。现在已经是，不管我写什么东西，你们都要误解。我的那篇谈英国关于选举策略的辩论的文章根本没有倾向性，纯粹是客观的评论。你却从其中看出我在推荐某种策略——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并且声言那种策略是错误的。我没有想到要在我论述夺取政权问题的文章里攻击德国党，有关奥地利的说法是针对累德堡及其同伙的方针的。事实上，德国党是相当经常地、或者不如说是一贯地实行机会主义的，而且它的政策不管怎样总是比口头上说的要正确得多。因此我也一点不想去改变党的实际政策（次要之点不算，在这些方面我们之间确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我所努力追求的，而且——用一次你们加在我身上的词——我作为理论家也必须努力追求的，是理论和实际、言语和行动的一致。二元论在平常时期是可以强词夺理的手段（我使用这个词并无恶意，我自己也常常强词夺理，而且有些时候不强词夺理就无法了结）来对付过去的，但是在任何一种紧张的形势下，二元论都将是危险的。

你责备我的“变化”。我一开始就不得不说，你对我的评论实在是很错误的。首先，我在柏林时不是杜林分子。我个人偏袒过杜林这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杜林体系。不过我根本不认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的光荣，相反，我认为这件事证明了我那时候的理论见解是多么贫乏，我的思想方法是多么肤浅。很自然，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曾经是个折中主义者，是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我和赫希柏格在一起时也没有变成赫希柏格分子。远非如此，我在洛加诺的时候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只是偶然

地参加了赫希柏格—施拉姆^①文章的写作，这篇文章是施拉姆—赫希柏格和库尔蒂^②讨论的，当赫希柏格问我是否也觉得过去的鼓动方式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时，那篇文章已经写成了。我说，我讨厌哈赛尔曼对工人阿谀奉承（我现在仍旧讨厌它，有一些文人太善于模仿这种作风了），于是在赫希柏格的催促下，我写了二十多行。这就是我对这篇文章的全部贡献。

你会记起来，那时我对恩格斯针对这篇文章的通告信的答复是和施拉姆—赫希柏格以及福尔马尔完全不同的。而且早在通告信发出以前很久，我就逼着赫希柏格到伦敦去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谅解。1880年7月赫希柏格的伦敦之行是我的成绩，幸好我还有一封赫希柏格的信来证明这件事。这次访问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对赫希柏格大发脾气，另一方面是由于赫希柏格和恩格斯的理解方式基本上是对立的。

可见，我并不是在伦敦、或者说从1880年那一次到伦敦起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我也并不是在伦敦或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才改变我的观点的。我请你读一下我发表在最后几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特别是连载于1890年第15、18、和21期上的那篇《悬崖》、25期上那篇《略谈策略问题》以及36期上给一篇丹麦来稿写的后记，还有同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你将会发现，我绝不象你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突然发生变化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充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直到两年前，我还是竭力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当我一年半

① 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 (Karl August Schramm)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的作者之一。参见本书第60页注①。——编者注

② 特奥多尔·库尔蒂 (Theodor Curti) ——《苏黎世邮报》主编之一。——编者注

以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完全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是很说明问题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还存着演讲的底稿，那是一次可以引以为戒的、善意的“援助尝试”。我想帮助马克思，想说明，他所说过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一切没有发生的，也是他曾经说过不会发生的。但是，当我完成这个作品去作演讲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你歪曲了马克思，你所讲的不是马克思。机智的费边社社员休伯特·布兰德^①在演讲结束后向我提了几个善意的问题，我仍然照老一套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给了我很大刺激。我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样下去不行。想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是徒劳的。需要做的无宁说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而我以前采取了后一种做法，还有许多人今天仍旧在这样做。我一定还要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因此在这里就不谈了。

不管怎么说，上面讲的已经证明，我的思想发展并不象你们想象的那样。照你们的说法，我肯定是可怜巴巴地毫无主见，奴隶般地顺从我的环境，但我根本不是这样。应当说正好倒过来。我不管在形式上怎样迁就，思想上是一贯反抗环境的压力的。这是顺便说说。

说实在的，这件事真是滑稽，你们大家现在都责备我说：你透过英国的眼镜来评论德国。可是英国的眼镜却是我所“背叛”的党的官方教义的基础。教义是以英国为根据的，直到今天它还从英国援引证据，如果你们夺去了它的这一基础，你们必须给它一个新的基础。

你不能说你们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过是说我用英国目前

^① 休伯特·布兰德 (Hubert Bland 1856—1914) ——英国费边社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的情况作为判断德国形势的标准，并且忽略了英国和德国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别。对于这点，我的回答是：你们想把我看成什么都请便，但是休想把我当成白痴。我确实还没有英国化到看不出今天的德国和今天的英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地步，我曾对自己说，由于这种差别，发展不可能是平行的。我并不是根据英国的统计，而是根据德国的统计得出我反对崩溃论的论据的。我还将向你们提供证据，证明有产者的数目不仅是在英国，而且是在所有现代国家中都不断地增长。只要把马克思在他的研究过程中附带提到的某些原理继续发展下去，也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推引出这一证明。不要忘记，《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结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我认为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科学性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愈来愈困难了。从这方面来说，这部伟大著作的命运几乎是象征性的，并且无论如何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如果不久的将来某种事件使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那时我们的理论假设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别便将充分显露，而隐藏在“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这个原理背后的严重错误就将暴露：由于把法国革命的手段这样搬到现代社会而产生了观点上的混乱，今天把仆役头儿和放牛娃、簿记员和仆人、技工和小工混为一谈，把他们一概算作统一的一群“无产阶级”，这是对这一群人的真正性质的错误认识，不过我宁愿说，这是忘记了这群人的真正性质。正如过去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或是一个统一的第三等级一样，现在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他们只是统一在一定的对立之中和一定的压力之下。压力愈减轻，他们在行动上的差别就愈大，因此最荒谬莫过于设想，在一次革命中会有一千五百万被帕尔乌斯算成“无产阶级”的人统一行动。另一方面，在一次革命中也确实不可能有选择和有步骤地进行剥夺。那时一切都是原始力量在推动，谈不上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干预。那时的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是违背“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的。

由此可见，要是有一批文人今天用过头话在工人中唤起或培养仿佛我们面临这么一种灾变的观念，并且把他们没有估计在内的一切事情都看成小资产阶级的微不足道的事，这样他们自己就承担上重大的责任了。在英国，关于大革命即将来临的空谈只不过是可笑的，而在德国，局势本来已经紧张，这种空谈干脆就是犯罪。无论如何这是不明智的。

我已经说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政党实际上从来没有由于自己理论上的错误而发生严重的动摇。它避免了这一情况，一半是由于它的领袖具有人的健全理智，一半是由于环境的力量。何况这种错误对于青年时期的党还不是很危险的。但是随着党的力量的增长，责任也加重了，愈来愈必须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因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须对理论进行检验。你们已经在农业问题上看到，这种理论给你们留下了多少不能解开的难题；如果你们企图抛掉仅有的劳工保护法的基础，那你们在工业上也会遇到相似的情况。在合作社问题上不得不求救于一个借口，说这些合作社现在是“资本主义企业”，而当事物的进程愈来愈清楚地揭露出立为正统的理论的严重缺陷时，这个借口只不过表明我们今天在理论上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是的，不是我在攻击理论，是现实本身证明了它的不足之处。不是我的目光阴暗，而是你们的目光模糊。

我这样说，不是狂妄自大，而是证实我们的不同处境。你们处于政治斗争之中，我离得很远，处于政治斗争之外。也许考茨基是对的，他说，如果我在德国，我可能和你们的想法完全一样。但是事实上是否我更正确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可以只是为了给“久经考验”的理论挑选证明而去翻阅统计材料，如果统计象上次那样表明小农减少了一千户，我也可以把这解释为小农的土地占有即将消失的可靠证据。上帝呀！这是完全合乎人之常情的。政党总是很不愿意它们的口号受到威胁的，

而且政党愈是激进，它们在这方面就愈是保守。谁对五十年前就宣布了的伟大的剥夺表示不相信，谁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近《莱比锡人民报》就是这样推论的，只不过说法稍微不同罢了。哪怕只有在党的各个主要机关刊物里呆着的一批能干的文人固执地按这个意思写作，他们也能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一种舆论，也就是某种形式的思想恐怖主义，所有的人都比较自愿地、或者不太自愿地、或者不是自愿地去服从这一情况，或者反正要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我自己就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你信上说党内百分之九十九都反对我，是骗不了我的。反对我的人中大多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是因为他们受到错误的指引，从我的文章里读出了和原来意义大为出入的东西；是因为响亮的空话和迷网般的诡辩使他们晕头转向了。但是这是不会持久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党已经经过很多次变化。它没有一个即将临近的“最终目的”的幻景也成长起来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慎重得多，却也鼓舞了我们。也用不着担心社会民主党会由于放弃某些假设而失去它的正当理由。丢掉的只是一些幻想，会有新的理想代替那些过时的理想去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火。在这一方面，你们的信心比我薄弱得多。我的道路走起来缓慢一些，但是它伸向前方；你们的路引向深渊，你们却看到深渊的彼岸是天国乐土。

我估计，你在写信的结尾的那几句话时，你已经知道那样说只不过是个形式。我不可能改变我的信念。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信念使我不能留在党内，你们就坦率地告诉我，我会作出决定。同时我将不会忘记，你们和我一样，是在忠实地遵循良心上的义务，而且你们中的多数人是对我满怀最友好的情谊的。我只想还求你们做一件事。把目光越过德国的疆界，看一看这些政治上走在前面的国家：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挪威，对，甚至还有法国。那些地方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会象王德威尔得那样公开对你们说，他们不相信崩溃，或者会用他们的行动来表示不相信，

正如你们对私人生活的一些安排表明你们也不相信一样。在德国，由于特有的情况，党所取得的政治上的权力地位同政治上其他方面的发展是矛盾的。因此党处境困难。不断敲击革命的铜鼓肯定不会减轻困难，要减轻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清醒地判断一下，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谈的够了。我请你在党执行委员会里宣读此信或者让别人宣读。我要写一本专门著作来详细阐明我的观点。但是这本著作还得一两个月后才能出版，而我愿意早一点得到你们的宣判。

衷心问候你和所有的朋友们。

你的 爱德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与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258—263页。

爱·伯恩施坦 声 明 (摘录)

(1898年10月20日)

……考茨基和阿德勒在他们发表在《前进报》上的对于我的《夺取政权》一文的答复中，表示希望我把我在《社会主义问题》中阐述过的立场用书籍的形式作一总括的说明，这个意见从前他们已经写信告诉过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拒绝听从这些朋友的劝告，因为我有这样的意见（现在仍旧是这样），这些文章的倾向完全没有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总的发展路线。但是既然他们现在公开地重复这一意见，而且许多别的朋友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因此我决心遵从这些敦促，在一本著作中系统地阐述我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的见解……

阿德勒和另外一些人对于我预期民主制度的发展会使阶级斗争趋于缓和的看法表示不满，他们说，这是因为我纯粹通过英国的眼镜来看事情。但他们的说法完全不合事实。即使假定关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这一原理近来已经失效，并且对大陆同英国的发展之间的一切差别（这我也并不是一点不知道的）充分加以考虑，情况也是一样。我的看法是以大陆上的现象为根据的，人们尽管会在斗争的热潮中暂时忽略这些现象，却不能长久忽视它们。我们在先进的国家中到处可以看到阶级斗争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形式，如果不是这样，前途就很难说是颇有希望了。不言而喻，一般的发展过程并不排除周期性的倒退，但是只要具体设想一下，例如即使在德国，市民大众的愈来愈多的部分今天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于罢工抱什么态度，现在那里处理许多罢工的方式同不过十年或二十年以前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同，已经更为明智，那么的确不能反对在这里可以描绘出一种进步。即使这并不说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①，但是按照我的看法，它给社会主义运动指出的道路毕竟比灾变论所指出的更有希望，而且不致伤害社会主义战士的热情和干劲。这一点阿德勒是一定不会反驳我的。

有过一个时候，我所发表的见解在党内似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如果说它现在遭到了反对，那么我只把它看成对于某些日常现象的一个可以理解的反作用，它将和这些日常现象一同消失，代之而起的将是对于这一点的重新认识；随着民主机构的增加，在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中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级斗争面前也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发表于1898年10月23日《前进报》，译自《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21年柏林—斯图加特德文版第10—11页。

奥·倍倍尔致爱·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22日于柏林(24日发出)

亲爱的爱德：

你的信收到了。谢谢。它长，我不奇怪，它几乎不可能写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编者注

更短，不过这样也足够了。

我立刻就回你的信，因为有一点我应当对你说清楚，而这一点对你来说很重要。

看起来你把我的信当成官方性质的了，你以为我事前给别人看过，以为我是用他们的名义写的。这是不对的。这封信在寄给你之前，没有人看到过，我只是让我妻子抄了一个副本并依次把副本传给了卡尔、保尔^①和李卜克内西。

执行委员会直到现在对我的信还一无所知，因此，我什么时候或者是否把你的信通知执行委员会，你不妨让我决定好了。

卡尔已经说过你应当系统地公开阐述你的观点，你的信促使我也加深了这个念头。我从你给卡尔的那些信和你这次给我的信里看到，不那么做就无法进行辩论，因为辩论的领域不断地全面改变，人们会越扯越远，离题万里。不过我想给你这本著作出一个好主意。在你动笔时，你要当成是你现在才初次发表你的想法那样去写，不要采用对于目前已经讲过的或写出的东西进行论战的口气。其次，要写得清楚而明确。这就是说，如果你为了证明你的观点要在反对的人当中举出一个来做例子，那么你就要说得很清楚，不要使人弄不明白你指的是谁。比方说，你在上封信里说，你上次发表在《前进报》上那篇文章攻击的不是德国党，而是针对累德堡的。但是这里没有人是这样理解的，同时从阿德勒的回答来看，他在维也纳也同样觉得文章是针对党的。

你的论战文章有这种模糊或者说暧昧的毛病已经好几年了。我曾经向卡尔指出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些地方是针对我或者某一个其他的人的观点的，而卡尔说他不认为是这样，他说这些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针对这个人的，但在别的情况下又是针对那个人的了。

^① 指保尔·辛格尔。当时他和倍倍尔共同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编者注

这样的话，怎么能把问题说清楚呢？如果你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和帕尔乌斯笔战，那我将——我有绝对的把握——不参与。如果你反对的是累德堡或者另外某个人或某一群人，我也同样不参与，我不把自己算在那些人里头。

这种含混不清和暧昧不明还必然造成另一个后果：你所指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在泛指，是指的整体。这对于你和我们都是有害的。由于今后特别重要的是，在迄今为止作为我们党的基础的东西中，你反对的是什么，所以我劝你也在这里明确地讲出来。

由于暧昧不清，对手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并没有讲过的东西，如果你纠正它，便造成恶劣的影响并引起不必要的刺激。

即使是卡尔这样一个懂得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的、“头脑还算敏锐的人”，你和他也还在信上不断进行过那样的笔战。

我承认，误解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必须注意用明确的和正面的表达方法去尽可能地消除误解。

还有一点要首先向你讲清楚，我们并不是死死地拘泥于《共产党宣言》的一字一句的党，没有人拘泥于它，而在策略问题上和采用的方式上，从帕尔乌斯到奥艾尔，看法是千差万别的。

不过主要的是我目前确信你已经完全不再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了。我并不只是从你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而是更进一步从你的私人通信和谈话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过去我们对于你所说的都能很好地理解，今天突然统统理解错了。到目前为止，同你论战的每一个人都误解了你，只不过这个人误解得多一些，另一个人少一些。这样说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对你上次信中的说法，还有许多地方是我可以反驳的，我不说了，免得彼此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只简单地说明一点。你不同意我对你脱毛的看法，我固然承认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比旁人对他的判断更为中肯，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对在年鉴上发表那篇文章并没有作任何保留，

你就应该对全篇文章负责。

这里用得上这句话：同流合污，同归于尽。要说你并不同意那篇文章（不是指其中的每一句话，而是指它的全篇和它的倾向），这也是不可想象的，除非说这是出于你的软弱。要对这件事作出评判，关键在于你是否同意它的全篇和它的倾向。你可以为自己辩护，要求得到酌情减免，但是把责任全部推掉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你对这件事很快就有了一种看法，而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却从来没有这种看法，这是由于你在和同志们交往时了解到对你们的责难，你迅速地对你的错误有所察觉。1880年夏天，你打发赫希柏格去伦敦，你以为他和两位老人之间可以取得谅解，这件事表现出你对双方的立场的认识有多么错误。

实在是够了，要不我们又没完没了了。

坐下来，写吧！我们把剑（应当说笔）收入剑鞘，以后再交锋吧。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奥·倍倍尔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与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263—265页。

卡·考茨基致爱·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23日于弗里德里希

亲爱的爱德：

你上次的来信使我非常忧郁，不过这是我能够预料到的，我也不得不这样预料。

首先我必须再一次请你不要认为我有成见。没有个人成

见，这是很明显的。除了李卜克内西，我根本不知道这里有谁对你抱有个人成见。但是你也不应该说有公务方面的成见。要说有，是打哪儿来的呢？你说到累德堡和施塔特哈根。我讨厌累德堡，从不和他来往。我和施塔特哈根还没有进行一次政治性的谈话，因为我觉得他的政治见解既呆板又无趣。梅林吗？我和他来往多一些，但对他绝非毫无怀疑，我一贯对他保持警惕。和我交往最多并且相处最亲密的人是阿道夫·布劳恩^①。难道是他给我灌输了对你的公务方面的成见吗？不，请相信我，就算我是一个会听信别人的话而对你产生反感的人，我在这儿的环境也不会使我这样。

难道说为了说明我为什么起来反对你，就必须相信是出于成见吗？你对我的行动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例如，党代表大会即将开幕前我的沉默。你问我是否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没有兴趣，但是各方面都劝我去。直到开会前两天，当我看到了由席佩耳起草的决议时，我才决定去。我是作为自由贸易派去和这个决议斗争的。

然而后来发生了对《新时代》的攻击，同时你的声明寄到了，我就不得不讲话了，沉默便是怯懦。我不认为我讲话对你不利。要是我不曾对奥古斯特说我准备回答你的声明，他自己就会回答的。他的回答会是什么样子，你从他的激烈而直率的性格可以想象得到。

接着是我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我写它，是出于布劳恩的请求，他要我自己立即回答，以免又给卢森堡等人造成进攻的机会。他的估计很准。他们觉得发表了我的回答就够了。布劳恩自己却对我说，回答所采取的温和而谅解的调子使他感到吃惊。

从哪里你看出有成见呢？

^① 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 1862—1929）——奥国社会民主党员，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任《前进报》编辑。——编者注

要不就是，只要我和你处于对立状态，你便觉得是有成见吧？但是难道在这一方面也需要用成见才能解释吗？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我不否认，我在一些问题上观点有改变，而且你对党的批评，我大半是衷心同意的，但是这只限于批评党不站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它的论据往往带有空想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痕迹，这种批评是为了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它的先驱者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战胜马克思主义。

说实在的，就你目前的态度讲，用“战胜马克思主义”一语还嫌太轻。它在你那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是它向更高的形式继续发展，而是你向批评它的人投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搞调和，这我是不能帮忙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坚决斗争。

你的文章、你的信以及今春我们之间的交谈已经使我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不能和反正事情已经如此的思想妥协，我曾经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了多久）我们有重新互相理解的可能，并且我希望换换你的环境会促进这一点。促使你转向新的立场的新事实、新理论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对我们讲的一切，难道不是早在那时候，即当你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的吗？有什么改变了呢？只不过是你的环境。你近几年来英国化了。不是什么新事实和新理论产生了你的新立场，它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因此我对自己解释说，你完全没有感觉到你已经和我们严重对立，于是你对于你的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们起来反对你感到难以忍受的失望和震惊。

但是不管怎样，也不管你立论有什么根据——我们还将公开讨论这一点，这在一封信里是解决不了的——事实是我们之

间出现了一条裂缝，你最近来的信使这条裂缝显得比我个人估计的还要深。隐瞒这一点以及反对从这种状态得出应有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尽管非常痛心，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我们公务上的合作完结了，从公务性冲突中拯救我们私人友谊的唯一可能性在于结束已经使我们俩都十分苦恼的现状。我们在这方面不可沉溺于幻想。

我对《新时代》的任务的看法，你是了解的。我编辑它一天，它就一天是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不是《社会主义月刊》或者《社会主义评论》之类的折中主义的机关报。我对世界观统一性的向往和我对任何一种折中主义的反感都太大太深，以致我不可能用别 的思想去编辑《新时代》。而且我认为《新时代》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我自认是一个蹩脚的编辑，但是却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去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那我就是去掉它的特征。你把《新时代》比作一家教会刊物，那好吧，要是你把每一家战斗的机关刊物都叫作教会刊物，那我不反对这个名称。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会因此吃亏。所有一切敌对的刊物都把版面提供给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该是绰绰有余了。这些刊物一开始刊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就宣布我的失败。只要还不是这种情况，只要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一切敌对科学及其数不清的机关刊物的斗争中开辟道路的学说，我就要坚持《新时代》的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机关报性质。

难道科学概念不也包含着自我批评吗？这是肯定的，我们也必须实行自我批评，但是这种自我批评是有自己的立场的。我看，《新时代》一贯是给自我批评提供足够的版面的，我自己认为我在这方面和你一样活跃，象你一样曾经枪毙了许多口号（阿德勒有一回这么形容过）。可是你这一段时候所进行的已不再是反对口号的斗争，而是反对我们的基本原则的斗争了。当然在你看来基本原则也只不过比口号略胜一筹，但是这一点

只不过证明你离开我们已经多么远了。

《新时代》可以不妨偶尔批评一下它的基本原则。但是不要忘记你在《新时代》的特殊地位：你并非偶尔投投稿的人，你是固定撰稿人；你不象梅林那样是写政治文章的人，你首先是个写理论文章的人。你是给《新时代》定调子的，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当有的时候提供篇幅让你进行批评，而是你的调子是否应该是《新时代》的调子。

这个问题从春天以来就叫我苦恼，它使我拟了各种各样的计划，而现在它也开始使你把撰稿当成受苦受难。我徒然地寻找使对朋友的义务和对信念的责任调和起来的出路，我曾经准备为你牺牲《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为此也要牺牲我的主编职务，为别的人我是不会的。可是这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过去在苏黎世还可能为了你的利益或是为某个中立者的利益放弃编辑职务，今天恐怕不可能了。

我们在理论方面一贯的合作是不再可能存在了，它反倒成了经常冲突的根源。我认为，除了结束合作，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说出这话来并不是容易的。我已经和自己斗争了半年之久，而且我试过了所有别的出路，想找一个和谐相处的方式，但是白费劲，而且这样下去没有意思，长疼不如短疼。

还是先谈最要紧的问题吧。你在受到攻击时经常可以随意使用《新时代》的篇幅来保卫和阐述你的观点，是的，在这方面它是责无旁贷的机关报，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你退出《新时代》，而是要停止你给它的固定撰稿。

你关于布朗基主义等等的文章，如果你希望立即发表，我当然照办，不加任何附注。我只有一个考虑，即你的小册子。我想，你不是在小册子里阐述你的观点，就是在单篇的文章里阐述你的观点。两处都写是没有意义的。你发表《布朗基主义》，就给一场论战提供了基础，而这场论战会把与此有关的一切问题都提出来。那时再出小册子，或者会太晚，或者会迫使人们重新

进行论战，那可确实是过分多余的了。

顶要紧的是请你立即告诉我，我是否应当发表《布朗基主义》。我之所以必须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你放弃发表，而是集中力量写小册子，那么我在小册子出版以前，也不发表一切攻击你的文章；可是如果你现在就用《布朗基主义》来参加论战，我就做不到了。这就是说，或者在小册子出版之前休战，或者发表《布朗基主义》，从而也就是在小册子出版之前展开争论。你必须作出决定。请你立即作出这个决定，因为如果要发表《布朗基主义》，就应该尽快发表。^①

争论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我希望我们的友谊经得起这场争论的火的考验，不过论战终究常常是一件危险的事，何况我在斯图加特的讲话和我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本来实在是非常缓和、非常客观和非常友好的，而你却生气了，这是不吉之兆。但是我们将不再做超出必要限度的使彼此伤心的事。

可是然后怎么办呢？

春天你曾想谋求一个资产阶级的位置，这肯定是由于你正确地判断出，就你的观点来说，你不会长久保持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名代表的地位。

这个过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过商人生活的念头，你大概已经丢掉了。不行，你必须继续执笔，不要只考虑金钱问题。每一个人应当做他最擅长的工作，一个象你这样水平的作家想搁笔是一种罪过。

从另一方面说，你要是为了面包不得已而去为敌人工作，对方肯定会高兴地接纳你，但这对于我们和你都同样是既难受又

① 伯恩施坦在1898年10月27日写信给考茨基，信的结尾说：“请把《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文退还给我……”。后来此文也没有在《新时代》上发表。伯恩施坦将其中一部分收入《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第2章《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一节中。该文全篇加上一些补充以意大利文发表于由萨韦里奥·梅尔利诺创办的《社会主义评论》第1卷（1899年）第4、5期。——编者注

丢脸的事。我们不愿意出现这种万一的情况。

党代表大会后，我和狄茨以及他的两个伙伴商谈过一次，我提到根据现状看来，我们应当估计到和你发生冲突以及你退出《新时代》的可能性。于是我说，有必要弄清楚，除了《新时代》，党有哪一个写作方面的位置可以给你。

其他人反对，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反对我认为党有责任保证你的文字^①生涯的看法，他们只是认为，既然你还没有明确表示立场，我们为方式问题而伤脑筋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我认为你和《前进报》的关系不必作什么变动：你在那里只写关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文章，只写书评，不作批评。除此之外，我希望你在最近时期把你的写作活动放在写书方面。写一本书比在一本杂志上写文章自由得多，一家出版社比一个编辑部自由得多。即使我已不能再把你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合适的先锋战士，我却也不至于如此心胸褊狭，竟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存在别的珍贵的科学研究成果。我深信狄茨会乐意出版你的著作，他将象曾经帮助我付排第四卷^②那样高兴地帮助你，而且你的著作在他的出版社将会象罗杰斯和维伯的著作一样受到重视。

我认为你应当埋头写书还有一个原因。你说你确信我们将很快追随你。我的看法不同，但是唯一能使你的观点受到重视的办法就是详细论证它。不过你可不要以为我们会因为你的几篇文章，就放弃我们三十多年来在和最危险的敌人斗争中胜利地保卫过的东西。你的小册子也起不到这种作用，它固然可以说清问题，消除误解，但是你自己不要指望一本小册子就会使我

① 奥古斯特现在说，“文字”一词是误解。——考茨基注

② 指考茨基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编者注

们放弃我们至今坚持的原则。

仔细推敲你的观点，详细阐明你的观点，这对你没有害处，对我们也没有害处。不管结果如何，它对双方都有好处。

此外还有一点是必要的。当你决定不到苏黎世去而仍然留在伦敦，这就意味着一切照旧，我对路易莎说过：我担心我们要永远失去爱德，他和苏黎世分手就是和我们分手。

你已经决定当个英国人：那就得出结论并且变成英国人吧。你和英国报刊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和德国报刊的关系。你在英国为资产阶级报刊工作不必丢掉什么。直到今天我还在惋惜，劝你迁居维也纳和为英国报刊写通讯的建议没有得到你的同意。现在你留在英国，我觉得加倍重要的是你要在英国新闻界取得一席之地。

关于这方面，你不要有错觉，以为你已经完全失掉了和德国的接触，并且就象你信中所说的那样愈来愈失去接触。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如果你留在英国，那么你想要继续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分对英国人和德国人讲话，就是找错了地方。你选择的发展方向导致你即使不是脱离社会主义，也是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在去年一年中你已经令人吃惊地、飞速地朝这个方向前进了。试试吧，在英国运动中获得一席之地，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一个代表，以这样的身分来对国际社会民主党讲话。

我知道这是困难的，在你这样的年纪不得不完成这种转变是痛苦的，但是这比你和你党内同志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痛苦要轻些；你把你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一种信念，由于捍卫这种信念你获得了历史声望，你却在这样的年纪改变信念了，同这比起来，上面所说的那种转变并不更加新奇。

但是你如果有更好的建议，我会乐意赞同。我早就在盼望这一点了。半年前我看出不可能维持现状，半年前我就为寻找一个和谐相处的新方式而绞尽脑汁。但是白费力气，我的提议遭到拒绝，而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建议。我恰恰是最希望由你提

出建议，可是直到如今，你的回答只不过是抱怨，抱怨我对你虐待，抱怨我有成见等等。

不要以为我对你的处境的痛苦和难堪无动于衷。我为此够伤心了。不要从个人而要从事件去找寻冲突的根源。我们不能跟你走你所选择的道路。如果你再这样走下去，你就只能一个人走。我们的友谊依然如故，即使你在我们还会遇到的论战中对我大发雷霆，我仍旧要坚决维护我们的友谊，而我也不会失去你的友谊。即使对我的不满会暂时给友谊笼罩上乌云，但是只要一切恢复正常，你就会重新找到它。

但是我们的共同战斗是完结了。我不能跟着你，我的信念和你的同样深，同样坚定。

再见吧，亲爱的老家伙。这是一封我不能不写给你的悲伤的信，在我们已经把一切讲明白之后，在我们不可能继续自己骗自己之后，再来玩捉迷藏是没有意思的，也是对我们友谊的侮辱。我们一如往日深情地拥抱你们。

你的 男爵

又及：我刚才在奥古斯特那里。他完全同意我的信，包括我劝你埋头著书的建议。不过他觉得这还是一种零敲碎打地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换个样子进行目前的冲突，也是延长冲突。要是狄茨和你就这一点达成协议，他不会阻拦。他也坚持党有责任不使你陷入窘境。但是他宁愿用另一种方式。会向你提出一个建议。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与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272—278页。

爱·伯恩施坦 私人声明

(1898年11月)

我已在《前进报》上声明，我决定写一部书，概括阐述我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的观点，并用以回答最近一个时期对我的各种攻击。

我认为，在这本书写完并出版之前，我不宜继续在党的定期刊物上就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争论。因此，我暂不发表我的几篇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章，包括一篇论述《布朗基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文章，一篇关于劳动价值的规定性的论文，还有一篇反批评，是驳斥卢森堡小姐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对我的文章的批评的。这些文章有一部分已经寄给《新时代》，另一部分也是为《新时代》写的，已经写完。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在这里答复格·普列汉诺夫的《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当时我曾认为，等到普列汉诺夫宣布要写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后才来回答是适当的。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但是我现在不能对普列汉诺夫例外，我不得不把揭露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错误结论和矛盾这个尽管不愉快、却是轻松的工作留给康拉德·施米特去做。此外，我只好暂时请求那些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人，在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之后再去仔细看一遍我的受到反驳的文章^①（《新时代》第16年卷第2册第225页及以下各页）。那么，即使没有我的任何解释他们也能够对以下的问题作出解答：对于该文所讲的东西，普列汉诺夫到底驳倒了什么。

在我的著作发表之前，我为《新时代》撰稿的活动将只限

^① 《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中译文参见《伯恩施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54—69页。——编者注

于写些书评和论述那些不会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原则性论战的问题。

爱德华·伯恩斯坦

1898年10月26日于伦敦

发表于1898年11月。译自《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第1册第7期第219—220页。

格·普列汉诺夫 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

——给卡尔·考茨基的公开信

(1898年10—11月)

敬爱的同志：

请允许我首先向您表示自己的感谢，因为听了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几次发言，是很愉快的。这些发言，由于党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向您表示热烈拥护，是有很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如果说，从前德国党的某些党员如伯恩施坦、康拉德·施米特、海涅诸先生的言论能够使我们的敌人怀着希望，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准备放弃阶级斗争的革命立场而落入机会主义的泥坑，那么现在这种希望是云消雾散了。现在不可能有任何的怀疑。现在任何人都相信，伯恩施坦、康拉德·施米特和海涅诸先生所表示的绝不是党的观点，而且相信辛格尔同志完全有权在自己的闭幕词中说：我们现在是同过去一样，而且将来还会是这样的。不错，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是我们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忠实旗手！

可惜，在您的一次发言中，有一些地方能相当减弱它所引起的深刻的和愉快的印象，而且将来还会引起很大的误会。我这里所指的是您反对伯恩施坦的发言，因为其中可争论之点无疑地不仅使我而且使其他许多人感到震惊，所以我想不在和您的私人谈话中，而在给您的公开信中加以讨论。

您在您的发言中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①

^①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这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对。确实,伯恩施坦一点也没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勇气。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说到他促使我们深思熟虑,这是可能的吗?我以为很难这样说。

为了启发人去思考,必须举出新的事实,或者就已知的事实作新的发挥。伯恩施坦两样都没有做到,所以他不能启发任何人去思考。

或者,我对于伯恩施坦的著作的评价是错误的吧?好吧,让我们来考察一下。

不消说,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只是他的那些引起某些同志一定的责难的著作。最近几年他所写的著作就属于这一类。关于他从前的著作,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必谈这一点。

总之,伯恩施坦最近几年来一般是在进行反对他所说的革命空谈的斗争,特别是在进行反对“灾变论”的斗争。他反对这一理论的中心论据,就在于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发表的许多见解无疑地没有为后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证实。他说:“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象《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想掩饰这一点,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愚不可及。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减少,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①如果我们把伯恩施坦的这些议论跟他所说的某些工业部门资本集中进行得很慢,而今后商业危机不会象从前那样尖锐和普遍这种意见合起来看,那么就可以完全有权利说,他反对“灾变论”的全部论据不过尔尔。而现在,敬爱的同志,您注意地看一下这种论据您自己就会相信:这里面没有

^① 见本书第39页。——编者注

一点东西，绝对没有一点东西不是资产阶级阵营中我们的论敌们已对我们说过多少次的。那时候您也就必然会承认，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感谢伯恩斯坦。

无疑地，您是知道舒尔采-格弗尼茨先生的著作的。请拿他所著的《论社会和平》一书从第2卷第487页起读一读。舒尔采-格弗尼茨先生想在那里驳斥“灾变论”。他把这一理论表述成这样：“大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工人日益没落为未分化的无产阶级队伍，财富积聚于少数人之手，中等阶层消灭，社会革命党出现。”依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事实是和这一理论不符合的：

“商业部的详细统计表明，英国的现象是恰恰相反的；因而社会革命派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一方面，工人的经济状况最近五十年来有了不断的改善，另一方面，“那种认为财产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里的流行的观念”，原是错误的。最后，股份公司的广布，吸引越来越多的小积蓄所有者分沾大工业企业的利润。这一切情形加在一起，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就为和平解决社会问题开辟了道路。

他在自己的另外一部著作《大生产——经济和社会的一项进步》中，也发挥过诸如此类的见解。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说法，是远不正确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在英国已有统计证明。当工业的雇主们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上争到首要地位时，在他们后面有新的中等阶级开始兴起，它们先在经济上后来又在政治上巩固起来。”（第225页）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议论和结论都是谈的英国。他承认，别国家的情形要不同一些，例如在德国，“中等阶级还在大大减少”。但是他只以德国的落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并借此表明，他认为自己关于英国是说得正确的那种情形，将来在德国也将得到自己的全部意义。

这里不预备指出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议论和结论是何等地片面和偏颇。敬爱的同志，关于这点，您当然比我清楚得多。果

森就是一个想证明现在的英国正处于新中等阶级形成时期的研究工作者。他在1887年12月在伦敦统计家协会宣读的讲稿中指出：“说‘数字能证明一切’的侮辱统计家的说法，只能表明从来不说假话的数字可以被用作说假话的佐证。数字本身从不说谎，但是谁都必须承认，无论什么精确可靠的材料都不及统计材料那样容易用来适合于一个引用者的特殊的目的。”当我一翻阅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上述著作时，每次我都记起果森的这几句话。但是我现在不想详论这一著作。我在此只想对您指出，伯恩斯坦只是重复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他以前几年所说的话。

但是连舒尔采-格弗尼茨也绝对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还在他以前，就有几个英国的统计学家关于这一问题有所发挥，例如，上述的果森；同样，还有几个法国经济学家，例如，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在他的1881年巴黎出版的《论财富的分配及社会不平等的趋于缓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引的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著作不过是保尔·勒卢阿-博利约曾特别加以详细研究的旧题之新说法。这样伯恩斯坦所反复咀嚼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为什么我们应该只感谢他而不感谢那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呢？为什么我们必须断定，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是他，伯恩斯坦，启发了我们去思考呢？不是这样的，最可敬爱的同志。假使真要说到我们应当感谢某人，那么我们应当公道些，不应当感谢错了人。一般地说，我们应当感谢一切“经济协调论”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们，首先，当然是感谢不朽的巴师夏。

伯恩斯坦不止一次惋惜地说：“认真打算科学地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而当他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问题》中对于“早已被证明了的社会主义党的理论与要求作挑剔的批评”时，他得意地说：“任何一种理论工作都是对于以前为人承认的原理的‘挑剔的’批评”，而“假使《新时代》想成为社会主义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它就不能逃避这一‘挑剔的’批评”。他接着说：“而且哪一个错误不是从前某一个时候的‘早被证明了的

真理’呢？”而他的“理论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小市民的想法，如强调“经济上自我负责原则”的重要性，以及后来……坚决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们的理论观点的转变。伯恩施坦把最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理”端来给我们，而且还自以为是在把马克思的理论从伟大思想家所业已达到的地方向前“发展”。这是多么奇怪的妄想！关于伯恩施坦，我们可以重复一下浮士德关于瓦格纳所说的话：

贪婪的两手向着宝藏深挖，
挖着一条蚯蚓也快活无量。①

在斯图加特的党代表大会闭幕时，格雷利希同志曾替伯恩施坦说了这样几句辩护的话：“我深信，我们的事业只能从批评得到益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自己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接受了伟大的遗产。但是即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最后的真理，而只有永久需要重新向事实看齐的科学。”这是最正确不过的话。但是难道格雷利希同志真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折中地混合起来就能得益吗？难道他能把对这些学说的完全无批判的咀嚼称为批评吗？而在伯恩施坦的文字中除了这一无批判的咀嚼以外，我们实在找不到别的东西。只是由于这一无批判的咀嚼的结果，他才把自己的蚯蚓端给我们。

我顺带指出，伯恩施坦不是唯一错误地对我们的敌人的学说采取这样的无批判的态度的人，不过这一态度以伯恩施坦表现得特别鲜明罢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些博学的同志也一时兴高彩烈地出来证明，甚至对于马克思，他们也可以采取“批判的”态度。于是，他们抓住资产阶级的敌人对马克思的理论所作的一些歪曲，后来并借助于从这些敌人那里抄袭来的论据，得意地

① 歌德《浮士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部第31—32页。——编者注

进行自己的“批评”。

最敬爱的同志，您当然理解，社会主义理论从这样一种“批评”里绝不会得到什么益处，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那些“批评家”先生们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圈子内所得到的同情。

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最后的永恒的真理。这是对的。但是它是我们时代最高的社会真理，我们既没有理由把这一理论变为新出现的巴师夏和萨伊的“经济协调论”，也不应该把带着这种倾向的批评恭维成严肃的批评而予以称许。

最敬爱的同志，请原谅我离开了本题。我现在回到伯恩施坦，谈谈现已成为著名插曲的“最终目的”。

二

伯恩施坦在宣布了自己对于最终目的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感觉到自己必须做一番说明和辩解。但是这些说明和辩解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读了这些说明和辩解的文章以后，我就越发相信那一久经考验而且应当为任何一个作家所认真遵守的规则，那就是要先把自已的论文修改好，然后再交去付印，因为在论文印出以后再来进行纠正就于事无补了。同时我又自问，到底是什么动机使得伯恩施坦写这一篇没有任何逻辑意思的文章，或者如俗话所说既没有道理也没有调子的文章呢。开头我以为他是在把一句名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莱辛说的）依照自己的意思，照伯恩施坦的方式，来加以翻新。这句话是：“如果造物主在一个手中握住全部的真理，在另一个手中握住追求真理的意向，要我选择，我就宁愿要那追求真理的意向而不要现成的真理。”但是后来我偶尔翻阅了一下《论社会和平》一书，就看出这句臭名昭著的话原来别有出处。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旧英国的经济学是仇视劳动立法的，而它之所以仇视后者是因为后者会限制成年人的个人自

由。然而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工厂立法的必然结果，工厂立法又是随着工人阶级政治影响的增长而进步的。这些条件在英国就为接受和传布大陆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了园地，然而这个理论却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据说“工人阶级处于绝望境地的说法”已被抛弃了。舒尔采-格弗尼茨继续写道：“社会主义由此就丧失了自己的尖锐性，只被用作论证立法要求的根据。因此，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作为最终目的是被接受或被否决，实质上是无关重要的，因为这一要求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说来固然是必需的，但对于那些把近目标放在较远目标之前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说来就不是必需的了。”（《论社会和平》第2卷第98页）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是英国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精神”的社会主义，却很赞成国家对于个人的经济活动大加干涉，而且是“第一个主张在一定场合对于成年男子有加以保护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家”（《论社会和平》第2卷第99页）。我断言，现在，爱德华·伯恩斯坦也是这一牌号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者。舒尔采-格弗尼茨向我们叙述约·斯·穆勒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而且是根据他的自传中的材料。在我们一方面，也同样能精确认识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发展过程，我们所根据的是他自己所作的说明，而且是把这些说明跟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面所说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最终目的意义不大的议论联系起来的。

伯恩斯坦在吸收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和其他协调论者认为英国社会生活发展的过程仿佛驳斥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的见解之后，就醉心于舒尔采-格弗尼茨所描写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从这种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最终目的即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确实几乎是无所谓，假如不是完全的空想的话。于是，伯恩斯坦在深深感染了这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以后，就

急忙大声宣布自己对最终目的的新态度，而且上面所引的舒尔采-格弗尼茨关于最终目的的话不仅决定了他的思想方向，而且也决定了他的表达方式。这样，事情就变得完全明白，而初看起来荒谬之极的名言就有了极明确的含义。固然，伯恩施坦本人也为这一含义吓住了。他的说明和辩解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信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作出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①但是该信后面的内容就和这句话发生最明显的矛盾，即使伯恩施坦没有看出或不愿看出这一点，可是不论我们的事业的朋友或它的敌人却都是明白这一矛盾的。您在斯图加特的发言中也充分强调了这一点，您说：“他（伯恩施坦）对我们解释说，有产者的人数、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们是依靠错误的根据来形成我们的观点的。的确，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不仅我们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②

李卜克内西同志的发言也是同样的精神：“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③

从另一方面说，在伯恩施坦的论文《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的斗争》刊出以后不久，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写道：“对于他的议论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能算高的。这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当头一棒，是对它的公开宣战。”（《政治经济学中的幻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社会科学》杂志 1898 年第 4 期第 251 页）

我绝对不想否定伯恩施坦有棒吓他从前曾宣传过其思想的那个党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不应该

① 见本书第 39 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46 页。——编者注

③ 参见本书第 51 页。——编者注

力求说服我们，说他的见解的改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应当知道和理解，他的新见解必然会导向舒尔采-格弗尼茨及其伙伴所鼓吹的“社会和平”。总之，伯恩施坦有和社会民主党战斗的权利，但是他在战斗时应当抛弃假面具。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不值得我们感谢而值得我们重重地斥责。在文艺复兴时期或甚至更早些，有些学者曾极力想证明某些古代的哲学家是基督徒。不消说，他们实际上并未能证明他们所要证明的东西，而只是证明了他们完全没有意思证明的东西，就是说，他们自己抛弃了基督教的观点而成了异教徒。对于我们的一些替伯恩施坦辩护的“学者”，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没有能证明伯恩施坦继续忠于社会主义（“恩格斯和马克思精神的社会主义”），而是证明了他们自己受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家”的见解的感染。国际社会民主党应当当心这样的“学者”，否则它就会大受其害。

三

伯恩施坦事件对于一切愿意想一想这个问题的人都是大有教益的，——而且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愿意同您，最敬爱的同志，一起说，伯恩施坦值得我们感谢。他由社会民主党变为“社会政策家”的历史，永久应当唤起我们的党的一切深思熟虑的人的注意。李卜克内西同志曾以英国条件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转变。他说：“只有象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才可以住在英国写自己的《资本论》。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发展却使得伯恩施坦起崇敬佩服之感。”^①但是，难道真的必须象马克思那样的人才可以住在英国而不受英国资产阶级的影响吗？我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可以找到不少的同志虽然住在英国，却还是继续忠于社会

^① 参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神的社会主义”）。不是的，原因不在于伯恩斯坦住在英国，而在于他没有很好地懂得必须“科学地研究”的那一科学社会主义。我知道，许多人会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事实正是这样的。

我发表在《新时代》上面的论文《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曾经指出这人的哲学知识如何少得可惊，他关于唯物主义的認識，一般地说，是如何错误。在我现在正为《新时代》写的论文^①中，我要指出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是如何欠缺。现在我请您注意，他关于他所“批判地”反对的灾变论的理解也是少得惊人的。

他曾经这样向我们叙述“目前在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的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想法”：

“按照这种看法，迟早将有一场来势猛烈、规模巨大的营业危机通过它所造成的贫困激起人们猛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感情，促使人民群众深信在这种制度统治下不可能为了公共福利来管理现存的生产力，因而针对着这个制度的运动就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它的压力之下，这种制度本身将不可收拾地崩溃。换句话说，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作为当时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而掌握政治统治，在这个阶级统治之下将按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全面改造。”^②

最敬爱的同志，您是不是这样地认识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迟早一定要到来的社会“灾变”呢？难道您也以为，这样的“灾变”只能是巨大而普遍的经济危机之结果吗？我以为不会是这样的。我以为，在您看来，无产阶级的未来胜利未必要跟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您从来不是这样公式主义地

^① 指《Cant反对康德》。中译文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419—452页。——编者注

^② 《伯恩斯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36页。——编者注

看问题的。而且，就我的记忆所及，也没有一个别的人是这样地理解问题的。固然在1848年的革命以前曾经有过1847年的危机。但是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危机就不可能有“灾变”。

的确，在工业十分繁荣的时候，很难指望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但是谁能向我们保证工业的繁荣将来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呢？伯恩斯坦以为，鉴于现代国际交通的便利，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就变得不可能了。假定真是如此，假定商业中的停滞真象法国经济学家巴特比在1865年所说的只是局部的（“l'engagement des produits ne sera que partiel”）。但是谁也不否认我们刚经历不久的那一可怕的工业萧条有再度出现的可能。难道这些萧条不是最明显而可惊地证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已超出了它的生产关系吗？难道工人阶级真地那样难于理解这一现象的意义吗？说工业萧条时期在引起失业、贫困和痛苦以后，将促进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这是美国很明显地对我们表明的。

伯恩斯坦不考虑这些看法。他把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只寄托在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上。他认为这样的危机将来很难发生，所以他以为整个的“灾变论”已被推翻了。他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死板公式，接着又证明这些公式确是完全死板的。而以后他就因这些易得的胜利而狂喜。这从他教训“教条主义者”所用的那种腔调就可以看出来。

最敬爱的同志，您当然记得，有许多同志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责备帕尔乌斯和伯恩斯坦争论时的那种腔调。我也认为，如果帕尔乌斯在争论时的腔调不同一些，伯恩斯坦或不致有不吭一声的借口。那时候全世界就会清楚地看出伯恩斯坦的思想的可惊的贫乏。所以我对于帕尔乌斯之不能自制是很惋惜的。但同时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慨。依我的浅见，他的愤慨完全为环境所激成。此外，责备帕尔乌斯的人却没有一个注意到伯恩施

坦自己的不愉快的腔调。这是一种自信、自满的学究气十足的腔调。当我读到伯恩施坦对于“德国的以及一部分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教条主义者”的教训时，我就对自己说，假使不把桑乔·潘萨^①任命为省长而任命为社会科学的教授，假使他的天赋的健全理智突被蒙蔽，那么他的发言恐怕正是伯恩施坦的那种腔调。我知道：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胃口往往是不同的），但是我以为，许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腔调比热烈而带情感的腔调讨厌得多。

最敬爱的同志，您自己也承认，伯恩施坦的连载论文的标题《社会主义问题》令人喜欢，而内容却是可惊的贫乏。然而您还说，这些内容贫乏的论文启发我们思考。您预先就对伯恩施坦怀有好感，所以您是很不对的。

您在斯图加特说：“有人责备伯恩施坦，说他的文章削弱了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束缚了无产阶级的手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如果伯恩施坦的文章当真使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上发生动摇，那么这只是证明，不值得为这些人感到可惜，他们的信念不很牢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背弃我们。如果他们现在就背弃我们，而不是在一场灾变（那时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中背弃我们，那我们是可以感到高兴的。”^②

伯恩施坦的文章能使哪些人丧失信心呢？显然，只是那些赞成（即使是暂时的）伯恩施坦的新观点的人。只要接受这一观点，就必然会使任何一个具有逻辑思想的人与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完全决裂。但是这样的思想转变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能不产生恶果；这一转变必然地，即使只是临时地，要减弱他的力量；而且，那些拥护伯恩施坦观点的人的力量和相信社会民主

①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珂德》中的主人公吉珂德先生的仆人。
——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49页。——编者注

党胜利的人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于斗争的理解必然和我们不同，因此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念也与我们大有区别。所以必须说，我们的党的力量的削弱是和拥护伯恩斯坦的人的增加（虽说是暂时地）成正比例的。和您一样，我也认为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理由特别重视这些人的效忠，我们的党毋宁说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们在党受到严重考验的时辰到来之前离开党的队伍。依我看来，您对这些人的严厉斥责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似乎觉得您不彻底，因为如果您是彻底的话，就一定会更严厉地斥责那一直影响这些人的人，即伯恩斯坦本人。

我绝不想干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务，不想决定您在《新时代》上登载伯恩斯坦的文章是否应该。在我自己的心里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最敬爱的同志，您自己也知道，在斯图加特所争论的问题是对于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有巨大意义的问题。只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写这一封信给您。您说，和伯恩斯坦的论争，实在说，只是现在才开始。我不完全同意这句话，因为伯恩斯坦所提出的问题在帕尔乌斯的论文刊登以后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解决了。这是帕尔乌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所立的一个大功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在和伯恩斯坦重新开始论争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我所引用过的李卜克内西的话，如果伯恩斯坦是对的，我们就只有把我们的纲领和自己的整个过去都埋葬掉。我们必须坚持这点并向我们的读者们公开解释，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斯坦？我个人是不怀疑而且从没有怀疑过这一争论的结局的。但是，最敬爱的同志，在我的信的结尾，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您提出一个问题：难道我们真应该感谢这样一个给了社会民主党理论以沉重打击并力图（不管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埋葬这一理论以博得勾结在一起的“反动的一帮”的欢心的人吗？不能，不能，一千个不能。这样的人是

不值得我们感谢的。

您的忠实的 格·普列汉诺夫

选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405—418页。

卡·考茨基 私人声明

(1898年11月)

我这个声明要说明,我暂时不答复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萨克森工人报》上给我的公开信。这并不是因为我低估这封信的意见。我很清楚,他的论述对我们几年来研究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要答复他,就得和伯恩施坦进行讨论,而我目前不能这样做。我本人曾首先劝伯恩施坦写一本小册子来详细阐述他的观点,并在这本小册子问世之前避免一切论战;伯恩施坦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在他的小册子发表之前,我最不应该参与讨论他的观点,或者哪怕只是讨论他的思想中的比较重要的或不很重要的独特之点。

既然我一定不能参加讨论,我就只好向普列汉诺夫作如下的说明。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的基本著作、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写作时还只是潜在的。由于这些新的事实,我们有必要重新检验和修正我们的观点。我们有许多同志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但是谁也没有象伯恩施坦那样迫切地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他的巨大的功绩。我愈是不得不在其他观点上反对他,我愈是不能同意他在进行重新检验时所采用的方法和

他所得到的结论——不过这只是根据他直到目前为止所发表的东西而言——我就愈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我和伯恩施坦一样，非常感到有必要对新的事实进行分析。在他写《社会主义问题》时，我开始研究那些似乎和我们的理论基础极其明显地相矛盾的事实，即农业发展的事实。这一著作也许可以和伯恩施坦的著作同时发表。我希望，这两本著作将共同为不仅涉及我们策略的正确性，而且涉及我们纲领的正确性这样重大问题的一次讨论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

这些著作一发表，我就会出来战斗。在这以前，如果没有必要，我不会参加讨论。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沉默。

考茨基

1898年11月3日于柏林

发表于1898年11月。译自《新时代》第17年卷
(1898—1899)第1册第7期第220页。

维·阿德勒致奥·倍倍尔（柏林）

1898年11月1日于维也纳

亲爱的朋友：

鼠疫事件^①花去了我很多时间，我必须亲自过问和为它写东西，所以到今天才来回你的信。我让人把那些信抄了一份，以备（当然是在通信中）不时之需，并将原件寄回给你。

我不得不说，看到目前发生的事，我只感到非常痛心。我没法不担心，你们、首先是你和卡尔对爱德过分严厉，以致愈来愈把他往右推。很难说你们应当怎样做，但是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你们的策略的目的应该是：避免表示象爱德这样的人在党内已无处容身。他的大部分观点，我都不同意，我认为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我也完全相信，他在策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的观点要是占上风，对我们是危险的。但是我认为，总的看来，或者几乎可以说总的看来，爱德的话促使我们去进行十分有益的思想上的探讨，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爱德作为一个陌生人和我们对话。

怎么办呢？你们不能把你们的决定和各种公开的论战推迟到他的书出版之后吗？到那时，卡尔的《土地问题》也许也出来了，我们便有了确定的讨论材料，而到目前为止，讨论的对象总是飘忽不定和暧昧不明的。

爱德的信自然是太过分了。但是你不以为他本意并不如此，而是论战使他走得更远吗？还有，难道我们不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和怀疑吗？而且如果我们曾经有空闲听任这些斗争和

^① 维也纳当时发生鼠疫，死者当中有一个对此病进行细菌学研究的医生和一个照顾病人的护士。基督教社会党的报刊利用这一悲惨事件煽动反对细菌学研究和一般科学研究。阿德勒领导《工人报》对此进行了回击。——编者注

怀疑自己去发展,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忙忙碌碌,谁知道这些斗争和怀疑会发展到多么强烈的程度!最糟糕的是他的独白是大声讲出来的,他的思想斗争是公开地进行的,这自然使他很难回头了。必须对他讲明白,他应当先自己把思想上的疑问弄清楚,有了结果再公诸于世。你们却逼他作出抉择,逼他作出“彻底的决断”,我认为这是失策。看看马萨利克^①发表在最近一期《时代》周刊上的文章就可以知道,那些希望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立刻彻底见一个“分晓”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朋友。我(当然我是一个实践家,对理论几乎一窍不通)觉得最重要的是爱德和我们,特别是专门和你,在我们面临的实际的策略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至于是否必须修正理论,这是可以平心静气地、心情舒畅地进行讨论的。并没有人逼迫我们把我们最优秀的人之一赶出门外,因此我们不应当这样做。这样做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你们倒是看一看周围的动静吧!就我能够看到的来说,存在着使那些对党最不利的人、那些冷酷的煽动者占上风的危险。我是把累德堡和他那一伙、还有梅林算做这种人的。一般说来,我认为梅林是在积极地和消极地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积极地,是说他在挑动卡尔,也许还有你;消极地,是说他本身对爱德是一种刺激,他惹得爱德走得比自己所希望的更远。尽管我很重视梅林的知识和能力(对于他的知识和能力,几乎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这个人对党的组织却是危险的,我总是感到他的心不向着党,这是夸大的说法,而且有点感情用事,但是我找不到别的说法,你会了解我的。

正是因为卡尔和爱德本人很接近,卡尔才过分小心,过分严厉。他总是担心他对爱德的友谊会影响他,使他作出有害于事业的判断和行动,他出于高度的责任感而对爱德过分尖锐。我

^① 托马斯·加里格·马萨利克(Thomas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
——捷克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家。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曾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喝采。——编者注

懂得这一点。我在这里和很多人沾亲带故，如果我的笔涉及到一个朋友或者甚至是一个亲戚，我会更厉害些，这样做只是为了使我感到我绝对没有受个人考虑的影响，可以问心无愧。我深信卡尔是太小心了，他必须从思想上把自己和爱德划开，考茨基—伯恩施坦双星座已不再存在是明摆着的事，他们相互分离了。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把爱德排除出党。他带着他的错误留在党内可能对党有益，他在党外会对党有害而且非常有害！这并不能防止你们所害怕的传染，也许反而会促进它，我暂时看不出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好处。我明白，你现在不可能把出版马克思著作的事托付给他，也许更不用提把写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事托付给他了。不过你们已经等了这么久了，再等几个月，也许毕竟可以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你对普列汉诺夫如此热情，我可弄不懂。他在最近的文章里荒谬地声称“资产阶级”企图用新康德主义来“麻醉无产阶级”，^①这种说法简直使他自己丧失影响，也使我们丢脸。他的文章也许实质上是对的，不过我还必须彻底地思考一下这件事。“资产阶级”既不懂老康德，也不懂新康德，以为他们会搞出这样恶毒的计划，那就是拿某一位教授来以偏概全，把他偶像化了。如果这是由于我们的大学生们“在科学方面”毫无道理地目空一切而偶然给他们引路，那是很有益的；不过如果不是针对勇敢而谦逊的康拉德·施米特，而且普列汉诺夫方面不是骄傲得这么可怕的话，那我会更高兴。马克思—恩格斯对认识论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的态度肯定不会象普列汉诺夫所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奇怪，他不去碰碰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① 《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于《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第1册第5期。阿德勒在这里指的是这几句：“无产阶级变得愈来愈‘贪心’和不可驾驭，资产阶级希望在康德的哲学里找到麻醉无产阶级的‘鸦片’。新康德主义是统治阶级为生存而斗争时使用的精神武器，因此它在统治阶级中流行一时。”中译文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474页。——编者注

朗格，此人才真是干这件事的。要是我有闲功夫，这场论战还可能诱使那个早已尘封在我心中的学哲学的老大学生出来参加呢！

请将此信给卡尔看，我不可能另外再给他写了。但爱德信中涉及的各点，我是一定还要再谈谈的。

总的说来，我只看到恩格斯的逝世给我们留下的困难。老人本来也可以做到使我们在进行“修正”（只要是必须的）时容易一些。如今我们只得自己辛辛苦苦地去做。如果有一个人发现房屋太古老，我们立刻便害怕起来，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房子不会马上倒塌，不过即使这位叫喊房子太古老的人犯过上百次错误，比起上百个正确的人来，我宁可喜欢他。你们也是一样，只不过你们是责无旁贷的卫士，因此你们怕耽误了什么事。我们的农民有句话，别着急，慢慢来！

衷心问好

你的 维·阿德勒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与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265—268页。

奥·倍倍尔致维·阿德勒（维也纳）

1898年11月4日于柏林西区哈布斯堡街5号

亲爱的维克多：

信收到了。我的明信片刚刚发出，你的信就到了。你的迟延已经得到了原谅，现在请原谅我的急迫吧，我本来是打算过些天再写详细的信的。

首先我想让你放心，别担心我们会过早地展开论战。从我给爱德的第二封信的结尾你可以看到，我同样是劝他把他的观

点肯定地和明确地写成一部著作，而在他写完之前，我们休战。卡尔提出同样的意见比我还早，为了对外也宣布这次休战，最后决定爱德和卡尔都在报上发表一个声明，下周的《新时代》即将刊登。① 你想要的东西声明中全都有了。

这事就算解决了。现在来谈爱德的著作——卡尔的著作可能大致同时发表——如果爱德说出他的决定性的话，他的著作就会攻击到党的各项原则（他在信上已经从各个方面攻击过了），那么，上帝和魔鬼都阻止不了分手。原则成了问题，策略也就成了问题；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也成了问题，那就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了。

请千万注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象死抱住教义的信条那样坚持我们纲领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理论观点。是的，我们必须修正一些概念，但是如果修正走的太远，以致把一切直到今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都当成错的，或者只是十分有条件地承认其正确，如果这种批判导致我们不得不停止称我们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今后必须称自己是社会自由主义者，那我是不会参加的，因为我不能参加，因为这是违背我的全部信念的。

那些思想上已不再属于党的人离开党也是必要的，因为最不愉快和最难受的事莫过于同每走一步都要发生争执的人合作。伯恩斯坦分子的策略肯定必然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根本不同的。

你说爱德的做法是把本来应该自己先弄清楚的东西一下子就公开拿出来讨论，你的看法也许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照着这样做，那他必须为他已经做的事负责。

放心吧：他会负责的！你小看了爱德。他斗争已经好多年了。大约三年前，他告诉我们他想隐退，他打算接受特兰斯瓦尔一家银行里的一个位置，这个计划那时候使我们大吃一惊。那

① 见本书第84—85、99—100页。——编者注

那个时候他已经感觉到和我们有矛盾，而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时候恩格斯还健在。不久前，他又对卡尔讲过同样的想法。要是把我们现在对他讲的话早就对他讲，特别是在斯图加特之前就对他讲，那么事情恐怕已经发生了，而那是最好不过的。

我完全看到和爱德的争论在党内会引起震动，但是这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任何一个已经长成、而且多少在自己内部隐藏着一些异端分子的党，都免不了震动，我没料到的只是爱德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些分子的代言人。要是现在到了分手的时刻——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就不得不分手，我不发愁，不会有很多人跟着跑掉。

你对卡尔的评论也是错误的。卡尔在信上和口头同爱德斗争已经好几年了，而卡尔一直总是相信能够“挽救”他，甚至直到今年的八月，他仍然相信这一点。他的信念的最后一丝火花已经熄灭，如果你知道卡尔所知道的情况，那么你的信念也会破灭的。

说梅林对卡尔起到那么重要的影响，也完全是错误的。爱德憎恨梅林并且把他看成万恶之源，他的想法和你一样。这是大大贬低了卡尔。我发现一般说来我们总是这样评论我们的朋友：当一个一直同我们和谐相处的朋友同我们不再投合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有另外一个人在搞鬼，过错全在这个人。卡尔和梅林来往甚少，而且显然对梅林有“戒心”，因此梅林在卡尔对爱德的看法上丝毫没有责任。

比对梅林的看法更为错误的是你对累德堡的评价，他在党内的影响等于零，这样已经把话说透了。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傲慢之处我并不喜欢，但是除此之外，就我这个在哲学方面的十足的门外汉来判断，这些文章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他把新康德主义看做资产阶级的哲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同你提出的理由并不矛盾。你说资产阶级既不为老康德、也不为新康德而斗争，我承认

这个。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有他们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一部分是自觉地、一部分是不自觉地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而工作。此外，普列汉诺夫这几天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涉及了爱德^①，所用的方式肯定会使爱德感到很痛苦，因为普列汉诺夫在文章里十分清楚地证明，爱德当成新的真理来向我们宣告的东西是舒尔采-格弗尼茨等人的牙慧。可惜的是阿克雪里罗得给卡尔的信中所说的话仍旧有效：爱德站在赫克纳^②和普拉特的立场上；而我只是希望现在他在面临重大决断的时候，不要因为胆怯而不敢把他的全部思想说出来，因为反正他的气质以后会迫使他讲出来的，而那时候危机又会重新爆发了。

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房子老朽了，我们不要坐等它塌下来，而是要动手拆掉它，我喜欢尽可能住新式的房子。

衷心问候你和恩玛夫人。

你的 奥·倍倍尔

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梅林，所以……！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与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268—270页。

卡·考茨基致维·阿德勒

1898年12月23日于柏林

弗里德里希大街11号

亲爱的维克多：

我应当羞愧地向你作诚恳的表白。我接受了施塔姆法尔的

① 《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见本书第86—99页。——编者注

② 亨利希·赫克纳（Heinrich Herkner 1863—1932）——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有《工人问题》等书。——编者注

一篇反驳，后来我才知道你会认为接受这种东西是很不合时宜的，或者大概说吧，是愚蠢的。不过你不必担忧。它没什么大意思，不会给《人民小报》之类以从中渔利的机会。我还要用使它起不了影响的方式来刊登它（放入通告一栏，我再加上几句说明）。①

爱德将变得比施塔姆法尔更要紧。说的是我对待爱德的方式。我的做法也许还是不合你的心意，但我向你保证，我对他决不会比目前库诺在《新时代》上对他更粗暴②。当然这种方式的批评爱德也不会喜欢。他向我诉苦，说库诺的文章说马克思比伯恩斯坦看的远。可惜我将不得不对他讲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确实不愿意泄露内情和作反对他的宣传。你自己会评判，而且你的评判是我最热切希望听到的，因为我认为别人会说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大致都知道了。但我不了解你的看法，当然你不会同意爱德的观点，不过看来你认为如果宽容一些，和他合作还是有可能的，我却认为没有可能，而且我只盼望一件事，盼望爱德在党告诉他之前自己明白这一点并且自动离开。要是有人引他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我丝毫也不认为这是对爱德尽友谊。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在他的朋友们中我是告诉他这话的唯一的一个人，此外除了倍倍尔，还没有一个人对他这样讲过。他自己还希望能用他的小册子来说服我。他写信给我说，如果他达不到目的，他和我们的分手一定要由我来走第一步，他决不免掉我的这个不愉快的步骤。他的职责是坚守他的岗位，直到我们赶他

① 弗里德里希·施塔姆法尔在《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第1册第9期上发表《拥护波希米亚国家法》一文，考茨基在第10期上发表《波希米亚国家法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和他论战。施塔姆法尔为此又寄来反驳文章《奥地利的联邦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将它刊登在第16期的通告栏内并加了题为《分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附注。——编者注

② 指库诺的《关于崩溃论》，发表于《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第1册第12、13、14期。——编者注

走，他自己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自动离开就是承认他不对。当然并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离开只是意味着他由于他的观点而不能继续和我们合作。要是他在斯图加特大会之后就发表声明说，他由于不再能指望得到多数党员的必要的信任而退出《新时代》，那么这样离开是体面的。任何进一步的论战都会停火，我们分手时仍然是朋友。可是他却固执地要人来赶，这事就弄得不体面不愉快了。他不会再回到我们这边来了——夏天倒是有过一次最后的机会，虽则那可能性极小——他不能停留在他现在站的地方，他一定得离开我们。而他在我们这边一天，他的态度就起一天极为有害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后辈。作为敌对者，他对我们的危害并不比某一个普拉特或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更大。

由于这些情况，我将对爱德发动进攻，态度上纵然可以温和，实质上要严厉，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这是他自找的！他也不会放过我们。和他的全部争论大大浪费了本来可以更好地使用的精力。

这就是我听到路易莎告诉我你对于爱德事件的看法时的心情。这种心情同圣诞节是不很相称的。我在内心深处还是因为爱德而非常难受，但是如果事情见了分晓，对于他倒更好，反正他已不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在党内已不再感到舒服，党对他成了难以忍受的束缚。

再见吧，亲爱的维克多，愿你和你全家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比今年更加顺利！祝圣诞和新年快乐！

你的 老卡尔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和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281—282页。



(二)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考茨基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在他们的文章和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表示希望他写一本书来系统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倍倍尔也赞成。伯恩施坦接受了这一建议，于1899年1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施坦在这本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修正。正如列宁所说的，这部最平凡的作品“却有特出的政治意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页）。

伯恩施坦的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敌人的热烈欢迎，给他们提供了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武器。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把这本书奉为经典。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和广大党员群众的严重关切。因此，1899年10月9日到14日在汉诺威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把伯恩施坦问题列为第五项议程：“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这是大会的中心议题。

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长达六小时的报告，详尽地驳斥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倍倍尔的报告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卢森堡、蔡特金、李卜克内西等在发言中都支持倍倍尔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大卫、福尔马尔、奥艾尔等则竭力为伯恩施坦辩护。伯恩施坦没有出席大会，但是奥艾尔在大会之前就把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寄给他。伯恩施坦写了一篇长达二十页的声明，委托奥艾尔在会上宣读。奥艾尔在发言中提到了这一声

明，但没有宣读。

大会经过四天的讨论，以二一六票赞成，二十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了倍倍尔的决议案。决议严正地宣称，“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等等。这一决议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修正主义者出于他们的两面派特性，在这样的形势下也投了赞成票，甚至伯恩斯坦也在上述声明中表示，在作必要保留的情况下，他可以赞成倍倍尔的决议。但是，伯恩斯坦和大卫等人在大会以后又发表文章竭力贬低大会对他们的批判的重要意义，歪曲倍倍尔决议的内容，实际上表示他们今后的言行是不受决议约束的。

我们在这一部分将倍倍尔的长篇报告全文译出，还选译了汉诺威大会的若干篇重要发言。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是她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重要著作，因篇幅较长，而且已有中文译本，我们只选用了一部分。此外还选译了大会前后的有关书信和文章以及《社会主义月刊》就汉诺威代表大会的成果进行的意见调查。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899年3月22日于柏林

亲爱的卡尔：

在我动身之前还想向你建议，你在写作你的文章^①时要狠狠地触动爱德，决不能含糊。我从多方面听说，你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就是由于含糊而没有产生应有的印象。

……

奥·倍倍尔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
阿森德文版第113页。

① 指考茨基的《伯恩施坦和唯物史观》、《伯恩施坦和辩证法》、《伯恩施坦论价值理论和阶级》，载于《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第2册第27、28、29期。——编者注

罗·卢森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摘录）

（1899年4月）

第一部分

本文的标题，初看会叫人感到惊奇。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么？或者说，它可以把成为它的最终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现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么？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各种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达到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必经之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我们在爱德华·伯恩斯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他发表在1897—1898年《新时代》上的、题目叫作《社会主义问题》的一批论文中，特别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这一著作中，他表述了这种理论。这整个理论，总结起来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斯坦自己曾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是这样写的：“对我来说，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个唯一的决定性的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急进主义

区别了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适足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装饰品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为如此，“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个问题，在伯恩施坦的意义上，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同时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施坦及其门徒辩论的问题，最终说来，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策略还是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认识这一点，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运动中影响的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施坦从理论上表述了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靠拢党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上风、依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盲目的企图。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一 机会主义的方法

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的现象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那么，在伯恩施坦理论的面前，就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反映。伯恩施坦的理论，是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长眠之后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英国机器工人失败之后主张由工会监督生产过程的理论，是在萨克森已经修改了宪法、国会普选权已经被扼杀之后主张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的理论！可是，伯恩施坦论述的重点，我们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的见解，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说的话，那些见解同这些话当然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照伯恩施坦的看法，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越来越分化，资本主义由

于本身的发展而发生崩溃的事，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照伯恩施坦的看法，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和交通通讯工作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最后，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

从此得出的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斗争的总的指示是：它的策略，不是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而是去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不是通过一个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控制、逐步贯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自己看不到他的议论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倒以为这些议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说法，同社会民主党一贯采取的总方针，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很难否认，伯恩施坦的见解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途径有着根本的矛盾。

如果伯恩施坦的全部修正总起来说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人们平常设想的要慢的多，那么，这种看法在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把一贯主张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迟一些，从此得出的结果，实际上顶多是斗争的速度放慢而已。但是，事情不是这样。伯恩施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过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理论总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必须分别两个方面：其一，是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这些思想的表面形式。这里的根本思想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由于本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成为不可能存在。人们把这个时机想成是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一定有它的道理的，但是，虽然如此，对那

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附带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大家知道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是生产过程的迈着大步走向社会化，这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确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就要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伯恩施坦所拔掉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一定形式，并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本身。他明确地说过：“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想的不仅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①

如果是这样，倒出了一个大大问题了：究竟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达到和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同伯恩施坦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崩溃，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从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就是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一点，伯恩施坦也看到了的，他说：“社会主义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溃论后）却绝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

① 《伯恩施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39页。——编者注

力。因为仔细看来，我们以上所列举的消除或限制旧危机的一切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全部同时也是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①

只要稍为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这也是个错误的结论。伯恩斯坦把卡特尔、信贷、完善的交通工具、工人阶级的提高等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现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现象废除了或者至少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见，废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废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一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升到中间阶层，——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缓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贷、工会之类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于崩溃，把资本主义保存了下来，——因此伯恩斯坦才把它们称作“适应工具”，——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呢？显然，这是就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无须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过渡就成了多余的事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端和前提，就只是就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就历史上说是如此了，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但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多余的事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崩溃在精神上的简单反映，——因为崩溃已经由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说服力量是以它

^① 《伯恩斯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38页。——编者注

自己给自己想象出来的完美性为依据的。

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根据，即唯心的根据，而客观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据，却消失了。修正主义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在将来也还是同过去一样，是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或者，“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因而它的矛盾能够废止，如果是那样，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它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一个结果。这个两刀论法，总起来说也是另一个：或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想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乌托邦，或者，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乌托邦，那么“适应工具”论就必然站不住。问题就在这里。

五 修正主义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

我们在第一章中想说明：伯恩施坦的理论，是要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错误地放到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去。这是关于理论根据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放到实际工作上，又怎样表现的呢？最初，在形式上，它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到今天为止的通常实际工作并无分别。工会、社会改良的斗争和政治民主化的斗争这也就是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表面内容的东西。因此，区别不在于什么，而在于怎么干。就现今实际情况说，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是作为引导和教育无产阶级逐步走向夺取政权的手段来理解的。照修正主义的见解，既然夺取政权是有可能和没有目的的，这些斗争就只应该期望直接的结果，就是说，只应该为了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为了逐步限制资本主义

剥削和扩大社会控制。如果我们把直接提高工人生活这个目的置而不谈，——因为这个目的是到现在为止的党内普通的观点和修正主义的观点所共有的，——那么，全部区别可以总结为：依照普通的观点，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把这个革命的主观因素即无产阶级准备好。依照伯恩斯坦，它们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本身，使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地失去资本主义性质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总之，它们应该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客观上实行起来。因此，人们仔细一看，这两种观点甚至是恰恰相反的。从党内普通的观点看来，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可以深信用这些斗争来根本改变自己地位是不可能的，最后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从伯恩斯坦的观点看来，人们从夺取政权的不可能性出发，结果是通过单纯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伯恩斯坦的观点中，是在于相信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社会主义化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在事实上——象我们已经表述过的那样——纯粹是空想。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国家制度，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归根结底说来，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际斗争，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使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当人们把它们理解成直接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社会主义化的手段时，它们不单丧失了为它们捏造的作用，并且同时也丧失了其他意义：它不再是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教育工人阶级的手段了。

由此可见，当伯恩斯坦和施米特自己安慰自己，以为就是把全部斗争限于社会改良和工会斗争，就工人运动来说也没有丧失目的，因为在这个轨道上的每一步都引出后一步，所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当作一个趋势的运动本身，——在这时候，

他们是以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为依据的。如果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来说,情况倒的确如此,其所以如此,因为在工会斗争和社会改良斗争的面前,有夺取政权的自觉而坚定的企图作指路明星。可是,如果有人把这种事先确定了的企图与运动分开,首先把社会改良本身当作目的,那么社会改良不仅不是向着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走去,而且恰恰相反。施米特简单地相信所谓一发不能自止的机械运动,根据吃食生胃口的格言,认为工人阶级不到社会主义完成就决不会满足。最后的这一点假定,当然是对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改良之无能,本身就为它向我们作了保证。但是那个从此得出的结论,却只有在对今天社会制度所进行的象一个链子一般连续不断的、日益增多的社会改良能直接构成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但这是空想,这个链子,就事情的本质说,很快就要断了,断了以后,运动所采取的可能的途径有好多种。

那时,最接近和最可能的结果,是策略上放缓一步,以使用尽一切办法让斗争的成果、即社会改良的成果得以实现。一旦直接实际收获成为主要目的,那种只对于夺取政权有意义的不调和的、严格的阶级立场就越来越只是一个障碍,因而下一步就是“补偿政策”——用正确的德文说是“贿赂政策”,以及调和让步的政治家的明智态度。但是,就是在这一步上运动也不能停留太久。因为,社会改良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经成为空壳,不论人们采取什么策略它总是存在着,那么,在逻辑上,下一步就是对于社会改良也失望了。——社会改良是一个避风港,施穆勒教授之类现在正是停泊在这个港里,在社会改良的海水上钻研形形色色的事物,以便最后让一切听天由命。①——由

① 1872年,瓦格纳、施穆勒、布伦坦诺等教授在爱森纳赫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大张旗鼓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良保护工人阶级。这些被自由党人奥本海姆讥讽地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的人,不久之后建立了“社会改良同盟”。几年后,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激烈化的时候,这些“讲坛社会主义”的人们已经以议员资格投票拥护延长反社会党人法了,这个同盟的全

此可见，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只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又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社会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如果象修正主义那样，不承认前者，又拒绝了后者，那么，工人运动最初是变成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最后并由于本身的重力而走到放弃阶级立场。

如果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看看修正主义理论，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种观点的一般性质究竟是什么？那么，刚才指出的那个结论也就明白了。修正主义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不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一起否认资本主义矛盾的，它在理论上倒是也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样，把这种矛盾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从此出发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在理论上不认为这些矛盾的消灭要通过它们自己的彻底发展，不是以此为根据。——这一点，既是修正主义观点一般的核心，也是它同到现在为止的普通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根本分歧。

修正主义理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它不愿意资本主义矛盾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在尖头上消灭矛盾，它倒愿意折断矛盾的尖头，缓和矛盾。于是，它以为，危机的迟来和企业主联合组织应该缓和生产与交换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应该缓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控制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应该缓和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当然，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策略，也不是说人们等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发展到极端，等着它们到那时候才发生突变。相反，我们只是依靠已经认识的发展方向，然后在政治斗争中使矛盾的后

部活动，除此以外，就是每年开大会，会上宣读讨论各种问题的几篇教授报告，其中，关于经济问题已经由同盟出版了100多本厚书。这些教授，除了主张社会改良以外，还拥护保护关税和军国主义之类，而对于社会改良，一点也没有动手。这个同盟最后连社会改良都放弃了，从事研究危机、卡特尔之类问题去了。——卢森堡注

果发展到极端，这是一般革命策略的本质。因此，例如对关税和军国主义，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进行斗争，不是等到它们的反动本质完全暴露了再说。伯恩斯坦则不然，他在策略上根本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尖锐化，而是依靠矛盾的缓和。当他谈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时，他把这一点说的最露骨。这种观点什么时候有过证明呢？今天社会的一切矛盾，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我们假定这种生产方式还要朝着到今天为止所取的方向发展，那么，它的一切后果，就必然会不可分地同它一起向前发展，使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矛盾缓和。因此，矛盾的缓和，反过来说，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遇到阻滞为前提条件的。总之，伯恩斯坦的理论的最一般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停顿。

在这个前提下，自然建立起这个理论来，并且有两个方面。因为，第一，这个理论，在有关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方面，暴露出空想性质，——一个停滞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望而知的，——这里，我们关于这个理论的实际结论的说明得到了证明。第二，这个理论，从资本主义事实上在迅速发展的事实看，暴露了它的反动性质。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解释伯恩斯坦的理解方法，或者不如说，怎样才能把它的特征表现出来？

伯恩斯坦在他对今天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经济前提——他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是站不住的，这一点，我们相信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明了。我们在那里看到，不论信用或者卡特尔都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不论暂时延迟了的危机或者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都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适应性的征象。但是，上面说到的适应论的一切细节，——姑且不管它们直接的错误，——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作为基础的。这个理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的关联上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经济

结构的联系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联系中割裂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例如，对于信用的适应作用的理解就是如此。如果看到，信用是内在于交换的矛盾的一个自然发生的较高阶段，就不可能把信用看作仿佛是什么处于交换过程之外的机械的“适应手段”，正如不能把货币本身、不能把商品、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样。信用也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有机的一环，它在这一点上丝毫不次于货币、商品和资本。在这个阶段上，它也完全同它们一样，既在经济的齿轮联动机构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齿轮，同时由于它增加了内在矛盾，它也是一个破坏工具。

至于卡特尔和完美的交通工具，情况完全一样。

伯恩施坦把危机的延迟当作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征象，这同样是机械的、非辩证的理解方法。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经济机构中的扰乱，如果危机延迟了，这个机构显然能圆滑地发挥机能。但是，危机事实上不是平常意义的“扰乱”，如果硬要说是“扰乱”，不如说，它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少了就无法进行的扰乱。危机，简单地说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因此是周期地解决生产的无限扩张能力和销售市场的狭隘限制之间的分裂的完全正常的方法，只要这是事实，那么，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扰乱的”前进过程中，倒不如说，包含着一种比危机还大的危险。这就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它不是由生产与交换的矛盾产生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本身造成的。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有一个最危险的趋势，就是它使一切中小资本的生产成为不可能，因而限制了新的投资的形成和进步。在这同一过程中作为另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危机，由于它周期地使资本贬值，由于它使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使活动中的资本有一部分停顿下来，恰恰是它倒起了提高利润的作用，因而为生产中新的投资和新的进步开辟了地盘。所以，危机

好象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之火重新旺盛起来的一个手段，而危机的延迟，如果不是指我们说过的世界市场成长中的一定时期的事，而是指单纯的延迟，那么，不是伯恩施坦所想的那样不久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相反，倒会把它直接带到泥潭中去。成为整个适应论的特色的机械理解方法，使伯恩施坦既看不到危机的必不可缺，也看不到中小资本周期地重新萌发起来的投资也是必不可缺的现象，因为这样，在他看来，小资本的不断重生也是资本主义停顿的标志，倒不是如实际情况那样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

当然，是有这么一个立场的，从这个立场看来，上面所讲的一切现象实际上也表现得象“适应论”所总结的那样，这就是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因为经济生活的种种事实是由竞争规律改变了形状进他意识中去的。个别资本家首先事实上把经济过程的每个有机组成部分看作完全独立的东西，还有，他只从它对——对个别资本家发生作用的那一面来看，因此把它看成单纯的“扰乱”或单纯的“适应手段”。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危机实际也只是扰乱，而危机的延迟让他延长寿命；对他来说，信用同样是使他的不够用的生产力“适应”市场需要的手段，对他来说，他所参加的卡特尔实际上也取消了生产无政府状态。

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论不过是个别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但是，这种理解方法在理论表现上究竟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精神和特点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派在经济学上的一切错误，其根源正在于把个别资本家眼中看到的竞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现象。例如，象伯恩施坦把信用看作“适应手段”一样，庸俗经济学也把货币当作巧妙的对市场需要的“适应手段”，它也是从资本主义现象本身去寻求资本主义病症的解毒药，它同伯恩施坦一样相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最后，归根结底，它还是同伯恩施坦的理论一样，是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和粘合资本主义的创伤的，用另一种说法，就是

一种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因此是一个空想。

因此修正主义理论，整个说来，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现出它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第二部分

三 夺取政权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的命运寄托在工人运动的命运身上。但是，民主的发展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使得在掌握国家政权和夺取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多余的事，或者不可能的事呢？

伯恩斯坦用彻底衡量合法改良和革命的优缺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优游自在地衡量着，叫人想起消费合作社中秤肉桂和胡椒的样子。他看到，在合法的发展过程中，是理智用事，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是感情用事，改良工作是历史前进的缓慢方法，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急速方法，立法是有计划的方法，革命是原始的暴力（第183页）。

由来已久了，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上总是看到“优点”一面和“缺点”一面，对每一个花坛都津津有味。但是，同样也是由来已久了，事物的实际进程很少关心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推测，精心搜集来的一堆世界上一切可能事物的“优点”碰碰就烟消云散。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合法改良和革命所起的作用，有比这个或那个方法的优点、缺点更为深刻的根据。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上，合法改良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直到它感到充分成熟，夺取了政权，推翻了全部现存的法律体系，以便建立一个新的法律体系为止。伯恩斯坦反

对夺取政权，把它当作布朗基主义的暴力理论来咒骂，不幸的是他把千百年来成为人类历史的关键和动力的东西当作布朗基主义的计算错误。自从阶级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历史基本内容以来，夺取政权一直是一切上升阶级的目的，又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始点和终点。这种情况，我们在古罗马农民同货币资本家和贵族的长期斗争中，在中世纪贵族同主教的斗争和手工业者同贵族的斗争中，在近代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都可以见到。

因此，合法改良和革命，并不是象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盆一样可以由人任意加以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斗争发展中的不同要素，它们既是互相制约和互相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

并且，每一个时候的法制都只是革命的一个产物。如果说，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立法就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继续成长。合法改良工作，就它本身来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离革命而独立的动力，它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它的刺激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或者，具体地说，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形态的框子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以为合法改良工作不过是放宽了的革命，以为革命不过是压紧了了的改良，那是根本错误的想法，完全违反历史。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不同的要素，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历史上运用政治力量进行的革命变革，其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转为新质，具体地说，正在于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另一个社会制度。

因此，如果谁把合法改良的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主张用前者代替后者，那么，他事实上选定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一个比较温和、稳当和缓慢的道路，而且也是选定了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

旧制度中作些无关紧要的变动。所以，从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同从它的经济理论一样，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根本上说，修正主义不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者少些，总之，它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本身。

上面所说的关于合法改良和革命的话，或许只是对到现在为止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吧？或许，从今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法制的成熟，合法改良可以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把社会从一个历史阶段引导到另一个，而无产阶级的夺取国家政权，如伯恩斯坦在他的书里第183页所说的那样，“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了吧？

情况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前的阶级社会——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正在于：现在的阶级统治不是以“既得权利”为依据，而是以实际经济关系为依据，雇佣劳动制度不是一个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在我们整个法律体系中，找不出现在的阶级统治的法律规定。如果还找到一些这样的规定，那么，它恰恰是——如仆役法——封建关系的遗物。

既然雇佣奴隶制度在法律上完全没有表现出来，又怎么“通过合法的道路”逐步地予以废除呢？想靠合法改良工作结束资本主义的伯恩斯坦，落在乌斯宾斯基说过的那个俄罗斯巡警的地位上了，巡警叙述他的冒险故事说：……“我一把抓住那家伙的领子，结果怎样呢？那可恶的家伙竟是没有领子的！”……麻烦就在这里呀。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①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过去阶段上，这个对立，曾经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上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一定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编者注

度为止，新兴的关系还可以在旧关系的框子内找到地盘。“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位置”^①。怎么做的呢？通过在城市郊区逐步废止那一切零零碎碎的、总起来构成农奴制度的权利，如徭役、选畜权、衣着权、借地继承税、人头税、强迫婚姻、遗产公享权之类。

同样，“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位置”^②。用什么办法？通过局部地正式废除行会的束缚或者事实上解脱行会的束缚，通过逐步地在最必需的范围内改造行政、财政、国防制度。

所以，如果抽象地研究问题而不是历史地研究问题，那么，在以前的阶级关系情况下，至少可以设想纯粹通过合法改良的办法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在那时候，合法改良也不是使资产阶级的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替夺取政权作了准备和引导。无论为了废除农奴制度，无论为了废除封建制度，真正的政治社会革命那时都是必不可缺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强迫无产阶级受资本奴役的，不是任何法律，而是必需，是缺乏生产资料。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能够宣布生产资料属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也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

其次，在雇佣关系内部的剥削，同样也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因为工资的高低不是由法律的途径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剥削这个事实本身就不是依据一种法律规定，而是依据这样的经济事实：——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场，它除其他特性以外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性质，就是它能生产价值，并且生产的价值比它自己在工人生活资料的形式中消耗的价值还多。总之资本主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编者注

义阶级统治的根本关系，是不能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合法改良的手段来改变掉的，因为这些关系既不是由资本主义的法律带来的，而它们的形式也不是从这种法律得来的。伯恩斯坦在订定社会主义“改良”计划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所不知道的，就是他自己说过的，因为在他的书里第10页上写着：“经济动机今天是自由地出场的，而它在以前是被各种各样的统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掩盖着的。”①

但是还得加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在这个制度中，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们不是向社会主义靠近，而是对社会主义疏远。在生产中，社会性越来越表现得明白。但是采取什么形式呢？——大企业、股份公司、卡特尔，这里，资本主义的对立、劳动力的被剥削和被奴役的情况发展到最高点。

在国防上，义务兵役制有了推广，服役期限缩短了，因而就物质方面说向人民军队接近了。但是，这是采取现代军国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人民受军事国家所统治、国家的阶级性质，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在政治关系上，民主有了发展，民主是最有利于所有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园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向“人民国家”发展。但是，民主采取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没有被废除，倒是开展和暴露出来了。由此可见，因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所以，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资本主义的外壳里挖出来，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要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伯恩斯坦从这里得出的当然是另一个结论：如果说，民主的发展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它缓和，那么，他答复

① 《伯恩斯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88页。——编者注

我们说：“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给自己的工作增加困难，倒是应该尽力去破坏社会改良和破坏民主措施的扩大了。”（第71页）不错，如果社会民主党还学小资产阶级的样子，对于从历史上去选择一切优点、抛弃一切缺点的吃力工作还是津津有味的话。不过，它后来势所必然地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尽力去破坏”，因为这个制度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在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布下重重障碍。实际上，资本主义除了布下障碍以外，同时也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唯一可能性。这种情况，在民主方面也完全适用。

如果说，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多余的，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正因为这样，对于工人阶级，它就成为必要的、不可缺的。首先，民主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之类），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对无产阶级起了跳板和支点的作用。其次，民主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中，在为民主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任务。

总之，民主是少不得的，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的事，相反，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既成为唯一可能的，并且同样成为必要的。当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序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他论述的——从序言的每一行都看得清楚——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的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子内他的态度的问题。总之，恩格斯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指明方针。

马克思关于英国土地问题的著名发言则相反，——伯恩斯坦同样引了它的一段话：“如果对地主实行赎买，或许是最便宜的”，——这里所讲的不是无产阶级在它胜利之前的态度，而是指胜利之后。因为显然只有工人阶级已经掌了舵才说得对

统治阶级的“赎买”。而马克思在这里当作可能性拿来考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的运用，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来代替这个专政。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到伯恩施坦，才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埘，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的机关。

不过，伯恩施坦让他的理论纯粹从忧虑和警告开头，——无产阶级可不能太早地取得政权呵！在这种情况下，照他看来，只有让资本主义的现状完全维持下去，即使我们遭受一次可怕的失败也好。我们从这种忧虑中首先看出了什么呢，那就是，如果由于种种情况，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么伯恩施坦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实际指示——躺着睡觉吧！因此，这个理论没有指出更多的东西，只是提出了一个观点，注定了无产阶级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只该坐着不动、消极地背叛自己的事业。

我们的整个纲领如果不能在斗争的一切紧要关头和时机为我们服务，并且是通过它的运用而不是不运用为我们服务，实际上就是一张倒霉的废纸。我们的纲领如果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表述，那么，必须在基本轮廓上表述这个发展的一切过渡阶段，因而它也就能够向无产阶级指出，在每个时机如何为着使社会主义早日到来而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可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时一刻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或者他被这个纲领所放弃。

实际上，事实就是这样表现的，由于事态的发展，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不可能或者不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实现他的纲领、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定措施的。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纲领可以在某一刹那间完全不提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事，可以对它的实现完全不作指示，那么，在这种主张背后就不自觉地藏着一个主张，就是说，社会主义纲领根本

是什么时候都实现不了的。

要是过渡措施采取得过早了呢？——在这个问题中，包含着对社会革命变革的现实过程的一大堆错误认识。

国家政权的由无产阶级掌握，就是说由一大批人民群众来掌握，首先不要认为这是可以用什么人工的方法造成的。它是经济政治情况的一定的成熟程度为前提的。——我们不说象巴黎公社这种场合，那里，政权的归到无产阶级手中，不是他的目标明确的斗争的结果，而是作为例外的情况，作为谁都不要的无主的财货现成得来的。——这是它同布朗基主义的政变根本不同的地方。布朗基主义主张由“坚决的少数”发动政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动，象从手枪发射的一般，正因为如此，它总是不合时宜的。由广大的有阶级觉悟的人民群众夺取政权，本身只能是已经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崩溃的产物，因此，本身就带着及时出现的经济政治合法证书。

因此，从社会前提的角度上来看，工人阶级的夺取政权完全不会“过早”发生的。可是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的角度上看，就是说，从政权的巩固来看，它却必然是“过早”地发生的。使伯恩斯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象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战栗和恐惧都毫无用处。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

第一，象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说要一下子完成，在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击之下完成，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认为这也是可能的，那又是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按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果的观点来说，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的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

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随着他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在政治上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要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是机械地看社会发展，它是假定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时机是在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而决定的。

这样看来，无产阶级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夺取政权，因为它无条件地必须作一次或几次的“过早”的夺取，才能有最后的、持久的掌握。因为如此，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正如条条大道通罗马，我们从这一方面也是必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修正主义的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方针，结果也就是放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

四 崩 溃

伯恩斯坦修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从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的。但是，既然资本主义的崩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那么，抛弃了这个基石，逻辑上必然使伯恩斯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趋于崩溃，在辩论过程中，为了支持他的第一个主张，他就把社会主义的阵地一个又一个地放弃了。

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剥夺资产阶级就不可能，——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的。

但是，合作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想到改良商业和消费合作社。

但是，通过消费合作社来改造社会，哪怕还同工会一起干，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物质发展是不相容的，——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了唯物的历史观。

但是，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观点是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不相容的，——于是，伯恩斯坦放弃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了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

但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没有在现今社会中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能进行，——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

但是，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伯恩斯坦在进一步的结论中，甚至反对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有阶级存在；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一群不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并且在经济上都是四分五裂的个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也不是靠内在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而只是由于外来的压力——从上来的或者从下来的——在政治上结合起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且根本上说也没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将来的斗争，而且也不可能它们到现在为止的斗争，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身和它的后果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事了。或者，如果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它同样只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倒是霍亨索伦方针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儿子，倒是反动所生的私生子。这样，由于不由自主的逻辑，伯恩斯坦从唯物的历史观走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斯报》的观点上去了。

在坚决地全盘否定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批判之后，剩下的路，只有满意现状了，至少在总的方面表示满意。对于这一点，伯恩斯坦倒也并不退缩，他觉得现在德国的反动并不那么厉害，“在西欧各国，政治上的反动看到的不多”，几乎所有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至多是防御而不

是镇压”(见1899年3月26日《前进报》)。工人不是贫困了，而是相反，他们越来越富裕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甚至在道德上也是健康的，不见有反动和压迫，——在这所有世界的最好的一个世界中，万事万物都走向最好的境界……

就是这样，伯恩施坦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头一贯到底。开始，他为运动的利益放弃了最终目的，但没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因此，结尾，他必然把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

因此，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观点全部崩溃了。雄伟、对称和奇美的马克思体系建筑物，在他手上，现在变成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破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公墓地。马克思和蒲鲁东，列奥·冯·布赫和弗兰茨·奥本海姆，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和康德，波罗戈波维契先生和利推尔·冯·纽包威尔，赫克纳和舒尔采-格弗尼茨，拉萨尔和尤利乌斯·沃尔弗——所有这些人在伯恩施坦思想体系中都有片断的贡献，伯恩施坦把所有这些都拜作老师。并不奇怪！他抛弃了阶级立场，也就失去了政治罗盘，他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把个别事实在一个彻底世界观中结成有机整体的结晶轴。

这个把一切可能的思想体系的残片无区别地混堆起来的理论，初看起来倒是毫无偏见的。伯恩施坦也不愿意听到什么“党的科学”，或者正确些说，阶级的科学，也不愿听什么阶级的自由主义，阶级的道德。他想代表的是一般人类的、抽象的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但是，因为现实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而不同的阶级有正相反对的利益、企图和观点，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的一般人类科学、抽象自由主义、抽象道德，暂时是一种幻想、一种自我欺骗。给伯恩施坦当作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的东西，只是统治者的东西，即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道德。

实际就是这样！当他拒绝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以便效忠于布伦坦诺、柏姆-耶方斯、萨伊、尤利乌斯·沃尔弗的时候，他除了用资产阶级的辩护论来代替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基础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当他谈论自由主义的一般人性，把社会主义变成它的变种的时候，他除了从社会主义抽去阶级性、抽去历史内容、因而根本抽去了一切内容之外，除了反过来把自由主义的历史代表人、把资产阶级当作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以外，又能作什么呢？

当他在社会民主党里攻击把“物质因素提高到作为决定发展的万能力量”、攻击“看不起理想”的时候，当他谈着理想主义和道德的字句，同时对于无产阶级重整精神的唯一泉源即对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生气的时候，老实说，除了向工人阶级宣传资产阶级道德的真髓，即向现存制度妥协并把希望带到虔诚的理想世界的来生以外，他还能作什么呢？

最后，当他用利箭针对辩证法的时候，除了同努力上进、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特有的思想方法斗争以外，还能作什么呢？他反对的是这把剑，这把剑曾帮助无产阶级打破黑暗、看清自己的历史的未来。他反对的是这个精神武器，用这武器无产阶级虽然物质上还在羁轭之下但战胜了资产阶级，因为它向资产阶级确实证明，资产阶级的存在是暂时的，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精神世界中已经完成了革命！当伯恩施坦向辩证法告别，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然，但是”、“虽然，可是”、“较多，较少”的思想跷板的时候，他就完全合乎逻辑地退化到没落资产阶级的、由历史所决定的思想方法中去了，这个思想方法，正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政治行为的一幅忠实的精神画像。目前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但是”，表现得恰恰同伯恩施坦的思想方法一模一样，而伯恩施坦的思想方法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最细致和最可靠的征象。

可是,在伯恩施坦看来,现在连bürgerlich^① 这个字也不是阶级表现了,而是一般社会概念了。这不过是说明了——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真是丝毫不差——他已经用资产阶级的科学、政治、道德、思想方法以至于历史语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科学、政治、道德、思想方法以至历史语言。当伯恩施坦把 Bürger ^② 理解为既是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因而无区别地是简单的人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就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了。

五 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

伯恩施坦的书,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替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建立一个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

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如果我们把一些零碎的表现——如大家知道的汽船补贴问题等——也计算进去,那是早就存在的了。可是,一个公开的统一的机会主义思潮,却是九十年代之初开始的,是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后,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开始的。福尔马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巴伐利亚的预算投票、南德的农业社会主义、海涅的补偿建议案、席佩耳的关税观点和民军观点,这些就是在机会主义的实际的发展中的界标。

机会主义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理论”,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实际活动,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设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们自然企图让自己的手不受束缚,就是,让我们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论”,不依据

①② 德文中的“Bürger”一词有“市民”和“资产阶级”这两重意义,“bürgerlich”一词相应地有“市民的”和“资产阶级的”这两重意义。伯恩施坦在这方面的观点可参看《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95—196页。——编者注

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迎头痛击了他们的每一个实际企图：国家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补贴政策、民军问题，都是机会主义遭到失败。显然，这些思潮，如果它们想反对我们的基本原理，势必向理论本身，向基本原理挑战，而不是单单置之不理；势必想法动摇这些基本原理，并且建立一种自己的理论。伯恩施坦的理论正是向这方面走的一种尝试，因此，我们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看到所有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刻在伯恩施坦的旗帜周围集合了起来。如果说，一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由于我们的斗争条件产生的现象，它的增长是可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另一方面，伯恩施坦的理论也是一个不难理解的企图，它是想把这些思潮在一个普遍的理论表现中总结起来，找出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因此，伯恩施坦的理论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耐火试验，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科学证书。

这次试验结果如何呢？我们已经看过了。机会主义树不起一个多少顶得住批评的实证理论。它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先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个别的基本原理进攻，最后，因为这个学说是各部分密切结合的一座建筑物，就想把整个学说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一起毁掉。由此证明，机会主义的实际在它的本质上和基础上是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不能相容的。

但是，其次它也证明了，机会主义同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它的内在的趋势是要把工人运动赶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去，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麻痹。当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马克思学说体系——从历史上说——不是一回事。在马克思以前，并且同马克思无关，就有了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的体系，每一个体系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论上表现出适应当时条件的工人阶级解放的意图。用道德上的公平观念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生产方式而反对分配方式的斗争，

把阶级斗争理解为贫富对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合作化”的企图，——我们在伯恩斯坦思想体系中遇到的这一切，早已存在了。这些理论，过去在它们那时代，尽管它们有一切欠缺的地方，仍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的理论，它们都是巨大的童鞋，无产阶级是穿着这些童鞋学会走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经达到脱掉这些理论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外就不能再有任何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至少在德国是如此。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一回事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上去，现在不再是表示回到无产阶级的巨大的童鞋，不是的，现在这是表示回到资产阶级的窄小的破鞋中去了。

伯恩斯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打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尝试。我们说是最后一次，是因为机会主义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无论消极方面——坚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无论积极方面——把可以抓得上的一切理论上的混乱堆到一起，都已经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没有更多的事留着要作的了。伯恩斯坦的书一出来，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就完成了，作了最后的结论了。

而马克思的学说，不仅能在理论上回击机会主义的学说，并且是唯一能够把机会主义当作历史现象放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说明的学说。无产阶级为达到它的最后胜利的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运动的全部特点，在于这里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人民群众自己违反着一切统治阶级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而这个意志必须超过现在社会在未来世界中实现。这个意志，群众又只有在同现存制度不断进行斗争，在现存制度的框子里培养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同一个超越全部现存制度的目的结合，日常斗争同伟大的世界改

造结合,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大问题,这个运动因此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必然是在两块礁石之间前进:一边是群众性的任务,一边是最后目的的任务;一边是重犯宗派主义,一边是滚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机会主义。

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在他的理论武库中早在半世纪以前已经提供了既反对这个极端又反对那个极端的锐利的武器。可是,正因为我们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而威胁着运动的危险不是从人的头脑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那种跳到无政府主义一边去和跳到机会主义一边去的现象,不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事先一劳永逸地防止得了的:它要在实践中降生以后,通过运动本身,当然只有靠马克思所提供的武器的帮助,才能克服。较小的一个危险,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儿麻疹,社会民主党已经把它和“独立派运动”^①一起克服了。较大的一个危险,即机会主义的水肿病,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在克服。

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到来,这时关于能否达到伟大目的怀疑,和关于运动的观念因素的动摇,在运动中抬起头来。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只能这样而不能是别样,动摇和畏缩的时刻,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不是出乎意外的事,倒是马克思早已看到和预言过的。马克思在半世纪以前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

^① 见本书第55页注④。——编者注

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①

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建立之后,这段话仍然是对的。就是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也还不是一下子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在德国也不是这样,它是一天天地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它的变成这种性质的运动,也是在它不断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极端偏向过程中进行的,——两者不过是当作过程来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要素。

从这一点看来,值得奇怪的不是竟有机会主义思潮产生,倒不如说是这个思潮竟如此虚弱。当它仅仅表现在党的个别实际工作上的时候,人家还以为在它后面总有一个多少是认真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它在伯恩施坦的书里已经完整的表达出来了,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觉得奇怪地喊道:怎么,你要说的就是这些了吗?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一点思想不是早已在几十年前给马克思主义踢倒、踏破、嘲笑过的,并且一点也没有改变呀。

机会主义说了话了,就足够证明它没有东西好说了。伯恩施坦的书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实在的意义就在于此。

因而,伯恩施坦在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同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告别的时候,还可以谢谢它们,因为它们对于他的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编者注

认为还有条件可以从宽发落。因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豁达大度的，它们让他表现为负有使命而不自觉的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通过这个工具已经把它的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了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摇摇头把这种不坚定性从自己方面远远地抛掷出去。

选自《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899年4月）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1—7、27—34、52—70页，

保·康普夫麦尔^① 伯恩施坦这个“小资产者”

(1899年4月)

对于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如此有特色的著作，敌我双方的态度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异的情景呵！可怜的、可怜的伯恩施坦，他受到双方的误解！首先，他得祈求苍天保佑，以对付他所谓的朋友。帕尔乌斯用墨水和笔对伯恩施坦发动的诛伐几乎还不如资产阶级报刊使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令人十分憎恨的编辑——不得不忍受的阿谀之词那样叫他感到痛苦。难道这位一度那么勇猛的阶级战士真的变成资产阶级报刊的“好青年”了吗？好吧，如果敌人的报刊真打算把伯恩施坦当成一个重新回头的浪子接进它们那古老而破败的家庭，如果它们要大摆宴席向改过自新的罪人祝贺，那么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认为这种举动是由它们那种天下闻名的肤浅和轻率造成的。这些报刊真是好样的，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好战的扫罗如果真的已经变成绵羊一样恭顺的保罗，^②他就会郑重其事地发誓否认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关于资本剥削工人的学说以及由此得出来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是，伯恩施坦丝毫没有丢掉那些精确区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世界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的思想。凡是不把当前的工资劳动看作是一种经济奴役的人，凡是认为无产阶级不经过夺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权力的阶级斗争

① 保尔·康普夫麦尔(Paul Kampffmeyer 1864—1945)——曾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机会主义集团“青年派”的成员，后转向修正主义。——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8—22章；扫罗和保罗是同一个人。扫罗残酷迫害教徒，耶稣显圣使其悔悟，变成虔诚的教徒保罗。——编者注

就能实现本阶级的解放的人，决不会坐在社会主义者的罪人和讽刺家的硬板凳上，他只会悠然躺在资产阶级舒适柔软的安乐椅上，做着一切社会阶级和谐一致的惬意而迷人的梦。当热中于调和的人沉醉在这种梦境中时，如果那些粗暴的黑色幽灵大喊大叫地从当代社会生活中冒出来，他就会大为不满。他希望到处都只看到令人愉快的阳光，因此他在阴暗的地方涂上鲜艳的色彩。他到处热心地美化现实画面，他的心思不是放在创作新的图画上。不是去创造新的环境，而是清除一些最突出的弊病，这就是资产阶级改革家的社会纲领。资产阶级改革家承认一部分工人的经济生活条件是艰难困苦的，那么好，这些工人尽可以去争取提高他们的工资，但是决不许他们反对工资制度本身。资产阶级改革家在理论上允许罢工，但是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支持、而且还反对罢工。而在这一方面的例外恰恰证明了这个规律。当少数几个热心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为汉堡码头工人募集捐款时，当时的资产阶级报刊发出了怎样的喊叫啊！根据我们的那些全权公民的观点，这种可以说一看就明白的人道主义行为只有完全堕落败坏的社会革命家才干得出来。因此，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生活安宁的、民族自由党的德国教授们好象是一些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恐怖政治活动家。我们可爱的祖国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成百次罢工，其中获得资产阶级同情和明确支持（后一情况当然还要更加困难得多）的罢工是屈指可数的。追求和谐的改革家总是希望社会各敌对党派和解，而不希望它们彼此斗争。善良的、好心肠的市民对待罢工的这种态度使我们突然看到，在资本主义生活观与社会主义生活观之间有一道令人头晕目眩的深渊。社会主义者由于具有经济学的知识，目光敏锐，他用这种目光观察社会对立时不会粉饰对立，而且要努力从实际上去根本消灭这些对立。在他看来，通过充分发展对立而使之消除，并不是一种令人深切悲痛的、无论如何要避免的因素，而是一种必要的促进文化的因素。经济斗争

和政治斗争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成强大的队伍，在群众中唤醒了一种热烈而生气勃勃的感情，即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一致的；还造成了所谓的阶级觉悟。明显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对立使无产阶级提高到对资本主义采取原则性对立的立场，却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超出当代经济界的水平，只能促使他去缓和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好吧，我们看到，伯恩施坦并没有抹杀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社会主义思想方式之间的原则对立。伯恩施坦全心全意、生气勃勃、热情积极地争取从经济上变革资本主义。他为新的经济进军擂起了战鼓，他要求建立大规模的、充满无产阶级精神的合作社，他向我们指出了一个广阔的、但还没有得到足够估价的战场，指出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这一场地。从伯恩施坦的书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斗争世界，传入我耳中的是铿锵的武器碰击声，而不是社会和平的笛子发出的窒息活力的靡靡之音。令人奇怪的是，另一些久经考验的同志没有和我一样从伯恩施坦的书中听到同样的声音。他们激烈地反对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社会改革思想。

例如，伯恩施坦建议成立和发展合作社。但是见鬼，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做的不就是这个吗？红色的变革者、勇敢而温柔的领主裁判所法官舒尔采-德里奇在消费合作商店里忙忙碌碌，出售香肠和黄油，现钱交易。一些目标明确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这样喊起来：这真是高度的革命行动！舒尔采还和他的敌人一样到工人中去，而且建立工会。表面上相似的努力各自获得的结果是：希尔施-敦克尔联合会^①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多么不同呵！毫不奇怪，这种区别显然是由于哺育了这两种运动的精神各有其特点而产生出来的。

如果两个目标明确的、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那么看吧，社会主义就在他们中间。真正的工人消

^① 指麦克斯·希尔施和古斯塔夫·敦克尔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创立的改良主义的德国工会联合会。——编者注

费合作社也不会缺少活跃在工会中的无产阶级精神。例如，在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工会中跳动着—个伟大的思想：工人必须对生产本身施加日益增长的巨大影响。资本主义作坊的专制国王不得不服从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会议。由于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日益增长，它给资产阶级的支配权力划定的界限愈来愈狭窄。在工作时间、工资等问题上，工会的干预越来越有力量。工会的伟大目标是统治生产本身。社会的从事生产的成员组织成工会，领导生产。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贯穿于无产阶级工会组织中的强烈的社会主义精神也正将存在于工人消费合作社中。在这里，社会主义精神的目标也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本身。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丝毫不了解这种精神，这位改革家完全是一位非常知足的家伙。他一贯自满，由于他曾使一些人在购买煤油和食油等等方面节省了几个银币而沾沾自喜。经济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的观点，有计划地组织消费的思想，永远不能进入他那狭隘的头脑。追求过得去的小康生活的小资产阶级理想时刻伴随着他。他怎么会去打扰他自己的骨肉同胞即小店主们，使他们不能安安静静地消化呢！应当让他们在和平中积铢累寸；消费合作社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满足—小批鞋匠和亚麻织工存钱的欲望。小资产者的胃口很小，他习惯于按照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方式消化—切东西。他把工会拿来咀嚼—番，使它转化成了希尔施—敦克尔工会和舒尔采—德里奇消费合作社。

如果伯恩施坦热情而激昂地让有社会主义阶级觉悟的工人牢牢记住建立消费合作社和合作企业，那么他就根本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

要不也许他是个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吧！那么，我们可爱的祖国语言实际上—定会由于—次新的巴比塔式的语言混乱而搅得—塌糊涂了。真正道地的小资产者是那些心情愉快、爱喝咖啡的萨克森人，他起劲地抱怨那些使中产阶级趋于消灭

的可怕的合作社，希望用营业税致它们于死地。难道现在应当突然把那位希望通过组织起来使小资产阶级从世界上消失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称为小资产者吗？这简直是在我们的语言中制造混乱！

现在谴责伯恩施坦是小资产者的并不就是最没有思想的人。因此，我们一再遇到这个重要问题：在伯恩施坦的思想和建议等等中，有哪些散发货真价实的小资产阶级气味？喔，这是因为他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改良工作，但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却谈得很含糊。也许伯恩施坦应当经常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几乎象是用扫帚把当笔来把它们大书特书，那就连目光最迟钝的人也能认出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了。这样用扫帚把大书特书是否合适，肯定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既然恩格斯已经——而且是正确地——称赞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厂是社会的企业，是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企业，那么当伯恩施坦特别强调消费合作社和与消费合作社紧密相连的合作化大企业是重要的、大有希望的未来图景时，难道能够恰恰因此去责备他吗？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行动，商品的生产方式将具有集体主义的性质，并与现在的个人主义的商品占有方式发生日益尖锐的对立。在以消费合作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合作化大企业中，社会主义内核毕竟要比在资本主义工厂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承认合作化企业具有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那就的确不能认为建立这种企业是可怜的社会改良工作了。相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越高，我们的神圣任务就越应当是有计划地发展这种合作化大企业。这样我们就建立了集体企业，有条不紊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建立这种合作企业难道不就是有意识地支持目前的朝着建立大企业方向前进的发展趋势吗！

也许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发现了社会主义萌芽的那位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以建立大工业的合作企业。他以此来

发展生产力，并从而大大地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和消除。他可以尽可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致触犯原则。他这样做就支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社会主义这一生长过程。他认为社会主义将用暴力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这种炸毁显然是经济的必然性；因为它是受黑格尔—马克思发现的一种独特的发展规律制约的。爱德华·伯恩斯坦不承认这个规律，因为这一点，而且主要是因为这一点，他被称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家。

马克思认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道路。”^①按照他的理论，本身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显示出一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其反面的奇特的转化。最可怕的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转化为它的反面，即社会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加重一无所有的群众所受的贫困、压迫和奴役，是通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贫困发展到极端，就产生它的最极端的对立面，即反抗贫困，最终消灭贫困。

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派有一次也谈到，对立的尖锐化将导致对立的自动消除。他们认为，任何琐碎的社会改革工作都会缓和与经济对立。这种以僵硬而片面的态度发挥到底的基本理论观点产生了如下的策略：反对议会制度，嘲笑一切争取劳动保护立法的努力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市侩庸人的做法，主张进行最粗暴、最直接、不受任何立法方面的改革活动削弱的阶级斗争。这种以片面的理论基础为根据的纲领看起来并不是没有某种彻底性。但是——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它的基础是否坚实牢固，不可推翻呢？难道我们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起发现了一个公式，经济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可以按照这一公式一劳永逸地完成吗？我们能利用这一公式控制一切历史进程吗？

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同生产资料的发展相联系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编者注

产资料越发展,生产力就越是迅猛发展,它就能够在更早炸毁生产关系的枷锁。从这些定理可以得出下面两个重要结论:首先,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按其性质来说,是多种多样的,这些矛盾的特性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发展。各个时期的矛盾的解决,即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的。如果把这些形式一概称之为革命,那就很少能说明它们的本质。这样笼统地含糊地使用革命这个词,它就根本表达不出什么东西了。其次,生产力越迅猛发展,社会革命的时期就一定越频繁,革命就越深入,越粗暴,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根据这一普遍的观点,一再预言将爆发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这第二个结论是普遍正确的话,那么英国就一定会是社会革命的真正中心。因此,应当对于英国生产力的惊人发展究竟会导致一次暴力的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还是一次决定性的、深入的社会改革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让真正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在这里发言吧。它们可以说出它们对于辩证的发展形式的意见。下一篇文章将让历史本身来说话。

发表于1899年4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899年第4期第147—152页。

拉·龚普洛维奇 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

(1899年4月)

一

几个月来，我一直焦急地盼望伯恩施坦的著作发表，后来又急不可耐地几乎一口气读完了它。这部著作确实做了我希望它做的事情，这就是：一次解放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学说原来想成为一次猛烈的突进的理论公式。但是由于它同事实相矛盾，本身又发生了分裂，它就越来越退化成为一种宿命论的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同社会民主党的票数日益增多的情况十分协调，但在其他方面，它对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活动都起着阻碍甚至麻痹的作用。在农业问题上，它使人们无法不带偏见地了解农民的情况，在城市问题上，它阻碍人们进行有计划的和目的明确的工作；恰恰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本来应当最强有力地起鼓舞作用的地方，也就是在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问题上，顽固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表明是最有害的。如果我们要把什么事归功于马克思的话，那么这肯定是他对于经济关系对整个社会生活所能施加的决定性影响的认识。但是，如果说德国工人的工会运动是如此可耻地支离破碎，合作社运动几乎刚刚开始，那么这一令人气愤的可悲状态多半要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怎么会舍得给这类“修补工作”讲一句鼓励的话呢，要知道它已经断言，大动乱完全会自行到来，即使不发生在1898年，那也一定会发生在1907年。在那以前怎样呢？在那以前，人们进行选举，或者自己竞选，发表勇敢的演说，或者听别人

发表勇敢的演说，——这肯定是十分有益的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单凭本身还远远不能起什么作用。

因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实践是过分耽于空想，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却是过分敌视理想的了。据他们说，社会主义同人的意志毫不相干，同人的正义感、同人的理想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小市民空想主义蠢话更加毫不相干。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自动产生出来的，它的体现者是无产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目光远大、意志坚强和道德高尚的人，也不是仅仅就他们是这样的人而言，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倒霉，做了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资奴隶。但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完成和自我克服，而这些都是自动实现的。或者，正如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此人整个说来相当糊涂）在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贴切的那样：当各族人民的皮被从头到脚剥了下来，然后又彬彬有礼地重新安上时，这张皮对于他们来说才会具有充分的价值。按照这种逻辑，马克思主义的贤人们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成了这样：日日夜夜小心翼翼地盯着看这个大有出息的剥皮过程是否在顺利地顺利进行。这样一来，对工人实际生活和从这种生活中自动萌发的发展可能性的热情洋溢的观察就被最抽象、最晦涩的国民经济学思辨所排斥——这种思辨是煞费思索的科学游戏，它那无穷尽的推论几乎象是对当前无比深重的苦难的嘲弄。

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充沛的健康力量，并且在群众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在这样一个党的运动中，当然不可能缺少反对学理主义顽固态度的有益的对抗倾向。这种对抗倾向常常是如此强大，以致学理主义者本人也受到它的影响，尤其在工会问题上是如此。但是，所有这些不再宿命地等待、而是积极地创造的社会主义的萌芽是零散地存在着的，一直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和一贯性。在早就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旁边，还经常继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果是杂乱无章和由于精力衰退而得过且过。

虽然在保尔·康普夫麦尔卓越的，就其简练明确来说几乎是经典性的著作《更多一点暴力！》中，新的合题实际上已经完成；但是人们似乎至今还很不看重这个有价值的礼物。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康普夫麦尔更多地是把批判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很好地加以整理并且作了综合的叙述，却没有详细地介绍这些研究本身。

但是这一次我们不仅要讨论成果，而且要讨论对理论基础的深刻的修正。而且，这位批判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弱点和矛盾的人，多年来曾经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学生。当他抡起斧头砍向他的导师建立起来并且他自己曾经长期保卫过的大厦时，人们从他踌躇不决的态度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他很不愿意这样做。实际上，他至今仍旧喜爱他所破坏的东西。这种破坏工作很有点精神自杀的味道。在这个上了年纪的倦于战斗的人那里，除了爱好真理外，恐怕很难发现别的什么动机，因此我们就更加深切地感谢他了。

凡是知道马克思主义并且读过伯恩斯坦著作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人，再也不会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这一次终于完结了。尽管可以批评书中的细节，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向作者指出，他对数字的解释有点轻率，甚至有计算上的错误。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有缺点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事实相矛盾，这种理论所作的预言已被事态迄今的发展所推翻——所有这一切在经过最精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家之一作了详尽的批判性的阐述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人会加以反驳了。人们企图对伯恩斯坦著作的这一部分提出的那些反对意见，只能证明他是多么正确。只要读一下《士瓦本哨兵》上那些空洞无比的遁词就不得不确信：一些整个说来十分聪明的人竟用这样的论据来为这个事业辩护，可见情况很糟了。

尤其是，伯恩斯坦促使崩溃论终于崩溃了，这是这种口头革命的清静无为的不幸理论完全罪有应得的。我们在进行政治

估计时,可以不再依据以下的观点:主要工业国家的资本家将会表明他们是自己本行中的笨拙的学徒,他们会锯断自己所坐的树枝,他们会招致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加学会预防的危机。如果我们希望资本主义从世界上消失,那么我们就必须动手把这种剥削从世界上消灭掉。

二

伯恩施坦是个勇敢的破坏者。他是否也能够创造呢?

让我们观察一下。他准确地看到,“农业问题、地方自治政策问题、合作社问题以及工商业权利的各种问题”,是党的纲领必须补充论述的问题。他比较坚决地肯定了独立的工会运动的权利和影响。他关于合作制的那一段话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他为村社争取强迫购买耕地用来向农业工人合作社出租的权利^①,这就卓有成效地修改了奥本海姆^②关于移民区合作社的观点。尽管如此,他的第四章没有给人留下满意的印象。

原因是,写这本书的是一位疲倦的人。这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过分亲密的人,他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可能不同时丧失自己的一部分进攻的劲头甚至抵抗力。伯恩施坦虽然装出一付桀骜不驯的样子,但是在这个假面具后面时常要漏出某种倦态,甚至几乎是怀念自由主义的温情脉脉的乡愁,其原因也许就在这里,社会主义最初是从自由主义产生的,这种说法也许是符合历史的;但是,在这类事情上,“我不能回到我妈妈的肚子里去”这句法国人的粗话对于一切愿意前进而不愿倒退的人都是适用的。如果在一切问题上都追随伯恩施坦,那当然就

①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29页。——编者注

② 弗兰茨·奥本海姆 (Franz Oppenheimer 1864—1943)——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主张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编者注

会意味着在一些问题上后退；固然不会退到已经夺取的阵地后面，但是毕竟要撤回一些长期以来已经得到明确阐述并且已经开始对当前的实际生活发生反作用的要求。

我在这里要特别谈一下伯恩斯坦在剥夺问题上的立场。他正确地强调指出，在这方面所要解决的困难与其说是政治性质的，远不如说是技术管理方面的。他指出，在我们的工业生活象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能通过议会法令仓促创立一个新的制度；不如说，必须无论如何在“大崩溃”之前做好绝大部分工作，也就是有组织地建设广泛的工人合作社，它们能够成为普遍推行社会主义生产时的结晶的核心——我衷心希望他的这些话能永远受到重视。但是，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制的前景并不因此就象伯恩斯坦描绘的那样坏。在伯恩斯坦那里，实行剥夺除了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以外，还有一个纯粹主观的困难，这就是作者缺乏幻想，连他自己都承认“从来不能读完任何一本描绘将来的书”^①。他没有看到，现在许多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由企业主或股东管理，而是由领薪的专家管理，而且也不能预先判断，为什么这些专家在为国家、市镇或合作社服务时，工作做得会不如为那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私人企业主服务时好。但是，当企业主同时也是技术方面的领导人时，那么在通常情况下，解雇他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把他的地位从一个不负责的工厂暴君转变为一个负责任的民主的公务员，这是当前首要的任务。

伯恩斯坦对技术困难的一切担心都不如他在原则上的不彻底性那样叫人不舒服。伯恩斯坦否定剥夺的权利。从字面上看，他当然是容许这种权利的，但只是在保证原来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权获得赔偿的条件下才容许。不过，要么社会主义是一句空话，要么这种获得赔偿的权利就不存在。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承认劳动是收入权利的唯一来源，无论是手工劳动

^① 参见本书第42页。——编者注

还是脑力劳动。^①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工作能力的人的唯一权利就是按照其能力而就业，按照其劳动而取酬。^② 显然，迄今不劳而获的人应当享有的也正是这种权利；他们怎样能办得到继续不劳而获呢？社会主义不承认不劳而获的权利。它在遇到这种所谓的权利的时候，总是把它看成不正当的。社会主义可能出于软弱或者出于宽大而暂时容忍它，但决不可能承认它。伯恩斯坦希望即使在胜利时也避免对迄今享有特权的人采取残暴专横的措施，因此他的人道主义是值得大加称颂的。但是，对资本家的舒适和安宁的这种富于人情味的考虑归根到底要受到更为有力得多的那些考虑的限制，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千百万人挨饿的世界。

当然这一切都是未来的幻想，伯恩斯坦看到，当资本主义这头熊还在毛皮十分完整地到处奔走时，我就如此热烈地为熊皮而同他争论，他也许会微笑。但是，伯恩斯坦在谈到未来时的过分谦虚对于他对目前问题的态度不是没有影响的。伯恩斯坦为了充分利用社会民主党的实力手段而劝告党采取果断的联盟政策，这是他的一大功绩，正象鼓舞人们积极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也是他的功绩一样。但是，人们是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而拥护这种联盟^③，还是出于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的同情

① 有人可能反对这种说法，认为现在大多数领取高薪的脑力劳动者（如工程师、教授等等）毕竟是凭借经济特权获得很高技能的，这种经济特权准许他们进行花费很高的学习，而很多天资也许高得多、但没有钱的青年却被排斥在外。这种看法很正确；但是甚至一个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也许要经过普遍实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后在第二代人中才能清除这个弊病。——龚普洛维奇注

② 当然这与用公共资金赡养老幼、病人和产妇的做法并不矛盾。所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收入在原则上可以看成一种保险金。这种保险金一部分记在已经付出的劳动的帐下，另一部分记在有待付出的劳动的帐下。——龚普洛维奇注

③ 保尔·顾普夫麦尔这样做，就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更多一点暴力》第34页）。——龚普洛维奇注

而拥护这种联盟，并且企图抹杀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分歧，这是有很大差别的，伯恩斯坦就是后一种情况。他给自由主义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以致一切争取自由的努力最后都被包括进去了。但是事实上，自由主义就其历史作用而言，是表示在财产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自由竞争。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自由”竞争是剥削的一个根源，也就是经济上的不自由的一个根源。因此我们摒弃它；既然我们要摒弃自由竞争而代之以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力的自由竞争，我们就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反对个别人获得在任意的规模上占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哪怕他是多么有天才的发明家也好；在这一方面我们实际上是希望，为了保护一切人的自由而创造一种“新的束缚”^①。如果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别企图把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要求混合起来，从而使他们过了时的纲领得到更新，这种努力是很值得尊敬的，但是我们却不需要因此就反过来去摹仿它。对于一个日薄西山的党来说，有意识的含混不清也许是使自己暂时不致灭亡的一种手段；但对于一个蒸蒸日上的党来说，明确性是必要的。

三

伯恩斯坦的伟大功绩主要是消极性的。与其说他开辟和走上了新的道路，不如说他用法术破除了那些想象出来的限制，这些限制看来一直封锁了实际上已向行进的军队开放的路线。他破除了对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这一奇迹的信仰，这种信仰迄今阻碍着这么多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不能通过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强的工人阶级来参与有计划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工作，甚至

^① 这是我对伯恩斯坦关于“社会主义不会创造任何类型的新的束缚”这句话（见《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00页。——编者注）的回答。——赛普洛维奇注

不肯开恩准许别人这样做^①，因此人们谴责他对自由主义的嗜好，却仍旧可以把他的著作当作社会主义新纪元的起点而加以欢迎。

简单扼要地说，这次争论的内容是：命运对抗意志。从我们不再把社会发展的戏剧看成谬尔纳^②之流的拙劣的命运悲剧的那一时刻起，就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它的拥护者的意志——并且取决于体现这一意志的勇于献身的精神、宣传鼓动的情、社会政治方面的判断力和组织方面的才干等等的程度。不用说，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会把发表这种意见的人看成“乌托邦主义者”，并且认为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在我看来，能够与社会主义的那些第一批伟大英雄相比，是一种奉承，而不是反驳。不仅我们今天在思想上还是以欧文主义和傅立叶主义为依据的，而且在实践上欧文主义和傅立叶主义至少可以部分地拿出很值得尊敬的成果来，它们那幸福的后果一直绵延到现在。为了简单起见，我这一次只提一下欧文主义与英国合作社运动的历史联系和傅立叶主义与公民投票在瑞士的发展之间的历史联系。但是撇开这些不谈，我倒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更象乌托邦；是傅立叶的柠檬水的海洋，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自动敲响的、经济革命的地狱之钟？

但是群众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这个意志当然要与牺牲他人使个人致富的意志区别开来）本身又是由一种认识即对社

① 参看伯恩施坦对考茨基的回答（1899年3月26日《前进报》）中的这几句话：“我的批判归根到底是针对什么呢？批判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反对这样的观点：把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工作都推迟到大崩溃之后去做，并且根据这一事件必然发生的观点去判断在它以前应当开展的活动。……实际的发展把愈来愈多的、过去期待‘遥远的未来’去实现的事情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使社会民主党愈来愈有理由进行所谓细小工作，而这种细小工作实际上是很伟大和很重要的。”——龚普洛维奇注

② 亚马多·哥特弗利德·阿道夫·缪尔纳(Amandus Gottfried Adolf Müllner 1774—1829)——德国戏剧家和文学评论家，写有许多宣扬宿命论思想的悲剧。——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权利观的理解而产生出来的。伯恩斯坦一再接触到这条思路^①。但是他坚持这条思路还不够彻底。他在反驳普列汉诺夫时，援引了恩格斯的一个观点说，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②时，人民才会成熟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但是谁既然已经站在权利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就不应当再利用这类论据了。那种认为原始的生产技术给实现社会主义造成的经济困难比高度发展的生产技术所造成的困难要更多的观点，是一个彻头彻尾武断的假定。让我们假设这样的情况：如果爱尔兰至今仍是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的国家，居住着一百万户佃农，他们按照原始的祖传的规矩自己干全部农活，却不得不把他们的一半收获作为实物地租上交给五百个在外的地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废除这种地租也完全同废除柏林西区的厂主、商业顾问、银行家和食利者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一样是社会主义的纲领，——并且没有一丝一毫乌托邦的性质，相反，恰恰是后一种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就在地主来说，他是寄生虫，并且仅仅是个寄生虫而已，这一点是很明白的；相反，就现在的厂主和商人来说，他们的收入中究竟有多少可以被看成垄断利润，有多少必须被看成付给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活动的正当工资，这一点常常是很难判断的。

中世纪的经济史——这是就它的实际情况来说，而不是就我们从种种马克思主义入门书中所读到的那种情况来说——也足够清楚地证明：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先决条件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现代化的东西。在十三世纪的德国，农村的每一个

① 3月26日的回答中说得最明确：“如果由于纯经济的原因而发生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发展所采取的道路就必须是确定的，但是发展在许多方面所采取的道路并不是这样。那么根据经济的必然性来推论出社会主义又有什么意思呢？贬低人的理智、正义感和意志又有什么意思呢？”

——龚普洛维奇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编者注

家主都是自由的农民，城市的每一个熟练的手工工人都是独立的师傅——那个时候的德国同今天存在着工厂奴役制、大地产不法行为、农村的仆役条例和大城市的大量娼妓的德国比起来，它所具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要多得多。经济历史恰恰没有表现出持续的向上发展，而是繁荣时期与衰落时期杂乱地交替着。如果我们不是坚强有力和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那么恰恰在我们的时代就可能出现所有萧条时期中最糟糕的一次——请看一看托拉斯吧。

如果我们不顾一切痛苦的经验，不顾关于当代的贫困和耻辱的一切令人意气消沉的见闻，仍旧坚定地抱着希望，认为目前存在的社会主义萌芽不会枯萎，而是会胜利地发展壮大；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十九世纪一切精巧的技术、一切完美的科学艺术同十三世纪公正的商品分配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先驱，那么使我们有权利抱这种希望的并不是我们时代的经济特点，而是它的精神特点。我们这个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有觉悟的时代。今天，千百万人之间散发着无数互相了解和协调的火花，它们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到处飞翔。从前斯瓦比亚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赫部部队和湖部部队步调不一致。但是今天，欧洲、美洲、日本、南非和澳洲的工人们互相写信和寄送报纸、派遣代表和支援罢工经费。每一条新的铁路，每一条新的轮船航线，每一条新的电报线路，都使我们更加可以希望把我们的整个文化圈内劳动人民的分散的反抗倾向融合成一个强大的集体意志，即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这些因素当然也能使资本家的互相了解更加容易实现；我们高度发展的通讯技术正好“为双方的军队加速提供武器”。但是没有一种能促使敌对的资产阶级集团合并成一个阵营的伦理上的动力。凡是在把个人的掠夺利益看作联盟的唯一目的地方，只要背信弃义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背信弃义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行动方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宗教是不可能的。相反，社会主

义当然包含着发展成为社会的世界宗教的素质。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这就是，在今后的几十年间，社会主义将不会始终仅仅是象星期日说教这样的每重复一次就更加陈旧和更加乏味的空话，它将成为实际的生活和创造活动的主旋律。由此可见，必须日复一日地向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提供进行实际的社会主义活动的机会。在一切工业发达并且工人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中，工会是进行这种活动的最自然和最必要的战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会作为牢固的基础，就只能五色缤纷的空中楼阁，随便来一阵风就会把它吹倒。不过工会运动必须一方面从政治活动和地方行政活动得到补充，另一方面必须从合作社运动得到补充。

这是一些枯燥的口号，但是在了解情况的人看来，它们意味着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姑且假定（不用说这仅仅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这些前提已接近实现。我们首先假定，在国家和市镇中已有足够数目的社会主义代表通过多年来的尽可能建设性的合作实际通晓了最重要的管理问题。我们进一步设想，大多数雇佣工人已联合成具有充分的失业保险和大量罢工基金的准备战斗的工会。我们再进一步假定，在一切工业中心已有强大的消费合作社，它们与农民的销售合作社联合起来掌握了工人阶级不可缺少全部生活资料的销售和其中大部分的生产。我们再进一步设想，通过把强大的房客联合会同广泛的住宅合作社联合起来的办法，城市房主的专制主义受到了限制。最后我们设想，军队里已经渗透进去这么多的社会主义分子，以致于实际上已经不能指望使用它来镇压“国内敌人”。那就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工人阶级凭借自己的力量导致的一场危机将绰绰有余地代替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运动将自动产生世界危机的那种骗人的梦想。但是这种危机会有一个名称：总罢工。总罢工过去常常被一些口头革命家拿出来卖弄

炫耀，然而今后它仍将能够成为一次胜利的决定性斗争的口号。

发表于1899年4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899年第4期第152—160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附抄件）

1899年8月3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爱德给我写了封长信，除了谈别的事外，对你要求他继续撰稿的事发牢骚。现将我对他信中这一部分的答复抄一份附上。这个人这么不明白他的处境，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这封信里还有另一些稀奇古怪的说法，例如说我们（我和他）已在去年秋天的通信中就政治分歧取得了谅解。对此我却是一无所知。还有，据说是我在去年秋天用声明欺骗了他，关于这件事我也向他明确解释了我的观点。

.....

今天我收到博尼埃^①一封信，我们这里十足的“德雷福斯派”使得他大动肝火，他问我是否看出德雷福斯事件和伯恩施坦事件是一回事。我对他说，我不明白这种联系，我完全同意星期二《前进报》上你那篇文章^②的观点^{*}，并且希望他们大会上的大多数人公平对待饶勒斯。他们应当求得一致，否则国际代表大会^③就不会有什么成果。再次上演1889年的把戏^④，我们可不想看。

① 沙尔·博尼埃（Charles Bonnier生于1863年）——法国社会党员，盖得的亲密合作者。——编者注

② 指考茨基1899年7月26日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题为《饶勒斯的策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考茨基还有一封致饶勒斯的信发表在《小共和国报》上，信中说：“您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拯救了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我在此向您表示由衷的钦佩。”——编者注

③ 第二国际曾决定于1899年召开大会，后延期。——编者注

④ 1889年法国可能派掀起运动，目的在于破坏当年7月14日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亦即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编者注

老头^①的声明使他自己大大丢脸，他愈老，愈是矛盾百出，简直令人惋惜。使我特别开心的是帕尔乌斯如此卖力地为巴伐利亚人辩护^②，这个人今后再也没有资格谈论社会革命了。

上星期我在斯图加特待了几天，克拉拉的病情稍有好转，医生认为手术可望顺利通过。狄茨抱怨《新时代》上的笔战没完没了，他想知道会怎么对待爱德，我对他的回答和对爱德的一样。

.....

你的 奥·倍倍尔

* 除开会引起误解的一般地论述妥协的那几句话。

附：奥·倍倍尔致爱·伯恩施坦（抄件）

1899年8月3日

你和卡尔之间——这样说是为了限制在一定的人身上——的意见分歧很多，在社会运动中没有任何重要问题是你们没有分歧的。这没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两个象你们这样在基本观点上如此不同的人，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其结果必然是不断进行笔战。可是长此下去，没有一家报纸受得了，因为读者对这类笔战厌倦了。这类笔战每一次都是越来越离题万里，每一个人都尽最大的可能用犀利的话来阐明他的不同观点，越来越拉扯到旁的问题上去，弄到后来再也没有人明白争论的中心是什么，读者就把报扔到一边去了。

单从这点来看，笔战也应当有个终结。但是要真正做到不致老是重开笔战，你就必须选定一些不存在意见分歧的领域来写稿。因此必须在这一点上达成谅解。如果你不愿忍受这种限制，你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指帕尔乌斯在《慕尼黑邮报》上为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就选区问题与反动的中央党达成协议一事辩护。——编者注

必须容许卡尔享有他所要求的权利。因为照我看来，编辑部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我还认为，卡尔对待你并不比对其他撰稿人更差，对我也不例外。而且据我估计，他没有别的意思。你设身处地替卡尔想想就会发现，你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15—118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899年9月3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祝贺你反驳伯恩斯坦的小册子^①，很出色，它严厉地谴责了爱德。爱德读了之后大概会明白，不可能和你继续合作下去了。不过如果他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也会看到自己已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邪路。

我现在手里有你的小册子的八个印张，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什么意见或补充。我关心的只是使它尽快出版，好对党代表大会^②起作用。我在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加以推荐。

寄上我的决议草案^③，写是早就写完了，但是我要在估计你写完小册子以后才寄给你。

请严格地审阅一下草案并来信告诉我，你有哪些意见。但是我迫切地请求你，你的回答至迟在星期四要寄到我手里，那时我必须把草案立即寄往柏林，因为下星期党的领导人要开会。我有可能到那里去一两天参加这个会。

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希望你们也一样。

① 指《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出版于1899年9月。——编者注

② 指1899年10月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编者注

③ 为汉诺威代表大会写的。参见本书第281—282页。——编者注

我们想10月2日从这里动身，我3日上午就可以到达那里了。

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奥·倍倍尔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18—119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①

1899年9月9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你碰见什么鬼了，在“纲领的措辞”^②部分对爱德作了那么多让步？这样一来就大大削弱了你的著作给人的印象，而且你推翻你自己同意的我的决议，把我的计划毁得好苦。

我的提案中说：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修改纲领。可是原则条文的作者^③却跑来同意作一系列的改动。你容许改动的地方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动，而且是实质上的改动。我丝毫不反对这些改动，但是现在提出这些改动，就意味着伯恩施坦的一个胜利和我们特别是你的一次失败。要是你早一些同意改动，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而如今事到临头来作改动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迫切地请求你修改有关部分。我拟删去154页上以“人们认为这是必须的”等等话开头的倒数第二段。同样，我想155页的第一段至少要修改一下。这个地方会使我们的对手

① 倍倍尔于同一天还发了一个电报给考茨基，电文是：“小册子的纲领部分不要，详见信。”——编者注

② 指考茨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的第2章第9节。——编者注

③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的起草人。——编者注

认为你放弃了贫困化理论。因此我还拟删去第二段中以“特别精确的”等等开头的关于纲领的提案。

我拟修改156页的第三段（这一段的开头几个字是“第四段”）。照现在这个样子，这一段在粗略阅读时给人以作了让步的印象。对157页上第3段，我拟删去“但是谨慎的想法应当”等话。与此相应，下面紧接着的几句也必须修改。

不得不作这样的改动是令人不快的，因为你没有把握说不会泄露出去，但是反正一样，一定要修改。

请你设想一下：在我说明了我的决议之后，难道不会跑上一个人来根据你的著作建议修改纲领吗？那可是一件妙事。

我们在几年后肯定要作修改和补充，但是现在却为时过早。

请用明信片告诉我你是否收到了我的信。

向你热情问好。

奥·倍倍尔

如果你把有关部分中上面所提到的段落整个改写一下，那就最好不过了。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20—121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899年9月11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我的信这时候将到你手中了，但愿你看了信后下决心进行我所希望的修改。你要是不这样做，我将非常遗憾，事情的结果将表明我是正确的。

我也是经过认真的、客观的研究才认识到我们丝毫没有理由匆匆忙忙去修改纲领。

不仅仅是工联大会的主席^①否定了爱德的看法，就是巴恩斯^②在奥格斯堡谈到英国机器制造业工人时也承认，英国的持有阶级斗争观点的工人是在增加。由于一份费边社宣传品的启发，连爱德自己也在昨天的《苏黎世邮报》上的一篇通讯中承认了一些同他的书相矛盾的事实。例如其中谈到，绝大多数啤酒酒店是大酿造厂的附属店，许多小面包作坊同使用蒸气的大面粉厂和面粉进口公司的关系也相类似等等。

我当然要在哥达^③使他痛切地认识到这些地方。

.....

奥艾尔来信说，他将投票赞成决议，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出决议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

我回答他说，这是不言而喻的。辛格尔和李卜克内西可能会因为有关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一节而更加不满。^④

你也许已从报上看到，布勒斯劳的伯恩施坦分子在布鲁恩斯^⑤的领导下通过决议表示坚持纲领和策略。这是向你又一次示意。如果决议的第三段不与此相抵触的话，它将顺利地一致通过。辩论也就不会太广泛。

我想劝你无论如何要参加辩论。你以报告人身份还是以发言人身份出现，我认为是有区别的。如果当报告人，在争论中你

① 伍·吉·戴维斯 (W.J.Davis 1848—1923) ——英国金属工人，当时的工联大会主席。——编者注

② 乔治·巴恩斯 (George Barnes 1859—1940) ——英国机械工人联合会总书记，议员。——编者注

③ 这恐怕是倍倍尔的笔误。应当指1899年10月在汉诺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编者注

④ 参见本书第249、282—283页。——编者注

⑤ 尤利乌斯·布鲁恩斯 (Julius Bruhns 1860—1927) ——国会议员，布勒斯劳报编辑。——编者注

就是带头的,并且可以说是领导人,这可能使对方不快。

.....

你的 奥·倍倍尔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21—123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摘录)

1899年9月13日〔于苏黎世〕

亲爱的卡:

我很高兴,你改写了最后一章,我也同意你改了标题。现在的标题听起来更尖锐,也更严峻了。

前言不错,特别是结尾^①。

.....

奥·倍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23页。

① 考茨基的《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的前言的最后几句是：“但是，我们不应当由于存在对立就闭眼不看伯恩施坦过去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个人从他那里获益不浅，他不仅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的工作中给我们大家以鼓舞和教诲，而且也在多年来亲密无间的合作中给我们以强有力的精神上的推动。如果我能够做到在下面的篇章中提出充分的论据来反驳伯恩施坦现在的观点，那么这不仅要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也要归功于伯恩施坦。”（1899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8页）——编者注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899年9月22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

刚才收到从斯图加特寄来的你的文章^①，我完全同意。它是你的著作^②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又是党代表大会的一首合适的序曲。爱德现在可要腻烦死了。

向你热情问好。

奥·倍

证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24页。

① 《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发表于《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1期第11—19页，见本书第171—180页。——编者注

② 《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编者注

卡·考茨基 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摘录）

（1899年9月）

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基本上和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相同。和爱尔福特一样，这次代表大会必须主要讨论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大会应当审查爱尔福特确定下来的东西并决定是否有必要改变。

但是1899年大会和1891年大会之间也仅仅在任务方面是一致的。爱尔福特大会之前，党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其严重程度甚至使了解我们党的那些比较冷静的、有经验的专家都曾考虑过分裂的可能性。可是今天却连我们那些经常在这一季节热中于预言社会民主党即将发生分裂的敌人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那时的形势和今天也是截然不同的。那时在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以后正开始出现经济萧条，而今天我们却处在前所未有的经济高涨的顶点。就是这一点今天已促使群众对于眼前的有关经济组织的问题远比对于有关一种看得更远的政策的问题更为关心。那时看来党在政治上飞速前进的时期到来了，二月敕令^①使许多人盼望政府的政策有一个决定性的改变；俾斯麦垮台了；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当时看来，重要的是为进军作好准备。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进军，是坚持旧日的策略还是采取福尔马尔倡议的新策略，或者用“青年派”——从那时以来他们很快地变老了——为之喧嚷一时的策略，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现实问题。

今天我们面对着苦役监禁法。不管我们策略上和纲领上的

^① 由于不断发生工人罢工，德皇于1890年2月5日发布两道欺骗性的敕令，答应修改工人保护法和召开国际工人保护会议。——编者注

分歧有多么大，不管汉诺威的辩论将是多么激烈，都几乎不会使我们最近时期的实际斗争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但是，虽说今天的形势远不如1891年那么紧张和充满山雨欲来之势，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却不会因此而变得不重要。

大概策略问题将提到首位。其次才会涉及我们的纲领。没有提出关于修改纲领的明确的建议，连伯恩施坦本人也没有提。席佩耳也没有提出要改写我们的纲领的第三条。

另一方面，对于“宗教裁判”和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的想法，就连最激烈反对伯恩施坦的人也是坚决不同意的。一般说来，应当让每一个党员自己决定他是否还站在党的立场上。开除只是用来对付那些损害党的分子，一贯高度重视辩论自由的社会民主党还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进行了纯粹客观的批评就把他开除出党。即使伯恩施坦对于我们的事业没有作过这么巨大的贡献，即使他没有由于从事党的活动而被迫流亡，也谈不上开除他。

如果说尽管这样我们的原则问题恐怕仍然会成为汉诺威大会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这与其说是由于考虑到伯恩施坦和席佩耳，不如说是由于考虑到我们的敌人。敌人把伯恩施坦的书看成是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认为自由主义思想也进入社会民主党了；他们认为这本书不仅全面背离了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条或那一条的措辞，而且全面背离了整个社会主义。甚至对伯恩施坦十分同情的、冷静的观察家也是这样来理解他的阐述的。这么一来，席佩耳-伊塞格里姆的捣乱^①也被看成是社会民主党日益倾向于军国主义的脱毛的标志。

无论关于这方面人们会怎样想，有一点是肯定的，举世都在期待党代表大会在以下问题上明确表示态度：党员是否仍然坚

^① 麦克斯·席佩耳于1898年11月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以“伊塞格里姆”为笔名发表《恩格斯是相信民兵的吗？》一文，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政策。——编者注

持他们八年前所持的原则立场；社会民主党是否仍然相信自己，也就是说相信它的社会主义的使命；党是否仍然深信经济发展给它指出的目标同它所抱定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和纲领问题相比，大会可能要远为更多地研究策略问题。这里涉及的不是一本小册子或者是一篇文章任意提出的问题，而是政治发展本身迫使我们考虑的问题，首先是当前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在研究的那一问题：确定我们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迅速衰落，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同样迅速地强大起来，与之相对，反动潮流也同时高涨起来，在这一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怎样在实践中最好地运用它所获得的巨大力量，它是否能够和应当与资产阶级当中的民主分子和自由主义分子合作以及应当怎样合作，以便不让反动派占优势，这一问题到处都提出来了。与此相适应，我们看到在比利时，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组成了选举同盟；在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互相接近，在西班牙也是这样；在法国，甚至有一个社会党员部长进入了自由主义的内阁；在德国，各个地方都出现了选举妥协的问题。

.....

我们可以有三种策略。第一是继续采取我们迄今执行的策略：社会民主党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它致力于启发、教育、组织无产阶级，利用各种现有的手段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夺取每一个已适合夺取的阵地，这样来使无产阶级获得力量和成熟起来，并终于能够夺取政权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样做绝不排斥《共产党宣言》就已强调的策略：在需要进行反对共同的反动敌人的斗争时，社会民主党可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且与之合作。

这种策略充分适应各种极不相同的条件，它也不排斥选举同盟，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使这种同盟成为必不可少的。

反对这种策略的人认为，这种策略没有考虑到资产阶级民

主派已在衰落。他们认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掌握政权；在最近时期，民主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有统治能力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党去实行。但是只要社会民主党坚持刚才叙述的那种策略，这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吓退资产阶级并把他们赶进反动派的怀抱。所以社会民主党必须停止宣布他们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它必须只限于要求在现存社会的范围内进行改良。这么一来，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会重新信任无产阶级，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出现，它将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并且开辟畅行无阻的道路，使无产阶级从此能够安静和平地前进。

我们不能明确地说这就是伯恩施坦的观点，因为他根本不让人明确地抓住他的观点。不过无论如何他的许多意见是和这种策略一致的，否则这些意见就难以理解了。虽然如此，党代表大会未必会很多地研究这种策略，因为就我们所知，在德国没有一个地方存在着这种策略所必需的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复活力量的信任。

当君权神授说显得和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相容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拿出勇气和力量来同它一刀两断。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和君权神授说妥协并且已经获得了他们的利益，难道他们反而敢于认真地对它发起进攻了吗？

如果资产阶级对个人专制哪怕有一星半点的威胁，容克们目前就不会这样拼命地鼓吹立宪主义。

我们姑且假定一夜之间发生了奇迹，我们有了一个资产阶级激进党，这个党决心竭尽全力去争取人民的主权。可是它从哪儿取得这样做的力量呢？

非常遗憾，我们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我们党吸收新生力量的最好的地区是各工业省份，而这也恰好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汲取力量的地区。虽然我们党也进入了一些农业地区，而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成功地夺得了一些小农地区，然而，每一种激进的

运动——不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的重点仍然在城市和工业地区。因此社会民主党的扩展主要是靠牺牲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来实现的。这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为了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本来更加需要首先夺取最反动的地区，最后才夺取进步地区，但是尽管这是多么必要，事实的逻辑却采取了相反的道路。

选举协议改变不了这些情况。在我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地方，没有人会提议搞选举协议。虽然我们今天因为自己还不能进入决选而在一次复选中投票支持一个进步党人，但我们毕竟要努力争取使自己在下一次取代进步党人。

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激进党和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前者强大，后者就衰弱，反过来也是如此。为在德国有可能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不但必须放弃“贪食奇谈”，而且还必须放弃自己本身的存在。

由此可见，就算今天无产阶级愿意自觉地做它在1848年曾经不自觉地做过的事，也就是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帮助他们取得政权，那也缺少一个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掌握统治权力的资产阶级激进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是几乎完全一致的，我相信没有人反对我这样说。我们之中再没有人相信德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战斗力。

如果说尽管这样伯恩斯坦在策略方面的一些暗示仍旧有时在党内得到响应，那么这是由于它们给第三种策略提供了论据，而第三种策略现在还可以考虑，它在我们的队伍里比刚才提到的那种策略有更多的基础。

伯恩斯坦自己有一次承认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今天没有力量”在德国争取到民主。缺少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激进党。“社会民主党代替了资产阶级激进党，社会

民主党准备好并下决心去承担它的任务，它比资产阶级激进党更有活动能力，但是没有它那种适应的能力。”

没有适应的能力，适应什么？问题就在这里。伯恩斯坦恐怕不是想说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适应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变化不定的环境，要知道这样说就意味着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生命力。我们并不是一味蛮干，我们处处都考虑到现实的环境而去适应它。那么凭什么说我们缺乏适应能力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出色地具备这种能力呢？

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决定它仅仅缺少一种适应能力：它不能够适应有产阶级的需要。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既然我们再也不能够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既然社会民主党始终不能够适应有产阶级的需要，那么德国只要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可能出现民主的政体。

我已经在斯图加特针对伯恩斯坦发表过这种观点：“我们这里只有一种民主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我们也许还能够利用资产阶级青年时代的民主残余，但是资产阶级争取新的民主权利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伯恩斯坦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取得民主，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无产阶级引到胜利，那么我要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我们这里，民主的胜利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我承认，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是不容易发展的。我承认，英国无产阶级所走的道路是较好的，它要求的牺牲较少，我们必须希望我们能走同样的道路；但是历史的进程不是由虔诚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事实决定的”^①。

但是虔诚的愿望也会产生影响，即使影响不了历史的进程，

^① 见本书第48页。——编者注

却也能影响一些人的精神境界。所有那些渴望民主早日胜利、而又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心怀恐惧、或者认为无产阶级的统治不可能实现的民主分子，将被迫不顾一切地去寻找一些和社会民主党迄今所走的道路不同的途径，走向哪怕不是民主的、至少也还是立宪的政体。但是既然不再能指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会强大起来，那就只有使社会民主党具有适应能力，至少是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的需要。

因此这不仅仅是谴责人们使用一种可能吓跑资产阶级的语言，而且是低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强调同一个国家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利益的和谐一致。席佩耳在斯图加特作支持保护关税的发言时说过：“工人并不单纯是消费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工业的每一次即使起初是人为地促成的扩展的参与者。工业的高度发展这个最终目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切。小额的价格波动和价格上涨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工人不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而是以今天的生产机体的参与者的身份来对此进行判断的。”

换句话说，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就是对于全体来说，工人是资本家的合伙人。不是全体消费者靠工人的生产活着，而是工人靠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活着。面对全体，工人和资本家有着共同利益。工人和资本家一起剥削消费者。

还有，对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权力手段和扩张欲望妥协，向常备军和殖民政策献媚，努力使无产阶级对自己掌握政权感到害怕，这些也都包括在适应能力之内。

再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来完成民主事业了，自从这一点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以来，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本身的有远见的拥护者们开始致力于或者赋予资产阶级民主以社会的内容，使其对无产阶级更有吸引力，或者是建立一个和社会民主党竞争的民族社会党，从而组成一个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适应能力结合起来的党。但是民主派资产阶级的这种“迎

合的”姿态至今还很少得到无产阶级的回报，首先是由于这些资产阶级的工人之友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其次是由于甚至这些将军们在需要作出抉择的关键时刻就显示出自己是一些很靠不住的家伙。

因此这些分子就更加感觉到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社会民主党的“脱毛”上，他们希望社会民主党队伍里的有适应能力并且需要适应的流派能够壮大起来。

也许可以把这样一种倾向于适应的流派称为人民党流派，因为这个流派最终会使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党变成一个各民主人民阶层的党，虽然无产阶级在这个党内终究还处于首要地位。无产阶级流派和人民党流派之间的区别不应当归结为单纯性格方面的区别。在我们党内，当然和在任何其他政党内一样，早已存在着性格上、理解上、环境上的区别和对立。在我们的队伍里一直存在着谨慎的人和急躁的人、宽容的人和偏狭的人、温和派和激进派。无产阶级流派和人民党流派的区别也不是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区别（因为我们发现两个阵营中都有这两种人），或者是社会改良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区别。也许伯恩斯坦分子对我们党所做的最坏的事就是他们使得我们的敌人更加相信，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不要社会改良，而是象懒汉等待烤熟了的鸽子飞进嘴里那样等待社会革命从天而降。

不，从根本上说，两个流派之间的对立是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阶级政策和非独立自主的阶级政策之间的对立。如果两个流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那么汉诺威党代表大会面临的决定性问题就会是：社会民主党应当仍然是坚决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还是应当使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与之相应的目的服从各个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民阶层的共同利益。

但是，即将到来的党代表大会在讨论纲领和一般的策略时看来不会遇到这个决定性问题。

上面谈到在社会民主党内有一个人民党流派，这实际上是说得过分了。严格地说，我们只能说党内存在一种人民党的情绪，这种情绪有时流露出来，对于鲜明地表现出我党严峻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个别行动和理论非常直率地表示不满，但是这种情绪还没有集中成确定的、互相联系的要求与建议，反而总是强调说，它实际上并不希望发生什么改变。

我们不需要在这儿研究心理学；不需要探讨这种克制态度是从何而来的，是由于感到软弱，还是由于对自己的观点的结论有所顾虑，还是由于这种情绪至今只是对于我们党的基本原则的这一条或那一条有所怀疑，却还没有发展到明确制定新的基本原则。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流派的天然结果即暧昧性助长了这种克制态度。

.....

尽管不要指望我们党内会形成明确的人民党流派，但毕竟可能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一股程度不同的模糊的人民党情绪，而这股情绪是否得到鼓励，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同党的当前策略对立的，它表现得愈强烈，就必然愈是由于这种对立而成为不和的因素，必然愈是增加党这架机器内部的摩擦力，必然愈是要求党员为了克服这种摩擦力而付出时间和精力——这是白白付出的，因为这股情绪的零星爆发不能带来实际的结果。

我们面临的实际任务：斗争任务、组织任务、宣传任务都大大增加了，而我们所拥有的力量却很有限，因此我们不应该大手大脚地把力量浪费在无益的摩擦上，还有够多的无法避免的具体问题要我们讨论，我们不必担心由于我们不对情绪和怀疑进行争论而僵化成教派。

我们队伍中的人民党情绪是会加强还是会削弱，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得不担心最近几年内将毫无实际结果地继续进行、甚至加剧内部的口角和争吵，还是可以期望我们重新团结一致地

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于和“外部敌人”（我们的外部敌人）进行斗争，这一切都取决于即将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进程。

如果除了斗争之外还继续进行科学探讨，那就更好。但是只要科学探讨还停留在空洞的怀疑和担心的阶段，又提不出积极的建议和要求，就不要向党提出。怀疑态度可以形成十分伟大的哲学力量，而在政治上，一个政党对于自己及其事业的怀疑却意味着它的破产。

发表于1899年9月。译自《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1期第11—19页。

奥·倍倍尔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
代表大会上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
策略立场的攻击”的报告

(1899年10月10日)

同志们！我们刚刚开始这场争论对党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党从建立以来就一直进行着关于纲领和策略的讨论。这些讨论每一次都在敌人心里唤起希望，使他们认为这一次我们要发生分裂了。我们过去有这样的讨论，而且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今后还会有这样的讨论，这是我党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

我党的目标是把社会改造成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象我们这样的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途径是密切注意经济生活的变化，并且根据这种变化给党提供的事实材料来检查自己关于这个社会本质的基本观点。我以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思想上的脱毛过程中。这句话不仅遭到我们敌人的嘲笑，而且遭到我们一部分朋友的嘲笑；尽管如此，这却是真实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想完全抛弃我党的本质的话。我们忠实地履行了不断观察经济现象的任务，在最近三十年内三次对我们纲领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改动。例如，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论点，拉萨尔认为这一论点非常重要，他声明，每一个想要加入你们^①的人都必须表明他对铁的工资规律的态度。又如，哥达统一纲领中的一个论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还有，关于反动的一帮这句话。最后还有，我们还把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必要性写进了好几个纲领，这是旧

^①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的拉萨尔纲领的回想。这个要求我们现在也已经放弃了。

考虑到所有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提醒同志们在报纸上和会议上展开讨论时不要搞宗教裁判。宗教裁判的前提是我们有教条。但是，如果有哪个党是没有教条的话，那就是社会民主党，如果有人曾经坚决反对教条作风并且把它从我们头脑中清除出去的话，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他们今天被某些方面的人不公平地称作教条作风的代表。我们这里没有教条，因此也没有宗教裁判。我们党根据自己的纲领把取消对言论自由的一切限制列为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提出的最近要求之一，如果它不想把它向现存社会要求的东西给予自己的同志，那它就会陷入非常奇特的自相矛盾中。自由批评的权利是我们无可争议的要求。批评也许会使我们不舒服，批评总是使人不舒服的，因为无论人们还是政党都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必须先出现一系列情况，个别人的乃至广大群众的判断才会改正。批评自由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尤其使我感到不愉快的是，人们在卡尔斯卢厄甚至通过了一个关于党代表大会不应当损害党的尊严的决议。制定这个决议的人们一定是对党的运动非常缺乏经验，要不就是，他们一定没有充分注意党的运动；否则，他们会知道，尽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了最激烈的斗争，但我们从未忘记过我们的尊严，这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惊讶，甚至有些恐惧。当然，要在这里为那个决议辩护的那位卡尔斯卢厄代表，当他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由于自己的行为受到谴责时，曾经自称是巴登的老粗。如果卡尔斯卢厄的同志们打算用这个决议指示他怎样行动：这次不要当老粗，维护你的尊严吧，——那么我是丝毫不反对这种决议的。

这次关于纲领的争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涉及的范围甚广，而且中心人物是一个我们大家要非常感谢的人，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为党立下了

很大的功劳,由于这些功劳,他至今还受到尊重,他一直当之无愧地享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附带说一下,如果卡尔·马克思还活着,那就没有人比他本人更加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说法了。很久以来,伯恩斯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一大批文章,为他的和以前不同的理论观点作辩护,这些观点整个说来没有受到十分重视,而是受到各方面的十分激烈的攻击。他预料上届代表大会将对他的观点展开讨论,因此请求我宣读关于他的立场的一个声明;我照办了。于是,党内对这个问题逐渐展开了一场很热烈的辩论。我本人在一封信中极其直率地向他说出了我对他的转变的看法。当有人建议他写一本小册子时,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但是当他抱怨说他被人误解时,我写信对他说,那就请你把小册子写得非常清楚、明确、准确,使别人无法对你误解,除非别人一定要误解你。就这一方面说,伯恩斯坦的著作使我大失所望。我粗略地读了一下后就确信,他完全没有听从我关于准确性和明确性的善意劝告。如果在党的文献中出现过某种反对党的全部基本观点并且是以极其含糊和矛盾百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伯恩斯坦的这本小册子。然而,他想要什么,在这本小册子里终究说出来了。

现在谈一谈我是怎样理解我的任务的。关于伯恩斯坦观点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年,考茨基的著名著作^①可以说是使这场讨论暂时告一段落。许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为此发表了无数文章。因此很明显,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在讨论过程中已经谈过的许多内容。要在这里说出什么新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全面总结一下,论述一下反对伯恩斯坦的理由,为讨论打下基础。

伯恩斯坦认为自己是在澄清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学说,并认为:“有理由反对马克思的人,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② 但

^① 《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编者注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66页。——编者注

是，他最后竟然说，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如果一个人在科学态度方面受到他的批评家这样批评：“你写的是一大堆如此含糊不清、矛盾百出的东西，人们可以用这篇文章证明一切”——那么这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尖锐的评语了。伯恩斯坦在他的书的序言中说，他并不总是能成功地做到选择最为贴切地表达他的思想的形式和论据。我对于这句话特别感到遗憾，因为，尽管他也许还认为，由于他从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他必须对他们保持尊敬，但是，如果他开始创立新的理论基础并且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所主张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这一切尊敬就必然要消失了。同时他补充说，他并不企求有什么独创性；他所说的大部分在实质上是别人已经说过或至少暗示过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伯恩斯坦。他的思想，他的批评，他建议采取的途径，所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甚至社会主义者几十年来经常说的东西，他的著作只不过是所有这些思想的杂烩。因此敌人兴高采烈地向伯恩斯坦的著作欢呼。我不责怪他们，因为如果在象社会主义党这样一个伟大的令人生畏的党里，最优秀的党员之一对他一直维护的基本观点表示怀疑，并且部分地使用了和敌人所使用的一样的论据，那么敌人确实有一切理由最热烈地给这样的人喝彩。因此从无政府主义者起一直到汉斯·德尔布吕克和尤利乌斯·沃尔弗都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尤其是布伦坦诺，他竟然声称伯恩斯坦十分出色地证实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根据，而伯恩斯坦在他的小册子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础，即唯物史观，辩证法，价值理论以及所谓贫困化理论和崩溃论等等一一加以攻击，因此敌人就更加有理由感到高兴了。伯恩斯坦还研究各种各样的哲学概念，如因果律，决定论，宿命论以及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其他一些概念，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对这些概念一窍不通，你们中间大多数人大概也不懂，但我总觉得，在这一方面，他

在讨论中似乎被他的敌人驳得体无完肤了。他走进了一个他不很熟悉的领域。此外，他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布朗基主义，也就是说，他指责他们遵循这样的理论：一切都取决于选择适当的时刻来发动一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对社会实行突然袭击，夺取政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实行新的理论。人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有什么想法就可以有什么想法，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达尔文为自然史所做的事情，达尔文在有关支配生物发展的规律方面所确定下来的东西，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及其机构做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他发现的。但这就是说，他的出发点决不可能是这个观点：可以通过任意的革命超越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我在后面还可以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也就是从任何一个泛泛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知道的地方，引用马克思自己的话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伯恩施坦进一步说，《资本论》是按照一个事先确定的命题写成的，这种说法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己的思想发展的阐述截然矛盾的。

既然这次代表大会不是科学会议，我们就无论如何不可能讨论受到攻击的严格的理论方面的题目，如唯物史观，辩证法和价值理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的经济结构，或者说怎样生产和怎样交换产品，对于国家机构和一切政治社会现象以及人民精神生活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因此，如果伯恩施坦在攻击唯物史观时提出证据来证明，对于某一历史事件来说，唯物史观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这就会令人信服。但是在他的整整一本书中，你们看不到他有提出事实的尝试，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子也没有。关于这一点，我请你们看一看伯恩施坦在理论上十分亲密的朋友弗兰茨·奥本海姆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尤利乌斯·沃尔弗的《社会科学》杂志第三期上，它对于伯恩施坦的观点是常不利的。

这是一个生活在摩门教国家的人的著作的译文。这个人非常激烈地反驳通常的关于教会决定经济制度的说法，认为不如

说经济制度创造了教会。由此可见，这个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无所知，却是最坚决地维护了这种观点。伯恩斯坦谈到在马克思那里有黑格尔辩证法的泥潭，谈到逻辑上的翻筋斗，我认为，这不仅表明伯恩斯坦对辩证法的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根本不同，而且表明，伯恩斯坦提出了一个指责，如果这个指责能够成立，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会被说成是十分愚昧无知的人。我在这里附带说一下，我认为他们在四十年代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激烈批判就表明他们已充分认识了它的缺陷，并且创立了他们自己的辩证法。

我也不想详细谈论价值理论。只是为了说明伯恩斯坦怎样评论马克思学说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我想指出，他的著作的有关章节的标题是《略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意义！》略论火腿与香肠的意义！在这一章里也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应该用什么来代替，而这是人们必须向批评者要求的首要事情。破坏以往的全部基本理论观点并且制造混乱，毕竟是不行的。

现在我谈谈伯恩斯坦论述中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与我们关系密切，它们意味着对我党纲领中的观点进行粗暴的批评，如果他的批评合理，我们就有必要改变纲领。伯恩斯坦在他的曾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被宣读的声明中说：“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象《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想掩饰这一点，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愚不可及。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减少（马克思从来没有概括地讲过这句话），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

工业中生产积聚的劲头和速度目前也还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在很多生产部门中，生产的积聚固然证实了社会主义批评的全部预言，但是在另一些部门中，积聚目前还没有达到预言所

说的那种程度。农业的积聚过程进行得还要慢。工商业统计表明,企业分成非常多的等级,任何一级都没有消失的趋势。”^①

伯恩施坦在这里栽在马克思名下的那段话并不是马克思的。如果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话,那就是相信马克思是最糟糕的鼠目寸光的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话:“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从而生产资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接下去还说:“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②伯恩施坦一定是把这段意义重大的话完全忽略了;这段话会使伯恩施坦丧失许多论据。

伯恩施坦企图根据统计证明,社会民主党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在它的纲领中阐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观点是过分乐观的,这一过程的进展要缓慢得多,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如果仅仅以这种被错误理解的发展为根据,就会遥遥无期,甚至根本不能实现。奥本海姆说伯恩施坦的数字材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对于这种统计方面的证据来说,关键显然只是它的证明力。德意志帝国1895年的工商业调查本身并不说明什么问题,除非我把它的结果与以前的调查相比较。伯恩施坦在谈到法国的统计时恰恰犯了 this 错误。这种论证是靠不住的。

但是,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经济的发展比伯恩施坦所说

① 见本书第39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5—686页。——编者注

的要快得多。德国已经成为工业国。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人口增加了14.5%，即增加了六百五十万人。在这段时间内，以农业为谋生的主要职业的人只增加了五万六千一百九十六人，还不到总数的0.75%，与此相反，工业和手工业增加了一百八十八万九千七百六十五人，或者说增长了29.5%，商业和运输业增加了七十六万八千人，即增长49%。如果再加上家属和仆役，统计就对农业更不利了；农业减少了3.17%，与此相反，工业和手工业增长了26%，商业和运输业增长了31.7%，可见居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从1880年到1895年，蒸气机从一百〇五万六千马力的十万六千八百台增加到大约三百九十九万九千马力的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台，也就是说，当蒸气机的台数增加了38%时，蒸气机的马力增长了222%，这又一次表明，在应用了动力机的企业中，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

诚然，中小企业的数字也是十分庞大的，这使伯恩 施坦 认为，不能设想中产阶级会在不久的将来显著地减少。单纯看表面的数字，他的论点似乎有理。1882年独立企业，包括家庭手工业者在内，共有二百二十七万；而1895年只有二百一十四万六千，减少了5.4%。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人口增长了14.5%；根据这一点来推断，1882年该是有大约二百六十万企业，所以相对地说，不是减少了5.4%，而是减少了20%。

个人企业减少了十八万八千，即12.6%；在这一方面也是大大衰退了，企业彻底垮台了。在这种企业里工匠没有雇用学徒和帮工，单是这种企业就占有所有企业的整整61%。你们几乎都是处在实际生活中的人，请问你们：这种占61%的工匠企业在我们工业中有什么经济意义？他们毫无例外地是纯粹的无产者，其中绝大部分的处境都比一个收入好的工人还坏。这种企业在经济上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这个社会能尽快地灭亡，这甚至会对它们最有好处。

一个懂得批判地思考的人实在不理解，怎么能够根据这种

固然令人眼花缭乱、却是毫无意义的数字得出象伯恩施坦所阐述的那种理论来。1882年，有二至五人的企业大约有六十七万九千个，1895年有六十八万一千个，增长了0.2%，也就是说显示出一种完全静止的状态。一大批这类小企业仅仅由于极其残酷地剥削学徒才能够生存。其中有几十万家庭手工业者是依靠妻儿一起维持生活的。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结果是令人吃惊的：这种细小企业（它们的破产只是时间问题）竟占92.3%。1895年，联邦议会对包括第三十个部分在内的德意志帝国各地的手工业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有一百个帮工就有五十二个学徒，因此，学徒的数目大得不成比例，而在一大批企业中百分比还要高得多。至于有六至十个帮工的企业，其增长是显著的，即增加了58%，人员增加了60%。有十一至五十人的企业增加了72%，人员增加了77%。可见企业越大，它的增长的百分比就越高，这是工业中存在着强大的集中趋势的一个小小的证据。有一百至二百人的企业增加了93%，工人数目增加了93.5%。最大的企业增加了75%，人员增加了82%。因此，这个领域里的发展趋势是丝毫不容怀疑的。所有这些小企业所代表的生产量同大中企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遗憾的是我们德国没有生产统计，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有关美国的有趣的数字，而且它包括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它涉及美国的十个主要工业部门，其中最低等级的产值每年最多四万美元，中间等级在四万美元与十五万美元之间，最高等级至少十五万美元。这些工厂总共有三千六百九十六个。其中最低等级有两千零四十二个，大大超过总数的一半，这两千零四十二个企业的产品只占总产品的9.4%，九百六十八个第二等级的工厂的产品占19.5%，所以，这两类加起来总共三千零一十个工厂的产品占28.9%，而六百八十六个大工厂的数目占全部企业的19%，它们生产的商品至少占71.1%。请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德国所有手工业生产都考虑在内，那么它的产值在总产值中会占多少呢？

另外,千千万万手工业者被称为独立的,但是如果撇开家庭工业不算,它们根本不是独立的。我想起了无数的锁匠,细木匠和制刀匠等等。他们自称是独立的,但是他们是为商人和厂主工作的家庭工人。我们今天有大批面包师,他们完全依赖面粉商,我们在大城市里有大批屠夫,他们整年不杀一头牲畜,而是到牲畜饲养场去买肉,至多把肉加工成香肠。他们自称是屠夫,但是他们不屠宰,这正象许多人自称是锁匠,但是一辈子也没有制造过一把锁。还要加上统计中实际使用的方法,人们把一些企业说成是独立的,其实它们根本不是独立的,而只是企业的分支。这就是企业统计与财产统计之间的巨大区别。如果我们有财产统计,你们将惊异地看到,企业数字会变得多么小!你们只要想一想大地产所有者吧!他们拥有砖瓦厂、酿造厂、烧酒厂、锯木厂、石灰窑、制糖厂等等。在统计中这些都被算作独立企业。你们再想一想柏林的巨大的舒尔泰斯股份公司吧,它拥有大批酿造厂,它们都被名不副实地算作独立企业。每一个大的酿造厂都有一个制桶工场,它也算成独立企业。另外,在今天,工人的数目往往已根本不再能确切地说明某企业是否大企业,因为发展趋势是减少工人的人数。如果说虽然如此,工人的数目仍在不断上升,那么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趋势,这个趋势使生产不断分化。新的企业产生了,别的企业过剩的工人可以在新企业里找到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又想起《资本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引用一位工厂视察员的话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六十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之后,我把工人减少到三十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使我又能够把工人从三十人减少到十三人。’”^①这就是说大量削减人员,而生产保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1页注223。——编者注

不变！德国工业的集中、工人的增加和企业的减少是同时并进的，证明这一点的是：从1882年到1895年，炼铁厂和拔丝厂减少了25%以上，工人增加了23%，砖瓦厂和制管厂减少了21.9%，工人增加了57.7%，制铜工场减少8%，工人增加了35.5%，其他许多企业的情形相似，工业和手工业发生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施坦企图证明革命进行得很缓慢。一位社会民主党员竟竭力不断地向我们说明：小心点，事情发展的并不象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快。他这样说是多么令人惊异。别的党都迫切要求胜利，但有人居然要使我们丧失一切信心和勇气，向我们喊道：永远慢慢走，好让乡巴佬的民团跟得上。这个观点象一根红线贯穿伯恩施坦的全书。这样，他就作出了一些最大胆的论断，甚至企图证明，剥夺是毫无意义的。他问道，你们想怎样剥夺大企业呢？但是假定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剥夺，难道你们相信这些企业中的大批工人会对剥夺进行反抗吗？德国拥有二十个以上的工人的企业总数只是四万九千个，而伯恩施坦却说是十万，并以此向我们证明，对我们来说事情是多么困难。他今天在我们面前为之辩护的那些观点甚至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为之辩护的，这是伯恩施坦的特点。在评论一些事情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社会主义理论家伯恩施坦更激进。莱比锡著名的教授毕歇尔^①在其《国民经济的形成》（这本书在去年出了第二版，因此已经考虑到1895年的工商业调查）一书中说，手工业衰退的原因是：1、手工业被同类工厂的生产排挤。2、手工业的生产范围受到工厂或出版社的压缩。3、手工业并入大企业。4、由于需求的改变，手工业变穷了。5、商店使手工业降为家庭劳动和低贱劳动。此外，毕歇尔还谈到社会政策协会的研究。他所作出的基本结论是：如果构成旧城市居民核心的那一广大

^① 卡尔·毕歇尔（Karl Bücher 1847—193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国民经济的形成》一书出版于1893年，1898年出第2版，1901年出第3版。——编者注

的独立小手工业者阶层消失了，代之以一大批互不相关的不独立的人们，那么这肯定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这是社会的（当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损失，在城市的基础上，我们目前无法补偿这个损失。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手工业的发展的判断。如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如此超过社会主义理论家，我们就糟糕了。另外，毕歇尔还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莱比锡的手工业者的状况，莱比锡是一个富裕的城市，那里的手工业状况相当好。他调查了十七个手工业者，获得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在五千六百一十七个手工业者当中，有三千四百一十五人即百分之六十一的人，收入不到一千二百五十马克。连我也对这一点大为惊讶。伯恩施坦与此相反，极力向我们证明发展得很缓慢。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施坦不久前还主张和我今天所主张的同样的观点。伯恩施坦本人确实一点也不否认他经历了一个转变。但是，如果一个在科学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竟会根据同样的事实得出截然相反的看法，那我简直是无法理解了。我这样说，请你们不要见怪。伯恩施坦的转变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也不是他的转变之日，因为在这之前他就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组文章。但是1896年11月，他还在《新时代》上就1895年的工商业调查的结果写道：“如果考虑到按企业类别的劳动力配置方面的巨大变动，并且注意到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这一事实，那就一定要说，今天德国的生产已有三分之二（即使不说是四分之三）属于资本主义大企业。”“这个事实被上千个细节掩盖起来（这些细节现在他全都忘记了），但它的正确性是不容怀疑的”，一年以后他对此却除了怀疑就什么也没有了！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使伯恩施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简直令人难以理解地改变了他对一个最重要的现象的看法。象《乌尔姆报》这样的民族自由党人的报纸和象《十字报》这样的保守派地主的报纸同样确认企业在集

中和中等阶层在消失。不幸的是，人们不得不拿这一情况来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对比了。

现在我谈谈商业和交通。我们发现这方面的企业在增加，这与工业中的情形正好相反。独立经营者从1882年到1895年增加了20%，在这段时间内，职员增加了85%，工人增加了71%。我说的是大概的数字。但是这个部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呵！1882年，每一百个从业人员中有四十七点六七的独立经营者，1895年只有三十六个，因此，尽管独立经营者的绝对数增加了，比例却显著减少了。职员从百分之九增加到11.20%，工人从46.3%增加到52.8%。因此在商业和交通中，尽管小企业增加了，企业的集中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这一统计中，算作独立经营者的有大约三万五千三百个小贩，三万六千五百个中间人、代理人和经纪人，一万零七百个脚夫，此外还有男女仆人，蔬菜商和有一匹马的马车夫。商业有大约五十二万九千个企业，其中大中企业的数字也有了显著的增加。独立企业的数字总计二十七万零六百个，大约为51%，稍逊于工业。但是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在这一发展中不那么令人高兴的因素：妇女不仅作为女工，而且作为独立经营者在这个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已婚妇女的数目大大增加。独立从业的妇女增加了34.5%，与此相比，企业主平均只增长大约20%；女职员增加了172%，如女会计、女办事员等等，与此相比，职员总数平均增加35%；女工的数目增长了152%，与此相比，工人总数平均只增加71%。在二十七万零六百个小商业企业中，至少有九万三千个是妇女经营的，占34.5%。让我们在这里也看一下这些数字的实际意义。同一家酿酒厂的佃户们经营的全部农场，柏林的阿申格尔公司开的所有的啤酒店，勒泽尔-沃尔弗公司所属的全部雪茄烟店，所有的农业合作社的商店（它又分成千百个消费合作社支店），这一切在统计中都算作独立企业。可见数字是欺骗人的，还必须从本质上研究事物。伯恩斯坦企图向我们证明，我们在谈到

发展时弄错了，但我在这里必须向伯恩斯坦指出布勒斯劳社会政策协会最近举行的讨论。桑巴特教授在那里说（桑巴特的这一番话推翻了伯恩斯坦所有相反的话）：“最后，他^①不得不反对必须保存中间阶层的口号。尽管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他不得不明确表示，想人为地保存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是无意义的。从前人们说中间等级是指资产阶级这一上升的阶级。现在想人为地保存一个没落的阶级就是阻止文明的发展。”说这番话的人不是社会民主党员。还有一点：如果有什么事情证明伯恩斯坦所阐述的一切在生活实践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这就是这一事实：几十年以来德国存在一个中间阶层、手工业者的反犹太人运动。如果我们说，这是鼓动家们造成的，那么我们就是自打嘴巴！不，是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解体过程把这些阶层（他们认识了这个过程，却还没有发展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推进了这一反动的运动。对于这些行将灭亡的中间阶层来说，理想只存在于过去，因此它们向后看！

不过，伯恩斯坦虽然有这些奇怪的阐述，他也有恍然大悟的时候。今年9月10日《苏黎世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9月7日写于伦敦的，作者与伯恩斯坦很接近（笑声）^②。作者在指出托拉斯把企业主的力量集中起来之后说：“商业也是如此，甚至在商业集中于百货商店和合作社商店的那些地方，它也受集体主义原则支配。绝大多数啤酒店是大酿酒厂的“附属店”，许多小面包作坊同使用蒸气的大面粉厂和面粉进口公司的关系也相类似。香料店和药材店通过地方的和全国的价格同盟使自己不致因对方压价出售而遭到破产，但是以法律上受到保护的商标来包装出售的专利商品的贸易越来越得到推广，它使香料

① 指桑巴特，原文是间接引语。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妄图推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编者注

② 参见本书第168页。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伯恩斯坦自己。——编者注

商从一个熟练的专家越来越变成一个普通的伙计。在伦敦，经海路输入的煤炭的八分之五是由一家大辛迪加销售的，这家辛迪加拥有七千万法郎的资本，一家经售由铁路输入的煤炭的类似的辛迪加也已奠定了基础。”他还指出在所有的部门都存在辛迪加、联盟和瑞恩，都实行了合并。哎，如果伯恩施坦的著作中有这些话，那他至少可以省掉二十页篇幅的阐述，而我的论战也可以短得多了。如果他查一查汉堡亚历山大·扬公司1895年的年度报告，他就会发现，该公司的老板卡尔·迈伊（我觉得他对于伯恩施坦的著作起了一些助产的作用）对于商业发展的看法是与他伯恩施坦的看法不同的。

现在谈谈《农业与土地问题》这一章。考茨基写了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他在前言中说：“无疑地——而且我们认为这是老早就证明了的——农业并不是照着象工业一样的模型发展起来的。农业遵循着自己的规律”^①。我完全同意这句话。考茨基在下文中企图证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也日益发展起来并摧毁中小经营。马克思关于地产集中的观点直到七十年代中叶是有效的。毫无疑问，这个观点符合当时农业中存在的趋势。今天我还认为这个观点对法国来说是正确的；在这里我要援引德意志帝国统计资料第一百一十二卷的统计报告。在普鲁士（除施特拉尔松、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和威斯特伐利亚等行政区外），有马的农户在十九世纪最初六十年中减少了面积为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四十一莫尔根^②的九千八百七十三家。按照纳乌曼^③的说法，在普鲁士省和西普鲁士省从1825年到1859年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个无马的自耕农消失了。但在这以后，发展的情况不同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

① 考茨基《土地问题》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16页。——编者注

② 古时一种土地面积单位，约合25.5公顷。——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纳乌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德国反动政客，民族社会主义联盟的创始人。——编者注

外国的粮食竞争，它使我们在1878年产生了保护关税派，而我们的农民从前是自由贸易派。第二个原因是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利润高涨。毫无疑问，一个农场无论经营得多么合理，它的利润额也不能与一个经营良好的工业企业相比。因此，资本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所以，在农村，流动资本普遍缺少，劳力也同样缺乏。1882年至1895年，德意志帝国的人口增加了六百五十万，而农村人口减少了七十八万四千。但是在商业、交通和工业方面，人口大大增加。工业人口从一千六百二十五万增加到二千万，几乎增长25%，而农业人口减少了4%。在商业方面，人口从四百五十万增加到将近六百万，增长30%以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是农村劳力缺乏，后者严重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农民的抱怨确实是有道理的。这一切情况迫使农业转为尽可能集约的经营。粗放经营不再有利可图了。但是集约经营需要大量资本。由于发展，资本和信贷对于农业来说都涨价了。因此农业实际上受到双重打击。但是维持农业对于国家却是有利的。农业人口是保守的。由于互相隔绝和缺乏交往等等，农业人口一直坚持保守主义。对国家有危险的是具有数百万人口的工业中心。邪恶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这里简单描述的情况也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这样费力才能推进到农村中去并进行相应的宣传。可见目前的国家对于上述那种发展情况不能不采取行动。因此它努力帮助正在衰亡的阶层，这种努力表现为关于手工业工人的立法、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关于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类似的法律。我们的政治家很清楚，这样做只能给中间阶层提供骨头，而不能提供肉。但是有好几年人们就是啃骨头的。农业的情况不一样。在这方面，国家实际上可以通过立法比较有效地进行干预，破坏和阻碍自然的发展。1882年全国人口中农业人口占42.54%，1895年占35.7%。由此可见，农业甚至是愈来愈衰退。尽管农业人口减少了，但独立企业主的数字从1882年到1895年增长了二十八万零六百九

十二：即12.2%。职员人数从1882年的六万六千六百四十四增加到1892年的九万六千一百七十三，即增长了44.5%。相反，在这段时间内，男工人数减少了三十九万三百一十三，即10.7%，只有女工人数增加了十三万六千二百五十八。这些数字证明劳力是短缺的，农业对此大为苦恼。我要在这里顺便批评一下帝国统计资料。我在研究数字时发现了令人惊异的事实：农业上已耕土地的面积增加了六十四万九千公顷。林业占用的土地面积增加的数字还要大得多。对于这种增长是这样说明的：1882年登记林业企业是不够认真的。因此现在在这方面很难进行比较。在五百五十五万八千个农业企业中，独立的农户只有二百五十万。有二百一十四万九千人只是附带从事农业。按照统计，还有二十万六千个极小的细小农场。这是些什么样的农场呢？到柏林、沙洛顿堡、不来梅和莱比锡等城市的郊区走一走，就会看见那里有许多小园地和小块耕地，上面还有一些简陋的小房屋，一位柏林工人嘲讽地把这种建筑物称为“喀麦隆”^①。所有这些农场在统计中都算作农业企业。这些建筑物不断增长，这是大城市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些大城市使工人们感觉需要迁到乡下去。大批工业家、商人和公务员迁到大城市的郊区，住在别墅式的出租公寓里。这种住宅到处都带有花园，往往还带有一些耕地。于是无数的小农场产生了，它们在统计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但在经济上简直毫无意义。我这样说决不是想否认小农场增加了。这一点应如何解释呢？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些猜测。继承法显然起很大的作用。如果不付给继承人以遗产转让费，那么农庄就往往被分割成几个，但如果付了这笔费用，又会使农庄负一大笔债。重要的是小农场同大农场的关系如何。大农场并不象小农经营的辩护者所描绘的那样微不足道。1882年至1895年，大农场增长的数字如下：

^① 喀麦隆当时是德国的殖民地。这里可能是指这些简陋的房屋类似喀麦隆本地人民的住屋。——编者注

农场	农业使用的面积		总面积
20公亩以下	120230	16683公顷	68986公顷
	+ 13.1%	+ 13.7%	+ 65%
20公亩至 1 公顷	85580	22000公顷	157936公顷
	+ 6%	+ 3.2%	+ 19%

一公顷以下的农场共占全部农场的45.5%，占农地面积的2.2%，占总面积的2.6%。

二公顷以下的农场占全部农场的58.6%，占农地面积的5.33%，占总面积的5.6%。

五公顷以下的农场共占全部农场的76.9%，占农地面积的15.3%，占总面积的15.2%。但是一百公顷以上的大农场的情况如何呢？它们目前总共有二万五千零六十一个，仅仅增加了0.2%，但在全部农地面积中它们总共占有七百万零八百三十一公顷。而五公顷以下的农场虽然占全部农业企业的77%，却只占有五百零九万四千公顷的农地面积。因此，二万五千个大农场比四百二十五万五千个小农场加起来还多二百七十三万七千公顷。如果算总面积，那么大农场比四百二十五万小农场和细小农场加起来还多占四百五十万公顷。因此在经济上，小农场的庞大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要是有一天要实现贪食奇谈，那么，四百万小农场恐怕不会反对剥夺二万五千个大农场。只要我们有不受限制的鼓动自由，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东普鲁士的无地农民和短工全部争取过来。有人声称小农生活很舒适，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考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详尽阐述了这一点。一般地说，小农比无产者本身过着更加无产阶级化的生活。民族社会联盟的成员、财政顾问洛施博士在符腾堡王家统计局关于符腾堡农业（那里的条件应当是对小经营特别有利的）的报告中指出，那里的土地分割达到了最极端的地步，农民只是由于出卖继承的产业的收入几乎不够偿还债务才依旧守着自己的土地。可见农业方面的情况

还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也日益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今天，农业是所有行业中最引人注目然而也是最革命的，但是那些耕种土地的人是所有人当中最保守的，这是一个矛盾，你把它设想得怎样严重都不为过分。谁今天想在农业方面作一番成就，必须掌握现代的知识和方法。德国的限定继承财产正在高度集中，这也是有代表性的。在普鲁士，到1895年为止，共有二百一十三万五千公顷的土地被连结起来。有人认为工业中行得通的事对于农业中的大企业来说是行不通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证明，只要大农场跟得上现代的水平，它就会提供大量利润。无论如何这一过程仍旧在飞速发展之中，还不能一目了然。但必须强调指出：特别是普鲁士政府为了阻止农业中的解体过程，做了一定的工作，并部分地取得一些成绩（这一点对我们的鼓动极为重要）。到目前为止国家首先给农业或者仅仅给农业以下面这些好处：除了大家已知道的农业保护关税额以外，取消土地建筑税，这些好处使农村每年可获得二千八百五十万马克；免除营业税，这使农村每年可获得四百多万马克；烧酒专卖的好处每年有四千二百万马克之多；从糖业税得到的好处每年约计三千万马克（后两个数目是就整个帝国而言）；取消谷类原产地证明书（这个好处无法用数字表示），限制谷类和面粉制品混合过境仓库的关税贷款，取消过境仓库，改变济贫住宅（这对城市是不利的），鼓励雇佣外国工人而损害本国工人的利益，取消星期日生产乳酪的禁令；每年给农村小学经费二千万马克以上的津贴，仅仅1895—1896年度就拨给新学校建筑费六百万马克，仅仅1893—1894年度就由国家给农村男女教师以薪金津贴一百三十万马克，到1895—1896年度已付给男女教师养老金补贴三百三十六万马克；建筑为农业服务的铁路，为此提供贷款二亿六百万马克；减轻农产品铁路运费，由政府降低肥料价格，由政府补助建筑谷仓，补助改良土壤；仅仅1891—1892年度到1896—1897年度就用了一千二

百二十五万马克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等地进行垦殖，仅仅通过垦殖就建立了三十七个乡区，并通过分割大地产建立几千个中小农庄；建立拥有二千万政府贷款的中央合作银行；除此之外，政府还拨款补助马匹繁殖业、林业、畜牧业、葡萄种植业和乳酪业，政府当局直接购买农产品等等。这一切都是打断或阻碍自然发展过程的措施。还有一个情况说明小农场为什么增加：有一批银行购买了大农庄的分场或大农庄本身，把它分成小块农田，然后以高价出售。我知道柏林有一家这样的银行每年至少分配7%的股息，这是农业中的任何产业都不能带来的利息。

伯恩斯坦提出所得税统计作为他论证我党纲领不正确的另一个而且是决定性的证据。据说所得税统计证明，财产的集中与企业的集中相适应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伯恩斯坦把这个看法归之于马克思。我已经引用马克思自己的一段话向你们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①。但是伯恩斯坦要驳斥这种看法，他以股份公司的形式，特别是英国的情况为例，证明财产并没有集中，而是在分散，收入的情况亦是如此。

我不想就英国的情况提出反驳。考茨基在最近一部著作^②的第九十三至九十六页中出色地指出了有关的数字材料的表面性，在这以后就用不着再反驳了。伯恩斯坦的错误首先在于：他把一种估计说成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主要问题在于：在英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获得股票，只要他能够储蓄起二十马克，他就能用这笔钱去上当，购买任何一家企业的一英镑股票。幸好这在德国是不可能的。但是，难道持有一百五十万份股票的人也很多吗？

在英国，夫妻的财产是分别管理的，这一情况对英国来说特别重要。此外，伯恩斯坦在谈到股份制的价值时大错特错了。博利约，这个法国的舒尔采-德里奇说：“迄今为止，虽然股份公司

^① 见本书第187页。——编者注

^② 《伯恩斯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编者注

大大振作了事业心,发展了生产率,然而同时也造成了财产的集中。”——这同伯恩施坦所说的截然相反!“它使一些狡猾的冒险家大发横财,而使无数天真的人们陷入贫穷。”这个法国的舒尔采-德里奇对股份制的评论与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评论正好相反——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伯恩施坦最精彩的论据之一是萨克森的所得税统计。我独立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萨克森的所得税统计是搞得最好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地区,1882年德国人口有42.51%靠农业生活,1895年有35.7%,但萨克森在同一时期只各有19%或14%、也就是说只有七分之一的人口靠农业生活。这里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典型的。但应当注意的是,在萨克森的所得税统计中,已婚妇女的收入、儿童及未满十六岁的少年的收入是与已婚男子或父亲的收入合在一起计算的,在家庭成员进行协作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家庭手工业中间,以及在已婚妇女在谋生方面起非常重大作用的情况下,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我没有象伯恩施坦那样把1879年作为起点,因为新的所得税法是在这一年公布的,所以还不能提供可以使用的数字,此外,这一年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所以我选择1882年作为起点。我特别强调:我认为萨克森所得税统计所提供的证据对整个伯恩施坦问题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伯恩施坦有关萨克森统计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失败了,如果相反,那就是他失败了。1880年至1895年,萨克森人口增长了27.5%,大大超过德意志帝国平均的人口增长百分比。伯恩施坦在其著作中欢呼收入比人口增长得快得多。的确,这是一个到处存在的事实,原因很简单,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中必须工作的人数愈来愈多。1882年至1895—96年度,受到税额评定的人增长了36%,他们的总收入增长了72%。在九十年代初以前,不到三百马克的收入是免税的,此后,不到四百马克的收入可以免税,1882年,这种受到税额评定、但按上述规定可以免税的有七万六千八百六十三人,占全体受到税额评定的人的6.61%,

1895年却达到二十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四人，即13.76%。二十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四是一个巨大的数字，1895年有这么多人收入不到四百马克。1882年，收入在四百马克与八百马克之间的纳税人数总计占全体受到税额评定的人的76%，而1895年却只占64%；可见这一等级的收入状况有所改善。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平均收入从四百二十一马克增加到五百十一马克，这两种情况都远远低于六百马克这个平均数，但终究是增长了21%。收入在八百至一千二百五十马克之间的纳税人总数从全体受到税额评定的人的12%和总收入的12.75%增加到全体受到税额评定的人的17.2%和总收入19.7%，而他们的绝对数增加了131%。他们的平均收入差不多仍旧保持在九百九十九马克或九百九十四马克。除了那些穷得交不起税的人外，总收入在一千二百五十马克以下者1882年占总纳税人的52%，1895年占56%。收入为一千二百五十至三千三百马克之间（1895—96年度把界限规定为三千四百马克）的人数从9.55%增加到12.79%，就绝对数目来说增长了82%，平均收入从一千九百一十六马克下降到一千八百九十七马克，下降了十九马克。1882年，收入在三千三百马克以下的人至少占全体纳税人的97.6%，而1895—1896年度却占96.39%，因此它们的数目还是大于拉萨尔当年对收入在三千马克以下的人数的估计，即大约96%。三千三百马克与九千六百马克（1896年定为一万马克）之间的中等收入者从2.3%增加到2.8%，他们同纳税人的数目相比的绝对增长数是60%，因此大大低于收入在一千二百五十马克与三千三百马克之间的纳税人的增长。收入在九千六百（或一万）到二万六千马克之间的富裕者的人数增加了74%，他们的收入增加了83%。三千四百至一万马克的中等收入者增长的百分比最小，他们收入愈高，增长就愈大。收入在二万六千马克以上的百万富翁的数目增加了147%，他们的收入增加了143%，1882年，最高收入是二百五十七万马克，1896年增加到三百六十五万二千马克。从这

些数字来看,中等阶层发展得最少,低收入者的数目大大增加,最低收入者的数目则减少了,而对于这些等级的大部分人来说,收入是显著提高了,但是高收入和极高收入的增加还要大得多。

现在我必须谈一下看起来在我们党内几乎消失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似乎忘记了思考。老齐格勒有一次愤怒地向他的进步党朋友们喊道:“你们的头脑失常了,你们忘记了思考!”不幸的是,这句话对我们也往往很合适。一个六十年代的老练的拉萨尔派鼓动家不会犯现在一些甚至是有教养的人所犯的严重错误。有人向我们高喊,你们终究不能否认工人的收入增加了!显而易见,如果国家越来越富,工人也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正是根据国家财富不断增加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一情况得出最终有可能使一切都富裕起来的结论,也就是说有可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是,问题不在于货币工资的多少,而是在于实际工资的多少,在于工人是否能用增加的工资更好地满足他增加了的需要。其次是在于,工人用增加的收入提高需要的可能性同富裕阶级的收入相比较的情况如何,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扩大还是缩小了。毫无疑问,今天的有产者与1863年的有产者的生活情况完全不同,表现形式也完全不同。难道你们没有看过现在的赌博诉讼案的审理记录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纨绔子弟是怎样花钱的吗?这只是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小的一角;他们今天沉湎于酒宴淫乐之中,穷奢极欲的程度远远超出六十年代初期。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关键。我甚至亲身经历过这一点。当1863年拉萨尔来到莱比锡时,我正在第一个作坊里当镟工助手。我们刚刚从我们的师傅那里争得了计件工资。在工作日为十一小时的情况下每周最高工资是十马克!四年后,我独立营业了,并且有了一个助手,当我第一次出席国会后回家的时候,助手向我声明废除合同;他想独立了。我在街上和一个同事谈起这件事,他回答说:这全怪你,谁叫你这么傻,给了那人那么多工资,使他能有积蓄

呢？这笔工资是多少呢？十三点五马克！这是莱比锡最高的工资，我就是付了这样的工资。今天在莱比锡，肯定没有一个矿工助手不是每周拿二十一马克的，这比1863年多了100%；但如果谁想对我说，矿工助手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100%，那我简直要嘲笑他。不仅如此，拉萨尔在1863年把三千马克定为界限，从三千马克起算作有产者。有谁想声称，当时的三千马克可以同现在的三千马克相比呢？请你们比较一下房租、赋税和总的生活水平。房租至少增长了10%，国家和市镇的赋税肯定至少增长了100%。我想用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

同志们！我已向你们指出，1896年，收入在三千四百马克以下的人数达到96.75%，也就是略多于1883年的96%，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尽管平均收入提高了，但总的生活状况与富裕阶级相比丝毫没有改善，例如，我在1896年以三千四百马克收入所过的生活肯定不如1863年以三千马克收入所过的生活。所以实际上，那种以情况的表面变化为根据的全部理论是错误的。这一点是不容争论的，它也证明了伯恩施坦按照这种倾向所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和错误的。另外，谁也不能比富裕阶级更容易欺骗国家，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人们往往不知道对此应当怎样说。于是有人大胆地说，工人可以象资产阶级那样欺骗国家，并且可以不报告他们的收入情况。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但是，工人欺骗国家的可能性远远比不上富人。另外，在工业区，在中小城市，济贫费用和各项开支大幅度增长，人们煞费苦心向工人的全部收入课税，然而人们即使百般努力也无法触及富人的收入。或者难道人们不知道，所有大公司都有警察署和税务局看不到的秘密账簿。发言人在证明其诊断时举了冯·万根海姆男爵的情况为例。据至今没有被否认的报道说，万根海姆男爵直到几年前固然为四十万马克的财产交了二百马克的财产税，但他连一芬尼的所得税也没有交纳，尽管他除了财产外，每年还从烧酒专卖得到一万六千马克的好处，并且拥有一笔其地租纯收

益被评定为二千六百二十八马克的地产。1898年，柏林的五万三千一百份所得税申报单中，有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份被驳回，其中一万一千三百一十八份的驳回获得成功。申报纳税的人只承认总计一亿五千一百五十四万三千三百零五马克的收入，而米凯尔^①的X射线却查出有一亿九千二百一十五万一千八百八十一马克。这样一来，纳税总额就从四百八十三万一千三百零二马克提高到六百三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四马克。所以，由于税务局的警惕，国家就在柏林避免了一百五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二马克的损失。同一年在普鲁士的四十五万六千六百九十四份所得税申报单中有十四万八千二百六十八份被驳回，占总数的32.5%。有十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五份的驳回获得了成功，它们占被驳回的总数的75.7%。应课税的收入从而从六亿七千八百八十七万八千零五十六马克提高到八亿六千三百零四万三千八百三十马克。因此，国库大约增加了38%左右的利益。现在还远远不能说人们真正看透了已被他们揪住衣领的人。伯恩施坦对普鲁士财产税的结果感到欢欣鼓舞，他十分贪婪地抓住他能获得的每一个数字，以便证明，我们一直错了，事情的发展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是朝着有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向发展的。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查定附加税的结果提供了令人高兴的景象，而赫克纳这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得出了恰恰相反的论断。伯恩施坦在涉及普鲁士收入统计时犯了一些极大的错误。他谈到了从1854年到1893—94年度普鲁士高收入的巨大增长，却没想到1890年以前，普鲁士的税收制度与1891年以后的制度是完全不同的，这些结果因此是不能比较的。如果想进行真正的比较，可以把1890年作为最上限。我们这儿有一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克雷门·海斯先生在1898年写的论德国的高收

① 约翰奈斯·冯·米凯尔 (Johannes von Miquel 1828—1901)——德国政治家和金融家，曾为共产主义同盟盟员，九十年代为普鲁士财政大臣。——编者注

入及其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增长情况的优秀著作。这本书的作者获得了图宾根大学政治系的学术奖金。如果说这个系竟感到有必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如果说我们的学者们在最近几十年竟对这样的问题表示了态度，那么从道义上说我们是发起人。我们通过不断的宣传，迫使人们关心社会状况。关于资产阶级的好心肠和正义感所说的一切都来自我们的宣传这一泉源。再也不可否认白纸黑字写着的事实。人们投给猛兽面包屑，是为了使它安静。海斯考察了八个老的普鲁士省份从1854年到1890年的收入，而且只要有统计材料时也考察了工业企业，然后得出结论说：

“可以把我们的研究结果概括如下：在德国所有的征收所得税的各邦，高收入比所有其它的收入增长得快得多。不来梅在1874年到1885年这一短暂的时间内是唯一的例外。

最微薄的收入增长得最少。……

与此相反，颇为肯定的是，随着大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和高额财产的迅速增长，相当一部分工业中等阶层在经济上依赖于大企业和大资本家。”

一个不是我们队伍中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说的这番话与伯恩施坦所说的一切截然相反。海斯得出的1854—1890年八省收入状况的结果是怎样的呢？从1854年至1890年，人口增长了42%，三千马克以下的最低收入也只增长42%，在三千马克到三千六百马克之间的收入增长333%，在三千六百马克到六万马克之间的收入增长596%，在六万马克到十二万马克之间的收入增长835%，超过十二万马克的收入增长942%。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代表与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

显而易见，伯恩施坦在其观点中也抛弃了所谓贫困化理论。在这里我首先得说明一下，在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甚至洛贝尔图斯那里寻找所谓贫困化理论是徒劳的。这种理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发展，广大群众也越来越贫困。伯

恩施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定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他作为拉萨尔著作的编辑者，一定也知道拉萨尔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对于伯恩施坦的阐述，考茨基回答他说，他的论断是错误的。伯恩施坦回答说：

“首先，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而是考茨基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和发挥。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马克思论述崩溃那一章一致起来（马克思在这一章中说的不是无产阶级日益成熟和壮大，而是无产阶级日益退化和受奴役），我在这里可以不去管它，尤其是因为我自己曾经不断地着重强调：这一章只应当理解为一种倾向的标志。我只断定，公爵随着大衣一起倒下了①。”

考茨基是怎么说的呢？“这句话不是随便哪一个从来没读过《资本论》的庸俗经济学家写的，而是一位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理解得最好和最透彻的人写的。这句话说得是否有理，我们逐字重复伯恩施坦使用的那段引文就可以看出来。这段引文是：‘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②（《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793页）然后考茨基又正确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该书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力量。……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斗争的真

① 语出席勒《菲斯科的阴谋》第5幕第16场，原话是：“如果大衣倒下，那么公爵一定会随着倒下。”——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着重号是借倍尔加的。——编者注

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①

在这里，又一次极其清楚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压低工人阶级的倾向引起了反抗，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实际上，象伯恩施坦这样的人，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竟陷入如此的混乱，竟不再知道《资本论》说的是什么（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在这里讲什么“考茨基的解释”了），这确实是可悲的。从其他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在这里谈到过的观点。伯恩施坦用马克思《成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作为他的著作的题词：“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② 同志们，如果马克思认为伯恩施坦所解释的那种贫困化理论是正确的，他怎么还能够写下这句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是人们可能在他那里挑出来的最大的矛盾。如果从我们的敌人那里搬来的贫困化理论是真的，那么马克思也就不会驳斥铁的工资规律了。1864年《成立宣言》中被伯恩施坦引作题词的那一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惊人顽强的斗争，……终于争得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261页。着重号是倍倍尔加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①

此外，马克思1867年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他接着说：“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伯恩施坦会说：伦理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②这就是“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说的话。可耻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伯恩施坦这样的人竟抛出了与这些论述（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无疑是明确的）针锋相对的观点，他可能把一些信赖他的威望的人彻底引入歧途。恩格斯1891年在反驳布伦坦诺的文章中是怎么说的呢？“布伦坦诺先生经常反复谈论的所谓工人劳动保护法以及工会组织有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发明。马克思和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学的贫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132页。着重号是倍倍尔加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页。着重号是倍倍尔加的。——编者注

起,到《资本论》和我最近的著作止,都曾谈到这一点。”^①伯恩施坦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别的想法。这当然已经过去八年,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世代了,如果人们设想自己是三十岁的话,这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当时他在给拉萨尔的文集作的序言中说:“我认为,工人表面上的自由愈大,他们的依赖性只会愈严重。这种依赖性是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沉重负担,随着资本主义向前发展,这种负担也愈来愈重。”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宗教裁判官。正是在这里,我必须也为拉萨尔说句公道话。可悲的是,我们队伍中的老拉萨尔分子由于提高了认识而放弃了拉萨尔的一些学说,但恰恰是对于拉萨尔至今还正确的地方不再能理解了。拉萨尔在《公开答复》中说:“人的一切困苦和匮乏都只取决于满足资料同当时存在的需求和生活习惯的比例。人的一切困苦和匮乏以及人的一切满足,也就是说人的各种状况,只能通过和同时代其他人在习惯的生活需求方面的状况相比较来衡量。因而一个阶级的状况,永远只能通过它与同一时代其他阶级的状况的对比关系来衡量。”^②在拉萨尔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对我们说:“拉萨尔说的一切都是过甚其词,是一种欺骗。”工人今天的情况怎样呢?回想一下中世纪,那时候工人有玻璃窗吗?有镜子吗?有双人沙发吗?对此,拉萨尔派回答说:“的确,甚至查理大帝也没有玻璃窗,甚至可以断言,他没有穿衬衫。然而尽管如此,十九世纪工人的情况与统治阶级整个情况的对比,还不如八世纪时类似的阶级与统治阶级情况的对比。”当时,资产阶级对手企图用这样的蠢话愚弄我们,过了三十年后,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9页。着重号是倍倍尔加的。——编者注

② 拉萨尔《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参见《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29页。着重号是倍倍尔加的。——编者注

今天又有人用这一类说法获得了成就。的确，一大部分工人的状况绝对地看来比以前显著地改善了，提高了；至于同统治阶级的状况相比是否也比过去相对地改善，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是到处都能立刻给以肯定的回答的。但与此同时，贫困即社会的和经济的贫困也往往在增长，这是完全不容否定的，但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却要否定它。不得不说到这件事，是不幸的，但是对自己的党员同志也必须说实话。我已经说过：“你们忘记了思考！”难道工人状况的改善表现在今天就业的已婚妇女比1882年多50%吗？我们不是目前的婚姻的颂扬者，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理想，但我们并不因此就喜欢由于男子所得的报酬微薄而迫使妇女进工厂服劳役。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的论断又是与此一致的。例如一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说，只是由于男人的工资微薄，才促使妇女参加工作。越来越多的工作由妇女来承担了。我举出木工联合会的最近一次统计作为日益发展的贫困化的又一个证据。你们可以从这个统计中看到下面这个悲惨的事实：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整整23%的联合会成员的妻子被迫从事副业，而一般说来，参加这个联合会的是这个行业中挣钱最多的工人。而且，在所有死亡者当中，至少有58%是死于肺病。肺病的流行不也是社会的贫困吗？在结核病会议上，我们才第一次听说，这个病是无产阶级的病。它甚至还同失业联系在一起。尽管1897年是繁荣的一年，然而根据木工联合会的统计，仍有七千九百八十五个工人失业，占全体工人的20.7%，总计失业天数是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一十三天。其次，请你们注意，根据1895年6月14日的人口统计，有二十九万九千三百五十二个失业工人，其中十二万零三百四十八个工人是有病的；根据12月2日的统计，有七十七万一千零五个失业工人，其中二十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五个是有病的。但是，这种统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快照，它只涉及特定的某一天。而全年的统计则提供另外一种情景。

我必须再一次引用一位资产阶级作家的话。我今天的处境很不愉快，因为我不得不借资产阶级作家之口让我们的一部分同志遵守秩序，并向他们指出：资产阶级作家对工人阶级的痛苦的了解比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深切得多。在舍尔所编的《周报》第八期上，恩斯特·弗兰克博士描绘了一幅德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画面，尽管全国总的说来更加富裕了，然而这幅画面与一些社会民主党员看到的玫瑰色的情景有些不同。恩斯特·弗兰克说：“然而在这幅画面上不是没有很深的阴影。自从帝国建立以来，德国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肯定有十分显著的提高，而群众对于这种令人高兴的发展肯定也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向上发展的运动只对上层群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广大的下层还生活在艰难、困苦和贫穷之中，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看一看关于城市住宅的恶劣状况及其对身体精神的危害的描绘吧！读一读叙述无数贫苦家庭工人如何糊口的报告，就会知道这些人挣的钱只够苟延残喘！看一看普通的工人家庭的开支表，就会知道服装、靴鞋、器皿和家具等项开支是多么可怜！普鲁士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家长免除了所得税，因为这些家庭的收入不到九百马克。一个德国工人的全年工资平均只有六百至七百马克。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手工纺织厂中，许多全年收入只有三百至四百马克的家庭在困苦的生活中受折磨。成衣工业的家庭女工每星期只挣六至七马克，她们的生活还远不是最坏的。许多家庭一年中用于衣服、鞋和家具的开支下降到四十或三十甚至二十马克。有几百万人只有在盛大节日才能在他们的餐桌上看到一大块肉。有好几十万人住在过于拥挤的房间里，而只有在在一个房间的住宅里住六个人，在两个房间的住宅里至少住十个人时，在统计中才算是过于拥挤。”

贫民统计是目前贫困是否越来越加剧的很好的测量表。你们也许会认为柏林和斯图加特的数字是没有证明力的，因为它们是大城市，但是巴伐利亚的贫民统计是现有的统计中搞得最

好的,这个统计表明,从1871年到1895年,即包括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巴伐利亚的受救济者从十二万九千九百九十六人增加到十八万三千二百八十人,即增长了41%,而人口只增长14%,而且这个邦的天主教会办的慈善机构是很活跃的。

(到了午休时间,倍倍尔的报告暂停。)

倍倍尔继续作报告:我首先对大卫的发言^①说几句话。我今天早上对他说,我要少谈一些理论问题,多谈一些实际问题——即与我们的纲领有关的一切问题,关于策略问题,我却不想多谈。我现在来谈伯恩施坦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人们看到伯恩施坦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资本发展论》这一节的标题,一定会以为,他要清楚明确地拿他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同马克思相对比而进行阐述。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章对此一字不谈。在第八十八页至八十九页上,他得出结论说,一个具有完全相同利益的工人阶级是不存在的,在今天,它的利益的差别比1789年的所谓人民的利益的差别还要大,因此,谈不上什么共同的阶级意识。他在《新时代》第四十五和四十六期上,发表了题为《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的两篇文章,答复考茨基向他提出的他到底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多么奇特的标题!我们这里从来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的教条,伯恩施坦恐怕也很难从德国的工会运动中举出例子来论证他的独特的观点。其实对考茨基的问题是可以简单明了地答复的,十行文字就行了。但是伯恩施坦在这两篇文章里说些什么呢?他在两篇文章最后一段的结尾写道:“在今天,即当工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进行比以往更实际更有效的斗争的时候,人们的确用不着神经过敏,担心阶级斗争的教条可能遭到损害。”^②这肯定不是明确的答复。他于9月3日才在《前进报》上的一篇题为

① 大卫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前建议分开讨论倍倍尔报告的理论部分和策略部分。——编者注

② 《伯恩施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248页。——编者注

《我对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的态度》的文章中说，阶级斗争是比纲领中一段话所解释的要复杂得多的现象。但无论如何他已不再无视阶级斗争了，他承认阶级斗争是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他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但是，为了缓和、冲淡——如果不是听起来太激烈，我甚至要说熄灭——各种矛盾，他宣称，阶级斗争采取了较温和的形式。我同意这句表达得很明确的话。我们一般说来是变得更加温和了，因为我们是更加文明了，或者说得更好些，是更讲人道了。现在，没有人会因为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被绞死或烧死，工人也不再毁坏采用新机器的工厂了。如果说今天阶级斗争的形式变得更讲人道了，这并不是说，阶级矛盾变得更加缓和了。情况恰恰相反。英国职工会的成就是长期斗争的结果。1898年，德国工人的罢工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防御性罢工，而这一年是最繁荣的一年。事实表明阶级矛盾正在尖锐化。我们处在一个繁荣时期，获得高额利润的企业主宁愿迎合工人，尽管如此仍旧发生了这么多的防御性罢工。但是，如果发生工业衰退，情况会怎样呢？那时候，企业主会千方百计压低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而我们的职工会就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反抗。阶级矛盾尖锐化了。还有一种现象是朝着这个方向起作用的，对于这个现象的意义，我们队伍中还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指的是托拉斯和卡特尔。它们对于工人及其组织来说将变得非常危险，双方之间将爆发严重的斗争。近十五年来，企业主阶级组织的发展比工人阶级组织的发展大得多。当然，我们的职工会的发展也令人高兴，它们的力量和影响都加强了。然而事实上，加入排他性组织的企业主的百分比大于有组织的工人的百分比，尤其是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和瑞恩的大企业主组织还要与工人展开很严重的斗争。这些组织的排他性的目的首先是调整价格和提高利润率。第二个目的是，它们必须成为同工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如果照我的想法办事，必须公布一个法令，规定每个工人必须为改善生活状况加入职工会，就

象每个工人必须加入疾病保险储金会一样。但在实行苦役监禁方针^①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关于卡特尔和托拉斯对工人阶级的意义,我的看法决不是独一无二的。早在1894年,毕歇尔教授在维也纳社会政策协会中就企业主联合问题发表了完全相似的意见,他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建立卡特尔的直接后果都是:在为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中,企业主的地位大大加强了。在卡特尔化的工业中,全体企业主就象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一样面对工人,工人不再能在卡特尔外面找到工作。”这一领域的另一个研究者波勒博士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不仅资产阶级著作家这样判断。工会运动的真实的朋友维伯夫妇在他们的著作《理论和实践》^②中(第93页)说:“与此相反,如果整个工业掌握在一个唯一的大企业主手里,或者由一小批互不竞争的企业主瓜分——特别是,如果为了对付新的对手,以某种方式使垄断受到保护——,那么工联就会发现,它那种相互保证和缔结集体合同的方法简直是毫无用处的。例如英国的大铁路公司和美国的一些资本主义大托拉斯就是如此。面对着现代工业这个庞然大物的无限的手段和绝对的意志统一,最富有的工联的二十五万(英镑!)的财产和一二十万顽强而愤怒的工人的叫喊就象箭射在装甲舰上一样无济于事。……如果国家是企业主,那么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工联就会象单个工人一样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维伯夫妇在其著作《英国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二一七页上还说:

“在资本主义大公司中,由于缺少对立的企业主为雇用工

① 指《苦役监禁法》,这是德国议会于1899年6月提出的法律草案。该法律草案规定,凡组织和进行罢工的人要判处苦役。这实际上是取消工人的结社集会权。因此,德国工人发动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反对这个法案,使该法案未能通过。——编者注

② 《英国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编者注

人进行有效的竞争，因此工人的地位恶化了。战略地位上的差别如此悬殊，以致劳动合同一般说来已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合同了。”

说这番话的人无疑属于工会运动的最热烈和最真诚的朋友之列。我引用这番话的意思仅仅是，工人组织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早在三十年前我就这样说过。但是有人企图粉饰事物，把斗争说成好象愈来愈温和，把情况描绘得好象我们能愈来愈容易对付了，考虑到这一点，必须注意我们所反复强调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越过山顶，我们还站在山的前面，我们面前还有极大的困难。这些组织将给予我们有力的帮助，其必要性将远远超过人们试图描述的那样。在我看来，不言而喻的是，工会以及整个阶级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从某一点开始，工会就无能为力了，这时合作社是否能代替它来工作呢？合作社在伯恩施坦的著作中同样占了很大的篇幅，他认为合作社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伯恩施坦甚至认为合作社是未来社会的主要基础。当然，他认为，党本身不应当从事建立合作社的活动。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既然1893年党的柏林代表大会已经对生产合作社表明态度，我们今天在这里又必须对这个问题表明态度，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件事了。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大部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合作社的、特别是消费合作社的坚决的敌人。面对着舒尔采-德里奇的活动，拉萨尔对这个问题采取断然的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铁的工资规律的理论是他整个学说的支柱之一，因此合乎逻辑的是，他尽管承认舒尔采-德里奇为建立合作社所作出的努力，承认工人中的一些阶层由此获得了小小的利益，他还是认为合作社对工人是不合适的，这首先是因为，按照铁的工资规律，合作社带来的利益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会再次丧失，其次是因为，工人会被引入歧途，为了一些事情浪费他们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如果用在别的事情上本来要好得多。当时在德国工人运

动中有两派：一个是拉萨尔派，另一个是爱森纳赫派。我们从来没有同意拉萨尔的否定合作社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也没有同意他的观点。在当时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没有一次大会不主张建立这种合作社；甚至曾经要求国家把国有土地交给工人来开垦。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一阶段。我们爱森纳赫派以及后来我们党都不支持这种合作社，我们对它采取冷淡态度。在莱比锡、德累斯顿、茨维考等地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一部分发展得很好，一部分在销售方面可以同根特的福鲁伊特合作社媲美，但是我们在消费合作社中占领导地位的萨克森朋友们和其他地方的朋友们至今没有一个想起要声明，这种合作社一定会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或胚芽。这一点直到不久前还是没有人谈到过，现在我也声明反对这种看法。一个成绩卓著的消费合作社会付给每个一年支出四百至五百马克的工人家庭12%的股息，也许这相当于提高工资8%，这肯定是一个好处，但也仅此而已。有人假设，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和为消费合作社工作的生产合作社使资产阶级社会有准备地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我无法赞成这种高水平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我无法想象我们如何用这种方法获得大工业、大地产以及银行等等；用伯恩施坦优美高雅的言词来说，因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不得不力图把贪食奇谈变成真理。

伯恩施坦说：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用暴力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果，也不是由于废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才建立起来的，而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已经高度发展的时候消失。因此，他认为发达的合作社已经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他拒绝社会民主党的被称为贪食奇谈的关于剥夺的思想。他说这样做不但同经济发展相矛盾，而且同普遍的文化进步相矛盾。他说这种剥夺是史无前例的。对此，我回答说：在全部历史中也没有一个象社会主义运动这样的例子。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几百万最底层的工人在文化和思想上发展到

这种程度，自发地敢于对抗整个社会并且明确说出自己的目的是要用一个崭新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来代替它，这种情况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发生过呢？特别是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中以一种在我看来是侮辱工人的方式（我不胜惋惜地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点，我在反社会党人法开始实行时就说过同样的话，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再一次这样说）说，工人没有能力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事情，他们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我回答他说，组织起来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迄今已经到处证明并且每天都在重新证明，他们在政治教养、理解力和工作能力方面都大大超过资产阶级及其在革命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当我想起资产阶级在1848年表现的无能和他们在从那以后一再做过的事情时，当我把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相对比，看到前者的思想水平和生命力时，伯恩斯坦所作的这种批评就是不合适的了。我在这里再说一遍：当伯恩斯坦否认大剥夺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时，他似乎忘记了思考。伯恩斯坦说，我们最终必须实行的这种剥夺是史无前例的，这话不确实。伯恩斯坦这样说是太奇怪了，他毕竟应当知道马克思的观点；伯恩斯坦是否忘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简直是经典的那一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他难道不知道该篇中有一章的第二节？马克思在这一节中说，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是怎样描绘这一过程的呢？剥夺公有地，侵占森林和牧场，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走，这一过程开始于十五世纪，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我还要提到侵占教会财产和盗窃国有土地。在本世纪初，冯·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不是还把一万五千个农村居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用十三万头羊占据了这块地吗？这难道不是大规模的剥夺？

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并且企图阻止党采取认真的行动，然后无限地夸大困难，要党尽可能缓慢地前进，这一切简直象小孩子的胆大妄为。一个党要战斗，要胜利，就必须有热情，必须勇于

牺牲,必须乐于斗争,如果人们在四面八方人为地制造困难,如果人们一再对党说,要小心谨慎、安分守己,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不要吓坏可爱的资产阶级,那么这就会使党丧失这些精神。而在他那本书里,特别是在它的最后一部分,到处都可以听到所有这些言论,简直多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在那本书里,伯恩斯坦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有能力完成你们的任务!当然,如果他只是想说,你们应当学习,实行和熟悉工作,那是可以的,不过见鬼,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这样做吗?但他总是在哲学上探讨小杂货铺对我们的利益还能产生什么损害,那我是爱听的。如果我们的任务仅止于此,如果我们不应该怀着最后必胜的信念瞻望未来,那么我早就该低头认输了。

我们再谈谈所谓贪食奇谈吧!咳,见鬼,整个宗教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德国的邦君们宣称反对教皇和教会,赞成路德,他们的目的不是精神的,而是完全物质的。侵占教会财产是宗教改革的推动力。德国资产阶级同情宗教改革是出于对僧侣的仇恨,他们想取消豪华奢侈的教会仪式和许多节日,归根到底是为了工作、节省和积聚资本。德国的资本主义时期,数世纪之久的资本主义发展正是以这次宗教改革为起点的。

难道伯恩斯坦对农民战争及其结果,对各文明国家中的清地,对侵占公有土地等等一无所知吗?在梅克伦堡,从三十年战争到1848年,在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三个农庄当中几乎有一万二千个消失了。在波美拉尼亚,从1628年到1812年,有一万二千个农户消失了。

其次,我请你们回想一下法国资产阶级实行的大规模剥夺。并不是路易十六的斩首奠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的,只是通过没收贵族和僧侣的财产,通过建立小农庄,才根除了封建生产方式。1815年,流亡的贵族重新回来,法国不得不付给他们十亿法郎的赔偿费,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站稳脚根,不可改

变了。而在我们德国，革命只进行了一小点，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的工作做得不彻底，我们今天还不得不同封建主义进行搏斗。再说美国的奴隶大解放。在伯恩施坦看来，这大概是伦理观点在起决定作用了，大概是出于对贫苦奴隶的同情了。北美资产阶级是要消灭奴隶制，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成千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被剥夺了。从伦理的观点上看，人们大概会把这叫作偷窃。但是只要能达到目的，我一点也不关心词句。

我们再来看看在成长中的意大利，它今天的政治经济生活是建立在没收教会财产之上的。被榨取的财产有二三十亿法郎。

用不着劝告我们只应当采取“伦理”的手段。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们总有一天要在德国实行大剥夺——不过抱歉的是，还要再拖延一些时候，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怎样通过合作社把克虏伯家族、施杜姆家族和劳拉许特家族等等的大地产、大银行等收为国有一—如果那时我有幸还活着，我要向你们作最精彩的演说，证明我们根据“伦理”的理由，根据公益的理由，有义务进行剥夺。由此可见，还是要坚持剥夺，我们不放弃这一点。

我们没有必要使用暴力。我总是说：我为在所有的争斗中倒下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惋惜。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事情，而根本不在于人；相反，我希望，所有有关的人都在场，并且观察我们做得多么好。我们对于暴力革命的想法，党内是没有人怀疑的。如果假定在我们党内哪怕有一个人，当他认为他的目的能够好得多、容易得多、简单得多地达到的时候，还想制造一场革命，那么这种假定是很荒谬的。革命不是革命派制造的，在任何时候都是反动派制造的。伟大的歌德对他的埃克尔曼^①说，革命

^① 约翰·彼得·埃克尔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 1792—1854) ——歌德的私人秘书。——编者注

的到来只是政府的罪过；我可以从包括老蒙森^①在内的著作家那里给你们举出一打这样的句子。老蒙森在他的《罗马史》中作了如此经典式的阐述：如果一个政府证明自己无力解决与大多数国民的利益有关的任务，那么举行革命就是一项权利，有罪的不是那些奋起使用暴力的人，而是挑动暴力的人。同志们，在我们德国，资产阶级本身也总是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

现在的财政大臣冯·米凯尔博士从前是共产主义者和农民起义的组织者，曾经是我们的党员同志。他一进入财政部，就打算实行财产税，办法是很温和的，并且不包含累进税率，于是《科伦日报》声明：人们将不得不改变对君主政体的观点了。资产阶级明天可能成为共和主义者，如果共和制对他们有利的話，然而他们今天是君主主义者，因为目前君主政体对他们很有利。瑞士的资产阶级怀着充满欲念的爱情注视着德国，特别是柏林，他们简直是迫不及待地指望德国把瑞士吸收进去。正是在瑞士有着一系列民主制度使资产阶级感到不舒服，瑞士也不存在常备军，这种常备军是有可能向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开枪的，民军却不会这样。虽然我们德国目前的状况是如此可怜，简直无法想象比这更加可怜的了，然而，瑞士的资产者还是愿意容忍我们的各项制度，因为他们对自己说：我们在那里有强大的君主政体，它维护财产的神圣性，同时也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伯恩施坦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议，告诉我们总的说来应当怎样对待资产阶级。这些建议大体上是这样的：要温文尔雅，不要使用粗暴的词句，不要惊吓资产阶级。我要建议他做一个政治上的“克尼格”^②，写一本论与政敌交往的书。没有这种指令，我担心我们在他的眼里始终会是罪孽深重的。

① 泰奥多尔·蒙森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 ——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编者注

② 阿道夫·冯·克尼格 (Adolf von Knigge 1752—1796) ——德国作家，著有《论与人的交往》一书。——编者注

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中还说：“bürgerlich”一词的应用是一种返祖现象，或者无论如何是一种语言上的含混。社会民主党不想用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制度代替市民社会制度，而是想用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①但是同志们，难道我们不是很普遍地把我们的敌人叫作“资产阶级政党”吗？这是如此正确，以致我们的敌人也接受了这个说法。我们不说人民的解放斗争，而是说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虽然资产阶级的主要战役是工人们打的。1848—49年度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的问题是从阻碍资产阶级自由的一切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我们用“资产阶级”这一词还表示我们与别的政党的区别。不管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个别成员如何对待我们，不管他们多么主张自由主义或者追求理想的伦理，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这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不愿怀疑现存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这是决定性的。我们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因为我们力图用崭新的、与资产阶级制度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现存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按照这个方向，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最明显的界线。首先，我们也必须坚持认为，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什么呢，纲领上说得很清楚：因为所有其他的阶级，尽管互相之间也有利害冲突，但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并且是把保存现存社会的基础作为共同目标的。我想这说得很清楚了。伯恩斯坦怎么会想要修改我们纲领中的这一原理呢？他说，对工人阶级表示善意的那些人的数目在与日俱增。但是，资产阶级怎么会关心我们呢？请你们想一想拉萨尔去世时资产阶级发出的欢呼声吧，他们以为，工人运动就此完结了。但是，尽管如此工人运动仍旧开展起来了，这一发展首先促使资产阶级思想家去研究怎么会发生这

^① 参见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95—196页。——编者注

样的事。他们感到必须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著作。尽管人们可以各行其是，但他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学者胜过资产阶级学者，因为我们的学者不象资产阶级学者那样直接同阶级利益有关。于是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功劳，尽管敌人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然后，我们强迫国家承认了我们。最后，我们还强迫国家至少部分地承认我们的作用。我想起1880年威廉皇帝在国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他在其中不得不明确表示：我们想镇压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想承认它的合理的核心。难道这种让步也仅仅是为了体现正义吗？当然，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我很惭愧地谈到这一点——近几个月根据帝国议会关于苦役监禁法案的讨论说，这证明伯恩斯坦是多么有理，证明巴塞尔曼之流和黑尔之流等等心地善良。这样一些人还能自称社会民主党人吗？他们是鼓吹调和的使徒。但是，难道我们曾经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我们不同，就疏远他吗？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把两位东普鲁士大地主作为我们自己人的代表来欢迎，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稀有人物。我们曾经研究过那些不属于无产者、而是出于理想主义转到我们这一边的人们。我总是说，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多多益善，如果有谁作为真诚的党员同志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有一切理由为之高兴。但是，无论这批理想主义者的数目多大，他们同全党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样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而且他们受到本阶级的蔑视，在社会上受到排斥，有时还忍受着无产阶级所不知道的痛苦。

农民战争顾名思义是农民参加的战争。但是在农民战争中，有弗洛里安·盖尔，托马斯·闵采尔，米哈埃尔·盖斯迈尔，甚至还有葛兹·冯·伯利欣根。难道因为有这些人就不能称为农民战争了吗？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被压迫阶级的领袖都来自统治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有米拉波、西哀士和贵族、僧侣的其他代表。难道因为有这些人，革命的性质就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那么我们自己的情形又怎样呢？象拉萨尔、马克思和

恩格斯这样一些人是什么人呢？是无产者吗？尽管如此，我们的运动还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并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非常明确地要求的那样，如果要使我们的运动不致毁灭，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

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的第138页上说，德国市民阶级之所以变得更加反动，是因为它的所有的分子都感到同样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威胁，有一些是感到自己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另一些人是感到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利益，即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爱国主义，自己的想使国家免于—场暴力革命的痛苦的愿望受到威胁。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一点。^①对此，我回答说：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支持者竟如此愚蠢，以为我们想搞暴力革命，想把头往墙上撞，那么我们对这种蠢事是不负责任的。的确，他们感到自己的物质利益受到我们的威胁；要是我们想隐瞒这一点，那是伪善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利益是什么呢！恰好是束缚工人阶级的缰绳！资产阶级在其内心深处完全同我们中间的人一样，也是不信神的。他们现在到教堂去，是由于害怕我们，也是为了引诱工人到那里去，因此学校中的愚民教育变本加厉。他们有爱国心吗？哎呀，我们的爱国心要完美得多。因此，要我们不去损害所有这些思想意识的利益，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构成我们的本质的一切和我们至今在鼓动工作中所维护的一切。我开诚布公地声明：一旦伯恩施坦在这里为之辩护的那些原则在党内得到实行，我将宣布：你白白地工作了三十六年，现在你走开吧，去沉思默想吧。这是欧根·李希特尔的笔法！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浪费时间来对那些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熟知的事物进行辩论。难道市民阶级在它的解放斗争中的所作所为与我们不同吗？与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资产

^①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08页。——编者注

阶级诗人的诗作相比，我们的诗人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儿戏。有人提醒我们不要攻击宗教信仰，我只能说：在反对利用宗教来进行愚民教育这一方面，我们做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在这一领域我们的报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施坦就自由主义和市民阶级所阐述的那些观点，在122、126、130等页上，他从消极的意义上把民主说成是防止一个阶级的统治。他在129页上说：“给自己加上自由的名义的政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卫士，或者在发展过程中成了这样的卫士。在这些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当然只能存在敌对的关系。但是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的继承者”^①。最后这句话非常明显地与前面讲的那些话相矛盾，对此我可以简单地讲几句。伯恩施坦在其著作中以哲学上极端含糊和矛盾百出的方式长篇累牍地分析“自由主义的”和“民主的”这两个词，然后声明：这些政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当然只能存在敌对关系，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唉，如果伯恩施坦把他的书的所有篇章都删掉，只写这句话，我们就一致了，一切混乱都不会发生了。他的哲学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哲学观点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现实情况即物质情况的反映。无论何时何地，自由主义都可以说是市民阶级的政治代表，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它与前者是针锋相对的；这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是相反的。正因为自由主义的政党是市民阶级的卫士，所以我们不愿与他们建立联盟，以免损害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最近几天对机会主义谈得很多。我要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大家都是机会主义者谁也不想明天就走上街垒。争论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永远争论下去。当我们意见不一致的

^①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97页。——编者注

时候，当我们争论我们应当继续走下去还是到此为止的时候，总会有问题出现。我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已经阐述过这一点，只要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我们就回避不了这一点，如果社会民主党有朝一日成为执政党，并且实行了它的社会设施——那么我们之间更加要进行争论，而且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有的人自命比别人更聪明些，而且或许也是更聪明些。我们也在我们的联合会中争论什么是最好的管理方式，谁是最好的人选。因此观点的分歧总是有的，如果没有这种分歧，社会将是多么单调无味呵！——在这样的社会里，我宁愿明天就死，或者到博托库特人^①那里去，因为我以为在他们中间倒还能找到反对派。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共同的基本观念；没有这种共同基础和共同的基本观念，当然就不能互相理解。

但是，同志们，伯恩斯坦从他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对独特的自由市民阶级（他自己也承认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的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合乎逻辑地作出结论说，我们应当称自己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改变我们的名称。在他谈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命力、谈论了与资产阶级缔结协定的可能性、谈论了有许多人对我们怀有善意以及阶级斗争缓和等等之后，这样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最有力地证明了伯恩斯坦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距离多么远。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敢这样说并向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再说一遍，我们在本质上是一个革命的党。但是这不仅不排斥、而且包括这样的意思：当我们能够取得改良时，我们不拒绝改良。我们的纲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纲领分成原则部分与实践部分，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夸大了一些事情。当然，我们曾就议会制度的意义展开了争论。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参加议会活动，我们应当赞

^① 巴西东部的印第安人。——编者注

成还是反对某一法令，国会党团曾经就这些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最近，关于民法的争论就是如此。国会党团中一部分人希望我们投票赞成它，但多数人反对。

但是尽管有这些斗争，我们还是从1867年起向国会提出了许多提案，并且还参加了委员会，例如1869年参加了国会的工商业条例委员会。即使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期间，我们还开展了实际活动。我们提出了大量有关疾病、不幸事故和残废的法律草案。如果说我们没有开展实际的活动，这是不确实的。我们的活动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向我们作出让步。俾斯麦1885年在国会中对我的朋友奥艾尔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伯恩施坦对国家民主化的必要性谈了很多。这的确是必要的。我们曾为此大声疾呼，但是二十多年来，德国究竟在什么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政治进步呢？

选举权、结社权是否有改善呢？在萨克森，选举权的情况恶化了，在迈宁根，市镇选举权的情况也恶化了。如果在巴伐利亚要实行选举改革，那么我要对你们说，假使这种改革对教会没有好处，它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不背叛我们的原则，不损害我们的策略，我决不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暂时合作。我们为什么不接受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呢？一两个能干的人，好比鲤鱼池里几条大梭子鱼，他们在主要问题上出来发言就足够了，就能发生作用了。我们看到，1871年我们是怎样利用国会的。在邦议会上我们可以谈论一系列很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在帝国议会上却不能谈论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能够获得的利益，因此我要宣布，我不责备巴伐利亚同志在最近一个阶段的行为。这样说也许是说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巴伐利亚同志是处于迫不得已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德国的情况不好，我们不是生活在象法国那样一个统一的、比较民主的国家里。如果我们在二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里存在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我们就不会对我们的策略进行争论了。但是，我们被关在门外，于是，只要能

摆脱困境，即使采取令人不快的方式也可以。如果说尽管如此我还要责备巴伐利亚的同志，那就是责备他们没有正确地利用初选得到的地位，却竭力去获得尽可能多的议席，从而忽略了我认为在有些时候比几个议席更为重要的东西；是责备他们没有尊重斯图加特决议，竟然对中央党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狡猾阴险的党宣布，我们投票支持你们，但劳驾请你们承担义务在选举权问题上作一些让步。如果说巴伐利亚同志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策略错误和原则错误，那么去年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就不该以接近全体一致的多数通过一项决议，事先认可了所有这些所谓违反原则的错误。如果这是对党的背叛，那也就不应当允许暂时的或例外的对党的背叛。这种事我们的巴登同志两年前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已做了，并没有人过问，而且他们现在又打算这样做，因此如果我们想在巴伐利亚谴责这种行为，那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我再说一遍，在这一点上，没有发生什么错误。

我想在我的决议案中在这一方面尽可能做一些保留。我的决议案对这一点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假使我们不排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原则立场决不会因此受到损害。我们的全部努力本来都是为了尽可能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具有更高的战斗能力来实现我们的伟大目的。

决议案还说，党一如既往地反对在海上和陆上搞军国主义，反对殖民政策。伯恩斯坦对这一点也说得矛盾百出和含糊不清，只会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混乱。

我再说一遍，我要特别谴责的是，伯恩斯坦确实使我们害怕胜利，他似乎企图使我们厌恶胜利；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会共和国之中。但是，把目标推向遥遥无期的未来，使党丧失牺牲的勇气、热情、献身精神即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品质，并且千方百计制造人为的困难，破坏人们对胜利可能性的信念，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策

略。我要专门说一下极其缺少知识分子这个一再受到强调的问题，我告诉你们，同志们，我们一旦确实地掌握了政权，我就不为知识分子问题担心。那些在资产阶级队伍里工作的知识分子将做什么呢？难道你们以为，如果我们尊重公务员、技术员和工程师等并且给他们以较好的报酬，他们会罢工、不愿与我们合作吗？我告诉你们，那时甚至会有一大批枢密顾问到我们这里来，或许还有部长呢！官僚们不过是机构的管理人；当然，我们要把这种机构设置成另外的样子，但是那时它会比以前的更好。无论如何，我们决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的策略和我们的名称。我把我的发言概括为一句话：我们一如既往。我请你们尽可能一致地通过我的决议案。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年柏林德文版第94—127页。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爱·大 卫（摘录）

（10月10日）

同志们！伯恩施坦的处境尴尬，他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因而他一上来就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对他（作为人和同志）进行人身攻击。我们有义务对他采取这种态度，但我发现，倍倍尔有好几次没有顾到这一点。

谁也不会对伯恩施坦的每一项主张都表示赞许，但是他的基本观点是应当维护的。我是属于赞同他的基本观点的人。听了倍倍尔的报告，我仍然有勇气说出上面这句话。如果倍倍尔对伯恩施坦的观点的一切描述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就鼓不起这样的勇气了。我将提供证据来说明，倍倍尔在叙述伯恩施坦的立场观点时有好些地方是很不正确的。

在考察伯恩施坦的陈述的时候，我愿意把他的观点的积极的一面放在优先地位。倍倍尔则相反，他更多地强调消极的一面，他更多指出的是伯恩施坦使我们丧失的东西，而不是伯恩施坦给予我们的东西。伯恩施坦确实给了我们一些东西。我想首先提到的是伯恩施坦的这一面，我希望我能够证明下面这一点，即伯恩施坦的书^①贯穿着一个统一的基本思想，决不是象这里所说的那样条理紊乱、含混不清。当有人提出一种新的、独特的思想的时候，最初的效果会是：维护旧事物的大多数人只看到他对旧事物的批评，他们不具备能够容纳新事物的统觉中心。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编者注

我想马上把话题转向一个主要问题：赞同伯恩施坦的观点的人怎么还能自称社会主义者，自称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的反对者认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

人们一直在这样说：在伯恩施坦的书里存在一大堆矛盾。然而，人们发现，最大的矛盾是伯恩施坦仍旧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他把伯恩施坦称为“Apostata”，即叛教者。这个字出自教会斗争。Apostata指的是背离宗教信仰的人。选用这样的字，已足以说明这种批评方式的精神实质了。施泰恩同志在斯图加特写道：

“爱德华·伯恩施坦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了。——想把这个事实隐瞒起来，那是愚蠢的！……的确，他怀着明确的、赫罗斯特拉特^①式的敌意，向马克思主义的神殿投掷了批判的火把，把它变成了一片瓦砾。”

与此截然相反，《前进报》（第74期社论）说，如果资产阶级报刊的批评家费心细读伯恩施坦的著作，那么他们将会发现，“伯恩施坦根本没有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和‘最终目的’，即把一切生产手段转为社会所有和按集体的（社会主义的）原则组织生产”。

接着，伯恩施坦的有名的文章在《前进报》上登出来了。倍倍尔“终于”发现这篇文章确认了阶级斗争。然而，这篇文章曾经在《新时代》编辑部搁了四个月之久。所以说，“终于”一词是不该用的。现在呢，李卜克内西发现“伯恩施坦的忏悔书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明目张胆的否定”（请参看他的新著《不作任何妥协，不要选举同盟》）。在第18页，他认为，伯恩施坦的攻击必然“使我们整个世界观的基础瓦解”。既然伯恩施坦的反对者在这些矛盾之间摇摆不定，他们就不应当作出这种样子，似乎“矛盾”仅仅存在于伯恩施坦这一方。然而最

^①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留名于后世，竟焚毁了有名的阿尔蒂米斯神殿。——编者注

为滑稽的是：在李卜克内西脱了毛，表示赞成施泰恩的观点以后，施泰恩却再度脱毛，回到原来的观点了。施泰恩在《汉堡回声报》（9月23日）上宣称：“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是：由于他^①承认生产的社会化，他完全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再次确认他是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认为，讲明上述情况，是对为党作出贡献的一位同志应有的忠诚。”

因此，伯恩斯坦是不是社会主义者，这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现在我要直接提到“最终目的”这个问题，我想把它当作我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我们的纲领的第五段从两个方面明确规定我们的最终目的，这就是生产这一方面和分配（商品的分配）这一方面。纲领中说：因此，关于第一点，我们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关于第二点，我们要求以生产物品的社会主义分配取代资本主义的货物交换。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伯恩斯坦试图根据社会主义一词的语源 socius（德文的 Genosse，同伙）给这个经济原则下一个定义，把它称为生产和分配的“合作”制^②。我认为，这个定义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可能引起误会。多数党员同志听到这个名称，就会想到合作社，并且说，由此看来，伯恩斯坦就是一个合作主义者，仅此而已。上述定义可能使人过分狭窄地理解问题，我要说说我是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个原则也许可以叫作生产过程的“社会”制。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况是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有决定的权力，并占有剩余价值，我们能够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述与此相对立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有一个使任何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都不可能存在的制度。

因此，承认这个原则的任何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不承认这个原则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伯恩斯坦和他在党内的追随者

① 指伯恩斯坦。——编者注

② 参见《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45页。——编者注

也都是承认这个原则的。

与此相反，关于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得到实现的时间，我们的纲领并不要求有一个确定的看法，纲领中对这一点什么也没有说。是要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五十年还是要过五百年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党员对此可以有种种看法。倍倍尔责备伯恩施坦总是说“慢慢来！慢慢来！”但是党内有人不相信一夜之间就能成功，这是大好事。倍倍尔今天说：山还在前面。实际上按照他以前作过的预言，我们应当在一年以前就越过大山了。

我们的纲领仅仅相对地规定了时间。第七节说，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之前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大家都重复了这一思想，卢森堡女士，累德堡，考茨基都提了。倍倍尔也在他的决议中表述了这一思想。我们应当夺取政权并且“依靠政权”实行生产手段社会化。

现在我要假定有这么一个人，他相信在这以前工人阶级就已经能实现社会主义。他大概不是社会主义者吧？（喊声：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我却认为他是。如果说，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那么就不能把现在已经承认这个原则的人排除在外。有这样的人，他们说，我们能够通过合作社从里向外把资本主义国家吞掉。这是唯合作主义者。我不属于有这种想法的同志；我也认为伯恩施坦不是这样想的。大家知道，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同唯物主义历史观有矛盾。唯物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经济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前提。考茨基反对这一观点，他的论据是：不需要把经济权力理解成无产阶级必须先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然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它也就有了经济权力。我不认为这一论据是高明的，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农奴在封建生产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农奴，骑士就要挨饿，而古代的奴隶也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从来就有经济权力。不

过这只是顺便说说的。要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我必须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我却不想在这里谈。

还可以设想有第三种可能性，伯恩斯坦是主张这一可能性的。他说：先夺取政治权力，后夺取经济权力，是错误的；反过来说也是错误的；不如说必须二者同时进行，互为条件，相辅相成。通过这种方式将来有一天就可以达到“最终目的”。

如果你们肯定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人们列举的伯恩斯坦的滔天大罪，有一些却是有道理的。你们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最终目的，对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的看法，立刻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一个人如果并不认为运动仅仅包含民主化的原则，而是认为在当前社会的基础上已经有社会化过程，那么他说社会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运动（我们党的名称就是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对他来说是主要问题，而人们通常所说的最终目的即相当突然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看来价值较小，他这样说就会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无论如何，那时人们就不应当不加思索地、简单地宣布伯恩斯坦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说他满足于改良，而放弃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有人会反驳说：在当前国家的基础上不可能促使社会主义原则取得胜利。伯恩斯坦说，这确实是可能的；我同他一起说：这是可能的。我也不害怕因此招致非难，被人说成是“傻瓜”或者“糊涂人”，或者被加上人们用来骂我们“机会主义者”的随便什么别的好名称。一个人必须对什么事情都习惯才行。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在今天就已经能够胜利的最好证据就是这一事实：这个过程已经在我们眼前进行着；这不仅是从资本主义为生产的社会化组织作了准备这一意义上说的，而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今天已经在取消、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的资本主义权利和资本主义权力已经在废除这一真实的意义上说的。

有人会反驳说：“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取消任何私有财产”，

“我们毕竟没有实行剥夺”。不，我们是做了这些事的！什么是所有权？这是指一些权利，它们允许我任意处理某种事物。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意味着我能够任意处理生产资料。如果你们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就会对我承认，不仅可以从表面的意义上来理解剥夺，即把它理解成从某个人那里拿走某件东西，而且也可以通过一项接一项地夺取他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利来剥夺他的所有权，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从里向外对他实行剥夺，挖空他的财产权利。在这一意义上说当然已经能够在今天社会的基础上实行剥夺。当然不会突然实行，因为这样的剥夺从来不是突然完成的。如果发生政治上的剥夺，那么对剥夺对象的所有权通常是已经从内部被动摇了。

伯恩施坦只不过是说，如果没有事先就已经从里向外限制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就不能通过在政治上突然一挥手来完成最后的剥夺。他说，如果人们简单地夺取机器等等，那么会得到什么呢？拿到手的只是空壳。你们由此可以看到，倍倍尔对伯恩施坦的理解是错误的。比方说，如果今天通过法律废除资本家自由使用他的机器的权利，如果禁止他开动机器二十四小时，十二小时，六小时，三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剥夺。每一次根据社会的权威性命令缩短劳动时间，资本家就丧失他对生产企业的一部分所有权。如果我禁止他在随便什么地方开动机器，或者在使用妇女和儿童操作这些机器方面加以限制，结果也是一样。

我们作为政党也早已知道，人们今天就已经能够实行对资本家的剥夺，当然始终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实行。我们的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确实已包含一些决不是政治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是同限制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利有关的。我们在那里甚至表示要对工资支付的情况进行干预，也就是要求禁止实物工资制。不仅是我们这样做了，马克思也用明确的语言表示，他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在今天的基础上已经能

够取得胜利。他说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一个原则的胜利^①。这个原则认为，财产私有主没有权利以他的生产资料来做符合他个人利益的事，而是存在着一个社会权力，它对生产资料拥有社会权利，并且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行使这一权利，使资本家丧失它对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支配权。

伯恩斯坦把马克思这句话作为题词放在他的书的扉页上，可见这一观点是他的书的基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说作者是用一句题词给人们提供理解他的书的线索。可惜，书的批评者们很少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党也是经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才争取到参加议会活动的权利的，当时反对派说：在目前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是排除社会化的可能性的，那么你们在议会中干什么呢？议会政治的拥护者反驳说：我们想首先夺取议会讲坛来进行鼓动，我们想通过它来教育无产阶级，启发无产阶级对自己地位的觉悟。在这以后，关于议会活动也具有积极意义的认识愈来愈发展，而我们的同志们在议会中维护经济要求的热情证明，他们不仅打算发挥鼓动作用，而是愈来愈感到，在当前社会的基础上已经能够实现一部分社会主义，当然还有人反对这一观点，象卢森堡同志就是，她现在还认为议会政治是卑鄙透顶的。她在反对伯恩斯坦的论战中说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鸡棚”。好吧，如果她处在能够当选的地位，她肯定会拒绝在那里下她的社会主义的蛋！

在工会斗争中，我们在逐步用集体主义权利克服、渗透和代替个人财产权利方面还走得更远。工会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纯粹的表现；伯恩斯坦从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点，这本来应当使他不致受人指责，说他没有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既然一个人对工会运动的意义的评价超过其他方面的人通常所作的评价，那么毕竟不能说他否认阶级斗争了。如果你们今天通过一项从头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1—12页。——编者注

到尾都和伯恩施坦一致的决议，那么阶级斗争决不会因此走上邪路。工会队伍中的人们恰恰是同伯恩施坦接近的。工会比议会进一步要求缩短劳动时间；在工会里，不仅从理论上反对自由缔结工资合同的权利，而且事实上已经部分地废除了这一权利。在英国的大的工联里，也就是在熟练程度较高的工人那里，劳动合同通常已不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了。难道你们不把这称为取消私有财产，难道你们不把这称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贯彻吗？难道德国印刷工人的工资协议也不是社会主义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取得的很好成就吗？我不想在这里维护这一协议的形式和期限，我对它的了解一点也不详细；我只是把它当作一项原则方面的成就来谈论的。

根据维伯夫妇提供的情况，英国百分之九十的熟练工人已用集体劳动合同代替个人合同。难道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成就吗？

倍倍尔前些日子说，只要工人的敌人一旦充分联合起来，那么联合起来的工人就只能发挥很小的力量，他还举防御性罢工为例来说明联合起来的工人的软弱，但是他忘记了，目前的工会组织的软弱不是由于雇主的强大，而是由于广大工人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他们从背后袭击了罢工工人。维伯夫妇决不是认为工会组织将来不能取得胜利。我在《社会主义月刊》（1899年第10期）中看到从维伯书中引用的话：“整个工人阶级一方面联合成一个合作社联合会，另一方面联合成一个工会联合会，这在事实上就会把国家的统治权交给工人。”

如果各国工人阶级都在工会里并且——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谈到——在合作社里组织起来，那么他们就有了政权，那时他们也才会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挖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剩下需要处理的事只要以漂亮的姿势一挥手就可以完成了。从原则上说这一观点是无法反对的。

但是，关于工会现在已经能取得积极成果的观点还必须在

社会民主党内给自己开辟道路，这也是十分说明问题的。倍倍尔在科伦就已经宣称，资本家一旦组织起来，工会的丧钟就敲响了。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即使企业主的联合遥遥领先，但企业主之间毕竟存在着利害冲突，阻碍他们加强团结的感情。

如果我和伯恩施坦是所谓的唯工会主义者，如果我们认为只有经过工会的途径才能促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那么你们的反驳就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另一个因素，合作社的因素。考茨基在上一期《新时代》上，从“较高的见地”出发把对立解释成无产阶级思潮同人民党思潮的对立——顺便说一句，这一观点我是断然拒绝的——，但我认为很有趣的是，在这篇文章后面紧接着是王德威尔得同志的一篇文章，读了这篇文章就令人感到，毕竟还有另一些手段能使我们在目前社会的基础上取得某些成就，而我们德国人在运用这些手段上并不完全是走在前头的。

合作社运动涉及前面强调过的我们的最终目的的第二个方面，即分配方面。合作社运动试图在货物分配方面现在就废除表现在自由的商品交换中的资本主义财产权利。我从一开始就请求在这次讨论中不要对我提到舒尔采-德里奇，或者提到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生产合作社，而只提到在所谓罗契德尔原则基础上建立的那些合作社。（倍倍尔喊道：这是股份公司！）不是的，如果在这种合作社中有一些获得了剩余价值，那它们当然是还背负着资本主义习惯的重担；但是社会主义合作社的红利仅仅是它们通过取消中间商业而获得的节余。这些红利不能同股份公司的红利相比。误解是由这一不幸的状况造成的：当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用同一个词来表述时，通常是简单地搬用较老的概念来解释这二者。

倍倍尔在他的决议中说，不能认为合作社对于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什么叫“决定性的”意义？在政治生活中哪些因素是决定性的，哪些不是？没有一个单独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它们只有加在一起才起决定作用。可见

不如这样说更好一些：人们认为合作社具有参与决定的意义。至于应当把这意义估计得多高，我们当然是不能知道的。

如上所述，罗莎·卢森堡同志对工会的价值估计得较小，并且认为，英国的工会正处在衰退之中。（而考茨基，他最近发现英国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他同卢森堡的看法相反，他认为英国工人已做到迫使企业主放弃他们的一部分决定权和财产权。）她也十分顺理成章地声称她认为合作社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她说，如果人们想用合作社取得某种成就，那么在她看来，这好象是想用一个顶针来汲干大洋。合作社已经给工人提供了几十亿，如果她想把这么多钱放进去，那她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顶针了。人们当然可以说，同我们将来进行彻底改造时所得到的比起来，这是微小的；但是现在的微小成就毕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人们现在已经把它拿到手了。何况人们并不需要因此就放弃未来的更多的成就。

.....

我现在回过头来谈本题。伯恩斯坦认为，社会化过程同民主化过程必须齐头并进。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我同样认为，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促使运动按有利于社会化的方向发展，以便工人阶级的影响能在一切领域同时扩大。伯恩斯坦的见解实际上是以某种统一的思想为基础的，从这一思想出发就能消除矛盾。但是他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明确地说出了这一点。那里是这样说的：观点中的矛盾基本上可以这样表述：是通过经济组织获得解放还是通过政治暴力的途径用剥夺来解放工人阶级。他这样说决不是要求放弃我们向来的实践；他却说：你们现在已经做了正确的事情，你们根本不需要改变你们的策略。他根本不想使我们的活动走上邪路，他只是对我们的实践作了另一种评价，而这是很重要的。人们把我们的当前工作叫作应付手段，叫作修补工作，认为它不能获得重要的成就。人们甚至诽谤这种工作，说它在一定情况下会妨碍运动的

进步。罗莎·卢森堡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引用马克思的话（不过我没有查到这句话），说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把工人保护法看成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东西。这还是那个老观点：如果今天就给工人提供某些东西，那么在一定情况下就有阻碍革命运动的危险。人们还进一步论证这种蔑视当前工作的态度，他们说，主要的问题是进行社会革命的宣传以鼓舞群众。“最终目的”应当成为我们的指路明星。我们行动的指路明星是社会主义原则，是民主化和社会化。这是我们的主导思想，它防止我们成为资产阶级改良家，防止我们满足于小事情而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

当然有这样的人，他们对于细小的、当前能够争取得到的东西毫无热情，他们为了不丧失斗争的乐趣，总是不得不仅仅注视着最终目的。但是群众并不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对于最终目的的关注、纯粹社会革命的宣传并不会使他们更加激烈地波动起来。在选举时我们用什么办法鼓动群众呢？那时我们完全本能地把重点放在取得实际的、眼前的、已经把握得住的好处上，同时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原则。工会运动也同时在起作用，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当真想夺取政权，那么对当前工作的较高的原则性估计并不是障碍，而是很大的促进。今天究竟是谁在掌握政权？人们不加思索就会回答：资本家阶级。当然如此，但是有一部分政权他们毕竟只有在获得无产阶级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掌握。施杜姆并不是本身就是执掌政权的人，而是把他选进国会的那些工人给了他一部分政权，使他能在国会中行使这一权力。必须首先从广大的还没有觉悟的群众那里把政权夺过来，我们最恨的敌人是群众的愚昧！这不是什么新发现的真理。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论证，如果人们承认当前工作具有原则性意义，就会使夺取政权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伯恩斯坦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如果说，谁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谁就会力求夺取政权，谁不想夺取政权，例如伯恩斯坦，谁就不是社会民主

党人。如果说一个伟大的运动必须有理想，那么倍倍尔不妨判断一下，当他把工会运动说成是一支在十分危险的阵地上作战并且一定会被迫从那里撤退的队伍时，这对工会运动来说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认为，他这样说可以使工会更加容易夺取权力吗？不，如果有人，例如伯恩施坦，把重点放在当前工作上，那么他并不会因此放弃实现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了它的实现。

……

11月10日大卫继续发言：

……

由此可见，伯恩施坦的著作并没有同社会化原则决裂，它基本上归结于一点：说出对当前工作较高的原则性评价。当然我们今天即使没有这样的较高评价也是不断关心当前工作的，但是人们是仅仅把这一工作看成“应付手段”，还是看成伟大的未来建筑的基石，毕竟是不一样的。我坚决反对人们在背后毁谤伯恩施坦或我，说我们对政治运动重视不够，说我们似乎认为只有工会和合作社才能得到好处。不，我们不是这样想的。应当把重点放在所有这三个领域，即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和政治运动上，应当高度重视这个三位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全部力量。

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三方面的发展都不是以同样方式进行的，应当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我也决不会说，党本身应当创办合作社，这样做将是我们可能做的最荒谬的事情。只应当承认合作运动就是一种并行的不可缺少的形式。如果你们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看伯恩施坦的书，你们一定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伯恩施坦给予我们的东西比他使我们丧失的东西多。正是由于对当前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就更加可以确信，现在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内部就已经可以影响价值产品的分配，使它大大有利于工人阶级。这一信心是一个使我们的斗争能够生气勃勃的因素，在政治斗争、工会斗争和合作社斗争中都是如此。这

一·生·气·勃·勃·的·因·素·，·这·一·信·心·，·这·一·较·高·的·评·价·，·对·于·我·们·夺·取·政·权·，·对·于·一·切·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也·都·会·起·促·进·作·用·。·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这·样·概·括·了·我·的·观·点·：高·举·希·望·的·旗·帜·，·不·仅·希·望·有·一·个·较·好·的·未·来·，·而·是·尤·其·并·且·首·先·也·希·望·有·一·个·较·好·的·现·在·。

路·沃·尔·特·曼

(10月11日)

我确实认为，倍倍尔昨天对伯恩施坦的控诉词与其说是诉诸理智不如说是诉诸感情的。但是，为了慎重地弄清楚象目前这种科学上难以处理的、有分歧的争论点，我认为我们在这类问题上既不要自己激动，也不要受别人影响而激动，要让理智的光辉来解决。不言而喻，这里也是以激情为前提的。我坦白承认，我在许多重要的观点上与伯恩施坦是一致的；但是，我不赞成他的书；有些思想我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用另一种方式来论证，也会得出另一种结论。人们不应当从字面，而只应当从使全书生色的精神来理解伯恩施坦的著作。

我以为整个争论搞得太尖锐了。它常常给我一种印象：斗争是这样进行的，似乎是在一次纯粹哲学的斗争中争论辩证法的概念，似乎党的繁荣昌盛或者整个人类的幸福都取决于它。可惜，这种斗争不够实事求是，种种无法控制的个人原因无疑影响了许多党员同志的观点。当李卜克内西在他的论选举妥协的小册子中把伯恩施坦的著作称作“忏悔书”，并说它“扬扬得意地拒绝社会民主党的原则”，“重新承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唯一能超度世人的信念”时，我不得不坚决加以驳斥。这简直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大家都遭到了攻击，我们被描绘成伯恩施坦的帮手和忠实奴仆。人们总是在背后议论伯恩施坦的著作存在着矛盾，但是你们在他的对手那里会发现更多的矛盾。倍倍

尔责备伯恩斯坦和他的朋友们思想贫乏，我几乎想把这叫作无聊。相反，我相信，另一些死守教条的人已经不能设身处地去体会那些脱离常轨的人的思路。因此，我必须详细谈一谈倍倍尔的一些指责。伯恩斯坦说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命题，倍倍尔认为这是伯恩斯坦的一大过错。马克思在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前，事实上已经把资本主义的趋势和结局作为一种图式描绘好了，这一先验的命题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样，所谓的崩溃论与其说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推论出来的思想。还有，伯恩斯坦究竟曾在什么地方否认从前发生过剥夺呢？你们认为他真的愚蠢到连清扫领地和法国革命也不知道吗？伯恩斯坦把“贪食奇谈”理解成一种普遍的和同时进行的暴力剥夺，的确历史上迄今还没有出现过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其次，谈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人们的看法也可能与倍倍尔有些不一样。就思想方面说，社会主义这个词在科学和社会的意义上说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完成。我们确实从自由主义接受了它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重视自身的利益、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意识到必须把最能干的和最优秀的人推到前列。因为这些原则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的基本法则。但是问题在于，要创造普遍的社会基础，在这种基础上，个人竞争能够在平等的外部条件下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是集体主义派。

伯恩斯坦毕竟在原则上没有放弃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仅仅提到某些必要的修改。他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贫乏及其“陷阱”，这些陷阱也转移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里面来了。然而我们宁可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中用“进化”这一精确得多的、内容丰富得多的、更容易为工人们理解的概念来代替“辩证法”！的确，倍倍尔引用了伟大的达尔文的思想。达尔文比黑格尔更接近于我们。但是，只要有人敢于怀疑我们党的官方理论家的主观见解，我们的教条主义者立刻就会嗅出这是对原则的背叛，

伯恩施坦说有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证明一切^①，倍倍尔诬蔑这句话。你们想一想，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五十年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在不同的时期赋予社会生活的种种不同的现象以不同的伟大意义，并对此进行了概括。因此，在个别的阐述中就产生了矛盾和片面性。不能说所有的、一切的意识形**态**都是经济关系的一种简单的反映。在高级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在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中，存在着独立的精神利益和需要，它们按照自身内在的规律和目的而发展。

我要求倍倍尔指出，伯恩施坦在什么地方说过，资产阶级是出于道德的考虑给工人们以结社权并废除奴役的。（倍倍尔：我绝对没有说过！海涅：您确实说过！）倍倍尔如此嘲笑关于怜悯和正义的道德思想，这使我痛心。你们大家在进行批评和宣传鼓动时可都是道德家啊！不过，倍倍尔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使伯恩施坦出丑。倍倍尔从来没有否认这种阶级道德的存在。但是，也有一种超越阶级之上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昨天和今天才有的，它象整个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反对阶级的斗争贯穿整个历史，而我们现时的斗争仅仅是一个历史阶段。

考茨基和倍倍尔目前反对别人提到所谓的“可笑的崩溃论”，实际上这种理论直到不久以前在党内还是存在的。考茨基甚至在他的最新的著作中维护有关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崩溃的“可笑的”理论。这种形式的理论虽然在恩格斯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得到，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的。它在宣传鼓动中曾经风行一时。马克思谈到崩溃时从来没有不提阶级斗争。他始终把“有组织的、联合起来的和训练过的”工人阶级理解成打碎资本主义桎梏并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的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他始终把工会运动说成阶级斗争的基础。请你们重新读一下《哲学的贫困》论述“罢工”的一章，

^①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65页。——编者注

你们在那儿将读到，马克思如何论证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基础。而倍倍尔还是说，工会可能走向绝境。但是，应当如何夺取政治权力呢？选票确实是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可是在德国，选举权同结社权一样，都不是在阶级斗争中夺到的，尽管倍倍尔和梅林这样认为！如果说马克思的某一个定理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法律的和政治的立法记录了经济关系的意志。

所以，我的意见是这样（在这一方面我还要超过伯恩施坦）：可惜，经济斗争在德国是遭到忽视的。但是，除劳动力之外，也必须把消费力量集中和联合起来。我们这里的工会运动经历过什么样的情况，消费合作社运动也将经历什么样的情况。开始，消费合作社运动遭到敌视，后来人们容忍了它，现在人们同情它，但是，人们一定还会继续前进并且说：它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10月11日）

首先谈谈有关个人的问题。有人指责我说，我在皮申的演说中诽谤了我的朋友和多年的战友伯恩施坦。我早就声明，我在皮申的演说中（这次演说长达将近两小时，但是关于演说的报道是很简短的）没有说一句可能伤害伯恩施坦个人的话。敌人说伯恩施坦被我们当成科学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还当成马克思的继承者，我反驳了这种无稽之谈；资产阶级的报纸甚至认为他超过了马克思，这我也驳斥了。我说，就我所知，党内从来没有认为他是科学权威，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进行社会批评、有系统的研究以及创立新的学说体系。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考茨基在他的书中用几百页的篇幅说的话，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同我当时用几百个字所说的是一样的，我没有说过一句侮辱伯恩施坦的话，哪怕只是伤害他的话也没有说。

我从来没有称伯恩施坦是稻草编辑，这显然是对我的诬陷。我说过，伯恩施坦很出色地尽了自己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责任，我明确说过，他不是稻草编辑。我说过，《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由伯恩施坦或者某个人编写的，而是由广大战斗的工人群众、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编写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思想不是伯恩施坦的思想，而是被反社会党人法剥夺了法律保护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伯恩施坦如果不象他必须编辑的那样编辑这个刊物，那就根本不会允许他编辑这个刊物。我只是反对把伯恩施坦说成是他从来没有成为过的那种大人物。另外，有人指责我对伯恩施坦的评价还有一个矛盾，并且提到3月28日《前进报》上的一篇社论。这篇文章只是说，从伯恩施坦发表过的某些声明来看，他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最终目的，与此相反，他曾经表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最终目的。我说这样的话不是要为伯恩施坦辩护，而是要驳斥资产阶级报纸上的愚蠢的文章，那些文章说：“伯恩施坦是我们的人，我们所希望的一切正是他所希望的。”我在文章中嘲讽地问敌人：难道你们也想要伯恩施坦明确表示拥护的那一最终目的吗？

伯恩施坦的著作正是包含了应有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都有。除了完全正确的、但也决不是新的观点以外，我们在这本书中到处碰到与社会主义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学说和言论。伯恩施坦是充满矛盾的，但是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占优势，如果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结果就会使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政党。我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我今天对伯恩施坦的这个判断，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一个具有革命气质的人，也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伟大的科学权威。两年前在英国，他在和我谈话时说，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最后结果，当时我就看出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如果伯恩施坦说的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么这还讲得过去，但是，自由主义是市民阶级所特有的东西。

从市民阶级变成资本家的那一时刻起，它就不再是自由主义的了，它就向着而且必然向着与社会主义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现在来谈本题。我基本上同意倍倍尔的报告。我赞成倍倍尔反对伯恩斯坦的话，我只是反对他赞同伯恩斯坦的话，后者只涉及实践领域。在理论方面，倍倍尔所讲的我几乎每个字都同意。他谈得很透彻，所以我要说的话就不多了。

……

在争论过程中，有人说，伯恩斯坦并不否认最终目的，他在原则上完全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只是在速度问题上与我们有分歧。但是，速度问题上的分歧也会带来原则观点的分歧。民族自由党人冯·卞尼格先1878年在帝国议会中讨论反社会党人法时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不是永远不变的；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指责只是：它想用暴力加速发展过程，它前进的速度太快了。因此必须钳制它。可见卞尼格先对速度的看法与伯恩斯坦完全一致。速度问题把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带到了民族自由党人和老反革命分子卞尼格先那一边去了。

……

我说过，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群众对我们学说的信仰，如果我们的党员们相信，我党不是唯一的为无产阶级的权利、自由和阶级利益斗争的党，如果别的党被看成与我们的党同样重要，那么我们党员就一定会士气沮丧，人民群众就会无所适从。但是有人认为这句话违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我前面发言的同志认为举伊斯兰教为例是不科学的，但这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只要伊斯兰教的信奉者绝对坚定地相信他们学说的真理性，他们就无往而不胜；当他们开始同西方文化妥协的时候，他们才丧失胜利的力量。对争取明确目标的必要性的信念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我想起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有一次我走下国会讲坛时，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走过来对我说：“您能讲得很好，您还有信仰，我们却没有。”“信仰”这一词在这里不是在宗

教的意义上说的，而是指的绝对坚定的信念和对目标的明确认识，如果我们使我们的同志丧失了这个信仰，我们就使他们丧失了战斗的欢乐，我们就减少了他们战斗的兴趣。如果我对同志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一点也不坏，它实际上是很好的；如果你们象乖孩子那样循规蹈矩，资本主义社会就会给你们预备甜点心，而不会使用鞭子，如果我这样说，那么这就会使士气沮丧，这就会使一个必须战斗的党永远达不到目的。战斗着的同志们对伯恩斯坦极为愤慨的是，他声称，资产阶级之所以敌视我们，是由于我们执行了急躁轻率的策略。难道是我们使资产阶级胆怯了吗？难道拉萨尔不是深信，德国资产阶级一害怕就连哪怕只是争取最普通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斗争都不能进行吗？在当时，红色的怪影还没有以清晰的形貌出现在德国资产阶级面前。德国资产阶级既不能在中世纪末，也不能在上一世纪末，甚至不能在1848年从容克阶级那里夺得资产阶级自己的自由，难道是我们使它士气沮丧吗？我们总是自豪地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双重使命，它要完成在其他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此外还要实行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点伯恩斯坦完全忽略了。我们不能刹车，不能倒退，我们必须前进。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象伯恩斯坦所指责的那样把头往墙上撞。报纸上的一篇激烈的文章，一次激烈的演说——这说明什么呢？这毕竟并不代表党。自从社会民主党诞生以来，凡是在党能够在实践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时候，凡是在它在公众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总是做实际工作的。我们是考虑到实际情况的。我们没有试图立即争取还不能争取到的东西，我们指明了目标并且说，这件事或哪件事是必须争取的，但今天还做不到。伯恩斯坦什么也没有给我们，他只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东西。不仅在理论方面是如此，在实践方面也是如此。他的建议即使是很好的，也来得太晚了。他所说的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并且已经实行了。在他的整本著作中，没有一句话不是奥本海姆、不是民主主义作家或者半民

主义作家、甚至纯粹的自由主义作家以前在《法兰克福报》上说过的。使反对伯恩施坦的人非常气愤的是，他突然站到我们的敌人那一边，他为我们的敌人作证，特别是为一个叫作欧根·李希特尔的人所提出的既荒谬又不公平的论断作证，这一论断说：社会民主党要为现行的反动统治承担罪责。不对，应负罪责的是我们资产阶级的卑鄙行为。

……

……最后我必须声明：如果倍倍尔撤回他的决议案的第三段，那么我和一些观点相同的同志将会非常高兴；否则，我建议进行分段投票，我将投票反对这一段，因为我认为这一段是对阶级立场的背弃，是踏上了伯恩施坦为我们建立的通向其他政党的桥梁。辛格尔和我站在同一立场，在同他协商后，我必须声明：如果说应当接受提案的第三段，以便也向党外表示党在反对伯恩施坦所代表的倾向时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将投票赞成整个提案。

伯恩施坦认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进行统治。我要问：难道那个其代表现在坐在无害诉讼的被告席上的阶级比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更适合于统治国家吗？统治阶级是怎样管理国家的呢？这一点我们在交换过程中看到过了。刚刚发生了容克叛乱，这使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在资产阶级政党纷纷分崩离析时我们却目标明确，巍然屹立。在敌人到处都用愈来愈锐利的武器同我们进行斗争，而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时，我们党却能够以冷静的探讨态度对我党的生存发生问题的那些问题与原理进行思考，而在国家与社会的瓦解一天天地加快速度的时候，却有人想对我们说：不要急躁！慢慢来！不会发展得这样快。崩溃论是错误的。那么应当由谁在德国进行英国式的改良呢？有政治生命力的资产阶级在哪儿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对于我党的基本原则，伯恩施坦连一块石头也没有能够摇动，他只是使我们更明确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维护和实行的

那些原理的正确性。我们在老的旗帜下，为了老目标进行战斗，我们获得了千百次胜利，我们前进了！难道我们应当离开这个战场吗？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本身含有永葆青春的力量，放弃这个纲领和策略就意味着在实际上放弃最终目的，延长斗争和推迟胜利，因此，起来维护我们的老纲领和老策略吧！

卡·考茨基（摘录）

（10月11日）

同志们！我希望，我用不到半小时，就可以把我想对你们说的话说完。我不打算在这里再一次反驳伯恩斯坦。我要说的反对伯恩斯坦的话，我已经说够了，我希望，我不会再一次有机会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施托尔登^①刚刚表示了一个友好的愿望。他说，辩论还可以继续几年之久，如果我能够在这期间也不偷懒的话，那么这肯定不是坏事。当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偷懒，尽管我非常拥护懒惰的权利，但我或我们中间的另一个人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机会使用这个权利。如果说我希望结束辩论，那是因为辩论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新东西，因为辩论只是使我们丧失研究新事物的时间。这样一种辩论对于旁观者来说也许十分有趣，但对于不得不参加辩论的人来说已令人厌烦到极点。但是我之所以不打算再发言反对伯恩斯坦，还因为倍倍尔说得完全足够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不想反对伯恩斯坦，因为要是我说，我们大家还承认伯恩斯坦是同志，他曾站在我们一边斗争了几十年之久，当他发表了可能把党引入歧途的观点时，人们必须反对他，但是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使他痛苦，要是我这样说的话，我相信这是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情。如果我在发言过程中谈到伯恩斯坦，那么这并不是为了攻击他，而是为了维护

^① 奥托·施托尔登（Otto Stolten 1853—1928）——曾任汉堡市长，国会议员。——编者注

他，以反对大卫和沃尔特曼为他进行的辩护。

首先要作一点更正。施托尔登说过，我在斯图加特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曾说，资本家并没有增加，而如果增加的话，就会对我们的观点不利，并使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现在我完全坚持当时我说过的话。但是我承认，这些话可能引起误解，它说得不全面。我的小册子中的数字与之完全不相违背，问题只在于对于资本家是怎样理解的。大资本家的人数正在增加，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小资本家或者毋宁说小企业主的人数肯定是正在减少。最近的企业统计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整个斗争就会毫无希望。因为小企业主比人口增长得更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只不过意味着无财产者在减少罢了。但是，既然无财产者在减少，那么剥夺有产者的力量将从何而来呢？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把人人都变为有产者，由于我们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但是，既然有产者的人数目前已经日益增加，既然我们正在走向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情况，那么，社会主义的目的何在呢？那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会是毫无希望的。

罗·卢森堡（摘录）

（10月11日）

党员同志们！要是我在倍倍尔同志作了出色的报告之后还想详细谈论问题的理论方面，那就是往大海中倒水白费劲了。倍倍尔如此透彻地探讨了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实际材料，再来谈这些问题就是多余的了。但是，大卫的一些意见（其中一部分是针对我的）促使我出来回答。……

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的理论观点的最大弱点是他们关于所谓经济权力的理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在目前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获得这种经济权力，才能够成功地进行一次政治革

命。大卫以及伯恩施坦的另一一些拥护者常常指责我们空谈和偏爱死板的公式。我却要证明,在夺取经济权力的问题上,死板的公式和空谈恰恰是在他们那一边。

大家知道,马克思曾证明,任何政治的阶级运动是以一定的经济状况为基础的。马克思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上的一切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努力掌握了经济权力。大卫、沃尔特曼和伯恩施坦盲从地把这个公式应用于目前的情况。这表明,他们既不了解过去斗争的本质,也不了解目前斗争的本质。

过去的阶级,特别是第三等级,在获得政治解放之前,就获得了经济权力,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指这样的历史事实: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阶级斗争的原因要到经济事实中去寻找,一个新上升的阶级同时建立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并且最后在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手工业者在中世纪初期反对城市贵族的斗争是以下列事实为依据的:他面对贵族对于土地的所有制,建立了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新的所有制形式。这是一种经济上的新生事物,它终于粉碎了政治上的桎梏,并且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了变得无足轻重的封建所有制的残余。中世纪末期,重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时中产阶级展开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起来了,它最终导致第三等级也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

试问:难道可以把这一公式搬到我们的情况上来吗?不行。恰恰是那些空谈无产阶级经济权力的人忽略了我们的阶级斗争同以往一切阶级斗争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以往的阶级斗争相反,无产阶级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建立一种阶级统治,而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这个论断决不是空谈。它的根据在于:无产阶级并没有建立新的所有制形式,而只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就是把它转为社会所有。因此,如果以为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就能够

获得经济权力,那是一种幻想。它只能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伯恩斯坦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模式搬到我国的条件中来。但是,他自己和“经济权力”的其他拥护者却把法国大革命的经济模式搬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来了。

大卫阐述了挖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整套理论。我不知道,他关于社会主义斗争的观念是否确实会导致挖空;我对此非常怀疑。但无疑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必须以挖空我们的头脑为前提。

大卫以及伯恩斯坦的拥护者完全是从这种经济权力的观点出发来考虑我们对工会和合作社的态度的。他们责备我们把工会和合作社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我确信,在我们中间,以及在所谓的政治家(那些想在政治家和工会活动家中间人为地制造区别的人是这样说的)中间,没有一个同志不明白,在德国,在工会领域内,大部分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大家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用在这一任务上。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如果人们使我们放弃工会斗争,或者工会斗争不再继续发展,那么,政治斗争也必然因此遭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首要的条件是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而工会斗争是这一方面的最好手段。但是,从某种观点来说,那些指责我们对工会的友好态度不是全心全意的人也许是对的,尤其是如果他们把友好态度理解为促进对工会的幻想的话。的确,如果你们想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工会不仅是吸引工人参加阶级斗争、对他们进行启蒙并且改善他们目前状况的手段,如果你们把事情理解成这样:工会也能直接用来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挖空资本主义所有制,那么,我们不仅应当,而且必须拒绝支持这种观点。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的最大敌人是它自己的幻想。从根本上看,代表这种观点的人决不是工会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努力后来必然使人失望。

更为错误的是那一派关于合作社的观点。我在这里只想讲几点意见。把合作社同工会、甚至同政治斗争并列起来，这已经成为时髦。不，合作社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也完全撇开它对于工人阶级的积极意义和影响不谈，那就可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合作社不是阶级斗争。

其次，那些认为合作社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萌芽的人忘记了目前情况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后备军。即使我们假定，合作社逐步地排挤一切资本主义企业并取而代之，我们也不可能作出这样荒诞的假设，竟认为在保持目前的市场关系并且没有一个总的计划的情况下，就能够使生产关系适应市场的需求。后备军的问题将跟过去一样不能得到解决。

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人们把哪一种合作社看作是理想，看作是抽象的模式。我只知道，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合作社运动的典范的英国合作社，就其生产部分来说完全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人喊：我们的典范是比利时的合作社！）在工联代表大会上一个裁缝工会提议，希望工会的议会委员会同合作社方面达成协议，以便敦促合作社遵守议会委员会提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剥削决没有被消除。

与这种经济观点有关的是伯恩斯坦派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社会化的理论。在大卫的发言之后，详尽驳斥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多余的了。因为他也把工资协议看作是一种局部的资本主义社会化。那些同志显然把事情看成这样：整个实际政策仍旧同以往一样，只是也许更多地考虑到合作社，这样一来就很方便了：给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于是社会主义就大功告成！人们只是忘记了，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如果人们把鞋刷子归入哺乳动物一类，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①

另外，关于所谓崩溃论谈一点意见。当然，如果我们把我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编者注

目前已经做的一切称作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还要引起一次崩溃就会是完全多余的。但是,那些有着如此疯狂的观点的同志们(芬德里希:尊严!——主席摇铃)——请原谅,我没有侮辱的意思,我想说“错误的”。对社会主义持有如此错误的观点的同志们只是这样理解进化论:他们对辩证主义历史观作一个小小的修正,于是历史就会重新顺利地、完满地得到解决。他们把关于崩溃、关于社会灾变的概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进化论中分离出去,通过这种方式得出一个惬意的关于进化的概念,就象某一位布伦坦诺先生所理解的那样。如果我们想从历史学习,我们就会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阶级斗争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上升的阶级在旧社会内部通过细小的进步、合法的改良慢慢地愈来愈发展壮大起来,一直到它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通过一次社会的和政治的灾变来挣脱旧的桎梏。它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它在旧的统治阶级的内部就已经能够把它的经济权力发展到最大限度。对我们来说这样做就十倍地更加必要。那些认为不经过激变就可以平静地把社会引向社会主义的同志完全不是站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我们完全用不着把革命理解为动用干草叉和流血。革命也可以用文明的形式进行,如果说有某一种革命具有这样的前景,那么,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我们最不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和希望进行一次残暴的革命。但是,这种事情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完全不去考虑我们取得政权的形式问题;这是由我们目前还无法预言的形势所决定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事情的本质,这一本质就在于我们力求彻底改造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只有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做到,决不能采取在目前社会内部进行社会改良的方式。那些沉迷于这种希望的人所采取的立场是只有对过去一无所知并且对将来抱乐观主义的人才会采取的。

现在谈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倍倍尔作了六小时的发言,

出色地驳斥了伯恩施坦。试问：如果我们可以假定伯恩施坦是我们队伍中代表这些理论的唯一的人，如果意见分歧没有超出抽象理论的范围，倍倍尔是否会这样做呢？我们是一个实际的政治斗争的党，如果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人同党内其他人的观点有理论分歧，那么，不管这个人有多大的功绩和多么重要，倍倍尔也不会发表这样的演说。但是在我们党内有一批同志站在同他一样的立场上，而意见分歧不仅涉及理论，涉及抽象的概念，而且涉及实践。大约十年来，我们队伍中有一股相当强大的思潮，企图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把我们现在的实践说成是社会主义，并且（当然是无意识地）把我们力求实现的社会主义、唯一不是空谈和幻想的社会主义，说成是革命空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倍倍尔理所当然地表示蔑视说，伯恩施坦的观点是如此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人们无法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理解这些观点，因为他总会说，你们误解了我。过去伯恩施坦写文章不是这样的。这种暧昧，这种矛盾不是同他的个人，而是同他的那一派，同他阐述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如果你们仔细考察十年以来党的历史，尤其是研究一下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就会看到，伯恩施坦派已逐渐加强，但还决没有达到成熟；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成熟。在它目前的阶段，它完全不能明白自己的实质，完全不能为自己的倾向找到正确的语言。伯恩施坦的暧昧是可以这样解释的。这个伯恩施坦派是怎样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无稽之谈的，你们可以从最近几天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慕尼黑的一次对目前的党代表大会表示态度的集会上，有一位发言人在谈到席佩耳事件时，说了如下的话：席佩耳谈到民兵，而我们的纲领中说的是国民军（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差别；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他接着说：为了替席佩耳辩护可以说，我们纲领中这一段话的真正意思只是表明，我们在当前必须力求缩短服役期！我不想事先就涉及最近几天要举行的关于民兵问题的辩论，我举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

方法的特征。我们的最低纲领具有完全确定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不可能象从手枪中发射出来那样立即实现，而只有这样实现：我们在经济和政治的领域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从现存制度那里争得细小的改良，使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愈来愈改善并且获得最终推翻现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的最低要求只适合于现在。我们接受人们给予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要求实现全部政治纲领。然而，慕尼黑的同志不是把明确地包含民兵制的要求的第三条、而是把缩短服役期的要求说成是党的实际要求。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把我们最低纲领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真正的实际的最低纲领，那么，我们现在看作是最低纲领的东西，就会成为最终目的，而我们真正的最终目的就会完全脱离现实的范围，并真正成为“革命空谈”。

克·蔡特金（摘录）

（10月12日）

.....

我简要地总结一下。同伯恩施坦和大卫相反，我们固然认为，我们通过工会、通过立法和合作社所能达到的一切改良是有价值的，但是不能把这些改良看作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力求实行这些改良，作为提高无产阶级战斗能力的手段。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如何评价这些改良，而且在于我们应如何达到这些改良。我们应作为独立的阶级政党，还是作为一个民主集团的党为实行这些改良而斗争？伯恩施坦没有把这一点说清楚，但是根据他的言论以及根据各个方面对他表示赞同的意见，大概可以推断，如果社会民主党方面采取一种民主集团的政策，党内会有一些人感到高兴的。我用不着说，由于在德国缺乏一个真正坚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使得这一点成为不可能，我们不能同虚无联合。但是，即使这是可能的，我们通过这种政

策也会被迫削弱我们的阶级立场，削弱所有那些使我们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派区别开来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正是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强调夺取政权来实行社会的社会化。我们拒绝伯恩斯坦的观点，并不是因为对我们来说教条是神圣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把任何批评都看作是一种侵犯，而是因为他的批评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如果伯恩斯坦说，你们在改良工作方面做得不够，你们必须做得更多，那么，谁也不会拒绝这种批评。但是，如果要求我们把这些改良看作是向社会的社会化的一种过渡，并且把我们活动的重点从夺取政权的斗争转移到当前日常工作的范围，那么我们拒绝这种要求。的确，改良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它到处都在自动地涌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到群众中去仅仅是为了把他们拉向我们方面，那么，我们比骗子手好不了多少。不，我们争取这些改良不是仅仅为了争取群众，而是首先为了提高他们。砸碎了自己的锁链的奴隶固然可以举行一次短暂的暴动，但是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我们的全部改良工作都是为了在经济、思想和道德方面把工人阶级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一切改良工作都不能使我们满足。阿德勒同志说，我们必须任何时刻都全力以赴地争取当前的要求，就象这涉及到最终目的的实现一样，我举双手赞成这句话。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让我们不要在进行这种分期付款时忽略我们的主要目的，让我们向无产阶级进行启蒙，让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和热情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象明天就可能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的一样。

卡·弗罗梅^①（摘录）

（10月12日）

.....

我得到一种印象（不是从所有的人，尤其不是从倍倍尔，而是从另一些人那里得到的）：同伯恩施坦的争论只不过给了他们一个借口，好同党内所谓的机会主义派进行一次小小的清算。卢森堡博士十分坦率地说，问题在于反对党内一个按照伯恩施坦的思想行事的派别。不管我多么努力在党内寻找一个机会主义派，也就是说，一个倾向于放弃我们的原则、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妥协、转到资产阶级政党的阵营中去的派别，不管我多么努力寻找这样一个派别，我却找不到它。那些硬说存在这样的派别的人，举不出别的证据，只好提到有一批人喜欢发出和他们不同的另一种调子。诚然，昨天卢森堡同志还是非常温和的，但是不久以前她还在莱比锡的一次集会上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认为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

我得到一种印象，似乎许多在这里以原则的拯救者自居的人坚持和捍卫了从来没有受到攻击的事情和原则。人们不得不承认伯恩施坦的一些论点是无可争辩的，却又说根本用不着把它们写出来，因为这些是完全不言而喻的东西。要是我想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那么我必须说，卢森堡女士和其他人对我们讲的话有许多是完全多余的，这都是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化费力气在社会民主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来谈论。但是有人在这里同在外边一样行事。有人虚构出一些妖怪并且狠狠加以攻击，以便能够说：请看，我们是什么样的英雄，我们

^① 卡尔·埃贡·弗罗梅(Karl Egon Fröhme 1850—1933)——国会议员，曾任法兰克福《人民之友报》和《汉堡回声报》编辑。——编者注

是原则的拯救者和捍卫者！难道我们中间有人对我们的原则提出了异议，难道我们会帮助别人使我们的原则失去神圣性吗？我们的原则的神圣性并不在于人们表达这些原则的措辞形式，而在于要使它接近实现的坚定思想。

我也注意到，我们一些同志受到了敌对报刊的批评的影响，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当资产阶级报刊显示它们深知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瓦解以及社会民主党转变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党的情况时，有一些以有识之士自居的同志立即起来喊道：现在必须进行干涉，否则党就完了。对于一个多年参加过一切斗争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令人沮丧的景象。这种讨论是无济于事的。

对于辩论的过程伯恩斯坦可能会感到很满意。人们所预料的事情没有出现，尤其是倍倍尔、考茨基以及其他一些人力图完全以事实为根据来反驳伯恩斯坦。我坦率地承认，对我来说，现有的赞成和反对的大量材料对于作出最后的判断还是不够的。但是，有人因此想要断言，那些恰好是为了对事业有利还没有作出最后判断的人，同立即就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人相比，对党来说价值要小一些。

有人说，伯恩斯坦的著作在一定条件下会使工人们退缩和胆怯。我不这样想，但是，我却认为它的著作远不如有些人的做法那么令人担心，因为这些人是在工人阶级中唤起对于最近时期的不切实际的希望。让我们站到现实的基础上来，让我们至少真诚地对待我们自己。在选举中跟随我们的群众并不想以此来表示赞成马克思的理论。不，他们追随我们是出于这样一种内心的感受：他们在这里遇到的是真诚地对待人民利益的党。

格·累德堡^①（摘录）

（10月12日）

弗罗梅指责我们搞宗教裁判，这是老生常谈。我可以证明，我写到伯恩施坦问题的时候，尽管对他批驳得十分尖锐，但我还是有意识地避免对他进行个人攻击。我一直明确表示：如果党代表大会企图设立宗教裁判所，并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如果伯恩施坦认为自己的观点同党员身分不相矛盾的话，那么这是一个良心问题，党代表大会必须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我这样说，是尽一切可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固然我多次重复这样的意见，即伯恩施坦所表述的观点如果在党内有人拥护，一定会对党产生毁灭性的恶果。个人的争论和观点的争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从来没有否认伯恩施坦是诚心诚意为了党的利益而行动的，但是他在根本上错了。倍倍尔斥责伯恩施坦的观点，其尖锐程度至少并不亚于我。看来是，由于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大会又把它分发了，这样才使大卫猜测，可能会惹起宗教裁判。这篇文章也谈到大学生的傲慢态度（海涅喊：完全正确！），而所指的是我，说我在1894年甚至曾指责卡尔·考茨基实行宗教裁判。在我和考茨基之间，关于实行剥夺有过意见分歧，而直到今天，我们双方都还坚持各自的观点，但根本谈不到宗教裁判。那纯粹是无稽之谈。可靠的证人就是考茨基本人，他认为我对上述这篇文章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人们称我们为“大学生”和“理论家”，是企图贬低我们。我问你们，在这次辩论中理论家在哪里？大卫不就是理论家吗？他挺身而出，在长达四小时的演讲里抵挡了倍倍尔的重炮轰击。

^① 格奥尔格·累德堡（Georg Ledebour 1850—1947）——国会议员，曾在德累斯顿和柏林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的编辑。——编者注

大卫的勇气我是十分称赞的，他的所作所为从来跟别人不一样，这些人首先要小心翼翼地瞻前顾后，看看是否有坚如磐石的多数作自己的后盾。没有勇气正视失败的人，是没有资格夺取胜利的。大卫、沃尔特曼同另一些从前认为怎样激烈地为伯恩斯坦辩护都不为过分的人的区别就在这里。

……

阿·施塔特哈根（摘录）

（10月12日）

……放弃我们自己的原则属于妥协的范围。在党代表大会上不会发生一次宗教裁判，不会发生对真理的抵制，这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伯恩斯坦周围的人多年来力图组织一次宗教裁判，来反对我们老的久经考验的基本原则。如果有人问：你们是什么样子，就要敢于表现为什么样子！那就是宗教裁判，同时也就是指责我们虚伪。莫尔肯布尔^①完全正确地问道：你们叫我们这些在议会和工会中不声不响工作的人注意实际工作，然而，你们这些所谓机会主义者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党已经工作得够多了，也许是过多了，就是说党花费了某些人过多的精力。考虑舒尔采或者弥勒、伯恩斯坦或者孔策是否犯了错误，这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事后的侦探工作，这种对别人的思路进行穿凿附会确实是多余的。其结果经常只会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的话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问题只在于观点本身是否正确，我要说，对党的基本观点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是一个革命党，并且根据这次辩论的结果我们将幸运地继续是一个革命党。更重要得更多的是策略问题，在这方面有两个流派：一派说，我们必须使没有觉悟的广大群众革命化，另一派诉诸少数有

^① 赫尔曼·莫尔肯布尔（Hermann Molkenbuhr 1851—1927）——国会议员。《汉堡回声报》编辑。——编者注

教养的好汉，并想把他们争取到党里来。我们必须使人们的头脑革命化，这也属于我们的策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宿命论的。它当然把自然力的支配作用、把社会经济看作是形成社会的基础。社会历史的过程当然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把科学可以认识的规律性看作是人无法加以影响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与此相反，人起着助产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不是宿命论者，从斯宾诺莎主义或柏拉图主义也许会产生一种宿命论的唯物主义，但它决不会从马克思主义中产生出来。马克思主义指出人在利用社会的已被认识的自然力方面起积极作用，它要求人起积极作用。诚然，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就已经存在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应该无所事事。我们必须出一把力。如果我们指出只要一大批奴隶和一小撮老爷的这种情况不应永久存在下去，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使人们革命化，我们就将缩短路程。在报刊上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征集力量上，必须强调吸收新成员、新的社会民主党人，因此，请你们接受对于决议的补充案：在鼓动工作中应当把最终目的置于重要地位。大卫建议在竞选中首先强调实际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哪里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在那里就落选。我们柏林人在每一张传单上都指出最终目的，大卫同志，要是您没有这样做，那么，您失去您的选区是不足为怪的。（大卫插话：你们在柏林也失去了选区！）我要说的是：在柏林附近。而在柏林，在那些一下子就争取过来的选区中是象我所描述的那样进行宣传的。我将否决放弃最终目的的候选人。也让细小的社会改良见鬼去吧！这些改良可以在实行剥夺的过程中附带实行，它是必要的细小工作，但不是主要的事情。但是在每一次选举中，特别是在报刊上，我们应当加强对于压迫和奴役的愤怒感情。如果辩论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我欢迎辩论。当我们失去对我们的目的的信仰时，我们就放弃了社会民主党

人的身分。社会发展给予我们胜利的保证。作好准备，这就是一切，在这一意义上我请你们通过倍倍尔的决议以及由莫尔肯布尔和我提出的补充案。

伊·奥·艾尔

(10月12日)

首先我想关于我非常尊敬的上一位发言人^①和他竭力强调的最终目的谈几点意见。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选举的结果取决于人们有没有适时地利用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仅此而已！我倒要问施塔特哈根同志：他究竟怎样解释我们在选举中遭到的各种失败呢？譬如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我想，施塔特哈根不会否认他们两人对最终目的的大致也懂得一些吧。1881年李卜克内西在美因兹当选，当然是带着最终目的当选的。由于他同时在奥芬巴赫当选，他不能接受美因兹的当选证书，于是倍倍尔被提名。倍倍尔是不久前带着最终目的在柏林落选的，遗憾的是，他在美因兹也落选了，虽然他得到的票数比先前李卜克内西得到的票数多。我还可以向施塔特哈根举出一个时间更接近的例子。我假定，施塔特哈根同志稍微有一点怀疑在海涅同志那里最终目的的情况是否很好，我认为我这样想并不是对海涅同志不公正。在施塔特哈根高举挂着最终目的的旗帜走在前列的阵线中，海涅也是一起走过的，而费舍和施米特同志则落在后面。事情完全不象施塔特哈根同志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他走得还要远。关于代表大会，他作出了存在两种党员同志和两种鼓动员的奇特论断。一种同志使头脑革命化，使群众革命化，他们是正确的同志。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他们满足于不触动群众而仅仅争取到少数有教养的、迎合他们个人心

^① 指施塔特哈根。——编者注

意的人。施塔特哈根同志,你认为党内有一些人追求名声地位而放弃使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和争取群众,却想为有教养的人建立一个狭小的读书会,我认为您的这个论断是没有得到证明的,除非您向我们举出这样一个懒惰成性的鼓动员来。

你们大概不会指望我长篇大论地谈理论;这不是我擅长的,而且在分配给我的时间内恐怕也做不到。休恩朗克认为这次辩论的结果会是所谓的澄清问题,党刊也多次这样预言,我却不是这么想。不,我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不是通过简短的讨论、也不是通过举手表决可以决定的。我们离开这里时将完全同过去一样,问题没有得到澄清,意见分歧将依然存在,这些意见分歧是以气质、见解和各种不同的事态为根据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我们大家都象从一个模型里刻出来一样,如果一个人喊是,大家就跟着喊是。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批评现有的事实,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事实和现象的意见同另一个人不同,我们不是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而是考虑双方的意见,互相斗争,哪怕是激烈地斗争也不要紧,但不是象休恩朗克那样把我们按品质分成革命的先锋和穿拖鞋、戴睡帽的懒汉。如果我们不这样区分,那么,意见分歧也不会损害我们。但不幸的是,我们仍然经常缺乏必要的宽容,而这种情况在双方也许都有过。关于这个所谓伯恩施坦问题我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一行文字。我在这整个期间也从来没有在哪一次集会上说过一句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也没用!如果列举最坏的伯恩施坦分子,那么首先是奥艾尔!奥艾尔、福尔马尔、席佩耳和海涅,这就是为首的四个人。党员同志们,究竟谁对你们说过,我是一个伯恩施坦分子?关于这一点你们怎么会比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知道得更清楚呢?我在这里没有任何理由不直率地说:我不是伯恩施坦分子,正如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从马克思主义的长老们(伯恩施坦多年来一直属于他们的行列)逐渐造成的那一意义上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是伯恩施坦分子,因为尽管我非常尊敬伯恩施

坦,尽管从七十年代起我们之间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我却不能赞同他的实际建议。尽管我非常尊重工会,但我并不相信这样的见解,说什么我们之所以必须促进工会的发展,是因为工会将给我们为未来的社会实行社会化提供干部。我认为,既然今天克虜伯和施杜姆等等能够为他们的企业找到合适的人员,那么当我们能够把生产的领导接收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将找到合适的人员。我不相信这种干部教育。但是,工会是绝对必要的;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之前我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上和这以后却被怀疑为工会的敌人,这是完全不公平的。我现在是工会的一个最热心的朋友和赞助者,但愿我今后继续是这样。我更加不能赞成关于合作社对于我们未来的意义的见解。有一种巧妙的推论,说什么可以不让这些可恶的资产者觉察,暗中在小范围内建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然后有朝一日将幕布拉开对大家说:请你们看,现在我们到了!我不能赞同这种天真的见解。但是除此之外,我并不排斥伯恩施坦在实际建议方面所提出的一切新东西。在所有这一切东西后面包含着某一点真理,这都是一些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和事实,如果人们温和地对待这些现象和事实,而不是带着要给提出这些建议的人以狠狠一击的企图,那么人们完全可以让这一切东西通过。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可以讲的话,另一个人就不可以讲,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我们。我们大家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同志写过一篇出色的评论,指出社会民主党是唯一的人民党,那时大家是众口一声地欢呼和赞同的,而伯恩施坦现在说:实际上我们应该是一个人民党,于是人们就说:你们看,他想把我们出卖给宗内曼^①!我的先生们,两个人说同样的话,并不就是同样的意思,这要看这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如何理解它而定。你们是否知道,当我的朋友伯恩施坦把他的这些实际建议拿出来时,我给他

^① 列奥波特·宗内曼 (Leopold Sonnemann 1831—1909) ——德国资产阶级记者和政治家,曾协助创立德国人民党。——编者注

写信是怎么讲的？我给他写道：“亲爱的爱德，你是一头驴，因为人们不这样说，人们这样做！”由此可见，我被人称作伯恩施坦分子，却不是伯恩施坦分子，而我也不能成为到处都要求人们应当成为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凭我的智力无论如何弄不清楚在马克思主义这个集合名词下所包含的内容。我对辩证法以及所有这类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叫作什么）不太弄得懂；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而在更高的统一中得出一个灰色的混合物，人们见了这种东西会大吃一惊；我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我对哲学没有兴趣，因为我缺乏这一方面的必要的修养，因此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能是、也不是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我的理解力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一个热诚的拥护者。我十分坦率地声明这一点，我不认为，我们同两位老人留给我们的学说已经一刀两断，而是认为，我们大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还可以从中学学习到许多东西。

我刚才说过，如果在我们进行澄清的努力中始终有着良好的愿望，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看法：现在社会民主党内正在发生争论，发生口角，走向分裂，要分道扬镳了。谁以为在尖锐的词句后面确实也隐藏着一种邪恶的企图，当然可能很容易产生一种看法，认为现在势必要走向分裂。倍倍尔感到惊异，人们怎么会谈到宗教裁判，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作出这种假定。倍倍尔在夏季的几个月中不在德国，正如他的杰出的报告表明的那样，他花了极大的精力来准备这个报告，因而也许找不到时间来密切注意德国党内和报刊上全部详尽的事态过程，否则他一定会知道，确实从我们队伍的各个方面对伯恩施坦和伯恩施坦分子进行了辱骂，胆小的人可能会认为，在汉诺威要举行火刑，伯恩施坦分子将一个接一个遭到火烤和焚烧。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暗示，有一系列文章采用了这样的标题：叛教者伯恩施坦。此外，在很有影响的报刊上谈到了向资产阶级阵营叛逃的

人。一家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妇女出版的刊物不是完全公开地提出了明确划清界限的要求吗？（蔡特金夫人喊道：说的是原则的界限。）蔡特金同志，这确实不是提出这一要求的唯一的报刊。你们在李卜克内西的一本引起许多讨论的小册子的第六页上可以找到一句话，它很能说明人们企图制造舆论时所采用的方法。那里提出了间接的谴责，外面的广大群众看了一定会以为，现在这件事终于要摊牌了，要分道扬镳了。李卜克内西说了些什么？“党内的某些人有着放弃阶级斗争的立场并站到和其他党共同的斗争立场上的倾向，或者说意图。”有些人象倍倍尔和我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在选举中实行妥协绝对是政治灵活性的要求，如果有人指责他们，说他们的意图会导致放弃阶级斗争的立场并站到同敌人共同的斗争立场上，那么我要问那些有阅读能力并且愿意按照词句的本来意义来解释这些词句的人（他们不会在后来看到词句引起麻烦时就想赋予它们另一种意义），这一来除了向党内打进一个楔子，使我们互相不和，在我们中间制造猜疑，举行我们所说的宗教裁判，还能做些什么呢？在实践中和实际上不会把我们倒挂起来用火烤，这我们当然知道，但是也许与其说是由于有关人员的良好愿望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不如说是由于你们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此外，激烈的词句之争！因为在许多发言中并不是为伯恩施坦的理论进行争论。人们需要的伯恩施坦是被想象出来的。当爱德·伯恩施坦读到所有这些东西时，他可能会抓住自己还有的几根头发说：天晓得，这些人要审判我，对我的书却连一页也没有读过，就算他们读过了，他们也没有理解。因此，争论并不是围绕真正的伯恩施坦进行，而是围绕假想的伯恩施坦进行的，人们把他打扮成这样，以便说：好，你等着，你过来，现在给你一顿鞭子！有哪些东西没有被硬加到伯恩施坦身上呢！我的这些话不是针对倍倍尔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我一点不想硬说他们不是用正当的武器进行斗争。但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攻

击和指责,我认为并不都是正当的,要为这种做法辩护只能举出一点:这些发言人对自己说,既然有半小时的发言时间,现在无论如何总得讲些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是正当的批评者,即使是倍倍尔,也并不总是遵守他们本来应当遵守的路线。我要提到倍倍尔从伯恩施坦的小册子中引来的一句话: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他以他特有的激情援引这句话;并说:有一位伯恩施坦是这样说的!他把这硬加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他把他们说成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的确,倍倍尔同志,如果孤立地看这句话,在这本书的第十九页上确实有这句话,但是必须把它同上下文联系起来看。伯恩施坦用许多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在两位先驱者长达四五十年的脑力劳动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四十年之前所有的观点由于政治经济状况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他们在晚年作出了和早期不同的判断;随后他说,恩格斯和马克思未能做到整理和解释理论中似乎存在的这些矛盾,他们让自己的学生们去做这件事,接着他说:“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但是只要是还保留着一点点理论感的人,只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观赏品,逢到节日才从银柜中拿出来,平时却置之不理’,那么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就会感到清除这些矛盾的必要。导师们的学生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不是在于永远重复导师们的话。”^①如果同上下文联系起来看,那么,说今天的情况是任何一个舞文弄墨的人都能够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句话就不算粗暴了。(倍倍尔:不对!)啊,倍倍尔同志,你对我喊:不对;你以后可以作比我更长的发言反驳我,但是事情是这样,倍倍尔本人就是这方面的活生生的例子。请你们回想一下倍倍尔在群众集会上和在议会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65—66页。——编者注

中的演说：难道没有出现过“大动乱”、“崩溃”这种话吗？当然出现过。难道他不是也曾经在私下谈话中并且也对我这个不肯轻信的托马^①确切地规定过这件事发生的年份吗？他不否认，而且在这个大厅内外有大批有力的见证人可以证明倍倍尔曾热烈地劝说别人和我：哦，你原来是一个市侩，你不相信这一点，你缺乏革命毅力。这种场面曾经一再出现：我不相信1889年一切都将终结，后来从1889年推迟到九十年代中期，我也不相信；后来恩格斯和倍倍尔把最后的期限确定在1898年，我仍旧是怀疑者并说：等着吧。我们等待了，但昨天和今天又怎样呢？今天清早我问：倍倍尔，考茨基已经把他的见证人派到你那里去了吗？这当然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但在资产阶级中间必然会是这样的。

昨天考茨基把倍倍尔对待我们的行为说成是白痴行为，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后来人们会非常精确地向我们证明，这是不正确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我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在这样的事件中本来只可能发生视觉和听觉上的错误，如果在这类事情上都那么容易产生误解，那么，当伯恩施坦遭到误解时，人们也就不必为此大发牢骚了。误解确实存在着；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斗争象现在这样尖锐化、而又不总是能保证没有人故意引起误解时，误解就更加不可避免。还有一件更使我感到遗憾的事：《德累斯顿工人报》^②对于李卜克内西在皮申的演说发生了误解，对李卜克内西的话作了恰好相反的理解。要就是《萨克森工人报》的编辑误解了李卜克内西，要就是李卜克内西不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后一点是不可能的。李卜克内西说，他被误解了，而《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却保持沉默。说它故意作了误解这个严重的指责当然仍旧存在着，而且说这是一个针对伯恩施坦的诡

① 参见本书第18页注①。——编者注

② 应为《萨克森工人报》。——编者注

计,比这更加不高尚、更加不诚实的诡计在整个斗争中是前所未有的。所以编辑部对于说它在这里作了误解这个指责不应该保持沉默。现在对于倍倍尔还有简单的一句话要说。倍倍尔同志,你在作清算时最后竟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待伯恩施坦同志,以致我对自己说:这是不公平的!你简直把他看成是一个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人,你在提到他时一再说:“这个人竟然不知道,过去清地曾经是到处流行的!”现在请你们作出结论!这个人曾在外国担任责任重大的职位,也就是编辑过我们的中央机关报达十年之久,这个人一直到最近为止也被看作是从事科学著述活动的党员中最优秀的人物,这个人被恩格斯挑选来出版他的科学遗著,这样一个人今天在这里却被说成是一个连普通小学生都有的知识也不具备。(倍倍尔表示异议。)是的,我说过头了。我知道,你不这样认为。(倍倍尔:我没有说过那句话。)你说过!会议就是见证人。我要问:当我们的敌人听到,在党内居于突出地位的那个人竟然连德国历史上最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他们一定会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不是一定会把以往用在吉卜赛人身上的一句著名格言用到我们身上吗?但是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这句格言,我们应当改掉这种习惯。我们用不着同伯恩施坦达成协议,伯恩施坦自己可能现在已悄悄地从他的著作中撤回了一些内容。我手头有他的一篇长达二十页的声明,他把这篇声明寄给了我,让我在这里宣读。我不想宣读它,因为他让我酌情处理,而且我不想使你们感到厌倦。是的,宣读一篇长达二十页的声明是一个令人厌倦的程序。我认为,我们应当进行斗争,但是要采取在诚实的战士之间通常采取的方法。最后,我赞成倍倍尔的决议。我本来也同意它最初的措辞形式,在通过施托尔登的提案后,它更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赞成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是反对伯恩施坦的,而是因为它同样可以被伯恩施坦接受。正是伯恩施坦本人而不是别人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当我把最初的决议的内容告诉伯恩施坦时,他

写信给我说：“亲爱的朋友奥艾尔！在作必要的、在这种事情上通常要作的保留的情况下，我也赞成决议。”

格·福尔马尔（摘录）

（10月12日）

.....

这里所谈到的争论，决不是仅仅从伯恩施坦的书开始的，而是在去年，当这本书还根本没有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事先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要求采取措施反对伯恩施坦，与之同时也反对一切的可能派，一切的机会主义者（或者不管人们给他们什么别的名称）。当然，后来伯恩施坦被人家说服（要是我的话，就不会同意这样做），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这些异端的观点，这就给行将熄灭的火焰加了新的油，于是辩论重新爆发起来。在辩论中人们几乎只限于谈伯恩施坦，象我们这样一个战斗的党，竟然花了整整一个星期争论他所发表的一个观点，而不知道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荣幸。但是，只有很少的发言人，而且恰好是人们起初可能完全没有料到的那些人，除了谈到伯恩施坦外还谈到别人，所以我们这些人吃亏了，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空手而回了，这毕竟不是好事。我总的印象是，在为期一个月的辩论中，出现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从前几乎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过。几乎任何时候都没有象这样雷声大，雨点小。请你们回想一下，现今这次党代表大会被某些派别在事先描述得多么伟大，多么有声有色！休恩朗克说，谈不上举行一次火刑。确实如此。火刑堆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木柴燃烧不起来，也缺乏足够的力量把我们抛到火刑堆上去。应当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这在一大批人看来是确定无疑的。有人明确说过，他已不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了，叛教者、变节者、叛徒应当开除。还有一些人也应当跟他一起开除。党

内一位女作家完全正确地发现：如果人们揪住伯恩施坦不放，而对从事实际工作的一大批伯恩施坦听之任之，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小小的、但很有影响的集团（人们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所组成的整个流派，奥艾尔、席佩耳、海涅、当然还有我（我每年都列入被放逐者名单，这至今对我的健康的影响是十分好的，我对此丝毫没有怨言）——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受到追究，党代表大会应当成为一个刑事法庭，应当划清界限，今后应当永远阻止一切机会主义（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出现，应当把“纯洁的”观点奉为党的法律。人们就这样扬起一千张鼓得满满的帆向前进军，但是当以后发生战斗时，究竟剩下了什么呢？有人断定，在这个大厅里实际上没有人对伯恩施坦所写的一切全都赞成。我相信，伯恩施坦终究不是蠢人，他自己并不认为人们会赞成他就理论和实践所说的一切。我不同意他书中的一系列观点，尤其不同意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观点。他无疑是通过英国眼镜朝这一方向看问题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更大的人物也是通过英国眼镜看问题的，只不过人们并不害怕指出什么东西终究是站不住脚的。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并不是伯恩施坦的罪过，因为他为党牺牲了自己，他流亡在外，从而同我们失去联系，并且不再跟党完全和谐一致，他对许多事情可能理解错了。在另一方面，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伯恩施坦在他的书中提到的一系列事情是正确的，即使在正确性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的地方，他也至少促使我们进行思考，并不是每一本书、哪怕是每一本被我们传布和颂扬的书都可以谈得上这一点的。人们终究要考虑实际情况。这本书中我们喜欢的，我们就接受，我们觉得不合适的，我们就把它作为错误的东西搁在一边，正如我们对待别的书一样。有些人把每一本党的著作看作是一本福音书和真理的最后结论，这是十分可悲的。不，每一本书都应当首先激发人们去独立思考。由此可见，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为了这本书以及其中藏着的危险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曾不断地表示，没有人比我更

加不愿意讨好群众，因为我认为这是卑鄙的，但是我也必须说，有许多人以为，对于我们来说道德之路太狭窄了，稍微往右或者往左一步就会使人们离开我们，同这些人比起来，我是更加信任我们广大的党员同志的。

因此，如果说我也批判地对待伯恩施坦，如同对待其他任何人一样，那么，我还是要重复说，在这本书中包含着许多有益的东西，也许当目前的斗争过去以后，还有一些人会发现可以从这本书中学习许多有益的东西。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尽管人们可以反对伯恩施坦的观点，他是站在我们原则的基本思想上的，因此他同那些竟敢否认他是党员的人一样，仍旧是我们党的同志。

使我真正感到高兴的是，从报刊上，尤其是从《前进报》上看到，在许多地方的表示反对伯恩施坦的集会上仍然继续不断地重复说：伯恩施坦是党员同志。我们不会压制自由研究。（累德堡：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好吧，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提出过一项提案，按照这个提案，研究自由只有在它没有脱离我们的基础时才能得到保障。（累德堡：究竟是谁？）看来您一次也没有读过你们最近的报纸。比这更加超反动的要求在社会民主党内还从来没有提出过。当然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要求没有再出现，现在已经完全不再谈论对我们这些人实行总清算了。昨天我们荣幸地在这里听了一位女党员同志的发言，她是我所说的那一批人中间最得力的先锋。你们会记得，她的文章是按照什么精神写的，请你们把她在这里的行动方式与此作一对比。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报告；她以颇得人心的温和态度发表意见，结尾时只是慎重地表示希望伯恩施坦派不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我必须说：我根据以往的经验的确没有料想到这位发言人如此谦虚。我们重新被允许自己认为怎样正确就怎样行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只有得到我们的这位女同志的同意才能行动的），她不想坚持用一根稻草来禁止这一合

乎自然的策略，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安慰。但是我只能说，为了生下一个孵不出的蛋，用不着这样大声地咯咯叫。

……

有人说，伯恩斯坦的著作会促使我们厌恶斗争。但愿人们不要对每一件事都如此不恰当地夸大。人们说，谁胆小，就是为反动派效劳。的确如此！但是我要补充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公社以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谁向人民讲一些虚伪的革命奇谈，就是向启航的帆船提供错误的航线图。每一个人都知道，恩格斯有一次在给屠拉梯的信中说，我们在当前的运动中也代表将来的运动。但是同样确实的是，由于喋喋不休地谈论在当前社会里根本得不到任何值得努力争取的东西，就一定会对工人运动起麻痹作用。但是那些人所采取的最恶劣和最愚蠢的手段是继续不断地做出这种样子，似乎我们这里存在两种类型的党员同志。奥艾尔已经指出这一点，他用激烈的表述方式把这件事说得同我想对你们说的有些不一样。有人说，在一方面是机会主义者，在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看来已经不够美好了，他们必须制造一个新的词，并且经常重复它。这种区分为两个派别的做法是极端荒谬的，尤其是如果想要使一个派别屈服或者说必须彻底划清界限。的确如此！如果以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党（它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被战胜）受到削弱，这会使我们的敌人十分高兴。我毫不掩饰，党内有些事情和有些人也并不使我高兴，我只不过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中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些是不正确的，我考虑到我在这方面的责任，并且相信，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力量的发展终将使事情达到正确的结局。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是我们成功的必要前提。因此我始终维护统一，因此我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反对人们企图人为地引起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较量，我希望，那些一再想引起较量的人最后总有一天将放弃这样做。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保持这种把每一点细小的意见分歧都说成是

整个世界观方面的巨大差别的恶劣做法，如果这种争论继续下去，那么总有一天会使广大党员同志失去迄今所表现的耐心，他们会向有关的那些人指出，党拥有使他们放弃这种习惯的实力手段——不是决议的手段，而是来自舆论的手段。我和我的同志们完全同意倍倍尔的决议。我们对于决议中表述的思想感到满意，因此将愉快地一致赞成这个决议。

罗·卢森堡

(10月12日)

福尔马尔谴责我想搞宗教裁判，根据是我在柏林第三选区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压制批评自由。如果他说的是我曾提出一项建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涉及到海涅提出的一个决议案，它要求党代表大会允许无限制的批评自由。对此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您对批评自由的理解与其他任何人的理解没有什么两样，那么这个建议不仅是完全多余的，而且是直接给了党代表大会和党一记耳光。我说，没有一个党象我们党这样允许这么多的批评自由。但是，如果您对批评自由的理解是：在批评自由的名义下，党没有权利对最近一个时期的某些观点和批评表态，没有权利通过多数人的决议声明；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那么，我就必须对此提出抗议，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讨论的俱乐部，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党，这个党必须有明确的基本观点。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年柏林德文版第127—133、136—137、144、147—149、151—156、165—166、171—175、181—182、193—194、195、205—206、206—211、213—216、219页。

奥·倍倍尔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
的结束语（摘录）

（1899年10月13日）

如果要我用几句话大致描述一下辩论的实质性部分给我的印象，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在已载入纲领的我们的原则性见解、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的基本要求上，党代表大会是没有不同意见的，在最终目的上，我们也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出现过任何意见可以令人产生与上面相反的想法；我这样说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说到我们为实现我们的载入纲领的任务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关于它们的效果和意义当然是存在较严重的意见分歧的，而且将来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特别是伯恩施坦的小册子关于合作社的见解，即其中所说的合作社对于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意义，遭到了党代表大会大多数人的驳斥。但是，这些观点是允许争论的，它们无论如何决不会损害我们党的原则。

但是其次，辩论也表明，关于首先引起党代表大会上的这场讨论的那些问题，伯恩施坦在他的著名著作和在其前后发表的文章中所阐述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发言人（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的完全赞同。相反，我们当中站在伯恩施坦一边作战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明确地说，他有时在这一点上，有时在那一点上（其中一部分是很重要的论点），不赞成伯恩施坦；特别是，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发言人哪怕只是试图证明，他赞同伯恩施坦在其小册子中就我们对资产阶级或某些资产阶级分子的态度所发表的意见。这一情况也说明，大多数发言人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投票反对倍倍尔决议。因此一致通过决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承认，在我起草我的决议时，一开始我就在心里说，讨论

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在我动身到汉诺威来时，我甚至还想到，即使伯恩斯坦本人声明可以赞同这一决议——哪怕象奥艾尔昨天所暗示的那样，有一些我不十分明了其含义的小小的指责——那也丝毫不令人奇怪。我得坦率地说，现在我对伯恩斯坦的态度是：他的任何言行都再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了；这一点我在我的发言中也很明确地说清楚了。

但是，我当然认为，尽管伯恩斯坦分子——姑且保持这个集体名称——能赞同我的决议，但是，这对于伯恩斯坦来说，肯定要比对于那些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困难一些。

我的决议一开头说：“资产阶级社会迄今的发展没有提供理由使党放弃或者改变它对这一发展的基本观点”，这句话是同伯恩斯坦在他的书中阐述的看法针锋相对的，如果他说他接受这句话，他就是放弃了他的观点的基础（大卫：完全错了！）。如果他也赞同一系列其他的论点，那么人们最后要问：为什么吵吵嚷嚷呢？如果整个事情徒劳无益，如果我们都是一条心，那为什么要感情激动呢？

我的决议的第二点——这一点直接针对伯恩斯坦——中写道：“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根据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中阐述的关于资产阶级的全部观点，他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他在《前进报》的那篇著名文章中也提出过的观点，他说：这一句是错误的，只能说“首先是”。但是，我之所以经过考虑并且故意同伯恩斯坦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把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这句话写进了决议，正是因为我想要联系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说清楚，尽管我们欢迎和喜欢其他阶级的人投向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毕竟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因为这关系到一次阶级斗争和解放一个阶级。如果伯恩斯坦也赞同这句话，那么，在将来有一天要对纲领进行修改时，无论如何再也不可能有某一方面会对这句话今天在纲领中的写法

提出怀疑。

但是，我也要说明，我的第三段的论证肯定使伯恩斯坦难以赞同。不过，论述经济合作社意义的第四段的情况则是十分特殊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朋友们对他极尽歌颂之能事，似乎他有了什么划时代的发现，就是说发现除了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党和工会外，还有经济合作社这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阶级组织，它一定会从各方面教育工人阶级，以便象他所说的那样，加强工人阶级的经济权力，使工人阶级争得经济权力，从而更加易于夺取政治权力。但是现在我不仅说，党对合作社是采取中立态度的——这一点伯恩斯坦的确是赞同我的——而且进一步说：

“党认为，如果具备必要的先决条件，建立这种合作社是能够改善社员的经济状况的。”——这一点不可能有人反对，即使这种改善很少，即使按照王德威尔得的说法至多占工资的百分之八。但是，我进一步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认为合作社同工人用以维护和促进其自身利益的其他组织有什么两样，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对工人阶级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枷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极其尖锐地表述了对伯恩斯坦关于合作社的见解的反对意见，如果伯恩斯坦在这一点上也说他可以同意，那么我就用得着人们平时在大吃一惊时常说的那句话了：这就叫人摸不着头脑了！

最后，如果我说，我们既不改变我们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要求，也不改变我们的策略，也不改变名称，那就是说，我们不会成为伯恩斯坦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民主的改良的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不会对我们党（它是一个革命党！）迄今的本质采取原则性的对立态度；要是他对这些在我看来是棘手的建议也作了让步，那么人们再也不能设想比这更加不知羞耻的行动了。决议的结尾还多余地强调说，我们坚决拒绝旨在掩饰或者改变我们对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尝试。如果说以“掩饰”一词来评价伯恩斯坦一书的内容不符合伯恩施

坦的追随者的心意,那么,他们毕竟不得不承认,他费了很大的劲在他的书中用很大篇幅来证明,我们必须基本上改变我们迄今对资产阶级政党或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伯恩施坦连决议的这一点也承认,那他就是说:我抛弃了我在我的册子中所阐述的一切论点,我回到你们这里了!而我就要说,一个悔过的罪人比九十九个守法的人更使我们高兴这句话对我们也是适用的。但是,曾经为伯恩施坦的行动大喝其采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人士、弗兰茨·奥本海姆之流、纳普哈埃尔·迈之流、研究社会政策的教授们、《法兰克福报》,他们现在就会由于伯恩施坦的最新声明而陷入窘境。现在他们要进退维谷了。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年柏林德文版第224—226页。

奥·倍倍尔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
大会关于第五项议程^①的决议

(1899年10月13日)

资产阶级社会迄今的发展没有提供理由使党放弃或者改变它对这一发展的基本观点。

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因此党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依靠政权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而为一切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奠定基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运用一切符合其基本观点的、使它有希望获得成就的手段。只要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党作为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和维护者的本质和特点有清楚的认识,那么,一旦问题涉及到加强党在选举中的力量,或者涉及到扩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或者涉及到认真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和促进文化任务,或者涉及到反对与工人和人民为敌的意图,党并不拒绝根据具体情况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但是,党在其活动中,处处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并把它获得的每一项成就只看作是使它更加接近最终目的的一步。

党对经济合作社的建立持中立态度。党认为,如果具备必要的先决条件,建立这种合作社是能够改善社员的经济状况的。它也认为,同工人用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任何组织一样,建

^① 第五项议程是：“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倍倍尔就这一议程作了报告（见本书第181—229页）并提出一项决议。决议经分段表决并对第四段、第六段略加修改和补充后通过。——编者注

立这种合作社是教育工人阶级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一种适宜的手段。但是它认为这种经济合作社对工人阶级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枷锁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反对海上和陆上的军国主义以及殖民政策的斗争中，党坚守其一贯的立场。同样，它也坚持它一贯的旨在谋求各国人民，首先是各文明国的工人阶级的谅解和友谊的国际政策，以便在普遍联合的基础上解决共同的文化任务。

根据这一切，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名称，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改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党坚决拒绝旨在掩饰或者改变它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尝试。

发表于1899年。译自《1863—1909年社会民主党手册》1910年慕尼黑德文版第88页。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年柏林德文版第67—68页。

保·辛格尔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摘录)

(1899年10月14日)

.....

如果我:现在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的会议，那么我决不想隐瞒或掩饰某些事情，来对外造成一种获得满意成果的假象。不！我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可以对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成果感到满意。即使有些时候这个大厅内的情绪象暴风骤雨一样激烈，那么我要说，敌人或许认为这是我们的弱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正表明我党的强大。我们是热情洋溢、劲头十足地维护我们的观点的，如果我们不是也用某种激烈的方式把这种热情和劲头显示

出来，我们的讨论和决议就会丧失一部分价值。

这次代表大会还表明，尽管讨论非常激烈，尽管在我们个别党员之间存在着个人争执，尽管有种种具体的意见分歧，党对基本原则和策略的看法仍旧是一致的，并且今后在行动上也会充分协调一致。

同志们！我们讨论了我们的理论，讨论了我们的纲领。尽管有个别的偏离方向的情况，尽管有些观点如果彻底发挥，当然会导致改变我们的纲领。然而抱这种观点的人却愤怒地竭力反对人家说他们想把党引到另一条道路上去，他们表示毫无保留地拥护全党所维护的基本原则，表示自己是信仰坚定的、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认为，我们可以对这一成果感到满意，它一开始就粉碎了那种说我们分裂了、分道扬镳了的奇谈怪论；如果没有这种成果，我们的敌人无疑是会散布这种奇谈怪论的。不，同志们，我们要一起向全世界证实：尽管个别党员有分歧，但党的决议使党本身团结起来了；党通过自己所作出的决定声明：我们过去怎样，现在也怎样，我们现在怎样，将来也仍旧怎样！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年柏林德文版第294页。

卡·考茨基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摘录）

（1899年10月18日）

霍弗尔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应该是最值得重视的发言之一，他在结束时说道：“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的人，我懂得隔一定时期就必须疏浚田地上的沟渠，以便进行耕作。我们也必须隔一定时期就确定一下我们的地界在哪里。必须重新开挖界壕。”

这确实是新近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必须完成的任务。从1891

年以来，我们党在有些地方的界壕废弃了，填平了。一些发言使人可以认为，似乎党内存在着一个故意想使界壕无法辨认的派别。当一方受猜疑情绪支配时，另一方的一些话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多半会显得比本意更加可疑，实际上的对立之外又加上了误解，双方的怨恨愈积愈深，对党的基本观念和策略日益增长的动摇便暴露出来了。

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迎来了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它的讨论和决议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已经成功地结束这种状况。党已经知道，它可以信赖它的代表们，党也已经表明，它对它为之献身的事业的信念一如既往，毫不动摇。讨论已经表现出这一点，而倍倍尔决议的表决则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有些人曾期望能清楚地判断伯恩施坦派在党内有多大力量，他们失望了，因为这一派的拥护者投票赞成上述决议，也就不可能估计两派的力量对比了。

但是，不应当把这一情况归罪于倍倍尔决议的措辞，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满意这次表决。倍倍尔的决议极其清楚和毫不含糊地宣称：迄今的批评和讨论没有提供对我们党的性质和言论作任何改变的理由，如果伯恩施坦和他的同伙都同意这一观点并通过他们的表决来证明这一点，我们有一切理由为此而高兴。人们固然可以期望长达数年的讨论产生更积极的结果，使我们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达到新的认识。但是如果经过如此激烈而旷日持久的讨论，结果是重新加强了我们的信念，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观点，那么从理论的角度看来，这固然是微小的收获，但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说，这却是无法估量的成就。

面对这次表决，一切怀疑、一切顾虑、一切踌躇和动摇都必定会长久地消失。党的脚下重新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在汉诺威已得到一致的承认。

说一致，是因为投票反对决议的人并不是那些在讨论时站

在怀疑派一方的人。

……

实行政策是为了将来,我们对将来看得愈远,我们的政策也就愈有远见,愈明确和愈坚定。我们对将来愈是看得不远,我们愈是满足于平凡的日常事务,我们当前的政策也就变得愈加动摇和犹豫。因此每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必须力求从现在推断将来,他要是想争取群众支持他的政策,他就必须设法使群众也感到他对将来的希望是有根据的,因此他必须预言。

预言是政治家的本职,没有预言他就无法行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人能够做到充分清晰地认识将来,因此每一个政治家的生涯都充满了没有实现的预言,如果在事后由于这类预言而责怪作出预言的人,那么这种行为既没有价值,而且也是徒劳的。只有当这类预言不满足于仅仅起假设的作用,只有当它们扼杀独立思考并且脱离对现实的观察,或者只有当它们竟诱使人孤注一掷,把一切都寄托在预言的应验上时,它们才是危险的。由某一个受到一批虔诚信徒盲目追随的狂热的预言家作出的这种预言,在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还从来没有过。

但是每一个政治家必须多少是一个预言家,即使是最保守的政治家也是这样。假如我说:我们在一百年以后仍将停在原地不动,这和说二十年后情况将彻底改变一样,都是一种预言;事物是变化无常的,从这一点看来,后一种预言当然比前一种更有希望得到实现。

事实上人们有可能在任何一次没有应验的革命的预言之后接着就作出一次同样是没有应验的保守的预言。谁不去辩证地思考,谁盼望发展不是在矛盾中、而是笔直地进行,谁就最容易失望。谁根据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来作出推断,认为今后的发展将表现出与此相同的特点,他就总是要失望。布克尔^①给这类错误

^① 亨利·托马斯·布克尔 (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编者注

的预言提供了一个著名的例子，由于紧接着拿破仑战争之后是四十年的和平时期，他便认为欧洲的战云已经消失了，我们迎来了和平的纪元。正当他写下这些看法的时候，一个大战争的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是从一场东方战争开头而以另一场东方战争结束的。一个类似的错误的预言是蒲鲁东作出的，他在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兴高采烈地声称革命时期永远结束了。由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不再有过政治上的大变化，有些人就向我们保证：通过经济上的细小工作和平解决社会问题的时期已经来到了，很可能恰好是这些人作了错误的预言。

谁作预言，谁就始终必须准备着他的希望不能应验。然而，如果我们党为有人不再对较远的将来抱有希望并且表达这种希望，那我们会感到惋惜的。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党内有人不再积极地为将来而工作，而完全沉溺于今天了，他们不再胸怀大志，而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唤起的那种热情也就消失了。

幸而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讨论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是一如既往地朝气蓬勃和热情奔放的。

人们责难我们精神上倒退已有好些年了，在我们的革命的党内也出现了颂扬过去的好时光的人；颂扬那美好的时期，因为那时我们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大家都以最大的热心进行学习而且充满了为我们伟大的事业献身的热情。人们悲叹我们运动的黄金时代或者说光荣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他们看来，党的壮大和日常工作的增加就意味着党的平庸化。

这种看法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幻想的黄金时代和亲如一家、紧密团结的黄金时代。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由于新成分涌入和细小工作过分繁杂，我们对事业的信仰和热情、对科学的兴趣和对我们的斗争的高瞻远瞩的见解受到了压抑。固然有一系列现象使我们有理由产生这样的忧虑，而且本文作者必须承认，他也十分赞同这样的忧虑。但是汉诺威的讨论极其清楚地证明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党的水平即使不说有提高，也是和过去一样的。

我们认为，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的这一意义远比各项决议重要得多。大会使我们更加相信，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伟大任务是有觉悟的，而且丝毫也不愿意放弃这一任务；无产阶级已充分成熟并且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迎接沸腾动荡的时代可能向它提出的一切要求，一个新社会，一个历史上还没有见过的新社会将从这一斗争中涌现出来。

因此我们希望，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将结束怀疑和混乱的时代，并且开创一个团结一致对进逼的敌人展开确有把握的斗争的新纪元。

发表于1899年10月18日。译自《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4期第100—105页。

爱·大 卫

为什么“伯恩施坦分子”能够投票 赞成倍倍尔决议？

(1899年11月)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情况使我不能在那里说明，为什么“伯恩施坦分子”也能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倍倍尔决议。党报中的种种言论，尤其是《新时代》第四期上考茨基同志对这次表决所作的考察，迫使我事后还要对此作出说明。

考茨基认为，那些曾经期望清楚地判断“伯恩施坦分子”在党内有多大力量的人失望了，因为这一派的拥护者投票赞成上述决议，也就不可能估计两派的力量对比了。“但是”，他继续说，“不应当把这一情况归罪于倍倍尔决议的措辞，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满意这次表决。倍倍尔的决议极其清楚和毫不含糊地宣称：迄今的批评和讨论没有提供对我们党的性质和言论作任何改变的理由，如果伯恩施坦和他的同伙都同意这一观点并通过他们的表决来证明这一点，我们有一切理由为此而高兴！”^①

这样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投票赞成倍倍尔决议，是不符合原意的。从汉诺威讨论的过程来看，“伯恩施坦分子”绝不可能愿意用文件的形式来表示承认错误，而事实上也绝没有这样做。我们这方面的确没有理由承认错误。谁要这样去理解赞成倍倍尔决议的投票，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不得不非常坚决地反对人们说这个决议为投票赞成或者反对伯恩施坦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如果对方打算制造这样

^① 见本书第284页。——编者注

一次“较量”——顺便说一下，我认为这种“较量”并没有对两派的力量对比作出清楚的判断，而是一场虚假的、有损于党的喜剧——那他们就应该完全用另外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为此首先必须有一个对双方观点的原则性分歧作出公正的确切说明的决议；既不更多也不更少。

倍倍尔决议所包含的却比这更多。这是它的第一个缺点。它的第三段（选举联盟）和第四段（合作社）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实践的伯恩斯坦理论”。大家都知道，在“机会主义者”中间有那么一些人，对他们来说，灰色的理论微不足道，而生活的绿树却是一切，所以一开始就可以估计到，这些坏家伙有可能为了取得实践上的让步而忍受理论上的装饰，即使后者比它在实际上的样子还要激进得多。我不知道在汉诺威是否有许多这样的机会主义的唯实践论者，我不属于他们之列。恐怕无论如何不能由于他们赞成整个决议而责备他们，正象不能责备那些否决整个决议的激进分子一样，后者虽然对决议的理论阐述感到满意，但只是因为不愿忍受对机会主义实践的让步才这样做的。一批伯恩斯坦的最激进的反对者投票反对这一针对伯恩斯坦的决议，这件事本身足以证明，用这一决议来说明“伯恩斯坦分子”的失败是多么不恰当。

人们只要想象一下第三段和第四段中对机会主义实践所作的让步而造成的影响，就会明了，为什么恰好是“激进分子中最激进的人”（倍倍尔的结束语！）必然陷入为机会主义者所设置的罗网。

第三段说，“一旦问题涉及到加强党在选举中的力量，或者涉及到扩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或者涉及到认真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和促进文化任务，或者涉及到反对与工人和人民为敌的意图，党并不拒绝根据具体情况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合作。”这样一来就一下子解决了我们政治策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而且是按

照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精神解决的。据著名的原则维护者看来，巴伐利亚人、巴登人和黑森人由于搞了若干次选举联盟而犯下了滔天大罪，现在他们却得到了完全的赦免。“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做了任何违背党的原则或者哪怕只是违背党的策略的事情”（倍倍尔的结束语！）。所以任何一个不妥协派今后都没有权利破坏他们认为对于搞好运动是必要的选举协议，如果我们考虑到，某些人去汉诺威是为了由于南德意志人的“选举交易”而狠狠训斥他们一番，我们就会懂得决议的这一段是怎样的无价之宝了。

这一段对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问题也清清楚楚地作了原则性的回答。倍倍尔希望用这段话对这整个问题作出最后的结论。他在结束语中拒绝了要求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提案；事情终于使他感到厌烦了。“坦率地说”，他对李卜克内西和追随李卜克内西的柏林人喊道：“我今天就要让事情定局！”——不过不应当忘记，几年前首先积极维护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这一思想的就是伯恩施坦这个异教徒，那时倍倍尔还是反对他的。今天，倍倍尔是改宗者，他胜利地维护了原来伯恩施坦的要求，反对激进分子中最激进的人。“伯恩施坦派”难道不应为此而高兴吗？

论述经济合作社的第四段同样是一大进步。其意义在于，它使1892年柏林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失效了。柏林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全盘否定了合作社，直到最近那些反对合作社的人还援引它来反对消费合作社。我本来希望会有一个更加友好的表达方式，我在发言中批评了这一段。这段说，合作社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经济因素来说，什么是“决定性的”呢？单独地说，任何一种经济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合在一起，每一种都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我听了莫尔肯布反对合作社的意见并且知道他的挖去第四段的“内脏”的提案后，我立即在内心收回了我对倍倍尔的措辞的不满。从那一

时刻起，我坚决赞成不加修改地通过这一段的全文。因为“内脏”太美好了，不应当由于皮肤上几点美中不足之处而冒丧失内脏的危险。那一段是这样说的：党认为经济合作社“是能够改善社员的经济状况的。它也认为，同工人用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任何组织一样（在原件中是加重点刊印的！），建立这种合作社是教育工人阶级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一种适宜的手段”。……与此相比，“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是说对“决定性的”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分歧而已。对于一件用心良好的事，我不会由于它用词不当而把它错过。

倍倍尔的结束语也不再能够使我对这一整段感到扫兴。他在该结束语中宣称：“我们认为，合作社对于工人阶级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枷锁没有任何意义。”这同他自己的决议是矛盾的。通常说来，“没有任何意义”同“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表达的就不是同一回事。而就这个事例来说，考虑到上述“内脏”，它们就差不多相互成为对立面了。在决议中根本谈不到什么“尖锐得无以复加地表述了对伯恩斯坦关于合作社的见解的反对意见”^①。倍倍尔声称，万一伯恩斯坦连这一点也表示赞同，那他就摸不着头脑了。既然他这么说，我也要请他惠允我表示，我对他的“尖锐得无以复加的反对意见”也有片刻是摸不着头脑的。

倍倍尔决议的第二个错误，是它对反复争论了很久的理论方面的意见分歧没有作出客观的确切说明。它根本不想作这样一个说明。倍倍尔在他的结束语中说：“我承认，在我起草我的决议时，一开始我就在心里说，讨论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②这一解释说明了全部问题。这项决议应当体现一条能够把党

① 参见本书第291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277—278页。——编者注

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人，包括那些半心半意地倾向于伯恩施坦的观点的人在内，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中间路线。只有对伯恩施坦本人和可能会有的那些不顾一切地追随他的信徒，才应当抓住不放并相应地贴上标签。错误只在于，倍倍尔在讨论本身进行以前就作出讨论的结论。在讨论中间他本人（我认为这是他的光荣）和其他一些作为坚决的“伯恩施坦吞噬者”到汉诺威来的同志认识到，“伯恩施坦理论”确实不是毫无思想、毫无根据、并且在一切方面都很无聊的东西。他认识到，措辞应当放宽，使为数很多的、听了伯恩施坦的批评并不是丝毫无动于中的同志能够接受它。而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必须在某一点上作出严格的限制，使货真价实的“伯恩施坦分子”不致滑过去。

倍倍尔还在汉诺威就对他的决议做了两处修改，或者说他欣然同意做了两处修改，用它们说明上述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两处修改涉及决议最后一段开头的一句话。原来是这样说的：“根据这一切，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纲领、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名称。”根据施托尔登的提议，倍倍尔用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代替了纲领这个词，根据休恩朗克的提议，他同意作如下说明性的补充：“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改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

去掉纲领这个词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在于：第一个提出修改的人认为，再一次表示受爱尔福特纲领的某些条文的束缚，确实是没有好处的。说的是哪些条文，从当前形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就是纲领绪论的第一条到第四条，理论讨论主要是围绕它们进行的。通过辩论认识到，至少应当把集中化理论这样集中一下，即把农业经济排除在纲领中阐述的发展模式之外。此外，贫困化理论的贫乏变得如此明显，以至没有人再愿意在任何时候相信这种“噱头”了。至于危机论，事实证明它本身陷入了“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危机。此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假想后果，我们最老练的理论家们的

意见是有着内在的矛盾的，这就非常严重地损害了“传奇式的”崩溃论的声誉，滑稽的崩溃的崩溃使这种幻想破灭了。

但是所有这些现在已经被摆脱掉的错误观念在爱尔福特纲领开头那几段里或者是直接说出来的，或者毕竟是可以引伸出来的结论。以为这些条文绝对正确的天真信念在汉诺威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我看来，这场在网球场刮起的思想风暴对我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很值得庆幸的成果，这是倍倍尔也不可能不觉察到的。甚至他恐怕也不再想坚持纲领中那些有争议的条文的原来的措辞了。于是就欣然作了修改。

辛格尔同志在他的闭幕词中宣称：党无意“哪怕丝毫背离其纲领”，但是报道中已经把这句话修改了：也就是把纲领这个词改为基本原则。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取得和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辛格尔同志的同意。但是这一改变也是能说明问题的。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这样一个总的印象：纲领中那些论述发展的段落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权威性意义。

从倍倍尔决议和辛格尔的发言中去掉了纲领这个词，也就把考茨基的论断推翻了。他认为，倍倍尔决议清楚地明确地宣称：迄今的批评没有提供“对我们党的性质和观点作任何改变”的理由——“性质”当然用不着改变，至少是连“伯恩斯坦分子”也承认是我们运动的性质的那些东西用不着改变。但观点却是要改变的。因为倍倍尔决议在措辞修改以后已不敢再加以保护的那些纲领条文也是党的“观点”。面对着这一情况，考茨基同志居然认为，这场如此激烈而旷日持久的讨论的结果，“从理论的角度看来是微小的收获”^①并且为此感到宽慰。“伯恩斯坦分子”对这一收获是十分满意的！

以休恩朗克的名义提出的另一个修正案值得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待。这是出自这样的需要，就是使决议的“极其清楚极其

^① 参见本书第284页。——编者注

明确的”措辞还要更加清楚，更加明确。根据倡议者的设想，这会成为“伯恩施坦分子”必定要落入的陷阱。倍倍尔赞成这一补充，是因为考虑到他的决议可以因此“更加合乎目的”了。要是他没有这样做那该多好！

凡是不带成见地读过伯恩施坦的书的有关部分（休恩朗克的修正案就是针对它的）的人，就会知道，在伯恩施坦劝告党应当“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①的时候，他想说的是什么，伯恩施坦在那里同他的“社会革革革命派的”反对者进行论战，这些人尚未摆脱布朗基主义对于革命暴力的创造性力量的信念。伯恩施坦对这些人的重要性估计过高了，他显然是由于他们在我们的一些党刊中发表了大量作品而对他们的力量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他以为他要对付的是党内的一种重大的思潮。针对这一情况，他用改良党这个字无非是想说明，革命的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意味着追求暴力行动的意向，而是如倍倍尔在莱比锡叛国审判案中所宣称的那样，“始终只是指和平的发展”而言。伯恩施坦看到了以立法等和平手段进行工作的党和那些信奉暴力的理论家的“革革革命的”词藻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党应当克服这一矛盾。他不是要社会民主党“改变”，而是说，如果党事实上早就是这种样子，它就不应在它的言论中表现为另外一种样子。

所以，只要那个修正案所反对的是改变党的实际的政治性质，它对“伯恩施坦分子”就没有意义，对他们的投票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这是专门针对党的名称可能出现的改变而言的——请参看倍倍尔的结束语！——那么伯恩施坦案件的辩护士们更加没有理由反对它。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39页。——编者注

即使新的名称比老的名称好，“伯恩斯坦分子”单从策略上考虑也不会对改变我们党的原来的、合适的、久经考验而响亮的名称感兴趣。何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啊，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请伯恩斯坦同志对我不要见怪，他针对“社会革革革命派”而使用这个概念想要说明的问题，我是理解的并且是认为有道理的；尽管如此，只要科学社会主义的术语在其他方面还继续有效，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这一用语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荒谬现象。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这一词是怎样理解的？这就是一种以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的原则为目的的运动。与此相反，我们把改良党理解为一种不想改变经济原则本身、而只求作表面性修改的意图。区别的标志不在于进行的方法，而在于目的。那么，怎么会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呢？这就会是一个既把实现一个新的经济原则当作目的、同时又不把它当作目的的党。

但最奇怪的是，我们的社会革革革命派，这些唯一具有清醒的头脑并代表精确概念的人，竟能够接受这个用语并且在他们的修正案中不加引号地采用它！何况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的”一词的意义必然同“社会革命的”一词恰好一样的，因此，一个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必然是同一个“社会革命改良党”一样的。妙极了！他们在这里显然是在“社会的”这一意义上使用了“社会主义的”这个词。对这些如此有名的逻辑学家来说这简直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混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就等于民主的社会改良党。他们猜测，伯恩斯坦想要的就是这个。他们认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区别的标志；这里就是阿基里斯之踵^①；必须在这里击中他。是的，这些人真狡猾啊！

而如果真的在“伯恩斯坦分子”中有那么一个人，这个人

^① 阿基里斯（Achilles）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据说他全身除脚跟外不怕刀箭，后来就是因为脚跟中箭而死。因此“阿基里斯之踵”被后人比喻为人的致命弱点。——编者注

宁愿是一个“社会者”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连这个胆小鬼也一定会拒绝改名，因而一定会赞同休恩朗克的修正案，因为在我们原来的名称中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很奇怪，我们不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党而只称为社会民主党。由此可见，如果按照建议改变名称，就会使问题尖锐化。真是糟上加糟！

关于最后一段的其他内容，为了立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可以说它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伯恩施坦和其他有类似想法的同志企图“掩饰或改变”党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是一种捏造，从讨论的经过情况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再一次对它进行实质性的反驳了。

但是，决议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伯恩施坦分子”究竟怎么能够赞成的呢？

第一段说：“资产阶级社会迄今的发展没有提供理由使党放弃或者改变它对这一发展的基本观点。”这就是说，党对发展进程的基本观点不应该改变！好吧，但是这些“基本观点”是哪些呢？我认为，似乎全部争吵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哪些观点有权利声称自己是党对这一发展进程的“基本观点”。可见决议忘记了主要的事情，即告诉我们它所说的基本观点是哪些观点。

也许是指爱尔福特纲领的前四段吗？如果应当把这种真实和想象、事实和假设、问题和预言的杂烩理解为基本观点，那就必须把这个内容加进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投票反对它，而且很可能党代表大会的多数人，恐怕还有倍倍尔本人，都会和我一致。我对决议最后一段中施托尔登修正案的意义已经发表过意见，因此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了。惧怕“纲领”这个词已足以证明，认为“纸做的教皇”绝对正确的信念已经破灭了。

因此，只有假设应当把党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观点”理解为这样的概念，即资产阶级社会必然要经历政治

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社会化的过程。我认为这就是所有其余的“基本观点”中的基本观点，既然决议的措辞同这种解释绝不矛盾，我就毫无保留地投票赞成它了。

赞成第二段对我来说就没有这样容易了。这一段的开头说：“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这是一个连伯恩施坦也承认的不言而喻的事实，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员会对此提出异议。如果说，在取决于我们的限度内，我们不愿意用野蛮的暴力为手段来进行这种阶级斗争，而且它的“最终目的”不是谋求工人阶级的特权，而是谋求工人阶级在全体人民中间的社会平等权利，那么，这种观点当然也同样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建立一种新的阶级统治，而在于废除一切阶级统治。

这一段接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对此我也可以表示赞成。尽管倍倍尔在他的结束语中三次强调“只”这个字眼儿，并以为这样一来就表述了“同伯恩施坦的观点的尖锐对立”。伯恩施坦考虑到从其他营垒加入我们这边的战士，认为说“首先”好一些。倍倍尔对他咆哮说：不，必须说“只”，但随即又压低了嗓门补充说：“尽管我们欢迎和喜欢其他阶级的人投向我们”^①。这不成了纯粹字句上的争论了吗？倍倍尔坚持他的“只”字，又几乎在同一时刻对它作了限制，这涉及到象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的一些人，而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last not least），还有倍倍尔自己！我认为，这些人的合作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合作，工人阶级今天还远远达不到它现在实际的水平。因此，倍倍尔的这个“只”实质上只能同伯恩施坦的“首先”作同样的解释。而如果有人在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工人阶级这个词并同拉萨尔一起把工人理解成

^① 见本书第278页。——编者注

每一个“对社会有所裨益的人”^①，好吧，那就让他只讲“只”，并且只要愿意就时常强调这可爱的词儿并强调个够吧！

现在来谈谈我的一点保留。决议中接着说：党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依靠政权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而为一切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奠定基础”。如果这句一开头说：“党认为它的历史任务等等”，而不是说“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等等”，那我不费多大踌躇也能赞成决议的这一部分。党，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组织，有权宣告它的历史使命是夺取政权，以便“依靠它”实现社会化（关于这一点我是这样想的：党恐怕不会等到它夺取了全部政权以后才开始社会化，而是在这以前就利用它所夺得的每一点一滴的政权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促进经济的改造过程）。但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除了夺取政权外还包括实行社会化的其他手段，也包括为取得经济权力而在工会和合作社方面进行的斗争。所以倍倍尔的措辞太狭窄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触及到两派争论的核心。当然仅仅是触及，并没有把它尖锐而清楚地提出来，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他在起草决议的时候对中心点根本还不清楚。

尽管有这一错误的措辞，但这一段仍旧使我感到高兴，使我能够赞成它，这是由于它的最后一行。倍倍尔在这里对我们真正的、实际的最终目的作了出色的确切说明。这里说：一切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

是的，这就说对了！我同倍倍尔同志握手致意。我知道，从他内心深处来说他确实是一个伦理学家，就目的来说是一个伦理学家，并且因此，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就手段来说也是一个（不加引号的！）伦理学家。

那么，一切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是最终目的。就这样说定

^① 参见《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91页。——编者注

了！除此之外，党内在“最终目的”问题上摇来摆去的无非是实现那个实际的最终目的的手段。“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们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美好，而是为了一切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而斗争。一切，甚至连社会主义原则都必须服从这一最终目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原则是实现一切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的最适宜的手段。这使我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一旦确信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彻底实现对于一切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不起作用，或者还不能起作用，那么，就连这一经济原则也必须在它实现的时间、方式和范围上受到限制。对我们来说，社会本身高于它的形态——倍倍尔的最终目的说出了这一点。这是最主要之点。为了这一点，我不仅可以在内心作小小一点保留的情况下，而且可以在内心作很大保留的情况下投票赞成他的决议。

发表于1899年11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899年第11期第549—558页。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成果（摘录）

——《社会主义月刊》编辑部的一次意见调查

（1899年12月）

汉诺威代表大会无疑是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一次，对于这次代表大会，舆论界的看法和评价分歧很大。看来应当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收集起来。因此，我们向德国和外国的一些社会党人发函进行一次意见调查。虽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调查结果并不完美，但它们毕竟给党史提供了具有特色的材料，因此完全应当公开发表。

我们向各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如下：

（1）您认为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最重大的成果是什么？哪一次发言最使您感兴趣？

（2）在您看来，党内所谓机会主义者和所谓激进主义者之间的对立的本质是什么？您现在是否认为对立已经消除，而这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

（3）在您看来，关于党的原则的争论对于党的策略将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对于联合政策和合作社的承认（哪怕只是有条件的）将怎样在实践中得到贯彻？

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答复按收到时间的先后次序发表于后。

我是汉诺威党代表大会辩论的主要参加者之一。我认为，

如果我拒绝答复你们的问题，你们是可以理解的。

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9年10月26日于柏林

二

详细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会占去我很多时间，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书面全民投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对倍倍尔决议的看法，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讲过。每个人都知道机会主义者是什么，——尽管机会主义者还十分顽固地不承认是这个样子。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仅仅是开始，——这场斗争将决定今后的策略。从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发言”即执行委员会选举时的表决情况看来，方向已经可以判明了。

威廉·李卜克内西

1899年10月26日于柏林沙洛顿堡

三

(1) 我认为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最重大的成果是，倍倍尔决议承认了伯恩斯坦所要求的对目前实际工作的较高评价，此外关于一大批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其科学性至今还没有被多数党员完全理解）的观点也基本上得到了说明。

(2) 被错误地称为机会主义者的那些人认为，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绝对必须做到以下各点：在帝国议会、邦议会和市镇议会中开展议会活动，加强和扩大工会，教育工人阶级、使他们具有愈来愈大的自治能力，促进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打算通过在共同体中有组织的消费和有组织的共同大批收购，逐步过渡到为自己而生产），培养合作社中的同志式团结精神；这些人深信，如果工人阶级大

力开展活动以争取合法的劳动保护，建立工会和合作社，并通过由此加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来大大加速经济的发展，那么，细小经营、小经营和家庭工业经营就会被消除，目前经济中的寄生分子就会被吸收掉。他们认为，一部分同志所持有的观点是反动的，因为这些同志认为目前的实际工作只有次要意义，这些同志进行这一工作只打算达到宣传的目的。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实际活动对人的思想的革命化也比华丽的辞藻更加有效，并且坚决抗议人们说他们打算延缓发展过程和把最终目的的实现推迟到无限遥远的未来。

党内的所谓激进派每天都想说，似乎工人阶级应当夺取政权的伟大日子明天就要来到，但同时却忘记了一件事：这样的说法到头来必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他们的观点完全违背马克思所教导的经济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状况；人们不能改变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性，而这种成熟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自我教育的成果。

各种观点的对立在汉诺威没有消除，这些对立的基础是各人的性格、教育、思想发展过程、活动和社会地位，因此很难完全消失。

(3) 汉诺威关于原则的讨论对党的策略的影响只会慢慢地表现出来，当前的政治局势——首先是苦役监禁的方针——使人不能毫无顾虑地进行试验。在汉诺威，通过倍倍尔决议只是承认了既成的事实。根据情况同资产阶级政党采取共同行动，这早就成为事实了，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认为这样做是模糊我们的原则；在汉诺威已从原则上承认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采取这种共同行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愿这最终会制止对那些由于处在领导地位而必须公开支持这种共同行动的同志的仇视。

关于生产合作社，党代表大会也只是承认了一个既成的事实。现在，消费合作社在德国至少已经有八十万社员，其中五十

万肯定是辅助工人。商品流通额远远超过了二亿马克，它已经分配的赢利约二千万马克。

鉴于这个事实，党代表大会必须承认生产合作社是维护和促进工人利益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早就如此，那么，个别地方关于支持消费合作社是否也符合我们的纲领(11)的十分无益的争吵就可以避免；对柏林党代表大会那一有名的决议所作的完全错误的解释也可以被防止。

更加重要得多的是，倍倍尔决议承认合作社是教育工人阶级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适宜的手段，就是说不仅是由于物质上的好处才值得促进和支持合作社。

如果党员们对这一因素作出正确的评价，那么，但愿这些同志从现在起就不再置身于合作社之外，而是作为社员开展他们的批评，在有可能出现小商人习气和追求红利行为的一切地方，坚决加以反对，并且关心使消费组织所拥有的经济权力能用来全面地谋求工人的利益。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今后几年内就会有一次党代表大会比汉诺威党代表大会还要重视合作社，却不致遭到反对，那时还会承认，合作社能够对工人阶级摆脱雇佣劳动的枷锁起参与决定的作用。

阿道夫·冯·艾尔姆^①

1899年10月30日于汉堡

四

由于我没有详尽地研究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所以我不能对你们说明我对它的看法。我只能说一说我的一般印象，这一印象是：党内的各个流派的对立是根本不能消除的。夺取政权，这是一些人的原则，坚守自己的利益以及自由人的联合，这是另一些

^① 阿道夫·冯·艾尔姆 (Adolf von Elm 1857—1918)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德国工人合作社运动的领导人，国会议员。——编者注

人的理想，我想把这二者比作兀鹰和鸽子同笼。

埃利塞·勒克律^①

1899年10月28日于布鲁塞尔

五

(1) 我认为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公开确认象伯恩施坦那样思考问题的同志在社会民主党内不是“受容忍的”党员，而是完全合格的党员。

(2) 就实践来说，“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之间的对立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对于前者来说，当前的社会政策工作占第一位，对未来的希望占第二位，而激进派的态度相反。这一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因为它是以性格以及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个人见解为基础的。

(3) 好几年来，党在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进展时走的是实践的“机会主义”道路，今后党将在这条路上更加坚决和更有成效地大步前进，因为人们在内心感到已经摆脱了某些理论预断所造成的碍事的概念，关于这些理论预断“永无谬误”的说法已被证明是极其荒谬的了。合作社运动即使得不到党的正式承认，也会进行下去。倍倍尔决议的第四条将有助于减少与此有关的个人阻力。

爱德华·大卫

1899年10月30日于美因兹莫姆巴赫

① 让·雅克·埃利塞·勒克律 (Jean-Jacques Elisée Reclus 1830—1905)
——法国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之一，第一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编者注

六

我认为，想用三言两语来回答你们提出的复杂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要详细回答我又没有时间。因此我请你们不要考虑我的回答。

卡尔·考茨基

1899年10月31日于柏林弗里德里希

七

(1) 汉诺威代表大会最重大的事件是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倍倍尔决议。这一决议保证了党所必需的统一，却又允许某些专门领域的个别部分可以有自由，人们已愈来愈感到这种自由是不可缺少的了。

(2) 所谓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之间的对立的本质是很复杂的，三言两语未必能下一个定义。有人企图把它规定为不同性格的产物，其中当然也应当包括这个问题所牵涉的那些个人因素；这种说法当然包含很多正确的内容，但这个定义毕竟不是包罗万象的，还必须用其他因素来说明。其中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以集中化的愿望为一方和实行分散策略为另一方的对立，即公式化思想和具体化思想之间的对立。只有当一种倾向由于得到官方承认而带上光轮、另一种倾向却被看作异教邪说的時候，这两种倾向才能够是对立的。在我看来，倍倍尔决议消除了这一对立，因此我认为，策略领域里的分歧暂时已经消除。但是新的情况又会在这一领域造成对立。

(3) 对联合政策的承认将给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问题以新的推动力；它无疑已大大加强主张参加选举的人的地位。关于合作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地的状况和需要；因此我不相

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目前除了理论上的意义外还有别的意义。

阿尔伯特·休特古姆^①

1899年10月31日于纽伦堡

八

(1)我认为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党内长期受到鼓励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某种突然的崩溃以及社会主义的与此相应的同样突然的胜利的观点最终被埋葬了。就这一方面来说，伯恩斯坦仍旧是胜利者。我说仍旧，是为了突出说明，由于他现在所强调的这一观点早已在党内成为几乎普遍的信念，因此在这一限度内说来，他以前已经是胜利者了。

在这一方面的最有趣的发言是奥艾尔作出的。一般说来，他是用强有力的手腕把党的发展引向正确轨道的人，或者说得更恰当一些，他懂得凭自己的力量阻止那种想改弦易辙、使发展脱离党多年来已经采取的道路的企图。他的与此有关的两次发言是这样的：

“请你们回想一下倍倍尔在群众集会上和在议会中的演说：难道没有出现过‘大动乱’、‘崩溃’这种话吗？当然出现过。难道他不是也曾经在私下谈话中并且也对我这个不肯轻信的托马确切地规定过这件事发生的年份吗？（笑声）他不否认，他也否认不了，在这个大厅内外有大批有力的见证人可以证明，我们这些不肯轻信的托马曾经对他们谈过这件事。倍倍尔还对我说，还劝告我说：哦，你原来是一个市侩，你不相信这一点，你缺乏革命毅力（大笑声）。这种场面曾经一再出现：我不相信1889年一切都将终结（笑声），后来从1889年推迟到九十年代中期（大笑声），我也不相信；后来恩格斯和倍倍尔把最后的

^① 阿尔伯特·休特古姆（Albert Sudekum 1871—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国会议员，曾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编者注

期限确定在1898年（大笑声），我仍旧是怀疑者，并说：等着吧！我们等待了，但昨天和今天又怎样呢？今天清早我问：倍倍尔，考茨基已经把他的见证人派到你那里去了吗？这当然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但在资产阶级中间必然会是这样的（笑声）。”^①

还有：

“如果考茨基声称，我在这一方面告诉你们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那么同志们，我要把这一声明登记备案，我认为这样一来‘大动乱’这个丑八怪已经被解决了，但是它是存在过的（大笑声）。”^②

(2) 所谓的机会主义者和所谓的激进派之间的对立是以党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党的力量发展了，党所负的责任加重了，就产生了所谓的机会主义。一个社会主义的宗派能够满足于只提出激进的抗议，由于这种抗议的本质，它力求采用过分尖锐的言语。一个拥有几百万群众的党再也不能够、而且再也不应当满足于抗议，它必须为对它给予信任的几百万人进行斗争，因此认为自己有必要更多地直接同现状发生联系。这一对立还没有消除，但是正象1891年的青年派已经消失一样，1899年的老年派也将消失，或者说，后者不会消失，但是他们将重新学习，倍倍尔今天已经作出了光辉的范例。按照实际斗争的需要来重新学习，原则也不会因此丝毫有所改变。

(3) 从关心取得一切可能取得的成就这一意义上说，策略将一如既往。我不期望实行联合政策，党将始终保持绝对的独立性并且只企图从敌人的不和中取得好处。很可能，在这样做时将更加不象原来那么谨小慎微地担心党会通过敌人接触而受到损害。

① 参见本书第269—270页。——编者注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年柏林德文版第220页。——编者注

合作社将放手发展,而且由于它的实际成就,党将被迫对它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

亨利希·彼乌斯

1899年11月1日于德骚

九

(1) 我认为党代表大会最重大的成果是,以通过著名的决议来克服党的革命核心和形形色色的有政治野心的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对立,后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是最近几年混进来的。上述决议是否足以长久地保持和解,这还要看一看,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就我看到的发言来说,我认为,从党的立场看来,倍倍尔的发言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二点,我不能作更加详细的回答了。

(2) 我认为,用一句话来说,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之间对立的本质在于,机会主义者完全丧失了对党的最终目的的信心,从而也完全丧失了对这一最终目的的兴趣,而激进派却坚持真正的党的原则。此外还应指出,所谓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伯恩斯坦,在英国这里几乎被看作是十足的自由派或者温和的激进派。我个人认识很多激进派,他们的观点比伯恩斯坦本人及其在党内的公开或隐蔽的朋友还要激烈得多。据我看来,只有这些分子脱离党,对立才会消除。

(3) 我认为,关于原则的争论是有作用的,它推动党的比较优秀的成员向左转。一般说来,有政治野心的分子和鼓吹温和政策的信徒可能还会以更大的劲头去着手破坏党的革命性。有关党的策略的争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很难说的。我认为,由于有条件地承认联合政策和合作制而产生的影响会根据情况而有所不同,或者只会使党的策略稍有改变,或者还可以起十分

持久的作用——这恰恰完全取决于部分地存在于党外的因素。

厄·贝尔福特·巴克斯^①

1899年11月2日于伦敦

十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争论同我个人的关系过分密切，因此目前我对你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是不合适的。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提得不对。问题与其说是在于人的对立，不如说是在于两种观点的对立。这一对立贯穿于党的全部历史，表现的形式和信仰者的组合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据我看，也许可以认为它已经缓和，但绝不能认为它已经消除。

关于党在政治联盟的实践中的原则和党对合作制的态度的争论，其结果可能是使人们在任何具体情况下都将日益充分地探讨客观前提，并且根据这些前提，而不是根据抽象的公式作出决定。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回忆一些事情。

(1) 距现在足有六年以前，我就在《新时代》上建议重新考虑一下党在普鲁士的邦议会选举中一向遵守的策略问题，从而也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容许选举妥协的问题。当这一建议（它早就由弗罗梅和哈森克莱维尔以其他形式提出）几乎遭到一致的坚决反对的时候，我在《新时代》上写道，好事要慢慢来；但是，除非在这期间情况发生彻底的变化，党在五年之后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问题。“那时，也许会发现一条比我那条更好的道路，但是，也许那位让我打着灯笼把党引进‘妥协的马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心满意足地喊道：‘哦，我的先知先觉！’”问题不

^①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 (Ernest Belfort Bax 1854—1926)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成员，曾著文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后来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编者注

在于一件事是怎样称呼或者怎样表现的,而在于它起什么作用。

(《新时代》1893—1894年第1册第80页)汉诺威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大多数对选举联盟问题表示了态度。

(2) 在同一年即1893年,我在《新时代》上有机会在讨论英国煤炭工人大罢工时指出工人在这一斗争中从他们的消费合作社所能得到的支持(上引书,第271页)。而当以后几年德国的建立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热潮一再受到教条主义者反对的时候,我于1895年11月在《新时代》上指出,这一运动不是重复旧的错误,而宁可应当说是克服旧的错误;只有根据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理由(担心警察迫害)才会反对鼓舞工人为了党去建立消费合作社。我写道:“冒着被指责倾向曼彻斯特主义的危险,我自己认为,除工人政治上的独立活动外,经济上的独立活动也是相当值得想望的事情,因此如果我能够按前一个意义也就是肯定的意义来回答问题,我只会特别高兴。”(《新时代》1895—1896年第1册第234页)汉诺威代表大会基本上按肯定的意义回答了这个问题。

(3) 八年多以前(1891年),我在《新时代》上写道:“社会民主党作为战斗的党,有自己所拥护的一定的目的和要求,这些已写入它的纲领,而党籍是以承认这个纲领为条件的。但是党没有同它的纲领的理论基础有关的必须遵守的教条。当然,理论基础是存在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一种有科学论据的国家观和社会观在实践上的表现,这恰恰是社会民主党的骄傲,而且是正当的骄傲。但正是这种观点的科学性禁止人们把它宣布为党的教条……纲领有时候作为政治行动的准则是有约束力的,而理论即使在一定的时刻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承认,仍旧要不断地受到批判,受到自由的讨论。”^①

在关于我的著名著作的书面辩论中,当是否赞同爱尔福特

^① 参见《伯恩斯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12—13页。——编者注

纲领的某些理论原则的问题眼看就要成为是否坚持信念的问题时，我坚决地维护了同样的观点。汉诺威代表大会拒绝承认纲领除了上述意义的约束力以外还有其他意义的约束力。

爱德华·伯恩斯坦

1899年11月2日于伦敦

十一

(1) 在我看来，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最重大的事件是，由于修改了倍倍尔的决议，党员就不是受爱尔福特纲领的字句的约束，而是非常一般地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的约束。但是，如果人们考虑一下社会民主党将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历史，就会认为经济崩溃论不属于它的基本观点。这一理论只是从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以来才见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不是站在经济崩溃论的立场之上的。只有从社会民主党成立以来得到一切杰出的思想家和战士拥护的那些观点才能够被看作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如下：资本所有制是建立在占有别人劳动的基础上，雇佣劳动是经济奴役的一种形式，这种奴役只有通过一种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才能得到克服；在实现这一由工人本身的阶级地位所产生的特殊经济制度的时候，工人阶级首先依靠的是本阶级的力量，因此，它必须把这一阶级的力量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政党，但是，有组织的政党的力量只有在一种自由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中才能得到发挥，因此，工人阶级的政策必须有计划地使国家和行政走向民主化。

(2) 所谓机会主义者和所谓激进派之间的对立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两派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所持的观点。激进派认为，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对立在日益尖锐化。经济和国家都保持着愈来愈片面的资本主义色彩。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如同水火一样不能相容。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手段，已经表明是完全没有能力按照社会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机会主义者认为，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不断加强，今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可能逐步社会化。激进派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通过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决没有得到和解。只有两派就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道路和手段相互取得一致的时候，和解才会实现。但是，关于各民族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的深入的、严格科学的研究，会促成这种一致。应当精确地阐述生产制度、财产制度和国家制度改造过程的各种类型，而不是提出笼统的公式。

（3）关于原则的争论不会触动党的策略。大批大批的党员将按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继续去想，但是将按伯恩施坦那样去做。这种情况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社会实践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动摇了社会理论为止。实践推动着愈来愈多的党员投身到当前的任务中去。这一实践为了对现状实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变革，必须考虑现状。当前的所有问题都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当前的问题往往不是表现为无产阶级单独的阶级问题。对于解决住宅问题，小资产者与无产者同样是经常关心的。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很多政治问题（军国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战斗口号，即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其他一切社会阶级在争取解放劳动的斗争中只是反动的一帮，这个口号从前在一切必要和不必要的情况下使用过，但在解决许多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在汉诺威，由于深刻认识到这样一种战斗口号对于解决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无能为力，就产生一项明智的联合政策。这一联合政策是社会民主党策略方面的一个现实的事件。关于合作社的决议有一个功劳，就是一些陷在拉萨尔的思路中不能自拔的社会民主党人从现在起不再把建立合作社看作是一种活生生的背叛原则的行为了。倍倍尔决议宣称建立合作社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党的事业，

它这样说是打中了要害。恰恰也有一些非社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的分子必然会参加扩充合作社。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迫切需要分工。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从事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宣传，它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争取在国家和市镇实行民主，它从私人企业主那里夺取适于国有化的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它通过国家法律干预资本主义垄断制的领域并且把统治阶级的权力手段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权力手段。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来说，这一任务几乎已经过分广泛了。因此，它也就不能同时解决合作社和工会完全特有的那些经济和组织问题。

保尔·康普夫麦尔

1899年11月5日于陶努斯山克龙贝尔格

十二

简短地回答你们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尽管如此我仍旧要尝试这样做，因为我缺乏时间，不能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详细地回答。

我从你们的第二个问题开始。

倍倍尔说：“要坚持剥夺！”大卫说，工资协定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我认为这两个公式表达了“所谓机会主义者和所谓激进主义者之间的对立”的核心，或者毕竟是表达了它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即使党的忠实地遵循进化论的左翼决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实现设想成一次突然的、直接的飞跃，那么它毕竟也没有陷入那种超科学的、因而也是非科学的观点，这种观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任何种属上的、质的区别，并且进一步把灾变的可能性直截了当地从历史上抹去了。

“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我认为这是他们的观点的理论根源。由此产生的结果首先是：他们认为“实际工作”在

质的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并且强调阶级斗争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形式”。说到量的方面，从应当用于实际工作的劳动的角度来说，恐怕没有一个“激进派”对日常斗争任务的评价比最爱和平的“机会主义者”低。另一方面，“激进派”一般说来能够平心静气地承认阶级斗争在这一或那一程度上出现“缓和”，尽管恰恰在德国实际上很少能看到这种缓和。但是对“机会主义者”来说，那种真正的或所谓的“缓和”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不受觉察地——我要说：偷偷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和平地、不受觉察地、偷偷地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证据，而这种情况迄今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因此我认为倍倍尔决议仅仅在涉及党的实际斗争的限度内消除了这一对立。当然根本不可能有另一种消除。理论方面的意见分歧既不能通过辩论也不能通过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得到消除。但是除了这一点限制以外我无条件地认为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是“激进派”从而是全党的一次成功。

如果说伯恩斯坦的追随者同样赞成倍倍尔决议，那么这使我生动地想起法国众议院内某些政党在重要的表决时的行动。例如有一次——我想，这是在推翻梅利纳^①的秩序党内阁的那次会议上——天主教保皇党一致赞同一项针对梅利纳的提法，要求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内阁多数派”。……但是这一行动是打算抹杀这次表决的真正意义的，这一点是瞒不了任何人的。相反……

这样一来，我也就回答了你们的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成果”的问题。在我看来，党代表大会使社会民主党重新加强了。党的无产阶级核心部队曾经长期坚持和巩固了他们从整体利益出发理应占有的地位。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回答你们的第三个问题——据

^① 茹尔·梅利纳（Jules Méline 1838—1925）——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96—1898年任政府总理。——编者注

在我看来，关于原则的辩论的结果只能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

我绝不认为倍倍尔决议中关于“联合政策”和合作社的阐述是对伯恩施坦分子的让步。前者仅仅是同宗派主义的策略不相容的，但是对于在一个被内部冲突分裂的社会中活动并且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阶级政党来说，它却是而且仍旧是一个必然性。而且倍倍尔如此全面地限定了“联合政策”的性质和目的，因此不管对各种具体情况的判断多么不一样，都不能由此引伸出抹杀阶级对立的观点。至于合作社，那么党认为它“对工人阶级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枷锁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这句话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关于决议对合作社会有什么实际影响，我不能说什么，因为这里要考虑种种因素，而外国的旁观者对这些因素是不了解的。

就“联合政策”来说，倍倍尔决议对迄今的策略未作任何改变。但是我认为，倍倍尔决议的总的性质或者辩论的总的结果不如说会对迄今在这里或那里遵循的选举联盟政策起一种限制作用，而且是朝着这一方向，即人们将认为原则性选举鼓动比获得议席更有价值。

波里斯·克里切夫斯基^②

1899年11月2日于巴黎

十三

我认为我不应当接受你们的友好的要求，因为我已经在汉诺威的闭幕词中概括讲了我对这次讨论的结果的意见，目前没

^① 见本书第282页。——编者注

^② 波里斯·克里切夫斯基 (Boris Kritschewsky 1866—1919) ——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有必要再进一步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保尔·辛格尔

1899年11月9日于柏林

十四

费边社向1896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已经向你们指出，伯恩斯坦现在为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而在德国开始的斗争，费边社已经在英国进行到底并且圆满结束了。当然，我是个十足的伯恩斯坦分子。如果李卜克内西愿意仅仅根据他自己的费边主义策略、而不是根据对1848年和1871年事件的热情洋溢的概述和旧的革命激进主义来发表演说，那么，每个人就会看到，他事先已在议会活动中改变了态度，后来他却谴责这种改变是对纲领的改变。今天在英国，人们把一个不可救药地落在发展后面的社会主义者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如果党表明自己没有能力接受伯恩斯坦思想，那么，这一名称恐怕也会获得这样的意义。

乔·肖伯纳

1899年11月11日于伦敦

十五

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意大利的主要的社会主义报纸^①报告胜利，它宣称，倍倍尔决议确认了老的学说和老的策略的胜利。屠拉梯却给他的朋友们泼冷水，他在10月17日的《社会评论》上说：

“我们不同意《前进报》关于伯恩斯坦的异端思想已被倍

^① 指《前进报》。——编者注

倍尔决议战胜和排除的看法。完全撇开语调和性格问题不谈，这一异端思想也是从发展和适应的必然性产生的；它将伴随着党，就象影子伴随着身体一样，随时间和环境的不同，有时被强调得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伯恩斯坦表示同意获得如此一致赞同的倍尔决议，这既不是怯懦，也不是自杀。伯恩斯坦思想的辩护者奥·艾·尔重新被选入了党执行委员会。决议几乎是一致通过的。总而言之，说什么胜利者和被战胜者，确实是不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是胜利者。”

然后屠拉梯继续说：“党的革命性质并不禁止它赞助一切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改良，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即党的革命性质不会由于争取改良的斗争而丝毫受到损害。”

有趣的是看到《前进报》在欢庆胜利的第二天就向屠拉梯的论证投降，它在发表宣告胜利的文章之后立刻讲了如下的话：

“社会主义政党同任何其他政党一样，有它的右翼和它的左翼。饶勒斯曾用这句话来说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辩论。当社会主义处于萌芽状态时，这种讨论是不可能的，它会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它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和有益的，因为我们已经成长了，并且有了一副结实的骨骼。”

终于这样说了！我必须提起一件事：当我比伯恩斯坦略早一些时候在我的书和《社会主义评论》中提出与伯恩斯坦相同的问题时，我被人大张旗鼓地革出了教门，他们（请注意，这是《前进报》！）宣布我不是社会主义者。

今天他们放弃了这一看法，但是他们在党的日报上仍旧表现出用沉默来扼杀我的思想和我的宣传的那一倾向。不过，这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说到我对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意见，我要简短地讲几句话。

我完全同意康普夫麦尔观察爱尔福特纲领的方式——几年前我曾在布鲁塞尔的《新社会》上发表我对他的观察方式的看法。在纲领的理论部分和实际部分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

鸿沟。第一部分清楚明确地宣扬灾变论，期待社会矛盾激化和危机加剧，直到爆发革命。如果从这些前提出发，社会主义的策略就应当是尽一切可能促进危机的激化。纲领的第二部分却不是这样，它要求改良，它预告国家的日益民主化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化。伯恩斯坦所要求的与此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所建议的策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遵循的。党的理论同党的策略不一致，而伯恩斯坦所做的不过是批评了理论！因此他可以接受倍倍尔决议，别人也可以赞同他表示同意的声明。

当然，人们是这样写着的：“党既不改变学说，也不改变策略。”

这一宣言同特里登廷宗教会议^①的长老们在路德和加尔文的异端思想出现后所发表的那个宣言相类似。

但是人们已经作了改变！谁看不出哥达和爱尔福特之间——爱尔福特和汉诺威之间的差别呢？

萨韦里奥·梅尔利诺

1899年11月11日于罗马

十六

说到你们询问的第二点，我认为，不能认真地谈论我们党内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的对立。我们的政策必须考虑到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状况中存在的可能性，我们的策略为了取得某些成果必须同这些可能性相适应，从这个非常广泛的意义来说，整个党自然是机会主义的或者可能主义的。不言而喻，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是每一项有成效的政治活动的本质。这种机会主义远不是同我们的社会批判和我们的最终目的在原则方面的激进主义相对立，而只是这一激进主义的必要补充，这一激进主义只有通过

^① 指1545—1563年在意大利特里登特断断续续地举行的天主教宗教大会。

——编者注

把它的认识变为政治的和经济的日常工作才能发挥现实的作用，这样，在发展过程中也就能实现激进的变革。我们的运动现在象任何时候一样都没有坏的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萎靡不振，纵容坏事，害怕为了实现党的目的而不顾一切地、彻底地、因而尽可能激进地利用现有的各种可能性（这是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的遗传病），这种机会主义者在我们的队伍中是没有地位的。不用说，关于个别的策略问题（选举同盟）存在着不同意见，但是，正因为这些不同意见所表现的是愈来愈明确和坚决的党的意志，而不是坏的机会主义的慢性毒素，所以这些不同意见对党的力量、统一和团结是完全没有危险的。

其次，我认为党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会上的辩论促进了互相了解，并且一定会在党内进一步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关于伯恩斯坦的讨论中交锋的那些理论观点的对立显然要比关于选举策略问题的意见分歧深刻得多。在这次讨论中，有些已经化为党的血肉（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学说也曾经是这样）的观点受到震动。但是，党代表大会的过程使人确信，这一理论方面的批判的争论也会完全自由地进行下去，而不致使党的团结受到危害。在这一争论中，问题始终只在于（辩论的情况已经向每个人指出这一点）：我们至今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解释是否同这一发展的事实完全一致；在这方面是否有必要对我们纲领的理论部分作某些修改。但是，党的原则，党的真正本质就是要成为上升的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这一点是任何这类关于解释内容的争论、任何预卜未来发展的企图都动摇不了的。这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原则同样地贯穿于党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所作的一切发言中。这是统一的、牢不可破的纽带。这是把一切引起分裂的因素紧紧束缚在一起的那种共同性，这一共同性也在表面上表现为党代表大会

的共同性,这就是说,争论的人在一个决议中取得一致了。

康拉德·施米特

1899年11月21日于柏林沙洛顿堡

十七

我很遗憾,不能满足你们的愿望。如果我想详细回答你们的问题,必须花费一些时间,而我在邦议会活动中间是没有这样的时间可用的。但是如果你们希望我用几句话概括我的印象,那么我只能说,汉诺威的辩论有一部分曾使我产生相当复杂的感情,但是我对于最终结果是相当满意的。

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

1899年11月29日于慕尼黑

发表于1899年12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1899年第12期第597、598—599、600—601、603—604、606、608、609、610—612、615—616、620、623页。

卡·考茨基 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决议^①（摘录）

（1900年2月21日）

由于伯恩施坦对他的书的法文版没有作实质性的改动，因而我批判的对象还是原来的样子，我也就没有理由对我的著作进行任何修改。

伯恩施坦为法文版写的前言也没有促使我去修改我的著作。这篇前言只不过对他的书的某些提法、特别是关于必然性概念的提法作了一番解释。他在前言中不断一再转换概念，而把这些混乱弄清楚只能带来很小的愉快，这同我花在这种工作上的精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毫不惋惜地放弃了再次和伯恩施坦讨论这个问题的打算。^②

但是，既然他得意洋洋地声称，他早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向我

① 我曾期望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会使德国报刊上关于伯恩施坦的讨论至少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既然伯恩施坦也用德文发表了他最近攻击他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的文章、即他的《前提》的法文版前言，那我就没有理由不把我的反驳译成德语发表了。这篇文章本来是我批判伯恩施坦的著作的法文版（《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批判者伯恩施坦》，巴黎斯托克出版社版）的前言，同时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一月号上。由于地点和时间不同，译出发表时我作了一些删节和补充。

《法兰克福报》已经猜测我们的沉默只不过是对那些“可能使社会民主党内某些方面的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采取用沉默来扼杀的策略。尽管我们愿意为了可爱的和平保持沉默，我们的敌人却促使我们说话。——考茨基注

②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他自己去和他的保护人与志同道合者彼·司徒卢威讨论，司徒卢威在布劳恩文库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我们也许还会和这篇文章打交道——中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提出的批评是非常无力的。他以为必须用‘较少的决定论’的解释来缓和唯物史观。好象关于决定论和自由居然可以说什么‘较多或较少’似的。康德把这种混乱思想称为‘可怜的托词’，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们打发掉了。”——考茨基注

提出了一个问题,而我直到现在还欠着债,没有回答他,那就让我至少在这里补充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他说:

“考茨基也反对我的这一说明:因为人类凭借对于他们的生存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组织,已经达到能够支配自然和指导经济进化的程度,‘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概念就相应地受到了限制。对他说来,这一说明是‘使历史必然性同空想主义的自由相调和’的有罪的尝试。”

对于我的如此苛刻的批评者来说,不幸的是,正是恩格斯本人,根据同马克思一致的意见,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描述为‘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飞跃’。人们会承认这一评价比我的评价要绝对得多。我曾经问过考茨基。否定我的论题同坚持恩格斯的论题这两件事怎样才能统一起来,我还在等待他的回答。”^①

伯恩斯坦记错了。他并不是用这种形式向我提出他的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对恩格斯的这句话发表过看法,人们也就不能够要求我把“对伯恩斯坦的话的否定同对恩格斯的话的承认统一起来”。

事实有点出入。伯恩斯坦把恩格斯的话用来作为反对我的一个论据。伯恩斯坦,这位伟大的反权威主义者和马克思批评家,他轻蔑地教训我们说:“学生的任务不是永远重复老师的话”,他却以为,如果他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来反对我提出的论据,就可以成功地把我的论据驳倒了。

如果伯恩斯坦不喜欢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一个观点,他就认为,反对这一观点是一种功绩,是独立思考的标志。相反,如果伯恩斯坦认为他能够用他的意思去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他就说,必须无条件地承认这些观点。

我这个狂热的、正统的、专断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同的看

^① 参见《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34页。

——编者注

法,我从来不主张:因为某一句话是马克思或者是恩格斯说的,所以它就是正确的。

但是这决不是说,从恩格斯那里引用的这句话是符合伯恩施坦的观点而和我的观点不一致的。

.....

伯恩施坦也是这样来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性质的,他用来观察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他发现汉诺威大会的决议对他的观点作了让步:

“当我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正在汉诺威开会。大会为这本书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情绪激动的人们曾经预言大会将作出毁灭性的裁决,而旨在导致这样的裁决的发言是并不缺少的。但是党的健全的理智和实际经验获得了对于教会精神的胜利,结局是一项决议,它的一部分至多不过触及作者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形式,而另一部分则对这些思想的本质本身作了相当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是:容许结成选举同盟,承认合作社对于工人解放的事业有益处,放弃认为党的现行纲领必须超出宣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范围的观点。”^①

人们从这段话肯定会作出推论,似乎“教会精神”和党的“健全的理智”在汉诺威展开过一场激战,“健全的理智”终于取得了胜利,以致能够用倍倍尔决议去束缚“教会精神”这个恶魔。实际上除了最后通过的决议外,根本没有提出过别的建议,而且这一决议是由那个对伯恩施坦的书作了毁灭性裁决的人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不管是在党代表大会之前还是党代表大会期间,就连最坚决反对伯恩施坦的人也从来没有提出把他当作叛教者开除出党的要求。所以谈论什么“教会精神”的失败,是需要相当大的想象力的。正象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员的所谓的挑拨精神一样,这种教会精神也纯粹是一个幽灵。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40—41页。

——编者注

伯恩施坦发现倍倍尔决议在选举同盟和合作社问题上对他的观点作了让步。

说到合作社，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恰好是在伯恩施坦遭到最激烈的反对的那一地区，特别是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合作社最发达。这就足以证明，人们可以对伯恩施坦的观点采取反对态度而并不敌视合作社制度。

请允许我在这里提起我在1897年春天，即早在伯恩施坦的书出版以前，已经发表了一本论述消费合作社的小册子，它的结束语是：

“除了工会为对生产条件施加影响而进行的斗争，除了无产阶级为争取在市镇和国家中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除了市镇和国家要求扩大和增加由他们掌握和管理的生产部门之外，每一个邦的合作社运动迟早肯定要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起一种相当重要的作用。”

那时候党内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这个观点，而比起汉诺威的决议来，我对消费合作社的态度是更加友好的。但是伯恩施坦摆出一付姿态，好象他是由于他关于合作社的思想而受到我们的攻击，因此当大会声明“党对建立经济合作社采取中立”时，他觉得大会与“教会精神”相反，对他作了“相当大的让步”。

选举同盟的问题也是一样。

不错，是伯恩施坦第一个提出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见1893年《新时代》）。当时，几乎各方面都不采纳他的建议，就连那些特出地被认为代表“党的健全理智和实际经验”的人，比如说奥艾尔，也不采纳这个建议。支持伯恩施坦的只有某个化名乌努斯的同志，他就是后来激烈反驳伯恩施坦的那位帕尔乌斯，但是他并没因此而改变他关于邦议会选举的意见。

不过虽然否定的意见是如此一致，并没有人想到由于伯恩施坦提出建议而责备他。何况这个建议之所以没有得到响应，也是由于提得太迟了，离邦议会选举只有几个星期了。1897年，

当普鲁士政府向邦议会提出一项扼杀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法律时，时机对于采纳这个建议就比较有利了。面对着这一法律，参加邦议会选举的建议得到了强烈的响应。在汉堡党代表大会上，奥艾尔的报告谈到这个问题：

“伯恩施坦和乌努斯在1893年完全是独持异议，这一次，当《新时代》、而且是它的主编考茨基重新提出这个建议时，情况就完全相反了。我们可以观察到，参加选举的想法一开始是受到普遍赞同的，当如何实行的问题提出来时，才发生意见分歧。”

我们党的国会党团那时候正好也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说：“如果资产阶级方面发表声明反对侵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就加以支持。面对容克反动派的进攻，大家必须团结一致。”

国会党团一致通过了这项宣言。

在我们上面讲过的那次汉堡党代表大会上，是倍倍尔提出一项决议，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和资产阶级反对党订立选举协定和选举资产阶级的选举人。在发言拥护这个决议的人中有克拉拉·蔡特金，她也是伯恩施坦思想的一个激烈的反对者。

表决时这个决议受到了某种歪曲，因而无法实行。因此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不得不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大会允许各个选区自由参加选举并在一定条件下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候选人。

这些决议都是在伯恩施坦的书出版以前作出的，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如下声明只是适应这些决议而已：

“只要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党作为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和拥护者的本质和特点有清楚的认识，那么，一旦问题涉及到加强党在选举中的力量，……党并不拒绝根据具体情况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①等等。

归根到底，《共产党宣言》已经阐述过这种策略。它在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时得到实践了，这是还在伯恩施坦采取他现在

^① 见本书第281页。——编者注

的态度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努力的结果，而且出力最多的恰好是那些在汉诺威最激烈地反对伯恩施坦的人。

伯恩施坦的书决不是支持这些努力的，不如说它更适合于败坏这些努力的声誉。

伯恩施坦正确地指出，他的书得到了“对名誉有损的恭维”^①。由于伯恩施坦自己不设法摆脱这种恭维，它就更加对名誉有损了。这样一来，不仅仅是伯恩施坦的书，而且所有稍稍和他的思想沾点边的一切都受到了连累。

如果伯恩施坦在倍倍尔决议有关经济合作社和偶尔与资产阶级反对党合作这两节中发现了对他的思想的“相当大的让步”，那么，这并不证明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而是证明今天他对这两节的看法完全和他对马克思理论的看法一样，都是非常错误的。

这两节证明，不应当把伯恩施坦和他的反对者之间的对立看成实际的改良政策和革命的空谈之间的、或者批判的发展论和僵化的教条主义之间的对立。我们已经看到，在伯恩施坦的书出版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有人开始考虑经济合作社和选举同盟。如果说我们的队伍中今天仍然存在认真地反对消费合作社和选举同盟的人，那么，导致他们采取否定态度的也是一些实际上的原因，而不是伯恩施坦认为在社会民主党内广泛

① 最近的一次对名誉有损的恭维来自英国。那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J·博纳在去年12月的《经济杂志》上写文章说：“根据这一切，我们对伯恩施坦先生的社会主义与一般的（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不相抵触这一点并不感到惊奇……对待各种政治问题、甚至连军事制度和殖民地政策问题的态度都如此温顺，肯定使一般非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感到非常舒服……我们觉得，伯恩施坦先生的原则实际上包含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至少不包含迄今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尽管它在英国也是变化多端的）。‘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先生身上的社会主义并不比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少，可是也多不了很多。”——考茨基注

流行的说革命“Cant”^①的那种现象。

在德国读者面前我们不需要详细进行解释，但是一旦伯恩施坦企图在不十分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读者面前如此严重地歪曲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有必要进行解释了。伯恩施坦的书所起的最坏的作用恐怕就是使外国和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的运动和它的理论基础得出极其错误的观念。

伯恩施坦发现的第三个“相当大的让步”是，“放弃认为党的现行纲领必须超出宣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范围的观点。我虽然被控为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开头五条绪论的异端，但是我承认大会是足够明智的，因而在上述决议中没有谈到这一点”。^②

伯恩施坦所说的“放弃”显然是指这一情况：在倍倍尔决议的结尾部分本来是说，“党没有理由修改它的纲领”，后来却用“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这两个词代替了“纲领”这个词。伯恩施坦一定认为这种差别意义很大；似乎用了“纲领”一词，这句话就会成为对伯恩施坦的裁决，就是把他指控为反对纲领的异端，不过党代表大会是“足够明智”的，它用另外两个词代替了“纲领”一词，而这就是对伯恩施坦作了相当大的让步。

但是他现在愈是要使人们觉得这种让步是重大的，下面这些话就愈是奇怪：

奥艾尔在汉诺威说：“当我把最初的决议的内容告诉伯恩施坦时，他写信给我说：‘亲爱的朋友奥艾尔！在作必要的、在这种事情上通常要作的保留的情况下，我也赞成决议。’”^③

由此可见，伯恩施坦已准备同意这句在他看来是不明智的、指控他为异端的话：我们党没有理由修改它的纲领。当然，要

① Cant一词来源于英语，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用这一词来指虚伪的口头禅。——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41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271—272页。——编者注

“作一点保留”。他后来是这样解释的：换句话说，同意纲领并不就是同意它的每个字，按道理说，纲领一词在这里的含意无非是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可是当党代表大会也是这样看，并因此用那两个词来代替纲领这个词时，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就突然一下子变得和纲领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行文上的变动就成了放弃一种思想、成了相当大的让步。

或者难道说，当伯恩施坦赞成这句话最初的措辞时，他已经有了现在这种看法，即认为这种措辞“使党的现行纲领必须超出宣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范围”？

人们按照需要对同一句话作不同的解释，每一次都作不同的保留，我认为，“在这种事情上”，这种做法决不是“通常的”。

促使伯恩施坦赞同整个决议的相当大的让步就是这个样子，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决议的其余部分是反对他的。当然他引以自慰的是，决议“一部分至多不过”触及作者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形式”。

读者可以自己判断倍倍尔决议触及的是怎样的“形式”。第一段说：

“资产阶级社会迄今的发展并没有提供理由使党放弃或者改变它对这一发展的基本观点。”^①

相反，伯恩施坦的书第47页上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的“描写同现实不相符合”^②。在第51页上他说：

“如果社会是按照社会主义学说迄今所设想的那样构成或者发展下来的，那么经济崩溃当然只能是一个很短时期内就要发生的问题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恰好不是这样。”^③

为了使这几句话和决议的第一段协调起来，就已经需要作

① 见本书第281页。——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99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05页。——编者注

相当大量的保留了。如果伯恩斯坦赞成这一条，那么他就是承认：不是他在书中歪曲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他错误地对这一学说进行了批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难道真有人会相信，决议中有关的这一段至多不过触及伯恩斯坦思想的形式吗？第二段开头说：

“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①。

这句话不是针对伯恩斯坦的书的，他的书并没有详细探讨阶级斗争问题。这句话是针对他发表在去年9月3日的《前进报》上的《对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的态度》这篇文章的。他在文章中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第六段（这一段中说：“这种社会变革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同时得出结论说：“说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这是对事实的很大曲解。”

当他写这几句话时，他不会想到这里至多不过是涉及形式问题，但是在汉诺威却关系到决定党的多数是站在伯恩斯坦一边、还是站在爱尔福特纲领一边的问题，这时他十分心安理得地赞成曾被他说成是“对事实的很大曲解”的那句话，然后对法国读者说，这样至多不过是触及了他的思想的形式。

决议的结尾说：

“根据这一切，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名称，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改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②

但是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的第165页上说：

“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

^① 见本书第281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282页。——编者注

多。”^①

社会民主党针对这个观点声明说：我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并且也不愿意表现为这样的党，这时伯恩施坦却鼓起勇气赞成这个声明并且指出，这个声明没有触及他的观点的实质，至多不过是触及它的形式。

如果他真是这样看问题，如果他把对他自己的言论的驳斥看成仅仅是形式问题，那么他就是极度地贬低了自己。那么他的言论就不过是空话，而大家为批评这些言论而花费的时间确实是很可惜的。

无论如何，应当向伯恩施坦的书的每一个未来的读者建议，在读这本书时，要始终想到倍倍尔决议，伯恩施坦是连这一决议的最初形式都赞同的。

如果有人相信，伯恩施坦的书表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危机，新的原则产生了，旧的原则消灭了，那么伯恩施坦同意汉诺威决议一事将告诉他们，伯恩施坦自己认为，他的书涉及的只是一些从属的次要问题，在重要问题上一切都应当照旧。^②

伯恩施坦的书当然谈到了恩格斯给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序言^③：

“他通过这篇文章为社会主义运动立下的功绩，是无论怎样高地评价都决不会过分的。……应当根据恩格斯的序言对近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39页。
——编者注

② 他在《伦理世界》（1月20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中也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认为，我们党内关于他的书的全部讨论的意义被过分夸大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曾经在汉诺威坚决反击伯恩施坦的倍倍尔在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即去年12月5日，在一次演说中发挥了一些见解，“使得一些报刊断定他几乎皈依了伯恩施坦的观点”。伯恩施坦根据一些敌人的巧妙的评论和《施瓦本哨兵报》的一句话得出结论说，全部争论是“小题大作”。

我可不致如此低估伯恩施坦的书。——考茨基注

③ 指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编者注

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著作作一些纠正，但是同这比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这一序言对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进行纠正。”^①

但是在汉诺威，当问题牵涉到要决定这种纠正是否必要的时候，伯恩施坦对决议表示赞同，而决议却说的是不需要纠正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

如果认为伯恩施坦同意倍倍尔决议只不过是一种逃避决战的狡计，因为决战可能只会非常清楚地表明，那些要求“纠正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的人在我们党内是多么少，那么这对伯恩施坦是不公正的。避免进行对自己不利的决战的愿望固然可能使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易于同意倍倍尔决议，但是假使伯恩施坦并不以为他能够心安理得地承认决议，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可以用他现在的整个原则立场、即他的折中主义来说明，而折中主义无非是他目前喜爱的政治倾向在理论上的结论。

要讲清楚就会扯得太远。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伯恩施坦认为，使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接近，排除使它们分开的障碍，抹去它们之间的界限，这是他的任务。

蒲鲁东的学说对于这种努力是非常合适的。因此伯恩施坦认为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这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关于蒲鲁东的论述是人所共知的：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

^① 参见《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74—75页。——编者注

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①

但是伯恩施坦并不是纯粹的蒲鲁东主义者，这就使事情更复杂了。他一方面是蒲鲁东主义者，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在他的序言中说的那样，他看到“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对于极端国家主义的自然的和健康的反作用”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引起了无政府主义如此健康的反作用的社会民主党，它所起的作用同样是健康的。他一方面厌恶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和他的高尚的伦理不相容，而另一方面他在当前英国的危机中支持张伯伦的铁血政策③。一方面他认为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据是无可辩驳的，而另一方面他仍然象从前一样当社会民主党人。因此，他一方面要求纠正我们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全部观点，而另一方面又同意一个拒绝这种纠正的决议，这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一种新的、毫不片面的立场，它依靠折中主义来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和统一性的束缚，它肯定对一些人来说是很合适的；对那些把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独立性看作眼中钉的文人来说是很合适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乐于和社会民主党保持良好关系而又不愿意向资产阶级宣战的人（这种人在不断增加）来说是合适的。最后，对于那些摒弃任何一种深刻的理论并且认为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去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人来说是合适的。

伯恩施坦的观点迎合了这样的需要。由于这种需要，他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劳斐二字是加重点的。——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38—39页。——编者注

③ 指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他是1899—1902年英国侵略南非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组织者。——编者注

文化界和政治界的一些人中间受到欢迎，从而赢得了在重要之点上和他有意见分歧的人们的好感。

但是这种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观点只能损害无产阶级必须完成的伟大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需要无产阶级全力以赴，彻底献身和拿出全部的热情。

它对于继续发展理论更加必然是毫无益处的，折中主义从来不曾对理论的发展有所推动，那种只是意味着向过去的思维方式倒退的折中主义尤其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无疑并不是人类思维可能达到的顶点。无论马克思主义对科学作了多么大的贡献，人类思维仍旧将超过马克思主义并创造出新的、更高的思维方式。但是不会用重新唤醒亡灵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

但是伯恩斯坦认为，当他高呼“退回去！”“回到康德去！”“回到朗格去！”“回到蒲鲁东去！”的时候，他是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对，谁要是更细心地注意一下，将会发现有时还喊：回到巴师夏去！

不，我们只能说：前进！而且只要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发现新的道路，我们就要高呼：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指出的道路前进！在我看来，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只能通过进一步专门化的研究，通过填补理论上的空白，通过改进现有的方法去取得理论上的进步。

如果有人找到一条发展理论的更好的道路，并且感到自己有力量走这条路，那么他可以向我们指出这条道路。但是指路人不应同时指出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指向这里、另一方面指向那里。

发表于1900年2月21日。译自《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22期第682—683、686—693页。

爱·伯恩施坦 我对倍倍尔决议的态度

——驳卡·考茨基

(1900年4月25日)

考茨基的文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决议》^①使我不得不再一次在这里谈谈这件事。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对倍倍尔决议发表进一步的看法，我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刚一闭幕时发表在《前进报》上的声明（1899年10月21日《前进报》）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相当清楚了。我从消息灵通的同志们那里知道，党内绝大多数人希望暂时停止一下我那尽人皆知的著作所引起的论战，我觉得最正确的做法是，只限于在那篇声明里讲几句话就算了。要对倍倍尔决议作任何详尽的分析，在当时都必须回头去谈那些在汉诺威阐明决议的理由的发言。那时免不了要发生争论，而争论又会引起进一步的论战。因此我简短地声明，照我看来，决议“没有禁止任何人对运动的各种可能性和运动进程的设想发表与倍倍尔不同的意见”，而且决议在其他原则性问题上的说法和我四个月前在伦敦提出的一些论点是一致的。由于我有权补充说，根据我收到的简短的说明，倍倍尔绝对不会怀疑我信念的忠诚，因此我就更加可以满足于那个论断了。不言而喻，我的声明是在告诉倍倍尔并且得到他的同意后发表的。我在发表前曾经把声明送给他和其他人看过，其中也有考茨基。

考茨基现在的文章不但对别的事情，而且对我的政治诚实

^① 见本书第321—333页。——编者注

性也提出了怀疑。在他看来，我对奥艾尔说我在作一些保留的条件下可以同意倍倍尔决议，这是使我避免毁灭性表决的“一条狡计”。考茨基同意给我减轻罪名，理由是我一时无能，分不清黑白。

我已在致《社会主义评论》(该刊首先发表了考茨基的文章)的一封信中详细地回答了考茨基的文章，这封信对许多事情作了详尽的说明，这对已经了解有关事实的《新时代》读者们也许是不必要的，因此我就不在这里全文发表这封信了。另一方面，在外国读者面前，我在论战涉及个人时不得不有所顾虑，在这里却可以不管了。因此我在这里将看情况而使用比《社会主义评论》上激烈一些的语调，并要对那里没有涉及的一些观点进行分析。

考茨基解释说，他之所以在《新时代》上发表他那篇对我个人如此尖刻的文章，是因为我最近那篇“攻击”我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的文章——《前提》的法文版序言——同样用德文发表了。

对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社会主义月刊》再次发表上述序言，固然并不是事前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但是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不是由我促成的。我认为这篇文章并不十分重要，不值得重新发表，我也是这样答复《社会主义月刊》编辑部的第一次询问的。不过，后来当编辑部请求我允许由他们来发表这篇文章时，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向法国读者讲的东西，也可以在德国发表。

这篇序言不是“攻击”，而是回答，而且是对在它动笔前不久发表的考茨基的批判著作《伯恩施坦……》^①（这本书明明白白也用法文发表了）的回答，同时也是对那些在汉诺威所作

^① 《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年斯图加特德文版，同年出法文版，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批判者伯恩施坦》。参见本书第321页考茨基注^①。——编者注

的反对我的发言的回答。我对考茨基的著作是怎么想的，我在《一句辩护的话》（1899年10月7日《前进报》）中已经讲过了，凡是可能在一篇短文里说清楚的理由也都说到了。我认为，这一著作涉及我的地方都是既有字句上的吹毛求疵，又有不惜粗暴地进行歪曲的恶意中伤。考茨基自然不会承认这个，但是他的著作的标题已经表明这是一部旨在贬低个人的作品。人们只要想想这个情况以及汉诺威的那些反对我的讲话，那么，我想，人们在读我的序言时就不会拒绝为我作证，证明我在反驳严重侮辱我的攻击时，是尽可能在这一任务所容许的范围内做到客观和有礼貌的。我坦率地承认，我这样做并不容易。然而任重者不可轻率。由于我深信实际的发展将证明我是对的，我就象经常做的那样，自己当自己的检查官，无情地把我的回答中一切比较尖刻的地方统统扔进纸篓。我严格避免一切针对个人和一切带有恶意的地方，只限于分析和说明我和我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之间、正确些说是和我特有的对手考茨基之间在观察方式上的不同。当我正要把手稿寄往巴黎时，听到了希望论战暂停的消息，于是我把最后涉及汉诺威决议的那一段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任何人只要并不认为对手没有被押进死囚车就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就不可能因为这段话而感到受了伤害。

辩护就是这样变成了“攻击”的。



现在来谈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说在作一些保留的条件下我也赞成决议。考茨基把我这句话说成是一个逃避决战的“狡计”，因为决战“可能只会非常清楚地表明，那些要求‘纠正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的人在我们党内是多么少”^①。据说我的混乱

^① 见本书第331页。——编者注

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立场”使我的良心容许这种怯懦的逃避。

对此我首先要回答说，他提到的这句话我并没有公开发表过，而是在我给奥艾尔的一封信中讲的。当奥艾尔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到这段话时，他明确地告诉人，他是自己决定这样做的。我觉得我没有理由抱怨他公开了这段话，但是我强烈抗议把这说成是有目的地玩弄怯懦的手腕。处于力量薄弱的少数自然不会令人感到舒服，但是如果有一个因此而放弃他的信念，这个人就是一个卑鄙的家伙。我没有给过这位在论战开始前就已洋洋得意地向我宣称他背后有“群众”的考茨基以任何口实，使他可以作出这种败坏别人名誉的暗示。

不管怎么说，信是在党代表大会前几星期写的，也就是在倍倍尔说明他希望人们怎样理解决议之前写的。至于倍倍尔在汉诺威对决议的论证对我直接起的影响使我会做些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我没有可能亲自参加这样的辩论，因此我同时也必须对我的直接的冲动加以一定的控制，并用较远一点的眼光去观察事情。

考茨基引用的倍倍尔决议结尾部分说：

“根据这一切，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名称，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改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①。

然后他指出，这一切都是针对我那本书和我的其他文章中的有关部分的。我不想反对这种说法。问题只在于是否打准了。

倍倍尔在他的报告的引言部分作过中肯的分析，他说，党在三十年里对自己的纲领中三个重要观点作过修改，党也反对保

^① 见本书第282页。——编者注

有不容争辩的教条和进行宗教裁判。党在思想上是不断脱毛的。如果把上面所引他的决议中的话绝对化，它和这段说明就是互相矛盾的。可见他的讲话本身证明必须“有保留地”理解决议。尽管我也决不想否认我和倍倍尔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我不得不证实，在我那封被引用的致奥艾尔的信中，在所指出的那个地方后面，我还接着写道：“但是确实没有必要作很大的保留。”

事情是这样的，我同意倍倍尔这个观点：承认对我们的概念随时进行新的修正的权利和必要性，并不等于抛弃社会民主党思想武器库中任何经久不变的因素。困难的地方只在于用普通的语言准确地划出这一经久不变因素的王国的界限。甚至连看上去基础非常牢固的原则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解释。

我们以阶级斗争的原则为例。在一部分人看来，这个原则只是确认现代工人的利益和目的与有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之间的对立，并只要求社会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站在工人一边。但是在另外一部分人看来，这个原则也已经包含着关于这场斗争的形式和发展进程的特定观点。而社会主义政党有关这一方面的观点确实逐渐起了巨大的变化。其他一些基本概念也有类似的情况。想想这一点，就会认识到，运动的真正的经久不变的因素存在于相当抽象的原则中。运动的物质基础、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以及它们的斗争形式、直接目的和历史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经常发生新的变化。只有抽象的或者说推论出来的原则才能保持不变。它们的观念论的（就这个词的特有的意义来讲）基础是运动的经久不变的因素。抽象的原则当然只有通过运用才能具有具体的内容，而运用是千变万化的。这一情况促使许多人否定抽象的原则具有任何价值，但是它和上面讲的并不矛盾。

要揭露那些习惯于轻蔑地谈论唯心主义的人所陷入的那些矛盾，这里不是合适的地方，这里要说的只是：我并不是毫无

用意地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作我的著作的题词的^①；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师在这句话里赞扬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胜利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同时我也不是毫无用意地在这部著作的结尾声明说，我不能赞同“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这句话。^②

因此当人们象倍倍尔决议那样说党没有理由修改自己的原则时，并没有说了什么我不能同意的东西，我甚至可以愉快地强调这个主张。只有当需要确定这些原则有哪些内容是不可改变时，矛盾才会暴露。基本要求也是一样。这些基本要求或者属于通则的领域——比如说，请考虑一下：“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的公式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③——或者表现为这些通则在当前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的运用，也就是表现为实际的要求，表现为或多或少激进的改良措施。可是在对后者的估价上，倍倍尔和我之间的分歧并不比党内通常也存在的分歧更大。至于党的策略，倍倍尔自己曾一再声明，他准备随着政治环境的每一次变化而相应地改变策略；关于党的名称，我已在1899年10月21日的声明中说过，我不可能想到去建议改变它。

这么说来难道就没有办法分清黑白了吗？呵，有的，这种办法已经有了，只不过一定不能到抽象理论和通则的领域中去。当倍倍尔力图用一般化的条文去表述一个应当有些象思想试金石的决议时，我认为他是给自己提出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

① 伯恩斯坦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的一句话来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扉页题词。这句话是：“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

② 参见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65页。——编者注

③ 这就是说，在实现社会化的范围和形式上，这个公式容许作哪些不同的设想。——伯恩斯坦注

务。如果他深入接触到具体问题，他又会碰上另一种障碍。逐点进行表决时也许每次的组合都不一样。汉诺威大会上的所谓伯恩施坦派和反伯恩施坦派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完全同类的人组成的集团。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分和合是相当错综复杂的。对于一个象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政党来说，只有一个问题可以检验它的党员：即他们的实际行为问题。党可以向党员提出的合理的要求是：承认党的总目标和一定的基本原则，保证遵守党的决议和按自己的可能参加党的活动。超出这一范围的要求，就会象我在关于我对党纲的态度的文章（1899年9月3日《前进报》）里说的，对于冒险家和幻想家显得象是一面蜘蛛网，对于忠诚的人显得象是一堵铁墙。倍倍尔肯定也对自己讲过这一点，而且他正是因此而试图用一般化的条文去概括那实际上本来需要用相当具体的条目去表达的东西。为了取得倍倍尔决议所没有产生的效果，连考茨基也觉得必须诉诸诡辩术，在这一方面恐怕埃斯科巴^①也会忌妒他的。

考茨基在我面前以黑格尔辩证法的热情的辩护士自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一个考茨基却对我的一个论点大发雷霆。我说，如果确认，社会主义临近胜利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也就包含着承认对准备性措施和改良的估价是错误的。我所说的关于纠正的那句可怕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根据恩格斯给《阶级斗争》写的序言，应当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进行纠正。要是说有什么地方适于运用辩证法，那就是这里，这里存在着明显而必然的相互关系。任何一种改良，任何一件政治措施或经济措施是否重要，都要看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胜利是临近还是遥远而定。只需要稍微懂得社会主义

^① 安东尼奥·埃斯科巴（Antonio Escobar 1589—1669）——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善于运用诡辩议论道德问题，后来他的名字在文学中成为伪君子和诡辩家的同义语。——编者注

政党的历史，就会知道，由于认识到争取解放的斗争所需要的时间超过最初的设想这一事实，对某些改良的估价也随之起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人们相信，第二天一觉醒来就会成为百万富翁，那人们对于储蓄是不会热心的。但是如果人们看到离那个日子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也就开始重视他们过去惯于以轻蔑的语气来议论的菜肴了。

* * *

就我对手的论战方法来看，我预料他会指责我，说我现在对他所反驳的论点的解释比我最初的意思狭窄。因此我一开头就声明，从我们刚开始论战起，我就反对考茨基对我的一些论点作夸大的解释。要每个人象我们自己那样准确地解释一般化的简练词句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观察问题的眼光多少都有些不同。这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概括得更多一些。因此我给自己订下一条规定，在我的对手甚至对我的论点作了最粗暴的歪曲的情况下，首先总是要假定这是出于诚实的误会。我们的政治术语和其他方面的术语是不断变化的，我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和我完全一致。但是我可以要求人们在我作了澄清之后放弃错误的解释。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恰恰缺乏体面的论战的这种最起码的前提。对他来说是不存在更正的。他在他的著作的法文版的正文中附带进行了一些攻击，涉及的问题是我们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争论之后已经可以说全部或者部分解决了的，同样，前言中也对我的论点作了一些解释，而在已经作了说明之后本来是不能再容许作这种解释的。大家从考茨基的文章，《我的土地问题》一书的两位批评家》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对待批评是何等敏感。赫兹只不过责备他有倾向性地解释了某些经济事实，就引起他大声叫屈，说赫兹把他当成一个“卑鄙小人”了，似乎责备他违背科学客观性就包含着责备他道德败坏。但是这种纤细的感情并不妨碍同一个考茨基骂我无耻狡猾，仅仅因为我没有迎合他的意思，没有

让他这位热中于当党内的国父的人逼着我去扮演卡提利纳^①的角色。

* * *

西塞罗^②——这实际上是考茨基在进行的这场反对我的论战时所打的旗号。他始终是作为这位国父的化身来反对我的，是以党和党的荣誉的拯救者身份来和我这个党的破坏者和怀疑者对立的。如果我反对党内任何一种以文字或其他形式表现的观点，那就是我批评了“党”，于是考茨基激昂慷慨地声明，必须反对我以保护党的荣誉。天呀！“党”是一个许多人的集合体，它是由共同的基本观点和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的，但是它其实从来不是、今天更加不是下一意义上的统一体：如果党员甲或党员乙喜欢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夸大其词，那就要党负责。和这种夸大作斗争还并不等于硬说党赞成或者准备赞成这种夸大。要准确指出谁是我们认为应加以反对的观点的代表人物，并不总是可能的或可行的，因为涉及到的往往与其说是明确表述的思想，不如说是零散出现的倾向。或者是因为存在某些顾虑，使人觉得不涉及个人的作法更加合适。因此，由于没有举出人名或者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人，就立即作出结论说这就是把某种观点算在党身上，并且说党的荣誉受到了攻击，这是一种非常武断的推论。论战既然不是直接针对党的，党也就不需要救命的辩护士。

考茨基在最新著作中特别强调伯恩施坦企图“在不十分了解情况的读者面前歪曲德国社会民主党”^③，为了抵消我的书所起的这种“恐怕是最坏的作用”^④，救世主似的考茨基竭力

① 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 (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约108—62) ——罗马政治家，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编者注

② 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 ——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卡提利纳的密谋是他执政时破获的。——编者注

③④ 参见本书第327页。——编者注

证明，倍倍尔决议中有关合作社、选举同盟等等问题的地方并没有向我所主张的观点让步的意思。

说到选举同盟问题，我满足于让考茨基去请教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我这是借用一下考茨基的说法）休恩朗克、累德堡之流。

关于合作社问题，考茨基援引了优先权，举出他“早”在我的著作之前——即一年半前——出版的论述消费合作社的小册子来，他说虽然他在小册子中承认合作社在工人的解放斗争中的作用，党内却并没有人表示反对。

考茨基和我之间的优先权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以上述思想的发现者或唯一代表人自居——不过我必须说明，我也同样相当“早”地在考茨基的小册子发表之前就已在《新时代》上非常坚决地主张建立消费合作社。考茨基的小册子的第21页到22页引用过我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但是考茨基仅仅谈我的书，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不十分了解情况”的读者中引起一种想法：似乎我为自己索取那理应属于他的荣誉。

不，荣誉属于应当得到荣誉的人。如果一定要说优先权，那么除了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我们这些理论家在这方面是又一次跟在他们后面蹒跚而行），象列·阿隆斯^①、阿德勒·格尔哈德这样的人是最有权提出要求的。特别是考茨基的小册子，尽管它在原则上对合作社作了种种让步，但对于实践却不如说是一本使人失去信心的著作，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它就是要写成这样的。倍倍尔决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抛掉了这种直到今天在党内占优势的倾向。

考茨基在纲领问题上对我的反驳和他在合作社问题上的反驳具有同等的证实力。我在我的著作里就已经声明，我并不感

^① 列奥·阿隆斯（Leo Arons 1860—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哲学教授，曾资助《社会主义月刊》的出版。——编者注

到有修改纲领的必要，我在对考茨基的攻击的第一篇答辩中也说明了这一点。考茨基一次又一次地象牧师拿教义问答那样拿党纲来责备我：坦白说出你对信条的立场吧！这时我才在1899年4月底寄给他一篇文章，其中严格地说明了我对纲领的一些理论条文的态度。但是我根据考茨基的提议又暂时把这篇文章抽了回来，准备在我们的理论争论结束之后再发表它。争论所需要的时间和篇幅比原来设想的要多，因此要不是考茨基突然再次谴责我“顽固地”拒绝说明我的主张对于党的纲领和策略会产生什么积极成果（《新时代》第17年卷第2册第626页注）^①，我大概不会发表这篇文章。在那以后，我把这篇文章交给《前进报》去发表（1899年9月3日副刊）。这篇文章说明纲领的理论条文中哪几点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或者过分一般化的，不过除了土地问题，我仍旧承认它们有条件的正确性，因为其中所警告的倾向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且即使是土地问题或者说农民经济的生命力问题，现在也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一句话，我没有提出过要对纲领作任何修改，而只是由于一再的挑衅才表示：如果这件事提上日程，需要修改的是哪些方面。但是我曾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不认为已经到了修改纲领的时候，因为纲领是党的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人们不会在短时期后就又把它们推翻。因此不管有无保留，我都可以接受倍倍尔决议中声称没有理由修改纲领的那句话。这样一般地理解，我到今天也同意。但是如果向我推论说，这句话意味着爱尔福特纲领理论条文的目前的措辞是绝对不可触动的，意味着“宣布我的观点为异端”，那我自然要说：“那我就不同意了”。不过如果有人声称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看不出这本身就是“宣布我的观点为异端”。接受倍倍尔决议还并不等于赞成考

^① 指考茨基在《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第2册第46期伯恩施坦的文章《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实际》一文之后加的注。——编者注

茨基的把纲领当作类似罗马异教谬论条目的东西来反对我的那种方式。

我认为，说社会主义所力求实现的社会变革“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事业”要比说它“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正确些。从考茨基对待我这一意见的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套是吹毛求疵的做法。一眼就看出，这里涉及的是措辞问题，而不是实际情况的改变，因为说到工人阶级行动的必要性，我的观点是应当尽可能强调它（我早就讲过这一点，参见1899年4月18日《前进报》），我认为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竭尽全力从事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并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想到要把社会主义运动限制在工人中间，把它当成工人的垄断物。因此，我还要说明的只是：在社会民主党所有早先的纲领中都没有我所非难而为考茨基狂热地坚持的“只”字。比方说，哥达纲领就简单地讲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想在国际的章程里去找这个“只”字也是徒然，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多么激烈地反对把运动限制在雇佣工人中间。

考茨基得意洋洋地拿倍倍尔决议中的一句话来反对我，他认为这句话明确地驳斥了我的观点，这句话是：

“资产阶级社会迄今的发展没有提供理由使党放弃或者改变它对这一发展的基本观点。”^①

毫无疑问，可以这样来解释这句话，它反对后来对以前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观点进行任何批评。但是界限在哪里？主要关键在哪里？这句话并没有说。按照它这种空泛的提法，它可以说是一种正统的宣言，我深信，反对它最坚决的莫过于倍倍尔。连“铁的工资规律”，连考茨基自己已放弃了的、说农民经济注定要遭到毁灭的观点，也都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观点”。如果说这句话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矛盾，那它只能是

^① 见本书第281页。——编者注

确认：要坚持关于目前社会的阶级性质，关于它的所有制和生产制度的不适当和不公正以及关于它的一般发展趋势的总判断。但是在这一限度内我是毫无保留地同意这句话的。可能，甚至很可能，倍倍尔还想用这句话表达更多的意思。不过这句话的措辞是允许我作那种解释的，而我不认为倍倍尔的解释同我的解释相差很大。

考茨基把引文巧妙地同上下文割裂开来，企图用这种手法来制造这样的印象：似乎在我的《前提》的叙述和我在其他地方的说明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只不过我由于自己的折中主义而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另一种指出我的严重矛盾的手法是把相互之间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对立起来，并把双方都极端地夸大。这些是论战中极其卑鄙的哗众取宠的手段。用这种方式可以使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变成十足的蠢话。

我们来举一些例子。考茨基在《新时代》第690页上说：

“相反——就是说同上面所引倍倍尔决议中的话相反——伯恩斯坦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描写’‘同现实不相符合’！”^①

如果假定倍倍尔决议要说的是社会民主党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切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这个矛盾确实是够尖锐的。但是首先，倍倍尔决议并没有提到《资本论》，其次，被考茨基引用的我的著作中那个地方是这样说的：

“它——那里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观点——首先就趋势来说是正确的。上述诸力量是存在的，并且按上述方向起着作用。但是这些过程也是从现实推断出来的……在这一限度内，上面的叙述在原则上是不可动摇的。如果说描写同现实不相符合，那么这不是因为说错了，而是因为说得不完整。”^②

① 参见本书第328页。——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99页。——编者注

不同之处是一目了然的。我的著作中的这段话和考茨基所引用的紧接着它的那句话都摘自论述现代社会的收入变动的一节。其中有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呢？说资本家人数增加或者减少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有什么关系呢？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反对我说资本家的数目增多了，他还表示，假如我的说法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就被否定了。在我的书出版后，他放弃了这个没有根据的论点。但是他不是公开承认他错了，而是以反驳的形式作了更正并且说（《前进报》4月8日）股份公司仅仅增加了游手好闲的有产者的人数。好象我在谈到有产者或者资本家时对他们的其他职能还作了区别似的。他不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反而对我进行了新的诬蔑，说我对股票持有者的寄生性不“感兴趣”。

另外一处：

“他（伯恩斯坦）一方面厌恶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和他的高尚的伦理不相容，而另一方面他在当前英国的危机中支持张伯伦的铁血政策。”^①

说到后一点，我非常怀疑张伯伦是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而执行铁血政策的，单凭这一原因，我就不可能支持他的这一政策。这次危机使大陆上的同志情绪上十分激动，我只是努力使他们明白，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它在南非要关心的事情远比约翰内斯堡的资本家和比勒陀利亚政府的争执重要得多，而且人们如果要想对英国和布尔共和国之间的斗争下客观的判断，就必须把这些争执和其他事件（这些只是促使冲突爆发的外部动因）同冲突的内在根源严格区别开来。甚至在作了这种区别之后，也仍然可能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因为这涉及到利益和原则之间的冲突，人们可能在对双方的评价上有分歧，但是作了这种区别，就具备了进行一次明智的讨论的前提。谁认为保持英

^① 见本书第332页。——编者注

国和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比为了德国将来可能得到的好处而使英国在南非受到削弱更为重要，那么他对南非的事件的判断自然就会同比如说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分子不一样，他们的看法相反，认为德国可能得到的这种好处、即这种未来的机会是高于一切的。我认识到，英国在好望角保卫它的国家的切身利益，它为了保障这一利益在必要时会投入它最大的力量，因此，布尔人的胜利解决不了冲突，而只会延长和加剧战争状态并导致极大地扩张军备，英国的胜利却既不意味着镇压布尔人，也不意味着严重损害德国的合法利益。自从我有这种认识之后，我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尽我所能地在报刊上发表我的看法。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观点，那就要看情况而定了，但是那时作为德国人他理所当然一定会支持舰队提案。但是不管怎样，伦理学在这里不会为实际的决定提供一个可靠的处方。伦理只提供衡量的尺度，当需要在一些祸害中进行选择时，它有时也可能站在暴力一边，只要这种暴力并不意味着践踏一种崇高的权利。

因此，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无条件地反对诉诸暴力。我在我的著作第127页上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的形式和它努力建立的一些制度都是和专政的概念相矛盾的。我重复一下我的话：“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致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句和现实相一致。”^① 和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文化（这种文化也是他们所力争实现的剥夺在道义上的权利根据）相比，阶级专政的概念属于较低下的文化。因此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它的彻底运用会导致布朗基主义）和民主的现代含义对立起来。但是民主和暴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现代形式的民主仅仅是一种缓和了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95页。——编者注

的、表示一种新的权利思想的暴力，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成为权利的暴力。和暴力在原则上对立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公约。正如我经常说过的那样，我很重视这种自由公约，但是我并不把它看得超出人类的一切利益或者说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一切利益。

因此，我对南非问题的态度和我的伦理原则根本不相矛盾。只是由于对二者的歪曲才能造成似乎存在这种矛盾的假象。考茨基为了取得廉价的轰动一时的效果，求救于这种歪曲来反对我。最无耻的歪曲是他说我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些”论据是“无可辩驳的”^①，谁意识到自己拥护的是强大的事业，他就会非常自豪，就不会在论战中采取这么一种可耻的手段。解释我在《伦理世界》上的文章的那种方式也是歪曲，关于各家报刊对我的书的评论也作了歪曲的报道。

我对这一点一直没有作声，但是考茨基的新引文使我不得不说，《新时代》那样报道对我的书的评论的方式，在各方面都践踏了我作为一个多年的固定撰稿人肯定应有的要求公正报道的权利。

对我采用的“回到康德去”这句话的解释是歪曲，最后竟然断定我“一方面是蒲鲁东主义者，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②。这是对我的言论的歪曲，粗暴的歪曲。什么叫蒲鲁东主义者，什么又叫马克思主义者呢？这里的识别标准是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什么？

蒲鲁东和马克思都完成了他们的发展，两人的著作都包含了社会科学中的宽广的领域。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们之间也还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和相似之处。

我在我的著作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内战》的第三节中

^{①②} 见本书第332页。——编者注

所阐述的公社的纲领,事实上表达了马克思的观点,它很接近蒲鲁东在《能力》中的论述^①,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举出一系列类似的共同之处。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使他们之间的分歧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而就连这方面有时也并非没有过分的夸大,但是这绝对不是针对整个蒲鲁东的。四年前,我在《新时代》上指出过,马克思那封著名的关于蒲鲁东的信写于《政治能力》发表之前,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的信的作用受到了限制,^②后来我从沙尔·龙格处知道,马克思确实曾对他表示过,这本书比他预料的要好。照此看来,异教徒的意见同大师的意见之间的差距并不真是那么远。

但是不管怎样,社会主义所包括的领域是任何理论都不能穷尽的。在理论的概括性原理中,不得不忽略细节,而生活和活动是细节。生活比一切关于生活的理论丰富得多,社会主义运动也是这样。因此把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对立的理论看作是绝对相互排斥的,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看法。象哲学体系一样,这些理论多半只是在对一定观点的评价上互相排斥,而且争论多半是关于定义的,而不是关于本质的。如果现在发现,一种新的学说即使比老的学说更好,却也并非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毫无遗漏,它忽略了老的学说考虑得较好的一些地方,那么,对这种新的学说重新进行检验并不是“唤起亡灵”,而是向着增加富有生命力的材料、向着打开埋藏着的宝库前进了一步。在科学中,任何时代都发生过重新拾起暂时中断了的线索的事。至于人们是否也说明这条线索的来源,那是一个是否诚实的问题。只能劝庸人相信,如果不把象康德、蒲鲁东、朗格这样的

①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03—204页。《能力》系指蒲鲁东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

——编者注

② 参见《新时代》第14年卷(1895—1896)第2册第46期第609页《政治家和政论家的蒲鲁东》一文。——编者注

思想家当作死狗扔掉，就是糟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观点。①

发表于1900年4月25日。译自《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2册第31期第99—110页。

① 请允许我立即用脚注的形式附上我的回答，因为我只是想说明，我放弃继续进行论战。我感到遗憾的是，这场论战已经从关于我们运动的基础的讨论降低到不愉快的个人争吵。我为此感到遗憾并且但愿这不是由于我的过错。说我损害了伯恩施坦的名誉，这只是他的幻想。在整个讨论中，我从来没有一个字触犯他的名誉。

我希望，我们今后可以不再考虑争论的事了。

要是想认真地反驳，那就是再次引起那个说不明白的问题，即伯恩施坦究竟想要什么和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至于伯恩施坦对我倾盆泼来的人身攻击和诬蔑，我没有必要加以反驳。——考茨基注

卡·考茨基 伯恩施坦的旧文章和新痛苦^①（摘录）

（1901年5月29日）

伯恩施坦把他近十年中发表过的旧文章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②。这种集子通常要说明各篇文章过去发表的地方，但是这本书却没有说明。我们倒可以指出，这些文章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曾经发表在《新时代》上的。

在《新时代》上可以找到这些文章的全文。目前出的这个版本把一些地方删掉了。伯恩施坦在前言里说，他觉得，“删去论战文章中所有那些和论题没有必然的联系、仅仅针对对方个人而在这一方面又超出了客观上合理的限度的地方和用语，是十分公平合理的”。而我看到论战部分中被删去的却只是那些针对我们党的敌人的地方。论战中针对一些党员个人的地方不仅没有删节，而且还作了补充。伯恩施坦甚至从我过去给他的信中进行挖掘，来证明我的灵魂恶毒。

如果把个别句子从上下文割裂开来，即使一字不差地放在人们面前，要作出解释有时也是相当难办的事。但是伯恩施坦所转述的仅仅是他对我的信的理解。他想证明我从前的立场和他今天的立场是一致的，而后来“我却转到他的敌人方面去了”（第219页），还想证明我对他的书的批评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原则上的对立，而是出于个人的憎恨。

伯恩施坦难以从我的著作中为这种指控找出证据，因此不得不把我的旧信拿出来，以便首先用一些表示个人好感的说法

① 为了避免不正确的推测，我声明，我在本文中不涉及伯恩施坦最近作的演讲。我想等这个演讲发表出来时才去评论它。——考茨基注

② 《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编者注

来证明我对他原则上的同意，其次用我拒绝他的一些建议来证明我对他的憎恨。伯恩施坦把这种论战方法称为在社会主义中为争取自由科学而进行的战斗。

我很容易证明伯恩施坦的上述论断毫无根据，记忆力和幻想欺骗了他，他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塞到我们的通信中去了。不过要揭穿伯恩施坦所编造的罪名，毕竟需要花费读者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没有权利为这些小小的个人反控向我们的读者提出这种要求。

有一个用几句话就可以暴露出伯恩施坦的幻觉的例子也许已足以说明他的全部控告手法。

他抱怨说（第422页）：“事实上考茨基反对我的书的论战从一开始就不是讨论，而是告发，而且在告发时用尽了一切能够加在一个作家头上的隐晦的诬蔑之词……考茨基完全可以把讨论（一场关于我们运动的基础的讨论）引向他所说的那种高度。没有人比本文作者更加乐意赞同这一点。是的，我可以指出，在我的书出版以后，我曾向考茨基提了一个建议，它只是为这类讨论提供了总算还可能做到的保证。但是建议被拒绝了。看来讨论要成为一场屠杀而不是一场辩论。”

多么卑鄙无耻啊！又是什么样的的一种毁灭性的论据呵！是的，我必须承认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这一事实肯定使自由科学的拥护者感到满意！

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狂才会在他对拒绝的动机下判断之前，要求知道被我拒绝的建议的内容。可惜我依然是原来的那个宗教法庭庭长，因此我异常顽固地坚持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个建议本身上，尽管它显然是次要问题。我还要顽固地坚持认为：仅仅引用没有公开发表的私人信件作为证据，而不发表原文，这是远比发表原文更为恶劣的背信行为。

因此我就不客气了，我将逐字引证伯恩施坦的建议（摘自他1899年3月1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你预先通知我说你要发表整整一组文章来反驳我的书。我能够理解你感到自己有必要这样做，但是从一种观点来看，这件事在我终究是不愉快的。我强制自己不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如果你的文章要拖很长时间，那就是说我还得再沉默几个月。在这期间，当然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所有一切攻击都会象暴雨似的落到我头上——从卢森堡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文章我已经感到有什么样的美味在等着我了——我应当在什么地方去回敬这些攻击呢？《前进报》不收论战文章，难道我应当去向一家地方报刊、向《月刊》^①寻求好客的情谊吗？因为在《新时代》上，在进行理论争论时，不到你讲完，我不能开口讲话。

“我知道有一条出路，但是我怀疑它是否合你的心意。我早就想向你建议，选择一种不同于迄今在《新时代》上通常采用的论战方式，如果象我所设想的那样进行，这种论战也会比用蠕虫^②来比胜负（你难道不能这样来形容它吗？）更生动活泼一些。我要说的论战方式是这样的：你确定下有哪些要点是你可能必须反驳我的，然后我们按照你定下的次序逐一对各点进行辩论。而且是用这种方式：你写出反驳的文章（比方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然后我来回答。我每次都把我的回答写得不致引起新的论战，就是说我应当着重于阐明和捍卫我的观点，少进行一些论战，这样也许就可以由你紧接着写一篇后记来把关于这一点的争论了结。用这种方式，论战就保持着对话的性质并可能摆脱当前败坏党内论战的所有一切告发和挑拨。同时我深信《新时代》的大部分读者都会宁愿看到这种论战。”

建议就是这样。我必须承认我拒绝了它。大家看，这个建议并不是出于希望给一场根本性讨论提供一切“总算有可能做到的保证”，而是出于远非如此高尚的愿望：早点说话。也只有

① 《社会主义月刊》。——编者注

② 借喻冗长的文章。——编者注

这样看才能理解它。同样，除开自由科学的拥护者，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拒绝这个奇怪的无理要求，它要我一开始就放弃系统的批判而去从事对话。比起有系统的阐述来，这种对话决不能更加保证讨论的公正性，倒是可能产生使讨论变得支离破碎并且离题万里的危险。

伯恩施坦现在认为我对他的建议的拒绝就是他那惊人的指控的严密证据，证明我从一开始就是想对他屠杀，而不是进行辩论，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只不过表明，我们的论战使他处于一种多么奇特的情绪之中，同时也表明他属于那种并非少见的一类人之列，在这类人看来，自己向对方开火是一桩崇高事业，而对方还击便是十恶不赦。在伯恩施坦的脑海里他的开火被描绘成为自由科学进行的骑士式决斗，而我的还击则是令人厌恶的屠宰。

.....

伯恩施坦重新发表他的旧文章，按照他在前言里的说法，是为了“反驳一些看法，有这种看法的人从那些论文（指他近来的著作）中看出了与我早先的为大家熟知的论文迥然不同的内容”。要使读者能够判断究竟应该从他早先的论文中看出什么，他就应当完整地重印这些论文。他自己必须不作任何“挑选”^①。他没有这样做。对这次重印，他从他的文章中“挑选”了最符合他的目的的那几篇，而且不满足于此，还从挑出来的文章中“挑选”了一些地方作了一系列的删节。固然他在前言中说，这些话是在争论激烈时说的，和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他在事后也认识到它们是不合适的。这些话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

我们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删掉的地方恰恰是有代表性的，用这些地方来和他今天的观点相比较恰恰可以证明，这

^① 这一段中的“看出”和“挑选”原文都是“herauslesen”，考茨基在这里是利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来讽刺伯恩施坦。——编者注

和他旧日的信念迥然不同，因为这些删掉的地方表明伯恩施坦曾是他今天为之唱赞歌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激烈的批评者。这些删掉的地方不仅仅显示出伯恩施坦过去的倾向，而且还显示出，要是有一个同志在恩格斯在世时胆敢发表我们这位批判的社会主义者今天自己所维护的观点，伯恩施坦就会多么激烈地出来反对。把我对伯恩施坦的批评和他对“折中主义的陈词滥调”、对“暗中摸索，毫无章法”、对“不学无术”和对“政治经济学的伪善者”的“道德上发疯”的批评相比较，那么他的批评是硫酸，我的批评就是牛奶加蜂蜜了。

他还用这种删节绝妙地突出表明他对我的指控，他从我的信中“看出”，似乎我过去是赞同他的观点的，而后来我却“转到他的反对者方面去了”。不错，我过去和伯恩施坦观点一致，一致之处就是他从再版的文章中删去的那些地方，然而他要从他战友们的记忆中删去这些地方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站到从前我们共同的反对者方面去的不是我。我继续进行着直到几年之前我们曾并肩进行过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和方式都和伯恩施坦曾经进行过的一样。我坚持的正是他现在愿意从他早先的文章中删去的字句，如果现在重复这些字句不只击中和伤害了我们的敌人，而且也击中和伤害了他，那么他就最没有理由去责骂别人背信弃义。如果他要说什么屠杀，那么当年的伯恩施坦就已经屠杀了今天的伯恩施坦。

在他的那些文章的没有经过阉割的原件中活着那个为我们大家所爱戴和尊重的旧日的伯恩施坦，他尖锐而严峻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用来冲淡社会主义的大量的乞丐汤。谁想了解伯恩施坦过去是什么样子的，谁想判断伯恩施坦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可以去读一下伯恩施坦从1881年到恩格斯逝世这段时期内发表的旧文章的原件。尤其对于我们的来自知识界的后辈中变得颓废和怀疑成性的那部分人，这种学习是只会有益处的。

* * *

这篇批评文章大部分是半年前在这本书初版后立即写好了的。那时候我没有发表它，因为正当要发表的时候，我获悉正在为伯恩施坦能够回到德国而进行活动。由于过去的经验并没有使我醒悟，我依然希望新的环境会使他明白自己大大错了，或者至少会使他能够比较公正地评判党内批评他的人，因此我不愿意用这篇批评去迎接他的归来。对于伯恩施坦这次的挑衅就象对待他过去几次挑衅一样，我为了可爱的和平而默不作声，尤其是因为我可以假定，对于他援引私人信件并且悲叹我背信弃义和邪恶，是没有人会认真看待的。

但是现在伯恩施坦却准备用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最大欢乐的方式继续他的活动，我后来也不得不体会到，有一些人认为他对我的指控并不仅是微不足道的怨愤的发泄；加之伯恩施坦，或者说他的出版商，正准备出一种分册发行的新版来向更多的人推销他的书，并且采取埃德尔海姆公司能够使得出来的全部大吹大擂的广告手段向读者吹嘘这本书，我看不出再有什么理由继续闭口不谈这本书的特色了。

发表于1901年5月29日。译自《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35期第274—278页。



(三)

1901年2月，伯恩施坦在长期流亡国外后回到德国。虽然考茨基等人幻想伯恩施坦这时会改变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但是他不久就又对马克思主义发起新的攻击。1901年5月17日，伯恩施坦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以《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是可能的？》为题目发表演讲，公然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主张用“批判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这次演讲博得了资产阶级党派和报刊的热烈喝采，在社会民主党内则又一次引起反对伯恩施坦的愤怒浪潮。在1901年9月22日至28日举行的卢卑克党代表大会上，柏林第四选区、柏林第六选区、图林根以及巴登的党员分别提出了谴责伯恩施坦的提案，要求大会明确表示拒绝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意图。大会在讨论这些提案时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倍倍尔在发言中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在“批评自由”的幌子下进行的修正主义宣传活动。格龙瓦尔德、施塔特哈根和洛伊特尔特等也谴责了伯恩施坦。海涅表示既不同意伯恩施坦的一些提法，也不赞成倍倍尔等对他的批判。他提出了一个提案，片面地强调批评自由，对伯恩施坦却丝毫不作批评。大卫在发言中公开为伯恩施坦辩护，攻击倍倍尔等压制批评自由。大会最后以二〇三票赞成、三十一票反对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指名谴责伯恩施坦的决议案。伯恩施坦、考茨基、奥艾尔、费舍在表决时弃权。伯恩施坦在表决之后发表一项声明，说代表大会的裁决不能使他“对于自己的见解产生疑惑”，但是他今后将

“尊重和重视”代表大会的决议。

伯恩斯坦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的这次演讲后来印成小册子出版，我们在这里选译了它的主要部分以及考茨基反驳它的文章。帕尔乌斯的《实践中的机会主义》一文虽然没有涉及这次演讲，但在当时是比较有分量的批判修正主义的论文，我们也选译了一部分。关于卢卑克代表大会，除了有关的提案、决议和发言以外，我们还选了几篇评论大会成果和会后的斗争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考茨基对党内继续存在的修正主义危险的严重性估计得很不够，甚至极其错误地认为修正主义已经开始“退潮”。而伯恩斯坦、大卫、康普夫麦尔等人则毫不隐讳地宣布决不改变自己的信念，而且要加紧行动。

爱·伯恩施坦 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是可能的？（摘录）

（1901年5月17日）

—

……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当我们谈到社会主义同科学的关系时，我们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意思，然后再转到另一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它怎样才能是可能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但是，对于我们的探讨来说，只有那些同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回答才是可以考虑的。这些回答可以分为两类。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观念、概念和学说。人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争取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运动。但是，无论是把它理解为状态、学说还是理解为运动，社会主义在这里总是同一种理想主义的因素联结在一起的，或者是这一理想本身，或者是朝着这样一种理想发展的运动。因此，它是一种彼岸的东西，当然，不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彼岸，而是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它是一种应当发生的东西，或者是朝着应当发生的东西前进的运动。这种看法甚至适用于保守的社会主义体系。但是我们在考察时不想涉及而且也可以不涉及这种社会主义体系，因为它只是错误地使用了社会主义的名称。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一切概念混乱，那么我们最好不要把如此模糊不清的societas（社会）的概念，而是把明确得多的socius（同伙或合作制）的概念看成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语源。一切事物都可能是社会的，如果把“社会的”

(gesellschaftlich)这个词当作语源，那么一些跟目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希望的根本不同并且不能相容的意图就有权利使用社会的(social)和社会主义的概念了。但是，这些党的要求是有一个不适合“合作制的”这一概念的。我曾经从这一意义上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①，这里也要继续按这一意义来使用它。

当我们谈到科学社会主义时，这经常只能是指社会主义意图、社会主义要求的论据而言，指这些要求所根据的理论而言。社会主义运动作为群众现象固然构成这一理论力图理解和说明的对象，在一定情况下，理论还力图为运动辩护和对它进行教育。但是不言而喻，社会主义运动同德国农民战争、法国革命或者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斗争一样，都不是科学的运动。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诉诸认识，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把利益作为自己的最主要的动机，不过必须强调指出，利益在这里不是理解为仅仅个人的或经济的自私利益。还有一种道德的（具有社会感的）、理想主义的利益。但是没有利益就没有社会行动。认识可以唤起或引起一种利益，但是只要它不同一种利益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同一种利益融合在一起，它本身向外就是不活动的。另一方面，一种物质的或意识形态的利益固然能够推动认识，能够促进认识的传播，但是它总是只有在这种认识有助于它的目的或者至少不损害它的目的时才会自觉地、有意识地这样做。因此，在作为知识体现者的科学和任何一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思辨的利益之间始终可能存在一种对立。

二

现代社会主义被恩格斯描述为目前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

^①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45页。——编者注

者、资产者和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很清楚，它本身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科学认识的运动。阶级斗争是利益的斗争，任何利益都必须或多或少被明确地认识到，才会导致斗争，至于要把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最初仅仅偶然的、仅仅在某一地区和某一职业中发生的和围绕次要事情展开的斗争理解成普遍的历史性的阶级斗争，那甚至必须以一种对社会关系的相当进步的认识为前提。但是即使如此，阶级斗争始终是首先为实现一个阶级或政党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而不是认识原理的斗争，一般说来只有当认识原理同一个阶级或政党的利益一致时，它才是认识原理的斗争。此外，社会主义不仅是把工人们在各个时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同有产者展开的斗争所围绕的各点简单地记录下来并且加以综合。作为学说它是这种斗争的理论，作为运动它使这一斗争集中到一个确定的目的上来，这个目的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改造成按集体主义方式管理经济的社会制度。然而，这个目的不是仅仅由理论预先描述的、或多或少注定要发生的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进行斗争。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把这样一种未来图景当作目的，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在目前的行动取决于对这一目的的考虑，社会主义就势必相应地包含着有一部分空想主义。我当然并不是想说它所追求的是不可能的或不现实的，我只是想以此来证明，它带有一种思辨的理想主义的因素，包含着有一部分科学上没有得到证实的东西或者科学上无法证实的东西。这里所涉及的科学，即社会学，不能象精密科学预先确定某种现象那样确切地预言，社会主义力求达到的社会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到来。它只能说明这种社会制度多半可能在什么条件下到来，并且近似地估计它的可能性的程度。

.....

我说过，社会主义作为战斗的运动不可能完全没有倾向地

对待科学。这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它的首要的目的不是实现科学的要求。但是在评判对于发展因素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的价值时，它力求依靠科学来选择自己的手段和方法，根据科学来衡量自己当时的目的。这是在社会民主党内得到公认的原则。问题只在于，一个政治斗争的党的性质是否容许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容许社会主义具有理论上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真正科学性的先决条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种客观性的程度取决于作为客观认识的科学同政党的纲领和理论之间的界限是否清楚。

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培根在他的一篇著作中说，国家事务和科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在科学中只有变动和运动才是合适的，而国家事务则要靠权威和威望。培根是专制君主制的辩护人，他所理解的权威的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适用的。而且在这里也不必去探讨，在这一点上对于各个时期的狭义的国家制度来说什么是合乎愿望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的样子来看待事情，并且把国家事务这个词换成政党（在目前情况下政党完全属于广义的国家事务并且执行社会机体中的重要职能），^①那么培根的对比今天在原则上也是合适的。政党比现代国家更加具有权威性质——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们捍卫它们力求实现的某些原则和要求，而为了能够以应有的毅力来捍卫这些原则和要求，它们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要求自己的追随者毫无保留地为之献身。我完全承认这一点，尽管我认为，如果在这一方面使用象伊斯兰教所用的不可动摇这样的说法，或者象差不多三十年前一家社会主义刊物所做的那样，要求它所捍卫的学说具有天主教教会赋予教皇的那种永无谬误的性质，那是过甚其词。我们早已不干这种事了。事情不在于信仰或良心上的强制，而只在于承认党的决议对于党员的政治态度是有约束

^① 培根自己使用了包括国家和社会在内的“Civil Affairs(公民事务)”一词，正如当时还根本不存在区别于国家科学的社会科学一样。——伯恩施坦注

力的，在于党员应当维护被党宣布为基本的那些要求和原则，一个强大的党没有这两个条件是无法长久地存在下去的^①。在这一限度上说，必须承认每个党有某种不容异见的权利。但是正因为主张这样的权利，我认为需要严格划分党和科学的领域。而这就首先要求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取得一致。

如果我们严格地表达科学这一概念，那么，科学仅仅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知识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性质和联系的认识，~~然而~~各个时期的认识的状况来说，始终只有一种真理，所以在每一知识领域也始终只有一种科学。对于所谓精密科学来说，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现在没有人会想到说自由主义的物理学、社会主义的数学、保守主义的化学等等。但是，关于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制度的科学是另一个样子吗？我不能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是荒谬的说法。当人们遇到这样一类观点时，只要仔细考察一下总会发现：问题在于忽略或低估了科学地阐述的理论或学说同科学本身之间的差别，仅仅因为一种理论或学说的结构在形式上符合科学推理的要求就把它称为科学。但是只要一种学说体系的前提和目的包含着超出无倾向性认识之外的因素，那么科学的形式就还不能使它成为科学。而社会政治的理论恰恰通常是这样，社会政治的学说则始终是这样。^②

① 不言而喻，这个准则在实践中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一个党如果不想堕落成宗派或者停留在一个宗派的立场上（因为政党常常是作为宗派开始的），就不会过分狭隘地使用“基本的”这一概念；一个党如果不想成为在大多数问题上具有不同观点的人的单纯的集合体，就不会把这一概念限制为纯粹的形式。Est modus in rebus（万物有尺度）——当我谈到政党的时候，我假定对于它的本质和正常的生存条件是意见一致的。——伯恩施坦注

② 例如，一个从政治上保守的观点制定的社会学说可以成为一个经过周密思考、严格合乎逻辑地建立的学说体系，然而它并不因此就成为社会学科学，它同社会学科学的关系，就象素食食谱同味觉生理学和营养生理学的关系一样。这样说当然并不是对这类学说和食谱的存在判处死刑。——伯恩施坦注

社会学说和政治学说同相应的科学的区别在于，恰恰在科学继续前进的地方，社会和政治学说却停下来了。它们服从一定的目的，而目的涉及的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一种愿望，即使这些学说在某些方面还有取得新的认识的余地，这些目的也使它们具有已经完成的和持久不变的性质。但是科学的社会学是永远不会完成的，因为它的对象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因为它对于这一有机体所遵循的规律还没有认识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言而喻，各种科学也有它们的不可动摇的成就。不能把关于经常变动的原理理解成这样：似乎科学并不要求充分考虑所有已经确定的经验和认识原理，似乎科学容许在推理方式中有某种任意性。相反，科学在这一点上有着严格的精确性，因为它们的任务在于发现按照规律不可避免的东西。至于所考察的现象和事情的最终原因和所确定的发展的最终结果，科学是不知道的。科学不承认自己的学术体系的最后终结，而是允许经常用新的事实来加以补充和纠正。对于科学来说，除了认识的目的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指导性的目的。^①

蒲鲁东无疑怀有赋予社会主义以一种科学基础的良好愿望，他按照这一意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他在这封信中告诉了马克思他的著作的内容，马克思在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这一著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写道（我在这里比在会上更加详细地引用这一段话）：“让我们共同探讨社会生活的法则，探讨这些法则得到贯彻的方式，以及我们用来发现这些法则的方法，但是，在我们摧毁一切先验的教条体系之后，为了上帝的

^① 一位发言人在会上提出反对意见（我在其他场合也遇见过这种反对意见），说不能同意这一点，因为譬如说医学无疑是一种科学，它的目的就是治疗。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反驳这种反对意见，治疗是一种技术即实践医学的任务，它当然是以彻底掌握医学科学为前提的，但是医学科学本身的任务不是治疗，而是认识治疗的条件和方法。如果以这种概念上的差别作为样板，那么即使在更加复杂的场合也就可以容易地确定，科学到哪里为止，技术或学说从哪里开始。——伯恩施坦注

缘故，我们要防止我们自己向人民宣传教条主义。我们永远不认为一个问题是已经详尽无遗地解决了的，当我们用尽了我们最后一个论据的时候，如有必要，请您让我们施展辩才和嘲笑重新从头开始。”^①

“我们永远不认为一个问题是已经详尽无遗地解决了的”——这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确实是一个恰当的格言，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并且愿意成为科学的话。社会主义不仅是并且不可能仅仅是科学，不是并且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我认为我在前面已经证明了。表达这一概念的词就已经排除了这一点。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

但是尽管如此，在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科学之间仍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愈来愈从科学的武库中汲取自己的论据。在所有的社会党派中，社会主义是最接近科学的，因为作为一个上升阶级的运动，它对现存事物的批评比任何其他政党或运动都更为自由，而批评的自由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条件之一。社会是一个有生气的、不断发展的机体，一个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亲眼看见这种进步的方向——寄予期望最多的那个党或阶级自然也比任何其他的党或阶级更为关心认识的进步。

仅仅因为对社会的联系的认识能保证社会民主党找到适于加速社会进步的手段以及避免阻挠或者延缓社会进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主义就已经要关心这一进步了。社会主义固然象前面说过的那样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志的事业，但它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事业。为了达到所企求的目的，它需要

^① 1846年5月17日的信。——伯恩施朗注

关于社会机体的力量和联系、关于社会生活中的原因和结果的科学作为指南。

科学社会主义的称号会使人错误地得出一种观念，似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希望或者应当成为纯粹的科学。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它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隐藏着一种不小的危险。因为它非常适合于使社会主义恰恰丧失科学判断的最主要条件之一，即科学的客观性。这样一来，现有的社会主义学说体系中的每一原理，就会按其已经取得的形式被看作是社会主义论证的链条中一个不可代替的环节，而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力图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保持联系，上述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给实践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与其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我认为不如使用这样一个名称，它既充分表达这一思想，即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并且承认这些科学认识是决定方向的因素，同时又排除这样的观念，即似乎社会主义提出或承认一种要求，认为自己仅仅是科学并且作为科学在某一时期内是完成了的。我认为，最适合这个双重需要的名称是批判的社会主义——按康德的科学批判主义的意义理解的批判。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要立即补充一句，我决不是宁愿采取这一名称的唯一的社会主义者，也不企求做第一个提出这一名称的人。毋宁说，它应归于这样一个人，他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与我不同的观点。我指的是罗马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早在1896年，拉布里奥拉在一本纪念《共产党宣言》的著作中声称，最适合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名称不是人们通常不加思索地使用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这一称号，而是批判的共产主义这一名称。^①

^① “批判的共产主义——这就是它的真正的名称，再没有比这更适合这一学说的名称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关于唯物史观的探讨》第1卷，1896年罗马意大利文版）。拉布里奥拉的哲学著作表明，他作为哲学家与其说是康德主义者，不如说是黑格尔主义者。——伯恩斯坦注

不是由于一时兴起,也不是由于咬文嚼字,而正是出于使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尽可能高度的科学性的愿望,才促使人们对“科学的”这一附加的称号表示反对。问题在于防止对科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一种错误的解释。与此相反,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对于我来说只有在其中“科学的”这一概念正是按批判的意义被理解为要求和纲领时才保持它的充分理由,这个要求是社会主义向自己提出的,它表明,科学的方法和认识对于它的愿望具有指示方向的力量。

科学是没有倾向的,它作为对于实际事物的认识不属于任何党或阶级。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是一种倾向,它作为一个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党的学说不能仅仅把自己束缚于已经确定的事物上。但是,因为它所追求的目的同对现代社会的动力的科学考察所表明的社会发展是方向一致的,所以社会主义学说能够比任何别的学说更加满足科学性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党,即社会民主党,能够比任何其他政党更加使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同与之有关的科学的学说和要求一致起来。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合理地向一个想要创造崭新事物的运动的学说要求多大程度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写于1901年5月17日。译自《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1901年柏林德文版第19—22、30—38页。

卡·考茨基

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

(1901年6月)

大家知道，5月17日伯恩施坦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上的演讲引起了资产阶级报纸上的一片庆祝胜利的嚎叫。但是如果有谁在拿到印好的讲稿时指望在其中发现什么耸人听闻的东西，那是会大失所望的。

当然，这次演讲也不是象伯恩施坦在讲稿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无害。他在那里说：“在演讲以后展开的辩论中，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在指出这一演讲可能会遭到的最重要的理论方面的指责时说，我所提出的问题归根到底只涉及一次关于科学这一概念的词句之争。如果把词句之争换成定义之争，那么我承认这句话在形式上是正确的。对于我来说，问题实际上首先在于确定‘科学的’这一概念的界限。”

也许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演讲的题目并不是“什么是科学？”而是“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伯恩施坦的颂扬者对于他就定义展开的争论是很不关心的。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他如何运用这一定义来说明社会主义。在这一演讲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促使我们研究它的也是这一点。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宣称，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科学了。伯恩施坦却把推翻这一论断当作自己的任务。

当然，在这样做时起决定作用的，一方面是他关于科学的观点，另一方面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关于科学的观点和科学界通常的观点不同，人们已经屡次给他指出来了。

他说(第32页)：“如果我们严格地表达科学这一概念，

那么，科学仅仅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知识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性质和联系的认识”。在第35页上说：“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①在第37页上又进一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党的学说不能仅仅把自己束缚于已经确定的事物上”^②。在前面他已经宣称，社会主义“是一种彼岸的东西，当然，不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彼岸，而是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③（第19页）。

伯恩斯坦赞同“回到康德去”的号召，因此他可以算是康德主义者。但是真正的康德主义者看到他给知识下的定义恐怕是不会满意的。“知识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性质和联系的认识。”这就是说知识是对于物自体的认识。但是即使完全撇开知识的这一定义不谈，科学的定义恐怕也会使大家都“摇头”、“科学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也就是说，是一切已知的、确定的事实的系统的概括。据我们所知，这是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观念。中国人的科学和欧洲科学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受因果性思想、受探索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原因的冲动所支配的。对于我们来说，有条理的研究同系统地概括研究成果一样，也是科学的一项职能。但是研究要以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未知事物为前提，要以假说为前提。假说同对“已经确定的事物”的知识一样，也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假说恰恰是科学的最有价值的产品。

如果我依靠与科学的目前状况相适应的方法，根据得到科学承认的事实，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未知事物，那么我在这样做时是按照科学行动的，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的产物都属于科学，至于这一未知事物是在地球之外，还是在史前时期，还是属于未

① 见本书第36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369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361页。——编者注

来，这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有人根据今天已知的社会生活的事实，对社会生活今后的发展作出推论，那么他在这样做时是按照科学行动的，正象医生作出预断一样，正象勒威烈^①根据太阳系的扰乱推论出它一定还有一个那时还属未知的行星一样，正象达尔文根据他已知的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事实推论出从前曾存在过人的猿类祖先一样。

预言的正确性当然只是在它应验的时候才得到证明。只有在发现了被寻求的那一行星时，才证明勒威烈的计算是正确的；达尔文的假说只是在我们的猿类祖先的遗迹真正找到的日子才成为确定的科学成就；马克思的预断也只是在它已成为事实时才能被认为是事实。但是这丝毫不是否认这些预言具有科学性。

从原始的中国科学的观点看来固然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它是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它不能仅仅把自己束缚于已经确定的事物上。与此相反，这并不妨碍它在现代意义上是科学的。

伯恩施坦认为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第二个障碍是，它具有一种倾向，它代表着利益。“科学是没有倾向的，它作为对于实际事物的认识不属于任何党或阶级。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是一种倾向”^②。这种反对意见太陈腐了，不值得多加驳斥。

每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困难之处。社会科学的困难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自己是他们需要研究的机体的一个部分，他们不是处于这一机体之外，而是处于它之内，每一个人在这一机体中都有自己的一定地位（他只能从这一地位来考察这一机体），自己的一定职能，他对于这一机体的其他部分也有依存性，而这一机体的各个肢体是彼此处于矛盾之

① 乌尔本·让·约瑟夫·勒威烈（Urbain Jean Joseph Leverrier 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369 页，——编者注

中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如果说这一困难真的是如此之大，以致使任何科学都成为不可能的，那就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而且任何一种对社会的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了。那么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话同样也就适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

那时我们就要把国民经济学排除出科学之列。伯恩施坦的批评为什么仅仅针对社会主义呢？也许他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者代表确定的利益、确定的倾向，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而代表“纯粹科学”吗？要不就是，他认为除了具体的理论家的理论和学说之外还存在一种纯粹科学吗？这种科学也许存在于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的彼岸，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不存在的。

按照这种哪里都不存在的纯粹科学的意义来说以及按照中国的意义来说，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是科学的。只有按照现代的、欧洲的科学的意义来说，它才可能是科学的。

这样我们就回答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需要讨论：要成为一种科学的那种社会主义必需是什么样子的？

伯恩施坦问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第19页）他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但是，对于我们的探讨来说，只有那些同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回答才是可以考虑的。……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观念、概念和学说。人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争取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运动。”^①

接着就是上面引用的那句关于“彼岸”的话，然后论述了这一问题：是把社会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当作社会主义的语源更好，还是把合作制这一概念当作语源更好，最后是这样说的：

^① 见本书第361页。——编者注

目前的工人政党“的要求是没有任何一个不适合‘合作制的’这一概念的。我曾经从这一意义上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这里也要继续按这一意义来使用它。”^①

乍一看，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一定义至少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来说是不够的。它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它的本质，它太肤浅了。合作制始终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们不是为了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的，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如果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那就同样也能把医药科学描述为开药方和制造药物的技术。但是它是认识和治疗疾病的科学。

如果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么可以说，它在起初是要排除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就在社会上泛滥的群众性贫困和群众性苦难。我们还将看到，这一消除群众性贫困的努力后来变成了解放无产阶级的努力。但是单是这一努力还不能造成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道主义者努力消除群众性贫困，但是他们中间只有那些人才成为社会主义者，这些人怀疑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实现这一点的可能性，因而企图达到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现存社会制度，在这另一种社会制度下，群众性贫困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两个因素：消除群众性贫困或者说消除无产阶级的意图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开辟一个新的社会状态，因为现存社会状态必然是同群众性贫困或者说同没有资财的无产者的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因素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里必须特别加以强调。因为它们不象“合作制”那样仅仅包含“一种彼岸的东西。……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群众性贫困、无产阶级和反对群众性贫困的斗争是此岸的非常现实的因素，正是这一领域的非常确实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构成了社

^① 见本书第362页。——编者注

会主义的基础。但是政治经济学一旦成为科学以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也就只有科学地获得和检验过的经验才是有效的。因此社会主义早就包含科学的因素，从托马斯·莫尔起，社会主义的伟大代表人物总是表现出一种杰出的经济的、往往也是历史的洞察力。

但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当然包含一个非科学的因素：科学的领域所达到的范围只象可认识的必然性的领域一样。必然性不再存在的地方，科学也就不再存在。它们的疆界每天都在扩大，但是我们毕竟还没有达到可以科学地探讨个人在社会中的活动这样的地步，也就是说，还不能把个人的活动当作必然性来认识。只有社会的群众现象是我们能够科学地加以研究的。

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直到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形成社会的群众现象，而只是一些个别人的意图，运动的目的——消除群众性贫困——的实现，只能设想为在个别人、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居民等级中富于同情心的、大胆而有远见的人们的行动的结果。我们不能科学地论证为什么这一或那一慈善行为必然要发生，我们认为，一个人是否会对乞丐施舍，这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同样，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取决于这样的偶然性，即人们是否找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正确手段和合适的人。

社会主义是一项建议，一个计划，必须说服人们去相信它是合适的。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精心制作这一建议或计划，从而使反对者的一切可能的反对意见从一开始就遭到挫折。

因此，绝对有必要设计一幅人们力求获得的社会形态的图画，而由于莫尔的“乌托邦”是近代的这类图画的第一个例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据此把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①

^① 现在通常译为“空想社会主义”。——编者注

伯恩斯坦不仅把原始的社会主义的这一空想的方面，也就是它关于一种今后应当实现的新的、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计划，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而加以强调，而且也承认它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恰恰在于，它克服了早期社会主义的空想的方面。只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完成这一功绩，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前，连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能完成它，因为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运动才成为一种群众现象并且从而能接受科学的研究。

三十年代末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到了四十年代这一因素已经引起一切人的注意，这就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只看到受苦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必然是今天无知的低级批判家硬栽在马克思名下的那种意义的贫困化理论。

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展，社会主义获得了一个新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这一科学地获得的信念出发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在有各种对立阶级的社会里是由经济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决定的。

这一基础是纯粹科学的，甚至那些认为这一基础是错误的人和那些认为在社会主义那里科学性必然消失的人也会承认这一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纯粹的科学。但是它应当犯一种罪行（伯恩斯坦公开认为这是它的堕落），它应该成为应用科学；它应当被应用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如果要理解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并且对之作出预断，那就必须首先探讨现存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和运动规律。马克思做了这件事并且在剩余价值学说中发现了说明这一问题的钥匙。这时才有可能科学地理解和证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在这以前，对这一使命

仅仅是凭直觉去理解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但是无产阶级必然也随着资本一同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日益占人口的多数，而无产阶级是同资本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的。它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是自然必然的。但是这一斗争不可能始终是经济斗争。由于国家的本质，这一斗争必然要成为资本和劳动为掌握国家权力而彼此搏斗的政治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的发展趋势是要成为居民中最强大和最重要的阶级，胜利最后一定属于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力求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图画我们今天还没有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能够根据今天的生产方式的特征和无产阶级今天的社会和精神需要推论出它的大致轮廓。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的概括。连认为这一思路是错误的人也必须承认，它从头到尾是科学的，它处处是立足于经验的，它所推论出来的未知事物不是处于我们的经验的彼岸，而是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来的。

这种社会主义同在它以前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由于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是具有深刻的科学洞察力的人，由于他们的目的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样，都是消除无产阶级，基础也是一样，都是现行的生产方式，因此如果说空想主义者的建议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尽管方法不同，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且朝同一方向运动，也就是朝着取消（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私人生产并且用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生产来代替它的方向运动，或者用伯恩施坦的话来说，朝着“合作制”的方向运动，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的全部动力在于它的特殊建议的合宜性和优越性，也就是在于“彼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却是在于资本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于此岸。科学社会主义者一定

要力求认识最终目的，这不是为了借此使他的运动获得特别迷人的吸引力，而是为了使这一运动能够获得一致性和直线性，能够避免歧路和弯路，避免无益的牺牲。只要无产阶级的人数、力量和洞察力在增加，并且它同资本的矛盾没有减少，那么不管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研究的结果会是怎样，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绝不会因此受到削弱。由此可见，他不是把科学当作达到一个预先设想的目标并且为这一目标辩护的辅助手段，而是只把它用于一个目的，即认识什么是必然的事物。这一新的立场使他能不偏不倚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探讨社会现象时一般能达到的程度。

这一切都不是新东西。但遗憾的是，伯恩斯坦给我们的最新的东西还要比这更旧。他当作“社会主义”拿来给我们的实际上无非是老的乌托邦主义的一个新版本。

据说(第24页)“(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仅仅由理论预先描述的、或多或少注定要发生的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进行斗争。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把这样一种未来图景当作目的，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在目前的行动取决于对这一目的的考虑，社会主义就势必相应地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①

伯恩斯坦在这里完全撇开了人们提出目的时所采用的方法不谈，但这却是决定一切的关键；空想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正是在于它们提出自己的目的时所采用的方法。如果说提出一种必须经过斗争来实现的目的就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古典经济学、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就势必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因为要实现听之任之和自由贸易，是必须进行斗争的。伯恩斯坦认为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势必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恰恰是这一点表明他忘记了空想主义的本质

^① 见本书第363页。——编者注

所在。

伯恩施坦关于剩余价值的阐述表明，他已经多大程度忘记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恩格斯已经宣称，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①（《反杜林论》第3版第13页）。

伯恩施坦说：“根据这一点，人们有可能被诱使认为，在剩余价值的科学证据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即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从剩余价值的事实引伸出来的。”（第9页）从下面引述的话可以看出，伯恩施坦把这一点理解成似乎工人被剥削是从剩余价值的事实产生的，而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必然性又是从工人受剥削这一事实产生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反对过这种观点，因此伯恩施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设法解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终于幸运地找到了如下的答案：

“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事实直接证明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而是群众对剩余价值的非难，即他们把剩余价值当作剥削来非难，证明了现存制度是不可容忍的。”

他洋洋得意地说，但是这毕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证据，是的，它“甚至不能算作反对现存社会的科学证据。就象发现在奴隶劳动中奴隶所创造的肯定比他们所消费的多，也不会成为反对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科学证据一样”。后面这几句话是无可辩驳的。他接着还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于证明工人受剥削来说是多余的，人们不必这么费事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这些话也是无可辩驳的。

当然，我们的一致之处到此就为止了。

空想主义者不能在社会本身中看到任何最后必然要战胜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页。——编者注

本主义的力量,他们唯一能指望的只是说服一切善良的人,使后者相信资本主义是罪恶深重的,他们把斯密和李嘉图阐述的价值理论看成合乎心意的助手,他们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从这一理论引伸出工人受剥削的事实,以便根据它来推论出今天的生产方式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伯恩施坦在这里以及门格尔^①在他以前所认为的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是四十年代几个空想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要根据工人受剥削的事实直接地或者按照伯恩施坦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那种方式间接地为社会主义或者哪怕只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制造出一个“科学的证据”来。他的观点不是那么幼稚的。恩格斯在那里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是由于“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变成了科学的。如果有人从恩格斯的话里看出其中所没有的内容,那么他一定是已经完全忘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所在,一定是已经完全陷在空想主义的思想方式里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简单地从剥削的事实推论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非熟练劳动的作用,机器的作用,资本积聚的作用等等,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这些认识产生出来。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工人提供剩余产品这一得到经验确认的事实也许足够了。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因此它不能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特有的发展和运动规律,而只有根据这些规律才能对我们正在走向的那种超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解答。单凭这一点,这一事实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就是不够的。

伯恩施坦没有能力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这一点突出地表明他倒退到原始的空想主义观点有多么

^① 安东·门格尔 (Anton Menger 1841—1906) ——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 维也纳大学教授。——编者注

远。他在补遗（四）中的表现也不亚于此。他在那里认为迫使人们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是“由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正义性和合宜性而确定下来的意志”（第77页）。在他看来，在实践中重要的是“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望性和可能性的证明。社会主义的宣传迄今总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它的吸引力也是从此而来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社会主义宣传的吸引力是来自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自对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的科学证明。如果我们与此相反，打算在伯恩斯坦提出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如果我们在这样做时打算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合宜性，那么如上所述，我们就不得不设计一幅这一制度的详尽的图画。但是我们就必须负责担保在未来国家中事情真的会象我们许诺的那样合适。可见我们必须承担义务实现一个今天已经在一切基本特征上完整的计划——总之，我们必须重新成为空想主义者并且谈论未来国家，而我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时就曾经是这样做的。

我们目前采用的方法的成就使我们没有理由退回到我们党幼年时代的这种方法上去。我们一如既往，不愿意从证明虔诚愿望的合宜性来汲取我们的力量，而是愿意从对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的认识，对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认识，以及对无产阶级胜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的认识汲取力量。人们可以否认这些认识的正确性，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些认识要取决于我们面临的未知事物的合宜性的证明。我们不能通过我们今天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绞尽脑汁来保证这一合宜性本身，而只能通过我们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认识和有条理的思想来保证。认识，认识，始终还是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样，我们愿意在任何方面都保持我们已经成为的那个样子：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

科学社会主义是必需的，它也是可能的。它事实上已经存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不可能是原始意义上的科学，即伯恩施坦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科学。我们现在看到，它也不可能是原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伯恩施坦今天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对他作为他的演讲题目提出来的那一问题的回答。

因此，如果伯恩施坦拒绝把“科学的”名称用于他的那种特殊的社会主义，那么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理由援引康德和拉布里奥拉来把它称为“批判的”。在《前进报》上批评他的人已经指出，对于康德来说，科学和批判精神是意义相同的。而拉布里奥拉正是在他把马克思主义叫作“批判的共产主义”的那本书（《关于唯物史观的探讨》）中非常明确和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

伯恩施坦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从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那一组论文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就仅仅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它一个也没有解决，它愈来愈远地迷失在问题的迷宫里，找不到任何出路，而它的目标本身也愈来愈成为问题。难道人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为疑问的社会主义不是最恰当吗？要不就是，由于它纯粹是由怀疑构成的，并且不能摆脱这些怀疑，把它称为怀疑的社会主义不是最恰当吗？

这当然不是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一年以后开始提出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给自己规定的目标。他威风凛凛地骑马出发去对社会民主党内非科学的拳匪进行修正主义的远征，他想把一种更高的文化带给他们。他认为自己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域发现了空想主义的一些残余。必须把这些残余驱逐出去。

他在他的《前提》（1899年）中就已经问他的批评者：“问题究竟是在于克服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不如说是在于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呢？我们必须在这些残余中寻找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

实践上的矛盾的根源。”^①（第179页）他还宣称：“但是只要是还保留着一点点理论感的人，只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观赏品，……那么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就会感到清除这些矛盾的必要。”^②

今天这位联合起来的修正主义者们的世界统帅宣称自己不仅没有能力制服这种所谓的空想主义的最后残余，而且不如说他在空想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并且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王国中的合法的统治者。

如果伯恩斯坦在这里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身份，那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发表于1901年6月。译自《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38期第355—364页。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56—25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5—66页。——编者注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901年6月24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

今天读了你反驳伯恩施坦的文章^①，很满意，这一下够他受的。这一回朋友和敌人对他的看法都一致了。小格龙瓦尔德^②勃然大怒，马上和他绝交。做得对。

你在文章的结尾引用了他论述社会主义科学的著作中的话，并且拿来和他的演说的题目对比，他看到时应该想到自己正在飞快地走下坡路，他这个人很快就会只能引起病理学上的兴趣了。

在下一次的党代表大会^③上无论如何必须就伯恩施坦事件进行辩论。他给党造成的损害远远抵销了他过去所有的功绩，这一点一定要对他彻底讲清楚。我下一次批评他的讲话会是他从来还没有受到过的严厉斥责。辛格尔也非常生他的气，而莫尔肯布尔不久前在汉堡的讲话表明他也火极了。这样下去，伯恩施坦在卢卑克会吃惊得目瞪口呆。没有人会为他最近的这次行动辩护。

……

你的 奥·倍倍尔

① 指《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见本书第370—383页。

——编者注

② 麦克斯·格龙瓦尔德（Max Grunwald 1873—1926）——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图林根党报编辑。最初是激进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库诺、连施等从左翼转向右翼。——编者注

③ 指于1901年9月22—28日召开的卢卑克党代表大会。——编者注

向罗莎^①热诚问好，希望她为卢卑克武装自己。你现在作为党的一家正式刊物的编辑，有权利由党负担费用来出席党代表大会。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33—134页。

^① 罗莎·卢森堡。——编者注

帕尔乌斯

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摘录）

（1901年8—9月）

一、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发展

“这再一次证明，上流社会的那位暴君，即中产阶级的舆论，是多么不可救药地反复无常，也再一次证明，我们这些上一世代的社会主义者一直蔑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现在我们德国有一种完全的、成熟的机会主义，这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了。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离现在还不久，最年轻的党员们都还想得起来——，人们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机会主义具有免疫力。在那个时期，只要指出一项政治行动的机会主义性质，就足以使这一行动在党内受到耻笑。因为党不应当成为机会主义的，党不可能成为机会主义的，这简直是一条公理。还在两三年前，谁胆敢指责党内某一个大人物犯了机会主义，就要被斥为悲观论者，并且一定要多加小心，免得被当作爱争吵的人，由于进行“人身攻击”而被开除出党。

现在人们既不害怕机会主义这个词，也不害怕它的内容了。政治上赶时髦的人——我们党内也有这种人——炫耀他们的机会主义，把它拿到所有的市场上去卖弄。相反，在这些最新式样的政治家眼里，革命主义肯定是有些过时，有些土气了，就象1848年的长燕尾服和怪里怪气的大礼帽一样。总之，机会主义存在着并且生活得很愉快。而它的存在就为它存在的理由

和它的政治价值提供了主要论据。它宣称：“难道我不是曾经一再被否认，被驳斥，并且用其他办法被消灭吗？难道大家不是已经深信，在人们毫不留情地、理所当然地揭发了我思想空虚，我无知和我伪造引文以后，我再也不能出头了吗？但是我还是一再出现并且愈来愈厚脸皮了。难道这不是正好证明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吗？社会革命的认识又在哪儿呢？”

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不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的总的政治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行动同它的社会革命认识不是等值的。社会革命的认识不仅仅是社会革命宣传的产物。单凭我们的勤奋的和目的明确的鼓动，还远远不能决定社会革命的效果。决定工业发展速度的世界市场的广泛相互依存关系，繁荣和危机的周期性交替，农村人口的停滞或者城市人口的集中，移民，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发展，新的工业国的兴起和旧的经济形态的衰落，新的大国的形成和旧的大国的削弱或分裂，战争与和平，民族斗争，争取政治民主制的斗争，政府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党相互之间的利害冲突，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斗争，这一切都是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行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如同在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中一样，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也有发展迅速和发展缓慢的时期；在狂热的突飞猛进时期，无产阶级以其勇敢坚决的行为和大胆的计划使世界震惊，在低沉时期，他们却变得优柔寡断，小心翼翼，他们的震动世界的力量也似乎消耗在琐碎小事中了。

1848年革命的伟大历史风暴推翻了一些政府并且几乎颠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以后是一次严重的低潮，到六十年代出现了新的高涨，表现为国际，公社和德国工人的规模巨大的政治组织，而在1870—1871年事件之后又出现一次倒退，它在法国当然持续的时间最长，后来又是一次新的高涨。最后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无产阶级集合为巨大的议会政党。首先在德国是这样，那里由于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大国，集中了大批的工厂工人，一整

批工业部门实现了革新,例如现成服装的制造使缝纫业革新了,制鞋厂使制鞋业革新了,随着大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同小城市的瓦工和木工完全不一样的现代建筑工人阶层;那里新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到处都很活跃,而社会民主党则把现成的组织和目标明确的纲领带进这种生活;至于资产阶级,它除了不彻底、软弱、胆怯和叛卖等等政治传统以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它匍匐在俾斯麦脚下,因为霍亨索伦皇室的这个家奴把资产阶级无法争取到的德国的统一作为普鲁士国王的恩赐扔给了它,铁血宰相自己则卷进了一场既愚蠢又不坚决(尽管非常粗暴)的反对天主教僧侣的斗争,但是壮大起来的年青的社会民主党却通过反社会党人法加强了阶级觉悟和团结!在法国、奥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无产阶级也集合成为政党。

这一新的社会革命斗争高涨时期于1889年暂时达到了它的极盛点。在那以后组织固然是大大加强了,但是象第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①(它的召开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上的那种革命首创的活力再也达不到了。运动在几年内保持在同样的水平上,后来就开始衰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发展继续进行,但是历史洪流的表面已不再是那样一致,我们看到了一条条细细的支流和横流蜿蜒而去,我们也发现波浪上面有油。这种现象可以用多种多样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原因来说明。

议会的会议是起鼓动作用的,起初它是目的本身。但是议会活动不能长期停留为鼓动手段。随着党在议会中的重要性的增长,开始出现要取得直接的议会成就的努力。社会民主党在它还是弱小的议会政党时把许多力量用来揭发国家的阶级性质,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它的软弱的结果。后来党加强了,的确能

^① 指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编者注

在议会中取得一些成就了，这一情况反映在议员们的头脑中，很容易同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发生矛盾。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愈来愈多样化，内容愈来愈丰富，大量的活动愈来愈具体。日常的琐碎的政治工作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就整体来说也是非常革命的，但是有些人集中精力于一项具体工作，却忽视了普遍的联系。象无产阶级运动这样的一种历史运动，它的为数甚多的政治表现形式是准备包括全部公共生活的，人们根本不能期待它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明显地表现出它的基本特征。社会革命运动愈强大，在具体问题上就愈容易发生偏差和干扰，要想通过具体问题认识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愈困难，人们也就更加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普遍联系上。可见，议会活动给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许多细小的实际任务，它们容易使人偏离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道路，尤其容易使旁观者产生错误的看法。

另一方面，曾把许多绝望的人带进社会民主党队伍的那一非常痛苦的手工业革命化过程，现在在西欧大陆也可以说是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破产的手工工人已经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状况的一般批判，把这一批判当作道义上的支柱。产业工人却不满足于此。他首先要求摆脱贫困。他要求变革，如果可能的话，要巨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要小的。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论述应当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我仅仅指出，对于“建设性”活动的要求也是从此产生的。政府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终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可以认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权利和受到监督的时代一般说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想断定，资本主义国家已放弃用暴力来对待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它已相信卑劣的警察行动是无济于事的了。目前，它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多次遭到失败之后，正为在议会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和解而操心。不仅在已经成立正式的“社会和解”内阁的法国是这样，而且在德国，奥国以及最近以来在

意大利也是这样。下一情况进一步促成了这种策略：最近几年殖民政策和对外政策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具有了长久已不再有的那种重要性，因此政府对于国内政策的注意力转移了，取得国内和平以便腾出手来在国外争斗的要求产生了。政治反动停止了，这也起着安抚作用，而在这以前施用过社会改良的粪尿的土壤愈肥沃，人们头脑中由于这种安抚作用而产生的幻想就愈丰富。^①最近几年的工业高涨也对促进这种幻想起了一份作用。

不言而喻，这一切因素不能改变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性质，但是它们完全足以使一些议员、律师和记者的头脑中产生作为机会主义特征的那种思想混乱。资产阶级记者的空虚头脑为这一切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共鸣板。

但是也已经能够充分明显地看出一种发展的征兆了，这种发展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新的社会革命的集中化。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酝酿着一次商业重心的转移。全世界都看到英国的商业实力如何受到威胁。这不可能不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政策产生影响。英国的工业自由主义自从谷物法废除以来经历了辉煌的发展，它甚至能做到把工人驾在它的凯旋车上。但是英国的商业霸权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英国资本在商品市场和殖民地市场上受到严重的排挤，它的出口和它的工业早就不再能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并驾齐驱了，怎么办？“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

^① 我要冒昧地提到，早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我认为在论证我们党内的社会革命策略时把政府的暴力政策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了，因此发表了如下的意见：“政府的这种野蛮行动并不是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发生的。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就是一种策略。而在德国，人们也认识到不能用苦役监禁手段来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认识到在这一方面需要对付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这样的时刻，海涅的观点是危险的。发展将导致人们尝试同社会民主党实行议会内的和解，到那时，海涅现在羞于说出的思想就会付诸实践了。”从那时以来，政府走上了实行这种议会和解的道路，尽管它决不是急于朝这一方向前进，但是海涅的妥协政策毕竟更加临近实现了。——帕尔乌斯注

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①对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5年提出的这一问题，现在是在血流成河的情况下回答的：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是英国资本为了保证自己还能在一个时期内掌握海上贸易霸权而采取的最后的绝望步骤。这一尝试失败了，对此已不再有疑问。不管南非战争形式上怎样结束，它都不会为创立不列颠世界帝国主义提供所期待的基础，它却开创了英国世界霸权开始衰退的时代。战争之后将随之来到一个可怕的经济和政治的清算，不管是立刻发生还是先有一场创业的狂热都是一样。

在这期间沙皇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英国的亚洲势力范围周围画了半个铁圈，从北京直到波斯湾，拥有许多据点。在这期间德国和美国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对英国工业施加了压力。自从恩格斯写了那几句话以来，英国自由主义这个工业资本的政治代表继续削弱下去。它发生了分裂并且继续分裂下去。它不敢为政府的政策承担全部责任，又不敢从原则上反对这一政策。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命运也落到了英国自由主义身上，这就是政治上的混乱。这就使英国工人不再受到束缚，并且必然促使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党。不列颠国家愈是感到不得不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世界市场上的形势愈危急，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就愈有希望。“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②（弗·恩格斯）

大陆上的工业家对正在酝酿中的英国的衰落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分享英国的遗产。特别是德国资本自认为是英国商业霸权的命定继承人。一场空！这场斗争比两个工业国之间的斗争普遍得多。这里涉及的是整个整个大陆之间的斗争。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0页。——编者注

工业的未来属于美洲和俄国。这些国家同旧的欧洲相比有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而且还具有幅员广阔、工业从一开始发展就有巨大的规模、政治上统一等等优越性。这一竞争既威胁英国,同样也威胁德国和法国。只有地中海各国由于距离正在太平洋形成的新的世界市场中心较近,由于水力资源丰富(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利用水力发电是起巨大作用的),能与美国和俄国的竞争相匹敌。德国徒劳地把它的军事实力投入天平,它由此并不能缩小它同世界市场的距离,也不能增大欧洲的工业能力。德国帝国主义迄今主要是为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效劳。只要党的政策还不是必须由机会主义来决定,这种情况就还将继续下去。

受到历史传统附身之苦的、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欧洲除了面临着工业方面的冲突之外,还面临着政治冲突。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刻,那时形形色色领域的发展都已成熟,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此一切都共同促成一个伟大的变革。例如在1848年的革命斗争中,自由思想同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和匈牙利独立的思想混合在一起。现在我们也处在一个普遍骚动的时期。东方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奥地利的民族纠纷使国家机器陷于瘫痪。谁只要不是从一开始就深信奥地利国家将永世长存,他对于我们最近几年目睹的瓦解凶兆就不会毫不犹豫地置之不理。欧洲的政治体系是,在这里使一些民族四分五裂,在那里又把它们捆在一起,这一体系现在又同建立大的民族联盟的历史趋势相矛盾了。而对着美国和俄国形成了强大经济复合体的情况,西欧的小国分裂主义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或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建立统一的欧洲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日益迫切的要求。但是统一的欧洲只能设想为一个民主的欧洲。当这一过程在西欧进行的时候,沙皇俄国愈来愈不能被除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释放出来的力量,年轻的无产阶级大胆地抬起头来,不管鞭子和流放而日益紧密地把队伍团结起来,以日益密集的队形包围着沙

皇统治。

大家看到，不需要先想到社会革命就可以同意这样的看法：欧洲的政治发展决不会是一帆风顺和平静无事地进行的。我也相信，有一些人将会不知所措，他们在纸上如此轻易地、如此悄悄地把资本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人们怎样把哈布斯堡皇室和萨瓦皇室以及一大批受上帝保佑的政治集团毫无痛苦地合并起来并且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这毕竟是历史价值较小的历史任务。但是，不管欧洲的政治发展将在多大程度上疾风暴雨式地进行，根据前几世纪积累的经验来看，它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集中化将产生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断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代议制集会创立了一些组织，它们的巨大规模不仅使无产阶级从前的建立组织的一切尝试大为逊色，而且在欧洲的全部议会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也就更加容易了。与此同时，一些时候以来，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剥夺过程加速了，它排斥资本主义的中等企业，创立了巨大的混合体即大卡特尔，它们以巨大的规模使生产集中化，也以同样的规模使工人的阶级斗争集中化，并且把所有制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问题：一家资本主义联合的垄断还是集体主义！与此同时，由于电力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活动中又发生着一次根本的变革。

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所谓“舆论”的发展快得多；它同在报刊上和议会中决定调子的思想相比总是大大领先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刚刚用他们的可怜的学说和小小的愿望表为平静的、缓慢的、温和的资本主义发展作好准备，这一发展却奔腾澎湃、突飞猛进起来，而且简直象是特地为了欺骗它的好心的朋友们才这样做的。这种总是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在后面拖着走的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一直达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之内。如果人们打算根据工人政党内部广泛流行的日常见解来判断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当然有时会很不高兴的。不过工人运动的社

会革命性质的根据在于事实，而不是在于当时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性质所抱的看法。党内总是会有某些倒霉的家伙，社会革命的认识多半是从外面接近他们的，并且表现为文字上或政治上的鞭子，他们挨了这些鞭子。如果人们从这一观点来看发展，那就会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几年也提供了相当大量的社会革命认识。因为随时随地，只要机会主义一发作，立刻就会有社会革命的认识随之而来。社会革命的认识亦步亦趋地跟踪着机会主义，常常把它从最黑暗的隐藏之处揪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给我们的历史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认识无产阶级政策中的错误和缺陷的根源和后果。这样，我们预防失望，帮助排除干扰，竭力使积累起来的社会革命能量长期保持，不致散失，直到在形势的压力下发生无产阶级的新的社会革命集中化为止。

但是机会主义本身根本不能耐心等待不断前进的发展把它排除，而是要竭尽全身的力量使自己在这一方面就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荒谬的。本文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在这一方面从理论上给它稍加帮助。

让我们看一下，机会主义在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它有了什么成就，什么样的期待和希望是它有权利提出的。然后我们再来作出结论！

二、机会主义和教条

自从机会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活动以来，它就不断抱怨被人误解。福尔马尔在1891年作的黄金国大厅演说^①被人误解了，他在1892年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论述被人误解了，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同意预算的行动被人误解了，南德意志土地

^① 指他于1891年7月1日和6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所作的两次演说，演说的题目是《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编者注

纲领草案中关于农民“自主经济”的观点被人误解了，席佩耳在汉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军国主义的观点被人误解了，海涅的妥协政策被人误解了，最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起初被鄙人误解，然后又理所当然地被一切反对他的人误解，甚至伯恩施坦的最亲密的朋友、与他有二十年思想交往的考茨基也误解了他！机会主义可以被人误解，这种本领是它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有一些政治家，他们不管怎么想受人误解也从来没有做到，不如说他们讲得太露骨了，在个别情况下作出结论时把话说得太绝了，因而自食其果，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由于大胆而坦白地追求真理和明确性而产生的矛盾毕竟要比精神上的适应能力更受人尊敬。后者总是把两种真理各取一半挂在嘴上，这两个半个凑不成一整个，因为它们不是一回事；但是矛盾是人们眼中的刺，而折中则到处讨人喜欢。

所谓被人误解是机会主义的本质造成的。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首先是自己误解自己。它需要别人助一臂之力才能把自己的行动干到底，它需要比较长期的发展才能认识自己。它在第一次出现时，只是一种色调，一种色彩，一块油斑。尽管它成长得如此之快，但它从来没有成为一种体系，一种学说，甚至哪怕只是一个原理，它始终是不成形的，胶质状的。因此它内心深处最反感的就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即一种“学说”、一种“教条”。但同时，如果它受到攻击的话，那么它完全不必费多大劲就可以表示信仰一种教条。

因此，用一项决议来抓住机会主义也还总是不可能的。当倍倍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提出他的决议案时，党代表大会确信，按照福尔马尔的全部观点来说，他一定会建议作某些修改或补充，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痛痛快快地站到决议的立场上了。的确，他在结束语中声明，他根本不想改变党的策略，他希望策略就象现在这个样子。因此现在连伯恩施坦也在所有的决议上签了字。他愤怒地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科

学活动和政治活动,同时又声明,他是站在这两个人的思想和活动的立场上的。虽然在他和党的全部政策与历史传统之间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一条鸿沟,但他顽固地重复说,党是与他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当然通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必须放弃用一个公式来表达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不适于用公式来表示,正如流沙不适于雕刻一样。批评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机会主义的根源,从它的发展,从它的杂乱无章状态来阐述它。

我发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所有的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其根源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没有能力把党的当前工作同党的社会革命目标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在他们眼里,一边是“最终目的”,一边是“当前工作”,二者是互相割裂的。他们至多只懂得,社会革命的鼓动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活动是并行不悖的。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当前工作,尽管是多种多样的,尽管是“建设性的”,实践性的,却仍旧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社会革命的工作,而且是就这个词原来的真正的意义来说的,按照这种意义,社会革命只能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相反,对他们来说,那种放弃当前工作的纯粹革命主义却是很清楚的,他们理解这种革命主义。所以,福尔马尔在1891年把“青年派”说成是彻底性的模范。他把青年派的观点描绘如下:“在目前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下根本不能作任何改善。……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参加任何政治实践,只要提出抗议并且等待权力唾手可得的那一时刻到来就行了,那时我们就会一举而获得一切。这个时刻就要来到;能否使它加快来到,唯一就看我们的努力了。”福尔马尔补充说:“毫无疑问,这个观点是清楚的,完整的。”

与此相反,福尔马尔认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观点是最不彻底的。他在《慕尼黑邮报》的同一篇文章(《论乐观

主义》，转载于《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这一小册子，M.恩斯特出版社出版）中写道：“如果有人往往突然发表声明，把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工作说得简直毫无价值，那么，这是与我们关于逐渐长入新社会的整个观点相矛盾的。……最近在柏林，一位杰出的党员在一次经过认真思考的纲领性的演讲中说：‘统治阶级的国家所允许的东西决不会超出一些极不重要的让步。’一位‘青年派’成员完全可以说这样的话来论证自己的放弃政治实践而进行纯‘原则性’‘鼓动的要求’。实际上，既然我们除了‘不重要的’成果之外‘决’不能指望从这一工作获得更多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十分之九的活动都用在上面呢？”可以看出，福尔马尔不懂得，恰恰是在统治者由于其阶级利益或者哪怕只是由于其阶级利己主义而阻止通过立法实现我们提出的要求时，议会的日常工作 and 政治实践才保留着社会革命的鼓动价值。后来爱尔福特决议所着重论述的正是这一点。当然，这并不妨碍福尔马尔同意这个决议。

对于不懂得把社会革命的斗争与政治的或议会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的人来说，他在实践中时而会认为当前工作妨碍社会革命的鼓动，时而会认为社会革命的鼓动妨碍当前工作。因此，他将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纯粹的革命主义就是纯粹的改良主义！大家肯定知道，为什么在机会主义者的考虑里社会革命的时刻如此重要。如果社会革命近在眼前，他们就能摆脱这种困难的二重境地，他们就认为自己不必为社会改革的可能性伤脑筋了，于是他们就会献身于一种超革命主义。倍倍尔曾经期待在最近会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福尔马尔针对这一点说：“如果我能够同意上述观点，那么对于宣传的任何考虑都不能推动我去进一步完成日常的政治工作。”当然正确的办法也许恰恰是把即将到来的革命略为推迟，不过这是顺便说说而已。无产阶级能否在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或者五十年之内夺得政权并结束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

化意义的问题，但是社会革命的政策并不取决于社会革命的日期，它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而这种发展，不论进行得迅速还是缓慢，都会使工人阶级处于同资本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中。人们感到惊奇的是，福尔马尔这个起初宁可按照自己的极端革命主义而打破常规的人现在竟变得如此温和。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恰恰表现出一种奇特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后来也在1891年的“青年派”身上保持下来了。凡是还在坚持政治活动的“青年派”统统都象福尔马尔那样脱毛了。凡是仅仅因为指望革命明天就会爆发才成为革命者的人，如果革命由于事态的进展而延迟到周末，他就会在后天变成改良主义者，这是显而易见的。“青年派”的革命主义恰恰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愿望，这种革命主义缺乏对社会革命发展的坚定认识，它同他们现在的机会主义一样空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社会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一刻也没有发生过动摇，相反，他们的信心越来越高，这是因为他们有历史的洞察力，而别人则缺乏这一点；奥古斯特·倍倍尔也没有因为直到1898年还未出现重大的政治变革就发生丝毫改变。关键不是在于重大的历史日期，而是在于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刻首先不是取决于我们的预见，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福尔马尔指责倍倍尔不彻底，因为倍倍尔没有把他的革命主义夸大成每一项“日常工作”的总任务，但是福尔马尔自己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贯彻到底。因为，如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常工作”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对立，那么人们为了使自己不受干扰地献身于“日常工作”，就得放弃社会革命的观点。但是福尔马尔没有这样做，而是宣称，他要在进行日常工作“注视着”最终目的。伯恩施坦在说出他的名言“最终目的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①时已经进了一步。

^① 参见《伯恩施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40页。——编者注

但是这恰恰表明了机会主义的特征：它不敢解决它所陷入的矛盾。如果机会主义者把他的社会改良的主张贯彻到底，他也不再是机会主义者了，那时他就成为社会改良家了，那时这种情形就很清楚了：我们会象克服纯粹革命主义那样快地克服纯粹改良主义。我们以后将看到，机会主义发展的归宿也将是它被改良主义所吸收。但是只要还没有出现这一最后的结局，机会主义就要掩盖自己的发展。于是产生了逐渐长入社会主义、不受觉察地扼杀资本主义等等理论，这些理论最后都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把社会革命偷换成社会改良。这些理论相信，只要它们变换了名称，就改变了事物。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它们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同它们的出发点发生愈来愈明显的矛盾：它们嘲笑革命主义，先宣称社会主义是自由的科学，然后，它们以科学的名义诉诸人类知识的相对性，最后，它们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与信仰有关的事情，成为一个与性格有关的问题——于是，早在资本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之前，我们的那些一度认为无论怎样革命都不为过分的社会主义者已经转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他们不受觉察地扼杀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历史。

机会主义者不去解决他自身所处的矛盾，而是把这个矛盾转嫁给整个党。他以为，如果我们与他斗争，我们就把社会革命的未来理想同当前的工作对立起来。但是在我们看来，根本不能用这种表述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社会革命的宣传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当前的工作，反而会促进当前的工作。问题在于当前工作（机会主义者把社会革命的宣传从其中去掉了）本身。问题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应当只限于取得直接的议会的和工会的成果呢，还是我们能把这种日常工作本身当作手段，来达到更高的统一即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组织。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当选举，是否应当争取议会成就，是否应当拥护社会改良和民主法律，是否应当组织工资斗争和其他工会斗

争——而是在于，是尽管做了这些工作仍旧让政权留在资产阶级手里，还是应当通过这一切活动在社会革命的宣传活动中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当机会主义者谴责我们放弃或者轻视当前的工作时，他们并不是在反对我们，而是在反对一个虚构的敌人。福尔马尔是这样，他把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等人的社会革命观点歪曲成“青年派”的制造革命的观点。爱德·伯恩施坦是这样，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布朗基主义，这种布朗基主义是地地道道的盲动主义，它无论在德国或是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它是伯恩施坦为了进行论战特意编造出来的。让·饶勒斯是这样，他反对不妥协主义，而不妥协主义在法国也早就不时兴了，他不考虑已经教育法国无产阶级去进行社会革命日常工作的那些党的实践活动，反而认为一方面从事当前工作、另一方面又不放弃社会革命原则是矛盾的。福尔马尔于1891年自以为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那里发现的也正是这种矛盾。

一个人如果通过一面棱形镜来观察世界，那么当他看到世界呈现出五光十色、绚丽多采的面貌时，他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命运。它自身包含着矛盾，它所反对的只是它自己的颠倒过来的映象。机会主义在不妥协的革命主义身上映出了自己，正如不妥协主义在机会主义身上映出了自己一样。

五、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科学的认识不会停止，经济理论必须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加以修改，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谁也不去争论这些问题。由于机会主义思想空虚，所以它才会大谈特谈什么它不愿服从教条，它有权利提出它自己的观点，它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它有

批评的权利、有修正的权利等等。谁要是真正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他就会把它说出来，而不必提出许多问题，他首先关心的将是把这一新事物考虑成熟，把它和旧事物之间的区别清楚而准确地讲出来。但是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不敢承认这种不可避免地要说清楚的区别，如果它遭受攻击，它就躲到它所反对的那个学说背后去了。它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讲话，它唱起了老调子，并且声称，它的痛苦的呻吟就是从前的活泼的笛声。人们没有反对它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而是反对它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其全部思想和活动所奠定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偷换成它自己的观点的权利。革命的社会主义也许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请人们给我们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人们向我们说：全世界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他们不是过早地去世的话，他们就会从伯恩斯坦的嘴里才第一次听到自己想要什么，——那么我们就需要根据科学的和政治的文献反驳这一点，并且把它嘲笑一番。我们所需要的首先是明确性。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想在文字上制造混乱，以便掩盖自己的思想结论的企图，反对一切打算使真理模糊，而不是阐明真理的做法。

整整四年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战役无非是追求明确性。是向左还是向右：我们是应当坚持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还是应当成为一个社会改良的党——一点不能含糊，不要上演任何政治假面剧，不要任何自我欺骗！但是伯恩斯坦恰恰再也不可能清楚明确地表示态度了，要他注视事物而不转移着眼点，他一刻也办不到，他已丧失了这种能力。他把自己当作轴心，围绕着它跳一场疯狂的旋转舞，跳得天旋地转，眼花缭乱！如果有人要求他把自己的观点的结论说出来，他就会感到非常讨厌，甚至感到受了侮辱。这位党的改革者，这位想向国际无产阶级指出新道路的社会主义先驱者竟十分可怜地说，他公开他的观

点是因为上了别人的当。谁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可笑的情形！^①伯恩施坦认为，当他的朋友考茨基建议他写一本书概括说明自己的观点时，考茨基对他的态度是十分卑劣的。多么阴险啊！考茨基当然知道，让伯恩施坦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修正主义就会使伯恩施坦遗臭万年。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一个很有趣的特征是：一方面，伯恩施坦越是进行“修正”，话就说得越多；另一方面，他又常常感到，如果他完全沉默，那就更好一些。他感到自己象是奥维德笔下的乌鸦，由于饶舌，宙斯把它的羽毛换了颜色。他渴望回到他那洁白无疵的过去，却又禁不住要唠叨不休。

想当年羽毛胜雪，发出闪闪银光，
乌鸦蔑视那毫无瑕疵的鸽子，自逞光芒，
不要说那守卫罗马神殿的警惕的鹅，
就连水波上荡漾的天鹅也比它不上。
舌头是它的祸根，
饶舌招来灾殃，
突然一片漆黑，涂没了羽毛的光亮。

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也是以批评者的身份、以修正主义者的身份登场的。大家不妨看一看，他们是多么鲜明地努力把他们的观点从一团混乱的传统观点中区别出来，他们是多么果断而明确地划清新与旧之间的界限，一直到形式，一直到名称——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以区别于当时那种社会主义的大杂烩。

^① 伯恩施坦在这里歪曲了事实。就他的观点进行的讨论在他的《前提》出版之前就已经热烈展开，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它了。党内各方人士都强烈要求把事情弄清楚。我要求没有参加讨论的考茨基自己公开说明他的观点。他要就是出来反对伯恩施坦，要就是宣布支持伯恩施坦，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伯恩施坦出版一本概括论述的著作，实际上是给伯恩施坦提供弥补往事的最后的可能性。——帕尔乌斯注

因为他们有一个政治纲领、一种社会学说需要提出来使它发挥作用。一直到现在，任何在科学和政治上有一种创见需要为之斗争的人还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特征恰恰是，它没有显示出一点自己的思想，它不能提出任何新的事实。它背叛了旧的信念，但没有获得新的信念。它用社会改良的论据来反对社会革命的原理，但是它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认为，阶级分化进行得不象社会主义所假定的那么迅速，中产阶级妨碍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贪恋自己的小财产，工业小企业为数仍旧很多，企业集中缓慢下来了，资本家作为经营者起着重大作用；商业危机并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为基础的，而是由欺诈造成的，无论如何，危机一定会向资本主义的商业组织、卡特尔等等让步；他谈到资本主义的文化进步和工人状况的改善，谈到博爱观点、舆论和民主制的影响，谈到缓慢的进步或者说历史中没有任何飞跃，谈到工人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通过占有小额股份或一个小小的储蓄银行存折而转变成资本家，谈到经济改造在政权没有自觉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自发地把资本主义缓慢而确实地变成另一种社会制度——在伯恩斯坦这些观点凑成的大杂烩中，究竟有哪一句话不是在他以前就已经口头上和文字上被人重复过千百次，有哪一个思想不是至少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呢？这一切我们早就知道了，早就以充分的理由加以反驳，指出它们是极端的夸张，彻底的错误，或者是对事实的歪曲。

伯恩斯坦收集来证明他的修正主义的事实材料是十分贫乏的，而且不加任何批判，任何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家都会觉得用这种材料去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很丢脸的。我这次不想驳斥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它早就被驳斥过了——，而是想谈谈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性质，所以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伯恩斯坦对德国职业和行业统计的论述甚至被从事这种统计的

官方人员斥责为谎言。

使伯恩施坦大为惊讶的是，小企业虽然普遍衰落，但个别行业的小企业却反而有了发展。伯恩施坦由此看出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让我们听一听官方的统计是怎么说的吧！“上述行业中个人企业的发展基础是不同的。在一些行业，如园艺、畜牧、煤气和自来水安装和理发业等等中，可以认为这一发展是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标志，在另一些行业中，这一发展是大小企业之间的竞争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从根本上说意味着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的失败，也就是说，手工业者被迫退回到原始的经营形式中去，在这种形式中，它们一部分成为纯粹的家庭手工业者，另一部分陷于对商店和其他大企业的依赖。”官方统计以鞋匠、钟表匠、印刷匠、烟草工人等为例说明这种衰退。“与此相反，个人企业在各种商品贸易、在缝纫和装炉工等行业中增多的原因主要是统计形式方面的。”它指出，由于1895年改变了计算方式，这就一定会使这方面的数字显得更大。“个人企业的衰退也许不是仅仅表现在各种纺织业、粗木器制造业、乳酪业和洗衣业等行业中（在这些行业中，大企业的最重要的同盟者是先进技术），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商业部类的各种行业以及运输业中（在这些行业中，大企业只具有组织方面的优越性）”等等。在比较企业的大小时，官方统计着重指出，仅仅有全体就职人员的统计数字还不足为准。“大企业的经济比重实际上还要大些，因为一方面，在这里起特别重要作用的不仅是人的劳动力，还有机械的劳动力（如发动机、机器）。另一方面，一部分大企业是被分成各个部分，作为小企业和中等企业来统计的。”很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统计关于各行业向大企业发展的能力的阐述。“在这一方面，如果人们根据统计设想每一个行业中的大企业所达到的最高规模，就可以找到线索了。”首先收集的是经营规模的极限最低的那些企业，结果是：“令人注意的是，举出的行业种类大部分是很不重要的，

特别是，在老的大手工行业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这一种类。真正说来，只有理发匠、理发师、烟囱清扫工人和小提琴制造工人属于这一类；而且几乎也只有在这些行业中大企业在技术上根本不能作出任何进步，组织上能作出的进步也很有限。”此外还专门对“今天还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的那些行业种类作一番概括的描述。结果是：“在上述这类行业中，有四种行业已经显示出向大型企业的发展，这就是：园艺业、制车业、制绳业和制皮业。……砖瓦业、制帽业和瓦工发展到大型企业（有五〇一名到一千名职工）。……发展成（具有二〇一名到五百名职工的）大工厂的首先是制鞋业和细木器业等重要的手工业……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陶器业、磨坊业、糖果业、被誉为‘现代手工业’的煤气和自来水安装业以及制桶业、制带业、铺石工人和鞍匠。”然后，在与1882年相比较的基础上说，“因此只可以说园艺业的发展是日益离开大企业的……另外，动物饲养业和渔业、旅馆和饮食店大多数还保持小企业的性质，其他一切门类或多或少都努力迅速地向大企业发展”。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官方编辑者自己说明由于把联合企业分解成各种专门企业，统计数字就变得对小企业有利，而对大企业不利。仅仅由于这一点，雇用一百人以上的企业少算的工人就超过了十六万。但是有些资本主义的组织并不限于一个地方，而是通过分支机构、附属企业和辅助企业遍布全国，甚至超出国界；对于这样的资本主义组织，官方统计是掌握不了的。例如德意志银行分成十二个独立企业，克虏伯工厂也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企业，如此等等。由于充分了解这种重大的缺陷，官方统计力图至少通过专题叙述一些典型的巨型企业来补充不精确的数字。对于伯恩施坦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伯恩施坦非常重视目前的阶级结构状况。不管发展趋势怎样，独立经营者的巨大数字表明，目前情况对于举行社会革命还是很不成熟的。与此相反，官方统计对这种“独立经营者”所

作的评论是有趣的。“毫无疑问,广大的独立经营者阶层内部的社会差别并不比广大的非独立经营者阶层内部的社会差别少些,而且肯定与它同样重要;小块土地所有者(他所耕种的几乎还不够自己和家庭的需要)虽然同大土地所有者一样是独立的,独立工匠虽然同一家雇用一千名工人的工厂的所有者一样是独立的,小商贩虽然象同每年能销售价值百万的货物的批发商人一样是独立的,但是这里的社会(阶级^①)差别并不比独立经营者与非独立经营者之间的差别小。”特别是在谈到工业中的独立经营者时这样说:“在一百万名以上的独立工匠中,成衣洗涤业和建筑业的独立经营者占了一大半;他们通常根本没有自己的经营资本,往往连必要的厂房都没有。独立劳动的建筑业经营者,特别是大量的瓦工和木工,大部分实际上是计件雇佣工人和计时雇佣工人,他们被雇来从事辅助劳动,往往只是在没有机会为一个师傅工作的时候才扮演独立经营者的角色。成衣洗涤业的独立劳动的独立经营者的工作大部分也是在顾客家里做的,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裁缝和鞋匠,虽然还不能列入家庭工业,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工人(定居帮工)或‘接受定钱的’手工业者。属于独立经营者最下层的四万三千纺织工业独立经营者也差不多处于同样的处境。其余的独立劳动的独立经营者——约三十万人——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值得一提的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因此这些独立经营者的大多数只是由于“形式主义的统计”才成为独立经营者的!

最后官方统计企图用数字表示出居民的“社会阶层”。它分别考查了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情况,而且在这样做时已最大限度地摆脱社会革命原则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偏见的影响。得出的结果如下:

^① 原文也是如此。——帕尔乌斯注

帝国居民的社会阶层：①

	一般	工业中
(a) 独立经营者中的有产阶级	0.74%	0.83%
(b) 独立经营者中的中等阶级	31.32%	14.58%
(c) 独立经营者中的没有资财的阶级	14.63%	16.04%
非独立经营者阶层 (雇佣工人)	53.31%	68.55%

由此可见，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官方统计证明，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单是雇佣工人阶级就占人口的大多数，如果再加上独立经营者中的没有资产的阶级（这一阶级不仅由于贫苦，而且往往由于自己的整个经济地位而与雇佣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仅仅由于形式主义的统计才使这两个阶级看起来似乎是分开的），就超过了三分之二，特别是在工业中，无产阶级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独立经营者中间的贫苦阶级，就超过五分之四，几乎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当伯恩施坦起初在《新时代》上提出他的统计表时，还没有官方编制的1895年职业和行业统计。但在当时，我已经在《萨克森工人报》上指出上面刚刚谈到的一切后来被官方统计强调的因素，用它们来谴责伯恩施坦。他甚至不敢尝试驳斥我对他的事实所进行的批评。他声称，他感觉我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因此他不回答我。显然，他也感觉受到官方统计的人身侮辱，因为他在《前提》一书以及在他以后所发表的一切文章中一贯对官方统计置之不理。

不是事实促使伯恩施坦改变他的观点，而是他的观点的改变促使他把事实看成另外的样子。因此人们根本不再能与他取得相互了解。无论事实如何彰明较著，无论统计讲得多么明确，他总是理解成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根本不加理睬。他眼看到德国的官方出版物却不理解，正如他眼看到正是在展开伯恩施坦问

① 一方面不包括在国营铁路及其他国营交通设施以及森林业中就业的职工，另一方面不包括公务员，各种自由职业和食利者。——帕尔乌斯注

题讨论的这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城市发展和资本集中,却不能理解一样,也正如他面对着当前的商业危机却不能理解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依据的1895年的数字在1899年他的《前提》出版时已经是彻头彻尾陈旧的了,何况他也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数字。现在,这些数字落后于现实的程度,比1882年工业调查落后于1895年工业调查的程度差不了多少。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尤其是工业的蓬勃发展,甚至已经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家哑口无言,或者改变了他们的思路。中等阶级被遗忘了,甚至,农民也被遗忘了,大家都向工厂无产阶级这个人数最多和迅速增长的社会阶级递送秋波。只有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重复他的社会结构缓慢改变、无产阶级不成熟等等警句。

伯恩施坦思想的转变是人的心理学上有趣的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还缺少很重要的论据。缺少伯恩施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那几年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从伯恩施坦自己零星发表的、并且作了许多删节的几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遇到比较重要的事件总乐意向伦敦请教,而恩格斯在回答他时写了整篇整篇的历史的、哲学的和党的政策的论文,从恩格斯谨严的重视科学良心的态度来说,也根本不能料想他会采取另一种做法。通信非常频繁,信件数目一定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善于多么卓越地用寥寥数语就描绘出一种形势和一整个发展过程的特征,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他的一些短文中包含了几乎是取之不尽的丰富的启发性意见,因此人们可以想象得出,在那些信里一定包含着许多知识和非常丰富的思想,年老的社会主义大师是用这些知识和思想来教育《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年轻编辑的。只有把这些信按照时间顺序,毫无遗漏和不加删节地发表出来,人们才能判断,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哪些是伯恩施坦自己的,哪些是

通过伯恩施坦在这个报上发表的，伯恩施坦一般来说是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自己独特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念，遵循自己努力获得的对形势的认识，还是遵循一位在思想上和科学上更为优越的人现成的指示。

在伯恩施坦还把自己限制在接受过来的学说的范围内的時候，他所写的文章的特点是意味深长，分析透彻，但是论证不严密，而且好几种思路平行发展，主次不分。他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发生怀疑和动摇。他的文章越来越使人不满意。人们饶有兴味地去读他的文章，但是读完之后，不知如何是好。几点有趣的想法，几句言过其实的话，几条限制——但是这一切究竟要说明什么，那是不清楚的。他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事情可以是这样，可以是那样，还可以是另外的样子——这就是一切。然后他又对可能性作了限制，在他面前，每个问题、每个题目都开始出现障碍。起初，当他的观点是确定的时候，他的各种平行的思路有一个统一的焦点，他的观点越不稳定，他的各个结论就越是互不相干。他有这样的本领，能够把性质不相同的事物统一起来，把最简单的事物分割和分解开来。他在开始的时候，认为每件事情有一千种可能性，却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而在结束的时候，又认为每件事情有一千种不可能性，却没有任何出路。

伯恩施坦相信，通过他的社会改良的论证，他已经超过了科学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还落在它的后面。这就是最主要之点。他把我们早已解决的事情当作新的论据拿来款待我们。但是不管我们多么愿意修正我们的原理，检查它是否符合前进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用新的科学基础来代替我党的多少年来已被风雨剥蚀的基础，但是我们毕竟不能总是把时间消耗在早已解决的事情上。对于我党的原理的修正只能向左，不能向右，只能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获得的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行，而不能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抛弃的社会改良的空想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它的目的只能是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

而不是限制它的政治活动，只能是激励社会革命的锐气，而不是使它麻痹，只能是更加大胆地追求和向望，而不是胆怯地退缩。

伯恩斯坦只是依靠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过去的编辑所享有的威信，依靠他在党内的个人联系，才敢于在党内传播他的修正主义，只是依靠这些他才能够党内维持了好几年。换了任何一个别人就会遭到嘲笑，人们就会随着奥艾尔一同向他指出，他“根本不懂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如果《前提》是匿名发表的，并且碰到伯恩斯坦写书评，那么他很可能出于误解而自己把它批得体无完肤。实际上，他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批评它了。他曾经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武器——批判过这些思想，却又把这些思想放在一起当作他对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而公诸于世。在他丧失了指导他的观点以后，一些事物和论证在他自己看来确实不一样了，正象外部世界在烛光下显得与在阳光下不同。但是别人是怎么会上当的呢？人们对自己说，“爱德”根本不可能只是重复他本人已经驳倒的观点，他多少年来维护党的原理，现在根本不可能自己也上社会改良主义的当，这里一定隐藏着别的什么思想，人们必须懂得正确地读他的书，——他们对那些无礼的人的“无限的夸大”感到非常愤怒，对于这些无礼的人来说，伯恩斯坦的名字在批评的天平上是没有分量的。伯恩斯坦的朋友们给他帮忙是不成功的，这是因为他们对他过分宽容，是因为他们用牵强附会的解释方法力图使自己 and 全世界相信，伯恩斯坦所想的与他所说的完全不同。

回顾一下四年来的伯恩斯坦辩论，就可发现，人们与其说是维护伯恩斯坦的观点，远不如说是维护他的人格。没有一个人在表示态度时不是很慎重地对待伯恩斯坦的。为伯恩斯坦辩护实际上就是反对伯恩斯坦的对手们。人们企图通过指责他们夸张和心怀恶意等等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由此可见，人们事实上是承认，如果批评者对伯恩斯坦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

他们的批评就是正确的。最后，人们诉诸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整个争论还在抽象的理论领域进行，群众对于争论就一定是一无所知，因此这种呼吁对于群众就更加能起作用。伯恩斯坦始终不敢从他的新的理论前提中得出最后的实践的结论，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他的实际建议加上但书，几乎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这种不彻底的态度是多余的。党容忍了伯恩斯坦，但从来没有能接受他的新观点。

不过理论还是逐渐澄清了。同时这个问题开始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这一情况虽然是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但恰恰因此，伯恩斯坦和他的朋友们最没有料到。有些人固然能自己欺骗自己，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新变种，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一定会把他看成自己的骨中之骨和肉中之肉。必须承认，社会改良家们在对待伯恩斯坦的态度上表现得很有分寸。这一次，他们是受一种正确的阶级本能支配的。首先他们没有一拥而上。他们对他们的批评者后来以如此明显的方式向他们赔罪感到很高兴，但他们把这种欣喜之情隐藏起来。他们很懂得，如果他们表示欣喜，就会使伯恩斯坦在党面前名誉扫地，会使这一场热闹迅速收场。因此他们让伯恩斯坦表演，而他们自己聚集在后台。但是他们组成合唱团来歌颂他的英雄业绩。他们明显地奉承他，称赞他是讲科学的人，革命主义的勇敢的克服者，新道路的宣布者。伯恩斯坦主义首先必须想方设法在社会民主党内受人欢迎。在社会改良家们相信这一目的已经达到时，他们就开始讨债。他们对这个在政治上利用他们的精神财富的人提出要求。他们先帮助伯恩斯坦扫清道路，现在又跟在他后面前进。凡是伯恩斯坦认为正确的，他们也一定认为是正确的，他们和伯恩斯坦说同样的话，只不过说得更加明确得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站在社会改良立场以外的其他立场，所以他们敢于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到底。伯恩斯坦羞羞答答不敢作出的

结论，诺西希^①先生轻而易举就得出来了。于是党突然发现，在伯恩斯坦背后，有一群资产阶级的谋士、独断专行的世界改良家和其他饶舌者向党逼近，准备把社会民主党引向新的道路上去。同时，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经常话题。销路很广的大做广告的报纸把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平化的消息带到工人群众中去，说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所有的党一样，允许别人同它谈判了，说它不再认真地考虑社会革命了，如此等等。人们在宣传活动中每时每刻都碰到这种情况。于是，迫切需要结束混乱状态并开创一个清新的局面，这种必然性是回避不了的。

人们有时“要求”，有时“期望”伯恩斯坦对资产阶级利用他的修正主义这件事坚决表示态度，至少要反驳那些亦步亦趋地追随他、公开颂扬他、利用他的名字讲话的文字骗子和政治冒险家，在他自己和社会改良者之间划清界限，但这些想法都落空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感到桑巴特这个人在思想上有恩于他，他在思想上和诺西希这个人的联系已经超过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另一方面，如果伯恩斯坦脱离社会民主党，他就失去了任何政治意义，单凭这一点，他就紧紧抓住社会民主党不放。他的任务是用社会改良主义瓦解社会民主党。如果他不再扮演这个角色，资产阶级就会把他扔进废物堆里，因为只有当他能够利用他在工人当中的威望时，资产阶级才需要他。

发表于1901年8—9月。译自《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46期第609—615页；第47期第659—663页；第50期第740—748页。

① 阿尔弗雷德·诺西希（Alfred Nossig 生于1864年）——德籍波兰作家，写有《社会主义的修正》等书。——编者注

奥·倍倍尔致路·考茨基（摘录）

1901年8月29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路易莎夫人：

……

那篇文章我已经写好，我将直接寄给狄茨。他可能把一份校样转给卡尔。文章不长，也不必长。

……

卡尔不应因我文章中反对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崩溃和危机这个论题进行辩论而发生困惑，^①党代表大会是否接受我的看法还是个问题。我认为在党代表大会上对许多问题的讨论离现实太远，我们已厌烦了。当然我也可能是错的。

我注意到了海涅关于《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的言论，并已想提请卡尔注意这一点。我很满意海涅这样说出来^②，这就有机会在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此事了。卡尔应当也就这个问

① 倍倍尔在《致卢卑克党代表大会》一文中说：“象一再希望的那样把‘崩溃和危机’这一论题列入党代表大会议程，这是否适当还是个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延期讨论这一问题恐怕是适宜的，而讨论这一问题，研究它的原因，这首先是党的报刊的任务。”（《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51期第773—774页）。——编者注

② 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1901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与伯恩斯坦的演说《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同名的文章，阐述他对这个演说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没有理由因为这一演说而发出胜利的欢呼，社会民主党也没有理由因为这一演说而感到恐惧。海涅说莱比锡开了一次会讨论这一事件，提出把它提到卢卑克党代表大会上去，但是又对大学生们建议以后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种无用的讨论上。海涅说，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探讨是多余的，而又要拿到党代表大会上去，那才是浪费时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编者注

题作些准备,因为那时无论如何还要讨论伯恩施坦退出^①的问题。

我建议罗莎盯住巴登的事件^②。要是提出一项关于这件事的提案就更好了(瞧瞧党执委会的号召)。此外我还要提醒罗莎应当从《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中撤回她的名字。虽然最近几期没有登撰稿人名单,但间或还是有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奥·倍倍尔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37—138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

1901年9月4日于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帕尔乌斯论述机会主义的文章^③,但是我怀疑它在当前这个时刻是否合适。在因《社会主义月刊》而即将爆发的斗争中,这组文章将再次被利用来证明:不能给一家以这种方式对“党内最有功绩的人物”进行谩骂的刊物写稿。诚然这组文章并不是谩骂,而是客观的批评,即使并不都是正确

① 伯恩施坦1900年5月在《新时代》登了一则声明,全文如下:“在我深信我不可能没有时间参加《新时代》的工作后,我决定解脱编辑部探讨我的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对它说来这是不易明白的)这一不愉快的劳动。我在此声明退出《新时代》。

这一行动当然丝毫不妨碍我仍然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我将一如既往尽我所能地为党努力工作。”——编者注

② 罗莎·卢森堡于1901年4月和9月各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党代表大会和批准预算》和《巴登的预算表决》。——编者注

③ 《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发表于《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46、47、48、50期,见本书第386—412页。——编者注

的。不过反对一切涉及个人的文章而又讨厌帕尔乌斯的那些感情用事的家伙会表示反对,这样,我们的处境就将十分困难。你想象不到党内存在着怎样一种厌恶帕尔乌斯和罗莎的情绪,即使我不同意迎合这种偏见,但完全不加重视也是不行的。

卢卑克代表大会的讨论肯定会提供非常丰富的材料,要是接着这次讨论而提出批评,没有人会对这一点感到吃惊,但在这一时刻它却显得太富于挑拨性了。

文章毕竟已经登出来了,其中对福尔马尔的批评特别精彩,而关于奥艾尔的话并不都中肯。例如,奥艾尔对合作社的态度,就是今天他对合作社也还不很愿意过问。

我劝你,准备材料,武装自己,因为有人也想向你开炮。我对这场斗争感到高兴。

向你衷心问好。

奥·倍·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39页。

在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上 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提案

(1901年9月)

(一)

第52号，柏林第六选区党员同志的提案：

党代表大会反对伯恩施坦同志所采取的那种宣传方式，因为它会使我们的目标完全模糊不清。

(二)

第91号，图林根党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提案：

图林根党代表大会无条件地坚决地拒绝爱德华·伯恩施坦同志的修正意图。

党代表大会特别声明，只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所阐明的以及爱尔福特纲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规定的认识、目标和道路，才能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中解放出来。

基于这一理由，党代表大会也毫不含糊地谴责伯恩施坦同志不顾汉诺威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倍倍尔同志的决议、继续在党内制造混乱和不和的企图。

伯恩施坦同志的修正意图经过全体党员同志和党的各级组织几年来客观的、深入的检验，已经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员同志的坚决拒绝，根据这一情况，图林根党代表大会希望在卢卑克举行的德国党代表大会对于伯恩施坦同志的这一行为发表一项十

分明确的声明。

(三)

第92号：柏林第四选区（东南）党员同志的提案：

柏林第四选区（东南）党员同志表示坚决希望，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将对伯恩施坦同志取消党的爱尔福特纲领所规定的原则的科学基础的最新企图坚决地明确地表示态度，并且将反对伯恩施坦把混乱和不和带到战斗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做法。会议认为，经济和政治情况引起严重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求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力量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反动势力，并且要求一切党员同志服从经过党代表大会详细辩论后确定的原则，在党内以及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修正意图，而不是把它拿到敌人的营垒中去发表，从而给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带来困难和给党造成损失。

(四)

第93号：巴登第二帝国议会选区的党员同志的提案：

巴登第二帝国议会选区的党员同志期待本届党代表大会就所谓“伯恩施坦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并建议拒绝伯恩施坦的政策。

(五)

第108号：海涅的决议案

党代表大会认为科学的自我批评的自由是党在思想上继续发展的前提。大会没有任何理由偏离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

通过的倍倍尔决议案的原则，因此认为第52、91、92和93号提案可以不必讨论。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1年柏林德文版第91、95—96、99页。

奥·倍倍尔
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
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案^①

(1901年9月)

党代表大会无保留地承认自我批评对于我党在思想上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伯恩施坦同志最近一些年来完全片面地从事这种批评，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代表却不加批评，这种做法使他处于一种暧昧地位并引起党内一大部分同志的不满。

党代表大会指望伯恩施坦同志不会无视这一裁决，并且会按照这一裁决采取行动，因此第52、91、92和93号提案不再列入议程。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1年柏林德文版第99页。

① 即第109号提案，1901年9月25日通过。——编者注

在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爱·伯恩施坦（摘录）

（9月23日）

尊敬的同志们！我没有想到今天就会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不能向你们源源本本地说明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举出足够的事实向你们说明，倍倍尔的一切指责都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各个地方的攻击都不是由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挑起的。首先，人们怎么会谈到伯恩施坦自从回国以来的修正意图呢？我回到德国以来进行了什么活动呢？我刚刚读了刊登在最近一期《新时代》上的维克多·阿德勒的文章，其中说到我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开展我的活动，看到这种说法，我就想起我在柏林和柏林郊区以及在外省所作的一系列演讲，邀请我的同志们听了这些演讲不仅没有反对，反而非常感谢。这里有一些来自我作过演讲的地方的见证人在场，他们将证明这一点。因此至多只能考虑到在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作的一次演讲。这个联合会受大学的纪律约束，它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学生联合会，它也不是这样的联合会，它只是想成为那些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学生的一个联合会，我完全可以说，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柏林大学生的精华的一部分，他们愿意进修，愿意从事严肃事情的研究，这些事情正是我们勉励青年去进行研究的。我回国不久，就应邀到该联合会就随便什么题目作一次演讲；这个题目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直接宣传社会主义的题目，它应当是一个科学的题目。我承认，我有一点是弄错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在不公开的场所举行的有五十到一百个大学生参加的小型集会，在那里讨论一个同公众无关的科学问题。在

我听说它是一个公开的集会的时候，我向主席再三声明，我宁愿它是不公开的会议。它却终于成了一个大型的集会。由于一系列的情况，我没有能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详细地拟定我的讲稿，但是我一开始就要声明，我认为绝对没有理由从我说过的话里收回什么东西。至于这篇演说在结构上存在着某些缺陷，我在当天晚上就向《社会主义月刊》的一位编辑承认了，而且我在第二天还对他讲，最使我扫兴的不是对演讲的反应，而是演讲本身没有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可见我决不想把演讲说成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从它的倾向、它的内容和它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这一问题的态度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收回的。我在演讲中也没有谈到修正的意图或者它的必要性，而只是提到社会民主党内部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就象争论所表明的那样）存在着意见分歧这一事实。我仅仅是指出了这一事实，根本没有对这些问题直接表示态度，而只是讨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然后说道：当我们亲眼看见社会主义在实际运动方面不断地前进，当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当工人运动夺取了一批又一批的阵地并且日益清楚地表述它的要求的时候，在它的科学方面却显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它在什么形式上是可能的。在第二部分我从历史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怎样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继续发展了社会主义。我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在它的未来纲领方面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因为它受意志支配，受阶级斗争支配。你们因为我说过所谓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运动对我说来就是一切这句话而对我很不满意。好罢，你们希望把最终目的放在心上，我承认这一最终目的，如果你们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个理想就存在于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实践运动本身之中。在演讲中对于这一点绝对没有加以否认和提出怀疑，不过是说，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

它必须并且应当部分地受意志的支配。如果《星期一世界报》的编辑作了错误的解释,说我批判地取消了社会主义,那么这算什么理由,要因此大惊小怪呢?关于批判地取消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人们不想在演讲中找到它的话,是根本找不到的。……

我再说一遍:对于我的演讲的批评,凡是涉及有关它的形式和结构的,我都已立即承认它们有道理,而关于科学的界限问题则是可以各持己见的。我确实在演讲的结尾说过: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会导致一些错误的假设,因为它会导致教条主义的理解,因为它会导致这样的理解,即似乎社会主义已经有了结论,因此,我宁可用批判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在我以前也已经有其他的人建议过了。我补充说,尽管如此,只要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中的“科学的”这一概念正是按照批判的意义被理解成要求,理解成纲领,理解成社会主义向自己提出的一种要求,它表明科学的方法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愿望说来是一种指示方向的力量,那么这一名称对我来说就保持着它的全部理由。在这种意义上,我完全承认这个名称,而如果它是这样地得到承认的话,就没有什么理由对此大惊小怪了。人们可以对《星期一世界报》加以驳斥,这件事就结束了。我们为之而斗争的实际要求没有一个受到怀疑,这是一个纯粹的方法论的问题。……

……

我说过,我宁可用批判的社会主义的名称,自然是在科学的批判的意义上说的。我已经一度引用过拉布里奥拉同志的话。他也认为批判的共产主义这一用语比“科学的共产主义”一词更正确些。在《新时代》上与我论战的一位作者也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不应当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掌握最终的真理。它是一种谦逊的自我约束的说法,说明我们愿意探讨真理。”这完全是我的观点。

请你们不要以为运动会由于批评而受到损害。运动的力量来自阶级斗争,来自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其中受苦的环境。我们

曾经多次被迫修改纲领中的某个论点，我们却一年一年地成长起来了。我对讨论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请你们回想一下，当恩格斯发表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的信时，有些同志多么愤怒。这一切很快就得到克服，这件事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害，却因此为一场富有成果的讨论打开了大门。请你们不要听到敌人的喊叫就上当，就打算对来自同志们的诚恳批评施加某种限制。请你们想一想宗教改革派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剑的形象。我们说的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说的是《资本论》。请你们坚持自由批评的原则。不要让敌人把你们吓倒。请你们不要通过一项这样的决议，它能够暂时使我个人处于不愉快的境地，但是它首先会使党丧失它天生有权享有的尊严。

沃·海涅（摘录）

（9月23日）

……倍倍尔已经说过，正是我反驳过伯恩斯坦的演讲。我反对他，因为我确实不同意他。我以为伯恩斯坦说的是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是科学。伯恩斯坦纠正了我，指出了他在结束时讲的那句话，说他在其中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①。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我忽略了这半句含混的话。但是，真是不幸，一个如此重要的思想竟隐藏在结尾中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这个思想，请伯恩斯坦不要见怪，同其他内容是矛盾的。你们看，尽管我认为伯恩斯坦在许多点上是正确的，尽管我很尊重他，伯恩斯坦和我并没有彼此保证互相吹捧，也就是在我们掌握的报纸上互相吹捧，说我们是何等杰出的人物，我们最近的著作又是多么出色。不，我们没有结成一个小团体，每个人都拥有无条件的批评权利。公正地说，还应该补充

^① 参见本书第368页。——编者注

一句，伯恩斯坦对科学的理解和通常的理解不同。他认为，只有达到了和说明了在一定情况下可能达到的真理的那种研究，才是科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当代的科学就根本不存在了。科学所采用的无数思想和假设只包含部分真理，必然要由将来去确定其中有多少真理。既然伯恩斯坦这样说了，并且给科学规定了一个与别人所规定的不同的概念，那么他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科学的整个论题也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如果硬说他破坏了我们纲领的基础，那我就要说：不对！他只是宣布，我们的理论从他限定的意义上说不是科学。但是，我们的理论从另一种意义，也就是从彻底地、无偏见地追求真理这种意义上说是科学，他并不否认这一点。在他文章的结尾关于“要求”的那句话，指的也是这种意义。我认为，从我所理解的科学是对于真理的真诚的和细心的追求这一意义上说，它也容许批评。而伯恩斯坦所宣读的考茨基一封信中那些话，完全触及了事情的本质：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自我批评。考茨基声称，他现在的看法仍旧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理论从我所理解的这种意义上说是科学，那么，更加必要对这种科学研究在任何方面都不作任何限制，那么，要求伯恩斯坦停止他的挖掘^①（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不公正的。我也愿意向霍夫曼这样说。人们不应当禁止一个研究者讲话。伯恩斯坦在这里的发言的结尾从极其严肃的道德和科学态度的观点出发对此作了说明，因此我可以不必再详谈了。

伯恩斯坦还阐明了这种科学对于我们的政治实践所担负的责任。我认为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的科学有责任提防我们的实践走上错误的道路并引导它走上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只有完全准确地进行考察，只有用科学方

^① 原文是Unterwühlung，与Untersuchung（研究）一词有一个共同的前缀“unter”。有些人在批判伯恩斯坦时用这个词来讽刺他，说他不是在“研究”而是在“挖掘”，即破坏党的基础。——编者注

法进行研究才能表明，我们是否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教会我们正确估计敌人和我们自己的权力手段。但是，主要的事实（这大概也是伯恩斯坦想说的，并且是促使他写文章的原因）是：虽然科学在这方面担负的责任如此巨大、深刻而又广泛，但效果并不这样大，它的实际影响要小得多。我们固然从科学中得到一些理论武器，但是我们实际上从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更多。我并不属于贬低科学的人。我完全无意使社会民主党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我们就会放弃卡尔·马克思的一大部分遗产。因此我也反对伯恩斯坦建议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但我们也不想过高估计理论的实际价值，而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是过高估计了它的实际价值。我过去也属于信仰科学的人，但是如果说现在这一方面有什么事情使我担心的话，那就是：象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这样两个对党忠诚的严肃的人，虽然在实际问题上看没有任何争论，却多年来在理论上互相争论，这些争论的确可能使党受到损害。这就是理论的危险。

现在谈谈第二点。倍倍尔曾指责伯恩斯坦在这个大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人们关于这件事甚至说，他是到敌人那里去攻击党。我只想说明一点：我出席了这次集会，听了伯恩斯坦的演讲，并且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为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一次宣传，当然它的形式是与地点相适应的。伯恩斯坦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完全正确。没有人感到伯恩斯坦想破坏党。还有人居然援引了民族社会联盟报纸上反对我们的东西！我想说几句话来反对民族社会联盟分子同我们进行辩论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也是受害者之一。在我看来，这些民族社会联盟分子就象是被一个教授从数千个瓶罐和曲颈甌中制造出来的侏儒，因此摩非斯特评论侏儒的那句话：“你身体那么小，却是一个很大的空想家！”^①也适

^① 参见歌德《浮士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部第119页。——编者注

用于他们。民族社会党人想实行的完全是一种空想的政策。它有两个基本点。其中之一是：把皇帝争取过来，然后让皇帝运用他的巨大无比的权力手段推翻现存国家，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熟悉我们德国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空想。但第二点更为重要：他们一心想分裂社会民主党，或者象格腊德纳乌厄尔非常正确地说过的那样，用赞扬来使它产生不和。他们使用地地道道的僧侣般的狡猾手腕：党内有些人享受到被某个人赐给“机会主义者”称号的优待，这个称号具有致命的特性，谁一旦获得了它，就一辈子摆脱不了。如果继续象帕尔乌斯那样干下去，它就会成为党内的一个荣誉称号。谁能被称为机会主义者，民族社会党人就认为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向他宣布：他实际上是属于我们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他完全正确，如此等等，那么他们就能够把他从党内赶出去。有一些同志不同意说人们在近期内就将通过一次大革命、通过政治性大罢工获得政权，然后在三个月中完完整整地建成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他们因此惹得一位大人物大发雷霆，我也是这些同志中的一员。为了不使人发生误会，我想同时说明，我说的“大人物”是指帕尔乌斯先生。民族社会联盟分子对于我也曾这样干过：在我发表讲话的每一次集会上，总是有一个人出席，并且说：海涅实际上是属于我们的。于是，我第一次向冯·格尔拉赫先生个人提出谴责（他是我的一个熟人），我对他说：“我亲爱的格尔拉赫，您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你们的领袖还不够？难道你们没有人？”他说：“是的，但是我们知道，那样一来会有一大部分工人跟过来。”你们看，他一点也不否认。我没有任何理由对此避而不谈，因为我让他把这些告诉我时并没有以严守秘密为条件。几个月之后，毛伦布勒歇尔先生继续实行这一策略。于是我当着参加集会的党员同志的面向他讲了同样的话，并且对他说，我认为这是十分幼稚的，我坚决请求不要这样在我们队伍中散布不和。我对他说过，即使你们真的做到把我从党内赶出去，你们会得到些

什么呢？那时虽然党少了一个人，但它仍旧跟从前一样。这就是我的看法，此后至少毛伦布雷歇尔停止了这种尝试，我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

现在我再谈一谈伯恩施坦提出的问题。我已经说过，我认为，对于伯恩施坦的理论所花费的时间已经超出了绝对必需的限度，我不是说今天，而是说最近几年。伯恩施坦现在提出的新问题所涉及的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关于理论的理论。我确实认为，我们可以拒绝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党员同志们，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在今后许多年内，我反对对纲领作任何修改。我也不知道有谁建议修改纲领。我根本不认为纲领有如此巨大的实际价值。主要的是实际工作。如果把伯恩施坦，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放到实际工作中去，放到一定的问题面前，那时就会表明，我们大家都是一致的。理论使人们互相分离，这是理论的本性，而实际工作的本性则是使人们集合起来，它使说得不一样和想得不一样的人们集合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既然我们不是一个空谈和理论思维的党，而是一个实际行动的党，既然我们面前摆着相当多需要进行实际工作的现实任务，那么就让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去谈论理论（这也是我们德国人的气质），但是我们在辩论中，在处理公共的日常政治斗争的党报上，对待问题应当更多地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应当更多地注意实际工作，那么我们大家就会一致起来。

麦·格龙瓦尔德

（9月24日）

图林根的决议案^①，也许还有其他决议案，不应被看作是建

^① 见本书第416页。——编者注

议，而正是应被看作是决议案，其中主要是论述提案人的理由，只是在图林根决议案的结尾才提出一项建议。自由批评的权利我们当然要保护，这一点用不着伯恩施坦来说。在汉诺威代表大会通过倍倍尔的决议案后，人们本来可以指望伯恩施坦在回国后首先用几年时间熟悉德国的情况，然后如有机会再重新开始他的批评。最使人气愤的是，伯恩施坦不顾汉诺威代表大会的决议而继续他的批评，甚至变本加厉，攻击起党的基本原则来。不仅如此，伯恩施坦到一个敌对的联合会那里去，不是为了客观地解释或捍卫党的原则，而是为了从否定的意义批评党。只有在党的各种联合会里才能这样做。伯恩施坦和格腊德纳乌厄尔把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说成是天真无邪的孩子。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当柏林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大学生运动时，有觉悟的党员同志干脆被赶出了那个联合会。人所共知的社会主义的死敌阿道夫·瓦格纳^①、施穆勒^②等成了联合会的保护人，他们曾同党进行过最激烈的斗争。这个联合会在原则上既不赞成又不反对我们，但是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反对我们的，因为不这样德国的大学就不会容忍它。至于联合会中可能有一些秘密的同志由于处于大学生的地位不能进行活动，这是另一回事。假如伯恩施坦是一个象我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外省人，或者假如他过去没有什么名声，那么，人们可能不会注意到他在那里讲了话。但是一个象伯恩施坦这样的人在那里出现，那就会被看作是历史性的时刻，即使他说的话毫无价值，而《前进报》作为柏林的党报就有无可逃避的义务和责任去把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记录下来，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防御，不如说首先是为了使外省的同志立即能够作出客观的判断。现在格腊德纳乌厄尔说，联合会并

① 阿道夫·瓦格纳 (Adolf Wagner 1835—191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柏林大学教授。——编者注

② 古斯塔夫·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柏林大学教授。——编者注

没有在我们这里登广告,因此用不着重视它。我直接向格腊德纳乌厄尔提一个问题,难道他不知道伯恩施坦将去那里讲话?何况联合会也把关于哪一个讲演人在哪一天发表演说的日程表寄给了《前进报》。象累德堡,梅林,甚至席佩耳(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样的有觉悟的同志都没有被大学允许在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说,可见资产阶级社会和大学对伯恩施坦的看法是怎样的。我现在只想再讲一句话,如果不仅是理论家(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而且实践家也起来说话,这倒是很好的。伯恩施坦抱怨辩论的方式。但是他似乎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而别人则不行。我故意在图林根决议案中,尤其是在我发表于《论坛报》上的文章中,采取了尖锐的形式,为的是促使卢卑克代表大会讨论伯恩施坦问题。我的愿望满足了。但是我也不承认我是过分尖锐了,也许在形式上我有些过火,这是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整个伯恩施坦问题现在可以归结为这一问题:伯恩施坦的行为对党的活动有什么影响?因为从原则上讲,这件事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已经结束了。但是由于伯恩施坦继续对党进行攻击,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有害的后果早在1898年的选举中就已经表现出来,最近在国际政策问题上以及在国内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进一步表现出来了。我们的小鼓动员(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轻视他们的意思)在基层工作,为党把种子撒到最偏僻的地区,当敌人在集会上在他们面前抬出伯恩施坦时,他们往往不知所措。有些一向很能干的同志常常到我这里来抱怨说,他们根据伯恩施坦的论证无法驳倒敌人。这种情况和可能性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新建立统一的鼓动工作原则势在必行了。

卡·考茨基（摘录）

（9月24日）

……现在再也不能说伯恩斯坦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见解了。当他的最初的一些小册子问世时，欢呼之声曾喧嚣一时，说什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认识。而今天伯恩斯坦的信徒们却说：啊，你们不要激动，不值得为这件事花费精力。从这件事中什么也没有得到。你们到底想要伯恩斯坦怎样？我认为，人们对于一次修正运动的结果所作出的判断不可能比这更坏了。伯恩斯坦当然是另一种看法。他向我们指出，他的修正纲领的实际结论在海因费尔德纲领^①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反对声和赞同声。柏林的费舍^②喊道：他说过，他们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我至少是这样理解的。他指出，奥地利同志把贫困化理论从海因费尔德纲领中删去了。那么这个贫困化理论是怎样的呢？这个理论认为，在能够变好之前，必然将愈来愈坏，无产阶级愈来愈贫困，直至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只有到那时，解放的伟大日子才会突然来临。同志们，党内有哪一个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赞成过这种贫困化理论？当然没有。这种贫困化理论早就被驳倒了，而且不是别人，恰恰是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驳斥了它。这个原理只能理解为一种倾向，而不能理解为绝对真理。只能这样来理解：资本必然力图增加自己的剩余价值，使无产阶级的状况愈来愈贫困。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马克思本人还指出存在着相反的作用。他自己就是争取工人保护的先驱者之一，是最早指出工会的重要性的人

① 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海因费尔德代表大会（1888年12月31日—1889年1月1日）所通过的纲领《关于原则的宣言》。——编者注

② 理查·费舍（Richard Fischer 1855—1926）——曾任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国会议员，领导《前进报》出版社。——编者注

之一，那还是在1847年，当时其他社会主义者对此还根本不感兴趣。他指出，这个倾向是绝对必然的，但是它并不是绝对必然地导致工人的贫穷。但是我们和资产阶级改良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这种倾向本身能够得到克服，能够建立一种社会和平，即资本不力求使工人贫穷的这样一种状态。资本是一定要力求做到这一点的，由此产生了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我们夺取资本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手段。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社会和平就不可能重新建立，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坚持贫困增加的理论。如果奥地利同志对这一点在表述上稍微作了一些变动，那么，正如阿德勒已经在《维也纳工人报》上阐述的那样，这不是由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老的见解，而只不过是，纲领恰恰不仅是一种理论的产物，而且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纲领必须简洁，它只能对那些容易产生误解的条目作较详细的论述。究竟是哪些条目，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当1891年制定爱尔福特纲领和1888年制定海因费尔德纲领时，人们还没有预料到伯恩斯坦要出来，当时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不是伯恩斯坦同反对他的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因此当时对于论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的那一条在纲领中谈得比较详细。与此相反，现在则需要驳斥对贫困化理论的错误观念，并对这一条作出更精确的表述。假如现在要求修改爱尔福特纲领，那么我同样要建议把这一条修改得使人不能误解。但是，恰恰是伯恩斯坦把这种误解带进了辩论。现在伯恩斯坦出来说，我们之所以看得较清楚是他的功劳。不，我们总是有一些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反驳他们说，我们关于贫困增加的理论不是日益贫困化的理论。我们必须保持这一理论的明确性，而伯恩斯坦只是增加了我们在完成这一任务时的困难，因为他说，那些不赞成他的人还是自从《共产党宣言》以来就已经被克服的老的陈腐理论的拥护者。因此，你们看，从这整个修正中得出了什么！现在伯恩斯坦说，他的演讲是完全无害的。的确，如果伯恩斯坦

在四、五年前发表这个演讲，那么没有一个人会为它担心。人们也许读了它之后会摇摇头说：唉，伯恩施坦究竟想干什么？现在这个演讲被看作是他论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那本书的结论。人们是从这个角度看待这次演讲的，而且这个演讲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有意义。资产阶级报刊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它的，而我们必须承担后果。不仅是《星期一世界报》，而且是全部资产阶级报刊，《法兰克福报》，《柏林每日小报》，《福斯报》都异口同声地说，伯恩施坦再一次表明，社会民主党应当是一个民主改良党，而不是别的什么。当敌人把一个人本来没有的观点硬栽到他身上时，他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伯恩施坦被误解了，那是他倒霉，我为此替他感到惋惜，但是，人们毕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人们毕竟不应心安理得地容忍敌人对自己的赞扬。我过去就曾责备过伯恩施坦意志薄弱，竟容忍敌人对自己的赞扬。他对此反驳说，我也有一个论点被误解了并被敌人利用来反对党。他指的是我关于贸易政策的小册子^①，农业党人^②利用了其中的一个论点。但是毕竟只是在他们只知道这一小册子的发表在《前进报》上的一章时才能这样！当他们知道了整个小册子时，他们就再也不能利用这个论点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因此就安心，而是把我的一个论点被人当作反对我们的武器这件事看成耻辱。因此，当我看到《十字报》^③上的文章后，第二天立即给在农业党报刊上赞扬我的先生们以迎头痛击，这就使得他们马上放弃了同我的联盟。

对于伯恩施坦来说，问题涉及的不是单独一章中的一个论点，而是三年来的整个精神活动。三年来，凡是在他从事批判

① 《贸易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② 德国的代表容克地主利益的政党的成员。——编者注

③ 《十字报》，即《新普鲁士报》。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印有十字章图案。——编者注

活动的时候，他总是只进行自我批评^①。当然他也从事别的活动，但是他的批判活动仅仅指向党。为什么他一次也没有起来反对党外赞扬他的人呢？为了党的利益是迫切需要这样做的，因为我们的敌人不停地抬出伯恩斯坦来反对我们。他们说：

“你们对社会主义懂得什么？伯恩斯坦懂得的东西多得多，他是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某某事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伯恩斯坦有朝一日起来反对这些敌人，反对这些想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假朋友，如果他消除了一切怀疑和澄清了一切暧昧之处，那他就可以在一切方面按照他的愿望进行自我批评。这就是我们必须对他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伯恩斯坦提醒我们，他曾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达十年之久。是的，他为了我们的利益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了十年之久，我们感到很满意，我正是衷心渴望他重新恢复他所提到的这一传统。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也批判了我们的敌人，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家，他曾经非常坚决地反对过这些人。但愿他能恢复老的传统！那时他可以放心：老的关系也将重新恢复，他也用不着再抱怨党内批评他的人了。

爱·大 卫（摘录）

（9月24日）

考茨基再次给我们作了一个关于贫困化理论的演讲，这样他也就用具体材料参加了关于汉诺威代表大会的伯恩斯坦辩论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他说什么伯恩斯坦的书出版后，伯恩斯坦的朋友们曾大喊大叫：现在一个新时代开始了，现在理论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上了！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您是否愿意给我举出一个这样叫喊的人呢？他还说什么现在同样是这些同志说：

^① 这次发言里所说的“自我批评”是指社会民主党党员对党的批评。——编者注

啊，从这件事中过去没有得到什么，现在也没有得到什么。这种说法同样是不真实的。在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一个地方对伯恩施坦的书发出过欢呼声。它受到很猛烈的抨击，于是一批同志出来说：你们不妨先看一下这本书，它是否真的象你们所说的那样？这样就产生了一场辩论。考茨基同志，这些夸张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其次是贫困化理论！我们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曾谈论过这种贫困化理论的贫困，而现在考茨基又发表了一种见解：过去没有人把贫困化理论理解成一种日益增长的绝对的贫困化，而总是只理解成一种倾向，但是它受到相反的倾向的抵制。我已经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简单地引用《共产党宣言》反驳过考茨基，宣言里说的不是一种降低的倾向，而是说，资产阶级社会甚至不能养活自己的奴隶，工人成了贫民。而且这里说的不是个别人，而是说的广大无产阶级，在宣言中也完全没有提到工会组织的反作用。马克思后来谈了这一点，但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一点也没有给予重视。他还作了另一个声明。他说过：工人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将砸碎自己的锁链，因为他们没有可失去的东西。而且《共产党宣言》是以展望即将来临的暴力革命作结尾的。可见，曾经有一些人持有这种观点，如果还象基塞尔那样把《共产党宣言》当作准则，那就不能说：这是对贫困化理论作了发了疯的解释，从来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作过这样的解释！不对，如果改变自己的观点，那也要有勇气和力量说：我们错了！（有人喊：陈词滥调！）是的，这确实是陈词滥调。完全正确，但是你们在考茨基提出这个问题时应该作这样的插话。

这种观点也决不可能就这样被抛弃掉，关于我们面临着一次暴力革命的观点尤其不是这样。《新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撰稿人帕尔乌斯在最近一期上声称，革命者这个概念只有从下述意义上理解才是正确的：革命仅仅从夺取政权后的那一天才开始。可见你们所持的仍旧是原来的好的意义上的革命者的概

念。据德累斯顿的费舍同志向我保证说，就是这个帕尔乌斯不久之前向一个工会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即将崩溃的一种非常奇特的见解。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事。我不认为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这倒是表明，我们还必须估计到理论领域中存在着多么落后的状态。

现在来谈谈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伯恩施坦的演讲不过犯了一个小小的“过错”，因此我认为，那些想根据这个演讲对他提出控诉的人，终究自己会感到这是多么不合适。在演讲出版之前，人们对于资产阶级报刊利用它谋私利的那种做法感到恼火并对此得出了错误的印象，这一点我完全理解。我也理解倍倍尔的神经过敏。但是在演讲出版后，每个人终究会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如海涅所说的那样，它涉及到理论的理论，是一次关于科学这一概念的定义之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同志也许会把这看作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学究气，但是科学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这个。然而，这个演讲对于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它对于在伯恩施坦辩论中提出的问题本身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为什么伯恩施坦没有权利在大学生们面前也谈一谈他对科学的理论的看法呢？据说特别是由于伴随发生的情况要对他提出控诉。格龙瓦尔德说，这个联合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而是敌视社会民主主义的。他说得好象是无可怀疑似的。这个联合会不过是一个科学联合会，没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它的任务是邀请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讨论和听取各种相反的意见，以便自己作出判断。这在英国是很流行的，并且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联合会中也有社会民主党人，这一点格龙瓦尔德也并不否认。他还忘记了指出一个事实，为了使他的推断真实起见，他本来是应当举出这个事实的，这就是：伯恩施坦在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象梅林发表演讲一样，是大学校长所禁止的。由此可见，校长并不那么相信他与之打交道的伯恩施坦是一个破坏社会主义的人。演讲当时是在不公开的集会上作

的，不需要批准。以上这些是为了说明情况。

有人说，是资产阶级报刊首先使我们注意到危险的。恰恰相反，反动报刊把伯恩斯坦说成是比别人更危险得多的人。但是企图用赞扬来离间我们的其他一些报刊，例如《法兰克福报》，却对伯恩斯坦的演讲丝毫未加赞扬。它把这说成是词句之争，什么也证明不了。那里是按照演讲的本来面目给予评价的，认为它是在作纯粹科学的推论，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

此外，还有其他两个决议案。首先是倍倍尔的决议案。我承认，倍倍尔不再专门把这一演讲当作自己的论据。他大概已认识到，这一演讲不可能有重要意义。但是，他后来作为论据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汉诺威代表大会决议的继续。我认为，如果要了结这件事，那也应该大家都这样做。人们指责伯恩斯坦“最近一些年来片面地从事这种批评，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代表却不加批评”^①。是的，党员同志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伯恩斯坦已经卷入了这场斗争，既然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于是他就把自己一大部分科学工作用来研究这一问题。据我所知，他也批评资产阶级社会，虽然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也同别人一样愿意和希望伯恩斯坦不仅通过他的写作活动和通过对我们自己的批评来为党服务，而且要设法直接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立足之地，同其他人一起参加组织和鼓动方面的实际的细小工作。我也希望其他单纯从事写作活动的同志这样做，如果这同他们的地位和能力相适应的话。是的，在这样做时人们往往同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发生矛盾。但是，在时间上受到的损失，将通过获得认识源泉而得到补偿，而直接的鼓动工作就是每个人的认识源泉。如果倍倍尔希望伯恩斯坦朝着这一方向扩大自己的活动，那么，他尽可以保持这种希望，但要把这种希望在一项决

^① 参见本书第419页。——编者注

议中表达出来,那就会使这项决议具有不公平的性质,因为那样一来倍倍尔就必须要求对立的一方也这样做。考茨基说,伯恩斯坦不能忍受任何自我批评,不对,这里已远远超过了实事求是的批评,这里出现了对个人的攻击和责难,它远远超出了可以允许的范围。奥艾尔和福尔马尔等人在《新时代》上也必须忍受的是些什么啊!倍倍尔应当收回自己的决议案,赞成对双方使用同样尺度来衡量的另一个决议案。汉诺威代表大会没有禁止对科学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和进一步的探讨,而是相反。在社会民主党内应当容许自由的、没有先决条件的科学(有人喊:从来就是容许的!)——一点不错,因此今后也应当这样。但是谁要是想作为科学家来对待这个问题,谁就应当先脱掉党派的外衣。人们赋予这些理论上的争论以这种意义,并且把它用到鼓动本身中去,这引起理所当然的愤怒。我在自己的鼓动活动中从来没有碰到过格龙瓦尔德所提供的情况。当然,应当使鼓动员也正确地了解情况,不要歪曲地反映事情。

如果人们不总是把事情看成党派的事情,那么,辩论就不会产生恶劣的伴随现象。请你们让这些文字上的争论保持其理论上的分歧的性质吧!我谴责倍倍尔过去想而且现在看来仍然想运用他个人的全部影响使这件事具有重大的党派政治的意义。谁如果站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的牢固基础上,那他就确实用不着因为有人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某些论点表示异议而生气。党员同志们,在这些批评中,凡属正确的,那就会存在下去并得到实现,哪怕它十次被判决有罪,凡属不正确的,那就会死亡。我们将取得新的经验,有关的同志自己也许会说,我们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曾经有过错误。因此,你们要容许这样做!科学并不总是在前面照耀,而往往是走在实践认识的后面。经验往往是前进的动力。因此我们用不着大惊小怪,并由此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去割断伯恩斯坦的喉咙。(有人喊:我们也不想这样做!)我也不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这样认为的。

.....

这次辩论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我只是希望在最近一段时期来说这是党内最后一次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辩论。（有人喊：但愿如此！）这次辩论使我们保持警惕，它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自我批评也是同敌人作斗争。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的党，我们就不应当同意对伯恩斯坦这样的研究者的活动进行压制。我们要容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党的利益继续工作。对方已经对伯恩斯坦讲过他们认为什么是错误的。党对这次辩论不会大惊小怪，它将从中得到好处。

奥·倍倍尔

（9月24日）

如果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个人仅仅听到大卫同志最后的那些话，他一定会认为党内有人企图禁止我们进行自由的自我批评。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现有的两个决议案的开头部分是完全一致的。大卫在他发言的最后部分要求我们保护党内的自我批评，这等于要把水运到大海中去，多此一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根本不再进行争论了。我们反对的是伯恩斯坦近年来进行活动的方式，也就是那种对党有害的方式。

我起初没有打算谈论两个流派的原则分歧。我以为这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已经解决了。我感到惊奇的是考茨基违背了这一正确的策略。他谈到所谓的贫困化理论，从而使大卫得到了争论的机会。如果对这类东西听之任之，不加驳斥，那是不好的，因此我讲几句话。他引证了《共产党宣言》。我要指出，恩格斯在1872年就已经在马克思的同意下宣布，他们只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件重新出版。谁如果深入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那么对于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大卫所说的那种贫困

理论就不会有疑问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说明问题并且可以反驳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中的许多地方，那就是伯恩斯坦作为他的书的扉页题词引用的《资本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其中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看作是一个原则的胜利。^① 马克思的观点是，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己的组织来对抗资本家迫使它的状况下降的趋势，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运用组织的力量促使国家政权采取这样的步骤，那么，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道义上的进步，而且是一个新的原则的胜利。甚至象拉萨尔这样一个坚决主张铁的工资规律的人也没有给人以任何机会可以搬出他来为贫困化理论的错误观点作证。他在《公开答复》中说：有人对你们工人们说，你们今天的处境完全不同于三、四百年以前。你们的处境确实比博托库德人和吃人的野人要好一些。他写道：“人的每一种满足永远只取决于满足资料与在一个时期内按照习惯已经必不可少的生活需求的比例，或者同样地取决于满足资料超过一个时期按照习惯所必不可少的最低生活需求的剩余额。”^② 他接着写道，但是当你们把富有阶级今天所拥有的东西同工人阶级今天所拥有的东西作一对比，那么，今天工人阶级同富有阶级之间的差距比从前大得多。这就是贫困化理论的核心，这是一个如此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事情。大卫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他对党的历史了解得很清楚，他本来应当采取相当客观的态度来承认我们伟大的理论家们的这些观点的。由于这一次他也把帕尔乌斯拉进了争论，并且引用了《新时代》上的一段话：“刚刚夺取政权后的那一天……”，所以我也不想保留我的看法。在最近几期的《新

① 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把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扉页题词：“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

② 参见《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28—129页。——编者注

时代》上发表了帕尔乌斯论述党内的所谓机会主义者以及杰出的党员同志的著名文章，^①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我认为，把一些杰出的党员同志差不多赤裸裸地展现在他们的敌人面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低级趣味。我看，《新时代》杂志编辑部不应发表这样的文章。我把这个意见立即告诉了考茨基。考茨基答复说，他对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也感到遗憾，但是他对此不能负责任，他那时在休假。考茨基是必须设法使他的疲劳过度的神经得到休息的。但是尽管考茨基没有责任，在我党的科学机关报上居然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我还是感到遗憾。至于说到大卫所提到的这篇文章中的那段引文，那么我们现在很少使用“从某一事件后的那一天起”这种说法。我们总是说“在……后的那一天”。这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是普遍流行的说法，人们不能从中引伸出这里引伸的那种东西。

我不打算详细谈论昨天谈到的《前进报》对伯恩斯坦和其他一些事情所采取的态度。我们决定严格掌握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讨论，我也将遵守这一点。但是与正题有关的是，我昨天直言不讳地谴责了《前进报》没有派一个记者去听伯恩斯坦的演讲。格腊德纳乌厄尔反驳说，我被《前进报》弄糊涂了，《前进报》曾派了一个记者到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去。但是当时《前进报》编辑部有人对我说，没有派记者到那里去。现在则又说，那里有一个记者。当然，谁在这个联合会里发表演讲，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象伯恩斯坦这样一个有名的同志发表演讲，如果他选择了他所选择的那个题目，那么我认为，一个细心的编辑部就有无可逃避的义务和责任派一个记者去，不仅要听他讲些什么，而且还要写报道。有人反驳说，这个演讲太混乱，太曲折，无法报道。这是击中了伯恩斯坦的要害。他在演讲中说得很不明确，甚至连海涅这样一个对法学和哲学有高度

^① 见本书第381—412页。——编者注

修养的人也批评说：“伯恩施坦东拉西扯，反来复去，还有许多说法令人迷惑不解，人们很难弄清他的思路。”当然，从一个朋友的嘴里对一次演讲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尖锐的谴责了。很可能《前进报》的记者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并且说：“我虽然注意听了，但是伯恩施坦讲的话我无法写出来。”过去，当伯恩施坦的脚还踩在坚实的土地上时，他能够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想法，而现在，当他陷入泥潭时，他就再也不能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想法了。这完全是伯恩施坦的不幸。只要读一读他的书，我敢打赌，其中没有一页不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的。要是人们以为抓住了他的要害，他就会立即说：这是你们误解了！是的，的确很难同伯恩施坦辩论，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是一样，因为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思路太混乱，太曲折，使人很难弄清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和格龙瓦尔德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一点也没有指责伯恩施坦在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讲。我根本不认识这些先生，也不想去关心这个联合会的往事。这些先生过去经常友好地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重大活动。但我总是由于缺乏时间而拒绝了。今年春天他们也要我到他们那里讲话。我拒绝了，一则是因为我没有时间，二则是因为我的健康状况很不好，甚至连向我自己的党员同志发表讲话都做不到。但是，对我说来，不存在不能到那里讲话的原则上的理由，不言而喻，对于伯恩施坦说来也是这样。但是，伯恩施坦所讲的题目则是另一回事。在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中不适合讲这样的题目。这个题目就其整个性质来说必然会重新引起一场关于伯恩施坦的争论。大卫同志，这就是目前这场争论的起因！事情被说成是这样，似乎我们是肇事人，特别是我。但是，在最近六个月里，我确实没有公开谈论过伯恩施坦或写过有关文章，而现在竟有人说我是那个运用自己的全部威信竭力反对伯恩施坦并引起目前这场争论的人。如果大卫对关于伯恩施坦的这种争论厌恶已极，那么我要说，我对这场争论已厌恶透顶。我同他一样希望我们是最后一次来谈

论这个问题。而为了使它真的成为最后一次，我们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它同另一个毫无内容的决议案不一样。我们在决议案中只是说明一个事实，我们没有作任何判断。我们希望，伯恩斯坦在最近几个月中，特别是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辩论了解了一大部分同志对于他的鼓动方式的想法以后，终于会觉悟过来，并将重新象过去一样为我们工作，我们认为，这对于原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大大上当了，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感到遗憾。但事情成为这样，我并不觉得奇怪。我们认识三十一年了。我知道，如果说有一个人受到他的环境的巨大影响的话，那就是伯恩斯坦同志。根据他在这三十一年中由于种种情况所处的不同环境可以说明，他自己为什么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变化。他最近的变化可以用他不得不多年生活在情况同我国根本不同的英国来解释，他不得不生活在那里，这不是他的过错，这甚至是他的功绩。如果他在德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观点。我不是谴责，不是非难，我只是说明事实。

伯恩斯坦提到他的演讲引起热烈的掌声。我对于伯恩斯坦重视这一点感到吃惊。那些给他鼓掌的年轻人几乎没有资格对他的演讲作出判断。至于党员同志们是怎样判断的，可以从海涅的批评看出来。海涅听了演讲，并且读了演讲词，因此具有了解口述和书面复述的双重优越性。因此他对大学生的鼓掌是用不着感到惊奇的。（伯恩斯坦喊：他们是在我讲到什么地方时鼓掌的？）伯恩斯坦刚才交给我的报道里写着：在伯恩斯坦反驳一个反对者时掌声最热烈。这当然叫人很高兴。但是我本来只是希望，当后来资产阶级报纸利用他的演讲时，他也把他在辩论中对一个反对者讲的话拿出来，清清楚楚地说明他对这种行动的态度。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可悲，现在不象当时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那样，我们党内不是只有一个人被资产阶级报纸当作模范儿童拿给我们看，不，今天我们已经有五个著名的同志享有那种

并不值得忌妒的幸运,不停地受到四面八方的敌人的称赞,他们却没有哪怕只一次利用机会表示拒绝这种对他们说来简直是有损名誉的赞扬,请这些报纸不要把他们所没有的意图栽在他们头上,并且宣布:我们是忠于党的。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奥艾尔指出福尔马尔不断受到敌对报纸的吹捧,他说:

“我们同巴伐利亚的同志们的摩擦之所以没有停止,这还同福尔马尔个人的态度以及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重要地位有关。福尔马尔不可能不知道,敌对报纸不断企图在他和我们之间制造对立,这种企图的历史同福尔马尔在党内的历史一样长。在福尔马尔还没有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站在我们党的极右一边、而是站在与此完全相反的方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出这一企图了。他们不断企图这样做,但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期待福尔马尔讲一句话,期待他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斥责敌人的这一卑劣行为。我常常在等着你的这句话,福尔马尔。你太骄傲了,不肯讲这句话。我们曾在顺利和艰难的日子里同你一起战斗过,我们了解你的性格并且知道你为什么沉默。但是代表大会以外的几十万人不是这样深刻了解你,他们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如果这种事一再出现,而福尔马尔却高高在上,一句表示同心同德的话都不说,那么见鬼吧,归根到底这后面总藏着点什么东西。”

这番话对今天的情况完全适用,只不过象上面所说的,我们今天有一大批人不断地受到敌人赞扬。我本来还曾经期望,奥艾尔在法兰克福发表的十分正确的意见终于有一天也在这里并且在最近几年的种种场合能受到重视。大卫说得完全对,他说,如果说《法兰克福报》赞扬了伯恩施坦的演讲,那是不正确的。不,它责备了伯恩施坦,不过这种责备的方式对于象伯恩施坦这样的同志来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如果说伯恩施坦曾经有一次非常迫切需要大发雷霆拒绝某种批评的话,那就是《法兰克福报》的这一批评。那里是这样写的:

“伯恩施坦很好地开始了修正。他把马克思主义拿来放在自己面前，不去详细研究各种微妙的问题，而是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抽出来，加以剖析，并指出其错误的结论。固然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这样做过，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必须有一个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再一次这样做。这是他的历史使命。如果他想继续自己的事业，他必须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并提出证明，也就是说，用科学反对科学。但是，如果一开头就把一方看作非科学的，那么就不再需要任何辩论，也不需要任何证明。这样一来就完结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伯恩施坦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这就是《法兰克福报》这样一家著名的、老练的报纸对于这个演讲所表示的看法和希望。我坦白地说，当我在《法兰克福报》上看到对伯恩施坦的这样一种批评时，我内心感到痛苦，以前伯恩施坦从这家报纸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不太愉快的批评。资产阶级报刊上赞扬毕洛夫伯爵^①让伯恩施坦回到德国是他的一着妙棋，难道你们大家没有看到吗？他最近在党内的活动造成了这样的暧昧状态。伯恩施坦最近三年究竟干了些什么？你们看到过他批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理论代表布伦坦诺、瓦格纳、施穆勒和桑巴特吗？没有，他唯独批评了党的原则，批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他的书再版时，他删去了对布伦坦诺的极尖锐的抨击，而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烈攻击。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伯恩施坦对于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的议会活动、军事政策、海军政策、殖民政策和国际政策以及在中国的冒险活动采取什么态度。这难道是一位如此杰出、如此聪明的党员同志的斗争方式吗？我昨天说过，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如果有一天他在我们的纲领中找不到一个可以批评的新的地方，他晚上就不能安心上床睡觉。我

^① 伯恩哈特·毕洛夫 (Bernhard Bülow 1849—1929)——1900—1909年德国首相。——编者注

们确实赞成批评自由，但是伯恩斯坦最近几年所进行的，已经不再是批评，而是哲学上的诡辩，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玩弄哲学和玩弄批评。这是一种总是要怀疑某种事物的怪癖，是一种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的爱好。

海涅说得完全正确，我们是一个行动的党。我也认为，我们之中大多数人的知识是在实际斗争中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理论批判得到的，因为我们的教养还没有达到在一切方面都能理解马克思的地步。但是我们还有理论家，所以我们不仅是一个实际行动的党，而且也是一个理论的党，是一个经常研究自己的情况、注意时事和社会中的变化的党，此外没有一个党是这样的。否则我们就不会在三十年中已经有了第四个纲领，再过几年，我们就会有第五个纲领。我不同意海涅的意见，他认为我们目前的纲领还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好多年。不对，我觉得这件事有点更加急迫了。在纲领的基本观点不断受到批评和怀疑的时候，我不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纲领投入战斗。我一点也不反对我们在明年成立一个修改纲领的委员会。

伯恩斯坦昨天强调说，奥地利党修改纲领是他进行了批评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新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阿德勒在奥地利《工人报》上声明，旧纲领条文中没有一条是“批判主义”即“伯恩斯坦主义”所动摇得了的。他接着写道：“但是，事情同样也表明，正是由于那一辩论，人们现在阅读某些老的条文时不再可能不感到它们会遭到误解和歪曲。大家知道，伯恩斯坦除了有某些真正的功绩外，还有所谓的发明了granum salis^①的功绩，他认为人们必须带着这种granum salis来阅读组成一个纲领的每一条概括性的一般条文。”阿德勒在《新时代》上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了我完全赞同的一种看法。党员同志们！只要不出现一个异常长久的繁荣时期，只要这个繁荣时期没有使

^① 拉丁文，意思是：一粒盐。转义是：言外之意，打折扣，有保留。——编者注

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对于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假设发生动摇，伯恩施坦的全部所作所为就不会长久地在党内起作用。现在危机来到了，它给千百万工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尽管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是从党的观点来看它有着最好的后果。它用电光照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面貌。我相信，如果危机在两年半之前，而不是在今年春天到来的话，伯恩施坦的书就不会写出来。

因此，我们对于伯恩施坦的所作所为应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伯恩施坦对党有过巨大的功绩。这一点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在反社会党人法的艰难时期同他有过密切的联系。但是我认为，他最近几年的活动非常严重地损害了他对党的功绩。多么可惜！如果我们大家都实行这一策略，我们今天就会看到社会民主党的垮台。基于这一理由，我恳切地请求你们采纳我们提出的决议案。有人指责这个决议案，说它含有伤害伯恩施坦的判决。事实不是这样。这个决议案只是毫不掩饰地指出事实，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伯恩施坦将会认识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希望伯恩施坦将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那时我们将会把他当作名副其实的自己人而愉快地欢迎他。

洛伊特尔特

(9月25日)

大卫认为，似乎只是由于格龙瓦尔德的“煽动”，才促使我们这些老同志提出反对伯恩施坦的决议案。我不得不反对这种见解。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不单单是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纪律的伯恩施坦理论。不是，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声讨伯恩施坦，那我们对席佩耳、卡尔韦尔^①以及《社会主义月刊》的其他撰稿人又该怎么办呢？这些人只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谁

^① 理查·卡尔韦尔 (Richard Calwer 1868—1927) ——国会议员，《社会主义月刊》的经常撰稿人，后退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想这样做,谁就应当继续在大学里学习。如果他们跟我们一起,那么,他们研究科学的目的必须是为了运用到实践中去。批评,反批评,自我批评,都是美好的东西,然而我们却因此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伊塞格里姆”^①的文章、席佩耳和卡尔韦尔在我们最近几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这件事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以为,伯恩施坦问题由于汉诺威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已经解决了。可惜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提出我们的决议,不仅仅是因为伯恩施坦在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的演讲,而是因为他在《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上否定我们整个最终目的的全部文章。伯恩施坦同志,难道你不认为这是有损于我们吗?在1898年的竞选中,我们对手的候选人曾经利用伯恩施坦的言论作为武器来反对我们。自由党人克吕格尔博士曾经引用伯恩施坦的一句话来反对我。他说,伯恩施坦说过,最终目的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反驳说:不对,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走向最终目的的运动对他来说就是一切,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同他是一致的。克吕格尔博士立即拿出《新时代》上伯恩施坦的文章给我看,我的脸色变得和死人一样苍白,并说:那里是这样写的,但只要我们的纲领上还没有这样写,我就不接受它,而且我可以担保,鲍德尔特也是这样看的。伯恩施坦进行批评、反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一切都是照旧,人们不能理解伯恩施坦。于是他写了论述工会的文章,其中用三种不同的说法声称,一切都是老样子。难道我们之所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因为我们想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吗?难道伯恩施坦不知道最近一些罢工的历史吗?难道他以为资本主义从反社会党人法以来改变了吗?对于激烈的行动,我们只能以最激烈的方式回答。为未来而利用经验,我把这称作科学。伯恩施坦说,他在大学生联合会作的演讲只是为小范围听众准备的。啊,伯恩施

^① 伊塞格里姆是席佩耳的笔名。参见本书第172页注^①。——编者注

坦同志，请你象我们每一个普通的鼓动员必须准备的那样进行准备。倍倍尔也改变过自己的观点，但他从未忘记，他的言论以及由此引出的结论对未来必然会有什么影响。他当帮工时是如此，当手工师傅时以及现在也是如此，因此他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十四年来，我一直在开设一家很好的画铺，但我知道，我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奴仆。在阿波尔达即使有四十名织袜业者也是多了。资本家把机器从自己家里发放出去，手工师傅为自己的劳动得到十马克的报酬就感到高兴，而它的劳动却值五十和六十马克。如果伯恩施坦象小孩子开始学习时那样研究事物（他还年轻，还能有所作为），那他还会有所收获，会认识到要采取一种共同的行动去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

阿·施塔特哈根（摘录）

（9月25日）

……对伯恩施坦的回答无疑是必要的。这种回答的最温和的形式包含在第109号决议案中。108号决议案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由于下述原因：昨天，伯恩施坦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模仿著名的乔尔丹诺·布鲁诺^①的一句名言：“你们作出了判决，你们对这个判决也许比我这个受到判决的人更加害怕”，他说：一个反对他的判决对党来说比对他自己将是更加不愉快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通过一个实事求是的决议，这既不会损害党，也不会损害他。如果伯恩施坦以为，问题在于通过一个反对他个人的决议，或者对自我批评加以某种限制，那他就错了。不，问题仅仅在于作出决议以反对某种行为。至于在第108号决议案的开头部分所说的：党代表大会认为科学的自我批评

①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意大利的伟大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关于宇宙构造的学说；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编者注

的自由是党在思想上继续发展的前提，那么，把这同有关的阐述联系起来，就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党曾经不赞成这一观点。伯恩斯坦主义者喜欢到处这样说：“你说的不过是老生常谈。”但是，把自我批评是必要的这一论点冒充为崭新原理的人，是不配讲这种话的。第52号和93号提案要求实行充分的自我批评。但是，这些提案也要求对那种会把混乱与不和带到战斗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方式采取反对态度。这些提案要求实行自我批评，拒绝自我批评是不适当的。第108号决议案避而不谈这个预定的要求，避而不谈自我批评。有些人是敌视自我批评的，这也就是我想直截了当称之为伯恩斯坦主义者的那些人，虽然我明确指出，伯恩斯坦不属于他们之列，他自以为是在推动别人，却通常是被别人所推动。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反对这股从外部涌向同志们和党的潮流。为了说明这些人的自我批评、科学性和语调，我举一个例子。一家通常也引人注目的报纸在介绍《社会主义月刊》的一则广告中写道：“《新时代》愈来愈成了这样的机关报，梅林、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在那里对所有那些敢于独立思考和不是把重复陈词滥调当作任务的人执行刽子手的职能。”用这样的语调和这样的敌视态度来反对那些不考虑个人受到的一切侮辱而表达自己信念的人，这就表明这些也自称为同志的人不能容忍自由的批评，这是同党一贯的实践背道而驰的。大卫同志，这些人就是这么写的，你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但这些人认为，他们是和你一致的。在目前这场辩论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个别同志有怎样的意图，而在于他的行动在我们敌人那里以及在我们队伍里起怎样的作用，这应当冷静地和客观地加以考察，因此人们必须象第109号提案所做的那样声明（这对于伯恩斯坦一点没有损害），需要对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批评，而不是对自己的党的原则进行想当然的批评，并且在大庭广众中，在很不合适的场合发表怀疑的言论。一位哲学家曾经给垃圾下了一个定义，说垃圾就是置

于错误地点的一种物质。我反对这种意义上的垃圾堆。我们应当要求我们的同志自己出来对敌人歪曲他们的一些话表明态度,并且谴责那些一心想把混乱带到我们队伍中来的人。在争吵的火头上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最终目的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一句如此错误的、在火头上偶然说出的话以及类似的东西所作的歪曲使用和解释表示态度,这是我们的报刊以及被这样曲解了的同志的事情。海涅曾告诉我们,他同《星期一世界报》编辑私下进行过一次讨论。是啊,可以举个例子,这个编辑一年前在维也纳的《时代报》上写道:海涅认为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作者冯·格尔拉赫认识海涅本人,因此他不得不说:如果海涅做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他这个民族社会联盟分子就不知道他们还剩下什么事可做了。对于这种说法必须坚决地和公开地表明态度,以便使那些想把混乱带到我们营垒中来的敌人受到致命打击。海涅没有这样做或者只是现在才这样做。固然有些人不喜欢同挤在周围的每一个肮脏家伙打交道。但是,如果有人宣称,我们认识海涅本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社会联盟分子,等等,那么,只是同这样的人作一次私下的谈话是不够的。当国务部长冯·伯尔莱普施男爵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说:我们的格言就是社会党人伯恩斯坦的格言,那时,伯恩斯坦也许会感到不好意思。伯恩斯坦当然不想这样。……

……

伯恩斯坦十分乐意在我们的行列中进行战斗。他回答勃兰登堡省鼓动委员会不久前向他发出的一张问题表时说,他完全听从我们支配去从事鼓动工作。由此可见,我们的爱德完全属于我们,这是就他的愿望而言。我们谴责的不是他的愿望,而是他采取的行动以及他违背自己意愿被推到了什么地方。当然,每个人都可能有怀疑,但是那时他应当呆在一间安静的小房子里去踌躇犹豫,直到怀疑消失为止。如果他的所谓的朋友没有

劝他到那个非社会民主主义的联合会中去讲话，如果在他从英国回来后人们最初不去打扰他，那么，我相信，他就不会发表那个演讲了。要发表怀疑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言论，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地方。这个联合会是由这样的青年人组成的，如果他们可以说有一种倾向的话，那么，他们与其说是站在我们的阵营里，不如说是站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我想利用这机会简短地、明确地表示一下我对大学生和工人、科学和劳动的任意划分的意见。这种划分是完全荒谬的。的确，大学生的长处是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恰恰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实际知识是工人的长处。人们总是说：整个争论只涉及大学生和理论家。但这是完全不确切的。有一些人自称是大学生，但实际上并不是。我指的是那种毫无价值的人，这种人刚刚开始学习就中断了，因为他们认为，大学能够给他们的东西不太多，但是他们的事业心能够在改造党、在几十年来已经克服的空想主义的庸俗社会主义中得到发挥。这些先生很容易把一知半解同科学性混淆起来。的确，我们中间有杰出的大学生，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披着大学生外衣的一批糊涂虫，这些人拉着伯恩斯坦衣服的下摆，力图把他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伯恩斯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谈到，谁只要稍微有一点理论上的理解力，只要不仅是把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当作一种装饰品，他就会怎么怎么做。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对伯恩斯坦来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装饰品。但是，如果人们读一下他的演讲，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伯恩斯坦在那里发表演讲的那一时刻，他的冷静的思想完全消逝了。我们中间许多人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对他提出的谴责是，他把这些蠢话带到了敌对的集会上，虽然我们大家都说过蠢话，但有的是社会民主党的集会或联合会，可以到那里去谈论这些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诚然，他并不是参加了一次保守党的代表大会。但是，如果象伯恩斯坦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谈论这样一个题

目,那么,他必须非常明确地说明,为什么马克思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只要冷静地进行思考,他就不会看不到,由于思想巨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成了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去,从而给空想主义的愿望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科学基础,指出了同我们的目标相一致的发展道路(在未来的事情可以被指出的限度内),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发表意见,不管要涉及的是伯恩斯坦还是另外一个人。我要毫不犹豫地,我本来宁可作出一个更尖锐的决议来反对其他一大批违背自己义务而行动的同志。第109号决议案是很温和的,甚至伯恩斯坦本人也会同意这个决议,因为情况正是这样,因为第108号决议案会是对党的一种嘲弄,或者至少敌人会这样看,我请求你们尽可能一致地赞成第109号决议案。格腊德纳乌厄尔认为,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辩论对于实践没有什么坏处。我相信,他将会认识到他是多么不正确。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实践和科学是携手并进的,这正是使我们受到鼓舞的地方。确实,对于无足轻重的人的诡辩和蠢话人们是不加重视的。但是,伯恩斯坦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希望他今后尽可能少给敌人提供可以利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借口。科学和实践,如果正确地理解,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现在把“大学生”这个词带到辩论中来,那么,这看起来好象是我们想借以保护我们希望防备的那些人,这些人几乎还没有长大成人,现在却突然认为他们负有战胜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使命了。这些青年人想炫耀自己的才能,但是他们忘记了,谁没有光,也就无法使别人发光。对于这些人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他们或者拉着伯恩斯坦的下摆不放,或者正如我所担心的,伯恩斯坦不由自主地让这些人的抛弃。我毫不怀疑,伯恩斯坦今后会更多地从事实际工作,将以最尖锐的方式反

对那些以为可以利用他的观点的敌人。我也不怀疑，伯恩斯坦在他可能要出的《前提》的新版中，将会举出默麦尔-黑德克鲁格和勃兰登堡的自由党人的行为来说明他认为自由党人已经大大向左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将会援引目前的危机来证明他对于发展进程的看法是错误的。

为了党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伯恩斯坦同志本人的利益，我请求你们赞成第109号决议案，这次决议毫无伤害人的地方，它无非是说：伯恩斯坦，重新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注意别让敌人利用你来反对我们！

爱·伯恩斯坦（摘录）

（9月25日）

同志们！我力求辩论尽量不牵涉个人，并且尽量不涉及次要问题，只讨论主要问题。我决不否认，两个决议对我个人都是友好的，第109号决议虽然对我作了谴责，但是只涉及到某些行为，没有涉及我的愿望，因此，绝不应当说它是对我个人的不信任表决，即使我承认这一点，我仍旧认为有义务请求你们不要赞同第109号决议，我反而要请提案人放弃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大部分是以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它影射而且也只能影射我重新回到德国以后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们要追查我的活动，那么，从你们的立场出发，只有我在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的演讲是唯一可加谴责的。我一开始就承认了那次演讲的某些形式上的缺陷，但是如果你们考虑一下演讲的倾向，公正地考虑，不要受敌人的批评和赞扬的影响，你们就会认识到，演讲给予社会主义的比它从社会主义那里去掉的要多。演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说社会主义不是科学；它只是说，社会主义不完全是并且不可能完全是科学。我们可以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们可以强调社会主义和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我的演讲恰恰就是这样

做的。但是，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关于社会的未来的一般的理论观点，它所包含的有一大部分是愿望的成分。我在演讲中论述了这一点以后，我说：

“但是尽管如此，在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科学之间仍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愈来愈从科学的宝库中汲取自己的论据。在所有的社会党派中，社会主义是最接近科学的，因为作为一个上升阶级的运动，它对现存事物的批评比任何其他政党或运动都更为自由，而批评的自由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条件之一。社会是一个有生气的、不断发展的机体，一个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亲眼看见这种进步的方向——寄予期望最多的那个党或阶级自然也比任何其他的党或阶级更为关心认识的进步。仅仅因为对社会的联系的认识能保证社会民主党找到适于加速社会进步的手段以及避免阻挠或者延缓社会进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主义就已经要关心这一进步了。社会主义固然象前面说过的那样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志的事业，但它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事业。为了达到所企求的目的，它需要关于社会机体的力量和联系的科学。”^①

……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所写过的任何东西。我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遭到尖锐的批评。我看不出这些批评（除了有关形式的之外）是合理的。有人对我说，我的书再版时应当重写。同志们，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比较冷静考虑问题的同志对我说：不必重写，你让它保持原样，这是一个文献！我深信，将来会有一天，社会民主党将为拥有这样一本书而感到骄傲。是的，这决不是自吹自擂。这是我的坚定信念：当争论过去后，你们将会看到，我的书包含着大量的认识要素，它们将给运动带来成果，而不会造成损失。我有权说出这一点。

^① 参见本书第367—368页。——编者注

这不是狂妄自大，这是我的信念，我坚持这一信念。

洛伊特尔特和其他人提出了一个我很容易理解的论据。我的一些说法给鼓动工作造成了困难。我确实感到遗憾。但是，我认为，整个说来对困难估计过头了。在实际的、现实的斗争中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武器。至于“最终目的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首先，我对它作了限定，其次，我对它作了解释。即使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分子利用了这句话，那么我们毕竟知道，我们在对现实状况的批评中应当用什么来反对我们的敌人，而在这一方面我的书决不会妨碍你们。相反，如果你们正确理解我的书，它会帮助你们。（笑声）啊，你们尽可以笑（有人喊：你自己应当试一下！）——我也做过鼓动工作。

.....

我再说一遍：倍倍尔的决议案不是怀有恶意的，不应当说是一次不信任表决，但它的前提是错误的。我的活动不是片面的，有一些同志曾要求发言，他们将证明这一点，而我也向你们指出过这一点。因此我向你们呼吁，呼吁你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请你们公正地对待事情！你们是可以公正的，因为党是有力量的。请你们不要指责我，那样做是不正确的。请你们通过海涅的决议案。我完全坦白地说，海涅的决议案也并不使我满意。

（笑声）尊敬的同志们，我要对你们说：我以为，你们本来可以在决议中说一些别的，说一句表示信任的话。（笑声）——是的，如果你们加进一句谴责的话，那么，本来也可以根据我回国后所开展的活动从另一方面说一句话。你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那很好！海涅的决议案绝对没有给我什么东西；但它对党有利。这一决议案说，党从来不赞同禁止自我批评，它并没有采取新的观点，它在考虑到老的观点的情况下转入下一议程。我坚决否认我曾经在我的那些演说中或者在我的其他活动中进行过片面的批评。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为党工作，我将继续这样

做，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的功绩。因此我请求你们通过这样一项对党是公正的但对我来说至少不是不公正的决议。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1年柏林德文版第138—140、143—144、144—147、156—157、157—159、159—164、164—169、170—171、171—175、176—177、179—181页。

爱·伯恩施坦 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的声明

(1901年9月25日)

党员同志们！正如我在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已经向你们说过的那样，代表大会的裁决不能使我对于自己的见解产生疑惑，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的多数同志的裁决对于我来说同时也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决议客观上对我不公正的，正如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的，它是根据错误的前提作出的。但是，在倍倍尔同志声明这一决议不包含任何不信任表决之后，我声明，我今后将给予代表大会多数的裁决以这样的代表大会决议理应得到的那种尊重和重视。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1年柏林德文版第188页。

卡·考茨基 卢卑克党代表大会（摘录）

（1901年10月2日）

倍倍尔在他致卢卑克劳动议会的祝贺文章^①中表示深信，它将最完满地解决它所面临的许多任务。由于最近我们中间出现了大量形形色色的意见分歧，因而许多人认为这个期望是过分的乐观主义的流露。但是结果出色地证实了倍倍尔的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可以为在卢卑克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

即使是在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的人也可以感到满意，因为虽然属于少数派是不愉快的，但是要使政治行动取得成效，毕竟有一个首要的先决条件：清楚了解人们必须加以考虑的各种不同因素的力量对比。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最近几次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并不总是得到这种了解的，因为一系列情况经常导致这样的结局：人们虽然非常激烈地进行争论，但是后来又一致通过一个决议，并且声明，我们大家的愿望都一样。

这一来并没有使党更加齐心，只是使它对党内各派力量的大小认识不清；辩论不会停止，而将一再爆发，除了使个人怨恨越来越深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只有卢卑克代表大会才说得清清楚楚，从而结束了那一种已开始象一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的局面。

.....

如果说泥瓦合同工事件的结局使那些妄想利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间的裂痕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失所望，那么，对于那些把希望寄托在社会民主党的脱毛以及由此产生的分裂之上的人来

^① 倍倍尔《致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发表在《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51期第772—774页。——编者注

说，在批准预算问题上以及在伯恩施坦问题上的决定就是一剂苦药。

他们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感到失望。党内脱毛的征兆有时显得比群众的真实情绪强烈得多，这是事物的本性造成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性是，它的任何一个大的阶级——无产者、小资产者、资本家和农民——都没有充分的时间、也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来自己关心自己的政治日常工作。这个工作几乎完全落到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专门家、也就是职业议会活动家和职业政论家手里，党越大，就越是这样。各个不同的和互相对立的阶级在本阶级中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因此，在报刊和议会的日常政治活动中，阶级矛盾不是直接得到表现，而是得到反映，从而通常也表现得比较缓和。资本家阶级在新闻界和议会中的代表多半不象他们的委托人那样残暴和仇视工人。反过来说，无产阶级在新闻界和议会中的代表的革命激情往往表现得不象无产阶级本身那样强烈，这是一个老经验了。因此，谁如果仅仅根据双方的言论和文章来进行活动，就会总是陷入自我欺骗，他就会把资产阶级看得比实际上对工人更加友好，把工人阶级看得比实际上更加温和，一旦他根据这个自我欺骗而采取行动，如果这个行动不仅涉及议会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而且也涉及群众，他就会遭到失败。资产阶级整个来说比它的政治代表更为反动，每当发生强有力的民主行动时，它总是抛弃它的政治代表，不去支持他们。无产阶级整个来说比它的代表更为革命，并且推动后者前进，尽管后者常常想要煞车。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批准预算问题以及伯恩施坦问题的解决再一次证明了这后一点。

伯恩施坦事件是党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对我曾引人注目地参加过的这次辩论的最后结果作出判断，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我希望全部问题从现在起已经成为过去，所以我就更加应该如此了。

并不是我相信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这样假定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要我们的党存在，在这次辩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就会存在下去；它将一再恢复并且一再表现出来，但是它也将一再改变自己的形式和争论的主题；它将一再达到休止点，在这个休止点之后，它将以改变了的形态出现。

看来现在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休止点。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温和派和激进派（或者随便人们怎么称呼他们）之间的矛盾肯定将再一次出现，但很可能是在另一些条件下，而且也许是通过另一种派别组合。但是我们不想继续为这个尚未产生的矛盾绞尽脑汁，我们高兴的只是，我们可以认为，旧的矛盾所采取的伯恩施坦问题这个特殊形式已成为过去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期望重新看到，今后几年将不仅在实践中（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受到阻碍），而且在理论上同心协力进行建设性的创造活动，在这几年中占优先地位的将是有条不紊的研究，而不是自我批判和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

伯恩施坦辩论的余波是对《新时代》的责难。这是我们的杂志第一次在党代表大会上成为公开批评的对象。因为我们在这里谈的是自己的事情，我们给它的篇幅不妨比这个问题就其一般意义来说应得的多一些。

首先我要对于费舍^①发言中的一句话补充一点“个人意见”。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些话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也没有听清楚。如果我沉默地容忍这句话，那就可能引起奇谈怪论。

根据会议记录，费舍说过：“考茨基在文章中表示过，党内不再有人认真对待这位作家（帕尔乌斯）了。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怎么可以把他当成我们科学杂志的旗手呢？”

我从来没有公开地讲过这样的话。费舍在一篇对我进行道

^① 指理查·费舍，见本书第430页注^②。——编者注

德说教的发言中，利用一封不公开的私人信件中的一段话来反对我。单凭一段引文的词句并不一定能把它的意思说清楚，从上下文看起来它可以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从一篇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引用一段话时，每个人都可以检查它从上下文来看是否真的有引用者赋予它的那种意思。在引用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时，这是不可能的。

我再也想起费舍所引用的那句话的上下文了；伯恩施坦公布了那封信的包含那句话的段落，这对于弄清楚上下文是不够的。但是我有一切理由假定，极而言之，我也只是想说帕尔乌斯在某一个问题上在党内是孤立的。我决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帕尔乌斯整个说来在党内不受到认真对待，因为从我读到他的最初一些文章时起，我就很认真地看待他，我把帕尔乌斯看作不仅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而且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和具有罕见的坚定信念和毅力的战士。正是由于他有创见并且喜欢自行其是，所以我们在基本观点一致的情况下在许多点上彼此有不同意见，虽然如此，我仍旧高度评价他作为党员、朋友和撰稿人的活动，特别是《新时代》要感谢他的很宝贵的投稿。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里说明这一点，因为否则我的沉默可能受到误解。

我在这里还必须补充谈到第二点，免得在这一方面也造成任何误解。有人硬说，我用我们这里盛行的恶劣的语调把一批撰稿人从《新时代》吓跑了，并且说这是蓄意如此的。我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已经驳斥过这种说法，不过也许太粗略了，因此我想在这里补充强调一下。不言而喻，我承认每个党员同志有权为《新时代》撰稿，只要他的作品适合于这样一个杂志的范围。不错，自从伯恩施坦辩论开始以来，一批很重要的撰稿人离开了《新时代》，对于其中有些人的离开，我是感到十分痛心的，但是我认为他们离开的原因完全不在于似乎我们这里盛行的恶劣的语调。这种“恶劣的语调”不是别的，正是热情

的人进行争论的语调，他们为他们认为最神圣、最崇高的东西进行斗争。在每一次争论中我们队伍里总有人抱怨恶劣的语调。卢卑克代表大会上关于报刊问题的讨论本身就表明，要想在一次争论中使用的语言不被对方看作侮辱性的恶劣的语调，是很少可能的。在这次讨论的过程中，正是那些对我们的不高尚的语调提出控告时叫得最响的人，最终充当了被告的角色。

在我们党内谁没有由于自己的恶劣的语调而受到攻击！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的辩论使人有点想起1877年的哥达代表大会，那时正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由于他反对杜林时采取的不适当的语调而遭到责难。在当时主张文雅语调的人中，也有约翰·莫斯特^①。

我们采取的语调是辩论的语调。使一批同志感到在《新时代》不太舒适的，不是语调，即使它有时可能不适当，而是辩论这一事实本身。我理解这一点并对此感到惋惜，但是我认为，进行这种辩论或容许这种辩论，不仅是我的权利，而且是我的职责。我决不是粗鲁行为的崇拜者，但是只要在指责我的恶劣语调时并不同时否认我所代表的原则性观点，那么这个罪名对我来说是轻如鸿毛的。但是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对于这种原则性观点没有提出任何指责。

使我们的一批撰稿人同我们疏远的，不是我们的语调，而是并非由我制造的伯恩斯坦及其批评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辩论。这是由事物的本性决定的，要避免这一点，除非我把掩饰和抹杀现有的矛盾看作《新时代》的任务。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有些同志之所以对我们不满，其真正原因在此，而不在于我们采取的语调。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作任何让步，因为否则我就会违背我对于一个党的科学杂志应有的任务的见解。

^① 约翰·莫斯特 (Johann Most 1846—1906)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880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有些人把科学和党看作是互不相容的概念，因此他们认为，一个科学杂志根本不可能成为党的机关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就应当不仅适用于杂志，而且适用于办杂志的人，那么作为某一个党的党员就会同科学活动不能相容，每一个想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就应当远离一切政党。谁不这样做，就表明科学对党对他来说决不是互不相容的。

一个科学的党报涉及的恰恰不是一般的科学，而是一种特定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它的名称就显示出它是一种政治的科学、科学的政治。它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经济任务及其解决办法的科学，它是这样一种科学，它从开始起就具有实践的性质，从开始起就致力于影响政治生活，要在其中起作用。但是在政治中只有大的严密的组织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如政府组织、教会和政党。与阶级矛盾相适应，政治经济科学分成一系列流派，这些流派中每一个都必定致力于争取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党。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要求。党的生活非但决不会使科学毁灭，相反，有了它才使科学生气勃勃，因为一个经济科学流派如果没有在政党中得到体现，就是死的，一个这样的流派如果不致力于在党的生活中获得实际应用，就成了一个毫无目的的概念游戏。

另一方面，既然政治成了科学探讨的一个主题，每个政党就必须力求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它的宣传活动和立法活动就注定得不到成果。科学和政党远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非极其密切地联合起来不可，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但是这当然并不是说，实际政治家的职能不是完全不同于理论政治家的职能，他们相互之间不是有时可能发生矛盾。实际政治追求权力，理论追求知识。为了取得政权，必须把朝着同一方向努力的一切人团结和联合起来，必须努力使他们之间有时出现的分歧不致破坏联合，必须突出他们中间的团结因素，

而不是突出分裂因素。奥艾尔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说，人们要纪念他的活动，最好莫过于在他的墓碑上写道：“奥艾尔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调解和消除工人运动中出现的矛盾。”这完全是从实际政治的意义上说的，来源于对实际政治的需要和任务的深刻认识。

但是理论的任务则不同。它要造成明确性，这需要首先把彼此相似、但实际上不相同的东西分开和区别开来，突出造成分歧的因素，而不是突出共同的因素。由于把相似的东西（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是相同的）混淆和混合起来，就产生最糟糕的混乱和误解，这也影响到实际政治，在那里造成幻想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败或力量消耗和弯路。没有临时的妥协，没有尽管相似、却是不同种类的成分的联合，实际政治是不行的，党愈大，它的实际任务愈重要，就愈不能没有这些。但是，伴随实际政治的理论愈是尖锐地突出这些成分中每一个的特性，愈是使人明确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实际政治在这条很滑的道路上就愈不会摔跤，就愈能稳步前进。调解和消除矛盾对于实际政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它对于理论来说却是死亡。

因此，尽管理论和实践非极其紧密地互相依靠不可，然而它们有时会互相发生矛盾，双方都因此感到不愉快。但是，我认为一个科学杂志编辑部的职责是，不让这种不和谐妨碍自己去履行说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我向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理解一个科学的党刊的任务，将近二十年之久我在《新时代》编辑部所遵循的制度就是根据这一观点建立的。1884年我第一次在这里表述了这一观点，那时我把马克思主义同洛贝尔图斯主义区分开来，我现在仍然象过去那样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尽管对于理论来说，区分相似的、但不相同的事物是多么重要，这并不是理论的唯一职能。只有当出现一种新现象，我们必须对此表明立场时，执行这一职能才是必要的。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繁荣和危机互相交替一样，

在我们党内自我批判和争论的时代也同实践和理论领域中联合创造的时代互相交替。我们希望，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已经使自我批判和争论的时期告一段落，并开辟一个齐心协力共同工作的时期。随着争论的终止，争论的语调也将终止，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今年的党代表大会将不仅给党，而且给党的科学机关报带来一个内部和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所有的同志将重新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机关报并加以利用。

发表于1901年10月2日。译自《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1期第13、16—20页。

奥·倍倍尔 卢卑克党代表大会的反响（摘录）

（1901年10月23日）

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举行了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这些大会事后在党内和党的报刊上得到的评价，没有一次象卢卑克党代表大会所得到的那样互相矛盾。有一部分评论是很激烈的。一些人差不多无保留地承认它的成果，另一些人则截然相反，差不多无保留地谴责它。然而，有一些批评家却置身于两个极端之间；这个人所赞扬的，那个人则加以指责。

.....

卢卑克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如此激烈，常常象戏剧一样激烈，这也使许多人极为惊讶。他们本来以为讨论的过程会是平心静气的，或者甚至是令人发困的，至多在讨论泥瓦合同工事件时才会生动活泼起来。而结果却完全不一样。因此，甚至现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在回想起卢卑克时觉得这不是真实的，而是象做了一场梦，他们还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感觉。

这些人正是完全没有注意到最近四年中发生的事件对党所起的心理影响。我们愿意承认，从汉堡党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在这四年中经历了一系列意见交锋，而且还看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令人讨厌的现象，这在党内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是在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最激烈地互相斗争时也没有。当时他们公开地，十分自觉地作为对手互相对峙，战线是一目了然的，斗争的目的是简单明确的。但是，从汉堡党代表大会以来，我们不得不接二连三地讨论一批著名的党员同志的观点、言论和立场，这些观点、言论和立场往往同迄今党所采取的立场背道而驰，并且

使广大党员深为不安。所争论的问题，有一些在那以前是人们认为不可能发生争论的。不仅如此。敌人利用这些分歧的观点和发表出来的不同意见取得了好处和损害了党，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他们的正当权利。由于这一切，在广大党员中产生了一种痛苦的、不愉快的感觉，这种感觉终于设法表达了出来。从这里，而且只有从这里，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卢卑克赞成那些表示不满的决议案。

我劝告对卢卑克的会议进程不满的那些党员同志务必根据这里论述的观点来观察一下在卢卑克发生的事情，他们也许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们党处于敌人、而且是死敌的包围之中，为了获得成果和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迫切需要坚定的、团结的和统一的行动，所以我们党比任何一个党更不能长久地容忍如下的情况而不受损害：自己的原则基础和策略基础不断受到怀疑，并出现一种批评，这种批评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进行这种批评只是出于对批评的爱好，而不考虑要在四面八方同时进行斗争的党的地位。

还有一个情况加剧了不愉快和痛苦。多年来我们注意到，一部分敌对的报刊是通过一种方法来了解党内情况和党的人事情况的，只是由于一些知情的或著名的党员同志在社交场合或咖啡馆和饭馆的交往中泄密，这种方法才能够获得成功。我们不想规定我们中的任何人应该同谁进行社交往来，但是当然可以要求最普通的同志也具有党员的礼貌观念和分寸感，对知名同志的要求则是加倍，要求他们在同敌对的记者（譬如这样说）、有时是思想倾向可疑的记者进行社交往来时不要用不友好的、甚至是嘲笑和侮辱的话来评论党内事务和党内的人员。敌对方面贪婪地吸收这些评论，只要有机会，不管是否合适，就拿出来反对我们的党。这些党员同志的这种态度不会使一个正派的、有思想的对手产生对他们个人和对党的尊重，这一点是不

用我说的。上面提到的事情是我在党的生活中所经历过的最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之一。

.....

卢卑克讨论过另一件事，后来在为了报告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情况而举行的各种集会上这件事仍旧起作用，这就是《新时代》的编辑部和内容。特别是福尔马尔同志在慕尼黑的一次党的集会上就这一点坦率地发表了意见。其中有这样的话：考茨基干什么都行，只是不能当编辑。他太片面了，根本不能评价别人的观点。他走得那么远，几乎把《新时代》的所有撰稿人都吓跑了。人们开始对《新时代》漠不关心了，有人说：如果我不是非订阅它不可的话，我就不订阅它。我们中间愈来愈多的人产生了这种感情。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月刊》会这样深入党内的原因。《月刊》是一个自由论坛，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发表自己的意见。既然把《新时代》的精神搞成现在这样的那个人仍旧留在自己的职位上，《月刊》的情况也就不会发生变化。

这些话引自《慕尼黑邮报》关于福尔马尔出席发言的那次慕尼黑集会的报道。我了解，福尔马尔特别在不久前《新时代》发生了那个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对《新时代》生气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生气的理由。但是这也促使他过分夸大其词和采取不公正的态度。前面引用的他的那段话的最后一句甚至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要考茨基还当编辑，就别再想福尔马尔为《新时代》撰稿。这首先是个人方面的因素，但也是公务方面的因素。《新时代》是党的正式机关报，而考茨基是它的正式编辑。如果在某一位或某一些党员同志看来考茨基不适合当编辑，因为他们认为他不称职，那么他们可以建议撤换他。但是，如果因为他是编辑就不给撰稿，那就是损害党的利益，而且不符合他们方面坚决要求的言论自由，考茨基是同其他人一样有权利要求这种自由的。

说到考茨基当编辑的资格，考茨基也许是最不会把自己设想成理想编辑的人。即使承认考茨基不是理想的编辑，其次，即使承认他犯了错误，从而侮辱了他的这一位或那一位撰稿人，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对党的正式机关报进行抵制，并宁愿支持一个处于党外的刊物。

相当多的一批著名的党员同志这样做了，这是组织涣散的一个表现，这也是我在本文中提到过的不和谐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由于缺乏团结感和同志感情。而上面的同志带头这样做，就使事情更加糟糕。

如果《新时代》编辑部引起人们的不满，那么申诉人可以采取适当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申诉和要求加以纠正。如果做不到，那时才会产生是否现在可以诉诸一个处于党外的刊物的问题。但是，人们对这个新刊物表现出来的那种热心表明，原因与其说是《新时代》的坏编辑——他现在充当了替罪羊，不如说是想在写作方面摆脱党的监督的倾向。

请设想一下，如果《新时代》上所发生的事，也发生在其他的党的刊物上，那么我们会怎样呢？我们的对手对于有利于他们的一切都十分敏感，他们也认识到这一形势充满矛盾，并且认为，通过损害《新时代》来支持《月刊》，是反对不仅在《新时代》中、而且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的一个宣言。似乎有一个新的党起来反对老的党并企图从外面战胜老的党。

能够写出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东西，而没有引起相应的抗议，这也是党在最近几年中不得不容许老的、起领导作用的党员同志做出的许多怪事之一。这种种事情有朝一日会产生自己的后果，对此是用不着奇怪的。

福尔马尔把奥艾尔关于在下次党代表大会上举行不公开会议的某些言论解释成这样：这就是说，会在一定条件下举行不公开的宗教裁判。由此可见，福尔马尔对于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的看法是多么错误。

在党内所存在的意见分歧中，奥艾尔站在福尔马尔一方的时候，比站在譬如说我这一方的时候多得多。我这样说，并不是泄漏什么秘密。但是，因为福尔马尔及其志同道合者正是怀疑我这一方有举行宗教裁判的意向，这一来奥艾尔就在无意中帮了我的忙，甚至是反对他自己了。我相信，只要指出福尔马尔的疑虑会得出什么结论，就可以使每个人看到，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我向福尔马尔保证，如果党内有哪一个（即使是我）认为必须举行所谓的宗教裁判，那么，既为了提出控告的那个人或一些人的利益，也为了被控告的人的利益，并且为了全党的利益，我将认为完全公开地进行讨论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按照这一看法采取行动。在一个得到数百万人支持的、每日每时遭到无数敌人批评的党内（对于这样一个彻底的民主政党来说，完全的公开性就象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似乎能够不公开地举行所谓的宗教裁判，这种想法只能来自有脱离党的内部生活的危险的那些人。

要说对于党的基本观点或策略的意见分歧除了完全公开地进行讨论外，似乎还可以采取别的办法，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

·发表于1901年10月23日。译自《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4期第100—105页。

爱·大 卫 回顾卢卑克（摘录）

（1901年11月）

.....

最后谈一谈理论上的学理主义和理论上的批判主义之间的斗争，关于这一点，后者的代表们可以满意地回顾伯恩斯坦论战的经过和结局。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原理毫无例外地进行无条件的批判检查的权利重新正式地得到公认。科学的怀疑不必羞怯地退缩，它有充分的权利今后也在公众面前履行自己的十分有益的职能，即抵制人们可以理解的那种使理论僵化的倾向，甚至不惜冒这样的危险：偶而使胆小的人们忧心忡忡，并且使思想懒汉感到烦恼。只要事后有益，起初的愤怒同这比起来就算不了什么。

社会主义理论不能构成科学理论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外。正因为社会主义自命是科学的理论，并且应当愈来愈成为这样的理论，所以它服从总的科学发展规律，而科学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真理法典，相反，它通过从认识到怀疑、从怀疑到纯化了的认识这样不断改造的过程向前发展。只有“天主教的科学”把承认某种永恒真理当作一切研究的出发点，要求发生怀疑的研究者牺牲智慧，也就是在“寂静的小室中”压抑冒上心头的批判思想，施塔特哈根正是劝告进行深入的科学探讨的同志们这样做的。

面对这样一种令人屈辱的劝告，正式承认无条件地批判党的理论的权利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有人说这个权利是从来不成问题的，这种说法根本不对。党内有相当一些人，他们赋予纲领绪论中的条文以无可辩驳的真理的性质，对于这些真理是不

可以批评的。还有不少同志认为，伯恩施坦对一些原理的批评攻击使他丧失了做党员的权利。通过适当的决议在道义上迫使他退党的意图已经相当公开地表现出来。而在卢卑克却再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了。

由于伯恩施坦的批判性著作、特别是他在柏林大学生联合会作的讲演受到了歪曲，在一些不从事科学工作的同志和他之间产生了猜疑的迷雾，但是伯恩施坦本人的态度已足以驱除这种迷雾了。大部分代表很快就确信，新的伯恩施坦仍旧是那个诚实的老党员，他对党的一切批评都是出于为共同的事业服务的真诚愿望。给伯恩施坦投不信任票的气氛被破坏了，要求伯恩施坦撤回他对党的纲领和理论的某一个“异教徒”观点的倾向也不再存在了。

已被通过的倍倍尔决议也同上述两种倾向无关。有人企图把这一决议说成是不信任投票，倍倍尔自己却明确声明，不应当把它看成这样。为了避免引起这样的猜疑，即似乎要禁止伯恩施坦从事批评活动或者把他的批评活动的成果污蔑为有害于党的异端，决议一开始就说：“党代表大会无保留地承认自我批评对于我党在思想上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①

由此可见，在这里不仅宣布了自我批评的权利，而且宣布了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从倍倍尔在卢卑克的发言中明显看出，他并不是想说几句漂亮话，他是非常认真的，是说了就要做的。他在发言中谈到了修改纲领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仅是一个实际行动的党，而且也是一个理论的党，是一个经常研究自己的情况、注意时事和社会中的变化的党，此外没有一个党是这样的。否则我们就不会在三十年中已经有了第四个纲领，再过几年，我们就会有第五个纲领。我不同意海涅的意见，他认为我们目前的纲领还要原封不动地保持

^① 见本书第419页。——编者注

好多年。不对，我觉得这件事有点更加急迫了。在纲领的基本观点不断受到批评和怀疑的时候，我不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纲领投入战斗。我一点也不反对我们在明年成立一个修改纲领的委员会。”^①

党的报刊也时常发表这样的意见：似乎今后在理论批评方面会出现暂时的静止状态，从倍倍尔的话看来，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马德堡人民之声报》在提到上述倍倍尔的话时说得很对：“如果应当检查某个基本原理是否有效或是否成立，那就需要进行仔细的长期的批判研究，这种研究伯恩斯坦已经做了一些。因此，在伯恩斯坦问题上实质上是一切照旧：伯恩斯坦和其他人将要并且应当继续进行批评，这对党的进一步发展是有益的。”

卢卑克大会外面的人起初认为倍倍尔的决议是谴责伯恩斯坦进行批评这件事本身的，并因此认为伯恩斯坦的最后声明是一个思想上表示屈服的行动，这种看法完全是由一篇不完备的和歪曲了的报道造成的。这篇报道在其他问题上也很令人讨厌。伯恩斯坦的声明开头一句话就说：代表大会的裁决不能使他对于自己的信念产生疑惑。^②这句话丝毫没有减少人们对这个声明的热烈而广泛的欢呼。

《哈雷人民报》评论说：“应当不厌其烦地强调，引起人们不满的并不是伯恩斯坦对社会主义许多基本问题的不同意见本身，而是这一事实（当然他是否否认这一事实的），即他在最近三年中总是片面地仅仅攻击我党的理论基础，却没有同样程度地用他那广博的知识去攻击资本主义社会。”

倍倍尔提出谴责的理由也正是他的决议中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代表却不加批判”。如果考虑到伯恩斯坦由于他的书而在写作方面陷于什么样的处境，那就要说这一谴责是彻

① 见本书第445页。——编者注

② 参见本书第457页。——编者注

底错误的，因为它是片面的。伯恩斯坦不断遭到攻击，因此不得不不断为自己辩护。他的辩护自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但是除此之外，他还在文字方面和鼓动方面参加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尽管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倍倍尔本来应当根据伯恩斯坦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解释把他的决议的这些部分删去。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他至少得公正地插进一些必不可少的话来提到反面的意见，而亨·布劳恩的决议却预先考虑到这一点。可惜布劳恩的决议在表决时没有放在它逻辑上应当处的次序，也就是在海涅的决议和倍倍尔的决议之间，否则它恐怕会通过

的。

于是，倍倍尔的措辞中的不公正的片面提法就被提到决议的高度。但是伯恩斯坦可以用《士瓦本哨兵》在它对党代表大会的评论中说出来的那一思想来安慰自己：“正义出来主持公道了。党的代表大会——固然不是通过决议，而是在争论中——也对那些反对伯恩斯坦的批评并且在防御时搞过头的人刮了一下鼻子。”鼻子甚至是刮了好几次，而且不是很轻的。

关于这一点，《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说：“德国同志通过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这样一些人表现出来的专横态度应当受到有力的驳斥。那些人企图使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开导和拯救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行动袖手旁观，那么我们大家最后都要蒙受耻辱。如果在这次争论中说出的言词过分激烈，也许使挑起争论的人自己听了不高兴，那么但愿这恰恰能使帕尔乌斯和卢森堡同志明白，广大党员对他们的行为多么不满。”

另一些党报一字不差地同意这个评论。帕尔乌斯本人却不在乎。他在《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工人报》上的一篇标题为《略论“屈辱”》的文章中说：“就我这一方来说，我没有什么可撤回的。我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一文中所作的那些描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包含任何超出党内政治斗争范围之外的内

容。”

一位可怜的无辜的人，他本来应当受到最崇高的赞扬，却受到人家的责难！且让我们听听他自己怎样描写自己的功绩吧：“人们也不能责备我挑起争论。1897年我由于从事实际的日常工作而采取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立场。我是孤立的，受到侮辱，被人污蔑为好争论的人，受到驱除出党的威胁，因为伯恩施坦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但是事态的发展表明，我这一次对党的利益看得比较清楚，而伯恩施坦的朋友们不得不相继表示反对伯恩施坦，当我看到这一讨论已不再绝对必须我参加时，我就走开了。”——是的，是的，事实正是这样。你们不妨回忆一下：的确是这样！当凶狠的伯恩施坦向党的理论挑战时，这些平时如此勇敢的社会民主党精神战士浑身颤抖得多么厉害！他们吓得面如土色，站在那里，谁也不敢接受这个挑战。理论似乎完了，党似乎也随着完了。在这个可怕的时刻——看，这位救命的骑士突然冲进战场！他是孤立的，受到侮辱，被人污蔑为好斗者，受到驱除出党的威胁！因为伯恩施坦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他满不在乎地抵抗着所有这些危难，向敌人冲去。交锋开始了！当魔鬼伯恩施坦被打得半死落下马来，“有势力的朋友”掉过头反对失败者时，得救的人们由衷地欢呼起来！于是这位骑士，帕尔乌斯，我们的帕尔乌斯，帕尔乌斯大帝——他是那么谦虚地站到一旁，让懦夫们向被打昏了躺在地上的威吓者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使他们还能捞到一些桂树叶。——这段伟大历史的回忆的确是一个美妙的故事。这样的一种谦虚则是更加美妙。但比前者和后者都更加美妙得多的是这位伟人十分体贴，他竭力避免伤害他的男女战友们的感情。多么动人呵！

还是回到卢卑克吧！说到表决本身，考茨基满意的是，这次表决使人“清楚地了解”党内不同派别的“力量对比”。可惜还不够清楚。有一个派别没有具体地宣布赞同伯恩施坦的批评

活动的所有成果,但是对此没有任何反感,而是对伯恩施坦深切同情。对海涅提案(108号)的表决是说明这个派别力量的最好证据。他们有七十一个人,其中有些人是很有名气的。在出席会议的四十个国会议员中,有十八个人,也就是几乎一半,投票赞成海涅提案。对于这样的结果,伯恩施坦无论如何可以感到满意了。至少在伯恩施坦的朋友当中,从未有人事先料到,面对倍倍尔凭他那雄辩的口才和他的威望的全部力量提出的控告,会有声势如此浩大、意义如此重要的一个少数派。

但是可惜对立面即激烈派没有能够计数。他们草拟和提出了用以阻止“修正主义活动”的柏林决议和图林根决议,倍倍尔决议要求不讨论上述决议而转入下一议事日程。伯恩施坦的朋友通过投票赞成海涅决议而否定了倍倍尔决议的理由,并从而正式阐明了他们的观点,在这以后,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即通过转入下一议事日程而排除更激烈的提案,不得不拥护这一决议了。而不信任决议案和禁口决议案的起草者和支持者却不得不在第二次表决时投票反对倍倍尔决议。由于累德堡对倍倍尔决议案的解释在表决之前被倍倍尔本人否定,他们就更加不得不这样做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投票赞成不讨论他们自己的提案而转入下一议事日程。人们不能要求更多的东西了。

由于这种自杀行为,我们丧失了有趣的第三个数字,这个数字本来可以使我們确定左翼在整个伯恩施坦问题中的力量。有关对手大部分退到大批中间派的队伍中去了。直到最后仍旧反对倍倍尔决议的那三十一票恐怕都是伯恩施坦的朋友投的,他们在表决时更多地是出于对伯恩施坦的友情,而不是出于对108号决议案被否决以后会议上出现的形势所做的合乎逻辑的考虑。

不过这种根据数字来判断思潮的做法没有多大价值。不算其他的偶然性,单是党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地理位置对数字就有很大影响。主要的问题仍旧是,各种思潮最后在总的趋势中

取得了一致。我们也认为这是卢卑克大会的主要成绩：通过这次大会，所有的种种不和谐都最后消失在普遍满意的情绪中了。

对于一个党代表大会来说，看到会上出现一系列矛盾并且互相攻击，是不愉快的。即使争吵的人在发怒时仍旧彬彬有礼（在卢卑克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也会暂时引起非常不愉快的情绪。但是，当人们感到所有这些骚乱丝毫动摇不了自然形成的统一基础时，人们就更加心满意足了。

清楚地看到党内存在的矛盾并通过公开的辩论解决这些矛盾，这是很必要的。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党代表大会为了对外保持和谐一致的假象而压制这样的辩论和斗争，情况会是怎样。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加深党的分裂或瓦解，那就是这种做法；反过来说，维护一个伟大运动的统一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在这个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矛盾公开地决一死战。只有这样才能使矛盾得到和解并逐渐地被克服。

结果将永远是团结感加强了，纯化了。这一次在卢卑克大会以后，我们就有这样的感受。现在论战消失了。我们将排成密集方阵前进，热情洋溢地去完成把我们大家结合在一起的伟大的实际任务。

发表于1901年11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1年第11期840—845页。

爱·伯恩施坦 党的纪律和对信念的忠诚（摘录）

跋

（1901年11月）

.....

我不想在这里对会议就所谓伯恩施坦问题作出的决议进行事后的批评。我认为必须提出的反驳这个决议的意见，我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经扼要地讲了，因此，就我这一方面说，争论已经结束。下面所写的不是为了争论，而只是阐明我个人对决议性质的看法，并且说明我为什么和在什么意义上准备并决心遵守决议，尽管我曾经表示反对它。

我预先声明，我认为，党的卢卑克代表大会的109号决议，从字面上看，它的涉及个人的部分是建立在一个错误前提上的。它开头很好，接着就用一个“但是”引出一个句子。这句话说到一件同我有关的事实，我已经否认这是真实的，现在还要否认。就这一点来说，我不能同意这句话，人们不会再责备我这样做了吧！

在参加表决这个决议的二三八个代表中，有二〇三个代表投了赞成票。即使从他们当中除去那些在一项对我有利的决议案被否决之后出于策略上的原因——考虑到现在这个决议的开头一句——勉强投赞成票的人，那么无论如何——我对这一点丝毫不抱幻想——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代表，他们并不是不管这个决议的第二部分而投票赞成它，而是为了这个决议的第二部分才投票赞成它的，对于他们来说，恰恰是第二部分才是决定性的部分。我不得不说，我对这种情况感到很遗憾。但是，这种

决议并不需要——或者不仅需要——人们对之表示惋惜，而首先是需要被人理解。

那么这次起初无法解释的表决怎么会又变得可以理解了呢？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大多数投票赞成决议的人与其说是把它理解成一项判决，不如说是理解成一种情绪的表现。有许多事实能够说明这一点，这些事实一部分是我在私人交往中，一部分是我作为一个细心的旁观者有机会看到的。只举一个例子：在投票赞成 109 号决议的代表中，有一些人在预算问题上恰恰代表了那种被认为纯粹“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伯恩施坦主义”，在这里就不必进一步研究了。在另一个场合：人们认为对我提出一项建议（其中包含了对一位政治家能给予的最大信任），同投票赞成倍倍尔决议是并不矛盾的。类似的例子还有。我根本不能认为，投票赞成 109 号决议的代表会对我和另一些人不惜蒙受“对党进行完全片面的批评”这一指责而提出的那些事实干脆置之不理。我宁可认为，对于他们——包括提案人在内——来说，关键在于决议的指令性质，而不是它的字面意思，而他们在表决时并不怎么注意过去，而首先是注意未来。

所以对我来说，接受这一决议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观点来说，尽管我不得不反对把这一决议当作一项判决，但是我过去和现在都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情绪的表现心平气和地接受，并且声明我准备给予它理应得到的尊重和重视。

人们从某一方面考虑，认为必须在我表示上述态度的声明中发现某种模棱两可的意思，必须指出选择“理应得到的”一词是暗藏着一点恶意。他们说，当人们想要对某些人表示不敬时，就在信的最后写上“向您致以应有的敬意”。

瞧，这个对比简直无聊透顶。我既然已经公开说出了我对决议有哪些指责，那么过去和现在都再也没有丝毫理由对决议

抱什么恶意了。但是决议倒是要促使党员们就这件事抚慰一下自己的民主良心，好好想一下：你能够既履行决议的要求而又问心无愧吗？

我一贯认为，没有严格的党的纪律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党内生活。凡是读过我以前和最近的文章的人都会发现，我一再坚决地强调这个思想。我还在《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这一演讲中——这次演讲受到许多批评，不过我认为这些批评大都是错误的——强调了这一个思想，尽管我承认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战斗的党，也和任何政党一样，有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排斥异端。最近我在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结尾用了我在1898年说过的一句话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党，社会民主党是某种利益的捍卫者，因此在某种限度内“可以坚持教条，甚至排斥异端”。不懂得这个道理或者不愿意服从这个道理的人，就信念来讲当然仍旧可以成为好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从此就不再属于党组织了。当然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这些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多半也是很有限的。

由此可见，如果我仅仅因为我不满意一个会议（它的合法组成是丝毫无可怀疑的）经过充分讨论以多数通过的决议就拒绝尊重它，而这种尊重是民主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给予多数的尊重，那么我就会是自打嘴巴。尊重不等于盲目服从。我可以尊重一个意见，即使我不赞成这个意见。我可以尊重一项我以前出于某种理由不得不反对的决议，只要这一决议不是无理地强迫我牺牲信念。说到撤回自己的信念，毕竟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一限度党的权利就不起作用了。健全的党内生活需要行动一致，同时也需要独立的思考和坚强的信念。如果党的决议侵犯了这一点：如果党把纪律要求发展成盲从，那么自尊心当然可以命令我们不接受这个决议，这时另一种义务即忠实于自己的信念的义务就会出来同党员对于党的义务平等地相对抗，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作为更高级的义务相对抗。因为我

们在成为党员之前，本来是普通人，而人对于自己应尽的最崇高的义务就包含信仰的坚定性。这种品质是如此重要，完全可以说，没有这种品质，也就没有健全的党内生活。有的时候，为了党的利益和为了党的健康发展，不服从党可能是有好处的。

目前这种情况存在吗？请看一看109号决议案，再看一看109号决议案宣布不加讨论就转入下一议程的那些决议案，就可看出，这是根本谈不上的。谈到目前这件事，如果说这是什么卑躬屈膝，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可笑的说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加对党不公平的说法了。把表示愿意尊重决议的声明解释成可耻的放弃信念，这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是极端卑鄙的。而一些敌对的报纸和一位代表，当然是那位累德堡^①同志，正是这样做的。

这个决议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呢？要求我在批评时，或者说在批评活动中减少片面性：我不应当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党。我认为，我根本没有这样做，但我能够理解，似乎我是这样做的印象是怎样形成并且确定下来的。首先，如果某一个人为形势所迫而脱离了日常的直接斗争，不得不更多地从比较广阔的历史观点、而不是从现实的观点来观察事物，那么这个人同处在战斗中的某一个人比起来，与敌人周旋的机会也就较少，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这还不算，这个人现在又碰到了这样的境遇：敌人或哪怕只是一部分敌人喜欢利用他来反对他自己的党，有

^① 当党代表大会上提到上述事实时，累德堡同志以极不必要的愤怒斥之为闻所未闻的“谣言”。说一句诬蔑人的话和公开支持这种诬蔑当然是两回事。但是，一个人既然大声说出毁谤人的话，弄得周围的人都听见了，那他是没有权利抱怨别人把这件事公之于众的。

乘机机会，我还要说明，在本文作者进行某些阐述时有人“哄笑”，这通常是由紧挨着记者席坐着的几个人发出的，其中以累德堡同志的声音最响。要不是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恰恰是累德堡同志）企图从上述“哄笑”中捞取政治资本的话，我是不会提到这件小事的。——伯恩施坦注

这些话在他来说决不是对党的批评，至多不过是针对党内出现的某种思潮的，这些话却被敌人一再宣扬和夸张，使某个第三者可以很容易地认为，他本人是处心积虑地对自己的党发泄不满。最后，有些著作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扩大党的知识，但是人们并没有考虑到这对于搞理论工作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倾向，却一开始就以“呵，他又来反对我们了”这样的感情来对待这些著作。要知道几乎每一种新的认识都是对迄今有效的认识原理的一点修改。

就这样，一些既不涉及党的实践也不触犯党的任何理论基础的话被敌人歪曲成动摇基础的“自白”，并且因此也被同志们在一时的惊愕中看成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些话也受到同样的对待，这些话既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我也没有把它们当作新东西说出来，只是在某一次阐述问题的过程中提到它们，正如人们在论证中一般要引用某些已知的定理一样。但是，根据某种表面的情况，就把这些话说成是，似乎我通过它们宣布了某种新的真理似的。

应当怎样对付这种情况呢？每次都跟在后面提出纠正吗？这是多么费时间而且——天呵——如此毫无结果的工作啊！为了反驳对我的著作的倾向和性质的一些离奇传说，我把手指都写痛了，而且是尽可能写得清楚的，效果却很小，离奇的传说仍旧逍遥自在。

当然，我应当承认自己在某一点上犯了错误。这就是我更加关心同自己党的成员进行争论，而不是同敌人争论。但是这仍旧是由整个形势造成的。如果我们的政敌对我们的著作的内容和倾向作了错误的解释，我们固然可以因此同他们进行论战，但是他们如何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来评价这些著作，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对作者来说，不管这种评价是否使他满意，他都得忍受。有人指责我说：我默默地醉心于敌人的赞赏，却没有起来斗争。但是我必须向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们说明，我对于来自敌

人方面的否定性批评和赞美所持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

这并不是说，我对一切关于我的评论都漠不关心。硬要这样说，那就是一种低级趣味的矫揉造作。不，任何一个作家要想无愧于自己的才华，都要争取而且必须争取别人对他的承认。当然首先要争取自己同志的承认。但是不管政治矛盾多么尖锐，也还有人认为甚至政敌也应当重视对立一方的意见。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他的工作领域中被对手尊重。让我们的争论摆脱虚伪的空话吧。谁会因为敌人写到他时说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而发怒呢？谁曾经禁止他的出版商把敌人赞扬他的评论登在他的著作的广告上呢？追求敌人的赞扬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我想，敢于如此责备我的人还没有出现呢！

我不想装出一付无所谓的态度，这不是我的本心。我坦率地承认，内行的敌人的评论我不是毫不在乎的。我仅仅认为，没有特别原因就抓住我不喜欢的评论而展开论战，这是不合适的。

当然，倍倍尔在提到《法兰克福报》对我向大学生们的演说所作的评论时曾经说过，这一评论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作为党员本来是不应当回避这一机会的，本来是绝对必须对《法兰克福报》的评论给予反击的。后来我仔细读完了他引用的话，它说了些什么呢？它说，《法兰克福报》赋予我一项使命，要我做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毁灭者，我的演说却把这一使命完全破坏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承认这一使命，相反，我曾多次拒绝，尽管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解释抱反对态度。因此《法兰克福报》的责备（说我粗手笨脚，通过演说把“使命”破坏了）怎么会使我激动呢？作为理论家我能够忍受谴责，作为党员我并没有因此丝毫受到影响，因为党的任何政治利益、任何原则和任何要求都没有发生问题。《法兰克福报》的批评这一次只是涉及我个人，敌人对我的其他批评大部分也是如此。因此，我不去过问这些批评，而首先是试图同自己阵营中的批评者进行争论。

这在我看来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要把某些批评者除外，这些批评者的语调和~~方法使被他们攻击的人无法同他们进行辩论。~~^①

① 这句话适用于帕尔乌斯在去年《新时代》的最后几期发表的针对我的文章。这一次我当然不能对有关文章根本不加理睬。这些文章在卢卑克党代表大会上遭到尖锐的斥责，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刊登出来了，这些文章提出的论断流传国内外，读者们绝对不可能检验它们的正确性。考虑到这一点，我有必要挑出两个观点并通过它们揭露整个文章是什么货色。

一开始（从740页到741页），帕尔乌斯说，我“十分可怜地”抱怨自己上了考茨基的“当”，竟“公开了”我的观点。“谁还能想象出比这位党的改革者，这位国际社会主义的开拓者的处境更可笑的情形吗”？读了这些话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真的在什么地方发出过如此荒谬的怨言，何况帕尔乌斯还厚着脸皮在一条注解中补充说：“而且伯恩施坦在这里歪曲了事实”（参见本书第401—402页和402页注①。——编者注）。事实上，全部叙述彻头彻尾是缺乏任何现实根据的捏造，而我讲的话和我写的文章没有任何东西给这种捏造哪怕提供一丝一毫的理由。

他歪曲了我关于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阐述，这一点我略去不提了，因为在一条注解中说不清楚，现在说读者同样无法检验的第二个观点。

当我的品格由于上述伪造而受到轻蔑，我目前的著作由于受到歪曲而被人称为毫无价值以后，那就必然要轮到~~我过去的著作了。~~这些著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篡改的。于是帕尔乌斯在745页和以下各页推断说：也许我以前写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来自恩格斯的。从我以前——慎重地然而零星地——发表的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我遇到重要的事件“乐意向恩格斯请教”，至于恩格斯经常写一些多么详细和指示得多么出色的信，这是大家知道的。就是说，这只鸟是用恩格斯的羽毛装饰起来的……

对于这种文字上的花招，应当怎么办呢？在有些问题上，例如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爆发争论，而我听到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抱怨时，我把向恩格斯询问他对这些事情的态度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义务，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写文章或成组的文章时，利用我同恩格斯的友好关系来向他提出这类问题，——难道我应当这样回答吗？除了头两年，我们的通信根本不是频繁的，1884年以后几乎完全停止了——难道我应当这样回答吗？难道我应当把恩格斯本人抬出来作为证人反对这些诬蔑吗？他给我的信四分之三是对我写的著作的事后的评论。我写给恩格斯的信件还锁在他的遗稿中，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我究竟有多少次用这种方法利用他的友谊，难道我应当引证这些信件吗？

然而为什么要愤怒呢？我从来不隐瞒我从恩格斯那里得到许多很有价值的教导和富有成果的建议，正如我一直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

同自己阵营内意见不一致的人进行的这种争论将来是否会大大减少，当然无法预言。在一个象社会民主党这样大的党中，除了日常斗争之外，总还是允许进行理论讨论的，谁也不希望这种讨论消失。但是将来的情况同过去的情况会有所区别，区别在于这种争论的本质和针对性。争论在这两个方面都将比它来自国外时更加明确，这将使它摆脱许多从前使一大批同志感到不愉快的东西。我为了不得罪任何人，曾经努力避免涉及个人，但这种做法给我招致的攻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所以，在被认为是对党的批评中有很多将自动消失，批评者实际上却并不因此就需要哪怕丝毫放弃过去和现在他十分关心的事。那时还要加上参加日常斗争（为此是不需要任何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的自然反作用，因此，被称为“对党的片面性批评”的这种危险就会大大减少了。

可见，109号决议实际上要求的事情很少，而且它所要求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需要牺牲任何批评的欲望才能做到的。我说的不是观点，因为一刻也谈不到放弃观点。我在这里也不能作任何许诺，因为尽管我在德国发现许多具体情况同我从远方所看到的不一样，但是运动及其发展条件的总的面貌同仔细阅读报刊和其他材料的人从国外所看到的情况毕竟没有重大

派一样。可见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也不是说我对自己的著作评价特别高，认为自己必须无条件地捍卫自己的声誉，把自己看成这些成就的独一无二的作者。在我们写的文章中究竟有多少是自己独创的思想的成果呢？有时我们被我们构成自己的思想系列时的那种表面情况所迷惑，竟会有片刻想象我们是有创见的，但即使在这种时候，我们有创见的情况也是多么少啊！不，我在这里关心的不是有关著作的微不足道的道义上的作者身份。我从来没有特别夸耀过这一点。我认为重要的只是在这里揭露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从这一方面着手对某种令人不愉快的观点在文字上的代表人物进行全面的诽谤。这种方法的厚颜无耻是一看就知道的，然而要判断它卑劣的程度则需要了解情况，而这一点是几乎谁也做不到的。因此，请大家原谅我离开正题来谈这些个人问题。——伯恩施坦注

差别。

最后要谈一谈批评活动问题。某一方面的人责备我缺乏坚定性，因为我自己没有提出修改党纲的建议，而倍倍尔却毫不犹豫地宣布了这一提议。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建议是由一个可以说是在火线上的人提出，还是由一个至今还只是在理论领域里工作的人提出，是大不相同的。适合这个人的事并不因此就适合那个人。后一个人也许可以更早地认识到从客观上说纲领需要修改，前一个人却更能判断，党内是否真正存在修改纲领的需要，什么时候进行修改最合适。随着分工也产生权利的划分。我也想到过提出修改纲领的建议，但是除了上述有关个人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实际的考虑阻止我提出来，这就是国会的改选估计已不远了。

但是人们在原则上将不得不听任这种情况保持下去：要就纲领的某些观点是否仍旧合适的问题事先进行调查研究，这是理论领域的工作者的事情，至于选择实际进行修改的时机则是战士们的事情。我坦白地说，虽然我有异端思想，但我并不急于修改纲领。我认为，对修改纲领的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最近几年的摩擦的反作用还太强，以致还不能假定所有的参加者已经可以毫无偏见地作出判断，而要想使这一工作有益处，这种判断是必需的。那么要修改的是什么呢？不是改变原则，因为不如说原则从一开始起就是确定的。也不是改变策略，因为纲领中不包含任何策略，策略是根据情况来决定的。剩下的就是修改关于现代发展趋势的某些提法，也许还要修改关于要求的那一部分的某几句话。这几句话的缺陷可以通过一些决议来弥补。从实际的斗争来看，修改有关发展趋势的那几句话还不是如此迫切的问题，不必急于从事，而从理论观点上看，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草草了事。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处在调查研究阶段。使它脱离这一阶段，以便在一旦进行修改时把工作做得圆满无缺，这是理论讨论的事情。如果能进行这样的讨

论，而不致使人认为这是“对党的批评”，那么也就可指望获得有益的效果了。①

发表于1901年11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1年第11期第847—853页。

①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一场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斗争的影响还在人们头脑中作祟的时候，在纲领问题上作出决定是多么危险。一些奥地利社会党人目前正在攻击一份讨论中的新党纲草案。他们激烈反对删去关于工人日益增长的贫困的那句话而用另一句话来代替它，这句话没有提到工人的无法证明的贫困化，而是肯定了这一完全可以证明的事实，即工人在社会财富的增长中分享到的份额很不充分。他们说这是向伯恩施坦的可耻的让步。幸运的是，或者如果有人愿意这样说的话，也可以说不幸的是，现在《新时代》上恰好公布了恩格斯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第一个草案的一封信，信中表明恩格斯也对纲领中的贫困一词不满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显而易见，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一直仍在流行的超马克思主义。要不也许恩格斯曾经是个隐蔽的“伯恩施坦分子”吗？这事值得研究一下。当心啊，执政官们！——伯恩施坦注

卡·考茨基 一万人的撤退

——对伯恩斯坦的最新序言和图尔
代表大会的一些评论（摘录）

（1902年3月19日）

居鲁士部队中的一万名希腊人曾经从小亚细亚向美索不达米亚进军，在库那克萨战役以后，他们从这里向黑海海岸后撤，这是一次著名的撤退。色诺芬^①写了一本书来叙述他参加过的这次行动，他把这本书定名为长征记（进军）。但是翻译这本书的人通常强调后撤（撤退），把它称为一万人的撤退。

这些天来谈的是另一个一万，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刚刚出版到一万册。问题是明摆着的：这是一次长征，一次不可阻挡的胜利进军，还是一次撤退的开始——修正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这本书起过十分突出的作用）退潮的开始？

伯恩斯坦本人当然不想撤退。他在新版序言中坚持他所说过的一切。序言着重论述的是他关于危机和有产者增加的意见。

关于第一个题目，我们很快将在另一个地方谈到，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谈伯恩斯坦在他的前言中关于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了。他的关于有产者增加的最新论述也用不着详加评论，因为这些论述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只是换一种说法来重复那些旧的错误。

.....

① 色诺芬（Xenophen 公元前约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编者注

在伯恩施坦的著作出版到一万册的同时，图尔代表大会^①举行了，这是独特的巧合——这里是提供理论，那里是对新方法的实践进行总结。

后者不是很鼓舞人的。米勒兰的试验完全破产了，以致连饶勒斯也不得不中断这一试验——在这以前我们德国的那些曾经大喊大叫为社会党员部长唱赞歌的人早已完全哑口无言了。

代表大会本身只是一次残余代表大会，不仅同巴黎代表大会相比是这样，而且同里昂代表大会相比也是这样。许多人缺席，他们仍旧留在里昂，忠实于总委员会^②。代表大会的讨论决不是令人高兴的。

.....

但是，新方法无非是对党的统一性的反抗；主张新方法的一派没有可以用来代替旧信念的新的统一的信念。它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只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对党内迄今流行的信念和策略的批判和反抗。这一派只能起瓦解作用。

在新方法已经实际上起作用（哪怕以前只是短时间）的地方，也就是在法国，已表现出这一点。党纪的松弛，以及随之而来的党本身的涣散，当然不是新方法的目的——它的目的肯定是最美好的——，却是它的结果。

首先在里昂，社会党员部长被置于党的监督之外，也就是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了。实际上饶勒斯派的议员们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议院中都是随自己的意愿投票的。现在召开了图尔代表大会。大会拒绝以随便哪种方式对议员的活动发表意见，并且创造了一种组织形式，这种形式现在也在党本身

① 指法国饶勒斯派同阿列曼派和可能派一起于1902年3月在图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会上宣布成立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章程。

——编者注

② 指1899年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在巴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总委员会，其中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占多数。——编者注

之内引起了分崩离析。

党的领导机构即总委员会，成了单纯的交流情报和进行调解的机构。每一个选区组织都实行自治，不听命于党的领导机构，可以随意行动。每一个议员只对自己的选区负责。

这无非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是适应追求议会席位的需要的。

我不久前已经指出（《新时代》第21期第671页），今天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冲击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社会成分，同国际^①内站在巴枯宁一边的那些社会成分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这种类似之处现在更大了：前者今天不得不采取后者追求建立的那种组织形式，是的，直到措辞方面人们都可以觉察到这种类似之处。人们在读到巴枯宁主义者和他们的朋友反对“权威主义者”和“下令革出教门的教皇”马克思、反对偏狭的总委员会等等的宣言时，不会不联想到今天的关于教条狂、宗教法庭庭长、军曹作风等等的发泄愤怒的话。

结局也将是同样的。一个社会党是不会在图尔建立的组织基础上兴旺发达起来的。代表大会确认了会前党内就已开始的瓦解状态，现在这一状态迅速发展了。

让·饶勒斯今后将同巴枯宁和多梅拉·纽文胡斯一起被列为党内的大破坏者，列为那样的人，这些人通过非凡的精力、智慧和献身精神为战斗无产阶级的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后来却违背了胜利前进的运动的趋势和基础，并且利用其对群众的巨大影响来诱使群众离开他们脚下的可靠基础，而去采取盲目的行动。

德国社会民主党当然可以怀着骄傲的心情回顾所有这些分裂和错误。它的纪律如此根深蒂固，它的关系如此牢不可破，以致自从党克服了早期的幼稚病以后，党内一切瓦解的倾向都成

① 指第一国际。——编者注

了耻辱。

在巴枯宁破坏了国际并且断送了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西部的运动的同时，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这两家为敌的兄弟却结成了可说是密不可分的同盟。

后来，在反社会党人法和德国的、奥地利的、法国的密探影响下，巴枯宁主义以莫斯特的形式得到了翻版，这时它使奥地利的、美国的和年青的英国的社会民主党分裂和变得软弱无力了，但是德国社会党不是这种情况。

到了新世纪开始时涣散的倾向又出现了，年青的成员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急于挫败反社会党人法而感到失望，这就助长了这一倾向。但是这时荷兰成了反抗的中心，多年来多梅拉·纽文胡斯使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严重地遭到了损害。德国给反抗运动提供了能干的先锋战士。尽管有这样的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却很快地解决了“青年派”。

曾经严重地打乱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最新方法，它的出现也没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损害。伯恩斯坦的《前提》的一万册出版时与第一版的一千册出版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了。第一版的一千册起了一枚炸弹的作用，它是一份宣战书，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些人担心这一时代会出现最坏的事情，另一些人则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无论是担心还是期望都没有实现。

他的第一万册《前提》所起的作用已不再是一份宣战书，而是一部曾经喧嚣一时的珍本著作。我可以泰然地看着你们出现，泰然地看着你们离去。这给人的印象好象是一场已在消逝的暴风雨最后的远远雷声。

一万册出版了。但是，根据图尔的经验它们不再能指望取得胜利。长征结束了，撤退开始了。

发表于1902年3月19日。译自《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25期第772、776、777—779页。

保·康普夫麦尔
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运动
的历史和理论（摘录）

（1902年5月）

伯恩斯坦的《前提》出版到一万册了。这一万册促使考茨基回顾了一下“伯恩斯坦分子”的修正主义运动。他在《一万人的撤退》那篇文章中说：“长征结束了，撤退开始了。”^①

不错，“伯恩斯坦分子”近来保持沉默。他们之所以沉默，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再说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打笔战打腻了，去采取行动了。他们懂得同志们关于“发挥你们的作用吧，行动吧”的严肃警告，他们对自己说：首先要行动。伯恩斯坦当了国会议员，艾尔姆比以前更积极地从事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大卫在黑森议会不疲倦地鞭策他的小战马并写完了他的农业问题巨著。

伯恩斯坦加了一篇谦虚的序言使第一万册问世了。对这篇序言反应十分平静。伯恩斯坦没有重新引起争论，他没有把他的一万册投入一场热烈的原则斗争。他冷静地把他的书拿给我们去进行详细的客观的检查。这种态度我们认为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在一个喜欢争吵的国民议会的炽热气氛中是不会出现科学的论证的。国民议会喜欢进行激昂的、各执己见的争论。但是，在这方面，当我们以科学态度严肃地寻求真理时，我们需要的是心平气和。我们要远远摆脱那种狂热的自以为是的可悲气氛。

发表于1902年5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2年第5期第345页。

① 见本书第491页。——编者注

爱·伯恩施坦
关于争论的争论（摘录）

（1902年5月）

.....

考茨基说出上述吓人的话^①的那篇文章发表在《新时代》第35期，题目是：一万人的撤退。这题目是同下面这个事实有关系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最近已出版达一万册。这不是一篇特别恶意的文章——相反，考茨基安慰自己说，该书的遭遇并没有象当时人们预言的那样。它出到一万册时，一万个人——修正主义者并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考茨基认为，修正运动的结局不象从前一万名希腊人的进军，而是象他们的撤退。回忆研究勇敢的色诺芬的美妙时代是多么幸福呀！但是回忆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它固然使叙述活龙活现，却容易使先知陷入谬误，这是明摆着的。

一本书在出版方面的成就或失败不会使任何一位明智之士对它说服和影响人的力量产生错觉。那本书第五版发行时形成的气氛比第一版发行时要冷静一些，但是这一情况更加算不了什么。考茨基写道，第一版的作用象一颗炸弹，象一份宣战书，目前一版的作用只是象一种珍本著作。它甚至不再使他夜不能寐了。

这如果是真的话，*tant mieux*（那就更好）。只是我必须说，只要是有点熟悉党史的人都能够预言这一点。当考茨基还和别人一起在那里叫嚷“一颗炸弹！一颗炸弹！”时，一位与他观点相近的人写信给我说：“五年之后人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这

^① 指考茨基斥责法国社会党人加布里埃尔·杰维尔使用“叛徒的诺言”。见《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25期。——编者注

本书能引起这样的风暴了。”同样的话当时有几个“修正主义者”也对我讲过，几乎一字不差，而且是不谋而合。五年还没有过去，这句话的正确性已经由考茨基证实了，这是令人高兴的。这种做法叫人想起一些年轻人的习惯，他们想象出一个幽灵，因此大为惊慌，等到醒悟过来之后，突然改变声调，无所畏惧地高喊：“哈哈，这东西居然自称是一个幽灵！”可是我们并不想由于这种情形而减少我们的愉快。

发表于1902年5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2年第5期第366—367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902年8月25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

我还没有看到爱德的文章^①，却看到我们的许多报刊对他的没完没了的挑剔表示反对。我还是那个意见，你让他闹去吧！他总会慢慢清醒的，这是说，假定他还有可能清醒的话。事情的发展完全和他的见解相反，如果他不醒悟，那可是太固执了。要是不醒悟，那也好。

.....

你的 奥·倍倍尔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
德文版第146页。

① 《对社会革命的最新预测》，《社会主义月刊》1902年第2期第584—598页。——编者注

(四)

1902年9月14日至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举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本来没有准备讨论伯恩斯坦问题或修正主义问题，但是由于奥艾尔在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到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在营业上有亏损，因此引起了一场关于《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这两个杂志的对立的激烈争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派之间的斗争的继续。

《社会主义月刊》的前身是《社会主义大学生》，1895年由私人出资创办，在当时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都开放的刊物。1897年，该刊改名《社会主义月刊》，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党员约瑟夫·布洛赫任编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伯恩斯坦问题展开争论以后，伯恩斯坦和他的追随者感到在《新时代》上不能畅所欲言，于是伯恩斯坦从1900年4月起不再担任《新时代》的固定撰稿人，其他的修正主义者也逐渐拒绝给《新时代》撰稿，转而专门为《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从此《社会主义月刊》就成为修正主义者的派别刊物。在慕尼黑代表大会上讨论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时有些代表指出，伯恩斯坦等人对《新时代》的抵制和《社会主义月刊》的竞争是造成《新时代》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修正主义者起来反驳，并且声称《社会主义月刊》也应当被看成是党的刊物。大会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大会以后，《社会主义月刊》仍旧自行其是，两个刊物对立的情况毫无改变。

这里选用了十三人的大会发言，反映了捍卫《新时代》和袒护《社会主义月刊》以及表示对争论不感兴趣的这样三种观

点。大会闭幕以后，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慕尼黑代表大会》，大卫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慕尼黑的法庭》，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这次代表大会作了评价，观点是针锋相对的。这里也一并选用。

在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阿·霍夫曼^①（摘录）

（1902年9月15日）

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都听到抱怨给报刊的补贴十分庞大，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都警告不要轻率地创办新的刊物。但是这一切都毫无用处。因此，或许最好是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我建议，每年在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一个委员会，由它来审核应该补助哪一家报纸，再由党代表大会作出给予补助的决定。……但是，如果一家没有生命力的报纸在第一年就垮台，那么这同持久地补助它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格里施^②也曾提到《新时代》有一万马克的亏损。我认为，如果宣传工作做得活跃的话，这笔亏损是可以消除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了一个老毛病。在一家报纸能够维持下去的地方，却创办了两家和三家报刊。《新时代》和另一家报刊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是后者不是党创办的刊物，而是一家私人企业。因此每一个同志都无权这样说：我不愿意为《新时代》撰稿，我不喜欢它。请你们在这里提出你们希望作哪些改变。但是你们不要为了一家私人企业的利益操心，却使党刊的亏损增大。……

① 阿道夫·霍夫曼（Adolph Hoffmann 1858—1930）——柏林市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编者注

② 卡尔·阿尔文·格里施（Karl Alwin Gerisch 1857—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司库。国会议员。——编者注

弗·楚拜尔

(1902年9月15日)

现在和将来都不再可能按照过去的规模增加进入党的财务处的资金。对党的要求一年比一年增加了。市政活动花费了一大部分从党员同志那里筹集来的资金。为了从事这种活动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我们需要资金来造成临时的房主等等。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也要大大耗费党的财力。奥艾尔有理由反对人们指责党的执行委员会给工会运动制造某种障碍。现在的工会运动耗费了过去可以提供给党的一大部分资金。工会运动首先必须使它的参加者在经济方面得到保障，然后才能支持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从柏林、汉堡以及其他的大城市筹集来的资金，在必要的时候当然也应当用来为小地方的同志们谋利益，但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为它在今天的报告中又一次令人遗憾地提到的那种企业花费资金。如果博胡姆是正确的话^①，那么我们可以为柏林周围的农村地区要求同样的权利，对于这些地区来说《前进报》也不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机关报。即使在那里我们也必须用小册子、传单等来进行竞选，因为没有专门的郊区报纸。但尽管如此我们有了《前进报》就满足了，而它主要是在柏林起支配作用的。现在有人竟达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声称，如果不掌握一个自己的党的机关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进行竞选。我请求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特别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在这一方面比以前更多地干预财务处。还有一点，当人们不得不看到（你们看那边桌子上红色封面的杂志^②），甚至在自己所作的执行委员会报告中抱怨《新时代》有亏损的那位

① 指党代表大会上有人要求党支持博胡姆党组织创办机关报。——编者注

② 指《社会主义月刊》。——编者注

党员同志^①，在这一杂志最近一期的开头发表了自己脑力劳动的成果，这是令人痛心的。如果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许多从事写作活动的有教养的党员同志的脑力劳动，那就可以说，有人要迫使我们支持私人企业，从而自愿或不自愿地帮助葬送党经营的企业。某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这样做是否正确，党员同志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沃·海涅

(9月15日)

我本来不想发言，霍夫曼的攻击迫使我不得不起来讲话。他认为，《社会主义月刊》（我也是这个刊物的撰稿人）在同党的刊物进行竞争。事情也许是这样，但是，霍夫曼是否适合对此提出指责，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我想提醒他，他十年以来经营着一家十分赚钱的出版社，它十分明显地同党的出版物进行竞争。我并不反对他这样做，这是他的正当权利，但是，既然他要求承认他个人有这样的权利，他也应当容许别人有这样的权利。楚拜尔充当了各种报纸上发表过的攻击奥艾尔的言论的传声筒。有一家报纸写道，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对于党的书记奥艾尔来说，在《新时代》上撰稿没有多大价值了。我们倒是想反过来说。对于《新时代》来说，那些现在给《社会主义月刊》写稿的同志的撰稿究竟有多大价值呢？你们难道以为，我们这些为《社会主义月刊》撰稿的人是如此热中于把我们的文章发表在随便什么地方吗？你们是否以为，我会走到布洛赫^②那里，请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接受我的一篇文章吗？不，相反，只有当这位使人无法忍受的《月刊》编辑跑到我们家里，并且说这里

① 指奥艾尔。——编者注

② 约瑟夫·布洛赫 (Joseph Bloch 1871—1936) ——德国社会民主党员，《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编者注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你应当就这一问题写一篇文章！这样我们大家才写。大家终于被说服了。是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好的编辑部是这样做的，如果《新时代》的编辑部想要让同志们撰稿，那么它应当努力这样做。伯恩施坦曾在《社会主义月刊》上批评了《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考茨基的一些小册子，奥格斯堡的提案^①是直接反对伯恩施坦的。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间的全部争论最好停止。但在这件事上伯恩施坦是被攻击的，因为考茨基的这些册子完全不是为了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鼓动而写的，而是十分之九为了进行反对内部敌人的鼓动，为了驳斥所谓的异端，这些册子一半是教皇通谕，一半是瓦德西式的强行灌输良好信念和压制邪恶信念的小书。对于《新时代》的亏损我感到遗憾，我承认，正式的机关报应当有某些考虑，因此编辑部的地位有困难。但是，党的统一也属于必须考虑的范围。我认为，考茨基更多地考虑观点的统一性，他甚至把它发展成片面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统一行动势必受到破坏。《新时代》编辑部总是公然以下述看法为出发点：只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而其他一切观点都是错误的，正确的观点应该宣传，错误的观点应该克服。当《新时代》编辑部接到一篇它觉得不完全正确的文章时，就立即加上一条小小的尾巴，也就是编辑部的意见。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当然我个人还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预先声明这一点，免得别人在这一方面提出指责。我们曾希望会有所变化。现在，《新时代》的形式的确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片面性不会改变，这是我们根据下面这一点知道的：考茨基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拒绝了让各种流派发表观点的要求，他冷嘲热讽地

^① 奥格斯堡党员的提案如下：“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对于党的机关报上无论哪一篇文章或者党的出版社出版的无论哪一本刊物或小册子的争论，将仍旧在党的机关报或党的出版社出版的刊物或小册子上展开。”（《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2年柏林德文版第78页）——编者注

说，那样一来会成为文字杂耍场了。这并不涉及到我个人。如果我把《新时代》看作是一个合适的引起共鸣的地方，那么我也会为它写文章，因为反对捏造出来的修正主义的整个纸上争论也使我感到无所谓了。但是，如果那些在《新时代》上受到个人攻击的人不愿意为它写稿，人们也不能加以责备。想要强迫他们这样做，那是一种不适当的要求。同样不适当的是禁止他们为另一家由社会民主党人创办、由社会民主党人编辑和撰稿的报刊写文章，只要这是一家正派的报刊。奥格斯堡提案还进一步要求，对于党的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只能在正式的党报上加以批评。然而，这是有利于党的书店和党的官方学说的十足的禁口法令。这究竟会引导到哪里去？一般说来我觉得这种由党的一切官方机关报来批准的做法毕竟走得太远了。这无非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狭隘性，是从我们最坏的敌人那里抄袭来的。如果这个提案来自美因线^①以北，那么每个人都会这样想：这真是那里普遍流行的普鲁士官僚主义。这个提案却是来自美因线以南；看起来巴伐利亚人的普鲁士化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展。如果官僚主义者想限制自由批评，那么这是他们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检查意味着无视脑力劳动的特性，对脑力劳动的自由的低估。我可以引证考茨基自己的话来证明这一点。

考茨基在他的《社会革命的次日》这本小册子的第42、43页中讨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怎样经营报纸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新闻业的资本主义部分只能通过国有企业来代替，然后他指出同这种国有化联系在一起的危险。他说：“国家对精神生活中一个这样巨大和重要的部分实行集中管理，会不会使它遭到它可能遭到的最严重的危险，即单调和停顿的危险？”大家看，我们的朋友认识得很清楚，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论问题。他接着说：“难道能使精神生活依赖于多数人的决定吗？难道

^① 指十九世纪北德意志联邦的南部边界线。——编者注

每一个新的真理开始时不是只有少数人理解和拥护吗？”考茨基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严肃的问题，但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他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自由团体的活动，这些团体希望为科学和公众生活服务并促进这些领域中的生产。由此可见，考茨基并不认为，在未来社会中能够禁止作家在官方的国家杂志以外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著作。但是我要说，我们希望现在就能得到我们想在未来得到的那种精神自由。《社会主义月刊》当时是从这一着眼点出发创办的，仅仅是为了给自由讨论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提供一个不受官方观点束缚的基地。一些年轻人作出很大的牺牲来支持它，它渐渐获得了某种重要性。你们不能向任何人要求仅仅为了照顾党的官方机关报而停办这样一个企业。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意味着使党在精神上贫乏化。

爱·伯恩斯坦

(9月15日)

我不想使辩论陷入个人的范围，而只是想阐明一般的观点。格龙瓦尔德同志认为必须谈一谈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只是表面上同党有联系，在红色封面的外表下掩盖着它在实质性观点方面所背弃的东西。很明显，他指的不是别的报刊，而是《社会主义月刊》。我十分坚决地对这种说法表示抗议。《社会主义月刊》是由一位党员、一位热情的党员布洛赫同志编辑的，他入党多年，忘我地为党工作，按照他的良心他也只能那样地为党工作。这一点格龙瓦尔德应该是知道的。《社会主义月刊》是由一位党员同志编辑的，为这个杂志撰稿的只有加入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者。霍夫曼谈到，《新时代》是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月刊》是私人刊物。《新时代》真的是党的机关报吗？党承认《新时代》是科学评论，这样说是对的。党为《新时代》承担亏损，这只会给党带来荣誉。但是《新时代》是作

为党的机关报、作为党刊编辑的吗？不言而喻，《新时代》是按照它的编辑认为对党最有利的的方式编辑的。我丝毫不想怀疑它具有真诚的信念。但是他的视野有多远？他的视野是否象这样一个大党的机关报编辑应有的那么远？我不说《新时代》对那些在编辑看来是错误的观点进行批评是不对的，这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新时代》上，一批党员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攻击，这些同志代表着一种观点，而由于这些党员同志在党内工作了几十年，甚至一个世代，由于他们在党内担任着负责的职位，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所代表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内是得到承认的。如果有人只是阅读《新时代》，那么他就会把党的某些代表看作完全错误的、卑鄙的家伙。（有人喊：啊唷！证据！证据！）我就拿出证据来！我对《新时代》编辑作为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指责。但是，当《新时代》上以讽刺嘲弄的方式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时，这是什么意思？这如何理解？在新近的一期《新时代》上，在有关党代表大会的专刊上，你们可以读到一篇题为《新方法》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党员同志。到目前为止他的最杰出的品质在于他是一个伟大名字的继承者。他以目空一切的态度（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般说来是可以原谅的）和狂妄自大的方式（也许每一个作出许多贡献的人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傲慢地辱骂“修正主义的假启蒙”。这篇文章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写的，矛头指向饶勒斯以及整个修正主义流派。（喊声：这是您的观点！）如果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同某一种观念、某一种理论作斗争，他可以使用他所愿意使用的尖锐的言语，但是这样盛气凌人地痛骂一大批党员同志（这些党员同志为党效劳的时间比他长久得多），他无权这样做。（喊声：出版自由！）我听到有人说“出版自由”。如果卡·李卜克内西同志创办一个自己的机关报，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新时代》要成为党的机关报，那就应当在党内保持一定的分寸，遵守一种使人们

彼此之间能作为人与人、同志与同志进行交往的辩论方式。但是在目前这种辩论方式下，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家都遭到了批判，但是这样的辩论会引导到哪里去？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奥格斯堡的罗尔瓦根同志的提案显然是由一批党报上刊载过《一边是考茨基，一边是伯恩施坦》这篇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谈到我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对考茨基的著作的批评。在这一案件中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当然，谁也不能指责考茨基写小册子这件事，不管这些小册子是怎样的。考茨基显然认为他的小册子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关于革命观念的新观点。这是他的正当权利，甚至是他的贡献。这使他的的小册子整个说来成为党内的一本解释性著作，但不是一本代表党的利益的宣传性小册子。问题在于考茨基对发展是怎样设想的。我一点也不反对写这样的小册子。但是考茨基无疑在小册子中间接地，然而相当明确地同一个流派进行论战——（有人喊：这是他的权利！）——当然这是他的正当权利，——他的小册子一部分是同我进行论战的。因此，首先，小册子发挥了新的观点，其次，它是论战性的。《莱比锡人民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无疑是由一位很接近考茨基的人，即罗莎·卢森堡同志写的。其中谈到“修正主义者的犹豫和动摇”，并且说，考茨基的小册子象一阵清风那样驱散了修正主义的迷雾。这确实是一次挑衅，是需要加以回答的。我在一个刊物上对此作了回答，自从我退出《新时代》后，我通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为什么我退出《新时代》，我不愿对此进行辩解；那里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不得不退出。于是我在《社会主义月刊》上阐述了我的观点。文章虽然是尖锐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对于考茨基的动机和正直表示怀疑。至于《奥芬巴赫晚报》所写的，纯粹是歪曲事实。尽管如此，许多党报还是转载了《奥芬巴赫晚报》的文章，其中有几家党报显然不了解我的文章。我始终赞成辩论自由，如果因为也许有一些敌对的报刊对辩论表示关

心，就企图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一次完全客观地进行的辩论，那我要坚决反对。

奥·倍倍尔

(9月15日)

我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同伯恩斯坦完全一致的：如果有人企图在党内阻碍言论自由，那么，不仅是他，而且我们大家都会最坚决地加以反对。现在事情被说成这样，似乎在党内有一派想压制另一派或一个少数派。我认为这是把一种非常严重的过失硬栽到整个党身上。因为这个指责不是针对具有编辑身分的个别人，而是针对整个党，特别是针对党代表大会，据说这次代表大会赞成压制言论自由这样的行动。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既然有人以为有理由必须对一个人，在目前这件事上是对《新时代》的编辑，提出申诉，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蔑视，那么，在党内存在着可以向之提出这些申诉的机关。最高的机关是党代表大会。我决不会毫不犹豫地赞成考茨基作为编辑所采取的行动。我要提到我在卢卑克党代表大会之后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我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谈到这一点并且说，谁以为自己有一个正式机关报的编辑提出申诉的理由，他也就知道应当向什么地方提出申诉。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向有关的机关，首先是向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任何申诉。而且我要说明，固然在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大发怨言，但没有提出任何申诉。一般说来我们对报刊是怎样想的呢？没有一个同志想要限制党内的言论自由。在目前存在的一切政党中，没有一个党象社会民主党那样，能够在党内如此毫无阻碍地表现出言论自由。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为党服务的报刊也要接受党的工作人员的监督。这在组织章程中作了明确规定。从这一方面看，《社会主义月刊》是处于党外的。以前，当《社会主义月刊》的前身《社会主

义大学生》的出版者向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承认《社会主义大学生》是党的机关报并把它列入党刊的名单时，党的执行委员会一致否决了这个建议。既然《新时代》是得到正式承认的党的机关报，这个刊物就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党的资金支持，因为《新时代》所要求的全部牺牲如果不是用在这方面的话，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给党带来利益。自从三年前这个刊物正式归党所有以来，党的执行委员会不得不最坚决地要求同志们帮助它广泛传播。如果党的执行委员会发出了这样的指令，而在另一方面，党的最有才能的代表人物却甘愿置身于机关报之外，甚至对《新时代》编辑再三的约稿要求置之不理，那么，人们应当怎样判断这种行为，对此我就不想多说了。海涅提到的那些人直到几个月以前都再三受到《新时代》编辑约稿的请求，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些人的这种行为势必起涣散人心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一些非常有名的同志以如此挑衅性的方式支持一个处于党外的刊物，那么，这会产生怎样的印象？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同志支持《新时代》来消除亏损，这又有什么意思？海涅认为，为了避免停顿，必须有这样的刊物。这也就是说，直到《社会主义月刊》创办的那一时刻为止，党内是处于停顿的状况。（海涅，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人当真想这样断言。如果有人企图压制言论自由，那么有组织章程中规定的机关来加以干涉。但是《社会主义月刊》是处于党外的，它愿意处于党外，它没有试图适应党内条件。我并不因此责备它，但是必须说清楚，好为可以被算作党刊的报刊划一条界线。海涅说，《社会主义月刊》是为了在党内能够开展自由辩论而创办的。这句话的意思又是似乎有人限制了自由辩论。我最坚决地反驳这种说法，甚至要证明情况恰恰相反。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伯恩施坦把修正主义这个词已经看作是一种嘲弄。（伯恩施坦表示反对。）亲爱的伯恩施坦，请允许我说一下，修正主义这个词不是由教条主义者发

明的，这个词是你们自己发明的。（喊声：是休恩朗克！）我是第一次在你们的刊物上读到这个词的，当人们把某一流派——而且的确是一个流派（伯恩施坦：不是！）——称作修正主义时，怎么会是一种侮辱，对此我不能理解。难道你们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难道你们想说，你们在自己的刊物上没有攻击我们？难道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难道我们不是墨守成规者？难道我没有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月刊》中受到个人攻击？对此我并不提出抗议，因为在意见不一致时你一刀我一枪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有人转到下面一点上，说考茨基的小册子是解释性的，但不是宣传性的。这是何等的无稽之谈？任何解释性著作都起宣传的作用，但考茨基的著作是否只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宣传性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是无关紧要的，是完全一样的。这两本小册子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话包含有可以真正被看作是侮辱性的评论，除非是非常敏感的人才会那样认为。如果这样的小册子被另一方列入查禁书目，那么，从此就根本谈不上出版自由了。因为如果你们有权发表你们的意见，那么另一派也有这样的权利，而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不过是行使了这样的权利罢了。

使我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文章怎么会遭到象伯恩施坦对它提出的那种批评。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篇文章，这是我读到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最初著作中的一篇。我发现这个年轻人有着锐利的笔锋，这使我感到高兴。我断然否认在这篇文章中哪怕有一句侮辱性的话，我要求提出证据来。这篇文章是怎么产生的？饶勒斯曾企图利用《前进报》上发表李卜克内西的遗著来为修正主义派辩护。儿子起来反对，他维护自己父亲的观点。他说道：不许碰！老人是我的父亲，他不属于你们。而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老李卜克内西不再能够回答，而且我认为，如果他能够起来回答的话，这位老人的回答还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呢，你们可以相信这一

点。因此，如果老李卜克内西的儿子起来维护父亲，那么，这是完全理所当然的。我再说一遍：在文章中没有一句话能够被另一方看作是侮辱、嘲弄和蔑视。因此，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发生了这样一场争论，这在几年前是简直不可能的。党内发生了矛盾，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些矛盾，对于这一点谁也不会低估，而这种辩论方式也就随着这些矛盾进入党内。双方都有缺点，如果辩论的结果能使双方都了解到，我们是同一个党的同志，因此我们也必须稍加克制，那么，这会是很大的好处。

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一大部分有名的党员同志没有充分使用他们应有的申诉权，而是直接跑到一个处于党外的刊物那里去发表文章，从而使资产阶级报刊感到高兴，资产阶级报刊不断从这一事实中捞取资本来反对党。每个党员同志都应当关心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我不希望我们不得不第二次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类似的辩论，那时它采取的形式会糟糕得多。

爱·大 卫

（9月15日）

倍倍尔再三声明，没有禁止任何人在《新时代》上发表意见，《社会主义月刊》的撰稿人用不着从《新时代》逃跑。倍倍尔在这一点上错了。实际上，禁止发表意见的情况是发生过的。请你们首先要愿意承认这是事实。（喊声：不拿出证据就不承认！）伯恩施坦为自己提出了证据，既然你们要求这样做，我想也为自己提出证据。我曾经由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一再同考茨基发生矛盾。在考茨基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发表后，我在二月立即给《新时代》寄去了对这本书的一篇批评。《新时代》

借口没有篇幅，到同年十月才发表了这篇批评文章。在我的批评发表后，随即发表了考茨基同志的回答。这个回答包含着很猛烈的个人攻击。当我提出反驳时，我得到通知说，我的反驳将会发表，不过需要耐心等待一些时候。（喊声：申诉机关！）

申诉机关——倍倍尔也曾试图用这一论据来进一步证明他的责备有道理。但是，当时人们甚至在形式上都不能向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因为《新时代》的编辑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关系根本不能使党的执行委员会有权对《新时代》的编辑活动进行干涉和监督。这样一种监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你们终究会懂得，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既然《新时代》通过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把人轰出去，可见为《新时代》撰稿是不受欢迎的。如果人们打算在别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无可非议的。当时创办《社会主义月刊》，是为了在大学生中进行宣传。这个刊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社会主义大学生》而来的，当时为维持这个刊物作了很大的牺牲。在很长时间以内，为《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也是无报酬的，即使现在这个刊物也还是无利可图，即使现在这在财务上也还是一种牺牲。如果象霍夫曼所做的那样，从财务方面来观察问题，并且断言《社会主义月刊》要为《新时代》的营业不振承担责任，那么理由是完全不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察《新时代》的财务问题。这样一来，对于《新时代》在财务方面没有象它本来能够的那样发达这一事实，也许就会有另一种看法了。不管怎样，《社会主义月刊》决不需要《新时代》那样的支出。这个刊物是必需的；它的重要性是完全自然而然地由以下事实产生的：一些人代表着以修正主义这一名称加以概括的观点，他们需要创办一个机关报，以便能够不受限制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这个机关报也是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党的监督之下的。倍倍尔关于《社会主义月刊》是处于党的监督之外这一论据是纯粹从形式着眼的。任何一个为《社会主义月刊》撰稿并且是党员的

人，以及他在那里发表的全部观点，都处于整个党的监督之下。倍倍尔没有理解伯恩斯坦关于考茨基最近的小册子的那些论述的中心思想。这些小册子是攻击伯恩斯坦和其他人的，对此伯恩斯坦有反驳的正当权利。但是，谁也没有权利在后来把事情歪曲成似乎善良的考茨基绝对愿意和平，而凶恶的伯恩斯坦则进行争吵，想在考茨基的腿上咬一口。过去老李卜克内西也曾给《社会主义月刊》撰稿，还有累德堡和罗莎·卢森堡。过去这是公开允许的，为什么现在要加以禁止？如果用财务方面的理由来掩饰提出的责难，那么我只能把这看作是一种借口。实际的意思却是，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脑力劳动的成果使某些同志不痛快。在《社会主义月刊》上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丰富的内容，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面评述，使《社会主义月刊》成为一个异常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杂志。现在，对此不欢迎的那一派想压制这个杂志，于是，人们提出了这样的借口。倍倍尔曾再三声明，没有人想在党内压制自由交换意见。我不怀疑这一看法的诚实性（喊声：多谢您的好意！）——我这样说是十分认真的，我之所以要把这句话说在前面，只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杜绝可能发生的错误解释，但是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的印象是，人们企图暗中限制自由交换意见。我用这个看法来反对倍倍尔的看法。根据最近几年的全部观察，实际上有一些人喜欢尽可能使党员同志听不到并且不接受某些见解。我是从这一观点来理解全部攻击的。我完全同意倍倍尔的下述意见：如果这个企图获得成功，这同我们党是不相称的。如果通过了奥格斯堡提案（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就会涉及许多其他刊物，如《文库》、《市政实践》；它会涉及全部工会报刊和合作社报刊。如果党以某种方式阻碍党员的自由科学活动，这同党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我对这种攻击的命运毫不担心，并且希望它将丝毫无损于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月刊》的发展。

莱恩德克尔

(9月16日)

首先我必须表示遗憾,昨天又一次引起一场伯恩斯坦辩论。同志们不愿意这一次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希望实实在在地工作。是大学生们开始了这场辩论的。(有人反对,有人喊:霍夫曼,楚拜尔!)如果大学生们在总的代表大会之前两三天单独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这也许是适宜的。围绕《社会主义月刊》的争论并没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奥艾尔和其他人所写的文章对于工人们来说比《新时代》上的过于理论性的文章更容易理解。只要能扩大工人们知识,那么,不管这是《新时代》还是《社会主义月刊》做的,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同样的。凡是有教益的东西,我们都应当接受。最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消灭《社会主义月刊》和《新时代》之间的争论:让布洛赫担任《新时代》的编辑,而让考茨基担任《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热烈鼓掌。)

罗尔瓦根

(9月16日)

奥格斯堡提案的意图不过是提醒一些杰出的党员同志不要忘了他们对于党的机关报的义务。我们看到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项:前进书店的销售额减少了七千五百三十六马克。这无疑同经济萧条有关,但是一些党员同志对《新时代》的抵制也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为《新时代》撰稿的国会议员寥寥无几,党的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而这个刊物不是党的出版社出版的。我们销售的书籍很少,我们知道,工人们要了解两个杂志,需要付出

巨大的牺牲。但是他们现在不得不订阅两个杂志。《新时代》上的文章必须不仅是写给理论家们看的，而且是写给广大工人群众看的，我们的鼓动员们应当从那里汲取知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争论只会促使人们支持我们的提案。如果在社会民主党内这种意见分歧继续起作用，工人们在目前这个重要时期就无法理解。如果言论自由确实受到压制，就必须加以纠正。如果编辑部不称职，就叫它让位，但是有关的人必须提出一项提案来。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一位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党的执行委员会应当首先使它自己要求同志们传播的报刊成为有吸引力的。但是他恰恰使《社会主义月刊》成为有吸引力的。我们的提案想要使反驳《新时代》上的文章的辩论仍旧在党出版的机关报上进行。这是人们可以提出的最低要求。否则必然会使同志们的头脑中留下一个印象：党内存在着两个阵营。但是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党。我请求通过我们的提案。

卡·考茨基（摘录）

（9月16日）

……我常常以为，同志们把修正主义这个词看作光荣；但他们不是这样，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侮辱。看来，这些自称批评者的同志认为自己有权批评一切，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容忍任何批评。那些对良好的语调很敏感的同志也许会给我们作出榜样吧？然而恰恰在所谓的修正主义报刊（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词）上并不总是看到良好的语调。我只提出伊塞格里姆的文章，其中把拥护我们纲领中关于建立民军的要求的同志们说成是白痴。你们能举出《新时代》上有哪一篇文章是用这种方式 and 同志们进行辩论的？当这些人被称作修正主义者时，他们就认为受到了侮辱，而当他们把别的同志说成是白痴时，却突然变得缺乏感觉

能力了。伯恩施坦由于卡尔·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富有朝气的文章而觉得受了委屈。李卜克内西的文章是因为受到挑衅而写的，而伊塞格里姆则不是。修正主义者从来没有在不进行挑衅的情况下受到我们攻击，但是他们要求我们对一切攻击保持沉默！据说我把我不满意的文章简单地推出去，这样就使人们不高兴撰稿，从而把同志们赶跑了。作为证据提出了唯一的一件事，大卫的那一件事。实际上这种事例不是个别的，我们的篇幅不够，常常必须把不迫切的文章往后移，不仅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如此，而且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也如此。我在最近几年中甚至把二十篇左右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完全退了回去。按照大卫的逻辑，这样一来伯恩施坦的反对者在《新时代》上就被完全封住了嘴。大卫的那一件事究竟是怎样的？他在二月写了一篇文章，在十月刊载了出来。这篇文章寄给我时，关于伯恩施坦的小册子刚刚出版。我写信给大卫说：“您的文章虽然对我鞭笞得很凶，但这不能成为我拒绝它的理由。我愿意采用它，然而我们不能同时进行两场论战。刚刚出版了关于伯恩施坦的书，整个资产阶级报刊都在谈论它，而对于土地问题目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因此，请允许我把您的文章推迟到关于伯恩施坦的辩论结束时才发表。”由此可见，我并没有封住大卫的嘴，而只是推迟发表他的文章，以利于关于伯恩施坦的辩论。我是叫大卫让伯恩施坦占先。这就是修正主义者说的不许发表意见！伯恩施坦辩论诚然拖延了一整个夏天，但是在它结束之后，我立即发表了大卫的文章。后来他又寄来了一篇文章。我写信给他，我可以采用这篇文章，但它太长了，如果他愿意稍加压缩的话，我可以早一些发表它。大卫答复说，我可以把稿子退回给他，他愿意看一看是否能压缩。我把稿子寄给了他，但是从此杳无音信。大卫对此既没有向上级机关也没有向我提出申诉，我一点不知道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现在他说，他的尊严不再容许他为《新时代》撰稿。如果人们如此敏感的话，那太过分了。此外，

据说我把伯恩施坦赶跑了。这也是不确实的。我没有使伯恩施坦对给《新时代》撰稿感到厌恶，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助理编辑，而我们的私人关系由于斗争而变得难以忍受，从而也使我们的合作变得难以忍受。你们会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有人要求海涅或福尔马尔和罗莎·卢森堡一起共同编辑一个刊物，我相信，海涅或福尔马尔将会断然拒绝；但是我不相信那时大卫会出来为罗莎·卢森堡辩护，并且要求人们把罗莎·卢森堡同福尔马尔拴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反对伯恩施坦撰稿，我甚至在卢卑克党代表大会结束后要求他为《新时代》撰稿。我本来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我的发言时间没有了。因此只是再讲一点：请你们不要把事情理解成个人的。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而涉及个人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事情涉及到深刻的实质性的意见分歧，涉及到不久前还使意大利的同志们深深激动并使法国的同志们四分五裂的意见分歧！你们可以高兴的是我们仍旧是团结的，这次辩论的唯一结果是使人有些容易激怒。我希望这种容易激怒的情况也将很快消失。我们面临着重大的关键时刻。国会选举将使我们团结在一起，从而使激怒的最后残余得到消除，我期待由此获得巨大的胜利，这种胜利将在资产阶级中重新引起对社会主义的恐怖，而美国的危机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恐怖。国会选举，围绕关税税率问题的斗争，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这是伟大斗争的开始。在这一斗争中，修正主义迷雾的残余将被驱散，我们将重新突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于是我们大家将在“打倒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下重新团结起来！

阿·施塔特哈根（摘录）

（9月16日）

……至于说到《社会主义月刊》问题，我很少象昨天那样

遇见这么多的错误堆在一起。大卫说，《社会主义月刊》是在无私地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诞生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社会主义大学生》在1895年并不是由现在的《社会主义月刊》的撰稿人创办的，而是由别人在付出个人的牺牲和大量的罚金的情况下创办的。这样创办的不可能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它现在也还不是），而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都开放的社会主义刊物。我这里有文件和通告。1897年，这个刊物改为《社会主义月刊》。它的纲领原封未动，它应是包括所有社会主义流派，从而也包括讲坛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流派等等的刊物。当这个刊物转归埃德尔海姆出版社所有时，原先的创办者大部分退了去。有些创办者曾为资助这个刊物每年捐款五百马克以上。不言而喻，埃德尔海姆用不着向他们赔偿这些损失。有关的人大概也不会接受这种赔偿。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标明自己名字的情况下给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报刊或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刊撰稿，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有人就《社会主义月刊》这样的一个刊物明确宣称，它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而是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开放的，那么，人们就不应当同它一起前进，并且不应当打着一个党的机关报的旗帜大肆吹嘘，所用的方式连舍尔和韦尔特海姆同它比起来都要望尘莫及。撰稿人先生们对这一切也许一无所知。《社会主义月刊》想在工会和党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这个企图必然遭到最激烈的反对。编辑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我认识布洛赫先生并且知道，他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还在去年他就认为弗兰茨·奥本海姆博士除了拥护社会民主党外从来没有拥护过别的党。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位老练的编辑至少是了解奥本海姆这种人的立场的，后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奥本海姆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1901年10月他还在《星期一世界报》上的一篇关于鲁道夫·微耳和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只有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才能拯救世界；

我们确信，社会主义的希望的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如此等等。”我还可以向你们列举一系列情况。因此，谁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无法作出区别，谁就会对什么人是真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问题回答说：“不言而喻，无政府主义者和奥本海姆等等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布洛赫喊道：这一切都是说谎！）布洛赫先生，尽管您说在您的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上也使用这样的语调，但是，您毕竟没有权利在这里说这种厚颜无耻的话。

《社会主义月刊》决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尽管有这么多个社会民主党人也为它撰稿。此外，正如昨天我们所听到的，编辑为了组稿对撰稿人竭力殷勤周到，使人们根本无法摆脱他，就象人们无法摆脱一个商品推销员一样。根据科尼斯堡的尤利安·博尔夏特告诉我的消息，从1900年起，也就是说自从埃德海姆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成了这个刊物的后台老板以来，就有意识地只邀请这样的人为之撰稿，这些人自称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抱怨别人把他们称为修正主义者。布洛赫过去曾邀请尤利安·博尔夏特撰稿，博尔夏特去年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他在莱比锡印刷所事件中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布洛赫表示，他不能采用这篇文章，但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篇幅，事情当然是具有现实重要性的，但它可以再搁置四、五个月。布洛赫继续说：“我向您提出如下建议：您暂且把您的文章收存起来。只要我能腾出篇幅，我就立即通知您，您再重新把稿子寄给我，当然要略加修改。目前这个事件那时大概不会再引起兴趣了，等等。”大卫同志，这是你们的编辑吗？针对党的执行委员会有关报刊情况的通告，《社会主义月刊》发布了一个通告。我想马上从这个通告中念几段给你们听。为了说明党的某些机关报的“良好语调”，我想首先只引用我手头有的一段报刊上的话，那里谈的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上，我们队伍中的超级理论家、超级教条主义者以及主张“要么全部要么没有”并且

用脑袋撞墙的政治家们给大会制造了麻烦，这些家伙企图使党代表大会降低到他们的智力的水平。这就是良好的语调！我不怀疑你们有良好的语调，但只是对你们自己。《社会主义月刊》出版社向工会领袖们呼吁并且请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订阅《社会主义月刊》。通告中写道：“我们固然知道，目前的危机以及与此相联的失业使许多同志连《社会主义月刊》的少量订费都几乎不可能筹集到。另一方面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月刊》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任何人除非由于贫困而迫不得已都不会放弃阅读这个杂志。”接着又说，《社会主义月刊》愿意提供一切方便。最后又说：“我们首先向你们建议，由你们的组织集体订阅一份杂志。此外，如果你们愿意在你们的下一次集会上宣读这封信，并在会上要求订阅这个杂志，那是非常适宜的。作为对于这种效劳的报酬，你们每替我们征集到一家订户，我们就付给组织的财务处五十分尼。”一个党的机关报当然不能采取这种手段。在定期出版的杂志中，《社会主义月刊》对于我们党的报刊来说，是同《地方通讯》以及其他《一般通讯》完全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求，不要形成一个这样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无疑是在片面地容忍一种只会对党带来损害的观点，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国会的每一次会议上起来反对《社会主义月刊》。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在酒精问题上也不得不再次摆脱《社会主义月刊》。这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这个刊物当然充满了对权威的梦想，但多少还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工人是不应当被这种梦想迷惑的。

格·福尔马尔

（9月16日）

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当诉诸热情，因为热情通常是盲目的，而只应当诉诸理智。我个人本来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

我的性情是简单直率的，没有什么写作才能。我很少感到需要把自己的每一个思想立即强加给别人。我很少参加，或者根本没有参加对于这里所谈的全部问题的辩论。在党代表大会开会之前，我出于责任把最近几年的各种争论的记录重新读了一遍；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参加争论是对的。在作了详尽考察之后，我不得不对自己说，在我看来，所说的话十分之九都可以不说，党不会因而有什么损失。因此，除非必须，我不再介入此事。事实是确定的：有人对于《新时代》长期营业不振表示不满。我想，一个刊物亏损了一万马克，这也许是营业不振。（喊声：过去一直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过去一直是营业不振。这个刊物情况不佳，虽然有党的威信，仍然有亏损，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月刊》（不管人们对它是怎样想的）不断向前发展，现在传播得这样广泛，其他刊物如果能这样传播也会感到完全满意的。对于这一事实首先用不着进一步谈。我一点不否认，当另一个杂志（它很长时间不是党的机关报，只是这几年来在实际上赢得了这个称号）获得了这样广泛的影响，这对于党来说是并不愉快的，这种情况也是不正常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在谈论这个问题的许多聪明人中间，竟没有一个人明确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觉得按理说，应当到哪里去寻找原因，就应当首先到那里去寻找，也就是说到编辑部去寻找，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一个有党的威信和钱袋作后盾的刊物应当获得异乎寻常的影响并且向前发展，这是具备一切有利条件的。如果没有做到这样，那么只能由编辑部负责。照目前这样的情况，我确信：你们愿意作什么决定就可以作出什么决定，但只要不改变编辑方针，就不会有变化。考茨基跟从前一样把事情说得很美妙。他说过：“人们到底对我提出了什么指责？都是一些小事！”但是，我觉得事情不过是这样的：考茨基（他的功劳和才干我用不着加以恭维，这是确定无疑的）具有一种片面性，狭隘性，他容忍不了不同的意见，我们党的其

他著名的党员同志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象他这样的。这是无可反驳的，这一点考茨基本人在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就向我们说过，那时有人对他个人提出了指责，有人谈到了思想自由，我们向资产阶级政党要求这种思想自由，而他认为，在我们党内提出思想自由的同样要求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而加入我们党则是自愿的，所以不能提出这个要求。他还补充说，他把党的统一看作是首要的。歌德说过：“你所说的各个时代的精神，其实只是作者的精神。”^①这句话正适合于他。你所说的党的统一，意味着你的原则，你的特殊的意见。其他的观点都被看作是错误的，不是在文字上同这些观点进行斗争，而是企图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这就是《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之间存在的差别。至于《月刊》的出版者做了些什么，我一无所知，目前也与我无关。问题在于文章的内容。每一个在《月刊》上发表文章的党员同志都是署名的，对自己的观点承担责任，只是让读者去作出自己的结论。但是考茨基恰恰不想这样，他曾声明，他的刊物不是为了代表不同的意见，而是为了捍卫党的统一。他现在说：这都是些小事。我想打一个比喻：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它的主席是世袭的，也就是说总是同一个人，他在辩论中只是对我表示怀疑，并且不管是否适当，一有机会就打断我的发言，他从来没有容许我正确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事后却利用一切机会大肆攻击。这样的会议我是不喜欢参加的。不只是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许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有人问，究竟是什么会议糟糕到这种程度。难道你们忘记了最近几年的辩论吗？难道你们不记得，有一批同志（我不把自己算在里头，我是不在乎的）被加上了很坏的罪名，使他们变得十分可笑？他们的罪名是：他们的行动有利于破坏党，他们站在通往资产阶级阵营的道路上。

^① 参见歌德《浮士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部第30页。——编者注

这些罪名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可不是小事。去年，甚至阿德勒不得不给考茨基写了一小段题词。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曾互相攻击，我们将重新和好，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善。但是，看起来这是考茨基一般说来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我认为，如果编辑部高高在上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外国的社会民主党内所发生的一切加以评判，如果饶勒斯这位法国最大的兄弟党的领导人被称为“党的大破坏者”（这样的人消灭得愈快愈好），这是不对的。而当王德威尔得同志发表了他的信时，人们对他的回答是多么不礼貌，这就用不着再说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轻率态度，在一个自由的刊物上也许可以发生这样的事，但在一个自命是党的科学机关报的刊物中，编辑每时每刻都应当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现在有人说，人们可以提出申诉。部长们每一次也是这样回答我们的控告的。然后又说，申诉在哪里呢？不对，枢密官先生，难道没有吗？谁会乐意就考茨基这样的编辑提出申诉呢？我认为，我对他了解得很清楚，我知道申诉根本无济于事。考茨基必然会同现在一样受到保护，他一点不会改变，或者至多只会变得比过去更加片面。倍倍尔去年写了一篇文章来评论我在此地的一次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他指责我：为什么不提出申诉？我反问道：如果党的机关和执行委员会真的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这方面进行纠正，那么，为什么《新时代》上出现了无数闻所未闻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听到党的执行委员会加以干涉呢？（普凡库赫喊道：干涉了！）是的，是在发表出来之后。在论述机会主义者的一组文章的最初一篇中，你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意图何在，并且可以说：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员同志。但是你们什么也没有做。你们让它发表了，而有关的人就不得不迁就这一点。因此，别跟我来这一套。正是笼罩着《新时代》编辑部的那种精神促使人们离开。一些著名的党员同志、国会议员停止为《新时代》撰稿了，你们究竟能用什么讲得通的理由来解释这件事呢？也许你们想提出

一种理论，说什么正在进行着一个阴谋，要破坏党或者把党引导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但是总有一个理由。这就是：由于笼罩着《新时代》编辑部的那种精神，他们感到自己受到排斥，得不到必要的活动余地，因此他们转向别的刊物了。如果在《新时代》中有可能发生变化，我将感到极大的高兴。但是我声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永恒的监督的精神，纪律的精神，而这种纪律是虚假的纪律，是人们所反对的兵营的纪律。请你们想一想，你们与之交往的可是独立的人啊！请你们让他们把话全说出来，并由党作出决定。如果有人想阻止这样做，那么这是感觉到自己虚弱。奥格斯堡的提案在我看来简直是荒谬的。当我读到这个提案时，我曾以为，奥格斯堡人把对象弄错了。这本来应该是为中央党、为有检查员高高在上的教会报刊（那里只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提出的提案。我不想再说反对这个提案的话了，因为提案人已经用自己的发言出色地反对自己的提案。请你们平心静气地让一切意见自由地说出来，只要这些意见是通过诚实的和正派的方式表达的。请你们不要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倍倍尔昨天说，根本谈不到限制言论自由。但是奥格斯堡提案就是这个意思（倍倍尔：我不赞成这个提案！）——固然这样，但是除了你以外大厅里还有别人。这个提案要求，辩论只应在党刊上进行。这不过就是说：如果党的出版社不愿采用这篇文章，那么人们就只好把嘴闭上。既然一些党员同志企图阻止一些文章发表（他们对这些文章提不出别的指责，只好说它们是发表在一个不属于党的杂志上的），那么，这就涉及到压制意见，这就是说，有人想压制言论自由。我不相信你们会这样做，因为这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单凭这一点我就不相信。唯一可能产生的后果将会是，《社会主义月刊》上展开的朝气蓬勃的活动被扼杀了，但是对《新时代》却没有帮助。如果你们以为，那时有关的同志将会服从考茨基的检查机关，那你们就弄错了，他们将会根本停止写作，

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如果有人企图压制言论自由，那么，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会俯首帖耳服从这样的检查。如果加入社会民主党并挣脱旧的不自由仅仅是为了用一种新的不自由来代替，那确实是不值得的

克·蔡特金

(9月16日)

我在许多方面同意对《新时代》的批评。《新时代》常常跟不上现实，这是毫无疑问的。它并不总是能够象《社会主义月刊》那样吸引新的力量来参加撰稿，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考茨基自己更加意识到这个缺点。但是这些缺点一部分是很容易解释的，并不是每个编辑都恰好既具有一个勤快的业务推销员的品质，同时也习惯于让别人把自己从前门赶出来却又自己从后门进去。考茨基现在受到很多激励，这也许会促使他愈来愈接近海涅昨天所提出的那种编辑的典范，使他也成为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编辑，他将学会说服——象海涅所说的那样——不十分适于参加撰稿的人们。至于说到吸引更多广泛的人，也包括那些发展过程还没有成熟的人，那么，考茨基拒绝在《新时代》上为这些力量提供广泛活动的场地，人们对于他在这一方面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作为社会民主党正式机关报的领导人对于全党和他自己的良心的责任感，这是由于他认识到，在《新时代》流传的范围内，个别的读者不能象福尔马尔作为典范提出来的那样检验一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种典范成为现实。正是最近几年来已经做到把新的力量吸引过来，而且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力量来自无产阶级本身。你们不应当把少数几期《新时代》同少数几期《月刊》进行比较。请想一想，其中一个是月刊，而另一个是周刊。有人提出，《新时代》的语调是这么多同志不愿意为它撰稿的最重要的理

由之一。关于这一点，在这里已经谈论了很多，我只想补充一句：如果修正主义者觉得修正主义者这个词侮辱了他们，那么，当有人不停地向我们把革命者称作“革革革命者”或者百折不挠的人、目标坚定的人等等，难道我们就不能同样有权利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正如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说过的那样，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有过错，因此我们不要互相指责。考茨基被指责犯有片面性，但是，为证明这一点而提出的材料是不充分的。一家不是仅仅自称的、而是实际上的党的科学机关报（而且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尽管由于当时政治形势造成的某种原因也许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编辑，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而一个处于党的机关监督之外的刊物是用不着这样的。考茨基已经指出，他不得不有哪些顾虑。但是，还有另外一点：他作为社会民主党科学杂志的编辑必须注意使观点愈来愈得到澄清和进一步发展。如果他坚决相信某些意见关系到全党的利益，关系到强大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那么他对党和对自己的良心都有责任使这些意见得到发表。正是由于这种责任感，毫无疑问他负有义务常常给这一篇文章或另一篇文章加上脚注或者加上遭到大卫指责的那种尾巴。如果大卫认为这已经是限制言论自由和限制批评，那么我感到非常遗憾，《卡尔斯卢厄人民之友报》要求对卢森堡同志实行党的禁口法令，我们却没有能够看到大卫写文章或者听到他发表演说来坚决反对。如果我们考察现在所提出的全部指责，那么双方的情况是这样的：人们固然承认有权最尖锐地批评老的派别（姑且这样说）并以最尖锐的语调跟它斗争，却十分坚决地拒绝承担避免任何尖锐语调的义务；人们要求给予自己的观点最广泛的言论自由和活动自由，但是当别人根据这同一种自由用反批评来回答批评时，他们就感到愤怒了。人们宣称对每一个老教条都极端蔑视，另一方面却要求别人对自己的新教条无限尊敬！《新时代》也许往往在语调、倾向性以及在同另一些倾向作斗争方面犯了

过分急躁的错误，然而从它诞生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新时代》对于党来说过去究竟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联系的环节，它把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等的伟大科学遗产整理好，以供每日的报纸、实际的日常工作、实际的政治斗争利用。为了能胜任这个崇高的使命，它不是仅仅在心平气和的、客观的文章中阐述我们的纲领和策略所依据的那些原则，不，它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任务，要反对一切想要伪造社会主义并缠住无产阶级不放的资产阶级败类。它可以说曾经必须同假社会主义的经常斗争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党内。制造武器的行业是一个粗暴的行业，谁不得不持久地同敌人搏斗，谁在跟同志进行斗争时也就会无意地使用尖锐的语调，而本来最好是能够避免这种语调的。既然《新时代》应该继续忠实地执行这个任务（它一直是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应该说，它完成得很出色），那么，一切有能力和有义务的党员同志都必须无保留地为《新时代》撰稿。这是做得到的。既然在党内实际的日常斗争中，在党代表大会上，两种倾向虽有尖锐的斗争却仍旧始终和睦相处，那么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新时代》上也应当而且能够这样。只有在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时，那些现在站在一旁感到不满和痛苦的力量才会重新向我们涌来。只有到那时，《新时代》才能够成为它应当而且有能力成为的那个样子。但是，它之所以应当成为这个样子，不仅从考茨基谈到的行将到来的斗争来看是必要的，而且从我们必须进行的细小的日常工作来看也是必要的。站到斗争前列的新的人员愈多，我们就愈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从一旁对他们进行帮助，在理论上加以引导、指导和劝告，致力于实现和促进统一，同时考虑到共同的目的，而这个共同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对共同的敌人和争取共同的自由。

卡·乌尔里希^①（摘录）

（9月16日）

我既没有以任何方式参加《新时代》的工作，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参加《月刊》的工作，因此我确实有权说，我没有受到任何一种贫乏的思想的感染，我在表明自己的态度时决不受个人考虑的影响。我认为，人们终究应当注意一个事实：从最近几年的辩论以来，情况并没有改变。我们必须弄清楚，一大部分党员同志为一个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报刊撰稿的原因是什么。我得出了同福尔马尔已经说过的同样的看法：《新时代》表现得太片面，对于去年已经发表的意见考虑得太少了。《新时代》编辑部片面地认为唯有它的观点才算数，这是不好的。考茨基说他已不可能和伯恩斯坦进行个人合作了，从这一发言中可以看出，考茨基自己承认了《月刊》有存在的权利。《月刊》所发表的文章，《新时代》也是可以发表的。据说情况正在好转，当我听到考茨基的“集合令”时，我觉得这确实是导致克服分歧的手段。但是我们必须请求双方不要那么敏感，今后不要再对语调表示抱怨。个别同志的钻牛角尖的言论在广大群众中得不到共鸣。如果那些认为写出了具有震撼世界意义的文章的作者能够听到群众对这些文章的想法，他们就再也不会对于它们的意义如此深信不疑了。放弃你们的学究式的咬文嚼字吧！（有人喊：这句话适合于伯恩斯坦！）我一点也不想去夸奖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两个人都必须克服他们的一部分敏感性。面对着目前的形势，面对着面包涨价，我们不应当继续争吵下去。我们在外省比在奥林普山上的理论家们对此更加感到痛苦，我们这些在外地从事鼓动的人时常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一个敌人在我们

^① 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 1853—1933）——手工工人出身，曾任《新奥芬巴赫报》编辑。——编者注

面前把考茨基拿出来夸耀，另一个敌人则把伯恩斯坦拿出来夸耀。我们有义务向无产阶级解释，必须战胜资本主义。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为这样的争论操心，那么我们就无法工作，因此必须停止争论。简直应该把所有理论家关在一起，一直到他们互相吃光为止。（赞同声。累德堡：那时党就会变傻了！）这不对！党拥有这么多健康的、精力充沛的力量，它不会因为失去理论家而变傻的。这些理论家往往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在读了伯恩斯坦或考茨基的文章后，常常问自己，他们究竟说的是什么；如果去问他们，他们就会向我们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我们直到听完他们的讲话还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此外，广大党员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这些先生们所想象的要更好。群众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并且会使我们避免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那种情况。……

爱·伯恩斯坦

（9月16日）

首先我必须反驳说我过分敏感的这一指责。但是对于有些事情我永远敏感的。这是涉及信念、涉及是否忠实于信念的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修正主义”这个用语。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休恩朗克发明的。新近有一位置身于党外并且走自己独特道路的人（这个人当然是社会主义者）出版了一本书。他在这本书中花了许多功夫和精力来论述对于社会主义的修正，它受到了大卫和我的批评。我们曾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修正决不能朝着这位作者所确定的方向前进。如果说虽然如此修正主义者这个词还是被用到我和别人身上，那么我一点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把修正主义者说成几乎就是党的叛徒。说我们继续不断地攻击另一派别的代表，那是不真实的。我自己曾评论过考茨基论述贸易政策的那本真正鼓动性的小册子，并

且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它的价值。可见，当事情涉及到维护党的共同原则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的。不仅如此，考茨基论述社会革命的小册子发表后，有名的洛仑兹利用这个机会在各种煽动性的刊物上告发考茨基，我立即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为考茨基进行辩护。在实际斗争中我们决不进行争吵。对于李卜克内西的文章我只是指责他说什么修正主义的假启蒙。年轻人是不应当这样写的。我不想探讨饶勒斯是否有权利援引老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在不同的时候也有过不同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有人装成这样，似乎饶勒斯这位国际社会主义引为自豪的人是完全处于党外的。当然，饶勒斯在某一点上也可能是错误的，对他也可以进行批评，但不是象人们批评党的叛徒那样。在《奥芬巴赫晚报》上的文章中写道，在资产阶级报刊被考茨基的小册子激怒之后，我却写文章使敌人感到高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邮报》甚至说过，伯恩施坦的观点比考茨基的观点还要危险得多。我没有批评整个派别，而仅仅批评了考茨基的书，而且这个批评不包含任何伤害人的内容。同志们，我请你们不要这样容易发怒。务必允许我们有批评的权利。几天以前，我刚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指出，党内的意见分歧将始终存在，我并不渴望哪一天这一思想斗争会停止，因为思想斗争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我的这一意见受到了普遍的赞同。在《世界政治通讯》上对我提出了指责（《莱比锡人民报》毫无异议地转载了），说我背弃了卢卑克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说通过有关我的决议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虽然在卢卑克反对过倍倍尔的决议，因为它包含某些关于我的错误论述，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认为倍倍尔决议胜过海涅决议，因为它比后者更坚决地强调自由批评的权利和必要性。后来我曾为倍倍尔决议辩护，以反对敌对报刊的攻击。而现在，在我为党进行了整整一年的鼓动活动之后，一旦我起来反驳考茨基的小册子，却有一个报刊出来说，我不把决议放在心上。我认为我已

尽可能忠实地遵守了决议。倍倍尔在向我点头，我很高兴他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发言时间结束了。）我仅仅再说一句：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月刊》和《新时代》都是属于党的，它们互相补充。党可以为拥有这两个机关报而感到骄傲。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2年柏林德文版第118—119、119—120、121—122、123—124、124—127、127—128、131、133、134—136、136—138、138—141、141—143、143—144、145—146页。

卡·考茨基 慕尼黑党代表大会（摘录）

（1902年9月24日）

关于《社会主义月刊》和《新时代》的争论比关于上述问题的争论激烈得多。我们本来期望党代表大会平静地进行，这些争论却使这一期望落空了。人们不妨把这些争论看作是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的一个反响。但是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以来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新方法的争论是出于批评我们的理论原理和修正我们的纲领的愿望，而这一次的争论则是出于这样的需要，即停止那种没有提供建设性的新认识、并且被群众认为无效的自我批评。因此，这些争论同消除一切内在分歧（任何一次大的行动，也就是说也包括任何一次普选，都要在我们队伍中引起这种分歧）的意图决不矛盾。一些实际工作者再也弄不清无效的自我批评是哪一方作出的，而且他们在争论的过程中总是笼统地要“理论”和理论工作者对此负责，这虽然不很令人愉快，但也并不奇怪。

从占突出地位的个人争执这一方面来看，这些争论也并不总是愉快的，但是我们有一切理由对这些争论感到满意，因为它们使我们有机会摈弃大量的流言蜚语和消除对《新时代》的一系列错误的看法。它们首先表明，《新时代》编辑部只是由于它所主张的原则和倾向才受到它的对手的攻击。从汉诺威代表大会到慕尼黑代表大会的一切与此有关的表决证明，这些原则和倾向是《新时代》编辑部和多数党员同志共有的。它们表明，虽然修正主义运动恰恰使《新时代》编辑部陷于困难的处境，使它并不总是易于把理论任务同编辑任务协调起来，但是，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却提不出重大的指责，尽管这一工作仍需从技术

方面作出某些改进。

争论有时变成十分尖锐的人身攻击，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就错误地认为，这次讨论是对《新时代》的编辑个人施加私刑，或者是《社会主义月刊》和《新时代》之间由于竞争而引起的一场争吵。争论的意义比较重大，否则它也不会使党代表大会如此感到兴趣和如此激动了；如上所述，有两个因素支配着争论：首先，争论是两个派别的斗争，它们各以《社会主义月刊》和《新时代》为发表言论的主要场所。其次，实际工作者在争论中对无尽无休的、并未使我们有所长进的理论批评明显地表示不满。

资产阶级报刊当然利用了这一争论，它们立即捏造说社会民主党要压制自由发表意见。但是连罗尔瓦根的提案也不是想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个提案并不想阻止对党的观点进行论战，而只是希望把论战限制在某些报刊上。提案的本意是一种示威行动，一旦它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争论，它就完成了任务，因此提案接着也就被撤回了。

一个党员应该怎样写作和在哪里发表，这是一个掌握分寸的问题，无法作出笼统的规定。谁也不会想到，仅仅由于一家机关报不受党的监督而责备一个党员不该为它撰稿。

修正主义者一旦形成了派别，就会寻求一家自己的机关报，那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意大利的两派的拥护者也都各自在一家特殊的机关报中聚集起来了。而且由于原来的科学机关报《社会批判》是修正主义者编辑的，因此在那里是反入阁派的拥护者办起了自己的机关报《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不会想到按照那些著名的榜样，为了这一点去谴责屠拉梯目光短浅、心胸狭窄、阴险地吓跑撰稿者。请注意，谁指责《新时代》编辑部偏激，不妨想一想，任何一家修正主义报纸发表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都没有我们这里发表的修正主义文章那样多。要知道，是《新时代》发表了伯恩施坦的成为修正主

义运动起点的那些文章。

当然《新时代》作为党的机关报，对于每个有些重要的话要说的党员都是开放的。但是不言而喻，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如果一家机关报的编辑全是他们的自己人，那么他们在这里就会感到比在《新时代》上更加自在一些，因为《新时代》的编辑不仅承认党纲，而且热诚地维护党纲；那里虽然发表修正主义者的批评文章，但是读者在那里也可以读到其他派别对这些文章的批评。

使人恼火的毕竟还不是《社会主义月刊》的存在，而是它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使两派报纸的思想斗争变成了一种商业竞争，在这一竞争中，修正主义报纸企图通过倾销竞争使党的机关报失去立足之地，而这些资本主义方法，是一家重视自己尊严的党机关报所不能也不应当采取的。

因此，个别同志为了使《社会主义月刊》在道德上有所提高而对它进行的责备不在言论自由方面，而在竞争自由方面。问题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应当把他的信念在他认为最有利的地方发表，而是社会主义者在彼此进行思想斗争时是否应当把资本主义竞争的一切手段都使用出来。

如果两派的竞争只是在思想领域进行，每一派都努力在科学方面和新闻政论方面显示最优异的成就，那么这种竞争决不是坏事。

如果我们在党内根本就没有两派，那当然更好。但是既不能用命令取消两派，也不能把它们否认掉。不过正在到来的国会选举毕竟能够大大有助于克服某些内在的对立。共同进行的一场斗争会使人们互相接近起来，但是，如果这场斗争造成一种一目了然的形势，使人们只能从一种意义去理解它，只能按照一个方向去进行斗争，那么，这一斗争也能消除对某些问题的意见分歧。

当然我们也不能期待我们党内的全部对立会自行消失。这

恐怕既不可能,也不是好事。这样一来,我们党内当然就会出现十分令人恐惧的停滞现象。有些对立是我们党内过去一直存在、今后还将存在的,即坚持原则的人和机会主义分子之间、政治家和盲目冒进分子等等之间的对立。此外,还存在一些集团,这些集团是从特定的历史情况产生和重新消失的,但只不过是让位给新的集团、新的对立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在八十年代上半叶,我们这里有洛贝尔图斯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之后是席佩耳的激进的反对派和他在《人民论坛报》上的拥护者。“青年派”接替了他们,经过短暂的间歇以后,青年派又被修正主义者取代了。

下一步会怎么样,这是看不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近年来的激烈的理论斗争对党来说是过去了,而且丝毫没有动摇它的团结一致和它的自觉性。这一点从来没有象在慕尼黑表现得那样明显。甚至资产阶级报刊,这些最热切地探寻瓦解迹象的不祥的乌鸦,这一次也不敢如同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那样发表社论论述社会民主党即将分裂。我们的统一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事业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而这种信心是一种十分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它将使我们在最近一年取得新的胜利。

发表于1902年9月24日。译自《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2册第26期第807—809页。

爱·大 卫

慕尼黑的法庭（摘录）

（1902年10月）

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比预料的要温和些。

请大家想象一下党代表大会之前的党内情况。已经宣布要进行两次审判。一次是针对实践的机会主义，另一次是针对理论的机会主义。首先应当给巴伐利亚主张在选举权方面实行妥协的人洗脑筋，其次应当给“修正主义的机关报”即《社会主义月刊》一下决定性打击。

……

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企图为攻击修正主义者进行辩护的理由已经非常贫乏，这一次为了这一目的而不得不提出的借口更是破绽百出，牵强附会，一开始就不能成功。如果竟能用这样一种论据来取胜，那么党内的健康意识和正义感的情况就会是很不妙了。

首先就财政方面的理由来说吧，柏林的阿道夫·霍夫曼是通过强调这个理由来开始攻击的，但经过争论已使人毫不怀疑，《社会主义月刊》的撰稿者决不能为《新时代》的亏损负责。据考茨基对该刊编辑情况所做的详细说明，所谓《新时代》亏损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同志们听到党的财务处拨给《新时代》一万马克补助费就感到奇怪和激动，但是这笔钱决不是仅仅用来维持杂志的。一部分用来津贴一所与编辑部有联系的国际文献问讯处和一所培养社会主义青年作家的学院。另一部分则用来保证编辑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更多的科学工作。我们对这种用途本身毫不反对；我们只不过认为，如果不用这种一次总付的片面办法，而是按照具体情况和直接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来

支持或促成必要的科学工作,那会更好一些。

谴责的第二个理由选择得更不聪明:强调由于修正主义者不向《新时代》投稿而使它的思想水平退步这一事实。怎么,难道我们在汉诺威代表大会前后没有听说伯恩斯坦和他的一伙是一些糊涂虫,是无知和思想混乱的人,只会无聊地吹毛求疵和强词夺理,根本说不出什么新鲜有趣和有意义的东西吗?难道人家没有拿我们同某些原则守卫者的高等智慧和万无一失的才智相比,把我们说成是可怜虫吗?修正主义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搞他们无聊的假启蒙,因而《新时代》向渴望启蒙的工人喷洒的晶莹透彻的马克思主义清泉没有遭受污染,难道不应该为此感谢他们吗?现在人们却责备我们对《新时代》实行“抵制”,要求我们应当重新为《新时代》写稿,应当用修正主义的迷雾遮住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灿烂阳光了!是啊,一位反对修正主义的梅斯特同志甚至坦率而明确地告诉考茨基,如果他没有能力以不偏不倚和光明正大的办法使抱有不同意见的人能够为《新时代》撰稿,那就请他引咎辞职,让一个更合适的同志担任编辑。

根据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来自工人中的意见,《社会主义月刊》是“有趣”、“及时”和“易懂”的,《新时代》却变得枯燥难懂、不适于在工人中争取读者了。观点的改变多么大呵!这证明修正主义多么受人尊崇,而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多么贫乏!修正主义者迅速获得这样的赞许,是可以满意了。他们在用思想武器进行的战斗中没有吃败仗。

但是,对于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可耻的是,个别同志居然会想出这样的主意,认为在反对“内部敌人”的思想斗争中必须赶快求助于党的一项决议的权威。纯正教义的捍卫者本来真正可以做一件好事,一开始就从自己方面斩钉截铁地反对这个尝试。如果他们不能用思想武器来消灭修正主义流派,那么他们至少应当考虑到自己的科学荣誉而拒绝采取这种手段,因

为今天仅仅在那些把无条件的科学研究自由和言论自由看成绊脚石的党派和机构中，这种手段还会受到重视。

人们让罗尔瓦根提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并且丝毫没有尝试通过某种比较缓和的形式把这一提案所依据的愿望和想法提供表决。攻击者为了避免在党代表大会上遭到痛斥，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这个了。社会民主党如果把这样一个决议当作大棒，把党内思想工作的自由和对党进行批评的思想工作的自由一棍子打死，那它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了。我们确信，这种事是决不会发生的。个别已不再能客观地思考的同志朝这个方向进行的一切尝试碰到全党的健康意识都将遭到失败。自由的、思想上的继续工作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和最不可缺少的生存要素之一。给这种工作制造困难就意味着严重地损害党。

使党避免教条主义的僵化是进行科学工作的同志的任务。一个想征服世界的运动也必须在思想方面总是处于运动之中。党的陈旧的、已被认为错误的学说必须纠正，必要的时候还必须全部放弃。因为如果拖着任何一种错误的理论前进，它就必然或迟或早要成为实际成就道路上的障碍。对于一个战斗的、指引方向的党来说，公开承认自己的纲领中这个或那个“铁的”原理、自己喜欢用的这个或那个鼓动论据是错误的，这是不太舒服的。但是陈旧的观点一旦成了无用的负担，党就应当毫无畏惧地把它扔掉。让别的政党去抵抗科学认识的进步，或者只是缓慢地、勉强地跟在它的后面跛行吧，我们的党必须始终站在前列。在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研究之间是不容许出现紧张状态的。

可能有一些心胸狭窄和头脑简单的人，他们认为对自己的党的思想领域进行批评工作是不舒服和不愉快的。这种情况不应当妨碍那些胜任思想工作的同志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不愿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却想争取一些人的宠爱，那他们就要弄得连自己都鄙视自己了。对于那些人来说，只要思想上的继续工

作同他们老一套的思路相抵触，他们就会认为这只是令人不愉快的玩弄理论。批评的怀疑态度本来是一切科学的生命源泉，他们却认为这不过是缺乏信念。思想工作者不是现代工人运动中受宽容的同路人，而是不可缺少的战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是现代工人运动取得成就的最可靠的保证。但是只有在脑力劳动完成任务时不感到厌烦或困难的情况下，这种结合才得到健康的保证。

我们满意地回顾了慕尼黑代表大会的讨论。我们确信，这次讨论已经重新加强了党内的这一觉悟：思想活动的自由必须成为比一切权威更高的不可侵犯的财产。

发表于1902年10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2年第10期第757—761页。

(五)

在1903年7月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共获得三百多万张选票，八十一个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在这一形势下，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月刊》上提出，即使必须承担朝见皇帝的义务，党也要力争取得国会副议长的职位，福尔马尔立刻响应这一建议。从表面看来，这一问题似乎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它反映了修正主义者通过改变党的策略来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企图，因此在党内和党的报刊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德累斯顿大会也把党的策略问题列为主要的议程。

这一议程包括三个问题：国会选举；副议长问题；修正主义的意图。讨论开始时，大会根据辛格爾的提议决定首先由倍倍尔和福尔马尔分别代表持不同观点的两方发言，为辩论提供基础。倍倍尔作了长篇发言，他还和考茨基、辛格爾一起向大会提出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谴责修正主义者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并且把革命的党改变成改良政党的企图。发言和决议案在会上都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但是最后决议案仍以二八八票对十一票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伯恩斯坦、大卫和艾爾姆等投反对票）。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历史上，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是具有重要意义。倍倍尔在会上的发言和他在汉诺威大会上的报告曾被列宁评价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页）。上述决议还成为次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的决议的基

础。

这里选译了倍倍尔发言的主要内容和决议的全文，也选了辩论双方的部分发言。还选用了会前倍倍尔表示决心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几封信以及会后几篇对大会作不同评价的文章。

德累斯顿大会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再也没有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斯坦和修正主义进行过讨论和批判。但是，从这里选用的几篇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可以看出，修正主义远远没有被克服，修正主义者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在继续活动。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低估了这一危险，没有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终于使党受了修正主义的严重腐蚀，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最后遭到破产。

卡·考茨基致奥·倍倍尔

1903年1月5日于柏林弗里德里希

亲爱的奥古斯特：

我以为你还在美丽的洛迦诺，就往那儿给你去了一封信，谈的事情是你在柏林、在议会和执行委员会工作中恐怕很少关心的，即有关恩格斯遗著的事。狄茨已经在他新发表的《文献》^①目录预告中宣布他们将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我不知道狄茨怎么想到宣布由伯恩施坦来出版马克思遗著。马克思的继承人认为，再没有比伯恩施坦更不合适的人了。在这件事情上，甚至一个公开的敌人也比一个虚伪的而且还是糊涂的朋友好得多。他最近在《文献》上对梅林出版的马克思著作进行的评论又一次证明，他不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公正地评价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从一开始在一切事情上就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的遗著没有他的份。

但是恩格斯的遗著呢？^②

现在狄茨显然将催促人们把恩格斯遗著交给伯恩施坦。这是很糟糕的，但是也许无法改变。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可以提出一个要求：恩格斯的遗著不应当由伯恩施坦垄断，恩格斯的那些朋友对于恩格斯比他的这位“感恩”的学生更加忠实，应当让他们有可能监督伯恩施坦。

① 《社会主义文献》，一种有关社会主义历史、文献和书目的月刊，1901—1906年出版，由伯恩施坦主编。——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93年7月29日写的遗嘱中说，归他所有的或由他支配的全部手稿（马克思的手稿除外）和全部信件（马克思的私人信除外）遗赠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后在遗嘱补充中又将一部分信件改赠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妮。——编者注

我经常同恩格斯谈论法国的事情，我很了解他的看法，伯恩施坦却把恩格斯关于盖得和拉法格的信件弄得支离破碎地出版，使其中的观点同恩格斯对法国事情的真正看法相反。老实说，自从我看到伯恩施坦玩弄这种不体面的手腕以后，我相信他在这类文字工作上还会搞别的卑鄙手法。从此我不再尊重他了，从此我就担心，如果伯恩施坦掌握了恩格斯的遗著，他糟蹋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会比他出版拉萨尔著作时糟蹋拉萨尔还要厉害得多，他会片面地只出版合乎他心意的部分。

所以我们必须能够监督伯恩施坦，但只有不让伯恩施坦掌握恩格斯的遗著，而是把它交给党的档案馆，使别的人也能接触到它，才有可能进行监督。我相信，所有关心纪念恩格斯的人都会要求这样做。

如果伯恩施坦稍为懂得一点分寸，他一定会放弃出版恩格斯的遗著，因为要是恩格斯当年能够预料到伯恩施坦后来的发展，毫无疑问，他绝不会把他的遗著托付给伯恩施坦。要是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在世时就写出了《前提》，将军对他可不会象我们对他这样客气，将军会赏他一脚并且对他喊道：“滚出去，你这个无赖！”

当年伯恩施坦成为遗著的继承人，是因为他同今天截然相反。

但是不能再指望伯恩施坦有什么分寸感了。对一切给他带来名利的事，他是抓住不放的。虽然我们有冲突，他却抓住《新时代》为埃德尔海姆做广告^①，现在他坚持要以“忠实的学生”身分糟蹋去世的、不能自卫的恩格斯。

我们也许不能阻止此事。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许还能做到：恩格斯的遗著中一个主要的部分是“国际”的文件和记录。我一直认为把这些文件放在恩格斯的遗著内是不对的，它们属于

^① 参见本书第357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遗著，过去是由马克思持有并保存的，在马克思逝世后连同马克思的别的文件一起交给恩格斯保存，而不是归恩格斯所有。这些资料就象《资本论》第四卷一样，虽然保存在恩格斯那里，但并不属于他。

当伯恩施坦是个可以信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敌人，他同情所有在国际中阴谋反对马克思并且最后破坏了国际的分子。由这个人来垄断国际历史的重要资料，就意味着永远不可能正确阐述党史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了。为此我要求宣布国际的文件属于马克思的继承人所有，伯恩施坦无权索取。

我绝不是要求使这些文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秘密文献。在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些文件编写了一部国际的历史之后，我一点不反对马克思的继承人把它们归入党的档案馆，供每一个研究党史的人使用。

但是我声明，对马克思生平事业中最伟大时期的这些重要资料，马克思的学生们有优先索取权，而一个比公开的敌人更不理解马克思而且更加敌视马克思（这种情况是叛徒的特性）的人是没有这种权利的。

由于狄茨现在为他的《文献》找粮食，他多半将要求你把全部遗著交给伯恩施坦。我迫切地请求你务必只在此信中所说明的限度内去处理。我相信我的理由是有说服力的。

你们也许会说：这个人再也不适合干别的事了，总得给他点事干干。

把一家担负着批评党的全部文献这一任务的刊物交给这位高级糊涂虫已经是一个笑话。我们在《新时代》可不敢这么干，因为我们是很有责任心的。伯恩施坦是敢干的——象别涅斯托费尔在他的小报^①上所做的那样，因为他认为他自己什么

^① 恩格耳伯特·别涅斯托费尔(Engelbert Pernerstorfer 1850—1918)——奥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维·阿德勒的好友，出版《德意志言论》。——编者注

都行。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干任何别的事都太糊涂，因此我们就把我们的两位大师的遗著交给这个人去编辑，使他有点事可干，那就可笑到了极点，而且会造成冲突的新根源。

要是狄茨想挽救伯恩施坦，他就应当悄悄地让《文献》停刊并且把伯恩施坦塞进《实话》杂志^①去。当伯恩施坦接手办《文献》时，鬼就附上了他。只要伯恩施坦还能有地方扮演理论家的角色，争吵就没个完。

这封信写得尖锐了一点，本来是不打算这样写的，但是我一想到伯恩施坦会垄断我们的老人的遗著，总要发火。

再见了，向你们俩和狄慈根^②衷心祝贺新年！我很抱歉没有给狄慈根写信，不过我实在没有功夫。

你最忠实的 卡·考·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48—151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903年1月8日于苏黎世

亲爱的卡：

你寄往洛迦诺的信到那里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别为出版遗著的事不安。我不知道狄茨怎么能发表这类预告。我没有授权给他，而没有我的授权是不能出版遗著的。我已经对狄茨明确表示过我对伯恩施坦的想法并且告诉他我认为这样一种事业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讽刺性刊物。——编者注

② 狄根·狄慈根（Eugen Dietzgen 1862—1930）——约瑟夫·狄慈根之子，德国政论家；1880年底至1881年初侨居美国；《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后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编者注

只会花掉一大笔钱。圣诞节前发生的事弄得不可能进行任何心平气和的交谈，以致于我还没有见到狄茨，他就订了合同。

明天我动身去斯图加特，在那儿停一天，可能有机会和狄茨交换意见并听他谈谈他和伯恩施坦订了什么协议。

梅林最近教训了一下伯恩施坦，^①这使狄茨对伯恩施坦很恼火，他责备伯恩施坦粗心大意。

……

你的 奥·倍·

我大概星期一以前回家。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51—152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903年8月10日于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在高个子耶格^②认为再次演出他的大型政治剧的时机已到之后，我也还想在《新时代》上回敬他一下^③。我打算把那篇

① 梅林在《新时代》第21年卷（1902—1903）第1册第12期第383—384页上发表的《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版本》一文中纠正了伯恩施坦在1902年第11、12期《社会主义文献》上评论梅林出版的遗著版本时所说的一些意见。——编者注

② 耶格奥尔格·福尔马尔。——编者注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3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这一情况使修正主义者的“议会痴”愈加发展。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月刊》（1903年第7期）发表《从国会选举的结果中得出什么结论？》一文，公开建议党即使在必须承担朝见皇帝的义务的条件下也要在国会争得一席副议长地位。同时福尔马尔也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的演说中热烈响应这一建议。倍倍尔在《新时代》第21年卷（1902—1903）第2册第49期上发表题为《关于副议长问题和有关问题》的文章，批评了福尔马尔。——编者注

长文章发表在九月份的第二期，即在七日左右，或者使它正赶上党代表大会。当然也要使代表们得到登这篇文章的这一期，我不清楚，代表们是一开会就总能收到最新一期《新时代》，还是收到上一星期的《新时代》。你看怎样好？你认为我应该在哪个星期写出来？

福尔马尔确实作了非常错误的估计，显然他天真地以为他的时机已到，否则他肯定不会动手。而现在他看到绝大部分的党报，其中——说来可怕——甚至包括美因兹的报纸都声明反对他。这种情绪在代表大会上还会表现得更强烈一些，这么一来，他这次吃的败仗将是他生平最惨的一次。而且这是当着他在新闻界的祭司们的面发生的。尤其是自从《前进报》也不得不带着苦笑证实党的报刊大多数都拒绝福尔马尔—伯恩施坦建议以来，这种情形就使他非常烦恼了。

.....

你的 奥·倍·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54—155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903年8月29日于苏黎世居斯纳赫特

亲爱的卡尔：

信和校样^①已收到。我非常奇怪，不光是你，尤其是还有狄茨也没有发现多少地方要作改动。狄茨对谈到吵吵嚷嚷之徒的那一句也表示不满。我已经作了点改动，我认为顾虑可以解除了。既然你也不满意这句话，我愿意在修改时再斟酌一下新的措辞或者也许干脆删去它。

^① 倍倍尔的《关于副议长问题和有关问题》一文的校样。——编者注

我在修辞方面作了不少改动，还作了不少补充，特别是在结束部分。我的文章是以我那篇反驳菲尔斯滕瓦尔德的投稿^①为基础的，我曾担心其中在一般地反对修正主义方面讲得太少。这一点我已大大地作了弥补。

这将是一次爆炸性的辩论。我对此非常高兴，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这一次我们用老虎钳钳住了这一伙人，他们是挣不脱的。

我坚决劝你，要到第五十期，即代表大会快开时才发表你的文章^②，因为你的题目就是致代表大会。目前我的文章已经够人们读的了，又还要读你的（虽说你的文章总会短一点）。此外，如果对手们没法再回答，而要到德累斯顿才能还手，这丝毫没有害处。

我的文章的发表不会早于第四十九期。我很满意狄茨提出这个建议。

……

象现在这样大家都把伯恩施坦抛出来，确实是一件不体面的行为。在所有那些人当中，伯恩施坦是危险性最小的。^③他

① 据《前进报》8月18日报道，在柏林附近的菲尔斯滕瓦尔德召开了一个反对讨论副议长问题的会议。倍倍尔写了个声明来回答，《前进报》一开始拒绝刊登，但是后来还是在8月22日发表了。声明说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没有必要地被提到了重要位置，首先是福尔马尔造成的。——编者注

② 考茨基的文章《致党代表大会》，后来发表于《新时代》第21年卷（1902—1903）第2册第49期，是9月2日左右，如果是第50期则是9月9日左右，而德累斯顿大会是9月13日开幕的。——编者注

③ 阿德勒在1903年9月13日的维也纳的《工人报》上写道：“……伯恩施坦曾经一再充当替罪羊的角色，这使他精神上的勇敢比他策略上的灵活和聪明赢得更多的声誉，但是他那一伙对他这一点的报答也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么坏。一旦发现不能争取党内群众来支持这类外交策略时，他们（从福尔马尔到海涅）可以说在第一个回合就干脆把他抛开不管。倍倍尔说得很中肯，他们先把可怜的伯恩施坦捧成他们的旗手，现在又把他贬成他们的捣乱者。他被大家习惯地称作修正主义者的那个集团无情地当作替罪羊而赶了出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和他不同，完全相反，是因为他，按照休特古姆风趣的说法，“不能滴水不漏”，是因为他缺乏修正主义的勇敢品质中最好的部分，即小心翼翼。”——编者注

的建议只是在福尔马尔为之大卖力气时才成了危险的。福尔马尔、海涅、休特古姆、亨利希·布劳恩、格腊德纳乌厄尔、奥艾尔这些人确实是危险的。但是一旦他们的真面目暴露出来，这种危险性也就没有了。

向你衷心问好。

奥·倍倍尔

克拉拉担心维克多又要来德累斯顿^①为修正主义者招摇撞骗。让他来好了，但是我会马上对他说，他要是个朋友，我很欢迎，他要是来当高级骗子，那就让他见鬼去吧。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55—157页。

奥·倍倍尔致卡·考茨基（摘录）

1903年9月9日于斯图加特

亲爱的卡尔：

……

说老实话，我觉得你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②太软弱了。要是我们一开头就想向修正主义者表明，我们只是叫，但不想咬，他们会暗中发笑，而神殿就再一次得救了。那么上一期《青年》上的画和诗就说对了。^③

我可不光是叫，我咬。这一回我要把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不过要非常冷静。党应当了解，道德败坏和出卖党的利益的行

① 维克多·阿德勒以来宾身分出席了德累斯顿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指《致党代表大会》一文。——编者注

③ 慕尼黑的《青年》周刊（艺术和生活画报）在1903年第2册第37期上刊登了漫画和讽刺诗，预言德累斯顿大会上倍倍尔和福尔马尔在副议长问题上的斗争将以和解告终，标题是《德累斯顿的兄弟相残》。——编者注

为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可以由有关的人去作出结论。

我不喜欢今后五年中在国会党团内关起门来和我们的修正主义者纠缠，我愿意有个明确的进军路线。

.....

我刚才在你文章的结尾处又看到了“党内和平”^①，我可真火极了。要就是真心诚意的和平，否则就不要。要我帮忙维持目前现状，我宁可退休还乡。

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倍倍尔

译自《倍倍尔和考茨基通信集》1971年阿森德文版第161页。

^① 考茨基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一文中用的是“内部和平”一词，但此文写于本信之后，而在此信之前写的两篇文章《致党代表大会》和《向党代表大会再进一言》中并没有发现“党内和平”一词。——编者注

在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奥·倍倍尔（摘录）

（9月17日）

党员同志们，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必须通知你们，考茨基、辛格尔和我向你们建议，对我们共同提出的第130号决议案作一点修改。我们起初没有商量，各人起草了一项决议案。前天晚上很迟的时候，在开完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之后，我们从十点半钟一直讨论到半夜。这时负责誊清决议案的人没有发现目前的这个第一条已被我们三人、也就是包括起草者本人否定了，我们已一致决定改成另一条，这就是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党代表大会认为，国会党团固然可以行使它的权利，从它的成员中提出候选人以取得帝国议会第一副议长和一名记录的职位，但是它应当拒绝承担不以帝国宪法或帝国议会议事规则为根据的进宫朝见的义务或其他义务。”

你们大家已一致作出决定，认为尽管目前这项议程的正式题目叫“策略”，但是它也应当同时特别考虑到国会选举、它的经过情况和它对于党或者说对于党团今后行动的意义。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这也是因为，在选举之后，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外国的对选举结果非常高兴的党员同志那里，在我们的敌人那里都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在取得这一远远超出预料的巨大成就以后将怎么办？这一问题本身已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选举的成果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今后的活动有很大的意义，很有可能使党团或者说党的整个态度发生改变。特别是有一家报纸（最近几天在这里多次提到它的名字，不过它不是《未来报》）在选举以后立即在一篇社论中非常客观地论述了党团今后是否也

会在国会中坚持它迄今的所谓的否定态度这一问题。考茨基也是立即就在紧接着出版的一期《新时代》上发表了《今后怎么办?》，在这篇文章中同样提出了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很精彩的地方，但是看完以后我并不比原来更加聪明多少，考茨基的文章往常是很少使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我对自己说：他提出了“今后怎么办？”这一问题，却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外国的党报，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报》（我读这家报纸时总是很感兴趣的）也就类似的一些思想进行了讨论。因此我的任务也是要首先讨论这一问题：今年夏天的选举带来了什么变化以及它可能对党的态度、特别是国会党团的策略产生什么影响？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我们得到的选票从1898年的大约210万零7千张增加到大约301万张（确切数字还没有）。票数增加了90万以上，也就是大约43.7%。固然要考虑到，1898年以来人口增加了8%。有选举权的人的数目增加得还要多一些，因为德国人的平均年龄提高了。而且一般说来，参加选举的情况比1898年更加踊跃，几乎所有的党派得到的选票都超过1898年，当然没有一个党象我们增加得这么多。1898年我们有58名议员，1903年增加到81名；这就是说，1898年我们的党团占全部国会议员的14.6%，1903年占20.4%。社会民主党的成就主要是靠使左翼资产阶级政党得票减少而取得的。我们也夺取了若干中央党选区，甚至保守党选区，而且如果选举机会对我们再稍微有利一些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还会大得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损失很大，这主要是对我们有利。由此可见，从总数说来左派的变化不大，不过动摇不定的人和三心二意的人退出了，我们代替了他们的位置。由此可见，今后在国会中讨论人民的要求时既必须按照资产阶级自由的精神、也特别必须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发言的那些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就这一限度来说已经发生了对左派有利的巨大变化，但是就国会投票作出决定特别是作出重要决定来说，几乎不能指望会发生

任何改变。即使在本届国会中中央党也可以在两种情况下获得多数。如果中央党同右派和民族自由党（它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指望这两个党）合作，它就能占多数，如果它同左派合作（这种情况决不会涉及主要问题和根本问题，而且在下届国会中将比以前更稀少），那就会出现起决定作用的左派多数。

另一方面，由于选举的结局，右翼方面的人将远远比过去更加团结。资产阶级的恐惧在复选时已经表现出来，这种恐惧促使资产阶级政党的大多数拥护者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在问题涉及最坏的反动分子时也是如此，这种恐惧将来在国会中的党派那里，特别是在中央党那里还会进一步表现出来。我坚决相信，中央党以及右派各党今后在国会中将比过去更加倾向于采取反动的行动。我们对这一点可不应当看错。《十字报》在它复选结果的感受还很新鲜的时候立即写道：“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抛弃一切疑虑，把罗马和维腾堡之间的斗争^①从政治生活中排除掉。”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这是一场使德意志帝国分裂了将近四百年的斗争，是一场整个说来一直到今天都对德意志帝国的全部思想的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惊人的有害影响的斗争，现在这一斗争应当愈来愈向后靠，应当愈来愈出现一种团结的局面，但不是为了促进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是相反，是为了压制和控制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这次选举斗争在资产阶级党派、特别是右翼党派那里造成的结果。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细心的观察者在若干年以前就已经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了。德国皇帝由于他那容易冲动的气质，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而在这一方面来说恰好也是如此。我们能够根据他的态度相当准确地判断地位举足轻重的那些人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够根据他的态度十分精确地看出风往那边吹，世界上唯一的新教帝国的这位代表好多年来对

^① 指基督教的新旧教会之间的斗争。——编者注

待天主教教会首脑以及高级和低级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态度是有高度典型意义的，它表明潮流向何处去：向后，向后，堂·罗德里哥！再向后！^①对于恰好是我们党如此大幅度地增加选票这件事情来说，这或许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而且从来没有否认——这对我们来说毕竟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在一切选举中（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最初几次选举也许除外，那时选举社会民主党人是危险的），给我们的候选人投的票有相当多的数目是来自暂时还没有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人。这是所谓的“同路人”。推动这些人的动机是很不相同的，当然不能一一具体判定。但我们是有这样的同路人的，我们可以承认，随着整个党的发展，同路人的数目所占的百分比也在增加。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肯定，尽管每次选举的同路人的数目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些，社会民主党本身的选票数目却按照一种自然规律的确定性愈来愈增加，尽管在今后的选举中这一或那一同路人会走开，但是会有新的同路人代替他们，而且坚持留在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数目是随着同路人的数目同时增加的。这一点是决定性的和特别令人高兴的。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一方面坚定地信赖我们的拥护者。在我们的同志以及这些同路人、拥护者和志同道合的人（我们这样称呼没有参加组织的人）中间，不可能有一个人在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时会怀疑自己选举的是什么人。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候选人和传单竟忘了说明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敌人是替我们承担了宣传工作的，他们把我们描绘得如此邪恶，如此危险，以致我常常对自己说：他们把我们变成了这样的怪物，但是这些怪物却得到这么多的选票，这是令人吃惊的。一切吓唬人的手段在这些人身上都丝毫不起作用，他们反而说：你们愿意怎么嘀嘀咕咕，咒骂和诽谤就怎么做吧，我

^① 见莱辛《智者》第28段。——编者注

反正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

.....

我们从来不相信我们能使直接税得到实行，一般说来我们是被迫去做许多我们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情。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能立刻实现某件事，而是在于我们必须要求实现它，因为它是正当的，明智的，从而是必须的。我们必须依靠我们举出的理由使议会外的人确信，我们的帝国和各邦今天实行的全部政策，尽管在这里或那里也有一块遮羞布，但毫无例外都是一种阶级政策，帝国和邦都是阶级国家，只要它们保持目前的状态，这种情况也将继续下去。

.....

现在产生了我们是否应当改变我们迄今的策略这个问题。一个政党在什么时候必须改变自己的策略呢？不言而喻，任何一种策略都不是永恒的。李卜克内西有一次用他的激烈的方式说过：如果有必要，我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二十四次改变我的策略。这种说法是很激烈的，却是很正确的。不过每个政党的策略必须适应党所依靠的基本原理，如果我真正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二十四次改变我的策略，那么在这二十四次中一次也不应当同党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这是决定性的！现在大家当然可以争论我们是否确实已同我们的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只能由党本身和事业的成就作出决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党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都说明，我们从上述观点出发也丝毫没有理由改变我们迄今的久经考验的策略。其次，也可能因为策略已表明是错误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而必须对它进行修改。在这方面也没有出现任何情况。当然是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发展壮大，我们的议员增加了，因此我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改变我们的策略，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刹车或者克制，不，在这批广大的选民群众根据我们迄今的策略、斗争和态度，通过投票对我们表示肯定和同意之后，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热烈地、更加坚决地

和更加迅速地前进。当然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决不是站在我们习惯称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一边——他们在最近这次选举以后要求我们在提出立法倡议、起草法律草案等等方面开展广泛的议会活动，我必须讲几句话来相当彻底地摧毁这些幻想。一般说来政党制定重大的法律草案并且提供国会讨论的情况是不常见的，因为这是艰巨的工作。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善良的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怎样拿这样的立法草案给我找了麻烦。这是在萨克森邦议会上，我们批评了矿山法并且要求修改。部长说，政府承认需要修改，但是这要花费时间，要思考，调查和研究。于是我们这位老人，他始终是一个轻骑兵，他就骑马朝这里冲过来了，他说：什么？我用五分钟就可以做到。啊，话说出口了，这时我对自己说：这一下我们可卷进去了！部长当然是聪明的，他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这么快就做到，那就请他们干吧！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干了，因为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我告诉你们，我花了十四个白天和黑夜坐在那里流汗，才完成了后来拿到党团中去讨论的那一草案。它是不完善的，但是至少有了一个草案。其次我要提到我们伟大的工人保护立法草案，并且要对你们承认一件事。在敌人眼里，甚至在我们的一大部分同志的眼里，我属于那些不愿意做实际工作的人之列，就在上星期我还被称为死守原则的人，说我永远是拿出自己的那一套空话来，而且总是表示否定。除了一个短暂的间歇之外，我在国会呆了三十六年，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我这个总是否定的人提出过更多的立法倡议和起草过更多的立法草案。我们的工人保护立法草案在赫克纳关于工人问题的书^①里大受赞扬。后来当我们重新提出这一草案时，特别在纳乌曼和格尔拉赫两位先生的报纸上是一片赞扬之声，他们要求国会应当一致通过这一草案。唉，尊敬的先生们（倍倍尔转向坐在记者

^① 指亨利希·赫克纳的《工人问题》（1894年柏林版，1902年第3版）。——编者注

席上的纳乌曼和冯·格尔拉赫），你们知道是谁起草了第一个草案吗？这就是我，是这个总是否定的人！提出法律草案肯定是很好的，但是起草法律草案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们有一切理由在制定大的法律草案时尽可能慎重从事。我们必须把这件事留给别人去做，他们是被任命来干这种事的，而且拿了薪金，这就是枢密顾问先生们；他们有材料，他们有专门知识，也有可能进行调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议会中做的工作已经使我们过分疲劳了。难道你们认为，现在有了八十一个人，就能够强迫多数认为我们的立法倡议比别的倡议好吗？辛格尔和我曾经在国会常务委员会中徒劳地对那些先生们说明，议会除了讨论政府提案外还有别的事要做。我们这样做是对牛弹琴。我只能对你们说，我们再也无法提出立法倡议了；如果我们按照蒂姆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建议设立一个处理工人保护法律和考虑一切有关提案的社会委员会，你们当真设想这样就可以有所作为吗？当然，这是非常需要的，不过我还要讲到决定性的¹一点，可惜我们对于这一点也一直是太不注意了。要想国会除了处理其他的讨论题目以外还彻底解决这些事情，这从议事规则来说是不可能的，否则国会必须整年开会才行，不仅如此，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德意志帝国以及世界上的其他议会的全部立法工作是如此可怜，如此不充分和有缺陷，以致如果今天完成了一项法律，明天所有的人就已经看到必须再一次加以改变。我们已不再能够制定任何重大的、根本性的法律，因为不再有支持这种法律的多数派了。萨维尼^①在上一世纪上半期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立法的使命，这句话今天也还适用。原因何在呢？因为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致人们最后只制定不完整的法律，而不再能制定完整的法律了。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一世纪初拿破仑法典产生了，这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立法成果。拿破仑法典是

^①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 1779—1861)
——德国资产阶级法学家，曾在普鲁士政府中负责修订法律。——编者注

革命的成果,是那一光辉灿烂时代的成果,从那以后资产阶级社会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一些最杰出的人物为这一作品出了力——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使它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这一作品是完美的,它直到今天还在法国存在着。现在我要问佛罗梅和施塔特哈根以及所有在委员会中参加制定资产阶级法典工作的人:三年前我们有了资产阶级法典,现在我们已到处都发现缺陷、含混和暧昧不明之处了!拿工商业条例来说吧,三十年以来对工商业条例作了什么样的修修补补啊!工商业条例在1869年是一个好东西。后来增加了一些补充条例,今天它已成了一个可怜的东拼西凑、矛盾百出的东西了。由此可见,时代已不再有立法的使命了,人们已不再能制定严密的法律了,因为不断发展的利益冲突和阶级矛盾使它不可能了。我常常问自己:在这种形势下议会活动到底是否值得我们花费劳力、时间和金钱呢?我们在国会中往往是进行单调乏味的工作。我好几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但是不言而喻,我是太热爱战斗了,因此不会长时间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对自己说: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只好排除困难干下去,闯出一条路来!我们尽力而为,但是对形势不要有幻想!我对你们说明这一情况,只是为了使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八十一名议员,就一定会在议会里大显身手。这里分发的著作中有一篇提到了1871年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那次会上已经提出十小时工作日的提案。这是三十二年以前!与此同时在爱森纳赫举行了所谓的社会代表会议,它也宣布支持十小时工作日。鲁道夫·迈尔^①声称(我想他还证明了)俾斯麦当时甚至建议起草一次提到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草案。据说这一草案要为工业工人和为农业工人规定十小时工作日(我们直到现在还不敢为农业工人要求这一点),而且农业工人的劳动时间规定为冬天八小时,春

^① 鲁道夫·赫尔曼·迈尔(Rudolf Hermann Meyer 生于1839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改良家。——编者注

天和秋天十小时，夏天十二小时。农村已经度过了三十个年头，今天又怎么样呢？我当然是八小时工作日的坚信不疑的拥护者。在这个大厅里恐怕没有人比我更加确信它的必要性，但是我十分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今天争取到了十小时工作日，我们就会很高兴了。所以说不要有幻想，在任何领域都不要有！这对你们的肉体和精神都没有害处，相反，这只会对你们有好处。——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将一如既往处于某种孤立状态并且仍旧是最激烈的反对派。这当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让步而且认为值得为此花费力量，我们就接受让步。当然我们曾经屡次为这些让步的价值进行争论。党团的右的方面（姑且用这种说法）连最微小的让步都愿意，尽管按照我的信念这些让步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我曾经问自己：如果我们无须投票赞成这些让步也能得到它们的话，我究竟为什么应当去投票赞成呢？我究竟为什么应当通过投票赞成这些让步而在一定程度上败坏我在议会中的声誉呢？但是当我们判断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让步时，我们就投票赞成。在最近一次讨论工伤保险的补充条例时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尖刻的讽刺象冰雹一样飞来，最后党团以十四票对十三票决定接受补充条例。于是我们投了赞成票，这时雅斯特洛夫博士（克瓦尔克^①昨天把他说成是社会糖水零售商中的一个）出来在《法兰克福报》上写文章说，甚至社会民主党也投票赞成这一可怜的补充条例，这确实是空前的。党团中的斗争就是这样的，我可以坦率地对你们讲，在党团的新的组成情况下，这样的斗争将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我在上面称之为党团的右的方面的那些人，在新的国会中将能够比以前更加容易占上风，因此我认为党必须对形势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团规定策略。这是就一般能做到的程度来说。当然不能设想党代表大会在一切问题上

^① 麦克斯·克瓦尔克（Max Quarck 1860—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国会议员。——编者注

都明确规定党团应当怎样行动。党代表大会只能作出指示，它可以指明前进的路线。它这样做了，党团就必须按照这一路线前进，不管是否愿意。（海涅：很正确！）您恐怕必须这样，海涅同志，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恐怕还会更好一些，那时当然会说：谁不服从就出去。我这样说不是指任何一个人，而是纯粹客观地说的。如果党代表大会对党团作出一次指示，党团就必须遵循。如果党代表大会确信党团应对严重的过错负责，它当然会立即提出严厉的谴责。在这以后情况当然就会不一样了。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政治形势和议会形势的概况。党对此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必须象水晶或玻璃一样明确和清楚，因为不允许有任何东西使敌人哪怕只有极小的可能说：这次巨大胜利的结果原来就是如此，社会民主党和迄今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情况一样：当它们达到了某一顶点时，它们就变了，就放弃它们的基本原则，于是它们就一切都完了。我们在许多方面已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继承人，但不是象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文章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继承人，他说我们必须“接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我们必须超过它。（海涅喊道：我写的是，要去“实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企图做的事！这就是说要超过它！）去接替和去实现，但是我不是按照您的意思那样理解的。您以后有权利讲这一点。可惜党的报刊对这篇文章的意义不是象我这样评价的。对于您的这一意见，我已经讲了我的看法。在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表现得愈来愈清楚了：不是单纯地排除自由主义党派，而是要接替它们。”如果我接替某一个被排除的人，那就是说：我应当实现他迄今在实行而现在已不再能实行的事。您（向着海涅）毕竟是律师，是语言学家，是一个研究过逻辑的人，而对于一篇在某种程度上表述一个纲领的文章，我们当然要求它是清楚的，用不着人们去争论它说的是什么意思。（海涅喊道：请您往下念！）下面是这样的：“……它要负

起责任，不是去取消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概念，而是去实现这些观念。”啊，尊敬的同志，难道我们迄今没有这样做吗？难道我们迄今在国会中否定过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概念吗？我们迄今已经努力求得您所说的那种意义的“实现”，而且超过了它。但是在这整个辩论中我们还会多次遇到我们就概念进行争论的情况。你们对此是有体会的：伯恩哈特^①写了一篇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的文章。但是他说：“啊，我并不愿意这样讲，但是我没法明确表述我的想法；我很遗憾做了这件事。我也保证不再做了。”这时我们作为宽大的法官必须说：“如果你做了某一件你对其重要性不清楚的事，你当然应当得到原谅。”后来觉勒^②在《未来》上发表了文章，这篇文章伯恩哈特没有看过。当《新时代》向他指出这篇文章时，他认为这篇文章并不重要。当我描绘了他的做法时，他大吃一惊，控制不住自己，用最粗野的话来骂我，并且宣称他不知道那篇文章；他太天真了——不是就字面上说，而是就意义上说——竟没有对《新时代》上的文章给予足够的重视，等等。我们可不要上当。还会有人说，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表述清楚，他想说的并不是人们按照逻辑必然会从词句中看出的那个意思。而最后还可能象在汉诺威和在以后的代表大会上那样，经过几天的争论后通过一个决议，但是后来仍旧象以前那样不一致。可不要说什么党内的统一和一致了！昨天布劳恩已经弹过这根弦了，他说我们党内是一致的。这不是事实，我最坚决地反对这样说；我们恰好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现在更加不团结，分歧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现在更大！要掩盖这一点，要再一次用糖水蒙混过去，从我个人来说我已经对这一套厌烦透顶了！

① 格奥尔格·伯恩哈特 (Georg Bernhard) ——德国社会民主党员，机会主义分子，曾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对党不利的文章。——编者注

② 保尔·觉勒 (Paul Göhre 1864—1928) ——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国会议员，曾经是牧师。——编者注

十二年来，自从在爱尔福特和福尔马尔进行了大论战以来，我把好多话咽到肚里，这常常使我烦恼。我一再上当，伸出手来调解矛盾，最后我终于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现在，我们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必须把帐算清，我们互相之间必须尽可能彻底地开诚布公。大家知道，整个新的“修正主义”运动的依据是伯恩斯坦的一本书。他那时幸而是在伦敦。因为自从他有机会到德国来（我衷心希望这会使他幸福，而且我本人曾尽力促成这件事），自从他在德国做实际工作以来，依我看，他没有赢得声望，而是丧失了声望，不仅是在激进主义者中间，而且尤其是在他的朋友们、在修正主义者中间丧失了声望。当初，他的朋友们把他当作救世主一样热烈欢迎，他们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新的福音，新的信念和新的策略，但是最近对于这个人还有什么话没说呢！现在忽然有人说：砸死他，砸死他！这不是因为他收回了他说过的话（哪怕只是一句），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他把话说得太愚蠢，太露骨了。所以人们狠狠地责备他，甚至说：“如果事情这么发展下去的话，他就必须退党！”这句话我们中间至今还没有人说过，这是直到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伯恩斯坦同志的追随者的那些人向他喊出来的。伯恩斯坦正是在某种程度上露出了真面目，表明自己是他的朋友们的*enfant terrible*，也就是一个直率得令人发窘的孩子。由于伯恩斯坦已经在许多人面前威信扫地，所以人们也就不太重视他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即选举一位甚至必须履行议会惯例所规定的进宫朝见义务的副议长。实际上，我对于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就很生气（这一点奥艾尔可以拿我的信来证明），因为我对自己说过：在党内充满着对于选举胜利的极大欢乐的时刻，在除了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以外，全党都确信现在需要乘胜前进，转入攻势，更敏锐地抓住时机，凭借更多的人的力量扩大目前已有的成果的时刻，在这个重大的时刻，他提出了副议长问题并且宣称：“即使我们必须进宫朝见，也不要因此就束缚我们的手脚！”难道伯恩斯坦从他自己

的立场出发，还能做出比这更愚蠢、更荒谬的事情吗？而且是在布勒斯劳和埃森的演说^①还使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就象吃了最凶狠的一记耳光那样脸上发烧的时刻；在每一个稍微能思考的人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上面在准备干什么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人们不得不对自己说：我们要在这里对付的那个统治势力代表人物^②曾经如此频繁地宣布：“归根结底，军队是用来镇压国内敌人的！”难道伯恩施坦认为，这一切会在德国无产者的头脑中消失吗？如果这个人有一天认为向我们攻击的时间已到，他就会下令动员他所指挥的海上和陆上的武装力量，难道伯恩施坦以为我们中间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吗？这个人说过：“只要有命令，你们就必须向父母开枪！”难道这句话已被忘记了吗？谁要是看不到这些，谁要是不知道这些，谁就干脆别去当政治家！根据我的估计，伯恩施坦的声望显然已经一落千丈，并且，就我在居斯纳赫特从我的天文台所能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也有一大部分党报认为，不值得用很大力量去反对他。在这样的重大时刻竟发生这种愚蠢的干扰，我很气愤。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尽管也有较大部分的党报（包括一部分在策略问题上通常不反对我的党报）责备我，但另一方面，我从事党的工作这么久，而且你们知道，这些年来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我却从未象现在这样得到这么多同志的赞同，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书面证明。如果一句话说得恰如其分并且正是时候，我们的同志是感到高兴的。我在国会党团和党内还从未遇到过现在这种情况，还从未象现在这样从党员同志们、包括从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和英国的党员同志们（这是德国同志，不是其他国家的同志）得到如此多的赞同意见，直到这一时刻我还在一封接一封地收到来信。所有这些同志都为终于解决了一件万分棘手的事情而高兴。这是一种在柏林，尤其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根本发现不了、

^① 指德皇威廉二世于1902年发表的两次攻击社会民主党的演说。——编者注

^② 指德皇威廉二世。——编者注

接触不到的情绪。这十分令人吃惊,但事情就是如此,人们在节骨眼上麻木不仁,头脑不清,同党的灵魂失去了接触,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中,我们有哪一次经历过象这个问题上一样的愤怒的风暴呢?当然,这主要是在福尔马尔同志进入格斗场以后发生的,他不仅捡起了伯恩斯坦说过的话,而且按他自己的方式把这些话扩展、加深并论证得更加精确了。福尔马尔是不轻易出场的,尤其不轻易以提出纲领的形式出场,然而,如果他认为到了他个人要为一件事全力以赴的时刻,他就会郑重其事地去做,那时他简直就象马上要宣布一种新的学说一样。在慕尼黑的情况也就是这样。我本来已经认为这件事结束了,我们只需要在党团里研究它就行了。我已经对自己说:现在你总算也可以安静地睡觉了。这时从慕尼黑传来了福尔马尔发表演说的消息。大家还记得福尔马尔1891年的行为,那时他在大剧院发表了纲领性演说,他因此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欢呼喝采。那时是这样说的:啊,这是党内唯一懂得摸索时代的脉搏的人。现在也是这样。特别是此时此地坐在我面前的纳乌曼先生,他曾经认真地恳求他说:“您是了解形势的人!务必请您从巴伐利亚的山上下来,到这里来担任领导,整个民族会用欢呼来迎接您。”说到欢呼当然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慕尼黑是有过欢呼的;只要福尔马尔来到慕尼黑,那里总是有欢呼的。慕尼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卡普阿^①。在慕尼黑,任何人都不能持久地不受到啤酒杯的惩罚。在慕尼黑,党的最辉煌的支柱经过一段时间也要垮台的。你们看一看这位帕尔乌斯,不久之前每一个人都还发誓说他是一个地道的激进派。当这个辉煌的支柱在慕尼黑住了一些时候以后,他垮了,他颓丧地躺在海德豪斯沼泽里了。当然,他曾经是激进派,他垮下来是同

^① 卡普阿是古代意大利以奢侈著名的城市,迦太基人的统帅汉尼拔一生所向无敌,但是在他的军队驻扎卡普阿并受到奢侈生活的腐蚀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直至失败。——编者注

修正主义者垮下来的情况不一样的，但他毕竟是垮了。他和另一些人的遭遇一样，他们去慕尼黑时是勇敢的、忠于原则的、坚定的同志，我看到这里的桌子旁边坐着几个这样的同志。在慕尼黑过了几年以后他们的思想和灵魂都垮了。这是我的印象，而且如果我自己搬到慕尼黑去，我相信我也要为自己担心。福尔马尔的行动不仅受到慕尼黑多数同志的欢呼和鼓掌，而且也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欢呼和鼓掌，几乎无一例外。我们党内已逐渐达到这样的地步，有某一批人在自己周围聚集了整整一群捧场的资产阶级记者作为祭司。我不是说，他们是被召唤来的。不，他们是自己朝这批同志靠拢的，他们是自愿来欢呼，来称颂的。我最近难道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福尔马尔，巴伐利亚的无冕之王！但是巴伐利亚的党的大多数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他们的无冕之王是丝毫不感兴趣的。巴伐利亚的情绪使我非常高兴。拜罗伊特，请记住是拜罗伊特，它走在前面，首先宣布反对福尔马尔的演说。这使我大为满意。巴伐利亚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报纸曾经说整个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都和福尔马尔意见一致。但是几天以后我们的七十八岁的老同志加布里尔·勒文施坦^①（他是代表，现在在这里）宣布：我不！泽吉茨^②同样是立刻说：我不！哈勒同样拒绝了福尔马尔的观点，不可能指望他会是别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弗兰茨·埃尔哈特^③，这位莱茵河畔的普伐尔茨选帝侯直到今天还保持沉默（麦斯特：不，他也已经说了，他不参加）。是这样吗？这叫我高兴。我已经认为你（朝着埃尔哈特）也迷路了。如果人们能争取到象你这样的一个伙伴，那是很有价值的。这种情绪在全党都表现出来了，

-
- ① 加布里尔·勒文施坦（Gabriel Löwenstein 1826—1911）——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之一，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编者注
- ② 马丁·泽吉茨（Martin Segitz 1853—1927）——工会工作者，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编者注
- ③ 弗兰茨·约瑟夫·埃尔哈特（Franz Joseph Ehrhart 1853—1908）——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国会议员，党内戏称为“红色普伐尔茨伯爵”。——编者注

这不是上面造成的，而是自下而上自发地产生的。我这一次没有带头，福尔马尔一说话，几乎全部党报都明确表示态度反对福尔马尔。到处都爆发了。在整个党内从下而上一致迸发出愤怒的喊叫声。也有人反对这样做。例如奥艾尔在最近一期的《社会主义月刊》（他只在那上面写文章，对他来说《新时代》似乎已不再存在了）上以他那种著名的机智的方式说，一件十分次要的事情被打扮成一场大型政治剧了。他认为这件事固然不是没有引起严重的反响，但是这一建议提出时恰好碰上新闻淡季^①，这一情况恐怕不是不起作用的。我深信奥艾尔是真心实意这样想的，这也完全符合他的为人。但是我为党内任何人都不能象为奥艾尔那样感到遗憾，他竟如此判断这些已经证明党心非常激动的事件。这些演说确实已经动摇了党的基础，这时要说争论是由微不足道的的原因引起的，这不是事实，正象另一种认为这次代表大会上前几天的辩论是文人争吵的说法是错误的一样。只有丧失了真正的基础、丧失了原则立场的人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奥艾尔认为这些事件毫无意义，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当然，他说党内斗争在我们这里通常是占用了夏季月份，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盛夏。我们恰好在夏天争论，这是因为我们大家，党的领袖和党团成员，在秋天，在冬天，一直到春天很晚的时候都在从事议会活动，只是到夏天才有时间考虑我们自己的事，进行理论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进行论战。关于副议长问题本身，我已经在《新时代》上我的文章中详细发表了意见。我在这里无须细谈了。我要回答对我的文章的攻击，并且但愿今后也有机会来回答。……

……

……请你们继续听下去：当《法兰克福报》的那个起初尽

^① 或称“新闻饥荒期”，指每年盛夏因议会休会等原因报纸上通常缺乏重大政治新闻的情况，这时报纸往往在小事上大做文章。——编者注

一切力量拉福尔马尔的撰稿人察觉党内的形势时，他在《法兰克福报》的一篇通讯中说：“如果有人认为，多数派会考虑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副议长（即使社会民主党人接受向他们提出的那些条件），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只有在这个党进一步改变时才谈得上这件事。……如果这种新的精神进入党内，那么能够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刻就到了！连民族自由党人、甚至连中央党也没有想到而且不可能想到让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坐在副议长席上。现在，也就是在这一争执发展成一场原则性的争论以后，应当再一次十分坦率地说明这一点。”事情没有搞成，还受了嘲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惹得你们现在争吵起来了；但这场争吵是白费劲，我们根本不想让你们当副议长；你们争了几个星期，但这全都是白费劲！这些人起初支持一个人，现在却叫他在道义上吃了一大得无以复加的败仗！权力问题！问题在于权力的增长；一般说来这就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人们希望最后在政府中获得权力，这里和伏日山脉那边^①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首先在一届内阁中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员枢密顾问，或者有一个副部长，或者甚至有一个部长那该多好！那时将会怎样？我们姑且假设，他们挑选你们队伍中最能干的人，比方说让福尔马尔当内政部长。你们难道认为他那时就能够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制定法律草案吗？要知道还有全部资产阶级在那里，他们刚刚才把自己的人派进政府，他们居然会允许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进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设想，那就是，他们十分明确地知道，他们通过这样做能够从内部瓦解社会民主党，能够使它变得同现在不一样。皇帝的确作过这样的批注：“唉，如果我们有一个米勒兰多好！”如果人们问我，我会说：我们有福尔马尔，他至少是同米勒兰不相上下的。至少他的策略同米勒兰的策略是一回事，而在我看来这是重大的

^① 指法国。——编者注

错误。我们这儿的情况当然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在我们这儿，在最后关头总是这样说的：要么弯曲，要么折断，既然不弯曲，那就折断了。你们不妨假设这样的情况：权威人士中有人指望通过从我们队伍中吸收一个人进入政府而得到好处，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工人产生影响。你们以为这件事没有让步能够进行吗？我给你们这个，是要你给我那个！没有人比福尔马尔更懂得这一条政治原则，为此人们会让给我们一点权力，这比你们所想象的要微小得多。好几年以来民族自由党人方面都有高个子默莱尔呆在政府里，两个星期以前我在民族自由党的《汉诺威信使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它的宗旨是：尊敬的同志，请您尽可能迅速地退出内阁吧；您在那里对我们毫无用处，您只是使我们丢脸。连民族自由党都是这样。让我们假设我们党也有可能遇到有些类似的情况，那时人们会对我们说：公平交易，我们对你们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但是现在请你们劳驾也投票赞成国家预算吧！你们现在必须接受陆军和海军预算、殖民地预算、对外政策、间接税、粮食关税、献金，把全部预算连皮带毛都吞下去，然后我们对你们作出让步。正象海涅的那次演说里那样说的：用大炮换人民的权利！^①（海涅：这么说您毕竟又提起这件事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次演说更为天真的东西。我已经反复讲过，一个强大的政府意味着一个软弱的议会。你们愈加强政府，你们就使它更加巩固，使它有力量压榨我们，拒绝我们的一切要求。有人说，究竟是谁居然会想到这样的事呢？当然有人想到的。福尔马尔在慕尼黑提出这一原则：我们应当把斗争专门集中于几项任务和几点浅近的问题，他举出的这类问题是联合、结社和集会权，取消粮食关税，标准工作日。关于粮食关税的情况，我们刚刚已经经历过了。迄今人们把这一政策叫作英国的工会政策。这已不再是原则性的政策，我们拿出它来就会站到错误

^① 参见本书第20页注①。——编者注

的立场上去。我们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预算问题。巴伐利亚的同志们投票赞成预算。那时是奥艾尔同志作了最强硬的反对福尔马尔的发言，今天他当然恐怕不会再坚持这次发言了（奥艾尔：很正确！）……修正主义在南德意志特别感到自在，这恐怕不仅是由于受了慕尼黑-卡普阿或者啤酒和葡萄酒的令人更富于人情味的影响，而是由南德意志比较不发达的经济关系造成的。但是正因如此人们不应当试图从南德意志出发强迫更加发达的北德意志接受一种新的策略。这种做法我是竭力反对的。……

……修正主义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也在于它的非常谨慎的态度。这甚至是一个主要的差别。他们满足于微不足道的小事，千万不要向前冲，千万不要激动，千万不要争取群众的同情。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本来能够把全部天主教工人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的话，那就是在巴伐利亚选举权问题上。但是那时本来应当在公共集会上提出抗议，反对取消从二十一岁起获得选举权的规定，反对把等待期从六个月延长到一年，反对延长获得选举权所必须的居留时期并从而使现在有选举权的十五万人丧失权利。他们在慕尼黑、纽伦堡、维茨堡、埃尔朗根等地的人民集会上没有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们坦率地对党团讲了自己的想法，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他们是这样想的：“千万要镇静，镇静！不要吵吵嚷嚷，白天不要，晚上也不要！我们关起门来搞花样，我们肯定会把事情搞成的；千万别把群众煽动起来，他们可能扰乱我们的小组！”如果把这运用到实践中去，那就成为伯恩哈特在他的文章中说出来的党的经验教训的一个部分。这些人认为：“我们愈谨慎，我们就愈容易胜利”；我说：“我们的行动愈谨慎，我们所取得的就愈少。”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说：“人们不能跳过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但是人们能缩短它的时间。”^①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

喔，比我们自己队伍中人所熟知的马克思更加伟大的现实政治家是没有的。人们不能跳过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可以缩短它。我们的全部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带来社会主义社会而缩短发展阶段。但是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却恰恰相反：啊，不要这么快！不要这么向前冲！话不是这样说的，但意思是这样的：群众还没有成熟呢！如果今天政权落到我们手里，你们怎么能想象这样的群众能够利用它呢？于是我回答说：你们不要替别人费脑筋了！你们究竟是否知道，当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时，我们这边将会拥有什么样的智慧吗？我们的党员同志在工会中，在疾病保险储金会中，在工商业仲裁法庭中，在议会中取得了多少成就啊！特别是那些进入议会的来自无产阶级的人——我现在不说大学生们——取得了什么成就啊！这些人在今年春天和夏天在关税委员会中是怎样尽职的啊！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我曾经期待他们会尽自己的本分的，但是看到他们如此杰出地完成他们的职责，我是敬佩不止的。请你们问一下政府代表们、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们，这样的场面是多么难堪：在讨论个别条目时至多只有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站在他自己的狭隘的立场发言，而我们这一方面的鲍德尔特们、楚拜尔们、安特里克^①们，反正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就最困难的题目凭卓越的专门知识作过发言。例如安特里克曾经就一系列最困难的化学问题作过报告，竟使政府代表吃惊得目瞪口呆。所以说，你们知道群众中有什么样的智慧吗？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在每一次伟大的人民运动中都会在合适的时刻出现合适的人物。如果说世界上曾经有过一次伟大的文化运动产生了自己的合适的人物、而且还有合适的妇女人物的话，那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文化运动。如果我们明天由于某种情况能够把我们的敌人从他们的位置上赶走，并且由我们自己去代替他们，那么

^① 奥托·安特里克 (Otto Antrick 1858—1924)——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曾在国会讨论关税问题时作长达九小时的发言。——编者注

你们不必担心，我们一定会懂得我们该怎么办。唉，这种鼠目寸光的观点，这种狭隘性，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这种无尽无休的安抚，随机应变，玩弄外交手腕，委曲求全！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修正主义者方面的政治家才能，都是他们方面的外交技巧。人们隔着一千米远就看得出他们的政治家才能了，人们从一百米以外就闻得出他们的政治家技巧了。所以我对你们说：这些死抱住原则不放的人，这些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党的老理想、老革命立场的人，他们不是外交家，不是政治家，他们不自命为这样的人，但是我要说，一旦人们注意到某一个人是一位“政治家”，他就再也不是政治家了。当某一个人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外交家并且也许还把这一点说出来时，他就不再是外交家了。一句话，这是力求和资产阶级社会亲近。掩盖、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对立，这是自称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在党内所追求的东西。这始终是、永远是那场旧的斗争，这边是左派，那边是右派，而中间是沼泽派。这是那些分子，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从来不说他们打算做什么。这是那些“狡猾的人”，他们总是首先听一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总是在摸索多数在哪里，随后他们就站到那里去。我们党内也有这种人。现在有一大批在这次讨论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人们必须揭露这种党员（喊声：揭露！？），是的，我是说揭露，这样，党员就会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动摇不定的人。对于那种至少是公开维护自己的立场的人，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能同他们作斗争，不是他们取胜，就是我取胜，但是这些动摇分子，他们总是溜走而回避任何明显的决战，他们总是重复说：我们都是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兄弟。他们是最卑鄙的人！我最反对这样的人。但是，如果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对于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还存在一点怀疑的话，那么，我认为敌人发表的意见可以最好地为我辩护。这些意见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晴雨表。但是我要问：难道我

们的敌人不是以种种方式纵容和赞扬修正主义倾向吗？难道他们不是尽一切可能从道义上来支持吗？《法兰克福报》几乎已经被叫作修正主义者的机关报了，而且人们可以说纳乌曼的《救济》杂志同它完全一样。尽管我同纳乌曼先生相去如此之远，尽管我认为他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但是就他所采取的针对我们的策略来说，他通常是很能干的。（喊声：他毕竟没有取得成果啊！）的确，他没有取得成果。同志们，你们想，我会相信修正主义有一天将在我们党内取得成果吗？不，同志们，修正主义没有取得成果，但是它给党造成了损害。它分散了我们的力量，它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它迫使我们发生意见分歧，它迫使我们互相反对，而本来是应当出现相反的情况的。一大批同志误入迷途了。这些人诚实地进行斗争，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关于我们的大学生我甚至也说过这样的意见，我说过他们是怎么回事，许多人只是转眼就把他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学到的东西忘记了，很多人或多或少地相信他们原来天生就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止一个人相信，由于他屈尊接受无产阶级的委托书，无产阶级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这不是存心不良，这不是故意的背叛，但这对党来说是一件坏事。除大学生外，我们的修正主义者中还有另一部分人，他们从前是无产者，后来社会地位提高了，而恰恰是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种地位要结束了。你们只需运用唯物史观，你们就可以解开这个谜。对一切敌人适用的东西，对我们也是适用的。他们还相信自己似乎具有政治家的气质，似乎自己生来就是外交天才。有了这样的信心，再加上同其他派别的人交往，就使他们逐渐走上了我今天在这里大致指出的那条道路。其次，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无产者！是的，这是一些没有知识的人，没有教养的人，这是那样的人，他们追随一个他们个人尊重并且认为应当感激的人。但是，如果有可能确定党内真正的无产阶级对修正主义的想法，那就可以看到，修正主义有一个气派十足的参谋部，但是追随这个参谋部的队伍却是很小

的。因为在最近一次选举以后——我不隐瞒这一情况，我再也不隐瞒什么了——修正主义在国会党团里加强了，因为我知道他们十分自然地企图在国会党团里贯彻他们的信念，因为我知道这会象从前那样重新引起不间断的斗争和最不愉快的、最讨厌的摩擦，所以我自己说过：现在党代表大会、现在党的代表机构终于应当决定，从它的立场来说今后应当怎样确定国会党团的策略。我在我的最初的一次声明中已经说过：“我知道，我们在国会党团中将专门就策略进行重大斗争，但是我也知道，归根到底，当党不得不说话的时候，问题的解决就会与在国会党团中不同。我们将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向党发出呼吁，要党就国会党团的策略作出决定。”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项作了修正的决议，修正的内容我一上来就念过了。根据这一观点，我请你们考虑这一决议并且作出判断。如果你们相信，决议说出了必须说的话，就那请你们以大多数（喊声：一致地！）同意这一决议。我深信，如果提供了这一准绳，如果为了今后传播关于党的一切重要问题的明确和真实的知识已经采取了其他必要的措施，党就会自豪地继续走自己的胜利道路，并且非常出色地实现它的历史使命。

格·福尔马尔（摘录）

（9月18日）

.....

尽管我不得不如此激烈地反对倍倍尔，我却认为全部事件的主角不是他，而是考茨基，这首先是因为考茨基有一个优点：他比较彻底的。考茨基是理论的狂信者，是化身为党的德国教授，他宁可让全世界、也许还连同党一起毁灭，却不允许人从他的美丽的学说体系上哪怕只取下一小片东西。（赞成声和反对声。喊声：这是胡说八道！）你们用这个说服不了我。我却要

提出证据。

考茨基常常告诉我们他对于党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怎样设想的，他有一次在那篇著名的反对伯恩斯坦的文章《一万人的撤退》中说：“打算把我们就思想自由之类向国家提出的要求也向党提出来，这是可笑的。”他在卢卑克大会上说，出版《新时代》，不是为了让党内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思想流派在思想上互相较量，《新时代》必须捍卫党的统一性。“党的统一性”，就是他的言论独裁。（很对！激烈的反对声。考茨基喊道：“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不停地有人打断发言。）我要安静地等待，直到你们表明至少在这里还略微有一点言论自由。我想，既然你们听了倍倍尔的发言，那么你们活该倒霉，也就有义务听我讲。否则你们就似乎要实行恐怖了。

可见，党的统一性就是他个人的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科学观点！问题就在这里。考茨基有一次明确地说过，新方法（这同现在人们所说的修正主义是一回事，它的名称每年都不一样）是一种“反叛”。压制反叛，在党内树立统一的信念，这是考茨基多年来所追求的，而且他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讨论到此为止。当然，在这以前他这样做是白费劲。现在他认为时机有利了。他认为党内对爱德这个永远的捣乱分子的情绪是够愤怒的了，他早就宣称伯恩斯坦对他个人来说已不再是同志，现在他认为时机有利，可以让党代表大会批准这样的判决了。机不可失啊！他早就在私下说过，有这样的人，他们已堕落到这种地步，居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全面谴责他在科学上的敌人伯恩斯坦，他们居然认为伯恩斯坦的一些论点是正确的或者毕竟是值得考虑的，尽管他们声称并不赞同许多别的论点。要知道神话毕竟应当结束了，这种神话说，好象人们在为伯恩斯坦欢呼，好象他正如倍倍尔昨天所说的那样被人看成了新的救世主。（倍倍尔：没有被你看成，你太冷淡了！）这使我感到高兴，但是为什么你们老是说修正主义者，你们是打算也把我算在

内的（倍倍尔：当然，你是为首的）。好吧！关于伯恩施坦我总共讲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第二次在卢卑克之后的慕尼黑的一次集会上，谁回想一下那些发言，就会清楚地知道，我丝毫没有想到为伯恩施坦欢呼，而是对他的那些观点作了很多指责。但是，我极其坚决地抗议人们对伯恩施坦这样脚下使绊。因此我说，考茨基和那些与他想法相同的人认为，人们能够打一次官司就把“修正主义者”连同伯恩施坦一起清除掉。考茨基长期以来竭力想找到一个能够扼要和精确说明修正主义的罪行的公式。他在三篇文章（两篇在《新时代》上，一篇在《莱比锡人民报》的一期副刊上）中这样描述这一罪行：“可见新的策略就是要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派的一员”。这就是说，我们打算追随资产阶级政党。在另一个地方说：“修正主义者说，党必须同意和友党联合，同它们一道形成一个有执政能力的多数。”接着又讲：“修正主义者想象，自由资产阶级会来一个突飞猛进，取得胜利，从而使我们不必为无产阶级最基本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是放弃阶级斗争——这就是要证明的。是的，党员同志们，事实上可能是放弃阶级斗争，而终于如此干净利落地发现了这一公式，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人们终究摆脱了空泛的说法而达到一些具体的东西。现在我要问您并请您回答：是什么时候，是谁在德国和为德国提倡过某一个这样的原则呢？我在我的慕尼黑演说中谈到资产阶级左派时说过：“实际上今天的情况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来说，随着这次选举的失败，也就失去了挽回已经丧失的影响的最后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只要那些真正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转向或者还没有进一步转向社会民主党阵营，他们就根本不再有什么工作可做了。如果那些人（真正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分子）振作起来，并且至少在反对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反动派的斗争中同我们竞争，这只会使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高兴，不过在其他方面他们应当明白，德国的情

况的发展显然会象比利时一样，而反对派的前哨战今后将由社会民主党来进行，左翼自由党人必须站在它的一边并在它的领导下采取行动。”这是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过的唯一的一点意见。我再次要求，如果人们打算对我们进行一次极其恶劣的倾向性审判，那么，毕竟至少要提出一些证据。

考茨基在这一方面所做的事情是荒唐的，他就党内遥远的发展前景所发表的想法也是同样荒唐的，这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最近他说过这样的话：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批评，必须停止对当前占支配地位的意见、对策略的怀疑。“怀疑！”，的确是这个词！我记住了这个词，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宗教课。（喊声：是这几个字吗？）“怀疑必须搁置！”你自己去找这句话吧！这就是说，不应禁止自由发表意见，而是应当推迟，不取消批评，而只是停止（eingestellt）一段时间！（喊声：搁置 [zurückgestellt]！）就我对德语的理解来说，这是一样的！是的，你们在教皇和教会那里也能听到这种说法。那里也停止对圣经的批评，不过也只停止到教皇自己承认批评是正确的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探讨这个问题时为止；然后就可以进行批评，一直到确定了新的教义为止。

不，党员同志：自由发表意见即批评的权利要就是完全地、无条件地存在，要就是根本不存在。否则，情况就象在今天的国家中那样，纸面上存在着思想自由和讲学自由，但在实践中必须慎重行使这种自由，以免引起公众的愤怒！不，我们可没有讲好要这么办。就社会民主党来说，不仅发表这样一种观点简直就是耻辱，而且哪怕只要想到这种观点也简直就是耻辱。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有什么生存基础，有什么生命源泉的话，那么，这就是绝对的思想自由，探讨自由，也就是研究原则、目的和策略的自由！谁想在这里哪怕只是实行最小的限制，谁就是想使党从一个伟大的文化运动变成一个宗派！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象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规模的运动表面上也还会轰轰烈

烈地存在一个时候，甚至也许在敌人的眼睛里还要更加轰轰烈烈，因为这一运动具有完全一致的统一的意见。但是，必然的结果是党的僵化，一点新鲜空气也进不来，从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被堵塞了。但是，这样一来，人们也不得不首先从我们的名称上勾掉“民主”这个词（倍倍尔：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当然可以！），也就一定不会去争取并保留独立的、自由的、有着满腔热血的人了。（倍倍尔：你看见自己造出来的鬼影！）

我可以对你们这样说：如果有人建议我戴上一个笼头，那么不管这是警察的、教会的笼头，还是所谓民主的笼头，对我来说都完全一样。这倒是真正值得我为之付出我的生命的。（倍倍尔：付出生命吗？什么地方？！）你不是把你的生命献给党，用你的生命为党效劳吗？（倍倍尔：我根本不是说的这一点！）你认为别人不是也这样吗？——因此我说：这倒是真正值得我付出全部生命来进行斗争的！推翻旧的权威，仅仅是为了以一个新的偶像来代替它，能乐意这样做的不是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只是狂信者！但是，哪怕这样一种危险还只是出现在远方，也必须详细地把它描绘出来！

这样，我就说到决议了。关于第一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在党作出了决定的时刻——何况它已经这样做了——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谈一谈有关“修正主义的企图”的那几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从这样不确切的概念开始。至于说到我，那么，我肯定是从来既没有把自己称作伯恩斯坦分子，也没有称作倍倍尔分子，甚至没有自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想成为这类“主义者”和“分子”，也没有这样的才干，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因此，我认为“修正主义企图”这样的用语是荒谬的说法，正象整个说来这几句话是一个怪影一样，起草者自己炮制了这种荒谬说法，是为了能够把它当作靶子来打。据说修正主义的企图是要“改变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

的、久经考验和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用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来夺取政权的政策。”^①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我或我的哪一个朋友曾经提出过这种要求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至于谈到我，那么，恰好是我的慕尼黑演说最清楚地谈到了由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

接着是第三句：“这种策略的后果就会是”等等。的确，如果这些臆想出来的企图是存在的并且是起作用的，那么，后果当然会是不好的。只不过它们在实际上恰好是不存在的。

最后，第四段是：“党代表大会还谴责为了便于投靠资产阶级政党而抹杀当前的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的任何企图。”^②同我从考茨基的著作中引述给你们看的那些话相比，这已经是退了一步。但是我在这里再问一下：谁提出了这个要求呢？我不知道有谁提出过。

党员同志们，据此我认为关于修正主义的三段话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我不知道谁曾经鼓吹过这里所说的那些主张（无论如何我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与这种描述相符合的那种“修正主义”。如果我是一个美学家，那么，由于这个决议的缺陷，我必须说它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我不是根据美学原则，而是根据其他观点作出判断的。我只是说：虽然我认为这全部都是错误的，但是正因如此它也就对我没有影响。我认为这些原则当前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起草者认为它们也许会在某一个时候出现，并且因此打算事先把它们“拒之门外”，而如果这样做会使大批党员同志感到安心的话，那么，我尊重这种看法，不想加以反对。我认为，根据议会解释的原则，不会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当然，决议的最后一段一点也不使我满意。起草者似乎非常忙于为修正主义概念找到根本找不到的定义，以致在写到对

^{①②} 见本书第607页。——编者注

党最重要的部分时已经精疲力竭了。不然，我就无法设想，为什么整段的词藻是如此丰富，但内容却十分贫乏。对我这个有害的“温和分子”来说，这一段根本不够激进。特别使我烦恼的是，当人们在原则上向前跨进一大步以后，关于很重要的社会政策问题却无非只知道说，我们必须“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可以想到的话里，这是最软弱无力的话，而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当我们害怕集会被解散的时候所使用的话里，这也是最软弱的话。倍倍尔惊异的正是，我突然激进起来了。（倍倍尔：完全是误会！你仍然只是你从前的那个样子！）法国有一句谚语：“人总是比某一个人更加反动的。”这就是说：不管是谁，总会有人超过他，比他更加保守，或者更加激进，而谁也不应认为自己在党内是最右的或者最左的。因此，人们在对待不同事物上会时而站在这方面，时而站在那方面。因为实际上，在国会讨论实际政策时，所谓修正主义者站在一个方面、“激进派”站在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况，我一次都举不出来，而总是错综复杂的。倍倍尔将为我证明，他和我的意见不止一次是一致的，并且有时曾一起反左，有时又一起反右。因此你们会看到，修正主义无非是个怪影。

考茨基孜孜不倦地攻击别人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人们甚至突然在超机会主义的狭路上碰到象他这样的人，那也是值得注意的。他在《新时代》上他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劝告人们不要赞同重新分配国会选区，因为否则选举权就会受到威胁。我们在所有的选举集会上都指出当前选区分配的不合理是一种耻辱，并且在国会一再提议改变这种分配；如果当我们打算在国会显示我们新的实力时，我们突然打算完全撤回这个要求，那么，我们现在就简直是放弃我们的权利。（倍倍尔喊：当然，根本谈不到这一点）好的；但是考茨基是这样建议的。（倍倍尔：我赞成你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任何说法都是削弱矛盾，但他们面对我们新获得的实力地位，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确

实是说明问题的。

我说完了。如果你们要对一样你们不中意的、你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在我看来你们给这一概念下的定义是很不合适的）作出了一项判决，如果你们要对你们认为有害的那些原则（假如存在这些原则的话，我也同样认为它们是有害的）作出了一项判决，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件随着通过这项决议就算解决了的事情。

……

因此，我想说，如果通过了决议，那么，为了使人安心和弄清问题所能希望的一切就都做到了，从而目的也就达到了。其次我相信，同昨天倍倍尔讲的相反，党代表大会将发现，恰恰现在比任何时候在党内都更没有理由引起真正原则性的争论，不如说，党内的统一和一致的确不是比从前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党将认识到，在我们面临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大的情况下，停止这种愚蠢的兄弟之争，是最合适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项任务，这项任务需要我们的所有力量，每一种力量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这项任务发挥适当的作用，正象圣经上所说，人们可以以各种方式供奉上帝。人们在工业区和农业区，在南方和北方的行动应当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到处都能忠实地运用我们的力量，只是必须努力使我们不致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发挥作用。我认为，党代表大会会懂得在这场不愉快的、但是必然要发生的争论之后怎样寻求正确的解决办法，它将坚决地反对任何也许还在冒头的、不是从公务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以伤害人或强加于人的方式打算干点什么的企图，并且叫左翼和右翼的领袖回到他们的岗位，回到对敌人进行共同斗争的岗位！

威·科尔布^①（摘录）

（9月18日）

……

……一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宣布，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要进行决定性的清算。但是我非常坚决地反对说党内存在着象人们在这里所设想的那种修正主义者。全部争论无非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在蛋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就孵化它。这里涉及的无非是一场对当前实际工作毫无重大意义的理论争吵。这个决议毕竟证明，关于修正主义的概念是多么模糊不清。我还是在几天以前才看出在这方面是多么混乱不堪。那时我对巴登的一个同志说，他毕竟不应当装得那么激进，因为他刚刚在奥芬堡的市政选举中达成了妥协。这个同志听了很气愤，他责备我说谎。事情是这样：在奥芬堡，在市政选举以前，社会民主党人同民主党和民族自由党人达成了妥协。由于这一妥协，我们有十五个同志进入了市议会，有两个同志进入了市政委员会。三个党提出了一致的候选人名单。因此我完全可以说达成了一项妥协。任何时候党内都有修正主义者，就是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个别的理论问题、有时也对个别的策略问题持特殊见解。只是争论从来没有采取象现在这样的形式。党愈大，这种讨论也就会愈来愈多，重要的只是人们不要在每一次意见分歧中都找出对原则的背叛来。

现在谈一谈副议长问题！据说，那些按照伯恩施坦的意思发言的人，当他们看到党内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就突然煞车了。不，这是不真实的。我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看作是非常不重要的。对于我来说，关键在于人们怎么会认为必须论证拒绝伯恩

^① 威廉·科尔布（Wilhelm Kolb 1870—1918）——曾任巴登邦议会议员，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编者注

施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起了《前进报》上的一篇关于策略的文章。我的印象是，这篇文章好象包含着一点恶意。这篇文章描述说，当涉及改变策略的问题时，即使在前些年也总是掀起同今天一样的轩然大波。例如，柏林决议中关于参加市政选举所说的话恰恰是今天被用来反对副议长问题的那些话。副议长问题就其本身来说是个很次要的问题。如果人们宣布愿意接受这个职位，那么，人们就不应当为了礼节而掀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我们至今从未对礼节进行过抨击，但愿将来也不这样做。现在有人说，这一礼节是法律规定的，还是我们自愿地服从的，这有很大差别。我强调指出，我们绝不自愿地服从。因为是法律为我们规定还是多数人为我们规定，这在实践中得到的结果是同样的。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强制。甚至帕尔乌斯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至于谈到策略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我们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取得政权。这不仅仅是德国党内的一种现象，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一切国家都有修正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对于发展过程有一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对我们目前必须做的事情来说，这一争论是不值得我们在每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为它耗费时间的。考茨基在选举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怎么办？我徒劳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在哪里？考茨基的论述是纯理论的，对现在国会中应当做的事情来说，他没有作出回答。他说，政府是否让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我们将取得胜利。的确，为了作出这个回答是用不着写文章的。考茨基的观点的特点是，他给我们的回答是消极的。我驳斥了这篇文章，而现在考茨基说，我这一下可把修正主义者想干什么说清楚了。但是，为了断定这一点，他不得不翻了一个筋斗，并且从我所写的东西里看出相反的内容来。我没有写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策略，而是说我们应以迄今的策略为基础。归根到底，这场争论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我

们打算接受考茨基的崩溃论还是伯恩斯坦的进化论。这在实践中是不必考虑的，我们在实践中总是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我有興味地读了瓦尔泰希几个月前在莱比锡发表的修正主义言论，但令人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听说党的共同创始人竟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也许《莱比锡人民报》只是由于下面一点才没有得出结论，因为人们向自己说：哎，这个人对我们没有危险，他反正还要回美国去！修正主义是一个实际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幽灵，这个幽灵同李希特尔的那个未来国家一样，必须先臆想出这个国家，才好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未来国家进行痛击。所谓修正主义者的立足点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一种有机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集中全部力量以取得影响并逐步达到目的。考茨基的立足点也是这样，但是他认为，我们想取得的东西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崩溃才能取得，他认为，一定会发展到崩溃。我们针对这一点说，不一定发展到崩溃。的确是这样，全部争论就是围绕着这一点进行的。难道我们所有的领导人不是都说过，我们打算通过合法途径达到目的吗？我们一再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有勇气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必说，一定会发展到崩溃，因为如果一定会发展到崩溃，那么也一定会来到这样的时刻，那时将是暴力来决定，而不是法律来决定了。同考茨基相反，我的立足点是，我们早已处在社会革命之中，这个革命正在我们眼前进行，而加速这一社会革命是我们的任务。谁正确，未来会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达到我们的目的。考茨基说，我们不能骗取政权，我们必须夺取政权。我的立足点完全是这样，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关键只是在于人们如何理解“夺取”一词。如果有一天情况发展到我们的一个同志被请进政府的地步，那么，这不是骗取政权，而是我们夺得了席位，因为如果社会不是被迫把席位交给我们，我们是得不到席位的。统治阶层根本不会自愿地给我们什么，我们必须夺取一切，我们至今保持着的东西也是我们夺来

的。这只是关于概念的一场争论。李卜克内西在一篇未写完的文章（《前进报》在他死后发表的）中指出了我们能够取得席位的两种可能性。

他说，或者是某一次战争引起崩溃，使统治阶层自发地遭到彻底破产，那时我们就有可能取得全部政权。他还说，或者是统治阶层看出自己已走上一条很危险的道路，它让步了，于是我们的一个人被请进政府，并且一定会被委托去专门调整工人关系。如果李卜克内西可以这样写，那么另外一个人当然也可以了。如果人们就这类问题展开讨论，这的确是无害于党的，相反，只会对党有利，因为由此会把问题说清楚。就实践来说，这个问题在当前没有意义，但是到时候就会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毕竟都是以我们不断增加的实力取得某种成果。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活动不断改变所有制的形式，那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政治的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到时候也将逐步有所改变。根据这一理由，我请求你们否决在这里提出的修正案，因为我们毕竟不打算通过对当前没有任何意义的决议。至于将来事情会怎么样，我们确实不知道。难道我们有必要现在就决定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永远不参与行政权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毕竟没有资格决定怎么办，这是要由在四十或五十年内按我们的意图工作的那些人来做的事。如果一定会发展到崩溃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迄今我们的自觉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如果一定会发展到崩溃，那么，我们就为促成崩溃而工作，而不是致力于循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就必须破坏现存的事物，才能有所建设；那么，弗里德伯格同志推荐总罢工就是对的。这是考茨基的理论的结论。修正主义根本不是别的，只是我们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决议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人们在多年反对修正主义以后，必须臆想出一种人造的修正主义并且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当中没有人打算修正党的原则，相反，我们知道这些原则是真正的和真实的，我们打算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

斗争。

.....

伊·奥艾尔（摘录）

（9月18日）

.....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感到我们的讨论有丝毫节日的气氛，但是也许还会出现这种气氛，因为风波似乎平静下去了。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党内并不存在真正原则性对立这一事实。性格的差别是存在的，出现这种或那种不高明的意见也是可能的。是的，谁在他的一生中还没有发表过不高明的意见呢？这毕竟不能成为我们互相反驳、攻击和诋毁的理由，何况所使用的语言有一部分在讲出来以后甚至当事人恐怕也会觉得太过分了。特别是倍倍尔——尽管我同他非常友好并且曾多年共同战斗，我还是必须这样说——是他首先使用粗暴的语调，并且通过他的声明和他的文章在党内和党外广泛地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似乎由于存在一些情况，根本不再可能继续共同合作了。你们大家都看见他了。你们知道，他作为演说家具有何等的力量。他在这里说，他十二年来把一切能忍受的和不能忍受的事情都咽到肚里，现在他已经憋不住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现在他必须开火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向自己说：见鬼去吧！是什么东西附在亲爱的奥古斯特身上了呢？他说他怒火满腔，这可能是很不愉快的感觉，但是我们对此负不了责任。我问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反社会党人法已废除十二年了。我们在90年、93年、98年以及现在即今年取得了简直是辉煌的成果，党是这样地发展壮大，它简直被看成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表率，我们出色地击退了对我们的进攻（请想一想苦役监禁法案），尽管我们人数很少，但我们在国会讨论文化问题时，例如讨论海因茨法案

时,却掌握了主动,我们捍卫了人民的利益,以致在最近这次选举时有三百万以上的人投了我们的票,难道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吗?难道所有这一切都补偿不了我们必须把许多事情咽到肚里这一情况吗?但是,这也是人的一个特点,他必须吞咽,否则他就无法生活。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是一个人往下吞吗?哎,不是的!在各个年代里,肯定发生过一些事情,忽而使这个人、忽而使那个人不顺心。我们人数愈多,被安排在负责岗位来捍卫工人利益的人数愈多,也就更加可以理解,在这些愈来愈多的人中,会有一些人是人们并不总是与之意见一致的。我不知道,怎么有可能做到使不同的性格在我们中间不起作用。如果某些人和某些性格叫人讨厌,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到此为止吧!我是赞同这种办法的。但是如果说,人们不得不把许多话咽在肚里,人们再也忍受不下去,那么我认为这是夸张得太厉害了。不过人们接着又加上一句:“是的,但是这个伯恩施坦啊!”一般说来圣经上的人物和用语在这次争论中曾被多次引用,伯恩施坦也就被称作新的救世主。按照血统和性别,他当然可以当救世主,但是如果说他缺乏某种本领的话,那就是救世主的本领。爱德·伯恩施坦是个忠诚的老战士,我和他在各个时期都是并肩作战的,今天也还是这样,但是他的确也不是没有人所会有的缺陷。他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简直笨拙得令人吃惊,总是打不中目标。如果伯恩施坦真的是修正主义者的救世主和领袖,那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就会去操心,不使事情超过限度了。倍倍尔说,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重新出现在群众面前,作为执政官来操心使国家(在这一情况下是指社会民主党)的幸福不致受到损害。他说,他打算说出事情的真相,好使人们知道何去何从。我认为,执政官用不着到人民中间去提醒这一点。我们在竞选中取胜了,我们可以为之感到骄傲。我们并肩进行了这场斗争,修正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互相给予了支持。当战斗的号令传来的时候,人们丝毫不

管这些所谓的对立,这些对立完全消除了,特别是倍倍尔,他的惊人的精力和顽强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高兴,他不去考虑什么修正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到处活动,出色地发挥了作用。

.....

但是现在谈一谈事情本身。人们究竟根据什么来识别所谓“修正主义者”呢?这类人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请你们给我举出一个来。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而且根据对所谓修正主义者的种种判断和阐述,直到最近也无法精确地了解什么是一个修正主义者的标志。修正主义者是谁,是什么?这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在我们继续前进以前,在我们作出最严厉的决定以前,——我还不打算说开除——我们的责任是弄清楚:从党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把修正主义者理解成什么样的人呢?

有一段时间,我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凡是对我们的爱尔福特纲领这一点或那一点稍有怀疑的人就要被理解为修正主义者。有一段时间似乎批评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的标志。但是我们在这里已经听到关于限制批评和言论自由的令人信服的说明,因此上面那种假定再也不能成立了。现在还剩下什么呢?我可以从所有这许多文章和演说中挑出两点作为修正主义者的特殊标志。对修正主义者的谴责首先是说他们抛弃、即否认阶级斗争性质,其次是说他们调和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对立,要使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以前谈到过的其他一切内容我都不加以考虑,一切针对个人的东西更是完全不在话下。谁知道得更清楚,可以讲出来。我反正只能挑出这两点。但是如果人们真的打算使社会民主工党加入资产阶级政党,牺牲党的独立性,使它成为资产阶级左派的一部分,那我就公开声明:谁有这些企图并且被确认犯有这些罪过,谁就当然是有意公开叛党。我也被称为修正主义者,但是我抗议这种诬陷。通过所有这些讨论,修正主义的含义已经逐渐阐明,谁硬说我是这种意义上的修正主义者,谁在背地里说我是这样的人,谁就是以最卑鄙的方

式诬蔑我。（党呐喊：谁就诬蔑了我们大家！）我没有权利为别人辩护，我只为我个人辩护。我不同意认为党团中似乎存在一个特殊组织的那种传说。

但是谁向我强调指出，我抛弃了阶级觉悟这个我们运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个我们立足的基础（唯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取得我们的成果），那么，或者是他不了解我，或者是，如果他了解我，他就是在诬蔑我。甚至还说什么加入资产阶级左派！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确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也曾一度同资产阶级左派分子采取过共同行动；例如1887年在国会解散后的那次选举中，当时事实上已取得协议，要争取当时的有产阶级，如此等等。这种情况是可能作为例外发生的，并且是由形势造成的，党的领袖如果在既定的情况下不使用必要的手段，就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但是说到合并！我不想谈我们应当合并到谁那里。我也不想建议同纳乌曼先生商谈并向他说，请他在一年之后告诉我们，他所实行的合并搞得怎样了。我认为，我们那时将体会到这是一个可怕的事例。但是，如果人们认为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那也完全是不真实的，那就是彻底歪曲了我们的整个运动。我们的力量在于阶级觉悟，在于给我们输送同道者的那个阶级。当我作为年轻的党员来到汉堡的时候，我对这一点已看得非常清楚。那里在选举时给我们争得选票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问题：请说一下，你是否也是一个工人？——是的。——那么你也必须选举一个工人候选人。铁的工资规律、剩余价值理论等等固然具有其重大的意义，但关于它们的概念讲起来要困难得多；简单地讲一下工人候选人却容易打动工人的心，容易得多。“工人候选人”一词，我们在南德意志那些年还是根本不知道的，我在汉堡才学会这个词。这时我逐渐了解到，什么叫作“阶级觉悟”，什么叫作把国内最强大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并且用道义的实力手段来补偿这个阶级在物质的实力手段方面的缺

陷。因此，我再一次声明：谁硬说我们，即所谓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我，丧失了阶级觉悟，说我倾向于加入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同左翼周旋应付，那么他就是实际上把我看作比我本来还要愚蠢了。

但是，既然确定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者和他们有什么特征，我们当然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究竟谁是修正主义者呢？我否认我是。前面发过言并且被指责有这种罪过的其他同志，同样否认这一点。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流放者名单，我不知道这种名单，但是党刊上当然已经提到一些名字。你们懂得，如果自己被看作是应当受人提防的、由于在我们党内扰乱了和平而必须被清除出去的一个人，这是不愉快的。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的科尼斯堡党的机关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想怎样摆脱这种情况，使它不致继续下去”，并且建议人们应当通过直接投票决定，这些人中间谁可以留在党内，谁不可以留下。我不想谈论直接投票，它在我们的组织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这些事情究竟在外省产生什么影响，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多特蒙德党的机关报是毫无顾虑地、而且我也能说它是机智地维护工人利益的，它认为科尼斯堡报的建议是违反常规的，并且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我现在提出的问题，即究竟谁是修正主义者呢？在我们把他们赶出去以前，我们毕竟必须知道他们是谁。接着这家机关报说：“难道大卫、海涅和福尔马尔，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德雷斯巴赫、科尔布、布勒斯劳编辑部的同志们，最后还有所有与所谓修正主义者有同感的人，都应当成为牺牲者吗？要知道奥艾尔也把自己算作修正主义者。但是，提出开除象奥艾尔这样的老战士的建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我很感激编辑部，因为它在这里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但是关于应当把谁赶出去的问题，党内是有过争论的。这里指的是大卫、海涅和福尔马尔——伯恩施坦还是根本不包括在内，席佩耳以及其他由于发表了各种文章而受到注意的人也不在内。特别是当新议员中

的多数同样应当说是修正主义者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界限应当划在哪里。归根到底，这些情况实际上应当促使那些在这方面站在斗争前列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这不是走得太远了吗？

党员同志们，有人对我们说过：“必须旗帜鲜明！”是的，真讨厌，的确必须旗帜鲜明！但难道我们不是在最近的竞选中刚刚亮明了旗帜吗？党打出了旗帜，我们都投入了斗争，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时刻是“遮遮掩掩”，是演了“喜剧”，难道这种说法是对的？谁硬要这样说，那么在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一定并不完全了解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以及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有什么权利提出这样的指责呢？我入党至今快三十五年了，我在党内参加了一系列斗争，只要有可能并需要维护党及其利益，我总是在场的。我并不害怕当社会民主党人和被人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纲领是公开了的，我们作过上千次演说，每天出版上千种报纸，我们在帝国议会和几乎所有的邦议会里都有我们的代表。难道我们想谴责这些同志迄今没有亮明旗帜吗？……

……

福尔马尔已经通过一系列引证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各种问题采取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有些事情人们起初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和不容许的，后来却也做了，而且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做的。他也顺便谈了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我也能从我们党的历史的最早时期和较近时期各举一例来向你们指出，如果人们死抱住标语口号不放，就会落到什么地步。当1874—75年最初提出使两个老的派别即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联合起来时，有一些在我们中间很有影响的同志认为，这样的联合恐怕是一个失策。他们对于同拉萨尔派联合非常踌躇，倍倍尔也属于他们之列。倍倍尔当时不可能和我们在一起，他必须在茨威考服九个月徒刑。他向汉堡（我是那里的党委员会的成员）给我们写了一封秘密信件（他当然不可以正式从监狱向外面写信），一封长达十八页的信。这封信包含着一个合格的纲领，而且是一个很详

尽的纲领，信里还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一纲领看作是同拉萨尔派磋商的原则，不承认它的所有重要之点，那么，他就不能参加联合，如果他的九个月刑期届满，那么，他就会举起反对这一联合的旗帜。（倍倍尔喊道：你那里有这封信吗？骚动。）（倍倍尔：我想看一下这封信）盖布也是党的委员会的成员，他说：嘿，这并不是那么危险的。李卜克内西是坚决主张联合的，我们青年人当然是同意的。在倍倍尔从狱中写来这封信和合并大会举行以后几个月，他自己成了主张联合的最热心的先锋。当他从狱中出来以后，当他了解到实际情况以后，他的热心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他除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外还想让另一些派别同时参加合并。这样说不是责备他，这是表明，一切都要看人们观察一件事情时所处的环境而定。倍倍尔已被关押了三年，起初在要塞，后来在监狱。他也不能避免人的弱点。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向德国写了一封供盖布、我、白拉克、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传阅的信，在这封信中他们直接对合并提出了责难，理由是施韦泽博士未能凭他的狡猾手腕做到的事情（即让德国的工人运动为柏林的牛奶市场效劳），现在似乎由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我不想用这里的称呼^①）同志做到了。他们向我们声明，他们谴责这一合并，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谴责，那么，他们认为，考虑到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国际地位，他们有必要公开声明自己是不同意这一合并的。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识到自己是错了。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方面的意见分歧。人们认为，不得不担心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对党来说会是多么糟糕的事情。那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马上就要举出作者的名字。就我想到的有关地方而言，首先谈的是轮船公司津贴，按照作者的观点，这并不涉及采取新策略的问题。不过，参加过关于这一问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哥达纲领的信中称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二人为“先生”。——编者注

题的斗争的那些同志却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那时“旧策略”遭到了很大的危险。那时的危险已经同今天的危险一样，只不过人物改变了。那时福尔马尔在右边作战，伯恩施坦在左边作战，而现世主义者倍倍尔在中间反对我们。现在人物不同了，但标语口号完全象那时一样。这本小册子接着写道：“但是在现在的争论中，问题在于彻底改变党的旧策略，这样的策略改变就意味着改变党的本质。问题在于是坚持还是放弃使我们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斗争观点。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一个决定性步骤，即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仍然是旧的社会民主党，还是渡过阶级斗争的卢比康河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党的左翼。”几年以前关于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问题的情况还是这样。据说问题在于：放弃旧的政策、放弃阶级斗争观点，渡过卢比康河去参加资产阶级左翼；可见这全部是今天又重新提出的那些谴责。谁写了这本小册子呢？这个人就是老李卜克内西，那时他是受柏林第六选区的委托写的。促使他写这本小册子的那些同志，以楚拜尔为首，现在却为参加邦议会选举而斗争了。（楚拜尔：因为我们必须！）如果情况象这里描绘的那样，如果问题在于放弃阶级斗争观点和参加资产阶级左翼，那么你们现在就不应当参加选举。我举出这个例子只是为了向他们表明，人们如果作出这类预言，提出这类原则，就会落到什么地步。这些预言和原则按照内在的必然性是不能保持不变的，因为它们被时间和发展的进程推翻了。现在我要结束了。但是我还想讲一点：请你们想一想，你们要求于我们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要说我抛弃阶级觉悟，说我想把党出卖给资产阶级左翼，那我就认为这些谴责是卑鄙的诬蔑之词，我要愤怒地加以驳斥！

卡·考茨基（摘录）

（9月19日）

.....

现在来谈谈本题。在制定决议时我们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的：党内存在着彼此截然对立、经常互相矛盾的两种倾向。福尔马尔和奥艾尔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些同志是正确的话，如果这里的辩论确实只是表达了个人的分歧，那么，党代表大会就会因此大大地降低水平了。我们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经历了如此激烈的场面，这是从未有过的。如果这只不过是发泄个人的怨恨，那么这次党代表大会就势必会给我们留下最令人沮丧和泄气的回忆。

这种激情不是个人的怨恨，而是要帮助无产阶级和解放无产阶级的热烈愿望，我希望这次党代表大会会因此得到提高。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愿望，而对于通向目标的道路则有分歧，所以我们相互发生这样激烈的冲突，这次党代表大会因此也不会留下它否则就会留下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印象。如果福尔马尔反对别人说的确存在这两种倾向，那么我必须承认，科尔布在这一点上看得更深刻。他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里存在的巨大矛盾，虽然他对这一矛盾的表述有某些错误。他说这是崩溃论和进化论之间的矛盾。这种说法有点含糊。但这一矛盾有一个合理的内核。我们迄今为止的策略是这样的：我们总是不顾一切地前进，这样我们就愈来愈扩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使统治阶级愈来愈仇视我们；我们每增加一分力量，就使有产者愈来愈感到恐惧；冲突愈来愈尖锐了，我们终于面临进行重大决战的时刻，那时我们不得不推翻敌人并夺取他们的政权。这就是我们迄今为止的策略。但是有一批同志害怕这样的状态，他们企图缓和并回

避这些冲突。如果我们能够回避它，如果有另一条道路，那么我们大家肯定都会满意。没有人为了冲突而寻找冲突。每个人寻找冲突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如果这些冲突来源于事物的本质，那么寻找一条回避冲突的道路是愚蠢的。要是与此相反，不存在使矛盾尖锐化的这种倾向，那么人们当然可以认为，我们不去避免可以通过另一种策略避免的冲突，是我们的过错。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这取决于社会矛盾是否具有尖锐化的倾向这一理论。同志们，你们看，理论问题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同策略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一种策略都是以一种理论为根据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错误的，那么新的策略就是正确的。因此这种策略必然要从对于我党所根据的原则进行修正出发。它是从提出修正这些原则的要求开始的，并且由于这个原因获得了修正主义的名称。起初人们说什么伯恩斯坦言论，但是后来我们宁愿使事情少带一些个人色彩。

在我转入决议本身之前，我必须首先回顾另一个决议的历史。我们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已经有过一次机会就（我要说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矛盾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当时发生了这一奇特的景象：我们在经过好几个月的激烈争论之后，两派终于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修正主义者曾经极其激烈地攻击我们的纲领。而在这个决议中却有一句话说，党丝毫没有理由对党的纲领、策略或名称作任何改变。在讨论过程中施托尔登提议用“原则和基本要求”来代替纲领，因为关键在于原则和基本要求。这样一来，对于那些虽然承认纲领的原则、却希望改变它的措辞的同志来说，决议就会成为可以接受的。倍倍尔声明赞成这个修改，因为他认为自然用不着拘泥于纲领的字面。不言而喻，他是以下述前提为出发点的：必须把这些原则和基本要求理解为这里的纲领中所阐明的原则和基本要求。修正主义者对于这些词的解释则不同。在党代表大会之后，他们认为必须说明投票的理由。在《社会主义月刊》的《为什么伯恩

施坦分子能够投票赞成倍倍尔决议？》^①一文中就是这样做了。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是因为用原则和基本要求这些词代替了纲领这个词。这就表明，纲领是站不住脚的，集中化理论、危机理论以及在爱尔福特纲领的绪论部分直接说出的或者可以作为它的结论引伸出来的这一切观念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原理的绝对正确性的天真信念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党代表大会的风暴所产生的这个很值得庆贺的后果，连倍倍尔也不可能不觉察到了，因此他愿意接受施托尔登的提案。^②由此可见，伯恩施坦分子之所以赞成这个决议，是因为其中用“原则”这个词代替了“纲领”这个词。当他们发表这个声明时，他们显然忘记了伯恩施坦曾向党代表大会发了一封信，他在其中表示赞成决议最初的措辞。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修正主义者中间，有一些人准备赞成一个决议，只要他们能够把它解释成纲领因此被废除了就行；在他们中间又有另一些人准备赞成这同一个决议，这却是因为他们把它解释成纲领因此依然存在！这是一种很奇特的见解。伯恩施坦在信中说，只要他加上一小粒普通的盐，他就同意决议^③。这是能使黑白颠倒的一小粒奇特的盐。这似乎就是那同一种药汤，只要你喝了它，你虽然不会把任何女人都看成海伦^④，却会把德国看成一个共和国。为了使人对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决议不再可能发生这类错误的理解，我想对它进一步加以说明，从而使那些赞成决议的人能够明确肯定某些观点。

报告人宣读了第130号决议案的第二段。为了对这一段话

① 见本书第288—299页。——编者注

② 参见本书第293页。——编者注

③ 这里的“盐”一词，在本书其他地方译为“保留”，参见本书第272页以及第445页注①。——编者注

④ 语出歌德《浮士德》。原话是：“只要你一把这种药汤吞饮，任何女子你都要看成海伦。”（《浮士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部第129页）海伦是古希腊传说中的美女。——编者注

进一步加以说明，我必须从前面已经提到的关于夺取政权问题的修正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观点说起。我们看到，修正主义者体现了这样一个方针，它希望在前进道路上没有冲突并且使无产阶级尽可能在和平的、合法的道路上前进。（海涅：难道你们不希望这样？）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很对！），但是对于可能性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很好！）历史并不是根据我们的善良愿望发展的。（喊声：否则你们就一定作预言了！）在哪一个领域中我们面临最大的冲突？在国家政权的领域中。它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贫穷阶级的组织。工会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工会一旦发展到对资产阶级有危险的程度，那时我可以向你们担保，他们将会借助于国家政权来使工会遭到巨大的损害。你们只要想一想英国就行了。再谈一下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当然，我们能够在地方自治团体中继续获得一部分进展，但是这仅仅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因为任何较广泛的进步都立即会遭到国家政权的阻止。选举权的问题也是这样。当统治阶级处于危险之中而且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受到严重威胁时，那时他们就会改变法律，使任何较广泛的进步都被打断。

掌握国家政权是决定性的。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我们才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靠基础。因此无产阶级抓住国家政权不放。而科尔布说：我们必须强迫资产阶级同我们分享国家政权！只有在我成为某个人主人时，我才能强迫他！但是，如果我们有权力来强迫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用不着同他们分享政权了！如果我们想分享政权，那么我们必须使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确信，这是有利于他们的。关于这种必要性我用不着再多费唇舌。谁如果是另一种意见，他就是空想家、幻想家，哪怕他怎么想象自己是一个现实政治家也不行。修正主义策略想要回避巨大的冲突，不是推翻资产阶级，而是从内部把它的政权挖空。这种修正主义策略有一个无条件的要求，这就是，必须使一部分资产阶级确信，把一部分国家政权转让给社会民主党是对

他们自己有利的。这只有通过迎合资产阶级才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的决议谴责一种想用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来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夺取政权的策略。

一些引文将证明这一点。不应当在我们这里寻找修正主义的实际出发点。对于这一点来说德国太落后了。修正主义的出发点应该到法国（饶勒斯和米勒兰）和英国（费边主义）去寻找。为了理解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必须到这些国家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逻辑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涉及米勒兰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德国修正主义者都拥护米勒兰。奥艾尔想向我指出一个矛盾并且说，在巴黎我自己就曾为米勒兰辩护，他奥艾尔曾支持我的决议案，而且似乎我曾向奥艾尔表示完全赞同他的发言。我认为，奥艾尔记错了。我只可能赞许奥艾尔发言的形式上的技巧，因为它的技术很高明，但是我不可能赞许它的内容，因为它使我感到很气忿，因为发言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当然，我力图使我的决议案采取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它在原则上是反对米勒兰的，但是把他的行为称为错误，而不是罪行。我想捍卫原则立场，而又设法使法国人统一起来。（有人喊：这是机会主义！）这后一个企图失败了。别人也曾碰到这种情况。我在巴黎决议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明确地说了以下这些：“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接着又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①

这样我就反对了修正主义者所代表的那种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只有通过一个接一个地夺取政府各部才能取得政权，从而不经过革命就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权。奥艾尔在他的巴黎发言中没有谈到这两句话，他甚至讲了恰恰相反的话。我在决

^① 《考茨基言论》1986年三联书店版第51—52页。——编者注

议中把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看作是一种特殊情况，而奥艾尔在巴黎说：“确实，我们那里还没有出现米勒兰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我希望，我们将尽快地也达到这样的地步。”你们相信我会同意奥艾尔的这句话吗？（倍倍尔：当然不相信！）这是他发言的要点之一。在巴黎决议之前我就已经讲过我对于米勒兰事件的看法，我采取了和现在同样的立场，我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改变。有人说，米勒兰事件只适合于法国。不言而喻，正如奥艾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德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也知道，组成一个巨大的资产阶级左翼的想法不再能够实现了。最近的选举埋葬了这一想法，它不久之前在纳乌曼牧师先生身上寿终正寝了。但是这种思想终究还继续在起作用。我对于福尔马尔发言中的话不能作别的解释，他说，如果有一个公正的代议制和一个真正的立宪议会制度，那么，没有我们参加，现在任何政府都无法组成。如果达到他所说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将不是有八十一名议员而是有一百二十五名议员，也就是说还不到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怎么能够说，没有三分之一的议员就无法组成任何政府！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一旦有了议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就立即同自由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一起组成一个政府，福尔马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创造这样的前提，这句话就毫无意思。

福尔马尔和奥艾尔曾表示希望在德国很快也能够发生一次米勒兰事件。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只有采取同在法国一样的道路，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组成一个执政的多数派。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建议我们选择的那一条道路，我从伯恩施坦的著作中看到的那一条道路。我必须在这里谈到伯恩施坦。福尔马尔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只要伯恩施坦一开口，我就准备立即扑上去扼住他的喉咙，似乎我对他充满了仇恨，以致我一听到他

的话，就会暴跳如雷。我非常不愿意发言反对伯恩斯坦，我经常只是被迫发表反对他的言论。请你们回忆一下争论的开始吧！伯恩斯坦发表他的观点已经半年之久，我并没有提出反驳，只是在他向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发表声明后我才发了言，那时继续沉默就会是怯懦了。现在，当伯恩斯坦提出了他关于副议长问题的建议时，我也是沉默了两个月，难道人们能指责我一有机会就写文章反对伯恩斯坦吗？只有当事情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不能再沉默下去，否则就会有怯懦的嫌疑，这时我才写文章。如果说我曾经对伯恩斯坦怀有怨恨，那么自从我看到他自己的修正主义同志怎样对待他，以致人们实际上应当同情他时，这种怨恨就早已消失了。不，如果说我反对他的时候多一些，那是因为他习惯于泄露修正主义的秘密，而爱德这个大孩子之所以开始使修正主义者害怕他，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伯恩斯坦在他的《前提》中指出，甚至在敌人中间，准备在政治权利上也考虑到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阶级发展中的变化的人数也在增加。他认为，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数在增加。“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么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①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有任何一个政党会被我们的言语吓得惊慌失措吗？如果在响亮的言语后面一无所有，就不会使任何人惊恐，它只会使使用这些言语的人变得可笑。不是我们的言语，而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力量以及朝着一定的方向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使资产阶级成了我们的敌人。只有当我们改变我们的这种意志时我们才会缓和资产阶级对于我们的敌视，而改变我们的词句却做不到这一点。伯恩斯坦继续写道：

“社会民主党越是下定决心要表现为它实际的那个样子，

^① 《伯恩斯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203页。——编者注

它的贯彻政治改良的希望也就越是增加。恐惧肯定是政治中的一个伟大因素,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煽动恐惧就能做到一切,那就是自己骗自己了。英国工人获得选举权并不是在宪章运动表现得最革命的时候,而是在革命口号销声匿迹并且工人为了争取改良而同激进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谁要是反对我说,德国不可能有相似的情况,那么我就要请求他读一下,还在十五年和二十年以前,自由主义的出版物上关于工会斗争和工人立法是怎样写的,以及这些党派的代表在要就与此有关的诸问题作出决定的帝国议会上是怎样说和怎样投票的。这一来他也许会承认,政治反动决不是资产阶级德国的最具特色的现象。”^①

这里以直率的语句建议同激进资产阶级一起争取改良。然而,这一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在英国争取到十小时工作日是在宪章运动表现得革命的时候,而不是在工人为了争取改良而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获得普选权的最初的步骤同样是英国工人争取到的,这也不是通过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而得到的。这是通过1867年的斗争,卡尔·马克思那么有力地参加了这一斗争,国际在其中起了那么巨大的作用。只是后来才进一步扩大了工人的选举权,当然这只是在工人为了争取改良而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之后,在他们不再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独立的成员之后,在他们完全成为英国自由主义的附庸之后。难道伯恩施坦要求我们采取同样的政策吗?当然不是!那么他举的全部历史上的例子就站不住脚了。

伯恩施坦还在《社会主义月刊》的一篇题为《巴黎和美因兹》的文章中反对我的巴黎决议,他的眼光比赞成我的决议的饶勒斯和奥艾尔更为远大。他反对这个决议,他声称,这个决议给予非可能派的东西,远远超过它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而从这个观点来看他有充分权利反驳这个决议。他举出英国作为无

^① 《伯恩施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205—206页。——编者注

产阶级怎样才能夺取政权的证明：

“在英国，1886年第一次有一个工人进入世界帝国的内阁。当然可以反驳说，那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人。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代表一个阶级，不管人们能够在别的方面如何指责布罗德赫斯特^①，无论如何他总是他的国家的有组织工人的公认的代表。而他担任这个职务是得到他们的同意的。1892年伯特^②的情形也是一样。……简言之，我们恰好在最先进的国家中看到被决议称作夺取政权的‘不正常的’开端的事情确实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实现。现实陷于不幸的处境，成为‘不正常’的了。”^③

由此可见，在伯恩施坦看来，伯特和布罗德赫斯特事件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伯恩施坦：不是这样！）那篇文章中有这个意思。（倍倍尔：那篇文章中很清楚有这个意思！）但是必须了解伯特和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他们属于这一类政客，在海牙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就已经把这些人痛斥为英国工人必须清除出去的无赖。这是一些把自己完全出卖给自由资产阶级的工人，这是一些职业政客。难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可以通过这些人来实现吗？你们中间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可见，企图通过逐渐挖空统治权来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权，而不是象通过突击攻下一个要塞那样来取得政权，就会引导到这样的地步。（有人喊：通过突击！）是的，通过突击！首先必须包围，而用突击来结束包围。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决议中不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谴责企图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权的政策呢？这一来我们的决议会变得更明确些，但是人们会反驳我们说，我们所指的情况，在德国还根本谈不上。在德国还谈不上某一个人参加内阁的

① 亨利·布罗德赫斯特（Henry Broadhurst 1840—1911）——英国工联领导人，1886年任自由党内阁次官。——编者注

② 托马斯·伯特（Thomas Burt 1837—1922）——英国矿工工会领导人，1886年和亨利·布罗德赫斯特一起被任命为自由党内阁的次官。——编者注

③ 《伯恩施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268—269页。——编者注

问题，这并不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原则上反对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愿意。在德国，修正主义仍旧停留在它的发端时期，它还没有越出它的准备阶段，而在这个准备阶段自然必须迎合现存制度。要是任何一个逻辑地思考并且谋求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权的人投票赞成这部分决议，他就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束缚了自己。而现在同志们说：我们根本不想迎合现政权。但是这不取决于愿望，事物有自己的逻辑，即使有人不按照逻辑思考，这也不妨碍我们看到事物的逻辑并从中得出我们的结论。德国修正主义没有提出一个确定的纲领，这也是它的不幸。（有人喊：我们有党的纲领！）修正主义在法国和英国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德国，环境对它不利，修正主义总是停留在发端阶段。它总是希望在我们这里开辟新的道路，却仍旧停留在旧的轨道上。不知说过多少次我们必须修改纲领了！（有人喊：倍倍尔也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修改内容！而等到要进行修改时，修正主义者就会宣称，我们必须停留在旧的轨道上。如果有哪一个人想走新的道路，却又停留在旧的轨道上，那会发生什么呢？他会出轨。德国修正主义不是表现为确定的方针，而是表现为一连串不间断的出轨。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出轨是一个认为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进程的典型形式。

.....

爱·伯恩施坦（摘录）

（9月19日）

党员同志们！我相信我们都会感激考茨基同志，因为他使关于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策略的讨论转移到原则性的领域了。没有人会比我本人更加深切地体会这种感激之情。我必须声明，不只是从这个时候，而是从一开始，我就决心要发言反对这一决议。我这样做并不是想伤害那些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却又

投票支持这一决议的人。我一开始就毫不迟疑地向你们声明，我是修正主义者，如果你们还嫌不够，那么，我甚至是个伯恩斯坦分子！

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个词不是由我首先创造的，是休恩朗克1894年在法兰克福说，对社会主义的概念的修正是必要的。我从未说过对于社会主义的修正，而是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修正主义所反对的是什么呢？如果把所有过去或现在在实践的或理论的问题上和绝大多数党员观点不同的人统统都称作修正主义者，就可以聚集起一大群人，他们所代表的观点是形形色色的。抱批评态度的人到处都比抱教条主义态度的人难于聚集得多。在宗教改革时代，天主教会团结得很紧，新教却分裂成许多细小的运动，这暂时成了它的弱点。因此如果所谓的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在许多点上各持己见，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对此从来没有抱过幻想，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我作为理论家要在一切问题上同福尔马尔，奥艾尔或海涅一致。我在英国时已经声明过：他们是独立的政治家，是有实际经验的人物；他们不对我负责，我也不对他们负责。如果他们宣称在某个问题上反对我，那么这还不是背弃，这还不是我被他们踢了一脚。我不承认党内有一个修正主义的党，因此我已经在不同的场合指出，刚刚提到的那几个同志并不比其他的同志更接近我。奥艾尔是我的一位密友，福尔马尔是我的一位老战友，但是，福尔马尔并不比奥古斯特·倍倍尔更接近我。当我今年夏天到瑞士去的时候，我在屈斯纳赫特拜访了倍倍尔，但是路过慕尼黑时却没有探望福尔马尔。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个人的关系，如果以为存在着一个图谋反对全党的统一的修正主义派别，那是错误的。仅仅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一种对党的正式的科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所代表的观点来说是非正统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如果象目前倍倍尔这样对我们宣战，那么，不言而喻，我们仅仅为了维护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要聚集在

一起。此后，如果事情过去了，各人将重新走他自己的路并且在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

按照我的理解，修正的任务在理论领域而不是在实践领域。而且理论受惠于运动的，比运动受惠于理论的为多。考茨基断言，修正主义者对纲领^①表示怀疑。不，这是不正确的。修正主义者首先绝对不怀疑一件事，即纲领的第二部分，它的全部政治的和经济的要求。你们举不出一句我对这些要求表示怀疑的话。因此，我断言，几乎谈不到党由于我们的工作而遭到的危险。我也不怀疑我们纲领的理论部分的最后两条。需要修正的是这一部分的前五条和第六条的一部分。落在我这个理论工作者身上的修正主义的任务就在这里。至于对实践的修正，它只能从实际的经验产生。因此只能对你们中间的个别人所预言的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是否按所说的方式进行这件事提出怀疑。但是要说到纲领中的要求，那么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们在我们纲领的第二部分表述了关于帝国、邦和市镇的民主的实际要求。考茨基会替我证明，在制定纲领的时候，我正好担负了在《新时代》上论述这一部分的任务，而且我可以这样说，这一部分的某几点是我加到纲领中去的。在这一方面我没有修正我的观点，而是始终非常坚决地捍卫这些观点。……

……

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我同考茨基比同另一派别更为接近。一个战斗的政党不是学院式的讨论会，而怀疑总得有一个界限。可以对同志们提出这个要求。但是，界限在那里？当然不是在关于假想的发展的观点里！在那里必须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界限是在党纲中规定的政治原则里，而我从来没有对这些原则提出异议；相反，我总是全力捍卫它们。考茨基说，“新的方法”必然要起瓦解作用，并且举出法国作为证明。我在当时根本没有直

^①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编者注

截了当地发表支持米勒兰内阁的意见，因为我对法国的情况的了解还不足以使我对问题作出判断，单凭这一点我就不能发表意见。但是在原则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会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资产阶级会分裂，那时为了促进工人阶级的发展，将需要社会民主党人和激进的民主派携手并进。我确信，一个懂得自己要求什么的社会民主党那时可以毫无危险地结成这种联盟。政党是它所依靠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的代理人。如果工人阶级的利益通过这种联盟能够真正得到促进，那么，结成这种联盟就是党的职责。如果说米勒兰的部长职位起了瓦解作用，那大部分是因为，当它产生时，法国党整个说来已经分裂了。至于对立因为米勒兰参加内阁而更加尖锐化，这当然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是，如果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站在米勒兰后面，一方面监督他，另一方面又支持他，那么，肯定能通过米勒兰的内阁获得更多的东西。人们说万一同自由派结成联盟就会使党削弱。我从来不抽象地判断这类问题。如果社会民主党是弱小的，组织涣散的，就能够出现并且很可能将要出现这样的削弱；但是，如果它象德国那样是一个强大的、有觉悟的和统一的党，那么通过这种联盟会给党造成什么损失呢！如果你们这样认为，那么你们对于实际事实的力量和工人阶级实际需要的力量的信念一定很薄弱。考茨基同志还提到参加历届英国政府的英国工人的例子，并且说他们就是被马克思斥为无赖的那些人。虽然我对科学家马克思怀着很大的敬意，并且尽管有种种意见分歧仍旧把自己算作马克思学派的人，但是在许多方面我对马克思来说的确是一个异教徒。不过无论如何，马克思在不少点上也有错误，特别在涉及英国工人运动时有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我讲过这种话，而且一个在英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的人也讲过这种话，这个人就是海德门同志，他在一本小册子里公开说，马克思从来没有完全正确地理解英国的发展。我认为这样说是过分了，但是，毫无疑问，马克思错误地判断过许

多事件,并且往往对一些人进行了攻击,而这些攻击后来并没有应验。布罗德赫斯特和伯特肯定不会同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同一个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些人加入政府时,是取得了他们组织的同意而行动的。托马斯·伯特在退出政府后,回到矿工联合会并且在那里重新担任他的旧职位。无赖的说法对他是不适用的,布尔战争就恰好证明了这点。老伯特是当时最激烈地对战争提出抗议的人们当中的一个。布罗德赫斯特和伯特是两个这样的人,他们象任何人一样热情地关怀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可能做过一些错事,但是,他们肯定不是无赖。

.....

沃·海涅 (摘录)

(9月19日)

.....我不提倍倍尔关于我的话,而是谈一谈考茨基今天早晨的发言。考茨基非常笼统地谈论修正主义者,从辩论的整个过程来看,人们无疑也把我包括在修正主义者中间。考茨基说,所有德国修正主义者都支持米勒兰。根据《前进报》的报道,我在今年7月29日的一次集会上说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把法国同志的政策移植到德国来,在德国缺乏这样做的一切前提”,我还说明,我认为即使在法国,这个试验对于法国同志也是有害的。可见,就我个人来说,那种认为所有修正主义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内,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词)都支持米勒兰的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次考茨基说,修正主义者同伯恩施坦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所发表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考茨基念了伯恩施坦著作中的一些章节。但是他没有告诉大家,这些章节几乎毫无例外就是我已经公开反驳过的那些章节。任何时候我对于把我的政治观点同伯恩施坦的政治观点等同起来都曾表示抗议。我在1902年的《社会主义月

刊》第424页上说：“正如我在其他场合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所谓的伯恩斯坦分子所重视的不是成为一个信奉一种伯恩斯坦教义的小团体，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生命力将通过最广泛的个人意见自由而得到保证。”根据会议记录，我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说过：“你们看，尽管我认为伯恩斯坦在许多点上是正确的，尽管我很尊重他，伯恩斯坦和我并没有彼此保证互相吹捧，也就是在我们掌握的报纸上互相吹捧，说我们是何等杰出的人物，我们最近的著作又是多么出色。不，我们没有结成一个小团体，每个人都拥有无条件的批评权利。”^①考茨基还说，修正主义者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原则，他念了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中的个别章节作为这一点的证据。我不能在这次发言中为伯恩斯坦辩护，我只能说我自己就这一点写了些什么。1899年10月，我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写道：“与此相反，我觉得，这一切情况都证明不了伯恩斯坦的下述说法：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增加；它也驳不倒中产阶级愈来愈无产阶级化的事实。我在这一方面不能同意伯恩斯坦关于总的发展过程的观点，我同样也必须反驳他关于在经济方面的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继续缓和的观点。这一斗争从表面看来愈是不那么纯粹，它在内部就愈加激烈。过去的暴力越轨举动，即破坏工厂和机器以及企图进行暴力革命，是同根本不了解无产阶级真正的阶级利益完全并行不悖的。今天的采取有秩序的合法形式的工会斗争，今天在工人保护方面的改良政策，是一种尖锐得多的阶级斗争，而且企业主们也认为它是这样的。至于说企业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仇视工人阶级，伯恩斯坦恐怕会同意在大陆上是这样的。”考茨基接着又认为修正主义者应对削弱政治斗争承担责任（这是他发言的核心），他是从伯恩斯坦关于老生常谈对资

^① 见本书第423页。——编者注

产阶级的影响的意见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我确认，我关于这一点说过以下这些话：“任何人，包括伯恩斯坦在内，都没有断言，我们通过在目前国家制度下的社会改良能够达到我们作为目的所设想的一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现在不想为将来继续建设打下必要的基础，那么我们什么也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遗憾不能赞同伯恩斯坦的乐观主义，他抱着这种乐观主义作出预言说，向社会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化的和平发展是确定无疑的。”我个人确实不是豪言壮语的爱好者，夸夸其谈的未来威胁完全使我厌恶，但是我认为，当伯恩斯坦说他所谓的我们的贪食奇谈应当为德国自由主义的软弱负责时，他是错误的。社会民主党愈是放弃自己青年时代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使庸人感到恐惧，那确实往往是不足为怪的），对社会民主党的愚蠢的仇视、对任何一点民主主义思想的畏惧在德国就会愈加厉害。一切革命空谈、一切华而不实的辞藻对资产阶级所起的威吓作用，不及我们参加的有节制的、平静的改良工作所起的一半。我们，就是说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勇气表现为我们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具有以改造社会基础为宗旨的理想和最终目的、也就是具有革命的理想和最终目的的实际改良的党，因此我反对伯恩斯坦提出的修改党的名称的建议。在我发表这一篇文章之前，我曾把稿子给福尔马尔看过。我们就内容进行了商量，他对此表示同意。我提到这些并不是为了反对一个无中生有的指责，而是为了证明，决议所针对的修正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3年柏林德文版第299—312、315—316、318—321、339—345、347—349、365—372、381—387、390—392、400—401、414—415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德累斯顿 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决议

(1903年9月19日)

党代表大会认为，国会党团固然可以行使它的权利，从它的成员中间提出候选人以取得帝国议会第一副议长和一名记录的职位，但是它应当拒绝承担进宫朝见的义务或者服从不以帝国宪法为根据的任何条件。

党代表大会非常坚决地谴责修正主义者的这一企图：改变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久经考验和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用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来夺取政权的政策。

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就会是：使得争取尽快地把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这个政党，也就是真正的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

因此，和党内存在的修正主义者的企图相反，党代表大会深信阶级矛盾并没有削弱，而是在不断加剧。党代表大会宣称：

一、对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它决不承认能够使统治阶级保持政权的任何措施。

二、根据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考茨基决议，社会民主党不能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

党代表大会还谴责为了便于投靠资产阶级政党而抹杀当前的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的任何企图。

党代表大会期望，国会党团运用由于它的成员增多和支持他们的选民群众大大增加而得到加强的力量，一如既往地阐明

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并且按照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利用这一力量，最有力地和最坚决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保证一切人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比以往更为有力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殖民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并为扩大社会立法和完成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而努力奋斗。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3年柏林德文版第418—419页。

卡·考茨基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

(1903年9月23日)

我们最近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不是那种我们一想起来就非常高兴的大会，这种感觉恐怕全党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把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算作失败的大会，那又太过分了。尽管它的过程有时是不愉快的，它的实际结果却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它排除了许许多多引起冲突和争吵的原因，因此尽管会上爆发了激烈的斗争，这次大会却有助于内部的和平。

但是还必须强调指出——而且对这一点不管多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这次党代表大会议程的中心点即关于策略的讨论丝毫也没有理由使我们感到沮丧。我们一点也不必由于把这一问题列入议程并且深入地加以讨论而后悔。

只是由于不幸把一个问题放在议程的开始而不是结尾去讨论，才引起了不愉快的、有时是痛苦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情绪。当时，由于人们都还没有把话说出来，因此一方面斗志和战斗力都还很旺盛，另一方面双方火气也正是最大的时候。如果把策略作为第一个议题，在这以后才讨论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问题，那么，恐怕可以肯定，关于这一点的讨论会简短得多、心平气和得多。

不过如果那些促使我们不得不讨论这一点的同志，也就是给《未来》杂志撰稿的人，事先了解到我们批评的根据和执行委员会决议的根据，如果他们在关于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问题的讨论结束时才作出的说明能在讨论开始时就提出来，那么讨论本来也可能是简短和心平气和的。而党代表大会便会赢得很

多宝贵的时间和避免一连串非常讨厌的场面。

这些同志准是早就知道自己的论点站不住脚，他们也没有打算认真去捍卫它。但是为了使这次退却不致变成逃跑，他们试图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转移，同时为了掩盖他们目前的错误，他们之中的两个人费尽心机把他们所能搜集到的梅林同志十年前和二十年前犯过的或者据说犯过的错误收集起来。他们挖空思想出来的这着棋对于把公务性讨论变成个人争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我认为在这里讨论和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的梅林事件是不合适的。每一天都可能提供新的消息，而这篇东西却要在写好一星期之后才和读者见面。不管我说些什么，都有被新提出的事实否定的危险。

这已经足够说明我为什么认为没有理由收回我在德累斯顿的发言的任何内容。

比起关于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问题的讨论来，关于策略的讨论就更加重要和更有教益，这次讨论是以一次值得注意的表决告终的。和汉诺威的表决相比，德累斯顿的表决在说明党内各种派别互相之间的力量对比上前进了一大步。这样一来，凡是通过讨论和决议能达到的目的，这次讨论和我们的决议都达到了。

我曾在我的《致党代表大会》一文（《新时代》第49期）中表示希望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能够做到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没有做到的事，即“作出一次被各方面同样地承认为党内多数人的不容否定的意志并且给予尊重的决断。如果使修正主义派别深信，党内不存在改变我们党的性质的基础，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期望，它将把精力更多地用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上，而不是用在寻找和提出党内问题上”，以致我们终于又可以“毫无芥蒂地肩并肩进行斗争”。

目前这一期望的第一部分至少是实现了：大会非常坚决地

证实了党内不存在改变或修正我们党的性质的基础。

反对我们的决议的总计有十一票。其中有一些同志是由于认为决议不够尖锐。当然也有一些同志，他们怎么能够投票反对伯恩斯坦，还是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这些同志曾经清楚地表述过修正主义观点和“正统”观点之间的深刻矛盾，例如科尔布同志。当然只不过是表述了矛盾，是否也理解了，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感觉到这一矛盾了，如果他们虽然如此，却又不投票支持伯恩斯坦，那只能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他的论点是虚弱的。

但是对于一批修正主义者没有投票支持伯恩斯坦这一点，还可以找到别的原因。

如果不把修正主义划分为两派，就无法了解近几年来修正主义运动。这两派也许可以称为理论的或自觉的修正主义和实践的或不自觉的修正主义。两派之中只有第一派感觉到我们的决议击中了它，只有它反对决议。与此相反，第二派单就其本身来说并不代表一个确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派别，而仅仅是代表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始终是存在的，而且今后还会存在，只有加上自觉的修正主义，这种情绪才会进一步凝集成一定的派别的紧密统一体，但自觉的修正主义一离开，它就又解体为一种松散的朦胧的情绪了。

在这一派看来，理论和对理论的修正是完全无所谓的事，就这一点来说，把他们称为不自觉的或者实践的修正主义者也许不完全正确。如果机会主义者这个名字不是如此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我也尽可能避免使用它，那也可以称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倍倍尔曾经正确地说过，我们大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机会主义者。我们之中没有人想不顾一切地蛮干，每个人都使自己的行动适应现存的环境。在我们党内，所谓的“机会主义者”受到谴责的地方只不过是适应的某种特定的形式，也就是说机会主义的某种特定的形式，即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对居民中一些

非无产者阶层的需要的适应。

但是如果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机会主义这个词，那么在这里附带提一下多次对我提出的责备——把我提出的在选举权问题上我们在国会中应当首先采取守势的这个建议称作机会主义的建议、或者干脆称作极端机会主义的建议，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里丝毫也谈不上考虑到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利益和倾向。

这里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还是不应该在普选权这个战场上向我们的敌人挑战？在一个我们一定会吃败仗的战场上迎战敌人的想法称不上是军事艺术。当然，如果能断定，无论如何必须在这个战场上交锋，如果能断定，保守派方面大概会提出一个使现有的选举权恶化的提案，那么赶在他们前面提出一个改善选举权的提案，这在策略上是聪明的。但是只要不能肯定这两点，我就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去发动改变选举权的现状，因为在我们的敌人目前的情绪下，如果实行改变，只可能是使选举权恶化。不过，我从来没有自诩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策略家，我很愿意得到指正。但是只能凭论据。我不会被“极端机会主义”之类的空洞口号吓住。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常常被骂成是“温和分子”，同样也常常被骂成是“激进分子”，然而我还是依然故我。我是不怕空话的。

还是回过头来谈我们对实践的修正主义的分析吧！

很清楚，我们党内尽管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每个同志在性格和性情上，以及在见解上总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使他们对各个问题也产生各不相同的看法。比这种个人差异还更重要的是地方差异。在一个象德国这么大的国家内，各地区的发展（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水平并不都是一样的，它们的历史，它们的传统，甚至它们的政治制度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环境，并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情绪和政治情绪。

倍倍尔在德累斯顿把慕尼黑形容成消磨才智的卡普阿^①。这肯定只是诙谐的说法，而慕尼黑的代表们却把它看得非常认真，这是错怪了他。不过这个说法包含着严肃的内核。慕尼黑或卡尔斯卢厄的社会环境所起的作用不同于莱比锡或德累斯顿或柏林，这是无可争辩的。一些同志在这里是“激进的”，到那里就变成“温和的”了，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种信念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思想不坚定或者智力贫乏，而仅仅是由于一个地方或者邦的阶级矛盾远比另一个地方或邦激烈得多。

在柏林，有两种环境并存着，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同志是受这一方向还是另一方向的影响，要看他所处的是这种环境还是另一种环境而定。如果在柏林的北区或东区，他身上会充满强烈的无产阶级斗志，相反，在柏林西区的咖啡馆里，他只会沾染上文人的傲慢、颓废派的萎靡不振和新闻记者追求耸人听闻消息的癖好。

谁立足于一种从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整体而得出来的深思熟虑的理论的扎实基础之上，谁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象超脱于周期性的经济动荡——繁荣和危机——的影响一样，超脱于各种不同的地方环境的变化不定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他个人所处的特殊环境。

在我们党内，由于多种多样的环境引起的多种多样的情绪和意见比由于多种多样的个人性格和学识引起的还要多，尽管我们党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是情绪和意见的多样性总是存在的，而且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党的迅速发展具有使情绪和意见的多样性愈来愈加强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力求愈来愈消灭一切地方特点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均等化倾向又起着相反的作用。

除了这种地方的差别以外还有时间方面的差别。广大党员

^① 见本书第561页注^①。——编者注

的情绪在繁荣时期或者在自由主义高潮时期是和危机时期或者在自由主义衰落时期不一样的。

所以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身上，党的感情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党的感情上的“激进主义”是很不相同的，而且这种激进主义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人身上也并不总是一样。

于是，在繁荣时期，在德国出现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它是伯恩施坦从英国输入的。在这以前，大卫和另一些人曾经朝这一方向作过努力，不过没有成功。

这种修正主义当时适应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地方的情绪，他们拥护它，并不是因为他们赞成它的理论观点，而是因为它在策略方面缓和阶级斗争和接近资产阶级民主的倾向符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并不是和这种理论完全一致的，倒不如说他们宣扬对于一切“理论上的争吵”都漠不关心，但是，他们却以这种方式非常激烈地攻击修正主义的敌人和批评者，即谴责这些人的批评是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这就使他们很省事，可以向修正主义的敌人开火，而不必费力气去理解和维理论修正主义。

这些实践的修正主义者并不是明确地赞成理论的修正主义，而只不过是维护它和促进它，但是，理论的修正主义是由于他们才在德国成为一种政治因素的，而资产阶级报刊又把这种因素的力量和危险性夸大了。另一方面，实践的修正主义却从理论的修正主义那里取得了它从前缺少的精神纽带。它由于各种地方的和个人的情绪的融合而发展成一个有着特殊的机关刊物的特殊派别。

于是党内的右翼和左翼之间的矛盾便具有了一种和过去不同的性质。当大家把理论的修正主义看成实践的修正主义的北极星时，后者已成为一个派别，它企图使党走上和党迄今所走的道路相反的方向。矛盾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偶然发生的了，它们变成经常的，任何时候都在互相冲突，最后，猜疑和恼怒甚至弄

得最好的同志和朋友都彼此决裂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是个人的矛盾和个别人的挑拨造成了在德累斯顿表现得如此激烈的争吵，人们只是在事后才寻找公务上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种看法是再错误不过的。

幸好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说，这种自诩通晓人情的浅薄见解在这件事上和它过去在许多类似的事情上一样，都是错误的。难道不是有人也曾经要把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矛盾贬低成个人矛盾吗！事情恰恰相反：谁深入地彻底研究一下这些事情，他通常会发现：凡是在党的生活中公务上和谐一致的地方，人们为了事业的利益可以容忍那些个人不喜欢的伙伴，相反，如果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长期持续的公务上的对立，那么面对它所造成的敌意的影响，私人之间最亲热的友谊也是保持不了的。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有最亲密和最美好的友好关系，是因为我们是战友，也就是说来源于公务上的和谐一致，而不是因为我们是酒肉朋友。

个人之间的矛盾是观点对立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只有当对立的观点被克服时，个人之间的矛盾才可能缓和。但是这不可能在小范围内通过私人的讨论来解决，只有通过我们的最高机构——党代表大会的裁决才能做到。因此，德累斯顿的讨论和决定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中央机关报没有理由贬低这些。我们需要的是明辨是非。德累斯顿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明辨是非，要不是布劳恩和伯恩哈特对梅林的复仇性讨伐化费了两天半的时间，从而缩短了关于策略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得到发言的机会），在这点上做得还会更好。

在德累斯顿暴露得最明显的是这一点：早在党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已经弄清楚，修正主义在群众中没有扎根，它只有军官，却没有军队；它在报刊上和代议机构中的代表比它在群众中的追随者要多得多，简直不成比例。但是在德累斯顿，就连修正主义的将军们也分成了两个阵营。军队指挥官们抛弃了参谋部，

实践的修正主义摆脱了理论的修正主义。

理论的修正主义没有实现实践的修正主义对它的期望。它不是深入群众并为实践的修正主义平整地基，而是愈来愈把群众推开。它变成了实践的修正主义的障碍，而不是支柱。是的，由于它眼看就要损害实践的修正主义的声誉，令人十分担心，因此它已成了一种危险。于是，伯恩施坦和米勒兰就被抛到一边，干得最起劲的是海涅，此人认为，谁说他是修正主义者，就等于指责他偷了银匙子。

饶勒斯将会对这种变化感到吃惊。他恐怕已甘心忍受这一次他的朋友们在德国仍旧会处于少数这一情况，不过他也许曾经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他的朋友们会很快变成多数，然后将倍倍尔、辛格尔、考茨基置于死地。但是他的朋友们却倒向多数派并且投票赞成一项谴责他的策略的决议，这是他不可能料到的。

德国的这一决议对于饶勒斯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决议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德国的疆界，它成了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合适的前奏曲，在这次大会上，如果临时议程不改变，我们将再一次讨论策略问题。饶勒斯本来盼望在阿姆斯特丹凭借他的德国朋友们的帮助来战胜他的批评者并同他们进行可怕的清算。现在他发现他和他的批评者之间有一堵墙，它虽然不是由奥艾尔、海涅、休特古姆、福尔马尔等人的身体筑成的，却是由他们的投票造成的。但是他们的票已经投定了，不可能再改变方向了，否则他们就会前后矛盾到极端荒谬的程度。

德累斯顿的声明和表决对于德国来说却意味着理论的修正主义作为政治因素已经被埋葬了。表决自然并不触及一些同志的信念，同样，党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不能证明一种学说在科学上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但是自从实践的修正主义离开理论的修正主义，后者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我们也许有时还会有机会对修正主义著作的这一种或另一种出版物进行批评，但

是我们可以十分冷静地处理这件事，因为理论的修正主义在最近时期内不再会在德国的政治斗争中起作用了。

德累斯顿的讨论在这方面使我们向内部和平跨进了一大步。

但是随着实践的修正主义脱离了理论的修正主义，实践的修正主义也就必然失去力量。尽管理论的修正主义还很不完整，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特殊的理论的萌芽。理论就是按一定方法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它远远超出了个人本身的经验的范围，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理论是使他尽可能摆脱地区和时间（他是偶然被抛进这种环境中去的）的不断变化的影响的唯一手段。谁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谁就会象一片随风飘荡的枯叶一样受他个人的情绪、也受他的环境的支配。

尽管实践的修正主义轻视理论，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它已不知不觉地通过理论的修正主义而获得了相当大的稳定性。现在它再次成为一团混乱的情绪了，它在伯恩施坦转到修正主义阵营之前就曾经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它处在一股同它方向相反的潮流中间，它的抵抗力比以前还要更弱。而且随着危机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衰落，随着同国家权力的巨大冲突日益加剧，这种潮流可望变得愈来愈猛烈。于是仍然受实践的修正主义情绪控制的地方环境以及个人就愈来愈减少了，党内的个人摩擦也肯定会随着减少，个人矛盾也肯定会随着缓和了。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也给予了有力的推动从而有助于内部和平。

当然，在这方面也不应当抱任何幻想。在我们中间仍然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而且有一些是绝不会完全结束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期望个人的激动和怨恨会立即消失。多年来的内部摩擦已使这种个人情绪发展得很严重。人们为了党的利益起初努力不让内部摩擦公开化，它们往往只是在暗中进行，矛盾从来没有得到过彻底解决，正因如此，内部摩擦不但没有缓和，反

而极度尖锐化了，以致于德累斯顿的爆发在那些对这一切毫无所知的人看来必然是完全不可理解和毫无道理的。

继续掩盖下去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德累斯顿的公开讨论虽然是痛苦的，却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了。然而这次讨论只是建立内部和平的开端，还决没有达到内部和平。在一些人的心里仍然残存着怨恨和猜疑，关于党代表大会的报道还有可能引出一些激动的插曲来。

但是汹涌的波浪终究是要平息的，而修正主义的不幸插曲将消逝在这些波浪中，就象十年前的“青年派”的插曲和几个星期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插曲已经消逝一样。

其实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和理论的修正主义相对应的资产阶级行动。它是和理论的修正主义在同一时间、从同样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产生出来的，它和理论的修正主义同时开花，当理论的修正主义不再受到经济繁荣和资产阶级向左转的阳光照耀时，国家社会主义也同它一起凋谢，现在这两朵花都枯萎了，而且没有在政治之树上留下一颗果实。

发表于1903年9月23日。译自《新时代》第21年卷（1902—1903）第2册第52期第809—815页。

阿·艾尔姆 胜利的党代表大会

(1903年10月)

三百万人的党^①在取得光荣的胜利后第一次举行了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党的无产者阶层中一再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这次胜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党的影响今后是否会强大到足以在议会中通过某些迫切需要的社会政治要求？在特尔托夫-贝斯科夫县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的党团必须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开展更加进攻性的活动。我们必须号召无产者群众和全体人民为实现我们的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要求而斗争，为消除在各个不同领域中最严重的弊端而斗争，并从而迫使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如此团结一致地在全国进行了这场斗争之后，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本来应当是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讨论我们对于将来的策略措施。但是，实际发生的却是另一回事。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了，因为我们的倍倍尔（他率领我们向敌人冲锋陷阵时的毅力是受到全党钦佩的，他的火一般的热情在群众中激发起崇高的激情）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美好的，但是这个胜利毫无用处，因为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毫无用处。他们多半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企图把无产阶级政党出卖给资产阶级的改良政党。

而在红色萨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顿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这一点。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3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约三百万张选票。——编者注

为了证明修正主义者没有良心和没有廉耻，首先给我们演出了三天的文人辩论的戏剧。这次辩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似乎这是关于修正主义者的大辩论的序幕。自从有了社会民主党，就有一些同志有时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的声誉是很好的。党内还从来没有人想把这些同志称作落伍者、叛徒。在《未来》杂志上年复一年也有一些本国的和外国的、激进的和温和的同志发表文章，内容既有政治性的，也有科学性的或趣味性的。去年，《未来》杂志上也出现了所谓修正主义者的一些文章。如果对凡是给《未来》杂志撰稿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一概加以谴责，那是绝对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因为我也认为，象《未来》这样已被证实曾对党进行过诽谤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连一行字都不应当给它写。至于在一般情况下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这个问题，所有那些不是被迫要为稿费而写作的人议论起来都很容易。但是我听到一位很激进的女同志说，要不是资产阶级报刊接受她的文章，她和她的孩子们就得挨饿。因此，尽管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对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种种理由，我也不能同意对此一概加以谴责。还没有能制订出普遍适用的准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但是，如果一位同志在一家资产阶级报刊上谈论党内事务或者甚至批评我党在某一个问题上的态度而使敌人感到高兴，我也认为这是十足的轻率态度。要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我认为，用不着客气，干脆把有关的人开除出去。我也谴责在《未来》杂志上发表《党的道德》一文，因为虽然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一般性的，然而，由于它是一位同志写的，就可能被看作对我们党也是适用的。但是这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是不彻底的，每一家资产阶级报刊都曾有时对我们党进行过敌对的、恶意的批评。所谓无党派的报刊在这一方面往往是最坏的，在上一次选举中，几乎所有的这一类报刊都抛开了假面具，并且公开地为资本家政党效劳。由此可见，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抉择：

或者是根本禁止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或者是——因为这一来就等于把一大批作家开除出党，所以看来是无法实行的——听任各人根据自己的分寸感采取行动，并对于凡是在资本主义报刊上批评或诽谤我们党的人立即加以惩办。我们党的某些报刊认为，那些在大庭广众之前受到谴责的人调转枪口并且瞄准《新时代》编辑所封的党的道德维护者，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报刊为一位梅林辩护，并且要求把那些在发表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文章中一句话也没有攻击党的人开除出党。谁采取这种做法，那就表明，他并不关心事情本身，他是从仇恨的感情出发行动的，他所要的不是党的团结，而是党的分裂。对于下面这一点绝大多数党员同志目前大概是意见一致的：一个忽而向前、忽而向后、然后又向前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人，一个在相当短的时间后就把自己先前曾兴高采烈地赞扬过的东西说得一团糟的人，一个这样的心理上不可捉摸的人不能担任我们党的科学机关刊物的领导职务。另一个问题是，这整个令人讨厌的争论对于党代表大会来说是不是无法避免的。倍倍尔说他并不以老师自居，这很好；如果一个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想独自以其他党员同志的裁判者自居，这也不会产生良好的印象。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向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最迫切的要求，今后应防止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令人厌恶的文人争吵。如果以为，党的机体很坚强，它连最坏的事情也可以忍受，那是不对的。要是今后我们继续这样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上互相厮杀而使我们的敌人高兴，那么，这一来不仅我们的党将在社会上名誉扫地，而且一大批党员同志将失去继续给党撰稿的兴趣。实事求是地讨论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策略会起弄清思想、鼓舞人心的作用；与此相反，个人的争吵则使人垂头丧气，失去信心。汉诺威的辩论没有使我们遭到损害，它从头到尾具有宽宏大量的性质；卢卑克的文人争吵在广大党员中引起了愤慨；在德累斯顿出现的事情，在许多无产者的心里将留下深切的痛苦、悲

伤和羞愧。

这是谁的罪过？每个参加者都将把罪责推给别人，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觉得，祸害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党内，首先是在作家中间，有一种吹毛求疵、容不得不同意见的精神发展起来了，这种精神自然而然地最终势必导致个人的憎恨。谁要是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人们就不再把这个同志看作是争取无产阶级事业的战友，人们就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他，把他自己最坚决地加以反对的目的和动机硬加到他身上。有人说，言论自由在我们党内没有受到威胁。的确，没有禁止发表某种言论，但是，如果公开地宣布这种言论或者甚至把它用黑字印在白纸上，那就要倒霉了。任何一个不拥护官方规定的观点的人，他所得到的绰号可以使人产生种种感觉，只是引不起对于他个人作为党员同志的尊重。所谓修正主义者在竞选斗争中也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任何一方都不否认这一点；但是，这并没有防止别人把这样的意图加到他们身上，似乎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事业不象对于其他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神圣了。奥艾尔曾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党效劳，然而，如柏林的一位代表所说的那样，如果他再一次象在汉诺威那样反对倍倍尔，他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是这些人所设想的党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这些同志来说，倍倍尔就是党；对于他们来说，谁要不是毫无异议地承认倍倍尔的言论和行动，谁就不再是合格的同志，必须开除。个人崇拜在我们这里终于达到了以往任何时期都没有达到的程度。不仅柏林是这样。《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倍倍尔的大会》和《我控诉》给我们提供了吹捧倍倍尔的更为有力的证据，这在柏林是无法设想的。如果说倍倍尔本人对于让他扮演的角色满意，说起话来口气（哪怕是在也包含对一位党员同志的颂扬时）简直伤人，如果说他最终也毫不反对开除持不同思想的人，那有什么好奇怪呢。反正是——“孩子们，别打扰我！”

在德累斯顿并没有说太多赞扬的话；相反，常常是进行最尖锐、最坚决的谴责，首先是对于修正主义的意图。什么是修正主义？谁是修正主义者？这不仅是德累斯顿的难以回答的问题；尽管就这个问题作了长篇大论的演说，问题仍旧存在着。我们甚至连这个美妙的称号是怎样产生的都不太清楚。诚然，考茨基对我们解释过：“起初人们说什么伯恩施坦言论，但是后来我们宁愿使事情少带一些个人色彩。”^①我们？指的是谁？是《新时代》编辑部吗？但是，在德累斯顿之前以及在德累斯顿，党内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信仰考茨基、倍倍尔和辛格尔在著名的决议中所描绘的修正主义，在德累斯顿之后也不会有人承认，因为要是承认的话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迎合现存制度，放弃阶级斗争，投靠资产阶级政党——谁想这样干？没有人！因此，修正主义者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赞成决议，因为决议中所谴责的同他们根本无关。我说，可以赞成决议，但是不应当赞成决议。我投了反对票。我这样做首先是因为，用表示赞成来正式承认党内存在上述意图，是违背我的心意的，因为我认为，公开宣称党内存在想使党失去阶级斗争性质的分子，是对党的一种侮辱。我之所以投反对票，其次还因为，决议中应当不是用空泛的词句、而是用确定的要求来表示阶级斗争性质的那一部分表达得不够明白和准确。我也支持蒂姆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仅仅是简要地重复了特尔托夫-沙洛顿堡的党员同志们的提案的思想。但是由于有些高教会派^②把提案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杜鹃蛋^③，激进的特尔托夫人就放弃了提案，而让工会工作者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提案。当然，要是我们党内的教皇们不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的话，那就没有人知道了！针

① 见本书第593页。——编者注

② 高教会派注重宗教仪式，因此这一词也用来指拘泥形式的人。——编者注

③ 意即可疑的礼品。——编者注

对蒂姆^①的提案，倍倍尔和奥艾尔曾说过，我们必须让枢密顾问们去制订法律草案，我们自己不行。但是一小时之后，在如此轻蔑地对我们的知识分子进行评论之后，倍倍尔扬扬得意地宣称：“如果我们明天由于某种情况能够把我们的敌人赶下台并由我们自己取而代之，那么，你们对此用不着担心，我们会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我们连制订一个简单的法律草案的力量都还没有，但是明天，如果一夜之间政权突然落到我们手里，那时我们立刻就会有这么多能干的同志，居然能够统治世界了。上帝给谁以职位，也给他以智慧！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们在我们的党团中缺乏足够的有能力的同志——我们在6月16日和25日增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同志——要是委托他们制订一个有关工人阶级切身利益问题的法律草案并提出论据，他们会胜任这个任务。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比我们的国会党团小得多，然而已多次提出拟定好的法律草案及其论据。在党代表大会上把修正主义者对空洞计划的癖好大大骂了一番，说什么如果给予修正主义者进行实际活动的机会，那时就会表明他们是否中用了。但是，对于我和所有工会工作者来说，在蒂姆的提案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人政治中暂时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一点，力图通过我们的宣传发动人民群众来争取一个要求。要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对政府和议会的集中攻击取得成果的话，我们将使工人更加紧密地靠拢党；要是政府和议会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那时我们的运动也将从中得到好处。这样一种争取用法律调整劳动时间、争取结社权等等的进攻性活动首先会使我们党内令人厌恶的争吵和吹毛求疵告一段落，并将受到参加工会的工人人们的欢迎。

但是我们的迄今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不能改变。这种策略的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一点考茨基教导我们：“我们迄今为

^① 约翰奈斯·蒂姆（Johannes Timm 1866—1945）——工会工作者，曾任巴伐利亚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编者注

止的策略是这样的：我们总是不顾一切地前进，这样我们就愈来愈扩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使统治阶级愈来愈仇视我们；我们每增加一分力量，就使有产者愈来愈感到恐惧；冲突愈来愈尖锐了，我们终于面临进行重大决战的时刻，那时我们不得不推翻敌人并夺取他们的政权。这就是我们迄今为止的策略。”^①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就我们的议会活动来考虑，我从来没有觉察到这样一种策略。譬如说，某一个国会党团成员在去年冬天阻碍通过关于关税税率的议案，那么我要非常坚决地否认指导他的思想是，用这一行动“使统治阶级愈来愈仇视我们”。我们采取阻碍议事进程的方法，不仅是企图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是企图保护商业和工业的利益。我们的三百万张选票不是考茨基硬说我们采取的激怒政策和冲突政策的结果，而只不过是下面这一点的承认：我们不顾一切地代表工人的利益，除此之外也代表广大人民阶层的利益。在经济领域中怎样呢？由少数头脑不清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煽动罢工来使工人的头脑革命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是为争取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斗争，不是为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使厂主和店主仇恨我们而斗争；在一场斗争开始之前，我们十分冷静、清醒地估计这场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是的，要是我们能够同我们的厂主缔结若干年的有利的工资合同，我们甚至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一来我们就赢得了扩大我们的组织的时间。

一位不象考茨基那样博学的同志把他的思路阐述得简要得多，他说：“我们必须目标明确地为促进灾变而工作。”我们的激进的同志在这一点上奇特地同反动的激烈派唱一个调子。《汉堡消息报》、《邮报》以及其他的极端反动的报刊也是目标明确地希望促使灾变到来。发动政变，破坏宪法，剥夺选举权——他们每天给政府开这样的药方，好促使灾变到来。无论怎

^① 见本书第590页。——编者注

样竭力劝告工人要最坚决地提防来自右边的以及来自左边的灾变政治家，都是不会过分的。要是我们想立刻非常轻率地投入斗争，将会发生什么呢？三百万张选票当然是很值得尊重的数字！但是经济发展是否真的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可以根据我们的伟大先驱马克思的学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即将来临？首先，我们的经济组织是否已经很强大，足以进行社会的改组了？倍倍尔是这样认为的。他责备我们不了解人民的心灵。如果这仅仅取决于感情，那当然他是正确的。倍倍尔在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一次演说，就可以使群众激动起来和处于陶醉状态。但是我们年复一年在工会和合作社中从事细小的工作，我们更了解群众，我们知道，还必须进行巨大的教育工作，才能使群众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组织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想宣称，我们在经济上的权力地位已很强大，足以促使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那就简直是狂妄了。

我们这些工会工作者和合作社工作者真的不想迎合现存制度。相反，我们不断地为改造现存制度而工作。进化论者、修正主义者比所谓激进派更加受到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憎恨；我只提出自由思想人民党人在总联合会中反对消费合作社的行为和消费合作社所受到的反犹太主义迫害！我们党内的激进派小资产者又怎样呢？他们在经济领域中同小店主比同我们更加接近。他们也把消费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看作是违背他们利益的机构，因此对赞成合作社的每一个同志都表示怀疑。他们只知道一个口号：政权，而完全忘记，如果政权缺少经济方面的基础，一个突然获得的政治上的权力地位是完全不能持久的。

如果实事求是和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的话，关于修正主义者的辩论本来可能起澄清思想的作用。可惜只有很少的发言者是这样做的，我觉得更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几个人的长篇发言使大多数同志无法发言。在德累斯顿对于主要问题实际上根本

没有作出决定，用通过的决议杀死的是一个幻影。要说有组织的工人会下定决心为促进即将到来的灾变而目标明确地进行工作，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决议本身在这一点上是机会主义的，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由于主要提案人给自己的作品打上了他的激怒政策和冲突政策的印记，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投票反对这个决议。我在将来也要维护到目前为止我所代表的对于工人运动中的这些问题的观点。我仍旧认为能够最快地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训练、培养和教育工人实行民主自治！

但是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可说是一点也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在一部分代表被迫不得不离开之后，虽然最后也还有几小时用于研究实际工作，但这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损害了无产阶级事业；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不是很快就要举行国会选举。

让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摆脱文人们的争吵和理论上的吹毛求疵吧！这应该是我们为今后提出的口号。群众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把我们攻击的矛头指向敌人，指向反动派，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等待时机在斗争中利用我们的弱点反对我们，只有当我们能够用无产者群众的密集方阵来同他们相对抗时，我们才能够战胜他们。

发表于1903年10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3年第10期第729—735页。

爱·伯恩施坦

一八七八年和一九〇三年（摘录）

（1903年10月）

.....

一九〇三年

1903年9月13日党在德累斯顿特里阿农大厅举行的代表大会开幕典礼是一次出色的检阅。从外表看一切就已经同反社会党人法以前时期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样子多么不同！代表人数众多，地方委员会给代表们赠送了富丽堂皇的礼品，报告装订成册，代表大会收到的一切提案都迅速印出来，所有国家的各大报刊派记者出席代表大会的讨论，来自各居民阶层的听众拥向会场——这一切在二十五年前或者是完全没有的，或者是仅仅有一个极其微弱的开端。代表们的职业性质也是这样。帝国议会和邦议会的议员、市镇议员、工会和消费合作社的职员、疾病保险储金会理事、工商业仲裁法庭陪审员和保险机关的委员、印刷厂经理和编辑——二十五年前，谁会在一次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找到这样五花八门的工人代表！这一点以及这些代表的人数之多生动地说明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

如果撇开党代表大会上的辩论不谈，那么表决时的意见一致也给人以极强烈的印象。几乎所有的决议都是以压倒多数对微不足道的少数通过的。谁看了表决的数字，也许会认为，代表大会上根本不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资产阶级报刊，尤其是反动政党的机关报，也毫不犹豫地关于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决议和关于所谓修正主义的决议通过之前激烈的意见交锋说成是一幕策划好的喜剧，是领袖们为了保持群众的情绪而演出的

一场虚假的战斗。

实际上，用虚假这个词来说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倒是适合的。如果说党代表大会两次主要表决的一致性只是虚假的，那无非是泄露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在两次表决时都是在一种由外部情况造成的不正常情绪的压力下通过了决议，压倒的多数可惜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说可惜，因为正如我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已经指出的那样：非常法的纪念日就要到了，正是这一情况本来应当阻止党代表大会通过带有情绪的决议来决定重大问题。我们凭无数的经验已经认识到，带有情绪的决议几乎总是荒谬的决议，除了感情生活范围的考虑之外，这一认识首先必定会阻止这样做。

少数人拒绝赞成有关的决议，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想在这里就这些决议谈几点意见：

说到关于社会党人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决议，只要对此作出某一种保证，始终只是按照党的执行委员会，或者说准确一些，按照它的成员普凡库赫^①所提出的论据来应用这个决议，我本来是可以表示赞成的。但是没有这样的保证。论据会被人忘记，相反，条文却总是存在的，它的伸缩性很大，为无谓的吹毛求疵大开方便之门。在情绪受到争论等等毒害的地方，人们往往懂得把最无害的言论解释得符合决议条文所规定的禁止撰稿的标准。小心谨慎、老老实实的作家将受到束缚，他们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却对任何人没有好处，而不那么懂得分寸的人可说是我行我素，毫无顾忌，至于他们是否有朝一日会由于给并非完全无可非议的报刊撰稿而受到谴责，他们对此是听天由命的。在任何时候这一类规定对于轻率的人表现为蜘蛛网，与之相反，对于有骨气的人则表现为铜墙铁壁，而且确实看起来有

^① 威廉·普凡库赫（Wilhelm Pfannkuch 1841—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94—1923年任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编者注

这样一个人，他首先被控告违背党代表大会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我指的是布鲁诺·博尔夏特博士同志，他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同志，他的正义感不容许他等待别人去破坏决议，他极为愤怒地写信给党代表大会说，他认为决议是对自由发表意见的侵犯，他偏要在哈尔登^①的《未来》杂志上发表文章，作为对决议的抗议。既然博尔夏特说出了这个意图，那么党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或者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惩罚一个人，这个人的忠诚是谁也不怀疑的，或者不得不对于违反刚刚通过的决议的行为听之任之。二者同样是危险的，但是，一切适合于个别情况的立法只要实行起来就会碰到的命运就是：事与愿违。

我必须承认，我很少遇到象表决这个关于报刊问题的宣言时那样不愉快的处境。我认为，党的执行委员会想通过这个宣言来划定的界线，同我自己早已为我的写作活动划定的界线相比，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反正是并不更窄些。单凭这一点我就不能投反对票。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我对于宣言的实际效果感到担心，我也确信根本没有普遍感到需要发表一个有权威的总的声明，因此我也不能投赞成票。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很好地用自己的报刊武装起来同敌对的报刊相抗衡，它自己的报刊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得到广泛的传播；那么，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恰恰现在要给自己的靠写作为生的拥护者规定他们谋生活动的界限呢？早先，当它的斗争困难得多的时候，它并不曾规定这些界限啊！

这样的考虑本来肯定最终会起决定作用的，但是没有。这是因为，促使党的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报刊问题的宣言的那一特殊情况是同修正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一个修正主义者首先公开建议，不要因为国会正副议长按照惯例必须对德皇履行纯粹形式上的礼仪就放弃副议长的职位，这一情况又使

^① 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 (Maximilian Harden 1861—1927) ——德国政论家和作家。1892年创办《未来》周刊。是俾斯麦的赞扬者。——编者注

修正主义问题获得了新的外貌。由于夸大了这些义务的实质及其影响,就大大加剧了为反对这个建议而掀起的风波^①。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旧是可以比较平心静气地,更多地从纯粹策略方面的考虑来处理的。不过所涉及的君主本人在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们中间引起的感情使得至少在目前简直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这种感情现在已有一部分转而针对修正主义了。这种感情在许多地方对于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发生影响,对于党代表大会任务的讨论发生影响,在党代表大会上广大代表也还充满了这种感情。甚至是被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关于修正主义的演说中称作沼泽派的那些人,也就是说,通常喜欢避免采取极端立场而主张中间路线的那些人,也不能摆脱这种感情的影响。有些人在政治实践中的态度就是被人们指责为修正主义的那种态度,但是甚至这些人也被卷进了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或者认为应当向这种潮流让步。

当然,各人对于修正主义这个概念的设想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在许多人看来,这个概念是同大学生或社会主义文人的概念一致的,尽管实际上党内很多文人和大学生,同党内真正的资产者一样,由于从心理上很容易解释的理由站在党的所谓激进派一边。但是,修正主义者(我姑且采用这个说法)中间的大学生和文人在理论辩论中自然而然地会站在前列,于是修正主义运动看起来象是这些人的运动,实际上它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却是工人的运动,只不过这一批工人实行的是修正主义,却并没有因此也发表修正主义的言论。奥艾尔的引起很大愤慨的“人们不这样说,但这样做!”这句名言被无数人实行了,而这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通常不去深入思索他们的政治言论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不一致。政治口号总是比它所表示的事物存在得更久。当在慕尼黑党代表大会上讨论1903年的代

^① 例如,国会议长的有名的舞鞋就属于无稽之谈。——伯恩施坦注

表大会的会址时，一位主张在莱比锡开会的激进的莱比锡代表说，切不要由于考虑到警察的刁难就不选择莱比锡，警察的情况早已不再那么糟糕了。但是，这位代表很可能同考茨基一起深信不疑地宣称，我关于反动在德国不是最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的论点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修正主义。

深信不疑，而且从某种观点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社会民主党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党有责任首先强调现实状况的阴暗面并同它作斗争。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我们队伍中有人出来说：“孩子们，并不是全都漆黑一团”，进攻的力量就会遭到削弱。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传统的论证。^①但是，一个大党要掌握一种新的论证，是需要时间的，而在这期间，还没有找到方向的人更易于受到刺激。所有过渡阶段都包含着病态现象，我认为，必须把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的反修正主义看成是这样的

① 作为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反动的一个证据，重新提出了英国贵族院关于工会的民法责任的判决。姑且不说反动的判决还不是全面反动的必要标志，在这一场合也根本谈不到一项反动判决。一批社会主义的和对工会友好的法学家受英国工会活动家的委托对判决进行鉴定，他们在对这一案件作了详尽检查后确信，这个判决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这就是说，并没有破坏现行法律，而是给工会的发展造成了旧的工会法无法满足的前提，它使得制定新的法律成为必要。不久前在莱斯特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表明，英国工人对英国法庭的信赖很少发生动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著名的社会主义工会领袖本·提利特在说明一项关于强制的仲裁法庭的提案的理由时，对于英国法官的公正给予最高的赞扬。

顺便在这里纠正一下《前进报》的伦敦通讯员不久前所犯的一个错误。他从英国1901年的征税登记簿所显示的所得税缴纳者少于1891年的征税登记簿这一情况作出结论说，在这一期间资本家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实际上在这一期间，即1894年，实行了一次赋税改革，根据这次改革，免税扩大到收入在160镑（3200马克）以下的人，从而使1891年的一整个纳税人等级在1901年不再是纳税人，并且在征税登记簿上消失了。

《前进报》通讯员后来自己又强调说，在上述十年中英国的就业人口减少了，与此相反，失业者相当显著地增加了（从41.5%增加到43.4%），这一情况本来应该告诉他，所得税缴纳者的人数减少不可能是资本家人数减少的结果，但是，关于凶恶的修正主义者的想法大概也使这位往常相当实事求是地报道的通讯员的眼光模糊了。——伯恩斯坦注

过渡现象，看成是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明天就可能随着引起它的建议一同被人忘记。

当奥艾尔们、福尔马尔们、科尔布们、彼乌斯们、埃德蒙德·费舍^①们、觉勒们以及其他投票赞成倍倍尔—考茨基—辛格的反修正主义决议案时，他们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大动肝火的时刻首先需要使感情平静下来，而广大同志过去和现在最为关心的是能够得到保证，不会把任何一种不是从各个具体情况下事物的本性自然产生出来的策略，也就是说，一方面不是从党本身及其代表的群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是从敌对政党的政治状况、态度和本质所产生出来的策略强加给党。这就是那个决议所得到的广泛支持的真正意义。谁想根据决议的条文、从几乎一致通过决议这一点推论出更多的东西，很快就会被事实纠正过来。为了论证这个决议的条文，考茨基不得不抓住本文作者多年以前发表的、现在一半已经被人忘记的著作和文章，而在我的新的言论中只有关于国会副议长的建议能够被引用来证明决议的所谓必要性，由此可见，决议的条文的意义在这种场合是多么微不足道。

为了使人一看就明白这个论据不适合，我当着到会的战士们面向倍倍尔提出了一个 *poser*（难题）——英国人对这类问题是这样称呼的——，如果副议长的职位在他看来也对党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可以预防突然袭击，那么他是否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由于进宫朝见这件事而放弃这一职位。倍倍尔凭他所特有的急智立即觉察到，他可能陷入圈套，于是他开了一个玩笑来逃避作出回答的必要性。因为无论他回答是或者否，他都要被我抓住。如果他回答是，他就会受到非难，说他把纯粹的形式问题置于党的切身利益之上。但是，如果他回答否，他就是承认，这整个问题是一个是否有利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这一

^① 埃德蒙德·费舍（Edmund Fischer 1864—1925）——国会议员，曾任《萨克森工人报》编辑。——编者注

来就表明由于我的建议而产生的一场愤怒的风暴是莫大的误会。然而在含糊其词的回答中也已经承认，对于这一问题不能从感情出发作出决定性的回答。

但是在我看来，这一来也就是对决议的第一段作出了判决，但是只有这一段人们才至少可以说，有直接的理由对于其中所讨论的问题表明态度。与此相反，并没有提到新的言论或行动来说明必须对决议中提出的其他问题表明态度。不存在不可避免的理由去讨论这些言论和行动。有必要使人安心，但这也可能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而且在我看来肯定是更好的方式，而不必通过一个决议。关于这个决议，我至少必须对自己说，它绝大部分是不必要的，其余部分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是同党的实际活动相违背的，归根到底也是很不高明的。

我不再详细地证明这些。至于说到最后一点，我但愿事情的发展会证明我说错了。我让时间这位伟大的修正主义者去证明决议是无法实现的。我深信，决议的倡议人只要是实践家，他们很快就会自己用行动来修改决议。如果党想继续充当工人利益的捍卫者，它就不能放弃我们的改良工作，而我们的一大部分改良工作就在于迎合现存制度，决议的第二段却极其坚决地谴责了这一点。要是真正遵守这一条，那就意味着党回到它的一些创始人在运动幼年时期所代表的立场，那时由于缺乏行动的力量，使用这类豪言壮语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些词句甚至在当时就无法保持。如果我们在市镇、邦和帝国中的代表不得不按照这个处方来进行他们的活动，他们该怎么办？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会立即认识到那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更用不着说从事工会运动的同志，如果按照这个处方，他们作为好的社会主义者除了同工资协定、均等的劳动介绍以及由于新发展而得到的其他成就作斗争外就再也没有更为迫切的事可做了。人们怎么能说赞成一系列改良（这些改良是同增加官吏、有时同增加邦和帝国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却不致至少暂时地违背决议第四段的第一小

节，^①这也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如果按照字面上理解这一段的开头一条，那么它使我们有义务烧掉我们的全部竞选传单，在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即使不是有意识地促使镇压措施获得胜利，也要希望它获得胜利，并且在任何改良、在政府和企业主对工人阶级的任何让步面前都要发抖，但是实际上任何人都不打算这样做。

够了。我不愿意继续详细谈论这件事，因为对于同志们的一次盛大集会通过的决议进行反复批评并不是一件崇高的工作。但是，为了至少说明我无法赞成决议的几点理由，上面这些话是非说不可的。对于那些为不顾种种反对意见而通过决议一事进行辩护的理由，我并没有置之不理。但是我也必须对自己说，没有一件事能够使人人满意。只从事实工作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对于热中于理论的人来说是不容许的——科学不容许任何妥协。我觉得，对党代表大会应有的尊敬要求我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坦率地表达出来。我感到高兴的是能够附带说，两位布勒斯劳的代表怀着类似的心情告诉我，即使我自己出于某种理由要投票赞成决议，他们，即授予国会委托书的那些党员的代表，仍旧要投反对票。最后，尽管听起来多么狂妄自大，我还是不得不说，我在投反对票时相信，这是为党效劳。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所见到的是激烈的争论而不是愉快的胜利欢呼，各方面都对此感到惋惜。事实上以往常常由于失败或者由于胜利者互相争夺战利品或荣誉而发生争吵，但是，在取得最辉煌的胜利后的第二天，在胜利者阵营中对于是谁把胜利的军队引上歧途这一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它表明神经受到极度的刺激。然而，比争吵本身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情况：争吵引出了使党违背自己的最好传统的决议。自从颁布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令以来已经

^① 参见本书第607页。——编者注

二十五年了，党曾竭尽全力反对这一法令，直到战胜这一倾向性法令。在党庆祝自己对于禁止一种倾向的伟大胜利的纪念日的时刻，党却根据一种意见制定了一项决议，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项决议只不过是一项反对被宣布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信仰的法令，虽然这种信念是一批经过考验的战友们的信念，是党自己宣布过无数次的信念。但是决议不应从字面上理解，也不可能从字面上理解。党的实践将为此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在这个证据变得非常显而易见，以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之前，投反对票者的行为可以证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任何信念都不禁止，对任何倾向都不压制，只要它不是确实越出党的纲领中规定的原则和要求的范围。我深信，正是那些对决议投反对票的人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而且将会坚持它的内部本质及其久经考验的、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

发表于1903年10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3年第10期第744—750页。

卡·考茨基 党代表大会的反响

(1903年10月1日)

德累斯顿的讨论和决议的影响开始逐渐表现出来。从实质方面来说，这些影响是完全令人高兴的。它明显地澄清了问题，首先是对国外。

我们决不可忘记，我们首先还是一个进行宣传的党。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实际问题还远不是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争取人民群众的问题。只有在争取群众的工作完成以后，夺取政权才会提上日程。我们目前在改良方面已经做到和能够实现的，同我们在群众鼓动中取得的而且还能进一步取得的成果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在采取每一项实际行动（譬如说议会行动或地方自治机关的行动）时必须不仅要问自己，我们在这样做时会得到什么具体结果，而且首先还要问自己，它对群众会产生什么影响。

最近几年来，广泛流行着一种想法，似乎社会民主党就要修改自己的原则和策略了。一些党员同志的个别言论提供了机会，使资产阶级报刊可以千方百计煽动人们相信这种想法。资产阶级报刊把这种想法带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并且传播到国外。但我们是一个国际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站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哨。它的榜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于是对国外进行澄清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一工作已经做了。尤其在英国和法国，德累斯顿决议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对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要知道那里的人习惯于从自由主义和内阁主义出发，在无产阶级面前把如

此受到崇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说成是一个进行社会改良的纯粹的民主党，似乎它早已把自己的革命纲领束之高阁了！在德累斯顿大会以后要进行这种欺骗或自我欺骗已不可能了。国外的报刊承认了这一点。

但是对国内来说同样有必要进行澄清。资产阶级报刊比党的报刊传得更广，由于这些资产阶级报刊，在那些同党还没有关系的人民阶层中，对于修正主义的力量和意图往往流行着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德累斯顿决议在通过作出决议所能达到的限度内纠正了这种观念。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虽然还企图继续玩弄老的花招，并且预言修正主义在我们中间很快会获得胜利。但是绝大部分已放弃这样做，其余的也不再有很多人相信了。

由此可见，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国外的影响是完全有利的。

从问题的实质方面来说（正如前面所说的），对于国内的影响也是这样。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从德累斯顿大会以来再也没有人为理论修正主义辩护了。伯恩施坦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月刊》上把德累斯顿决议说成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是同党的实际活动相违背的”^①。那么他不妨同《慕尼黑邮报》辩论一下，因为后者对于人们把这样的“一系列陈词滥调”塞给党代表大会表示愤慨；或者同艾尔姆辩论一下，因为他在同一期月刊中说，每一个修正主义者都可以投票赞成决议，他只是“由于主要提案人给自己的作品打上了激怒政策和冲突政策的印记”^②，才没有这样做。

这也是一种观点。

原来我说过，我们迄今的不顾一切地前进的策略必然产生使统治阶级愈来愈仇恨的后果，艾尔姆却把我的这一意见理解

① 见本书第 634 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627 页。——编者注

成一种要求了：凡是看起来适合于激怒统治阶级的一切，都要去做，即使在并不需要的时候也要去做！

他最坚决地反对任何一个党团成员抱着使统治阶级对我们愈来愈仇恨的想法而采取阻碍议事进程的办法。“我们采取阻碍议事进程的方法，不仅是企图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是企图保护商业和工业的利益。”^①

说得很对。但是，难道艾尔姆想否认阻碍议事进程所起的作用_用是使统治阶级对我们愈来愈仇恨吗？难道我们在这样做时发挥出来的力量_{力量}没有使工商业资本家也仇恨我们吗？难道它没有极大地扩大了我们同民族自由党人以及自由思想党人（除了巴尔特周围的少数几个人）之间的矛盾吗？

由此可见，即使在我们连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一同保护的时候，我们的不顾一切地前进的策略也会起激怒统治阶级的作用。何况在我们履行自己特殊的历史使命和代表纯粹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时候呢！

但是在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行动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它的良好愿望。艾尔姆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慕尼黑邮报》也这样说），党内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信仰决议中所描绘的修正主义，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

这是相当轻率的言论。

与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同时，在罗马举行了新成立的劳动会议（Consiglio di lavoro），参加会议的有政府、两院、企业主和工人的代表。在开幕典礼上屠拉梯也发了言，他声明，参加劳动会议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已不再认为国家是敌视他们的力量。他颂扬阶级利益的共同性，并表示相信，企业主利益的代表会认识到，想阻碍工人阶级上升是徒劳的，也是危险的。他们只要求逐渐地实现这一上升过程，并尽可能地保全现有的利益

^① 见本书第625页。——编者注

和财富。他预言，工业巨头们用一切阶级同自然的斗争代替阶级同阶级的斗争的时刻将会到来。

这个发言终于放弃了阶级斗争，并且连带也放弃了取消阶级这个最终目的。会议主席卢扎蒂答复了这个发言。他在1898年当过部长，那时政府下令判处屠拉梯十四年苦役监禁。从那时以来，卢扎蒂没有作过什么修正，但是他在他的答复中却可以满意地指出，他同屠拉梯有许多共同之点，只有很少的分歧。只有对于旧的灾变论的拥护者才无法达成协议，而不是对于象在座者那样的社会主义拥护者，因为他们相信目前的国家机关有解决劳动问题的真诚愿望。

这次讨论对于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讨论来说是一个独特的对立面。讨论是以十分彬彬有礼的方式进行的。没有任何不好的语调。良好语调的崇拜者一定会对这一点感到高兴。尽管如此，在德国很少有党员同志认为这次讨论能鼓舞人心。用艾尔姆和《慕尼黑邮报》的标准来衡量，屠拉梯已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

但是我们不想坐等发展成熟的屠拉梯们在我们德国出现。一旦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那时也就会发生分裂。但是我们的决议应当能防止这种分裂。

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决议没有提出重大的实质性的指责，因此我们不妨认为，这个决议是有利于党的内部团结的，它重新确认了根据我们的纲领所制定的策略。由此可见，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不仅对国外，而且对国内就实质方面来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关于德累斯顿讨论涉及个人的方面就不能说得这样确定了。相反，它触发了一系列个人的争论和解释，这些争论和解释还没有结束，它的最终结局还无法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们已经使相当多的口是心非、不忠诚和内心摇摆不定的现象暴露出来了。

一些人欢迎这种揭露,认为它是起清洁作用的暴风雨,另一些人则指责它是奔腾的洪水,会破坏我们最肥沃的耕地。现在人们既不能决定赞成前一种观点,也不能决定赞成后一种观点。这些事件结果究竟给党带来好处还是带来损害,这取决于党本身。如果党有力量把一切被证明为不纯的分子都清除出去,而毫不考虑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那么,最近几星期所发生的一切令人痛苦的事件的结果将会给党带来好处。如果与此相反,它没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德累斯顿的讨论及其余波当然一定会使我们党名誉扫地,并且最严重地动摇群众对党的信任。

一个只根据事实进行判断、不受流言蜚语的影响、而是铁面无私地履行职责的公正法庭已经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被告必须或者被证明无罪,或者被清除出我们的队伍,在犯了较小过错的情况下则解除其承担的重要职务。必须承担这种任务的法官是不值得羡慕的。这种任务既是困难的,又是令人痛苦的。但它是必要的,应该不让最近几天中挖出来的脏东西继续附在党自己的身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用这样的口号:不要掩饰,不要上演喜剧。

如果能够确定对于被揭发的卑鄙行为的个人责任并且把卑鄙的分子本人清除出去,那么,就涉及个人的方面来说,任何人再也没有理由把德累斯顿的这几天看作是白费的。人们固然可以因为这几天成为不可避免的而感到惋惜,但是人们没有权利希望实际存在的腐化现象不被揭露。有的人在德累斯顿还对于倍倍尔的“好走极端”表示愤慨,在那以后大概已承认他是正确的了。

被轻蔑地称作“文人们的争吵”的,是一场为了党在道德上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对于我们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巨大、更为重要的事吗?我们斗争的所向无敌的力量就在于此,我们对于自己的信念就在于此。没有这种斗争,党就会堕落成一个单纯制造编辑职位和议员委托书的机构。但是

它在道德方面也应当象过去一样仍旧是任何腐化现象和钻营行为的毫不留情的反对者。在这个范围内也是没有什么需要修正的。

有的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会这样重视我们党的道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认道德的力量和意义，我们只否认道德来源于在我们唯一接触到的现象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道德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它本身又成为使社会聚集在一起的最重要的纽带。没有道德就没有社会。每种社会形态、每个社会阶级都有自己特殊的道德，但是无论在哪里道德都不是个人可以随意抛弃的纯粹习俗性的事物，而是必需的事物——不仅从它必然从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意义上说是必需的，而且从它是不可缺少的意义上说是必需的。

现在，当资产阶级的阶级道德完全解体的时候，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不能够达到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无产阶级的道德）在抛开资产阶级道德的同时抛开了一切道德，但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是不许通过这种方式克服资产阶级道德的。

正如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法则一样，也存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不能缺少的道德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真诚地对待同志的义务。对于敌人决不承认这样的义务，与此相反，如果没有这种义务，处于平等地位的同志之间就不会有长久的合作。这个义务对于每一个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来说都是适用的，在一个充满了阶级矛盾的社会中它适用于每一个由阶级同志组成的特殊的政党。到目前为止，欺骗党员同志只有在这样的政党中才看作是可以容许的：在这个政党中有两个阶级进行合作，其中一个阶级是为了利用另一个阶级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而同它联合起来的。

这是耶稣教团的党的道德，整个僧侣阶层的党的道德。只要现代的文人们把自己看作是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一个“贵

族阶级”，并把无产阶级只当作工具，他们往往采用这种道德，这种道德已经连同一些这样的分子一起渗入了我们的队伍。但是社会民主党始终站在无产阶级道德的基础上，这种无产阶级道德是一切努力向上、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阶级的道德。它不容许任何欺骗党的企图，并且鄙视说谎者。

发表于1903年10月1日，译自《新时代》第22年卷（1903—1904）第1册第1期第1—5页。

威·科尔布 理论和策略

(1903年12月)

修正主义没有死亡；它活着并且在前进；就目前情况而言，它绝不可能被消灭。就算是少数非常热心的人的愿望在德累斯顿已经实现，就算是全部以修正主义者知名的同志已经被开除出党，这样一种做法也不会使激进主义得到什么好处。不知名的修正主义者的数目要比知名的多得多，只要一开始用类似的高压手段使社会民主党内的某些派别不能为害，那就很可能不得不相当经常地重复这种做法。就修正主义本身而论，它不是什么与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要求不相容的东西；相反，修正主义者恰恰认为，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会随着他们所代表的派别的胜利而加速，由于始终不渝地遵循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新社会分娩的阵痛会大大减轻和缩短。那么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呢？说到底，修正主义无非是转化成理论的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换句话说，无非是消除这种久经考验的策略同考茨基等人所宣布并维护的崩溃论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矛盾引起冲突的。谁只要稍微了解党的历史，他就懂得，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并不总是一个样子的，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每个具体问题上总是必须克服激进主义和革命词藻的强烈抵抗而使自己获得承认。现在反对担任副议长职位的意见以及因为这件事引起的担心难道不是和过去反对参加议会政治、反对参加议会常务委员会、反对参加各委员会的工作、反对参加邦议会和市镇议会的选举的意见以及由此引起的担心完全一样吗？激进派方面反对承认在担任这一职位时要考虑的仪式，他们提出来的一切意见都是老生常谈。这一纯粹策略问题本身的意义是很不重要的。尽管

如此，它还是引起了如此多的议论，并最终促使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就策略展开争论，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人们把这一纯粹策略问题与原则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为一场争论提供了前提，在争论的过程中，一大批鬼影如蜕化堕落，削弱原则，放弃阶级斗争，投靠资产阶级政党等等就列队出场了。这都是一些老相识，只要讨论任何一个策略问题，它们总是要上场的。

《前进报》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论策略的文章中认为，由于通过了关于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决议，有关策略的争论已暂时告一段落。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党和伴随它的整个工人运动愈壮大，它的任务也愈多。但是，人们怎样评价当前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从什么观点出发来解决这些任务，以便为工人阶级取得相应成就的。谁如果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治权力、完全占有国家政权的时候才能实行社会革命，也就是真正开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他对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可以取得的成就和我们以取得这种成就为目标的全部实际活动的评价自然会和另一种人完全不同，后者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内已经可以为在有机的发展中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奠定基石和基础。考茨基不断告诫我们：只要我们目前的旨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工作开始对资产阶级有危险，资产阶级就要加以阻止。好象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哪个领域都是一样）并不都是对资产阶级有危险的！我们的激进派总是害怕选举权和结社权可能从我们手里被夺走，或者被弄成很钝的武器。他们说，你们别指望这个，选举权结社权总有一天要完蛋的。那怎么办呢？对，怎么办！这恰好是考茨基和他的所有的朋友始终不给我们肯定答复的问题。考茨基说，这种合法的和平的工作总有一天要停止，他就是从这种说法推论出他的崩溃论来的。资产阶级不允许人们从背后夺走它手中的政权，总有一天要摊牌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十分有把握，天晓得他是从哪里知道的，他简单地说，崩溃必然到来。好！我

们姑且承认考茨基是对的。但是，这种有关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观点对于实践、对于我们的策略产生什么结果呢？十分明显，如果一定要发生一场灾难，发生一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最后的决战，那么，我们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就是根本错误的。考茨基在德累斯顿确实说过，我们迄今为止的策略旨在扩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使统治阶级愈来愈反对我们，使冲突尖锐化，从而使我们面临需要进行决战的情况。这场最后的决战的战利品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①人们必须承认，这是对认为崩溃绝对不能避免的理论的一种很精确的解释，但是同时也是对我们迄今的策略的一种解释，我们有一切理由对这种解释提出抗议。我们的策略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我们曾力求使统治阶级深信发展可以在合法的道路上进行，深信我们尤其努力使合法发展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倍倍尔和其他的人在国会和各种集会上就这一点说过了多少次！因为这一信念日益成为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日益放弃了我们以前的完全消极的观点，不断克服那些拒绝西西弗斯^②工作的革命战略家的阻力，在所有的领域逐步接近建设性的实际的改良工作。现在，我们理论家当中的一位跑出来并简单扼要地宣称，社会矛盾有尖锐化的趋势，所以一定会发生冲突，而最后的冲突将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我们不能避免这场最后的决战，我们将在其中制服我们的敌人！

如果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合法的、有机的发展，那么，需要老实说明，我们纲领的第二部分其实只是纲领第一部分的一种装饰品；那就根本不能设想，这一纲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能全部或部分地实现，因为纲领里提出的要求每一条都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必须公开和老实地告诉人们：不要

① 参见本书第590页。——编者注

② 西西弗斯(Sisyphus)——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暴君，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石在近山顶时又滚下，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息，劳而无功。——编者注

期望我们的议会活动会有成效。只有当我们占有全部的国家权力时，真正的改良工作才能开始。革命一定会发生，通向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如果革命一定会发生，那就不应当也不能够继续实行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我们就不得不采纳“青年派”在1890—1891年提出的策略。这样才是合乎逻辑的、公正的和彻底的。

全部占有国家政权是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最后的决战为绝对确实的前提的。但是，怎样进行这场战斗呢？如果人们认为这场斗争是绝对确实的，那就需要肯定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这样一场最后的决定性的冲突不经过流血是根本不可能的。考茨基尽可以上百次地强调指出，迄今意义上的革命是不存在的，因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这样一种革命就一定会发生。固然他认为，今天无产阶级有另外一种武器，即政治罢工。难道考茨基相信资产阶级由于政治罢工就会如此痛快地软下来？如果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全部策略的目标是：使冲突尖锐化，使资产阶级愈来愈仇恨我们，在各地挑起最后的决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阶级还会心平气和地一直看着我们充分准备好最后的决战，那么，这些统治阶级想必是疯了。考茨基在他的著作《社会革命》中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是等于一场持久的不流血的内战。未来的革命斗争将由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组织利用民主的形式进行到底。多么矛盾啊！考茨基起初说资产阶级不可能让无产阶级通过合法的道路达到它的目的并以此来论证肯定要发生崩溃，他预言结社权和选举权要被限制或者取消，然后，他又认为未来的革命斗争要依靠在民主自由基础上产生的组织进行到底。是的，他走得还要更远。他宣布，无产阶级为了能够制服自己的可怕的敌人，必须具备下列的、发展到最高程度的特性：1.高度的才智；2.严格的纪律；3.完备的群众组织和4.群众必须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经济状况必须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哪

怕是群众方面的暂时的罢工也会造成巨大的困难。但是，如果资产阶级在工会一旦威胁到它时就要利用国家权力大大伤害工会，那么天晓得无产阶级应当怎样把这些必要的特性发展到最高程度呢？人们看到，考茨基是在能够想象出来的最大的矛盾中活动。他时常把事情解释成恰好象他论证他的理论时所需要的那样。

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努力把考茨基所要求的全部特性发展到最高程度，这一点已经说清楚了。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利用它掌握的国家权力摧毁这种活动的基础，这种可能性就不再存在了。而考茨基在德累斯顿对我们迄今策略的附会和解释却是间接要求统治阶级摧毁这个基础；因为，如果我们公开声明，在我们和统治阶级决战时，我们要不顾一切地、而且自觉地冲破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阶级的政府对煽动者的恫吓不让步，不取缔我们的组织赖以存在的一切民主自由，那么，这种政府简直是不负责任的和轻率的。人们看到，冯·艾尔姆同志评论事物是多么的准确，他写道：无产阶级有一切理由不仅全力提防来自右面的激烈派，而且全力提防来自左面的激烈派。杀气腾腾的政治家能够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程度几乎还比不上主张崩溃论和灾变论的理论家。考茨基不许无产阶级直接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内的政府，也就是说不许逐步地夺取政权。他的口号是要么全部要么没有！不用说，倍倍尔事后针对冯·艾尔姆同志作了解释，他说，问题根本不涉及到突然夺取政权和随意引起决定性的事件——这里多么小心地把灾变改说成这样！——，没有人主张这点。问题最后归结于，通过我们在所有领域的活动加快发展的速度。倍倍尔一下子看出修正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悲观主义者，后者是乐观主义者。整个争论就是如此吗？德累斯顿的辩论是由此引起的吗？人们要问：难道这就是那个在德累斯顿作了长达四个小时反修正主义演说、为了拯救面临堕落危险的党而激发群众

的无产阶级本能的倍倍尔吗？照这样说，问题在于速度。好吧！但是，为了这一点并不需要把德累斯顿出现的这样的礼物赠给党。社会发展的速度问题与现代工人运动自身的各项原则和目标根本无关。关于速度的观点是否正确，要由成就、而不是由预言来作出判断。但是，成就基本上取决于按照现实状况而制定的策略。这一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到目前为止，灾变论者的预言真的如此灵验，以致他们可以并能够一再重新有充分的理由作出预言吗？我以为，迄今的经验证明完全相反。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的历史是反驳聪明的预言者们的历史，这些预言者似乎总是事先就知道事物是怎样演变的。他们说灾变应当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这一期限早已过去了，这就最好地证明，在发展速度的问题上，这些预言导致了怎样错误的结论。他们说社会革命的日子应当在上个世纪末就到来，然而，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世纪第三个年头的末尾了，当年的预言者们已学会了稍微冷静地、稍微清醒地、似乎也更多地从科学观点出发评价事物。确定的期限被取消了，代替它的是，人们现在是同不确定的期限打交道了。现在是说，我们的胜利近在咫尺，可见还是在不断地作预言。可惜，没完没了的预言丝毫没有加快速度，情况不如说是相反的。经验显然表明，与无产阶级占领新阵地有关的恐惧和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在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中使用的手段是革命的或者不是革命的，这全靠成就来断定。政治罢工始终是革命的手段，还是宁可说它在最近的将来要加以考虑的那些情况下会起反革命的作用，这还是个问题。在这类情况下没有站得住的理由就事先把自己束缚住，这完全没有意义。无产阶级将用哪种方式夺取政权，没有人能预言。如果可以根据迄今的经验作出结论，那么，无产阶级在自己方面不会反对逐步地夺取政权。全部夺取政权只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决战之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将是这场战斗的胜利者。但是，长久保持这种胜利的成果的先决条件恐怕是与之

相应地向前迈进的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只有当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活动的可能性在此以前没有受到阻碍时，这种力量才能获得。但是，如果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着并且保持着的，那就具备了有组织的合法发展的一切先决条件，就不需要发生崩溃和灾变了。

倍倍尔说：不应当突然夺取政权。但是，逐步地夺取政权是遭到禁止的，并且是受到德累斯顿决议诅咒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全部夺取政权要以突然性为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在社会革命之前的一天，国家政权总还是必须由某一个人掌握着。如果考茨基仍然正确的话，那么，无产阶级直到上述的暂时还未确定的期限之前还没有参与行使国家政权，可见政权仍旧由资产阶级占有。但是在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之后，国家政权就为无产阶级占有，假定决战结果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话。如果仔细地加以观察，人们会看到，崩溃论者的论据是怎样地百孔千疮。不是突然夺取政权，却又是全部夺取政权，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缺少某种东西，也就是缺乏逻辑。对考茨基来说，国家政权也象许多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僵化的概念，不是活生生的机体，这种机体象一切有生命的机体一样，是受发展支配的。我们其他的人也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我们认为，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并且通过我们的活动，现存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不停地变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也随着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发生变化；三十年后的国家政权将和今天的不同。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权利毕竟不会不对国家政权的形式发生任何影响。难道会这样吗？其次，我们的议会活动有什么目的呢？正如我们工会的权力的增长将缩小资本的权力并把它挖空一样，我们的政治影响的增长也将把国家政权挤入另一条轨道。激烈派的意志在无产阶级力量面前失败了。如果我们的实践活动应该有实际的成果，也就是说总得有一个目的，那么，这种理论一定是正确的理论。但是，考茨基总是惶惶不安，担心我们的实践活动——

议会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工作可能被我们估计过高。因此，他把社会革命开始的期限推迟到夺取政权之后的次日。现在进行的不是社会革命，这个过程以后才开始。但是，一旦我们有了政权，那么，感谢上帝！就要快马加鞭了。尽管到那时，社会革命也还是完全象社会革命的日子以前一样，是在改良的道路上进行的。考茨基自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但是在社会革命之后的次日才是。大企业的国有化要到那时才开始。我们却相当乐观地相信，国有化在社会革命的日子以前也已经开始了。农业和手工业企业的残余部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将存在下去。那时在极其多种多样形式的合作所有制周围也仍然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即剥削。这也要在社会革命的日子以后才逐步地废除，只不过那时是快速进行的。可见工资支付也还存在，那时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薪金，甚至分红都会受到重视。一切都同社会革命前的一天一样。资本家逐渐被剥夺，资本主义将——注意：在社会革命后的次日才开始——由内向外被挖空。已得到赔偿金的生产资料占有者要缴纳如此高的税，以致于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去劳动——这是说，假定他们不想溜走，并且在一个社会革命尚未开始的国家里挥霍他们的金钱的话。因为，从人们根据当前的状况得出的一切结论看来，各个国家的社会革命开始之日不会是同一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对考茨基的崩溃论是很致命的。然而，我们并不打算一一列举社会革命后的次日将开始实行的改革。考茨基自己的确在他论述这一题目的演讲的导言中对我们说明，他把社会革命理解为一个或者长一些或者短一些的持续的历史过程。但是，社会革命的开始却是在一个不能精确规定的日子，也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那一天。这是要点。象考茨基所主张的这种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整个见解，是向乌托邦的倒退。考茨基希望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后的次日才开始做的事，只要环境允许，它今天已经做了。在这一基础上并依靠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的帮助，它

将继续建设和工作，它这样做是责无旁贷的，而且是怀着虔诚的热忱的。这一实际活动没有使我们的革命干劲减弱，而是锻炼了它，现在活着的无产者决不愿意为了社会革命的日子以后活着的无产者而放弃这一实际活动。无产阶级意识到，通过自己的指向伟大的最终目的的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它是在为社会主义社会准备和创造基础，只有这一意识才赋予无产者真正的热情；这不是我们看到在漂亮的演说之后迸发出来的那种一时的激情，而是那种鼓舞我们以愈来愈大的规模发挥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干劲的深深扎根的热情。在这方面责备修正主义，正象在随便哪一件事情上责备它一样，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热情只能扎根在这种信念中：如果我们希望尽早获得胜利，我们必须作巨大的努力。恐怕只有极少数工人会热中于崩溃，但是热中于为未来社会建设基础的工作的恐怕很多。在这方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依靠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的帮助，通过把它彻底运用到一切领域，比起把我们的策略指向挑起冲突和煽动仇恨并且最后指向一场一定会使无产阶级吃亏的决战来，会较快地到达目的。

我们的迄今久经考验的策略是转化为实践的进化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根据我们迄今的策略在理论上作出结论，或者我们根据崩溃论为未来的策略作出结论。理论和策略之间的矛盾不能长期存在，因为它一再导致内部的冲突。

发表于1903年12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3年第12期第902—909页。

人名索引

A

- 阿德勒, 维克多 (Adler, Victor)。
——第4、63、71—73、78、101、103、
104、107、258、420、431、445、520、
545、546页。
-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Axelrod, Pawel Borissowitsch)。
——第107页。
- 阿隆斯, 列奥 (Arons, Leo) 。——第
343页。
- 埃尔哈特, 弗兰茨 (Ehrhart, Franz)。
——第562页。
- 埃德尔海姆, 约翰 (Edelheim, John)。
——第515、516、540页。
- 埃克尔曼, 约翰·彼得 (Eckermann,
Johann Peter) 。——第220页。
- 埃斯科巴, 安东尼奥 (Eskobar, An-
tonio) 。——第340页。
- 艾尔姆, 阿道夫·冯 (Elm, Adolf von)。
——第303、492、618、637、638、
647页。
- 艾威林, 爱德华 (Aveling, Eduard)。
——第4页。
- 爱德 (Ede), 即爱德华·伯恩斯坦。
- 安特里克, 奥托 (Antrick, Otto) 。
——第567页。
- 奥艾尔, 伊格纳茨 (Auer, Ignaz) 。
——第15、19、32、63、74、168、
227、264、265、272、273、275、
278、306、324、327、335、337、338、
410、415、437、443、464、469、470、
498、499、511、546、563、566、582、
586、590、594、595、597、600、621、
623、630页。
- 奥本海姆, 弗兰茨 (Oppenheimer,
Franz) 。——第122、136、154、

185、187、248、280、515、516页。

B

- 巴恩斯, 乔治 (Barnes, George) 。——
第168页。
- 巴尔特 (Barth) 。——第638页。
- 巴克斯,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 (Bax,
Ernst Belfort) 。——第6、309页。
-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Bakunin Michail Alexandro-
witsch) 。——第490、614页。
- 巴塞尔蒙 (Bassermann) 。——第223
页。
-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
ric) 。——第89、91、333页。
- 巴特比, 昂塞尔姆·波利卡尔普 (Batbie,
Anselm Polycarpe) 。——第96页。
- 白尔尼, 路德维希 (Börne, Ludwig)。
——第36页。
- 白拉克, 威廉 (Blacke, Wilhelm) 。
——第588页。
- 班贝尔格尔, 路德维希 (Bamberger,
Ludwig) 。——第247页。
- 鲍德尔特 (Baudert) 。——第447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第3、8、19、30、31、38、45、
56、59、63、72、76、81、83、101、
104、108、113、163—170、209、210、
213、230、231、235、237、238、
241—244、247、249—251、255、256、
259—261、264、267—271、276、277、
281、284、289—294、296—299、301、
306—308、315、325、331、334、
337—340、345、346、384、395—398、
400、413、414、416、420、423、425、
428、435—438、452、455、457、458、
466、472—474、476、483、486、

- 494, 505, 508—510, 520, 521, 528, 539, 542—546, 548, 570—572, 574, 576, 577, 582—584, 587—589, 591, 592, 598, 599, 623, 630页。
- 彼乌斯, 威廉·亨利希 (Peus, Wilhelm Heinrich)。——第16, 21, 308, 632页。
-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第52, 171, 388, 555页。
- 毕洛夫, 伯恩哈特 (Bulow, Bernhard)。——第444, 614页。
- 毕歇尔, 卡尔 (Bucher, Karl)。——第191, 192, 215页。
- 卜尼格先, 鲁道夫·冯 (Bennigsen, Rudolf von)。——第247页。
- 别涅斯托费尔, 恩格耳伯特 (Pernstorfer, Engelbert)。——第541页。
- 波勒 (Pohle)。——第215页。
- 波罗戈波维契 (Prokopowitsch)。——第136页。
- 波扎多夫斯基-魏纳, 阿尔图伯爵 (Posadowsky-Wehner Arthur Graf von)。——第10页。
- 伯恩哈特, 格奥尔格 (Bernhard, Georg)。——第558, 566页。
- 伯恩施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 伯尔莱普施, 冯 (Berlepsch, von)。——第450页。
- 伯利欣根, 葛兹·冯 (Berlichingen, Götz von)。——第223页。
- 伯特, 托马斯 (Burt, Thomas)。——第598, 603页。
- 博尔夏特, 布鲁诺 (Borchardt, Bruno)。——第629页。
- 博尔夏特, 尤利安 (Borchardt, Julian)。——第516页。
- 博利约 (Beaulieu)。——第200页。
- J·博纳 (Bonar)。——第326页。
- 博尼埃, 沙尔 (Bonnier, Charles)。——第163页。
- 布赫, 列奥·冯 (Buch, Leo von)。——第136页。
- 布克尔, 亨利·托马斯 (Buckle, Henry Thomas)。——第285页。
- 布兰德, 休伯特 (Bland, Hubert)。——第66页。
- 布劳恩, 阿道夫 (Braun, Adolf)。——第76页。
- 布劳恩, 亨利希 (Braun, Heinrich)。——第474, 546, 558, 614页。
- 布鲁恩斯, 尤利乌斯 (Bruhns, Julius)。——第168页。
- 布鲁诺, 乔尔丹诺 (Bruno, Giordano)。——第448页。
- 布伦坦诺, 路约 (Brentano, Lujo)。——第122, 137, 184, 209, 255, 444页。
- 布罗德赫斯特, 亨利 (Broadhurst, Henry)。——第598, 603页。
- 布洛赫, 约瑟夫 (Bloch, Joseph)。——第499, 502, 511, 516页。

C

- 蔡特金, 克拉拉 (Zetkin, Klara)。——第19, 22, 25, 30—33, 50, 164, 257, 268, 325页。
- 查理大帝 (Karl der Grosse)。——第210页。
- 楚拜尔, 弗里茨 (Zubeil, Fritz)。——第498, 499, 511, 589页。

D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第185, 372页。
- 大卫, 爱德华 (David, Eduard)。——第56, 213, 230, 251—254, 257, 261—263, 278, 288, 304, 313, 433, 438—441, 449, 471, 492, 508, 513—516, 523, 526, 533, 586, 613页。
- 戴维斯, 伍·吉· (Davis, W.J.)。——第168页。
- 德尔布吕克, 汉斯 (Delbrück, Hans)。——第184页。
- 德雷斯巴赫 (Dreesbach)。——第586页。

狄茨, 约翰·亨利希·威廉 (Dietz, Johann Heinrich Wilhelm)。——第81、83、413、539、541—545页。
狄慈根, 欧根 (Dietzgen, Eugen)。——第542页。
狄慈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ph)。——第542页。
蒂勒尔 (Thiele)。——第43页。
蒂姆, 约翰奈斯 (Timm, Johannes)。——第554、623页。
杜林, 欧根·卡尔 (Dühring, Eugen Karl)。——第60、64、462页。
敦克尔, 弗兰茨·古斯塔夫 (Duncker, Franz Gustav)。——第146页。

E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第3、5、7、18、35、39、40、46、60、65、87、90、92、95、103、104、106、116、131、148、150、151、153、159、169、182、184—186、206—209、217、224、244、253—255、267、269、270、275、297、306、322、330、333、340、356、362、370、376、379、386、391、394、395、398、401、402、408、416、421、423、438、444、452、462、484、487、524、539—541、588页。

F

费舍 (Fischer)。——第264、435页。
费舍, 埃德蒙德 (Fischer, Edmund)。——第632页。
费舍, 理查 (Fischer, Richard)。——第430、460、461页。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第7页。
芬德里希 (Fendrich)。——第36、37、255页。
弗兰克, 恩斯特 (Francke, Ernst)。——第212页。
弗里德伯格, 海尔曼 (Friedeberg, Hermann)。——第581页。

佛罗梅, 卡尔·埃贡 (Frohme, Karl Egon)。——第259、261、309、555页。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亨利希 (Vollmar, Georg Heinrich)。——第19、28、31、33、35、37、55—57、62、65、138、171、265、272、276、320、394—398、400、415、437、443、468—470、514、517、522、525、543—546、559、561—566、570、586、587、590、595、600、605、615页。

G

歌德, 约翰·沃尔夫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第220、425、519页。
盖布, 奥古斯特 (Geib, August)。——第588页。
盖得, 茹尔 (Guesde, Jules)。——第163、540页。
盖尔, 弗洛里安 (Geher, Florian)。——第223页。
盖斯迈尔, 米哈埃尔 (Gaismeier Michael)。——第223页。
格尔哈特, 阿德勒 (Gerhard, Adele)。——第343页。
格拉赫, 冯 (Gerlach, von)。——第426、450、553页。
格腊德纳乌厄尔, 格奥尔格 (Gradnauer, Georg)。——第33、43、426、428、440、452、546页。
格雷利希, 海尔曼 (Greulich, Hermann)。——第90页。
格里施, 卡尔·阿尔文 (Gerisch, Karl Alwin)。——第497页。
格龙瓦尔德, 麦克斯 (Grunwald, Max)。——第384、427、435、437、441、502页。
龚普洛维奇, 拉迪斯劳斯 (Gumplovicz, Ladislaus)。——第151、156、158、159页。
果森 (Gossen)。——第88—89页。

H

哈尔登, 马克西米利安 (Harden, Maxi-

millian)。——第629页。
 哈勒 (Haller)。——第562页。
 哈赛尔曼, 威廉 (Hasselmann, Wilhelm)。——第65、588页。
 哈森克莱维尔, 威廉 (Hasenclever, Wilhelm)。——第309、588页。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 (Hyndman, Henry Mayers)。——第4、602页。
 海涅, 沃尔弗于格 (Heine, Wolfgang)。——第3、17、20、22—27、30—32、36、43、52、56、63、86、138、244、261、264、273、276、395、413、417、423、426、435、440、442、445、450、455、472、474、476、499、506、522、545、546、557、565、586、593、600、603、615页。
 海斯, 克雷门 (Heiss, Glemens)。——第205、206页。
 海因茨 (Heintze)。——第582页。
 赫克纳, 亨利希 (Herkner, Heinrich)。——第107、136、205、553页。
 赫希伯格, 卡尔 (Höchberg, Karl)。——第60、64、65、75页。
 赫兹 (Hertz)。——第341页。
 黑尔 (Hehl)。——第223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第149、186、243、340页。
 霍弗尔 (Hofer)。——第283页。
 霍夫曼, 阿道夫 (Hoffmann, Adolf)。——第424、497、499、502、509、511、533页。

J

觉勒, 保尔 (Göhre, Paul)。——第558、585、632页。
 杰维尔, 加布里埃尔 (Deville, Gabriel)。——第493页。
 居鲁士 (Kyros)。——第488页。

K

卡尔多尔夫, 冯 (Kardorff, von)。——第23页。

卡尔韦尔, 理查 (Calwer, Richard)。——第446页。
 卡提利纳, 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 (Catilina, Lucius Sergius)。——第342页。
 卡托 (Cato)。——第37页。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第7、103、321、333、349、350、368、382页。
 康普夫麦尔, 保尔 (Kampffmeyer, Paul)。——第144、153、156、313、317页。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第3、4、7、8、43、44、50、51、57、58、71、76、86、99、100、103、107、113、163、165—167、169—171、183、195、198—200、207、208、213、233、238、239、244、245、250、260、261、270、288、293、305、307、321、322、325、326、334—337、340—347、349、351—353、355、370、384、395、402、414、424、425、430、433、434、437、438、440、449、468、469、484、488、492—494、500—502、504、505、507—510、512、518—527、529、533、534、539、542—549、570—573、575、576、579—581、599、601—604、608、615页。
 考茨基, 路易莎 (Kautsky, Luise)。——第82、109、413页。
 科尔布, 威廉 (Kolb, Wilhelm)。——第578、586、593、610、643页。
 克里切夫斯基, 波里斯 (Kritschewsky, Boris)。——第315页。
 克虏伯, 弗里德里希·阿尔弗勒德 (Krupp, Friedrich Alfred)。——第266页。
 克吕格尔 (Crüger)。——第447页。
 克尼格, 阿道夫·冯 (Knigge, Adolf von)。——第221页。
 克瓦尔克, 麦克斯 (Quarck, Max)。——第56、556页。
 孔策 (Kunze)。——第262页。

库尔蒂, 特奥多尔 (Curti, Theodor).
——第65页。

库诺, 亨利希·威廉·卡尔 (Cunow,
Heinrich Wilhelm Karl)。——第
108页。

L

拉布里奥拉, 安东尼奥 (Labriola, An-
tonio)。——第368、382、422页。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第540页。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第36、136、181、207、210、217、
222、223、248、297、311、312、319、
439、524、540页。

莱恩德克尔 (Leyendecker)。——第
511页。

莱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第91、
551页。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第103—104、
136、350页。

劳麦, 弗里德里希 (Raumer, Fridrich).
——第331页。

勒克律, 让·雅克·埃利塞 (Reclus,
Jean-Jacques Elisée)。——第304页。

勒卢阿-博利约, 保尔 (Leroy-Beaulieu
Paul)。——第89页。

勒威烈, 乌尔本·让·约瑟夫 (Leverrier,
Urbain Jean Joseph)。——第372页。

勒文施坦, 加布里尔 (Löwenstein,
Gabriel)。——第562页。

累德堡, 格奥尔格 (Ledebour, Georg).
——第64、73、74、76、102、106、
233、261、274、343、429、476、481、
510、526页。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第59页。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bknecht, Karl).
——第503、507、513页。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
helm)。——第50、61、73、76、93、

94、98、164、168、231、232、242、
245、264、266、268、270、290、297、
301、396、400、452、508、510、527、
553、581、588、589页。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第378、380页。

李希特尔, 欧根 (Richter, Eugen).
——第3、224、249、580页。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第350页。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
——第10、26、28、29、31、33、35、
37、44、53、54、76、114、122、
233、236、239、240、251、259、276、
354、385、414、415、449、474、
504、510、514、523页。

卢扎蒂 (Luzzatti)。——第639页。

罗尔瓦根 (Rollwagen)。——第504、
511、530、535页。

罗杰斯, 詹姆斯·爱得文·撒罗耳德 (Ro-
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第81页。

罗斯 (Rose)。——第3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翰·卡尔 (Rod-
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第206页。

洛伦兹 (Lorenz)。——第527页。

洛施 (Losch)。——第198页。

洛伊特尔特 (Leutert)。——第446页。

吕特根瑞 (Lutgenau)。——第31页。

M

马克思-艾威林, 爱琳娜 (Marx - Ave-
ling, Eleanor)。——第4页。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第7、28、30、35、40、47、51、60、
65—67、72、87、90—92、95、103、
116、131、135、137、139—141、
149—151、153、169、182—187、190、
195、200、206—209、213、217、
218、223、224、235、236、240、
243—245、252—255、260、267、269、
297、302、322、323、328、331、333、

339、346、349、366、372、376、377、
379、380、394、395、398、401、402、416、
421、423、425、430、433、437—439、
444、445、452、484、490、524、539、
541、566、567、581、588、597、598、
602、614、625页。
马萨利克，托马斯·加里格 (Masaryk
Thomas Garrigue)。——第102页。
迈，纳普哈埃尔 (May, Naphael)。
——第280页。
迈尔，鲁道夫·赫尔曼 (Meyer, Rudolf
Hermann)。——第555页。
迈伊，卡尔 (May, Karl)。——第
195页。
麦斯特 (Meister)。——第562页。
毛伦布勒歇尔 (Maurenbrecher)。——
第426页。
梅尔利诺，萨韦里奥 (Merlino, Saver-
lio)。——第80、318页。
梅利纳，茹尔 (Meline, Jules)。——第
314页。
梅林，弗兰茨 (Mehring, Franz)。
——第5、76、79、102、106、107、
245、429、435、449、539、543、
609、614、620页。
梅斯特 (Meist)。——第534页。
门格尔，安东 (Menger, Anton)。——
第380页。
蒙森，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
dor)。——第221页。
弥勒 (Müller)。——第262页。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 (Miquel, Johan-
nes von)。——第205、221页。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 (Mirabeau,
Honore Gabriel)。——第223页。
米勒兰，亚历山大·埃蒂耶纳 (Mille-
rand, Alexandre Etienne)。——
第489、564、594、595、602、603、
615页。
闵采尔，托马斯 (Münzer Thomas)。
——第223页。
缪尔纳，亚马多·哥特弗利德·阿道夫
(Mullner, Amandus Gottfried

Adolf)。——第158页。
莫尔肯布尔，赫尔曼 (Molkenbuhr,
Hermann)。——第262、264、290、
384页。
莫尔，托马斯 (More, Thomas)。——
第375页。
莫斯特，约翰 (Most, Johann)。——
第462、491页。
默莱尔 (Möller)。——第565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第92页。

N

拿破仑第一 (拿破仑·波拿巴) (Napo-
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第58、286页。
纳乌曼，弗里德里希 (Naumann,
Friedrich)。——第195、554、561、
569、585、595页。
纽包威尔，利推尔·冯 (Neupauer Rit-
ter von)。——第136页。
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 (Nieuwen-
huis, Ferdinnad Domela)。——
第490页。
诺西希，阿尔弗雷德 (Nossig, Alfred)。
——第412页。

P

帕尔乌斯 (Parvus, 即亚历山大·格尔
方德 Alexander Helphand)。——第
29、45、51、52、67、74、96—98、
144、164、231、324、386、390、402、
406、414、415、426、435、440、460、
461、474、475、484、561、579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 (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第364页。
普凡库赫，威廉 (Pfannkuch, Wilhelm)。
——第520、628页。
普拉特，尤利乌斯 (Platter, Julius)。
——第107、109页。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Plechanow, Georgi Walentino-

witsch)。——第5—8、45、84、86、99、103、106、107、159、354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第286、331、333、349、350、366页。

Q

齐格勒 (Ziegler)。——第203页。

R

饶勒斯，让 (Jaurès, Jean)。——第163、400、489、490、503、507、520、527、594、597、615页。

S

萨特伦德，哈利埃特·伊丽莎白·乔治娜·鲁森-高尔 (Sutherland, Harriet Elisabeth Georgina Leveson-Gower)。——第218页。

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冯 (Savigny, Friedrich Karl von)。——第554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 (Say, Jean-Baptiste)。——第91、137页。

桑巴特，威纳尔 (Sombart, Werner)。——第194、412、444页。

色诺芬 (Xenophon)。——第488页。

舍尔 (Scherl)。——第212、515页。

施杜姆，冯 (Stumm, von)。——第23、220、240、266页。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Karl August)。——第65、75页。

施米特，康拉德 (Schmidt, Conrad)。——第5—7、27、30、37、84、86、103、120、121、264、320页。

施穆勒，古斯达夫 (Schmoller, Gustav)。——第121、122、428、444页。

施塔姆法尔 (Stampfer)。——第108页。

施塔特哈根，阿尔都尔 (Stadthagen, Arthur)。——第15、17、31、76、262、264、265、448、471、514、555页。

施泰恩，雅科布 (Stern, Jacob)。——第6、232页。

施托尔登，奥托 (Stolten Otto)。——第250、251、271、591、592页。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第588页。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第146、147、200、201、216、238页。

舒尔采-格弗尼茨·格尔哈特·冯 (Schulze-Gavernitz, Gerhard von)。——第88、92—94、107、109、136页。

司徒卢威，彼 (Struve, P.)。——第321页。

斯密，亚当 (Smith, Adam)。——第378、380页。

T

提利特，本杰明 (Tillet, Benjamin)。——第632页。

屠拉梯，菲利浦 (Turati, Filippo)。——第275、316、317、530、638、639页。

托马 (Thomas)。——第306页。

W

瓦尔泰希，尤利乌斯 (Vahlteich, Julius)。——第580页。

瓦德西，阿尔弗里德伯爵 (Waldersee, Alfred Graf von)。——第10页。

瓦格纳，阿道夫 (Wagner, Adolf)。——第122、370、428、444页。

万根海姆，冯 (Wangenheim, von)。——第204页。

王德威尔得，艾米尔 (Vandervelde, Emile)。——第69、238、279页。

威廉二世 (Wilhelm II)。——第10、23、37、223、560页。

威纳尔 (Werner)。——第55页。

微耳和，鲁道夫 (Virchow, Rudolf)。——第515页。

韦尔特海姆 (Wertheim)。——第515

页。

维伯, 悉尼·詹姆斯 (Webb, Sidney James)。——第81、215、237页。

维伯, 比阿特里斯 (Webb, Beatrice)。——第81、215、237页。

沃尔弗, 尤利乌斯 (Wolf, Julius)。——第93、137、184页。

沃尔特曼, 路德维希 (Woltmann, Ludwig)。——第242、251、262页。

乌尔里希, 卡尔 (Ulrich, Karl)。——第18、252页。

乌努斯 (Unus)。——第324页。

乌斯宾斯基 (Uspenski)。——第128页。

X

西哀士, 艾曼纽尔·约瑟夫 (Sieyes, Emmanuel-Joseph)。——第223页。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第342页。

希尔施, 麦克斯 (Hirsch, Max)。——第146、147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第207页。

席佩耳, 麦克斯 (Schippel, Max)。——第32、63、76、138、172、177、

266、273、395、429、447、532、586页。

肖伯纳, 乔治 (Schaw, George Bernard)。——第316页。

辛格尔, 保尔 (Singer, Paul)。——第30、31、55、73、86、168、249、282、293、297、316、384、400、548、554、615、622、632页。

休恩朗克, 布鲁诺 (Schönlank, Bruno)。——第25、30、265、272、292、293、296、343、507、526、600页。

休特古姆, 阿尔伯特 (Sudekum, Albert)。——第306、545、615页。

Y

伊塞格里姆 (Isegrim)。——第172、447、512、513页。

雅斯特洛夫 (Jastrow)。——第556页。

Z

泽吉茨, 马丁 (Segitz, Martin)。——第562页。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第332、347页。

宗内曼, 列奥波特 (Sonnemann, Leopold)。——第266页。

页。

维伯, 悉尼·詹姆斯 (Webb, Sidney James)。——第81、215、237页。

维伯, 比阿特里斯 (Webb, Beatrice)。——第81、215、237页。

沃尔弗, 尤利乌斯 (Wolf, Julius)。——第93、137、184页。

沃尔特曼, 路德维希 (Woltmann, Ludwig)。——第242、251、262页。

乌尔里希, 卡尔 (Ulrich, Karl)。——第18、252页。

乌努斯 (Unus)。——第324页。

乌斯宾斯基 (Uspenski)。——第128页。

X

西哀士, 艾曼纽尔·约瑟夫 (Sieyes, Emmanuel-Joseph)。——第223页。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第342页。

希尔施, 麦克斯 (Hirsch, Max)。——第146、147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第207页。

席佩耳, 麦克斯 (Schippel, Max)。——第32、63、76、138、172、177、

266、273、395、429、447、532、586页。

肖伯纳, 乔治 (Schaw, George Bernard)。——第316页。

辛格尔, 保尔 (Singer, Paul)。——第30、31、55、73、86、168、249、282、293、297、316、384、400、548、554、615、622、632页。

休恩朗克, 布鲁诺 (Schönlank, Bruno)。——第25、30、265、272、292、293、296、343、507、526、600页。

休特古姆, 阿尔伯特 (Sudekum, Albert)。——第306、545、615页。

Y

伊塞格里姆 (Isegrim)。——第172、447、512、513页。

雅斯特洛夫 (Jastrow)。——第556页。

Z

泽吉茨, 马丁 (Segitz, Martin)。——第562页。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第332、347页。

宗内曼, 列奥波特 (Sonnemann, Leopold)。——第266页。

页。

维伯, 悉尼·詹姆斯 (Webb, Sidney James)。——第81、215、237页。

维伯, 比阿特里斯 (Webb, Beatrice)。——第81、215、237页。

沃尔弗, 尤利乌斯 (Wolf, Julius)。——第93、137、184页。

沃尔特曼, 路德维希 (Woltmann, Ludwig)。——第242、251、262页。

乌尔里希, 卡尔 (Ulrich, Karl)。——第18、252页。

乌努斯 (Unus)。——第324页。

乌斯宾斯基 (Uspenski)。——第128页。

X

西哀士, 艾曼纽尔·约瑟夫 (Sieyes, Emmanuel-Joseph)。——第223页。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第342页。

希尔施, 麦克斯 (Hirsch, Max)。——第146、147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第207页。

席佩耳, 麦克斯 (Schippel, Max)。——第32、63、76、138、172、177、

266、273、395、429、447、532、586页。

肖伯纳, 乔治 (Schaw, George Bernard)。——第316页。

辛格尔, 保尔 (Singer, Paul)。——第30、31、55、73、86、168、249、282、293、297、316、384、400、548、554、615、622、632页。

休恩朗克, 布鲁诺 (Schönlank, Bruno)。——第25、30、265、272、292、293、296、343、507、526、600页。

休特古姆, 阿尔伯特 (Sudekum, Albert)。——第306、545、615页。

Y

伊塞格里姆 (Isegrim)。——第172、447、512、513页。

雅斯特洛夫 (Jastrow)。——第556页。

Z

泽吉茨, 马丁 (Segitz, Martin)。——第562页。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第332、347页。

宗内曼, 列奥波特 (Sonnemann, Leopold)。——第266页。

页。

维伯, 悉尼·詹姆斯 (Webb, Sidney James)。——第81、215、237页。

维伯, 比阿特里斯 (Webb, Beatrice)。——第81、215、237页。

沃尔弗, 尤利乌斯 (Wolf, Julius)。——第93、137、184页。

沃尔特曼, 路德维希 (Woltmann, Ludwig)。——第242、251、262页。

乌尔里希, 卡尔 (Ulrich, Karl)。——第18、252页。

乌努斯 (Unus)。——第324页。

乌斯宾斯基 (Uspenski)。——第128页。

X

西哀士, 艾曼纽尔·约瑟夫 (Sieyes, Emmanuel-Joseph)。——第223页。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第342页。

希尔施, 麦克斯 (Hirsch, Max)。——第146、147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第207页。

席佩耳, 麦克斯 (Schippel, Max)。——第32、63、76、138、172、177、

266、273、395、429、447、532、586页。

肖伯纳, 乔治 (Schaw, George Bernard)。——第316页。

辛格尔, 保尔 (Singer, Paul)。——第30、31、55、73、86、168、249、282、293、297、316、384、400、548、554、615、622、632页。

休恩朗克, 布鲁诺 (Schönlank, Bruno)。——第25、30、265、272、292、293、296、343、507、526、600页。

休特古姆, 阿尔伯特 (Sudekum, Albert)。——第306、545、615页。

Y

伊塞格里姆 (Isegrim)。——第172、447、512、513页。

雅斯特洛夫 (Jastrow)。——第556页。

Z

泽吉茨, 马丁 (Segitz, Martin)。——第562页。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第332、347页。

宗内曼, 列奥波特 (Sonnemann, Leopold)。——第266页。